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通史·现代卷



1917 ~ 1945 年苏、美、英、法、 德、日政府首脑一览表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名单

1917.11 ~ 1924.1	列宁
1924.1 ~ 1930.12	李可夫
1930.12 ~ 1941.5	莫洛托夫
1941.5 ~ 1953.3	斯大林

美国总统名单

1913 ~ 1921.3	威尔逊（民主党）
1921.3 ~ 1923.8	哈定（共和党）
1923.8 ~ 1929.3	柯立芝（共和党）
1929.3 ~ 1933.3	胡佛（共和党）
1933.3 ~ 1945.4	罗斯福（民主党）
1945.4 ~ 1953.1	杜鲁门（民主党）

英国政府首相名单

1916.12 ~ 1919.1	劳合·乔治（自由党、保守党、 工党联合内阁）
1919.1 ~ 1922.10	劳合·乔治（自由党、保 守党联合内阁）
1922.10 ~ 1923.5	邦纳·劳（保守党内阁）
1923.5 ~ 1924.1	鲍尔温（保守党内阁）
1924.1 ~ 1924.11	麦克唐纳（工党内阁）
1924.11 ~ 1929.6	鲍尔温（保守党内阁）
1929.6 ~ 1931.8	麦克唐纳（工党内阁）
1931.8 ~ 1935.6	麦克唐纳（国民工党、保守党、 自由党国民政府）
1935.6 ~ 1937.5	鲍尔温（保守党、自由党、国民工党 国民政府）
1937.5 ~ 1940.5	张伯伦（保守党、自由党、国民工党 国民政府）
1940.5 ~ 1945.5	丘吉尔（保守党、工党、自由党联合内阁）
1945.5 ~ 1945.7	丘吉尔（看守内阁）
1945.7 ~ 1951.10	艾德礼（工党内阁）

法国总理名单

1917.11 ~ 1920.1	克里孟梭
1920.1 ~ 1920.2	米勒兰

1920.2 ~ 1920.9 米勒兰
1920.9 ~ 1921.1 勒古
1921.1 ~ 1922.1 白里安
1922.1 ~ 1924.3 普恩加莱
1924.3 ~ 1924.6 普恩加莱
1924.6 马塞
1924.6 ~ 1925.4 赫里欧

1925.4 ~ 1925.10 潘勒韦
1925.10 ~ 1925.11 潘勒韦
1925.11 ~ 1926.3 白里安
1926.3 ~ 1926.6 白里安
1926.6 ~ 1926.7 白里安
1926.7 赫里欧
1926.7 ~ 1928.11 普恩加莱
1928.11 ~ 1929.7 普恩加莱
1929.7 ~ 1929.11 白里安
1929.11 ~ 1930.2 塔迪厄
1930.2 ~ 1930.3 旭丹
1930.3 ~ 1930.12 塔迪厄
1930.12 ~ 1931.1 斯蒂
1931.1 ~ 1932.1 赖伐尔
1932.1 ~ 1932.2 赖伐尔
1932.2 ~ 1932.6 塔迪厄
1932.6 ~ 1932.12 赫里欧
1932.12 ~ 1933.1 邦库尔
1933.1 ~ 1933.10 达拉第
1933.10 ~ 1933.11 萨罗
1933.11 ~ 1934.1 旭丹
1934.1 ~ 1934.2 达拉第
1934.2 ~ 1934.11 杜迈格
1934.11 ~ 1935.5 弗朗丹
1935.5 ~ 1935.6 博松
1935.6 ~ 1936.1 赖伐尔
1936.1 ~ 1936.6 萨罗

1936.6 ~ 1937.6 勃鲁姆
1937.6 ~ 1938.1 旭丹
1938.1 ~ 1938.3 旭丹
1938.3 ~ 1938.4 勃鲁姆
1938.4 ~ 1940.3 达拉第
1940.3 ~ 1940.6 雷诺
1940.6 ~ 1944 贝当

德国总理名单

1909 ~ 1917.7	贝特曼-霍尔维格
1917.7 ~ 1917.10	米夏埃利斯
1917.10 ~ 1918.9	赫特林
1918.10 ~ 1918.11	马克斯，巴登亲王
1918.11 ~ 1919.1	艾伯特
1919.1 ~ 1919.6	谢德曼
1919.6 ~ 1920.3	鲍威尔
1920.3 ~ 1920.6	缪勒
1920.6 ~ 1921.5	费伦巴赫
1921.5 ~ 1922.11	维尔特
1922.11 ~ 1923.8	古诺
1923.8 ~ 1923.11	施特雷泽曼
1923.11 ~ 1925.1	威廉·马克斯
1925.1 ~ 1926.5	汉斯·路德
1926.5 ~ 1928.6	威廉·马克斯
1928.6 ~ 1930.3	缪勒
1930.3 ~ 1932.5	布吕宁
1932.5 ~ 1932.11	巴本
1932.12 ~ 1933.1	施莱彻尔
1933.1 ~ 1945.5	希特勒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名单

1916.10 ~ 1918.9	寺内正毅
1918.9 ~ 1921.11	原敬
1921.11 ~ 1922.6	高桥是清
1922.6 ~ 1923.8	加藤友三郎
1923.9 ~ 1924.1	山本权兵卫
1924.1 ~ 1924.6	清浦奎吾
1924.6 ~ 1926.1	加藤高明
1926.1 ~ 1927.4	若礼次郎
1927.4 ~ 1929.7	田中义一
1929.7 ~ 1931.4	滨口雄幸
1931.4 ~ 1931.12	若礼次郎
1931.12 ~ 1932.5	犬养毅
1932.5 ~ 1934.7	斋藤实
1934.7 ~ 1936.3	冈田启介
1936.3 ~ 1937.2	广田弘毅
1937.2 ~ 1937.6	林銑十郎
1937.6 ~ 1939.1	近卫文

1918年11月以前为德意志帝国首相，以后为共和国总理。

1939.1 ~ 1939.8	平沼骐一郎
1939.8 ~ 1940.1	阿部信行
1940.1 ~ 1940.7	米内光政
1940.7 ~ 1941.10	近卫文
1941.10 ~ 1944.7	东条英机
1944.7 ~ 1945.4	小矶国昭
1945.4 ~ 1945.8	铃木贯太郎
1945.8 ~ 1945.10	东久迩稔彦

后记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

导言许平、王红生、徐天新

第一章

 第一、二、四节徐健

 第三节王利军

第二章王红生

第三章李红庆

第四章

 第一节李红庆、徐天新

 第二、三节李红庆

第五章李兴

第六章许平

第七章徐天新

第八章梁志明

第九章

 第一、三、四节梁志明

 第二节王红生

第十章王红生

第十一章王红生

第十二章许平

第十三章段钰

第十四章段钰

1917~1945年苏、美、英、法、德、日政府首脑一览表徐天新、梁志明

大事年表徐天新、许平、王红生

重要人名、地名索引孙晓红、易秋芳

导言

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

改变世界面貌的变化始于本世纪初，或更早一些时候。以现代人的眼光，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门槛上，透视纷乱迷繁、气象万千的历史烟云，会发现此时正面临从近代文明向现代世界起承转合的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发源于15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渗透扩展至此已告一段落，经过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已建立起欧洲在全球居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临近20世纪，资本主义受其内在矛盾运动的驱使，也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末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依靠武装夺取政权的手段，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本书所涵盖的20世纪前半叶无疑是变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旧的界限仍然存在并继续发生作用，新的结构已经萌发生长并日益居于主导地位，新旧因素交替杂陈，新老力量交织对立，由此引出半个世纪的较量与碰撞、调整与变革、危机与革命、冲突与战争。在经历了一番动荡、调整、革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历史发展了，人类进步了，进入不同以往的新纪元。

在创造新世界的诸种力量中，最根本的力量是科学技术革命。本世纪初静悄悄地发生、延续至两次大战之间的那场科技革命，以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的确立为中心内容，涉及带动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理论的革命性的突破。科学理论的革命推动日后原子能技术、无线电技术、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又以其不可抗拒的渗透力量影响改变着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产品标准化和装配线生产的福特制的广泛采用，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因科技革命的发展而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我们今天生活内容的汽车、航空、化工、电气、石油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纺织、采掘等传统工业相对衰落。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也改观了，带有鲜明的现代生活的色彩。

科技进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还使得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加强，地球因此变小，成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各国政治经济不再彼此孤立隔绝，而是相互依存。一国发生的变革很快会影响、波及地球上的其他角落，甚至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可以说，世界一体化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和趋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这部世界史必须是以全球的观点来考察促成现代世界形成的各个大陆、各个国家、各种力量发展变化的历史。当然，世界一体化并不等同于世界同一化，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多样化多极化的发展，才构成世界各国既相

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

本世纪前几十年无疑是一个调整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多种矛盾尖锐冲突，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深刻震撼着资本主义世界。在战争废墟上挣扎出来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度过战后经济政治危机第一次全球性冲击之后，在国内政治关系上作出一些调整，政治民主化倾向有所加强，扩大民主权利，实行普选制，而英国还调整了帝国内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各国政局走向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本世纪 20 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出现程度不同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苏联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1929 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危及全球的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困境，寻找资本主义存在、发展的出路，一反自由竞争时代政府对经济生活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性地对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与调整，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较为坚固的美国实行以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罗斯福新政。英国政府则节约开支、提供就业机会、大力调整英联邦内部的相互关系。法国政府对军事工业、铁路、银行实行国有，并资助私人垄断资本企业。这些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不仅基本克服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引出绝境，而且为日后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难怪最先举起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大纛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把您任总统之日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德国和日本，公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起法西斯政权，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经济上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对外，则希图用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现代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畸型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20 世纪前几十年还是亚非拉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末已使广大亚非地区沦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入 20 世纪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拉丁美洲虽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获得政治独立，但英美很快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重新控制了该地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也在客观上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新的经济部门出现和发展，外贸增加，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加强。在此基础上，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新型的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在城市中，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中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 20 世纪初，亚非拉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成立了政治组织，在其领导下，亚洲一些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受十月革命的启发和鼓舞，一战后，在亚非拉许多国家先后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而原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出现激进化的倾向，出现了一大批像孙中山、甘地、凯末尔、恩克鲁玛和卡德纳斯等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人物。他们提出了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纲领，对当时社会

主义苏联的建设成就不同程度地怀抱钦仰之心。他们同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认识到唤起工农的重要性，在城乡广泛建立党组织，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从而使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持续性、广泛性和成熟性的新特点。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各国发展不平衡，表现在运动的领导阶级、斗争方式和运动结局的多样性上。在中国，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最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在印度，国大党人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旗帜下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在土耳其，凯末尔领导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开展民主改革；而埃塞俄比亚的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斗争则是在爱国王公贵族领导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最后获得成功的。所有这些民族解放斗争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因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曾经是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在 19 世纪，欧洲主宰世界，英国担任“乐队指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称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秩序看上去似乎天经地义，可以永恒存在。然而，自本世纪初开始，这一体系受到来自几方面的挑战。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作用下，美、德、日等国后来居上，在经济实力上赶上或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争夺殖民地、世界市场等方面矛盾尖锐，终于兵戎相见，以世界性战争的方式解决难以调和的冲突。这场主要是欧洲列强之间的血战，使点燃战争之火的欧洲本身被削弱、被改造。通过战争，英法殖民地虽然比 1914 年以前还有所扩大，但它们的实力在拼杀中严重削弱。雄踞欧洲几个世纪之久的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奥斯曼等帝国在战火中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在其废墟上出现社会主义苏联及德、奥、捷、匈、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在帝国主义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增添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一不可忽视的矛盾，这一矛盾对日后的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影响。然而，历史性的影响及变化并没有为当时的人们所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战胜国仍然希图恢复原有的旧秩序。它们像以前一样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建立起帝国主义新的世界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成立一个仍由欧洲领导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国际联盟，以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的新秩序。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实力为基础，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实力你消我长的发展变化，这一体系也在进行局部调整。20 年代相对和平稳定时期，通过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加诺公约、及其他国际性协议，缓和了战胜国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为防止新的战争，大国间进行裁军谈判，六十多个国家缔结了巴黎非战公约。社会主义苏联在战胜最初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后，20 年代开始潜心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状态。但是，短暂的和平为 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所打断。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内及国家间潜在的矛盾空前激化。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非大陆点燃侵略之火，企图用武力摧毁凡尔赛体系，按照新的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当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人民为抵制法西斯侵略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英法等大国却推行牺牲别国利益、部分满足侵略者要求，以求自身免于战火的绥靖政策。绥靖政策不仅不能制止战争，反倒纵容了侵略。德、

意、日率先建立侵略集团，而英、法、美、苏却迟迟不能建立起集体安全体系。制止侵略战争扩大的努力因彼此的矛盾作祟归于失败。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部开动。德国在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以后，便挑起新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名符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大搏斗。人类五分之四的人口，六十多个国家卷入战争，战场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大区域。反法西斯的世界人民在陆地、在空中、在海洋，甚至在水下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殊死的战斗。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战争狂人，英、美、苏、中等不同制度的国家终于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同仇敌忾、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社会主义苏联在战争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德、意、日法西斯从他们侵占的欧、亚、非大片地区驱逐出去。进步战胜反动，正义战胜邪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完成了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诸种变化。在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现代世界的轮廓清晰可见：存在几个世纪的欧洲霸权丧失了，代之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两相对峙的世界格局，尽管从现在的视角看，这一格局只是世界由一极向多极，由一元向多元转化的中介。此外，这场战争本来是因争夺或维护殖民地而引起的，但一场大厮杀之后，交战的结果令交战双方始料不及，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帝国宣告结束，亚、非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即使是战争的胜利者也不得不为日不落殖民帝国安排葬礼。战争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的发展，世界面貌又因之有新的改观。在完成诸种转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

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即本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人类刚刚经历的历史记录。在这世界历史转折变化的时期，人类活动的内容和活动范围异常宽广丰富、矛盾复杂、变化无穷。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撰述因此不能简单化、概念化。既要把握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三大主要矛盾，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又要从全球的视野出发，深入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真实历史过程，梳理出包融交汇的各种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准确理解历史急剧变革时期的深邃历史内涵。由此而鉴往知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世界，了解和探索世界未来。

世界通史（现代卷）

第一章 进入 20 世纪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新阶段

经过 19 世纪最后 30 年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到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经济和物质的观点看，这个阶段的特点由于两个事实而变得显著。一是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而导致物质财富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向纵深发展和横向扩散。整个世界在更大程度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最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是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

从 19 世纪末开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它们完全是由于科学上的发现而兴起的第一批工业。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紧密结合，又不断发展出新的工业。无数新的工业产品如汽车、飞机、电话、人造丝、合成纤维织物，甚至人造食物调味品等令人眼花缭乱。工业产品的范围不断被开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生产总量的大幅度增加。1870~1900 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近 2 倍，1900~1913 年仍保持这一发展速度。工业领域这种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其他一些重工业产品的增长量也是惊人的。世界煤炭产量，1870 年为 18,910 万吨，1913 年提高到 112,670 万吨，增长了近 5 倍。世界生铁产量，1870 年是 1203 万吨，1913 年达到 7915 万吨，增加了 5.6 倍。世界钢产量 1870 年仅 52 万吨，1913 年则上升至 7635 万吨，提高了近 146 倍。

世界工业生产指数 (1913 年 = 100)	
1870 年	19.5
1880 年	16.9
1890 年	41.1
1900 年	58.7
1913 年	100.0

伴随着工业迅猛发展的，是交通运输业的巨大飞跃，其重要成就是世界铁路网的形成和蒸汽船取代木帆船。19 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开始进入铁路建设时期，当时世界铁路长度还只有 38,600 公里，到 1880 年则增长到了 372,000 公里。19 世纪最后 25 年，铁路建设依旧蓬勃发展，人们修建新铁路，用钢轨代替铁轨。1890 年，世界铁路长度达 617,285 公里，1911 年更达到 1,057,809 公里，20 年内增加了 71%。其中，除了欧洲铁路网密度增加，从 223,869 公里发展到 338,880 公里外，美国铁路的长度大大超过了欧洲，1911 年达到 541,028 公里，超过了世界其他所有地区铁路长度之和。另外，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铁路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环绕世界的铁路网。

海洋运输在铁路出现之前，承担着主要的运输业务。随着苏伊士运河

(1869年)、基尔运河(1895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的开通,世界航运距离大大缩短,使这个古老行业焕发了生机。但是,使海洋运输的效益发生根本转机的还是蒸汽船代替木帆船游弋海上。1870年,欧美主要航运大国还主要是以木帆船承担货运,蒸汽船尚属于新生事物。到1883年,英国的蒸汽船吨数已和帆船吨数相等。十年后,全世界的吨数也达到同样的情况。191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马力大、安全可靠的蒸汽船吨位全都大大超过了帆船吨位。

1870、1910年主要航运国注册商船吨位(单位:千吨)			
		1870年	1910年
英国	木帆船	4578	1113
	蒸汽船	1113	10143
法国	木帆船	921	638
	蒸汽船	151	846
德国	木帆船	872	507
	蒸汽船	67	2383
美国	木帆船	2363	1655
	蒸汽船	1075	4900

科技的发展,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产品的多样化,陆路和海上运输的发展,这些都是促使世界贸易的规模和性质发生彻底变革的因素。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国际贸易增长的数字(见下表)。

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外贸易(单位:百万马克)	
年份	贸易额
1907	133943.5
1909	132515.0
1911	153870.0

尽管除英国之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采取了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但世界贸易总额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增多了。从1903年到1911年的八年中,国际贸易增长了50%。贸易的巨幅增长,除了国际贸易相当活跃的欧洲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扩大本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外,随着制造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分工的加剧,欧洲以外的地区更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向欧洲市场提供食品和原料。对外贸易日益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欧洲虽然在世界贸易中仍然占支配地位,但贸易额度下降了,而北美、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地位则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在欧洲内部,原来由英国独霸的贸易格局也开始被打破,德、法等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急剧上升。1913年,英、德、法在世界贸易中的百分比各为16%、12%、7%。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也有所变化,初级产品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多。1876~1913年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关系大体保持稳定,均衡发展。这

表明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大大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依赖性，世界上更多的地区打破了经济上的隔绝，彼此接近，在不断扩展的世界市场中，融合成一个世界规模的单一经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世界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稳定上升的，而是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发展。由于生产的扩展和加强超过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能力，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后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以至于世界经济史上把 1873~1895 年这个时期称为“大萧条”时期。20 世纪的序幕也是由经济危机揭开的，1900~1903 年，1907~1909 年，两次经济危机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虽然每次经济危机都普遍导致了价格、利润的下跌和投资范围的缩小，但从世界经济整体来考察，19、20 世纪之交，依然是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是个“富有活力”的时代。因为危机本身是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恶性表现，而危机当中出现的激烈竞争、企业兼并，又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方式经历了根本性变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工业化的纵深发展和横向扩散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完善，工业部门的日益增多，加之劳动组织和管理方法的更加科学化，进入 20 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了工业化。在这些国家中，工业化引起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

首先是工农业结构的变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的相对地位无一例外地都提高了，农业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到 20 世纪初，工业的产值基本上都超过了农业。美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保持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1889 年，工业所创造的净产值达 45.1 亿美元，占工农业所创造的净产值总额的 58.3%，农业创造的净产值为 32.4 亿美元，占 41.7%，工业大大超过了农业。法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个农业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工农业对比关系变动幅度较小，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超过了农业。20 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其次，重工业取代轻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大多发轫于以棉纺织为主的轻工业，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对能源、动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产生了更多的需求，由此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带动了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等等的产生。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工业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力。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轻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结构非常牢固。但到 19 世纪末，这个结构也发生了调整。1907 年，英国按净产值计算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为 58:42，重工业占了优势。德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工业化进展迅速。1895 年，德国重工业工人在全国工人中的比重占 35.1%，1913 年更提高到 54.5%。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成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构成了这一时期工业化国家的另一大景观。德国人口向城市移动在欧洲国家中是属于特别迅速的。1871 年，城市人口还只占 36.1%，1900 年，上升为 54.4%，1910 年更发展为 60%。美国城市人口的比重 1870 年为 25.7%，1900 年增加到 39.7%。英国的城市化程度是各国中最高的，1901 年，城市

人口比重就已高达 77%。法国的城市化运动不算迅速，但到 1911 年止，每十年都有 3% 的人口由农村移居城市。城市化虽然不等于工业化，但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人口的急剧上涨，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业不断增长和相对集中的趋势。

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纵深发展同时进行的还有工业化在国际上的横向扩散。资本是没有国界的，通过技术的国际传播、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移民等等方式，资本主义工业扩散到了过去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旋涡的国家和地区，促成了全球规模的世界经济的形成。据统计，1870~1913 年间，英、法、德、美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1870 年四国工业生产合计占 78%，1881~1885 年约为 79%，1896~1900 年为 74%，1913 年则为 72%。虽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仍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显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俄国自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工业发展迅速，到 1910 年工业生产增长了 9.5 倍。1913 年，俄国工业生产据世界第五，达到中等经济发展水平。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大力发展工业，1901~1914 年，日本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 6.3%，远远高出其他国家的增长水平。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更多的国家中展开了。

英国由盛转衰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均势却发生了显著变化。1870 年，英国的优势是无敌的；1900 年，它在整个世界工业和商业上的地位却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美国和德国崛起，对英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

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建立了其“世界工厂”的地位，达到了发展的“极盛时代”。进入 20 世纪，英国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和财政的中心国家。伦敦是世界金融的大本营，英国在贸易、海运，甚至传统出口工业品生产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资本输出的绝对数额和增长的幅度英国都高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三大支柱——煤炭、棉纺织和造船工业在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仍经历了迅速增长的阶段。但是，在繁荣和发展的背后，英国也出现了某些衰落的景象。1850~1870 年，英国经济增长率为 3.12%，1870~1913 年则下降到 2.1%。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1870 年为三分之一，1900 年为五分之一，1913 年则下降为七分之一。其中，基础工业煤、生铁和钢的产量急剧下跌。1880 年，英国煤产量高于美国和德国产量之和，到了 1913 年，却只有美国煤产量的半数略强。生铁的产量 1890 年被美国超过，1913 年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德国的一半。钢的生产也很快落后于美国，1900 年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德国的二分之一。随着工业生产的下跌，英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下滑，从 1880 年的四分之一降到 1913 年的六分之一。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是英国经济地位的象征，曾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它们的衰退，标志着英国由盛而衰的开始。

英国的相对衰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创新和进取精神的减弱，这是由长期以来“世界工厂”的优越地位所带来的负面效果。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工业部门结构显著变革的年代，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工业的面貌。但在英国，传统工业结构因为经济上的合算而继续固守工业阵地；新兴工业部门由于巨额资本难以形成，发展步履维艰。虽然政府也扶植了汽车、电力和人造丝等新兴工业，但这些部门规模小，政府经济政策又不稳定，因

而仍然无法弥补旧工业部门的衰退。技术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得英国工业生产固步自封，不愿接受最有前途的新发明，从而延缓了新一代技术力量的培养和对外国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吸收。此外，企业管理方式的落后与陈旧也是工业发展的一大阻力。英国的企业由于受到政府放任自流经济政策的影响，垄断化程度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较低水平，进展缓慢，旧式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管理，使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立不败之地。

美、德成长为新兴工业国 与英国的衰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工业国的崛起。

1870~1913年间，美国的发展速度呈跳跃式进行，工业增长了8.1倍，而与此同时，英国却只增长了1.3倍。1894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此后，差距不断扩大，到191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240亿美元，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主要的重工业产品中，美国的生铁产量由1860年的84万吨增加到1915年的3300万吨。同期，由于新的炼钢法的采用，钢产量也大踏步向前，从原来的1.2万吨上升到1915年的3200万吨。此外，食品制造和加工、纺织、木材及木材制品工业也成为美国工业的重要支柱。对新兴工业的重视，是美国工业迅速腾飞的重要原因。石油工业自始就是美国的天下，1860年石油开采量还只不过50万桶，1910年突增至20,960万桶。1895年刚刚起步的汽车工业，发展更为神速，1914年创下了生产56万辆的水平。电力工业也不落后，1914年产值达到35,943万美元。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发展之快，使英国处处感到威胁。1901年，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宣称，大不列颠很怕和美国搞经济竞争，因为“美国拥有的工业生产能力无与伦比，生产力量无穷无尽”。

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咄咄逼人，除了有赖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移民国家的优势，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外，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值得一提。在这方面，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泰勒，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泰勒制”被普遍运用于工厂企业，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而亨利·福特由于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福特主义”的问世使大批种类繁多的产品投放市场，为美国获得了巨大财富。

德国的发展速度仅次于美国，20世纪初，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生产提高了4.7倍。丰富的煤矿资源得到有效开采，煤产量从1870年的3400万吨上升到1913年的2.77亿吨。由于发明了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钢产量直线上升，从1870年的17万吨迅速发展到了1913年的1832万吨，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同期，生铁产量也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生铁和钢的巨幅增产为冶金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美国一样，新兴工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在这方面，德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还几乎等于零，但40年后，酸、碱等基本化学工业已占据世界首位，粗、细化学品和染料等大量输出国外。德国全部化学工业的雇工人数在1882~1907年的25年中增加了两倍。电气工业虽步美国后尘，但发展迅速，1891~1913年间，电气工业总值提高了28倍。电工器材在国外贸易中不断开辟新市场，为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本世纪初，德国在电气的特殊运用上居领导地位，工业、农业、铁路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广泛地采用了电力。

德国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经济史上乃是一个奇迹。这其中，除了 1870 年的统一使德国摆脱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国内市场得以形成之外，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 50 亿法郎的赔款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割让，也刺激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外，德国对教育和科技的高度重视，以及把科学方法用于工业和社会发展的成功，使德国在这一时期收到了丰硕果实。

概括而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赶上和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英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及时而迅速地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契机，采用新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并且在新的工业部门中，改变企业原有组织方式，采用大规模经营管理。

第二节 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

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向世界扩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得以最后形成。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重工业为特点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要求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力量雄厚，因而使生产和资本出现了不断集中的趋势。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1873~1907年间频繁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兼并和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吞噬过程。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集中达到了这样高的程度，最终导致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所谓垄断组织，一般是指资本主义企业间为了独占生产和市场，攫取高额利润而组成的垄断经济同盟。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一般来说，各国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美国垄断组织发展的程度高些，大多采取托拉斯的形式。1900~1907年美国托拉斯从185家增加到250家，托拉斯遍及美国主要经济部门。德国垄断组织发展程度仅次于美国，比较流行的组织形式是卡特尔。1905~1911年间德国卡特尔由385家增加到1600家。1900年，德国工业行业几乎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英、法相对来说，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程度要低于美、德，但在重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领域，这两个国家垄断的趋势也在明显加强。俄国和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但受到外国资本的扶植和本国政府的特殊保护，垄断组织的发展也很快。总的来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进入了垄断阶段，垄断组织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

垄断组织出现之后，立刻就能垄断一国之内的整个工业部门。据统计，美国最大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1904年垄断了国内石油市场的85%，石油出口贸易的90%；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1901年垄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原钢和钢铁预制品的生产。1910年，美国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纺织业50%，玻璃制造业54%，棉布印染业60%，食品加工业60%，酿酒业72%，金属工业77%，化学工业81%，钢铁工业84%，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全部处于托拉斯的控制之下。在德国，垄断组织对经济的控制也十分明显。德国著名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1903年垄断了全德煤炭生产的50%和相应的焦炭及煤砖生产；由各钢铁卡特尔组成的“钢铁联盟”，1910年控制了全国98%的钢铁生产；电气工业则基本被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两大集团控制。1910年，德国的垄断组织掌握了德国工业生产的80%。

与工业资本集中的同时是银行资本的迅速集中。英国和法国银行业垄断的程度远远高于工业。1913年，英国的五家最大的银行以仅占总行数5%的比重，拥有存款占全国银行总额的40%。1914年，法国银行资产总额为110亿法郎，为首的五大银行便占了其中的73%。德国六大银行1910年资本达11.2亿马克，集中了全国存款的一半。美国银行业资本也主要集中在两大财团，即花旗银行和国民商业银行手中。这类银行在获得垄断地位后，通过控制全国大部分存款、办理信贷抵押业务、独占公债和股票、有价证券发行等途径和手段，向工业资本渗透，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控制着国家政治和国民经济的命脉。

随着国内垄断的发展，金融资本国际联系的加强，各国垄断组织之间的

斗争加剧了。为了减少竞争造成的损失，各大垄断集团往往签订协定，成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组织。如在电气方面，1907年，德国和美国电气总公司签订了分割市场的协定。在航运方面，1903年，汉堡—美利坚公司、北德航运公司和摩根英美航运托拉斯之间也签订了划分活动范围的条约。这类国际垄断组织在20世纪初发展很快，到1910年便已增加到100个。这些国际垄断组织大多以卡特尔的形式出现，联系松散，又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无法和当代跨国公司相提并论。但它们的出现表明垄断已经走出了民族国家的范畴，发展到了一个比过去高的阶段，即“超级垄断”阶段，因而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有重大影响。

垄断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资本主义发展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这是由垄断独占生产与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一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因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而垄断并不消除竞争，相反使竞争在更高的程度上展开了。而且垄断使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同时也使技术的发明和改良过程社会化了。垄断组织有雄厚资金，有能力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并服务于生产。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采取一定的计划手段组织生产，控制市场状况。在企业内部，利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生产分工和专业化，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也对垄断行为进行某种调控。1857年德国通过了反控制竞争法。1890年，美国通过谢尔曼法，禁止有组织的反竞争安排。总之，垄断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它扩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迅速发展。

帝国主义的产生 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垄断的产生，也就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同，垄断资本主义有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为此，必将导致资本输出的扩大和对海外销售市场及原料产地的控制，并因此引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

资本总是要寻求最大利润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常常伴有资本输出的现象。但是，只有到了垄断阶段，资本输出才具有了空前特殊的重大意义。垄断资本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积极将“过剩”资本输往国外，并且主要是输往落后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规模扩大。英、法、荷、德、美五国1825年对外投资额仅9亿美元，1870年却增加到79亿美元，1913年更达到了新的高峰，共输出资本385.5亿美元。具体到各个国家，英国的资本输出一直遥遥领先，1913年达到了195亿美元，占其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位居其后，1913年资本输出额也有86亿美元，相当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这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流向与方式各有不同。英国资本大多输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美国，并且很大一部分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法国资本主要集中在欧洲，尤其是俄国，由于多半采用借贷的形式，被称为“高利贷资本主义”。德国这一时期资本输出的速度增长很快，甚至超过了英、法，一战前资本输出总额达67亿美元，是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成为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德国输出的资本半数投放在欧洲，其次是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美国在资本输出方面是个后来

者，1900年前对外投资还相当少，但增长幅度大，1914年资本输出额已激增至35亿美元。美、德对外投资的增长势头，充分反映了它们对外经济扩张方面的野心。

资本输出的急剧扩大，使得争夺投资机会和投资范围变成了垄断集团生死存亡的关键。同时，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资本在海外蒙受损失的风险加大，这就要求资本输出国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因此，资本输出使各列强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起来，以至于必须依靠军事武力。此外，垄断期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生产的工业品也急需寻求新市场，工业生产的原料也需要得到充分的供应和保证。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导致对世界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另外一方面，自由市场，即垄断组织尚未占有的市场却愈益狭窄。因此，列强在本国资本建立优势的要求的推动下，采取超经济手段，推行征服尚未被占领土地的“殖民政策”，并由此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

争夺殖民地的狂潮 对殖民地的争夺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始的。英国在屡次争斗中崭露头角，建立了大英帝国，并一直居于垄断地位。但是，整个19世纪，其他大国也不断地参与争夺殖民地的斗争。19世纪的最后30年，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帝国主义的产生，抢占殖民地再度成为热点。

从1870~1900年，英、俄、法、德、美和日本六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夺得殖民地领土2500万平方公里，使原来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扩大了一半以上，即由原来的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到1914年，六大殖民强国和其他殖民小国（如葡、荷、比等）所占有的殖民地面积的总和达到了749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面积的55%。如果按各个地区所占有的殖民领土的百分比算，澳洲被殖民的土地达到100%，非洲90.4%，亚洲56.6%，美洲27.2%，但是这些数字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它只涉及到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在19世纪初取得独立后，又先后遭到了英、德、美等资本势力的入侵，只不过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殖民地变成了半殖民地。亚洲也是如此，中国、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一些形式上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实际上也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任由列强干预、操纵政治，控制经济命脉。

在19世纪末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参加殖民行列的各强国目标各异。英帝国不变的外交政策是向全球扩大，继续保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因而在亚洲、非洲不断蚕食领地，扩充势力范围。同时，在拉丁美洲增加资本投资，成为该地区经济的霸主。1876年，英国殖民地面积有2250万平方公里，到1914年，则达到了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10倍。以对外扩张起家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以亚洲为主要目标，推行其在远东、中亚、西亚的蚕食政策，同时向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到1914年，沙俄霸占殖民地1740万平方公里，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后加紧了在非洲的争夺，同时在印度支那积极活动，先后控制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到1914年，它已拥有106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成为世界第三号殖民大帝国。德国80年代开始推行殖民政策，大肆抢占黑非洲的土地，并在大洋洲和中国扩大统治范围。1914年，它所抢到的殖民地也达到了290万平方公里。

到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基本瓜分完毕，但由于列强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继之而来的还将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分赃不均而引起的重新瓜分世界的

斗争。

美、日抬头 美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初都属于经济上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经济力量跃居世界第一，日本也以惊人的速度迈入大国行列。但是，美、日两国步入殖民事列晚，抢占殖民地少，1914 年，两国各占有殖民地面积 30 万平方公里。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政治实力和海外殖民地的相对弱势形成强烈反差，因而使得美、日帝国主义这一时期，在向外扩张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表现尤不一般。

美国在 19 世纪末开始逐渐摆脱其“孤立主义”的立场，广泛涉入国际事务。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是远东和太平洋地区，1898 年的美西战争预示着美国在远东扩张新时期的开始。1898 年 2 月 15 日，停泊在哈瓦那港内的美舰“缅因号”神秘地爆炸沉没，美国借机煽动国内对西班牙的战争情绪，挑起了美西战争。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和约》，规定美国吞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西班牙放弃对古巴主权和所有权的一切要求，由美国占领直至古巴政府建立。但根据 1901 年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有权监督古巴与外国的交往，有权对古巴人的生活、财产、个人自由乃至古巴的独立等事务进行干预。这样，古巴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国。美西战争是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后，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攫取了侵略硕果。

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是美国远东政策的继续。1899 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在致英、德、俄、日、意、法等六国的照会中表示，美国的“利益不得因任何列强在中国的所谓它们的势力范围以内的独占措施而受到损害，并希望在中国保持一个对世界商业开放着的市场”，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对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1900 年 7 月 3 日，美国又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以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为招牌，抗拒其他列强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从而无视美国人在华“合法利益”的企图。“门户开放”的实质是美国要求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得到的一切特权，这是美国与老牌帝国主义斗争，打入它们已经占有的中国阵地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它在中国的优势。

自 1823 年“门罗主义”问世以来，对拉丁美洲的不断渗透和排除外国势力对拉美的影响，便成了美国拉美政策的一贯目标。1901 年，美、英双方签订“海—庞斯福特条约”，承认美国单独修建与防御地峡运河的权利，从而排挤了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之后，美国又策划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迫使巴拿马共和国签订不平等的《美巴条约》，从中取得运河开凿权和运河区的永久租让权。

1903 年，委内瑞拉拒绝偿付国际债务，英、德出动军舰封锁并炮轰委内瑞拉港口，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派舰队采取警备措施。英、德在美的压力下被迫退缩，这一事件使美国对其今后的拉美政策倍增自信。翌年，多米尼加发生类似事件。为阻止欧洲国家的干预，美国断然接管了多米尼加海关，以海关税收清偿外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此在 1904 年 12 月向参议院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洲国家所发生的恶行，要求某些文明国家进行干涉。由于对门罗主义的信奉，美国将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一新政策，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它实质上是把美洲置于美国监督之下的断然通告，同时也为美国对外扩张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理论基础。

日本这一时期对外扩张的欲望也急剧膨胀。它推行“大陆政策”，即以

侵略中国东北和朝鲜为基本国策。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的江华岛，逼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取得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日本势力进入朝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将战火直接烧到了中国东北。在第二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日本割去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虽然因为受到俄、德、法三国的武力干涉，日本暂时放弃了辽东半岛，但却因此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3000万两银子的补偿。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对远东的领土野心进一步昭显。

与日本在东北亚扩张同时，俄国的势力也不断向这一带渗透。1896年，沙俄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力；1898年，又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1900年，沙俄派兵侵入中国东北，长期拒不撤兵，并同时插手朝鲜事务。日、俄发生尖锐冲突。

1903年，沙俄决定在中国东北实行“新方针”，即停止从中国东北撤军，并从俄国本土派遣增援部队；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东北，染指朝鲜。日、俄矛盾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持续了近一年，交战双方消耗巨大。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日本取得中国辽东半岛、俄国库页岛南部，以及对朝鲜的独占权。至此，日本夺取了相当其本国面积76%的殖民地，并将中国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初步形成了一个殖民帝国。

日俄战争是在别国领土上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粗暴蹂躏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节 20 世纪初的欧美社会政治

进入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社会构成 在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叶欧美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之后，第一次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大工业。它同时还导致一个包括北美（主要是美国）、西欧和中欧在内的广大的工业化地带的出现。

在这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工业，极大地刺激了工业资本的膨胀。进入本世纪不久，美国以工业为主的私人非农业企业的产值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75%；在西欧、中欧各主要工业国，工业私人资本也都毫无争议地成为本国经济的首要支柱。这样，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就普遍存在着一个空前强大的现代工业资本集团。位于这个工业资本集团顶端的是一群金融寡头。他们又以金融资本这种更高形态的资本进一步地控制整个工业资本。正是这个工业—金融资本集团构成了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依靠其掌握的现代大工业，拥有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在美国和英国，他们几乎全面控制了国家政治；在法国，他们在与旧派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日益取得优势；即便在德国，他们也与容克贵族以及军队一起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三大支柱。工业资产阶级已日益成为最主要的上层统治阶级。不过，在这个势力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当中，具有垄断地位与既得特权的大的工业家，与较为普通和后兴起的非特权资本家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为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逐渐变成社会中的又一保守力量，而后者为了谋求新的利益则更倾向于进行某种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改革。

在造就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同时，现代大工业也造就了一支同样空前强大的产业工人大军。这时的大工业不仅需要大的资本投入，同时也需要空前大量的工人劳动力。因此，这时工人数量的增加与工业规模的扩大成正比。这反映在工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的显著增长上。仅以从事制造业和采掘业这两项产业的人口来统计，1910 年他们占英格兰总劳动人口的 48%，在德国占 40%，法国 33%，美国 30%，均大大超过不久以前农业劳动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由于现代大工业所特有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要求，这些产业工人比他们的先辈具有了更高的素质，同时也具有了更强的组织性。他们已成为真正的现代产业工人。面对资方，他们首先构成一股强大的劳工大军，通过工会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同时，他们比以往也更加追求自己的政治、社会权利。从 19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各国纷纷建立了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组织。这些组织一般都以最能体现工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为宗旨。到 20 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都已经成立了工人政党。其中一些，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甚至还成为了国内拥有最广泛影响的政党之一。规模浩大的劳工运动以及更进步的以工人政党作核心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得产业工人表现出震撼全社会的阶级力量。他们是以一个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群体出现在欧美各国的舞台上。虽然位居社会底层，但他们有着足以和上层阶级相对抗的整体力量。不过，这时的工人阶级当中也存在着日趋扩大的内部分歧。这同样是由于新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很大一部分工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渐地，他们的社会观念与政治倾向也同那些处境仍无重大改变的工人显出了差异。例如，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劳资谈判和选举政治。这样，工人当中便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种力量。现代工业越发展、工业化成熟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工人运动温和化的趋势也就越明显。

与早期工业革命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型阶层，即现代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同样也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产物。现代大工业因其自身的特点，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从工程师、经理到普通的技师、职员，已经成为工业活动中最关键的角色。此外，直接或间接为大工业服务的其他各类专业人员也与日俱增，如银行中的职员、小商人、律师乃至大学教授等等。在整个工业社会里，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既不同于工业资本家，也不同于产业工人，而是恰恰居于两者中间。因此，他们被称为“中间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考虑到与以往时代曾有过的中产阶层的不同，准确说来，他们应当被称作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随着现代大工业的急速发展和它对新的工业社会的不断塑造，这一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日渐显著。作为工业经济活动关键的推动者、工业产品日益主要的消费者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俨然已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除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之外的另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是，由于处在上层和底层之间，中产阶级既受到上层社会的吸引，又面临沦为下层的潜在可能，这使得中产阶级具有较大的上下流动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分散、自我独立性强，彼此之间不易形成一致的利益目标和共同的行动主张。因此，中产阶级并不具备像产业工人或工业资产阶级那样较为稳定、一致的特征，与其说它是一个“阶级”，倒不如说它只是一个由相对共同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特定的社会群体。这就造成他们复杂的多重性格。一方面，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掌握现代知识，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因而是一个先进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先天的致命性的弱点，即由于过分依赖现代工业生活（依赖它提供的工作和消费），他们要么在经济顺利发展、社会比较稳定的环境中为满足虚荣而随波逐流，要么在遇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因孤立无助而铤而走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反倒容易成为正常生活秩序中的破坏性的力量。现代工业社会中产阶级的这种复杂性，将在 20 世纪的历史中反复地表现出来。

经过 19 世纪晚期开始的新的工业化浪潮，到本世纪初，欧美各国的工业和城市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已大幅度地提高，在其中的一些主要工业国甚至还明显超过了农村人口。工业和城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疑已占据中心地位。而上述三个工业—城市阶级与阶层，也就自然成为了西方社会政治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力量。

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完善 19 世纪晚期以后，各种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在欧美各国迅速而普遍地建立起来。首先是政府权力的加强和行政体制的完善。英国和美国是现代资产阶级发展最成熟的两个国家，其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现代政府机制也就较早地成熟起来。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他们分别加强了以内阁制和总统制为基础的行政权力。英国内阁和美国总统由此成为两国各自真正的权力中心。英国内阁中首次出现了许多管理现代社会事务的部门，如劳工部、卫生部和教育部等等。而美国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像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那样空前干预国内事务的强有力的政府。从这届政府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涉及从反托拉斯到保护国家资源在内的众多的社会领域。在建立现代中央政府的同时，英、美的地方行政也相继进行了目标现代化的改革。英国原来由当地贵族或国教教会成员进行管理的地方行政，变成了由当地纳税人直接选举政务人员进行管理。美国在市政改革中建立了市政委员会加市

政管理负责人的新型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既能够集中民意，又保证了专家治市。作为行政系统的辅助机制，英、美还率先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政府任用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公开考试，择优选拔；一旦任用，便使其常任其职，不因执政党派的变更而去留。这种制度有力地保证了政府效能的提高，也保证了政府工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继英、美之后，其他现代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也都大体经历了类似的完善政府和行政体制的过程。

就整个欧美范围而言，这一时期在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方面更为突出的成就，是议会代议制的普遍确立。英国经过 19 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美国经过完善其自始即有的近代国会，最先建立了现代的代议制度。包括英美两国在内的西欧、北美，成为代议制最先发展与最为普及和巩固的地区。无论是实行共和政体的美国、法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低地（指荷、比、卢）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议会（或国会）都已成为其国内政治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些国家一般都拥有较为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尤其是新兴的工业资本集团。而现代代议制无疑是最能体现他们要求的一种政治体制。在德国，虽然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很迅速，且统一之初就已建立了国会，但是，由于德皇依靠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军队继续坚持君主专制，那里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代议制。即便如此，德国帝国国会仍然取得了与德皇分享一定权力的地位。其余南欧和东欧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较弱，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了议会代议制的形式。甚至就连欧洲最为保守的沙皇俄国，在 1905 年革命以后也不得不开始建立了称为国家杜马的准议会制度。

第三个方面是现代政党的兴起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广泛建立。政党体系是除政府体系和议会制度之外支撑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另一根支柱。它直接反映资产阶级各派别、集团的政治利益，也直接决定议会和政府的组成。最先建立现代政党制度的依然是英国和美国。这是近代政党发源最早的两个国家。19 世纪 60、70 年代以后，具有在议会抗衡的传统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逐渐开始建立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并且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全国性竞选活动。美国在内战之后也最终形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两党轮流执政。这样，英、美首先确立了一种两党制的现代政党体制。两国之所以形成稳固的两党制，既有其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赖于其政党体制自身发展的特点。英、美社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构成相对比较整齐，容易形成政党所需的较为集中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英、美自始就形成了政党政治中的两极格局，而且这一两极格局又是动态的，两极之间是相互开放的。这样，它们始终能够包容绝大多数彼此不同的社会利益；广大的社会成员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就不断地跟从这两个对立而又对应的党派。正因为如此，政党政治成为了英、美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法国和德国也较早地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可是，法国缺乏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因而很难构成一个主流政党；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面对强大的德皇、容克贵族以及军队，也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还不能够确保议会通过立法和组织政府。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政党在各国还是越来越普遍地建立起来。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参与甚至主导国家政治的一种形式，在 20 世纪初的欧美各国已日益普及。现代政党制度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正式诞生了。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既有像英、美那样的两党制，也有像法国等国的多党制，并且以后者情况居多。

在资产阶级为自己营建上述政治体制的同时，包括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

级在内的社会普通阶层，也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努力奋斗着。工人政党创建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其影响日益扩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恢复合法地位的当年（即 1890 年），便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到 1912 年，它已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西欧、北欧各国的其他许多工人政党，也都成为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党并立的主要政党。与这种形势相伴随的，是工人运动日益转向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这一方面是工人自身政治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工人政党谋求新的政治权利的需要。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同时也在要求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政治地位提高的一种体现，便是争取到公民普选权。另外，这时工人阶级中的技术熟练工人，甚至公司“白领”雇员的成分也已大大增加。与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同，他们拥有一定的自我利益需要保护，因而较倾向于在既有的合法政治体系下获得一般权利。他们于是也就更加热衷于获得普选权。另一方面，面对自己在国内政治中不断取得的胜利，各国的工人政党也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已有的政治体系，来实现自己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作为其前提，首先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选民。因此，这些工人政党也都支持和鼓励工人争取获得普选权。这已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在争取自己的政治参与权。虽然他们的经济地位比工人高，但他们还不能跻身真正的资产阶级的行列、获得与他们一样的政治权利。作为相对来说最为年轻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还不具备像工人阶级那样的集体参与政治的能力。因此，他们只能先谋求一些个人的基本的政治权利。直到 19 世纪晚期，代表政治参与的公民选举权在多数实行代议制的欧美国家还只限于资产阶级；不但工人阶级不能被普及，就连一般中产阶级也没有这种权利。现在，争取获得普选权便成了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给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普通阶层的公民以普选权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资产阶级当中的自由派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认为，这样正可以吸引社会下层加入到支持其既成社会、政治体制的行列中来。面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与特权集团中的其他保守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不实行这种普选权已是得不偿失。于是，各国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普选权。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欧洲只有法国、德国、瑞士等少数国家规定成年男子的普选权。1884 年，英国将 1867 年改革后给予市镇产业工人的选举权扩大到农业工人，从而使英国工人获得普选权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英国完全实现普选权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1918 年）。从 90 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俄国以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普选权甚至还扩大到了妇女。美国也早在内战后不久的 70 年代规定了包括部分黑人在内的成年男子普选权。这样，到 20 世纪初，普选权在欧美各国已经普遍地确立起来了。

尽管这种普选权当时一般还仅限于男子，也尽管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保证工人和其他普通社会成员的真正权益，但它毕竟使社会下层开始获得了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的机会和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选权是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社会民主的一种体现。它的确立标志着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开端。这表明，西方政治这一时期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权利关系上也发生着相当深刻的变化。

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 如果说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政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末这种变化也同样发生在社会领域里。

从形式上来说，变化比较早地出现在德国。由于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异常迅速，因快速工业化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也异常突出。一方面是工人贫困化和生产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更多使其改善的机会和可能。因此，德国要求改善工人条件的呼声特别强烈。在此背景下，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也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1875年，两个主要的工人政治组织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工人中获得巨大支持。对于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来说，解决主要存在于下层工人中的社会问题，同时遏制威胁到统治集团——包括皇帝、贵族、军队以及大工业资产者——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也就变成了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于是，在颁布禁止社民党活动的“反对社会主义非常法”之后不久，俾斯麦政府又转向通过对工人实行社会保障来解决与其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1881年，俾斯麦颁发宣布对工人实行社会保障的文告。之后，德国政府从1883年到1889年连续颁布了三项有关实施这种措施的立法。它们是：《疾病保险法》《意外工伤保险法》和《老年及残疾保险法》。根据这些立法，工作中生病、遭受工伤以及年老和导致残疾的工人，分别可以获得某种保险。其所需保险费用，有的由雇主与工人双方承担，有的由雇主单独负责，也有的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三方承担。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关于社会保险的国家立法。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因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所造成的贫困化以及生产劳动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是放任不管的。即便有像英国“贫民法”（又称“济贫法”）那样的立法，也只是对贫困者施以某种监管。而自俾斯麦开始的德国立法，则第一次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很明显，这时德国的社会立法改革，其性质与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立法改革是有所不同的。首先，这时的德国还不是纯粹的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其次，它还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

德国的上述社会保险立法在俾斯麦之后继续得到扩充，补充了有关工厂制度、童工保护等方面的新内容，并最终在1911年形成了一部共有近两千个条文的大型社会法典。到1913年，约有1450万德国人获得了保险。德国最先建立的系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成为欧洲各国仿效的榜样。

受到德国的影响，英国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著名的由自由党领导的改革。由于英国是最早资本主义化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就更早地显现出来。但是，因其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英国政府只将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限制在最低程度。1834年议会修订的“贫民法”就体现了这一原则。直到70年代以后，英国才陆续出现了个别的照顾工人权益的社会立法，如保护童工、女工，设立工厂卫生检查制度，对部分遭受工伤的工人实行补偿等。但这些立法内容依然十分有限，也很不成系统。德国的社会立法对英国上层集团，尤其是自由党人产生很大影响。1906年，自由党上台执政，遂掀起一个社会立法改革的高潮。自由党政府推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立法，内容包括：所有行业遭受工伤事故的工人均享受雇主提供的赔偿补助金；煤矿工人（最先）享受一天八小时工作制；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可以在学校免费享用午餐；普通家庭的儿童可以得到一定的医疗照顾；70岁以上收入较低的老人可以领取每周5先令的养老金等等。而体现这一时期最大改革成果的立法还是1911年由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的《国民保险法案》。这是英国第一个系统的国家全民保险法案。当时就该法

案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包括劳合·乔治本人在内，倾向于对劳动者实行直接救助；另一种则以当时代表自由党担任贸易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为代表，倾向于通过缓解失业问题来对穷人实行间接救助。因此，法案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两个方面：它既要求对有疾病的工人提供健康保险和在保险范围内的免费医疗，同时也要求为某些工种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而建立和实施这些保险所需的费用是由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承担。这样，英国也就有了自己的正式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了解决由实行社会改革而扩大的资金问题，劳合·乔治还通过其著名的 1909 年预算案（被称为“人民预算案”），将征收财产累进税的原则第一次引入了英国的税收制度。这显然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税收制度，因此可以导致一种更为平等的社会分配。以后工党继承自由党开启的改革，进一步确定了追求普遍化的社会福利的目标。

同样的制度也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建立起来。但领导建立这种制度的政治力量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德国是由具有普鲁士国家主义传统的帝国政府完成的这一任务；英国则是很快就要面临衰落的自由党人的政府。在其余的大部分国家，虽然也都是自由党人或自由派政府（只有奥地利的情况较接近于德国），但这些国家的自由党或自由派却正值鼎盛。自由党是以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主，同时也包括部分上层中产阶级的政党。这里，英国自由党和其他各国的自由主义党派在国内面临着不同的形势。英国国内的保守党和正在崛起的工党，在社会不同的阶层中分别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随着保守党日益将自由主义纳为自己所支持的英国的正统，以及工党作为新兴社会民主力量的代表与部分中产阶级接近，原来自由党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日趋化解，并逐渐为另两个政党所吸收。因此，自由党在英国已面临着衰落。可在其他国家，情况却是另一种。那里的保守势力大多依然顽固地拒绝自由主义，而工人政党又不愿背离自己传统的社会基础过远。因而，那里的自由主义政党拥有较多存在的空间。正是这些自由党人和自由派，在各自的国家发起了与德、英同样的社会改革。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部分）、瑞士、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瑞典和西班牙等西欧、中欧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除俄国和巴尔干地区以外的欧洲各国也都有了相当完善的工厂法和劳动法。这样，最初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在欧洲大部分国家诞生了。

美国的情况又与欧洲各国不同。因其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那里工人的贫困化问题显得并不像欧洲那样突出（直到后来“大萧条”时期）。然而，垄断资本势力的恶性膨胀，却也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种种“丑恶问题”，包括企业间特别是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与残酷兼并，社会中充斥的金钱政治和腐败，以及垄断资本对劳工的无情使用等等。这些问题使得除垄断资产阶级之外的各个阶层受害。于是，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主要由资产阶级中的新自由派和中产阶级发起，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这场运动涉及从反托拉斯到地方民主改革的广泛的社会问题。作为内容之一，其中也包括若干保障工人基本权利的社会立法。这些立法当时大多还仅限于州一级，内容也远未达到欧洲国家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水平。不过，美国此时拥有了日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早的雏型。

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欧美各国还都开始发展起庞大的现代公用事业。到 1914 年，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里，普遍都建立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型的公用事业网。它包括公共卫生设施、自来水、煤气、电力供应、

交通运输、医院、商场、职业介绍所、博物馆、学校、图书馆、公园、游艺场所和体育场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受到政府空前鼓励的公共教育。对于初等普及教育，不少国家都规定了义务免费教育的原则。政府还对从初等到高等的不同类型的学校直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这就为包括一般国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空前地提高他们的素质创造了条件。

或是出于自由放任的传统，或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够发展，以往欧美国家对于上述领域是不加关注的。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职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扩大。

第四节 列宁主义的诞生

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861年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到80年代，俄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纺织业、金属加工业、造纸业、采矿业等已基本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到机器生产的过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60~1890年，俄国工业生产出现了惊人增长，铁产量增长了1倍多，钢产量增加了3倍，煤增长了19倍。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发生了改变，重工业比重增加，纺织业比重下降。同时，工业生产中心开始形成，如顿巴斯成为最重要的煤矿工业中心，克里沃罗格成为铁矿工业区，巴库成为石油工业区等等。此外，铁路建设一日千里，西伯利亚、欧俄南部等边区得到开发，国内市场不断扩大，这一切都使俄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和资本也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虽然俄国经济的发展还比较落后，但垄断组织还是广泛发展起来，到1914年，俄国的垄断组织达到150家，控制了国家市场，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俄国到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的帝国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军事封建性。沙皇专制的社会基础是地主贵族，因而农奴制残余在俄国大量保存下来。但同时沙皇统治在经济上又依赖于垄断资本，为满足垄断资本家追求垄断利润的需要，要经常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因此，列宁认为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第二，对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性。俄国工业及财政大量依靠外国资本的扶植，在经济上对西方国家处于某种服从地位。正是这两个特点使俄国成为20世纪初工农运动高涨地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发祥地。

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已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支队伍也日益壮大。以铁路工人为例，1861年还只有7.6万人，1895年则发展到150万。90年代初，俄国产业工人达到1000万。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俄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生活极其困苦。俄国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为12小时，多的可长达17小时。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且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制度。工人工资微薄，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沉重的经济压迫，造就了俄国工人高昂的斗争精神。其次，工人高度集中于大型企业。据统计，1892年，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占有所有工厂工人总数的47.8%，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同时期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对集中，有利于他们团结一致，开展革命活动。第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晚，资产阶级力量微弱，不可能拿出超额利润扶植工人贵族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中的机会主义成分要比西欧国家少得多。另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产业无产阶级少，觉悟性和组织性相对低下。

俄国工人阶级早在60年代便开始了罢工和骚动。70年代，工人的罢工、骚动更为频繁，达到290次。当时的工人运动多以经济目标为主，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后来，斗争逐渐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由扎斯拉夫斯基领导的“南俄工人协会”，这是俄国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革命组织。1878年，在彼得堡又成立了奥布诺尔斯基和哈尔士林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8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1879~

1884年，工人的骚动和罢工达205次，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和莫斯科。

工人运动的发展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80年代，有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检查民粹派运动失败的原因，以便寻找正确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在俄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

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是1883年由普列汉诺夫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劳动解放社”。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分子。他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普列汉诺夫1875年加入民粹派，1877年成为“土地与自由社”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成为“黑分社”的领导人物。1880年，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欧（1880~1917年）。侨居国外期间，普列汉诺夫接触了西欧工人运动，认真钻研了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又与前民粹派成员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等人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一举动标志着普列汉诺夫与民粹派的彻底决裂。

劳动解放社成立后，为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翻译和出版了《雇佣劳动和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并秘密运回俄国散发，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该社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俄国国情，制定革命纲领。

为此，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在这些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当时流行的民粹派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

第一，批判了俄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错误观点。以大量事实，如俄国工厂的增多、工人人数的扩大等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得到了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个强大的革命力量，即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继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批判了民粹派否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主张依靠农民实现社会革命的错误观点。农民在俄国虽然人数众多，但它属于日益分化的阶级，小生产所有者的狭隘和分散性使之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而正在成长中的工人阶级因为同大生产紧密相连，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才是现代历史最革命的力量。俄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应当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第三，批判了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的错误观点。农民村社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在分化瓦解。村社内部存在着贫富差别，因而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而是掩盖富农剥削的一种形式。

第四，批判了民粹派的唯心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英雄和杰出人物只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某些面貌，但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民粹派以救世主自居是错误的。

劳动解放社和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

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如彼得堡的布拉戈也夫小组，喀山的由费多谢也夫领导的小组等等。这些小组的活动，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准备了基础。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最初也存在着许多弱点。劳动解放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小组都只是在理论上进行宣传，范围也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并未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且，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纲领本身也有错误，一方面低估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否认工农联盟；另一方面又抬高了资产阶级的作用。这些理论上的缺陷，是普列汉诺夫后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变成孟什维克的思想根源。

列宁主义的诞生 弗·伊·列宁（1870~1924年），1870年4月22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里。1887年进喀山大学攻读法律，后因参加青年学生革命小组的活动，被开除学籍。从那时起，列宁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著作，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建立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积极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并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俄国农民问题。1893年，他赴彼得堡参加了当地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很快成为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公认的领导人。

当时，民粹派思想对俄国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受其蛊惑，仍然相信俄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实现社会主义，相信农民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为了帮助青年人澄清认识，从思想上肃清民粹主义，列宁在1894年秘密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反驳了民粹派的种种错误思想，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得到发展，无产阶级必将不断壮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且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创建政党，建立工农联盟，领导俄国革命的重要性。民粹派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与民粹派斗争的同时，列宁还与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较量。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沙皇政府所允许的合法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们也批判民粹主义，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学说，但实际上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恰恰在最本质的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主张不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号召工人无条件地“去向资本主义请教”。1894年，列宁写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系统地抨击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揭露了他们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真实面目。

列宁反对民粹派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创造了思想理论基础。

9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又一次进入高潮，建立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燃眉之急。但是，当时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彼此缺乏联系，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而且也缺少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经验。为了克服这些障碍，1895年，列宁将彼得堡的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它的影响下，莫斯科以及其他一些工业中心也都纷纷建立了类似“斗争协会”的团体。这些协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各地的罢工斗争，如1896年彼得堡“斗争协会”领导了一次三万人的纺织工人罢工，1897年又再度领导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在所有这些罢工中，“斗争协会”

都提出了工人将经济斗争同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口号，从而在俄国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此，俄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政党也得以初步萌芽。

由于沙皇对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镇压，1895年，列宁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在列宁流放的三年中，他时刻关注着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同时继续深入理论研究，先后完成了三十多篇著作，其中包括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科学巨著，为制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在列宁流放期间，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由许多青年人掌握了领导权。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加之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思想渗入俄国，协会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工人只因从事经济斗争而放弃政治斗争的主张，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派”，并很快控制了协会。1898年，俄国各地的“斗争协会”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纲领和章程，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不久也被沙皇政府破获。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仍然处于涣散状态，工人政党的建立遇到了巨大困难。

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到本土。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作思想组织准备，他到国外创办了大型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在工人中秘密散发。列宁以《火星报》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经济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一书，驳斥了“经济派”的胡言乱语，号召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进行政治斗争，走革命的道路，给“经济派”以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列宁还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阐述建党计划、党的性质和任务等，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列宁的努力下，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臻于成熟。

1903年7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经过讨论和激烈的斗争，由于列宁的坚持，大会最后通过决议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写进了党纲。这是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对机会主义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但是在讨论党章时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坚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活动的人，皆可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却主张：只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但无需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便可以成为党员。分歧的关键在于列宁想把党建成一个组织性强、纪律严明的团体，而马尔托夫则赞成一个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俱乐部。由于机会主义的阻挠，列宁的提议没有通过。然而，大会在最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拥护列宁的人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支持马尔托夫的人居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产生，意味着俄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革命政党。列宁主义诞生了，而它一诞生就立刻领导了俄国的第一次民主革命。

1905年革命 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存在着两种矛盾，一是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中，第一种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人迫切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农民强烈要求摆脱农奴制束缚，获得土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直接引发了革命。俄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败退，

暴露了沙皇政府的腐败，而战争期间税收负担的沉重，又加剧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工人及其家属约二十万人，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政府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两千余人，鲜血染红了积雪的广场。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流血事件打破了工人对沙皇的幻想，“武装起来”、“打倒专制制度”、“打倒血腥沙皇”成为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强烈呼声。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央工业区纷纷举行罢工和政治示威，到处发生工人与警察的流血冲突。全国规模的罢工迅速扩大，1月22日以后的三个月内，罢工人数超过了80万。布尔什维克直接领导了罢工运动，并且号召工人在罢工中把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结合起来。

农民受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参加斗争。欧俄地区的501个县有104个县爆发了起义。起义农民焚烧地主庄园，破坏庄稼，夺取粮食，甚至分了地主的土地。

军队也发生了动摇。1905年6月，俄国黑海舰队“波将金”号，因生活条件恶劣，在敖德萨发生水兵起义。虽然起义因未与工人运动结合，最后导致失败，但却表明沙皇专制统治的支柱已出现了巨大裂痕。

各地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但沙皇政府因握有政权，仍然可以随时打击革命。1905年3月，沙皇政府颁布敕令，要求召开咨询性的杜马会议。这显然是为了拉拢自由资产阶级以缓和革命。对沙皇的敕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布尔什维克认为，沙皇的许诺具有欺骗性，必须抵制杜马，推翻沙皇统治。而自由资产阶级则认为，杜马虽然不具有立法职能，但可以利用它与沙皇合作，乘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之东风，迫使沙皇作更大的让步。由于广大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咨询性杜马会议最终未能召开。

为了指导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制定正确路线领导革命深入进行。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倡议在伦敦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却拒绝参加。在列宁的主持下，第三次代表大会首先确定了1905年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消灭农奴制残余，打倒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革命的策略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结成联盟，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最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孟什维克则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与第三次代表大会迥然不同的机会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否定与农民的联盟而主张靠近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也不主张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

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积极推动革命的继续发展。工人的罢工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斗争中心也由彼得堡转向了莫斯科。10月6日，莫斯科—喀山铁路附属工厂工人罢工，10月7日，罢工扩展到莫斯科枢纽站的大多数铁路，10月12日，全国14条最大的铁路工人参加罢工，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从明斯克到海参崴，参加罢工的不仅有产业工人，还有学生、教师、工程师、商店店员、邮电职工等等，总人数达到200万。十月总罢工期间，各地都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它起着临时革命政府和起义的地方领导机构的作用，到后来则转变成了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

全国总罢工导致了沙皇政府的瘫痪。为了摆脱危险状态，沙皇不得不以退为进。10月17日沙皇颁布宣言，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

自由，扩大选举权，同时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任何法律须经国家杜马的批准，否则无效。实际上，沙皇是要在俄国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对“十月十七日宣言”非常满意，而布尔什维克则再次揭露了沙皇企图积聚反动力量，伺机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求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

12月18日，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向苏维埃提议宣布政治总罢工。12月20日，莫斯科各工厂汽笛鸣响，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15万之众。12月22日，政治罢工发展成武装起义，政府军与工人激战九天。莫斯科的起义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在一些地方，沙皇政府被推翻，工人代表苏维埃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但是，由于沙皇政府的极力反扑，局部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政治形势。莫斯科起义失败了，十二月起义最终还是遭到了残酷镇压。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最高峰，起义失败后，革命开始走下坡路。

1905年革命的失败，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起义前，苏维埃主要领导人被捕，工人缺乏有效领导，这些固然是其中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工人阶级没有同广大农民结成紧密联盟。此外，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裂也影响了工人思想意识的统一，削弱了工人阶级整体的战斗力。

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重大。沙皇专制制度受到革命的冲击不能再按旧方式统治下去了。1906年沙皇政府不得不遵守诺言，召开第一届立法杜马；1907年又召开第二届立法杜马。资产阶级在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和权力扩大了，俄国又向君主立宪制迈出了一步。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1905年的革命则丰富了他们政治斗争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经验，武装和训练了无产阶级，使他们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列宁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二章 亚洲的觉醒

欧亚大陆以乌拉尔山与乌拉尔河为界分为亚洲与欧洲两部分。亚洲占有世界陆地面积近三分之一和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雄踞大陆的东部和南部，欧洲则仅限于大陆的西北角。从近代开始，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最先产生并发展起来，凭借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优势，一些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完成了对整个亚洲的征服和奴役，西方使广大的东方沦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先差异很大的亚洲各国从此具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

进入 20 世纪后，亚洲各国纷纷从沉沦中开始觉醒，掀起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节 亚洲的社会变迁

亚洲被纳入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与东方传统社会的解体 西方凭借自己军事上的优势在征服了东方后，加快步伐将东方国家的经济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其手段就是将东方变成西方工业品的市场和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同西方的贸易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土耳其的贸易总值在 1840 年为 5.6 亿英镑，1913 年增加到 83.6 亿英镑。伊朗的外贸在 1800~1914 年增加了 12 倍。伊拉克出口总值从 1864~1872 年的每年 14.7 万英镑上升到 1912~1913 年的每年 296 万英镑。印度的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在 1841 年时分别为 1 亿卢比和 1.4 亿卢比，1913 年时增加到 19.1 亿卢比和 24.9 亿卢比。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增长很快，在 1868~1913 年期间，中国的进口额增加八倍，出口额增加了近六倍。输到欧洲的是印度的棉花、黄麻，中国的茶叶、绸缎、瓷器以及西亚国家的地毯、牲畜等；从欧洲输往亚洲的则主要是各种消费工业品。

这种经济格局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强使亚洲国家从事农业经济，充当挑水砍柴的依附性的仆人角色，而让欧洲发展工业，永远在世界经济中起支配性的作用。外贸的兴隆只是反映了亚洲各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增长及同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而不是它们的经济发展。

另一后果是彻底摧毁了亚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村社。亚洲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上，农民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各种副业，男人们在田里耕作，妇女则在家里纺纱织布。农民们不但生产出农产品，而且生产出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虽然社会上也存在商品交换，但交换的品种和交换的数量都极为有限。农民们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子中，同外界缺乏联系。西方的扩张带来的外贸增长虽然使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好处被部落酋长、城市精英、官僚和军官所组成的上层社会集团所独占，这些集团养成高消费的习气，喜爱外国货，从佃户榨取来的钱没有用于改进农业技术，更谈不上资助工业企业。此外，对内对外战争、军队现代化、朝廷的挥霍无度、频繁的出访在国内外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些使亚洲各国纷纷陷入财政困难，迫使土耳其、伊朗、中国政府在 19 世纪下半叶正式地卖官鬻爵，谁出价最高，谁就得到官职。那些通过此道而做官的人，自然把租税提到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步。最低层的农民被迫承受层层官吏的敲诈勒索。他们中许多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乡。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成为亚洲第一代的工业无产阶级。有的则流落在国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农民到俄国当苦力，印度农民到非洲，中国农民被当作猪仔卖到东南亚或非洲种植园。留在村子中的不得不多种经济作物，换取现金来交纳各式各样的租税和派款。一旦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亚洲的小农立即面临破产，成为受害者。传统的村社固然不是世外桃源，农民们忍受着地主的剥削和官府的欺诈，生活十分痛苦；但是，西方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剥削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与亚洲人民过去所遭受过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

界”。

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长 西方对亚洲的殖民统治除了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之外，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南亚地区，英国统治印度以前，印度社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印度的棉纺手工业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商业和金融业也有一定的规模。英国人统治印度后，先是通过以低价收购印度手工业工人的产品，运到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当英国自身工业发展起来后，则通过歧视性的关税政策，让英国棉纺织品倾销印度，从而摧毁了印度的棉纺手工业。同时，英国统治印度也结束了印度原来的封建割据状态，扫清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因素，客观上为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向印度输出资本。英国资本主要投资于铁路建设，1860 年印度有 1300 公里的铁路，1896 年时增加到近 4 万公里。此外，英国资本还投在港口、电报、航运、公路、水利设施、煤矿等部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

英国在印度所做的这些为印度本国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1851 年，位于印度西部的孟买出现了第一家印度资本所有的现代棉纺织厂，到 1900 年时，全印已有纺织厂 193 家，拥有 495 支纱锭、4 万台织机，雇用 16 万多工人。此外，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资本已拥有自己的银行信贷机构、钢铁厂、水电站、水泥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并出现像塔塔和比尔拉这样的大财团。

在殖民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具有如下一些突出的特点。首先，作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对英国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英国资本通过银行和经理行制度控制了印度的工商业，印资工厂在资金、技术、设备上均须仰仗和受制于英资。所有的铁路、港口、电报等基础设施都为殖民地政府或英国私人资本所拥有。在工厂和种植园的总投资中，英资占 70%，印资才占 30%。所以印度资产阶级与生俱来便对英国殖民统治有较大的依附性和妥协性。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护英国资本的利益，不惜损害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经常实施歧视性的政策，印度资产阶级因而也对英国统治者心存不满。印度资本越发展，印度资产阶级与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就越激烈，越迫切希望从英国统治下解脱出来。

其次，从近代发展起来的印度大资产阶级许多来自印度的西部地区，这里原先就已是印度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生活着一些专门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种姓与社团。这里又是较迟被英国人征服的地区，原有的印度商业和金融利益受的打击较小。英国统治给这些人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1895 年时，仅在孟买一地，就集中了印度 70 家的纺织厂。这样，印度大资产阶级就带有较强的地区性，因而同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产生矛盾。同时，印度资产阶级又由于出身商业种姓，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地位较低，声誉也不好，这促使他们具有改造印度社会的动力，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传统的重负阻碍了他们直接地干预印度政治，他们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同盟者和代言人。

在西亚和东亚的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62 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629 页。

点。最先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工业企业不是由原先存在于民间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逐渐发展起来，也不是由外国资本直接创办，而是由政府出面主持创办的。在土耳其，在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并实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大规模工业化计划。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西郊划定一个工业园区，在园内建立了一系列的钢铁厂、机械厂、纺织厂、造船厂等一百五十余家工业企业，想将欧洲国家的工业照搬到土耳其来。政府官僚办工业的积极性，一方面是出于救亡图存，挽救帝国的衰亡；另一方面同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歧视商人及商业活动有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希腊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他们被统治阶层视为异类，政府不愿让这种关系到自己生存的新兴事业落入他人手中。中国紧随土耳其之后，在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洋务运动，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无论是土耳其的“工业园区”计划，还是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没能获得成功。没过多久，“工业园区”内的企业便纷纷破产，留下了一大堆废铜烂铁和巨额的债务，不仅没能使土耳其强盛起来，反而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的洋务运动遭遇到的是完全相同的命运。

土耳其“工业园区”计划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两国的封建统治者都不得不放松对本国资本的限制。比较典型的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采取一些诸如“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中国商办厂矿资本 1908 年比 1900 年增加了四倍。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本国民族资本发展中的困境。它不仅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帝国主义设置重重障碍，不让亚洲的民族资本成长起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无论在土耳其还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遇到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处境艰难的亚洲大资产阶级因而往往不得不同时投靠外国资本和依附官僚势力，他们中许多人也往往是官僚、买办、企业家三位一体。

总之，在 20 世纪初，无论是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还是像土耳其和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尽管困难重重，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既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矛盾的一面；同时又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妥协和依附于它们的一面。亚洲资产阶级这种性格对 20 世纪上半叶亚洲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西式教育的推行与现代知识分子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出现的一个突出的新气象是西式教育得到广泛的推行。亚洲各国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在教学内容上偏重宗教伦理道德，轻视自然科学。虽然亚洲曾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并曾在许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统治阶级只将教育作为教化臣民，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当作本；而将科学技术当作奇技淫巧，当作末。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地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背诵《古兰经》和学习阿拉伯语的正字法；在南亚地区，教育由高级种姓婆罗门垄断，印度教教义和梵文是主要的教学内容；在中国，推行儒家文化教育，学子们走的是读经—科举—仕进的人生道路。

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亚洲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式教育开始在亚洲逐渐推广开来。在印度，作为小国寡民的英国要统治拥有几亿人口的次大陆，深感需要一大批印度本地人来帮助它。英国统治者吸收印度人到各级行政部门任职，招募印度人到军队当兵，利用印度人当买办经商。这些印度人必须掌握英语，通晓西方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如同马考莱

所说的“必须努力造就一个阶级，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和受我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的桥梁。这个阶级的人，在血缘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情趣、观点、品行和才智上则是英国人的”。一个西式教育体系从而在印度建立起来。1885~1900年间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1万增加到2.3万，中学生从42.9万增加到63.3万。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终于从不断挨打的经历中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将推行现代西方教育作为救亡图存改革的重要内容。在1859年，成立了米尔基耶学院，作为文官训练中心，后来演变为土耳其第一所文科大学，成为知识界的中心和传播新思想的大本营。在19世纪结束前一二十年里，土耳其增加了近二十所高等及专科学校。中国推行西式教育起步晚，但进展快。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提出了变科举、兴学堂，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式大学——京师大学堂。变法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仍继续推行西式现代教育，并于1905年9月2日，正式宣布废止科举考试。从此，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1902年时，全国有学堂4222所，在学学生9.2万人，六年之后，1908年，学堂增加到52,343所，学生数有156万之多。

除了在本国大力推行西式现代教育之外，亚洲各国还向海外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到国外留学，印度人到英国，西亚学生选择巴黎和柏林，中国学生到美国、欧洲以及自己的近邻日本。1902年只有608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六年之后，1908年，就增加到30,000人。

西式教育的推行给亚洲社会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西化的知识阶层。其中，以印度最为典型。伴随着西式教育的推广，以及印刷机的普通使用、英文报纸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原先印度各地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相互隔绝状态，在印度人中产生出一个熟悉外国语言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自由和理性的新阶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统治者推行新式教育的目的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往往相反。西式教育不仅加强了印度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而且改变了他们过去不关心世事的传统。他们从西方学习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逐渐激发民族自我意识，激发建立自治政府的要求，成为20世纪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坚力量。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早就注意到要防止学生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他们开办的绝大部分是工科院校，对出版发行进行严格的审查，但学生们一旦掌握了法语或英语，官方的控制就难以奏效。学校订有外文期刊，所购买的图书内容不可能全是自然科学，学校往往聘请一批外国教师任教，通过这些渠道，加上奥斯曼帝国紧靠欧洲，各种新思想在学生中广泛地传播。在中国，情况极为相似，清政府的教育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科学的目的在于保护儒家文明和维护封建统治，但结果适得其反。虽然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他们受到新思想和新价值观念的熏陶，充分意识到祖国遭受西方剥削和凌辱的程度，在感情上乃至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政府极为失望地发现在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原想培养为封建统治的栋梁之材的青年学生，成为中国社会中犯上作乱的分子，他们领导和组织了一次次的抗议和革命运动打击了封建统治并为推翻清王朝作出贡献。

第二节 一战前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从改良到革命：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的激进化 20世纪初，亚洲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是亚洲资产阶级日益成熟，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构成亚洲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人——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西化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结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政治态度上日益激进。

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是亚洲地区出现较早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它的产生同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有关。1857年是英国统治印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1857年以前，英国殖民政策的重点在打击印度社会中的封建势力，并因此推行一些社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获得了印度资产阶级和有进步思想的印度知识分子的拥护。由于英国的政策触犯了一些印度封建土邦王公的利益，有的地方则漠视了印度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结果导致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的爆发。该起义获得了印度人民的拥护，英国凭借武力才将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在镇压了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国人采取各种与印度封建势力改善关系的政策，在政治上转而依靠土邦王公和封建地主作为自己统治印度的社会基础，并不惜因此疏远印度的资产阶级。例如，英国任命的印度立法会议的成员大多是印度的土邦王公和大地主，几乎没有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排挤印度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机关，英国统治者有意将文官考试年龄限制在19岁以下，并且规定考试用语为英语，考试地点在英国。当时印度青年受完高等教育后大多超过规定的年龄；印度到英国万里迢迢，很少印度人有能力筹集到足够的旅费去赶考；此外，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不允许青年到欧洲去。因此，印度知识分子阶层要求放宽对考试年龄的限制，并在印度本土举办考试，这一合理要求竟遭到英国当局的断然拒绝。更使印度知识分子自尊心深受伤害的是英国人强烈的种族主义优越感。英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不准印度人进入某些专为英国人而设的旅馆、俱乐部和公园；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英国人几乎垄断了高级职位，印度人无论其资格如何都不准晋升到某一级别以上。英国统治者与印度人之间因而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上因素必然在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中唤醒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在激化。随着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英国对印度企业越来越采取歧视性政策。例如，为了让英国的纺织品占领印度市场，只对英国纺织品征收很低的关税，而对印度本土产的纺织品则征收较高的出厂税。在1885年，英国当局甚至应英国兰开夏制造商的要求，取消对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的一切进口税。这种做法激化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

随着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三大管区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他们是：1876年，成立于孟加拉的“印度协会”；1885年成立于孟买的“孟买管区协会”；1884年成立于马德拉斯的“马德拉斯士绅会”。在这些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1885年终于成立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印度国大党。最初的国大党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自由职业者占50%，工商业者占25%，其他25%为自由派地主。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受过西式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国大党被称为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

国大党在其最初的 20 年的活动中，态度极为温和，他们的活动仅局限于和平请愿，请求英国当局给印度人更多一些让步，国大党因而被人讥为“政治乞丐”。进入 20 世纪后，国大党的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大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印度知识分子加入了国大党，他们不满于老一辈国大党人的做法，要求对英国统治者采取更强硬不妥协的态度，他们因而被人称为激进派，代表人物是提拉克。激进派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的觉醒与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

在西亚地区，20 世纪初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激进化的倾向。同殖民地印度不同，作为半殖民地的西亚地区，主要政治矛盾是以封建专制势力为一方，主张进行全方位资产阶级改革的力量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自从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后，帝国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主张改革的人，他们认为欧洲自近代以来在各方面都优越于奥斯曼帝国，帝国如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加入到欧洲大家庭中，而不应以怀旧的心情去追求无法挽回的过去。另一派人则反对全盘西化，尤其反对引进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们被称为顽固派。在 19 世纪中叶，土耳其进行了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建立“工业园区”，建立现代学校，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按西方模式改组土耳其的法院、军队和政府机关，甚至进行宪政改革。1876 年，以欧洲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并于 1877 年，召开了奥斯曼帝国第一届国会。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带来的后果是改革派与顽固派都未曾估计到的。“工业园区”计划以劳民伤财告终，现代学校的建立使学校成为制造社会动乱的温床，文化典章制度的改革导致道德沦丧，而议会制的试行使统治者深感有大权旁落的危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甚至使一些主张改革的人也慨叹道“如果改革前，帝国是以两架马车的速度沿衰落的道路上前进的话，那末改革时期，帝国的衰落是以火车的速度向前直冲了”。使土耳其改革事业雪上加霜的是，在这关键时刻，俄国发动了俄土战争。以素丹哈密德二世为首的顽固派将土耳其的战败归罪于改革派所实行的改革上。他乘机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解散了议会，流放和处死改革派的头面人物。他还建立由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忠于自己的哈密德军和人数达十万的遍布全国的密探网，不许人民谈论政治，稍有反政府的嫌疑，便会遭到逮捕和拷打。在采取硬的一手的同时，哈密德二世仍坚持经济方面的改革，仍注意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哈密德二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

在哈密德二世专制统治下，土耳其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以法国巴黎为中心，通过创办《青年土耳其人报》，在海内外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多的人留在国内，进行反对哈密德二世的专制统治。1889 年，在庆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100 周年之际，四名土耳其医科大学学生在军医学院开会，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取名为统一进步同盟，后又名为青年土耳其党。这一组织很快在其他高等院校中得到发展，并同海外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最终在哈密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被迫由改良走上了革命的激进道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也经历了与土耳其资产阶级大致相似的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道路。中国离欧洲较远，历史上同欧洲交往少，沦为半殖民地的时间也较晚，当中国的统治集团在 1898 年决定进行改革时，整整比土耳其晚了近半个世纪。由于这些因素，当中国的改革者们代表新兴资产阶

级的利益，想通过光绪皇帝实施全方位的改革，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他们在经验上和群众基础方面都不如土耳其的改革者，而他们所遇到的各方面阻力却远远强于土耳其的封建势力。戊戌变法失败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采取的几乎是同哈密德二世相同的策略，一方面实行“新政”继续一些变革措施，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任何可能危及清王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那些想通过和平手段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破灭了，他们或者自身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或者让位给其他更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他于1894年11月在海外组织了兴中会，成员主要为华侨资产阶级，其余为会党和知识分子。当时该组织既有倡导维新改良振兴中华的愿望，也有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倾向。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的革命主张也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在20世纪初，不仅海外的革命组织在发展，在国内也出现了革命组织，1904年2月，革命者在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同年11月，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在中国的一些其他省份也出现革命团体。190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的革命团体的代表齐集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领导人，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级，从此，革命派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这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有重要的意义。

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20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处在萌动之中，年轻的亚洲资产阶级开始采用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斗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亚洲资产阶级以外部刺激，促使亚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1905年后的几年间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初，日本和俄国都已是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发动了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赢得了战争。俄国的战败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引发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亚洲资产阶级欢呼日本的胜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战胜欧洲人，增强了反对欧洲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而俄国的1905年革命则鼓舞了俄国周边的亚洲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并提供了经验。

20世纪初叶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事件有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

1905~1908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 20世纪初，英国加强对印度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英国提高英镑对卢比的兑换率，加强对大学和报刊的监督与审查。国大党虽然对英国统治持温和态度，也越来越为英国当局所不容。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叫嚷“要让国大党寿终正寝”。为了分化瓦解印度民族主义力量，1905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了“分割孟加拉”方案。孟加拉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孟加拉地区人民具有较高的民族主义觉悟和斗争精神。英国人将孟加拉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地区的地主和富人大多是印度教徒，而一般人民群众则信奉伊斯兰教；西部地区则恰恰相反，上层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是印度教徒。英国人试图施展其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通过分割孟加拉挑起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自

己好混水摸鱼。

分割孟加拉深深刺伤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国大党提出抗议，英国人对国大党的抗议不屑一顾。这对国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党内的温和派没有勇气去对付这一挑战，激进派则勇敢地站出来。提拉克说：“要求司瓦拉吉（自治）的时刻来到了。再别零零星星地要求改革了，现在的统治制度对这个国家是毁灭性的，必须变更或消除。”他把司瓦拉吉、司瓦德西（自产）、抵制和民族教育作为即将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四点纲领，并指出这四者的关系，司瓦拉吉是目的，其他三项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1905年12月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提拉克第一次在国大党的讲坛上提出印度必须获得司瓦拉吉。1905年年会后，激进派提名提拉克为1906年国大党主席，并要求将四点纲领写进党的决议中。温和派则抬出党的元老达达拜·纳奥罗哲，让他任国大党主席。当时正值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不久，印度民族主义者大受鼓舞，印度人民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纳奥罗哲因而调和两派意见，同意了提拉克的争取印度自治的主张，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这标志着国大党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向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转变。

在国大党的领导下，1905~1908年间，印度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运动的主要手段是抑制英国货，提倡使用国货，也称司瓦德西。该运动在孟加拉开展得最为突出，英国布、英国烟被堆放在街上焚烧示众，收入微薄的下层群众宁肯多花钱买国产布，也不穿廉价的洋布。学生们组织义务纠察队，不顾可能遇到的打击和迫害，劝说人们不买洋布，并组织服务队，到农村挨户送货上门。对不顾劝阻、坚持使用英国货的人，人们对其实行社会排斥，不给其做饭、洗衣、理发、开车、清扫厕所、执行宗教仪式，其子女找不到婚配对象，小孩找不到同伴玩耍。

司瓦德西运动促进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印资纺织厂的产品十分畅销，原有的工厂加足马力生产，同时兴建新的工厂，仅阿拉哈巴德和孟买两地在1906年就新建了22个棉纺厂。除纺织厂外，印度的制糖、卷烟、制盐等工业也得到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塔塔钢铁厂的建立。在民族主义高潮中，塔塔财团为建钢铁厂发行了7000股股票，资本总额达2317万卢比，股票被印度人抢购一空。该厂在1911年正式开工，这是印度民族资本向重工业领域发展的重要标志。受益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印度资本家们也纷纷出钱赞助印度的民族主义组织及其活动。为了回报印度社会，增强印度的科学技术事业，印度的民族资本还在印度创建大学和研究所，其中最著名的是1909年由塔塔财团赞助建立的印度科学研究所。

1905~1908年的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本在印度的利益。英国布价格暴跌，仍无法销出，库存爆满，经营洋布贸易的买办商人向曼彻斯特商会告急，要求他们敦促英国议会取消分割孟加拉法令。

代表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殖民当局十分惊慌。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破坏印度民族主义阵营的团结。在1906年，英国积极支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上层分子成立两个全国性的教派组织，即印度教大会和穆斯林联盟，教派主义组织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国大党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加紧拉拢国大党内的温和派，许诺将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扩大印度民选议员的名额。温和派很快与英国人妥协，将激进派开除出国大党。紧接着英国当局在1908年6月23日，以“阴谋推翻女王政权”

的罪名逮捕了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并不顾人民的反对，于同年7月判处提拉克六年苦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从此暂时转入低潮。

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 伊朗原名波斯，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近代，它落伍了。伊朗国内山脉纵横交错，交通不便，居民许多还处在部落阶段，迟至1914年，部落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政治上，国王对全国行使统治权，国王有权任命地方首领，但地方权力实际上操在世袭的各部落酋长手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分微弱。而宗教势力则十分强大，伊朗居民大多信奉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宗教首领拥有大片土地，控制教育和宗教法庭。什叶派宣扬穆斯林世界的合法统治者是自幼隐遁的哈里发阿里的第十二代孙，他终有一天会回来建立一种正义的统治。这一教义成为宗教领导人动员组织群众与国王分庭抗礼的有力武器。除国王和教会势力之外，活跃在20世纪初伊朗政治舞台上的第三种力量是被称为西方派的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要求将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实行义务兵制、分配土地给农民、实施公共教育等。

在20世纪初，随着伊朗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伊朗国内矛盾更加尖锐。封建主强占农民土地，强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不断增加地租和摊派苛捐杂税和徭役，农民被迫将40%~90%的收成交给封建主。手工业者也由于外国商品的涌入而失业，生活无着。加上不时的自然灾害的袭击，每年都有15万到20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伊朗逃往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而统治阶级却荒淫无耻。当时统治伊朗的是卡扎尔王朝，王室是最大的地主，其中一个王子就拥有2000个村庄和50万居民，王室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大量的地租收入仍不敷王室的支出，国王不断地向外国借款。1902年4月，国王穆扎法尔丁仅一次就向俄国人借了1000万卢布，这笔钱在当年夏天游历欧洲时花得一干二净，1903年又要借钱。王室每次向国外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权益为代价的。对卡扎尔王朝的腐败统治，农民们不满，资产阶级也不满。商人们痛感自己的权益受到外国资本的侵害，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前途忧心如焚。教会势力则想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卡扎尔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

由于大批伊朗人在俄国做工，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很快波及伊朗。1905年12月，德黑兰爆发了群众抗议示威反对糖价上涨，要求罢免不得人心的首相，实行内政改革和召开议会。这些要求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声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由此爆发。国王迫于压力，表示同意召开议会，但不想认真兑现。1906年7月，人民群众在德黑兰和各地再次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重提原来的要求。宗教领袖和一些武装部队也站在群众一边。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国王于1906年8月签署了召集国会的敕令。1906年9月，进行了国会选举；10月召开了第一届国会；12月颁布了宪法。1907年1月穆扎法尔丁国王去世，其子穆罕默德·阿里继位。

在1907年，伊朗人民还学习俄国革命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做法，首先在北部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关——恩楚明（意为委员会）和革命武装——费达伊，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大都控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这一做法很快遍及全国。

这样，在1907年，伊朗实际上存在三个权力中心：国王的权力仍然存在，由教会、地主、富商控制的国会，以及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的、受到工农群众拥护的恩楚明。另外，广大农村地区则由各部落武装控制。

伊朗革命震惊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英、俄两国策划进行武装干涉。1907年8月，英俄签定协定，划定各自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作为两国的“缓冲区”。1909年4月英国军队在南部登陆，同时，俄国军队借口保护侨民，开进革命者大本营大不里士城。1911年秋，英俄两国决定公开干涉伊朗内政，镇压伊朗革命。沙俄从北方，英国从南方同时向伊朗革命者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反革命集团趁机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它们占领了议会大厦，解散议会，大肆屠杀革命者。卡扎尔王朝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轰轰烈烈的伊朗革命终告失败。

1908~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在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土耳其革命党人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9世纪最后二十余年里，土耳其政治保持了表面上的平静。进入20世纪后，尤其1905年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也门等地区不断爆发民族起义；在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农民举行起义暴动；在伊兹密尔等城市也发生群众的反抗斗争。在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之际，青年土耳其党于1906年将总部从巴黎迁到马其顿的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位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这里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活动着民族游击队，该地区人民多信奉东正教，受俄国影响较深。此地还是犹太人较集中的地区，犹太人愿从经济上给予革命党人以援助。最重要的是，革命党注意在军队中做革命发展工作。许多军校学生受时代大潮影响，倾向革命，他们毕业后，在军队中逐渐成为青年军官，掌握了军队和武器。当时驻扎在萨洛尼卡的是第三军团，该军团的一些军官们在1906年9月成立“奥斯曼自由会”，组成十人委员会，成员除军官外，还包括当地军校的校长，当地邮电局局长等。萨洛尼卡因而成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根据地。

1907年，青年土耳其党和马其顿、亚美尼亚等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巴黎召开大会，就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在法律面前各民族和各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废除哈米德专制统治，恢复1876年宪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并拟订了一个从拒绝纳税、消极反抗到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通过密探网，哈米德二世得知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了控制军队，他采取收买、监视、镇压等老一套办法。对军官，他颁发勋章，许以晋级；对士兵，保证补发欠饷；对不安定分子则采取紧急调动。一位名叫恩维尔的军官受到怀疑，他立即被“邀请”前往伊斯坦布尔去“述职并接受晋级”。恩维尔意识到危险，逃到山里躲藏起来。7月4日，另一名军官艾哈迈德·尼亚齐少校率部起义，他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带着自己的军队及武器与物资进山，与恩维尔会合。驻在埃迪尔内的第二军团起而响应，马其顿的农民游击队也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

革命爆发后，哈米德二世急令驻伊兹密尔的自己信赖的安纳托利亚军团开赴马其顿进行镇压。但这支部队的士兵拒绝开枪，倒向革命。7月23日，起义部队开进萨洛尼卡，要求素丹立即恢复1876年宪法，否则第二、第三军团将立即进军伊斯坦布尔。此时，驻守首都的第一军团军心动摇。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哈米德二世被迫于7月24日下诏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国会。

1908年底，帝国新国会开幕，青年土耳其党获得多数席位。革命后的土耳其最初仍保留哈米德二世的皇位，只是在1909年4月哈米德二世企图政变

失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才废黜了哈米德二世，换上了服从自己的新苏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并重新组织政府，掌握了政权，从而结束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

一战前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评价 20世纪初发生在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自从亚洲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严重阻碍了亚洲历史的发展，亚洲人民因而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19世纪的后半叶，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亚洲曾有过农民造反、士兵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领导的维新运动。尽管亚洲人民在这些斗争中曾显示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仍然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状态。在20世纪初，亚洲人民开始扬弃旧式的斗争手段，正式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两面旗帜，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开始改变了亚洲的沉睡状态。在印度，1905~1908年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提出了自治的要求，迫使英国人作出一些让步，它增强了印度人民同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信心，成为一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预演。在伊朗，人民群众较广泛地参与了斗争，并直接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立了革命政权，只是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下，革命才被镇压下去。青年土耳其党人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沉重打击了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暴政，将封建神权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在亚洲的东部，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辛亥革命。革命最先由驻在武昌的一支军队起义而引发，在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全国。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总之，在20世纪初的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从此，亚洲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被宰割、被奴役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革命因素。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却在直接或间接地镇压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现象被列宁称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亚洲人民的斗争成为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军，“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亚洲人民在革命中付出流血牺牲代价后，并没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在印度，运动最后以英国统治者与温和派妥协，激进派被镇压为结局，印度仍没能争取到自治的目标。在伊朗，反动的卡扎尔王朝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伊朗半殖民地危机加深了。在土耳其，封建君主制仍被保留下来，哈米德二世的专制被军人寡头统治所取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将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能获得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不仅如此，革命运动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印度激进派的一些主张客观上对印度的教派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教派主义给整个20世纪印度历史带来不利的影响。土耳其革命后上台的军人政权没能解决好民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外交上采取亲德国政策，在一战时将土耳其绑在德国的战车上，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16页。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16页。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20 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带有的局限性及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由时代特点及领导这一革命运动的亚洲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20 世纪的世界同当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已很不相同，亚洲资产阶级如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不仅要战胜本国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预。而亚洲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亚洲的资产阶级因而既年轻，政治上尚不成熟，又同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面对远远强于自己的政治对手，往往显示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亚洲的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遭遇到的挫折迫使他们中的激进派认真思考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占亚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到革命运动中来的问题。这预示着亚洲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从三皇同盟到三国同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实力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各强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们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寻找新的盟友，以便压倒对手，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发展和变化，战前欧洲的国际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但基本线索是两大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形成，即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对立。

1871年以前，法国是西欧和中欧的霸主，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法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霸主地位；在战争中取胜的德国不仅吞并了法国重要的矿产基地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勒索了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成为欧洲大陆的强国。法国虽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无力抵抗德国，但它却不甘心忍受法兰克福和约的屈辱，1873年便付清了战争赔款，积极重整军备，寻找时机发动复仇战争，重做欧洲大陆的霸主。德法矛盾成为当时欧洲大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德国为了进一步削弱法国，使其长期孤立而不能复兴，以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外交活动。

德国首先积极改善同俄国的关系。俄国同普鲁士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曼诺夫和霍亨索伦两个封建王朝有着姻亲关系，瓜分波兰产生的共同利益以及经济上的某些联系。普法战争使俄国面对一个新的事实，即统一德国的出现，在俄罗斯帝国西部边界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潜在敌人。沙皇曾根据陆军大臣米柳亭的提议，将许多部队调往西部同德国接壤的省份。另外，俄国当时正与英国在西亚和中亚地区进行激烈角逐，为了加强自己在同英国对抗中的地位，俄国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同德关系。

德国同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由于普法战争也发生了变化。奥国开始同德国接近，以求得德国对它在巴尔干扩张政策的支持。德国也想利用奥匈帝国对俄国施加压力，使俄国脱离不了德国。这样，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政治利益，把德奥密切地联在了一起。

经俾斯麦多方斡旋，1872年9月，德皇威廉一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三人及其外长会晤于柏林，达成了关于成立“三皇同盟”的谅解。次年6月，俄奥两国皇帝签署一项协定：如果双方遇有利害冲突问题，则进行协商；如遇第三国进攻缔约一方，两国皇帝应互相谅解，求得一致行动；如果双方认为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末这种行动必须经过一个特别军事会议安排。同年10月，德皇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由于三皇同盟缔约的三方是同床异梦，因此它是极不稳定的，在此后发生的几次国际冲突中，便无形之中瓦解了。

三皇同盟瓦解的同时，各种政治力量又出现了新的组合，这便是“三国同盟”的形成和法俄之间的结盟。

在三皇同盟之中，德奥的关系比较稳固，俄奥在争夺巴尔干的控制权上有深刻矛盾，俄德对法国的政策也有分歧。俄国在结盟之后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强烈反对德国对法国的战争意图，以保持各方势力的均衡。1875年，德皇企图利用三皇同盟对法国发动一场战争，可是，当俾斯麦探询俄国的态度

时，俄国表示反对进一步削弱法国，英国也进行了干涉，迫使德国改变了进攻法国的计划，德俄关系出现了裂痕。1878年的柏林会议使德俄关系进一步恶化。柏林会议是俄国迫于德奥英的压力而同意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审查了俄国对土耳其战争胜利后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使俄国没能安稳地享受到俄土战争中夺取的赃物。这使俄国极为恼火。一个俄国将军对德皇威廉一世说：“这个可恶的柏林会议！……它破坏了我们之间先前的友谊，在宫廷、在政府中散布不信任感，并使人确信俄国军队经过1877年浴血奋战之后所得到的只是极大的不公平。”1879年，德国又对俄国的牲畜进口进行限制，而俄国也采取强硬的关税保护政策。两国之间的关系已不可逆转，因此，到期的三皇同盟盟约没有续订。

俾斯麦对俄德关系的恶化并不担心，他开始了争取奥匈的活动。1879年10月7日，德奥同盟协定在维也纳签订。其主要内容是：缔约一方受到俄国进攻时，两缔约国应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不得单独媾和；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到别一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则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把这个盟约看成是专门对付法国的，而奥匈则把它看成是专门对付俄国的。实际上这个同盟是既反俄又反法，它使俄国遭到孤立，又促使了俄法同盟的建立；而德奥同盟成为三国同盟这个军事集团的基础。

德奥同盟成立后不久，俾斯麦便着手创建他的联盟体系。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成员是意大利。意大利要加入该同盟有两个原因。一是法国夺取了突尼斯。突尼斯是意大利对外扩张的理想目标，那里有两万多意大利侨民，并在那里筑有铁路。意大利没有力量单独同法国较量，只有寻求同盟者。二是意大利同教皇的矛盾。1881年，德奥当局和国内天主教政党停止争论，达成协议，意大利担心德奥支持教皇收回他在俗世的领土。因此，意大利同德奥结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意大利入盟的要求，正符合俾斯麦建立联盟体系的设想。

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不得参加旨在反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同盟或协定。在法国进犯意大利时，两个缔约国答应给予意大利军事援助；在法国进犯德国时，意大利也负有同样义务。缔约国中的一国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发生战争时，彼此应恪守善意的中立，倘若其中一国同时遭受两个大国的进攻，则应给予军事支援。

罗马尼亚也在追随德奥集团。1883年，罗马尼亚同奥匈签订秘密条约。遂使罗马尼亚成为三国同盟的附庸。

三国同盟可望给每个盟国带来很大好处。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随着盟约的签订而提高，并巩固了摇摇欲坠的皇权，也不怕法国和教皇的进攻了。奥匈从这项条约中获得的主要利益是假使俄国因巴尔干问题而进攻时，不必再留一部分军队在南部以防备意大利进攻。它可将全部兵力对付俄国，或投入巴尔干。德国希望这项条约能防止意大利与法国缔结盟约因而助长法国复仇的势力。如果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法国也会因分兵对付意大利而减轻德国的压力。当然德国并没有指望意大利提供强大的战斗力，但只要是意大利军队西向法国，而不北向奥地利后方，这对德奥就非常有利了。总之，三个签字国各有所得。这个同盟的核心是德奥同盟，德国是这一同盟的领导者，奥匈是依附德国的小伙伴，意大利是暂时的和动摇的同盟者。

法俄结盟 为了与三国同盟对抗，法俄两国在互相接近。法国为了摆脱

普法战争后的孤立处境，急欲寻找同盟者。俄德关系的恶化，为俄法接近提供了机会。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法国的资本渗入俄国，法国的投资在俄国工业中占有主导地位。例如，1890年，外国资本在俄国工业的投资总额为2.147亿卢布，其中法国占6660万卢布；1900年外国投资为9.11亿卢布，法国占2.26亿卢布。1887年法国就向俄国提出了结盟的呼吁，次年向俄国提供了5亿法郎的贷款；1889年又提供了19亿法郎的贷款，法国向俄国输出一共近100亿法郎。1888年，俄国还向法国订购了50万支来福枪。这些经济上的往来为法俄结盟奠定了基础。1891年，法国舰队在访问俄国喀琅施塔得要塞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前往迎接，并在《马赛曲》的乐曲声中脱帽致敬，尽管《马赛曲》在俄国一向是严禁演奏的。这显然是对法亲善，对德示威的表示。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两国便签订了“咨商协定”。

1892年，两国在彼得堡签订了“法俄军事条约草案”，1893年底和1894年1月，两国政府以互换外交文件的形式确认了军事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同盟义务。协约规定，如果德国进攻法国，或意大利受德国支持进攻法国，则俄国当竭尽全力对德国作战；如果德国进攻俄国，或奥国受德国支持进攻俄国，则法国当竭尽全力对德国作战；如果三国同盟的三国或任何一国动员了，法俄获得此种消息后不须等待任何预先的协议，就立即动员它们所有的兵力，使其向边界移动，迅速迫使德国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法国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130万人，俄国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70万或80万人。

法俄协定的矛头，针对三国同盟特别是其盟主德国。法俄协定形成了另一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基础。

英德矛盾的发展 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一直奉行其所谓“光荣孤立”的政策。但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其“大陆政策”也转变为“世界政策”，使英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英德矛盾日益加深，英国的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英德矛盾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对殖民地的争夺、对海洋霸权的争夺以及在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的竞争。

到1876年，德国还没有一块殖民地，而此时英国殖民地已达到2250万平方公里。到1914年，德国所占殖民地面积仅有290万平方公里，约为英国的十分之一。德国对这种状况非常不满，强烈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瓜分世界，决心从英法手里夺取更多的殖民地，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列强分割非洲时起，英德两国就开始了严重的对抗。德国制定了建立从东非到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斜断非洲大陆的“赤道非洲帝国”的计划。而英国早已制定了从开罗到开普敦的“二C计划”，妄图把北非和南非的殖民地联成一片。英德的计划发生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南非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因为这一地区盛产黄金和钻石。英国为了扫除实现“二C计划”的障碍，想用武力吞并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布冲突中，德国鼓动布尔人同英国对抗，并在布尔人取得一次小胜之后，威廉二世向德兰士瓦总统发电报，祝贺他抵御外国侵犯而保全了他的国家独立。英国认为这是德国在向英国示威，极其不满，英德矛盾顿时激化。

德国在东亚地区的活动使英德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主要表现为两国在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上的竞争。德国以武力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之后，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德协定”，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则强占威海卫，并在长江流域继续扩大势力范围。

英德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是中、近东。自 1878 年柏林会议以后，德国就开始向土耳其渗透，派军官训练并改编土耳其军队，向土耳其倾销德国商品，并打算修建一条与欧洲大陆相连的铁路，即巴格达铁路，使从柏林经过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到巴格达连成一线（三 B 铁路），而且在 1880 年取得了其中一段的租让权。这样，德国不仅可以控制小亚细亚，把触角伸到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而且可以进而威胁印度。德国直言不讳地叫嚣，“巴格达铁路将替我们开辟到伊朗、阿富汗的道路，而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英国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因为在它的对外扩张计划中，有着一幅以印度洋为中心，建立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的战略地图。即以开罗为中心，修筑一条南到开普敦，东经巴格达到加尔各答的战略铁路；在海上，把苏伊士，新加坡和上海三点联结起来。能否占领中近东，是能否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因此，英国联合法国和俄国，竭力阻挠德国计划的实施。由于英、法、俄的重重阻挠，使巴格达铁路工程时兴时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条铁路还有一段未完工。

在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德国也日甚一日地排挤着英国，成为英德矛盾的又一个方面。德国的对外贸易额，在 1870~1914 年间自 1000 万美元增至 5000 万美元，但在 1913 年的国际贸易销售量中，英国还居第一位，占 17.3%，德国居第二位，占 12.6%，但英国已经感到了德国的威胁。英国工商业资本家大为德国商品所苦恼，因为在英国本土已有德国商品渐占优势的迹象。

从 1880 年至 1890 年，德国资本输出额由 30.9 亿马克增至 34 亿马克，而在以后的十年内输出额又增至 46.1 亿马克。德国资本输出获得的第一个巨大成就，就是获得巴格达铁路的建筑权。在资本输出方面，德国很快追上了英国和法国。1902 年，德国在国外的投资只有 125 亿金法郎，而在 1914 年已经达到 440 亿金法郎。

英德矛盾冲突还突出地表现在争夺海洋霸权上。夺取海洋霸权，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几百年来，英国能成为世界霸主，就是因为它一直掌握着海上霸权。德国要争得世界霸权，必须打破英国的海上垄断地位。于是，两国都把扩充海军实力作为争霸的重要手段。德国认为，建立海军是根据德国的需要，“至于是否合乎英国人的心意则毫无关系”，并组织起了“德国海军同盟”，大肆宣传“海权就是霸权，德国殖民之目的，只有在德国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而英国则认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我们是必需品，但是德国的海军从某些方面看不过是奢侈品。……如果别的海军国家想加倍努力赶上我们，那么，我们就要采取步骤再超过他们”，“德国的海上霸权是不能够与不列颠的存在并容的”。为此，英德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海军军备竞赛，使两国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到 20 世纪初，英德之间的矛盾不仅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

三国协约的形成 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德国，英国放弃了长期实行的“光荣孤立”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结盟的政策。1902 年 1 月，英日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该条约实际上是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英国可以假日本之手，削弱自己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沙俄，加强在远东的地位。但是英日同盟不能帮助英国对付其最主要的敌人德国，因此，英国要寻求在欧洲的伙伴。

德法之间的矛盾促使法国向英国靠拢。德法关系本来就极其紧张，在欧

洲大陆两国始终处于武装对峙状态，而在非洲为争夺摩洛哥双方正在进行剧烈的斗争。法国本想得到俄国的支持，但由于俄国正在对日作战，无法抽身，法国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身上。而此时的英国也在积极寻找欧洲的同盟者，这就使英国有可能与法国达成协议。

1900年，英国商会代表团访问巴黎取得成功；接着，一些法国商会代表团也访问了英国，双方开始接近起来。双方有决定性的“亲善”行为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在1903年春天访问巴黎，他在访问时对法国人说：“我相信过去两国之间的敌视，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两个国家的繁荣，像我们这样互相依赖。”英王的友好讲话换取了法国总统卢贝6月间的回访。英法关系迅速改善，两国外长开始就殖民地问题进行谈判。1904年4月8日，签订了《英法协定》。英法协定包括三个文件，在三个文件中都规定了两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协定载明，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的捕鱼权，英国在冈比亚和中非领土问题上向法国作了让步；法国承认埃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同意法国吞并摩洛哥；由英法两国沿湄南河把暹罗一分为二，划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暹罗与缅甸接壤的西部地区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印度支那毗邻的东部地区为法国势力范围；另外还调整了两国在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矛盾。由于英法就殖民地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国实际上建立了同盟关系。因此，可以说英法的结盟标志着英国正式同法俄集团勾结起来，准备共同对德国作战。

英法协约的签订为英俄接近创造了条件。英俄一向多仇恨，特别是在争夺远东和近东的斗争中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20世纪初，由于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使这些矛盾有所缓解。这是因为，俄国既已失败，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要求，对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不再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近东，由于俄国的力量受到削弱，英俄在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的矛盾也不如以前那样尖锐了。随着矛盾的缓解，双方往来增加。这一时期，英俄在经济上来往密切，英国对俄国的贷款有所增加。双方能签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德俄关系恶化，英德矛盾的激化，使德国成为英俄两国的共同敌人。

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英俄协定》。其主要目的是调整两国在中亚的矛盾。协定共有四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波斯的协定。协定规定，波斯将被划分为三个地区。北部地区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两个地区之间，有一个缓冲的中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双方均可取得租让权。在关于阿富汗的协议中，俄国政府声明，它承认阿富汗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即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关于中国西藏的协议中，双方约定，不干涉西藏的内政，不破坏它的领土完整，但只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宗主权”。

1893年法俄同盟的成立，1904年的英法协约，再加上1907年的英俄协约，构成了英、法、俄三国联盟，这个联盟又被称为“三国协约”。三国协约的形成使欧洲以前的均势格局发生变化，欧洲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在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中，同盟国一方以德国为主要代表，其实它已经陷入一种孤立的境地，因为意大利越来越靠不住；奥匈这个内部存在着深刻危机的帝国成了德国唯一可依赖的伙伴。在协约国里，英国占主导地位。俄国已在日俄战争中被削弱，国内又发生1905年革命，在经济上，英法的资本又控制着俄国，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附庸。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实质上

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德国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英、法之间的对立。

和平裁军和扩军备战 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前，总是施放和平烟雾，其目的是掩盖它们扩军备战的活动和麻痹敌方。19世纪90年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为帝国主义进行新的军备竞赛提供了物质条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积极地进行扩军活动，但它们仍然像以往一样，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战争准备，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天使。在这一点上，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现得最为突出。沙皇政府在1898年8月和1899年1月连续两次向各国发出倡议，要求举行和平会议，声称“这次会议有可能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纪的美好预兆”。沙皇在此时打出“保障和平”、“裁减军备”的旗号，完全是出于它自己的需要。一是因为它财政困难，在军备竞赛中无力与对手竞争，因此，想争取时间，放慢扩军的速度，用这种方法尽可能地限制对手；二是因为俄国与英日为争夺远东矛盾尖锐，特别是它刚刚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它企图以高唱和平的口号来缓和同英日的紧张关系，使自己有时间站稳脚跟。

各帝国主义国家非常清楚沙皇的真实目的，德皇威廉二世一语道破天机：“谁要是拒绝邀请，谁就是破坏了和平。”各国政府谁也不愿意公开拒绝，都假惺惺地表示同意。就这样，在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第一次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6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各国代表在会上大谈裁军与和平，却没有就裁军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决议，连会议发起国的俄国代表也认为不能期望这次会议有什么实际结果，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也夫更是直截了当地称裁军是“乌托邦”。会议仅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陆战法规等三项公约和禁止从气球上投掷炸弹和爆炸物等三项宣言，还决定创立一个“常设仲裁法庭”。这些作战公约成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但会议原来提出的任务，即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方面，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第一次海牙会议没有起到裁军的作用，也没给世界带来和平，人民普遍对这次会议不满。因此在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44个国家的代表。然而，这次会议同第一次一样，把废除战争作为一种幻想搁在一边，把大量时间放在争论国际法中关于战争的条文；重申了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公约，并通过了有关中立问题及海战法规等十个新公约。两次海牙会议给人总的印象，好像是在一场体育比赛之前制定比赛的规则，而不是要取消这场比赛。因此，这不是什么和平会议，而是战争的筹备会，它预示着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即将来临。

此外，双边和平谈判也在频繁进行，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德之间的谈判。自1905年起，英国就向德国提出裁减海军军备的建议。1908年英德两国又进行了新的谈判，这是英国企图束缚德国的手脚，使其放慢海军扩建计划的措施。在1912年英德之间的海军谈判中，英国企图以在争夺殖民地方面给予让步，来换取德国承认英国的海军优势，使德国放慢甚至停止造船，但没有达成协议。1913年的最后一次谈判，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终于以失败告终。这些谈判都是要束缚对方、欺骗对方，当然就不能有什么结果。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鼓噪和平的同时，积极进行扩军备战，进行军备竞赛。

德国为了扩军备战，军费猛增，从1902年至1911年，军费由87,450万马克增至125,900万马克，到1914年，增至324,400万马克。德国在战前拥有仅次于俄国的常备军，拥有51个师，达87万人，同时还训练了大量

的预备役军官，以备战争爆发时迅速扩军。此外，德国还增设了飞艇部队，计有 6 个兵站，飞艇 50 只。它还拥有大量 77 毫米速射野战炮。

奥匈帝国也不甘落后，它的军费开支从 1902 年到 1911 年由 40,160 万马克增至 54,880 万马克，至 1914 年增至 80,000 万马克。1912 年通过新的军事法案，增加军队 20 万，其正规部队到 1913 年达到 56 万人，并加强了炮兵。

意大利的军费开支也由 1902 年的 28,250 万马克增至 1911 年的 47,250 万马克。

与此同时，协约国也厉兵秣马，加紧备战。英国的军费开支从 1902 年到 1911 年由 121,830 万马克增至 145,240 万马克。它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海军方面，但同时也没有放弃陆军，战前，陆军达 25 万多人。

法国的军费开支也迅速增加，从 1902 年到 1911 年由 82,720 万马克增至 105,210 万马克，1914 年达到 150,000 万马克。为扩大兵员，1913 年把服役年龄由原来的 21 岁至 44 岁改为 20 岁至 48 岁，把两年兵役制改为三年，使其常备军增加 50%，达到 80 万人；并用新发明的 75 毫米野战炮装备陆军。

俄国虽然经济困难，有些力不从心，但它也决不甘心落在其他帝国主义后面，它利用法国贷款扩充军备。从 1902 年到 1911 年，俄国的军费从 87,450 万马克增加到 125,100 万马克，1914 年竟达到 183,400 万马克。1913 年，俄国把服役期延长三个月，并聘请法国霞飞将军为其改编军队出谋划策。它的陆军总数居欧洲列强之首，已达 130 万，但它还通过扩军法案，准备将常备军扩充到 230 万。并着手重建波罗的海舰队，加强黑海舰队。

在海军军备竞赛方面，尤以英德两国最为突出。德国感到，要同英国争霸必须掌握制海权，因此，威廉二世叫嚣“德国的未来在海上”。1898 年，德国通过了为期 20 年的庞大海军建设计划，两年后又把这个计划扩大了一倍。德国的海军扩充，使英国的“双强标准”遭到冲击，英德两国开始了疯狂的海军竞赛。1906 年，英国第一艘 18,000 吨级的巨型装甲舰“无畏号”下水，德国不甘示弱，很快就造出了无畏舰。1908 年，英国批准造好的无畏舰是 12 艘，德国是 9 艘；老式装甲舰英国是 63 艘，德国是 26 艘。由于新型战舰的出现，旧式军舰的作用已大大降低，因此，德国的海上力量仅稍稍落后于英国。但德国仍不满足，同年通过第四次海军法案，规定从 1908~1911 年每年建造四艘无畏舰，从 1912 年到 1917 年，每年建造两艘。德国的急起直追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威胁与日俱增。英国决定，德国每造一艘大型军舰，英国就造两艘，以保持“双强标准”。到 1914 年，德国已拥有各种新战舰共 232 艘，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海上强国。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是连结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最近通道，直布罗陀海峡、黑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是控制这条海道的咽喉。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在这里激烈展开，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地中海地区多次出现紧张局势，主要有 1905 年到 1906 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8 年至 1909 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 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 年至 1912 年的意土战争以及 1912 年至 1913 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

20 世纪初期第一次重要的国际危机是由德法对摩洛哥的争夺而引起的。在 1904 年的英法协约中，英国认可摩洛哥“行动自由”，法国便借此加紧了对摩洛哥的控制。1905 年 1 月，法国向摩洛哥提出一个对摩洛哥的行政、

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改革”的方案，如果摩洛哥接受这一方案，无异于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受法国的保护。德国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如果法国在地中海的势力不断扩大，必将威胁德国的称霸计划。所以德国指使摩洛哥政府予以拒绝。此外，德国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想以此来试验一下英法协约的效力，向法国指明，在紧急关头，英国不会支持法国。1905年3月底，德皇威廉二世到达摩洛哥，对摩洛哥苏丹进行礼节性访问，并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他声称，摩洛哥苏丹是独立国家的君主，因此他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并要求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绝对平等”，实际上是在否认法国的特殊权益。德皇公开宣称，德国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强国统治摩洛哥，它将对这件事进行不惜一切的抵抗。

法国对于德国在摩洛哥的挑战，开始是坚持对抗的态度。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认为，英法协约签订后，英国将支持法国的立场。事实的确如此，英国政府认为，法国是否向德国屈服，是它靠向德国还是靠向英国的问题，因此它忠告法国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不要对德国让步，并对法国保证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英国将派遣10万或11.5万军队支持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于1905年6月派军舰去摩洛哥对德国进行恫吓；德国也不示弱，首相比洛向法国大使提出警告说，“如果法国军队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就立时越过法国边界。”德法关系一时非常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但没过几天，德国强硬的态度就软了下来，同意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利益”。这是因为，德国看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支持德国，而且英国又明确地站在法国一边，再加上自己也确实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法国政府也认为，英法协约还不稳固，虽说英国答应支持法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英国的海军没有轮子……不能保卫巴黎”。而且法国自己也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因此，法国政府决定让步，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被迫辞职，同意在国际会议上审查摩洛哥问题。

1906年初，讨论摩洛哥问题的会议在西班牙的阿耳黑西拉斯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个国家。会上，俄、英、美等国都支持法国，甚至意大利都不支持自己的盟国——德国，而支持法国，只有一个奥匈帝国勉强支持德国，德国陷入孤立。会议声称，承认摩洛哥“独立”，各大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平等。但摩洛哥的财政由国际监督，它的警察组织和治安工作由法国和西班牙分别管理。这说明，法国在这次外交会议上取得了实际意义的胜利，促进了英法关系进一步加强，法俄联盟也进一步巩固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也有了改善，特别是它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摩洛哥进行控制和干涉。会议的结果与德国的愿望相反，不但没有达到打击法国、削弱英法协约的目的，反而使自己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境地。

波斯尼亚危机 摩洛哥危机以后，1908~1909年在巴尔干又发生了波斯尼亚危机，它反映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尔干地区的尖锐矛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由奥国占领，但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仍属土耳其版图。1908年，土耳其发生革命，奥国就乘机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奥匈帝国的扩张行径激起了南部斯拉夫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塞尔维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它一向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看作是它未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强烈反对奥匈吞并波、黑两地，要求以武力抵抗奥匈侵略。

奥匈帝国胆敢公然侵吞波、黑地区，是因为它既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又得到了俄国的默许。1908年9月，俄奥两国外交大臣在布赫劳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秘密协议：俄国同意奥匈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则同意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国舰队开放。这是一次为分割巴尔干势力范围而进行勾结的会议。英法两国对这个秘密协定极为不满，它们认为，如果开放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那就应该使欧洲各大国享有同等的权力，两个海峡不能单独对俄国舰队开放，而这是俄国绝对不能同意的，它宁可自己得不到海峡，也绝不许英法染指该地区。

由于海峡问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也就是俄国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奥匈先行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使俄国非常恼火，向奥匈提出抗议，并以自己是斯拉夫人的“保护者”的名义，转而支持塞尔维亚人抵抗奥匈，奥匈则力图用武力压服塞尔维亚。1908年11月奥匈帝国宣布部分动员，向塞尔维亚边境集结军队，进行威胁。12月，德国公开声明无条件地以武力支持奥匈，认为“这是和俄国算帐的最好时机”。土耳其政府对奥匈吞并波、黑两省，开始时提出强烈抗议，但由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只得于1909年2月与奥匈签订协定，土耳其以250万英镑的代价，放弃了自己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名义上的主权。

1909年3月，德国要求俄国敦促塞尔维亚承认奥匈吞并波、黑两省的既成事实，而且威胁俄国说，如果沙皇政府继续支持塞尔维亚，那么俄国“将不仅要同奥匈作战，而且将同德国作战。”沙皇俄国认为自己对德奥开战的准备和力量都不足，同时又没有得到英法的有力支持，只好对德奥让步，表示接受德国的要求，同时又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强迫塞尔维亚放弃反抗奥匈侵略的战争准备和停止一切反奥活动，塞尔维亚被迫屈服。这次危机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也使奥匈和塞尔维亚的敌对关系更趋尖锐，埋下了发生萨拉热窝事件的火种。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波斯尼亚危机过去不久，德法两国又在摩洛哥发生了新的冲突。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的近郊发生了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法国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镇压起义，在5月占领了非斯。摩洛哥就这样完全落入法国的掌握之中。

德国认为，法国的行为损害了它在摩洛哥的利益，所以不能容许法国独占摩洛哥，企图分割到一部分土地，或在别处殖民地上得到补偿。于是在1911年7月1日，德国驻巴黎大使交给法国外交部长一份备忘录，声称因摩洛哥的“混乱”，使德国侨民感到不安，德国政府决定派一艘军舰到阿加迪尔港，以便救助侨民和保护德国的利益。同日，德国军舰“豹号”抵达阿加迪尔港，并暗示要到法国撤兵之后“豹号”才会离开。还将军舰上的炮口对准阿加迪尔，进行威胁。这一事件被称为“阿加迪尔的豹的跳跃”。德法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接着，双方就此问题开始谈判。法国态度强硬，法国大使向德国外交大臣说：“假如您想在摩洛哥分得一杯羹，那末还是不谈为妙，法国舆论是不会同意和你们瓜分摩洛哥的。……你们可以去别处寻找嘛。”德国则提出，割让全部法属刚果作为补偿，但遭到法国的拒绝，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德国派柏林号巡洋舰去摩洛哥，进行恫吓，情势十分紧张，战争气氛越来越浓。

英国容不得德国在接近直布罗陀海峡入口处插足，唆使法国坚决反对德国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如果德法两国发生战争，英国一定参战。”

7月21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发表声明，决心站在法国一边，接受德国的挑战。由于英国强硬的态度，加之德国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不得不降低要求。11月，双方签订了协定：法国保护摩洛哥，但商业上仍实行门户开放；为补偿德国，法国把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随后，德国军舰撤离阿加迪尔港。经过几个大国的肮脏交易，以牺牲摩洛哥利益渡过了这次危机。危机虽然过去了，但德国极端仇视英国的干涉，加剧了英德对立。德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太少，积极地准备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

意土战争 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意大利突然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意大利早就蓄谋染指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这里虽然荒凉，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的黎波里地处北非地中海南岸，和西西里岛遥相呼应，监视地中海的较狭窄的海面。意大利把占领的黎波里看作是夺取地中海霸权和向北非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夺取这块土地，意大利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早在1902年，意大利就同法国订有秘约，在的黎波里问题上法国有支持意大利的义务。在1909年的拉康尼兹协定中，俄国也保证给意大利同样的支持。最后意大利便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趁火打劫。

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突然向土耳其发出要求割让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最后通牒，说该地区在土耳其统治下既无秩序又贫困，而且有反对意大利侨民的行为，意大利为“保护自己的声誉和利益，决定军事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还要求土耳其“防止对意大利军队的任何抵抗行为”。土耳其拒绝了这些屈辱的要求，意大利便对土耳其开战。意大利指挥部决定进行迅速的军事打击，以期土耳其不能作严重的抵抗就投降。的确，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很快就击败了土耳其在的黎波里的少量警备部队，并占领了的黎波里的沿海地带；但后来当地居住的阿拉伯人对意大利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使意军未能向腹地继续推进，战争拖长了。

为了对土耳其增加压力，意大利舰队炮轰贝鲁特和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请求列强出面调停，毫无结果。俄国借此机会再次提出黑海海峡单方面向俄国舰队开放的要求，由于英、法、德反对，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战争一直延续到1912年巴尔干战争开始时才结束。10月15日在洛桑订立和约草案，18日，正式签订了《意土和约》，土耳其被迫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让给意大利，使这一地区变成了意大利一个新的殖民地——利比亚。

两次巴尔干战争 意土战争结束之时，在巴尔干半岛上又爆发了新的战争。早在19世纪，巴尔干半岛就形成了许多独立国家，但直到20世纪初，土耳其仍然控制着巴尔干的大片领土，许多巴尔干人民仍处在土耳其暴政统治之下。意土战争加速了巴尔干各国反土耳其力量的结合。1912年3月，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5月，保加利亚又和希腊签订了同盟条约；8月，门的内哥罗加入了这个同盟，于是形成了四个巴尔干国家的同盟。这个同盟是巴尔干各国封建君主的联盟，但由于它领导巴尔干人民反对土耳其的统治，因此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

1912年10月9日，门的内哥罗首先对土耳其宣战，10月17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参战，翌日，希腊也参加了对土耳其的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全面爆发。最初的军事冲突就已经表明，巴尔干同盟国较土耳其居优势，它们很快打败了土耳其。保加利亚军队推进到伊斯坦布尔附近，希腊占领了萨洛尼卡，塞尔维亚占领马其顿大部、阿尔巴尼亚北部和新巴萨尔。1912年

11月，阿尔巴尼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土耳其在当地的政权；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宣告独立。土耳其失去了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土地，面临着军事上的全面崩溃。

11月3日，土耳其要求列强强调停议和，帝国主义乘机干预巴尔干战争。德奥两国不愿塞尔维亚强大，表示在塞尔维亚问题上不能让步；俄法则支持塞尔维亚，因为它是俄国在巴尔干的主要依靠，俄国并因此进行了局部动员。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夺，尤其是俄、奥的对立，巴尔干形势十分紧张。到11月末，巴尔干战争有转为德、奥对俄、法的欧洲大战的危险。只因俄国准备不足，被迫让步。德国也因英国表示如果事情演变到有法德参加的欧洲战争时，则英国可能不保守中立，而改变立场，所以奥匈帝国也不得不同意把这次争端交付国际会议去解决。

1912年12月，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欧洲列强操纵了这次会议，俄、法支持巴尔干同盟，德、奥则在背后给土耳其撑腰。1913年1月，土耳其国内发生政变，战事再起。3月13日，保加利亚军队攻陷亚得里亚那堡，伊斯坦布尔又在危急中，土耳其被迫再次求和，恢复了伦敦谈判。5月30日，签订伦敦条约。土耳其将伊诺斯—密地亚一线以西的属地让给巴尔干各国。至此，它在欧洲500年来所有的领土完全丧失，只保留首都孤城和它附近的地方。阿尔巴尼亚在各大国“保护”下独立。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次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使原来土耳其奴役下的一些巴尔干人民获得解放。

巴尔干同盟虽然取得了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但由于战果分配不均，同盟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希腊得到马其顿南部及克里特岛，塞尔维亚得到马其顿北部与中部，保加利亚得到色雷斯及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没有得到出海口，要求保加利亚给予补偿，而保加利亚则自恃作战有功，拒绝作出让步。1913年6月1日，塞尔维亚和希腊结成反保同盟，罗马尼亚随后也加入了这个同盟，准备对保作战。保加利亚先发制人，在奥匈的怂恿下，于6月29日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站在塞尔维亚一边作战，不久，土耳其也加入反保战争，想乘机捞回一些它在上次战争中的损失。这就展开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是争夺领土的王朝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仅进行了一个月保加利亚便战败求和。

1913年7月30日，和会在布加勒斯特开幕，8月11日，保加利亚就同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和约；9月29日，保土和约也签订了。塞尔维亚几乎完全得到了在此以前保加利亚从土耳其手中夺得的那一部分马其顿领土；南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划归希腊；南多布鲁甲划归罗马尼亚；东色雷斯一部分，连同埃迪尔内，划归土耳其。结果，保加利亚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所获得的领土，只剩下了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一小部分。

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民基本上摆脱了土耳其的民族压迫，推动了还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要求和塞尔维亚合并，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国家。但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了奥匈和沙俄等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它们取代了土耳其的势力，逐渐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形成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局面。奥匈不仅阻止塞尔维亚的扩大，并企图消灭年轻的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视为自己在巴尔干争霸的前哨阵地，竭力支

持塞尔维亚对抗奥匈。这就加剧了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巴尔干的争夺，使其成为最敏感、最易爆发战争的地区。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的爆发 20 世纪初期的地中海地区频发的危机和连年不断的局部战争，预示着大战即将到来。这是以英、德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然结果，它们都想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方，壮大自己。萨拉热窝事件便成为了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弗兰兹·斐迪南是一个积极主张进行战争的军国主义代表人物，他极力鼓吹对塞尔维亚进行“预防性的战争”；在政治方面主张修改宪法，废除奥匈帝国的“二元制”而改行“三元制”，也就是使帝国所统治的南斯拉夫人同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有所谓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其实质是要像统治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一样，牢牢地控制南斯拉夫人，在表面上却用“政治地位平等”来麻痹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斗争意志。因此，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认定斐迪南皇储是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对其深恶痛绝。

奥匈帝国为了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进行威胁，决定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维亚作为假想敌。奥匈帝国的这种蓄意挑衅行为，引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怒，一个名为“黑手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人团体决定打击奥匈侵略者的气焰，以刺杀皇储斐迪南为手段。他们在塞尔维亚准备好了之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几名受“黑手党”影响的波斯尼亚青年。他们虽然是奥匈国民，但都是塞尔维亚族人，具有强烈的反奥思想。在“黑手党”成员的协助下，潜回波斯尼亚，作了精心的布置，等待刺杀时机的到来。

1914 年 6 月 28 日，在检阅完军事演习后，斐迪南偕同妻子乘敞篷汽车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市政厅。当车队行驶到闹市中心时，事先埋伏在路旁的波斯尼亚青年查卜林诺维奇向斐迪南乘坐的汽车投掷了一枚炸弹，但没有命中，只炸伤了一名随从军官。当斐迪南夫妇参加完市政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乘车返回，行驶到一个街口转弯处，车速放慢时，隐蔽在路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波，急步上前，用手枪对准斐迪南夫妇连发两枪。斐迪南头部被击中，当时毙命，其妻子被击中腹部，倒在血泊中，不久死亡。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欧洲的火药库。

奥匈本来就一心要吞并塞尔维亚，斐迪南被刺正好提供了一个发动对塞尔维亚战争的借口。但调查的结果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并未参与谋刺活动。尽管如此，奥匈还是要以此事件为借口来发动战争。奥国的战争意图得到德国的大力支持。德皇威廉二世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坚决主张奥国应迅速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不必踟蹰”，“要么立即清算，要么永远不”。德国还用外交方式使奥国大使确信“德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有了德国的支持，奥匈更是有恃无恐，它也认为这是侵吞塞尔维亚的极好机会。6 月 29 日，奥匈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声称必须立即开始军事动员，外交大臣也叫嚷说：“现在是到了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候了。”

在协约国方面，沙俄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并竭力阻止奥匈吞并塞尔维亚以维护它自己在巴尔干的利益。沙俄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将有利于俄国夺取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法国向俄国保证，如果俄国与德国发生战争，法国定将履行自己的同盟义务，并指示法国驻俄国大使一定要使俄国“坚定，我们一定支持它”。英国则玩弄狡猾的外交伎俩，它一方

面向德国表示要尽可能防止大国间的战争，断然说沙俄是爱好和平的，如果发生纠纷，英国一定尽一切可能“防止暴风雨”。另一方面又鼓励俄国积极备战。这就给德奥造成一种英国不会马上卷入战争的错觉，增强了它们发动战争的信心。

经过与德国的密谋之后，关于战争的问题已经确定了。奥匈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向塞尔维亚提出其无法接受的要求，如何把军事冲突的责任从奥匈方面转嫁到塞尔维亚身上。1914年7月23日晚，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指责塞尔维亚政府纵容恐怖行动和支持反对奥匈的运动，并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求塞尔维亚取缔一切反奥组织，禁止一切反奥宣传，按照奥政府提供的名单从军队和政府中肃清反奥的文武官员，由奥方派代表到塞尔维亚境内追捕和审判与谋刺案有关的“凶手”等等。限定在48小时以内答复。满足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塞尔维亚将失掉自己的主权，沦为奥匈的附庸。塞尔维亚政府一方面向各国使节申诉塞国政府不能接受奥国要求的理由，一方面向沙俄求援，并表示“除死战外，别无可为”。而此时沙俄政府却想以牺牲塞尔维亚来求得同德奥的暂时妥协，劝告塞尔维亚把军队调开，放弃抵抗，并要求它在答复奥匈最后通牒时尽量委屈求全。由于沙俄违背了支持塞尔维亚的诺言，塞尔维亚政府认为自己无力单独抵抗奥匈的进攻，不得不忍辱求全，于7月25日晚最后通牒时效到期之前，向驻塞尔维亚的奥国大使递交照会，表示接受最后通牒中的大部分要求，仅因最后一项“破坏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而有所保留。虽然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已经表示了它平息冲突的决心，但决心对塞尔维亚开战的奥匈仍宣布说，它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断绝了奥塞之间的外交关系，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是日午夜，炮击贝尔格莱德，开始了军事行动，此后，事态急剧发展，各国纷纷动员、宣战。

俄国原想以牺牲塞尔维亚来暂时避免与德奥作战，不料奥匈仍对塞尔维亚宣布了战争。尽管它还未完全准备好，也不得不提前行动，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12小时内取消总动员令。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同日，法国下令总动员；8月3日，德国以法国飞机侵犯德国领空和法军挑起边界冲突为借口对法国宣战。8月1日，德军占领卢森堡，2日下午又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准许德军过境，借道进攻法国。只有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坚决地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英国请求援助。英国政府决定利用这次请求作为参战的主要理由，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不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德国的外交大臣的回答是不能给予这种保证。8月4日晚11时20分，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他已经向所有的海洋发出无线电报，命令英国军舰对德作战。8月5日，门的内哥罗加入塞尔维亚方面作战。8月6日，奥匈帝国正式向俄国宣战。这样，欧洲各帝国主义大国，除意大利还在动摇外，都卷入了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中。

在欧洲爆发的军事冲突，很短时间就蔓延到远东和近东。日本为扩张在东亚的势力也趁火打劫，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走中日领海内的德国海军，于9月15日以前“无条件和无代价”地把胶州湾交给日本，遭到德国拒绝后，日本就借口履行“英日同盟”的义务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土耳其早已亲德而疏远协约国家，于8月2日同德国签订密约，帮助它去防御沙俄。10月29日，土耳其的兵舰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等俄

国重要港口。沙俄随即于 11 月 2 日对土宣战。英、法也于 11 月 5 日对土耳其宣战。

从 1914 年 7 月 28 日起，历时仅三个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就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德、奥、土为一方，俄、法、英、日、比、塞及门的内哥罗为另一方。到 1918 年，共有 31 个国家参加了战争。战争范围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这次战争是几十年来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交战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但各参战国都用“正义战争”、“保卫祖国”等美丽辞藻掩盖自己掠夺政策的本质。

德国首相曾发表声明说：“别人嫉妒德国的富强，因此想把锁链加在德国身上。我们为了欧洲的和平而战争。”德国的报刊也写道，德国在东方作战是为了反对帝俄专制统治，推进西欧文明；在西方作战是为了预防法国的进犯。德国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声称即使德国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法国也要侵犯。俄国声称自己是被迫作战，纯系反抗德、奥进攻。法国则说，德国未经宣战就进入了法国领土，从而破坏了国际公法。法国总统说：“法国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而斗争。”英国参战时则强调德国破坏了庄严的国际条约，英国是为了捍卫比利时的中立，反对强大民族欺凌弱小民族。

德国参战的目的，是要彻底重新瓜分世界，夺取英、法、比利时等国的殖民地，建立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意志帝国”或“中欧帝国”。它的范围包括比利时、荷兰、法国的一部分、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国家和西亚地区。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经济同盟，把俄国挤到亚洲去，并使其成为德国的农业附庸国。在海上打垮英国的垄断地位；在非洲、太平洋和南美夺取英、法、葡、比等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奥匈帝国则想使塞尔维亚沦为其附属国，夺取通往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出海口，把奥匈二元帝国扩大为三元帝国。

在协约国方面，英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保住世界霸权，同时掠夺更多的殖民地；消灭德国海军，打垮德国这个世界市场上最危险的竞争者；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并巩固在埃及的统治。法国要在战争中洗刷 1870 年普法战争中失败的耻辱，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侵占德国的萨尔煤铁矿区，恢复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沙皇俄国则要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伊斯坦布尔，使黑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意大利则要瓜分北非，建立在地中海中的霸权。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别国领土，奴役别的民族，镇压革命运动，转移国内阶级矛盾，打击竞争者和争夺世界霸权。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应当指出的是，塞尔维亚是被侵略国家，它的参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反对侵略和民族解放的因素，它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但对整个战争而言只具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

双方的战略计划 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都对这场世界大战作了充分准备。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装备较好的陆军，奥匈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

依附于德国，两国陆军人数达 623 万人，且兵力集中，装备精良。英、法、俄三国兵力达 873 万人，并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英、法舰队可以对德、奥实行封锁，断绝他们的海外联系，但英、法的兵员分散，装备较差。从战争的后备力量来看，德、奥、土、保四国的人口为 1.45 亿，其领土连成一片，兵员调集方便、灵活；但它们能支配的只有本国的资源和用战争手段夺取的被占领国家的资源。英、法、俄、意四协约国人口达 2.88 亿，但较分散；但它能广泛利用殖民地和中立国的资源，有利于长期作战。

欧洲一直是大战的主要战场，共有三条主要战线：西线是英、法对德战场；东线是俄国对德、奥战场；南线是奥匈对俄国与塞尔维亚战场。

德国的作战计划是，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实行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速决战。这种战略思想是根据战前总参谋长施里芬在 1905 年制定的计划而形成的。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集中很大部分兵力，在四周至六周内迅速击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调过头来对付俄国，争取在两三个月内赢得整个战争。“施里芬计划”规定，在东线对沙俄军队采取守势，只用 9 个师配合奥军进行防御。在西线集中 78 个师进攻法国。西线的左翼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只布置了 8 个师；其余的 70 个师则集中于右翼，企图出其不意地通过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越过未设防的法国北部，沿海岸线迅速推进，强渡塞纳河，经鲁昂北部折向东南，从西南和南面包抄巴黎，形成钳形攻势，这样就可以把法军围歼在右翼纵队的“铁锤”与左翼纵队的“铁砧”之间。然后把主力部分调到东线，会合奥军，以同样的闪击方式全歼俄军。战争爆发时，由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对施里芬计划作了一些修改。西线右翼部分只有 52 个步兵师和 7 个骑兵师，比前计划少了 11 个师，左翼增至 15 个师，同时东线的力量也有所加强，两线进攻的力量被削弱了。

奥匈为配合德国的攻势，在 1909 年拟定的作战方案中，把战略重点放在对付俄国。将全部兵力分成三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布置在加里西亚地区；第二方面军驻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边境；第三方面军配合进攻塞尔维亚，同时支援第一方面军。

协约国方面的计划是指望俄、法两国同时在陆上对德国展开进攻，迫使德国在两线分兵作战。法国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莱茵河左岸。在 1914 年 4 月，法军总司令霞飞完成了“第十七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法军在德法边境共配备 5 个集团军，其中包括 79 个野战师、后备师和 10 个骑兵师。第一、二两个集团军放在战线的右翼，第五集团军放在左翼，第三集团军部署在凡尔登地区，目的是把左右两翼联为一体，第四集团军放在第三集团军背后，处于二线的位置，起接应作用。

俄国在 1910 年制定了第十九号作战计划，规定西部边境分为两条战线，分别对付德国和奥匈。在俄国的西北战线，部署了 19 个野战师，11 个后备师、9 个半骑兵师；在西南战线总共配置了 33 个半野战师、13 个后备师和 18 个半骑兵师。此外还在彼得堡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罗马尼亚、黑海沿岸部署了防御部队。

英国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上，因此它制定了周密的海上作战方案，并同法国进行了分工：法国负责地中海的防卫和战斗，英国则在北海对德国海岸的所有海军基地和港口实行封锁。另外，英国组织了十二万多人的远征军和十六万多人的后备部队，集结在法国北部，由法国参谋部统一指挥。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1914年的战争进程 1914年的战争是以德国速决战破产为特征的。在西线，德国出动了5个集团军，150万人向法国大举进攻。8月2日，对卢森堡不宣而战；8月3日夜侵入比利时，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德国本想迅速通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但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被德国称为“巧克力兵”的比利时军队，在列日同德军对抗了三天，使德军以四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夺取了这座城市，直到8月20日，德军才占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是德军速决战的首次受挫。从8月21日起，德军右纵队沿卢森堡—那慕尔—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一线，分五路向法国北部挺进，21日至24日，双方在沙罗瓦会战，法军失败而退。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登陆以后于8月23日在蒙斯和德军交锋，也被德军击败。此后德军迅速推进。8月25日占领那慕尔，27日占领隆维，9月1日占领苏瓦松，2日占领拉昂，3日占领维兰斯，前锋距巴黎仅十几公里，法国政府匆忙迁往波尔多。巴黎危在旦夕。

法国虽然丢城失地，一路败退，但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经过修整和补充，准备反攻。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后，法军开始向巴黎地区集结，在巴黎设防，由加利埃尼将军指挥。9月3日以后，德军右翼第一、二集团军之间50公里的暴露地带，被英法联军插入，出现了有利于法军的情况，战局改观。4日，法军统帅霞飞抓住战机，下令同德军决战。9月5~9日，英法联军同德军会战于凡尔登和巴黎之间的平原上，这就是著名的马恩河战役。英、法6个集团军，德国5个集团军，共约200万人参加了战役，双方大约投入了600多门重炮和6000门轻炮。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双方展开了激战。法军死亡21,000多人，受伤120,000多人；德军死亡43,000人，受伤173,000人。10日晚，德军全线退却，霞飞向全世界宣布“马恩河战役以得到无疑的胜利而结束”。这次战役使巴黎的危势得以扭转，稳定了西线，德军的迅速推进被遏止，德国六周内打败法国的计划宣告破产。德军统帅小毛奇因马恩河战役失利而被撤职，由法尔根汉继任德军参谋总长。

马恩河战役以后，西线的主要战斗是“奔向海岸”，即争夺法国北部多佛尔海峡沿岸地区。法军经过亚眠向北急进，企图包抄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德军加以阻击，不断发生战斗。双方先后参加战斗的共有百个以上的步兵师和西线所有的骑兵。德国所研制的飞艇也投入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夺，德军占领了比利时西北部以及首都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奥斯坦德等重要城市。还深入法国东北部，共占领2.1万平方公里，是法国领土的二十分之一。但德国切断英法交通线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到12月，双方各自挖掘战壕，修筑工事，西线的军事进攻几乎停止，呈胶着状态。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稳定的战线：从凡尔登向西边延伸，西至努瓦荣然后转向北直到海岸；从凡尔登向南边，过圣米耶尔突出部，大致经当时法德边界到瑞士边境。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

1914年在德奥与俄国之间的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罗马尼亚边境的东线战场有两次大的战役，即俄、德之间的东普鲁士战役和俄、奥之间的加里西亚战役。

东普鲁士战场即俄国的西北战线，德国在此部署了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防止俄国的进攻；俄国兵力约等于德国的两倍。为了配合西线作战，俄国在未完成动员的情况下，于8月中旬便向东普鲁士的德军发起了进攻。17日

越过边界，20日在冈比宁战役中获胜，德军被迫撤退，伤亡达三分之一。俄第二集团军于23日越过边界，蜂拥而来。德军新任东线总司令兴登堡及参谋长鲁登道夫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于26日至28日包围了俄第二集团军，俄军统帅于29日夜自杀，部队全部被歼。接着，9月11日，德军又攻下俄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13日，俄军退出东普鲁士，虽然避免了被围歼，但损失了11万人，德军乘胜渡过尼门河，进入俄属波兰领土。东普鲁士战役以俄国失败而告结束。

俄军在东普鲁士失败的时候，在西南的加里西亚战场却取得了胜利。俄军集中了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在三百多公里战线上向奥匈军队发动进攻，奥军抵挡不住，接连败退。到9月底，俄军占领全部东加里西亚及布科维纳，到达喀尔巴阡山麓。以后进行的华沙—伊凡哥罗德之战、罗兹之战，俄军连连取胜。到12月中旬，双方都停止了进攻。于是东线同西线一样，也呈现了近于阵地战的状态。

1914年的东线双方互有胜负，德军虽然取得了东普鲁士战役的胜利，但这个胜利迫使它从西线调来援军，从而扩大了东线的战争规模，越来越深深地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境地。

南线是塞尔维亚对奥匈的战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唯一的正义战争。8月13日，奥匈军队越过德里纳河，开始侵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口不多，经过战争动员，兵员达40万人，但只有10万支步枪，其他战备物资也极为缺乏，但塞尔维亚人民士气高涨，抗战英勇。仅经过四天的战斗，奥匈军队便被逐回德里纳河对岸。虽然以后奥匈军队又发动两次进攻，甚至在11月17日占领贝尔格莱德，但不过一个月，塞军便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奥军在巴尔干战场损失了二十八万多人。从此直到1915年10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巴尔干基本上保持着静寂的状态。

除欧洲三条战线外，战争也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10月29日，德、土舰队炮轰俄国黑海港口，袭击俄国船只。31日，俄军自高加索侵入土耳其国境，土耳其第九军被围投降，第十军全部被歼。随后，俄国进兵占领伊朗的阿塞拜疆。虽然伊朗政府已发表了中立的声明，但交战国集团对这个声明没有理睬，依然在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英国也派兵到波斯湾，向美索不达米亚推进。12月，英国宣布埃及脱离土耳其统治，把它变成自己的保护国。

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后，不派一兵一卒到欧洲作战，却在远东地区趁火打劫。9月初，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那群岛。同时侵入中国领土山东半岛，占领德国租借地青岛。

1914年海上作战的规模不大。12月8日，英国海军在福克兰群岛水域击溃了德国的巡洋舰队。在北海，8月28日，英国海军袭击赫尔戈兰港，取得成功，战斗中英国只有一艘巡洋舰受伤，而德国有三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俄罗舰队在黑海也取得了对德国海军的胜利。

1915年的战争进程 1915年1月底通过的德奥年度战局计划规定，在西线，从新港到瑞士边境长700公里的陆地上进行积极防御；在东线，德奥军队协同作战，旨在击溃俄军的猛烈进攻，迫使俄国投降，然后把军队调往西线，歼灭英法军队。所以从1915年初起，德军就从西线抽调大量部队增援东线。在1~3月的战役中，双方互有胜负，俄军在马祖尔湖被德军击败，从东普鲁士撤了出来，但俄军也击溃了装备较差的奥匈军队，巩固了在加里西亚

的地位，占领了喀尔巴阡山上的几条通道，威胁到匈牙利。

德国力图要实现其战略意图，继续在东线增兵，到4月末，德军已在维斯瓦河上游和喀尔巴阡山之间集中了雄厚的兵力，包括16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1410门野战炮和1000门重炮。5月2日德军突然在西部加里西亚果尔利策宽约三十公里的地方突破俄国的防线。俄军遭此突然袭击，指挥和军需供应一片混乱，正面前线每门炮每天只有一两发炮弹可供发射，出现了“炮弹荒”。前线部队不断要求“紧急供应”，但情况没有丝毫好转。不得已俄军被迫在160公里宽的战线上匆忙后退。德军迅速推进，直到9月下旬，德军的进攻才缓慢下来。

总计东线五个月的战争结果，俄国放弃了布科维纳、加里西亚、波兰、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从此，东线又转为阵地战。德奥军所防守的战线，北起里加湾，南到布科维纳。俄军的节节败退，使战线大幅度东移。但是德军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它没有摧毁俄军，也没能使德军统帅部抽调其东线的全部兵力转移到西线去。

在西线，英法军队多次发动进攻。由于这些战斗都是在极其狭窄的战线上进行的，目标很小，所以收效甚微。2月16日至3月17日，英法军发动了香槟战役，但未能突破德军防御阵地。

德军为了反击英法军的进攻，并掩护军队向东线调动，于4月22日发动了伊普尔战役。在战役中，德军公然违反海牙国际公约，首次使用毒气，但没有收到太大效果。

为了减轻东线俄军的压力，9月，英法联军在阿土瓦和香槟再次发动进攻。这一次英军也使用了毒气，但几次进攻，前进的步幅不大，被迫停止了攻势。从11月开始，西部战线逐渐沉寂下来，再一次转入阵地对峙。在1915年的战役中，双方虽然都损失惨重，但阵地没有太大的变化。

意大利虽是同盟国的成员，但在战争爆发后却宣布中立，实际上是与交战国双方进行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协约国满足了意大利的欲望，于1915年4月26日在伦敦签订了英、法、俄、意协定，按照这个秘密协定，意大利将得到蒂罗尔南部，特伦的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及小亚细亚的部分领土。协约还规定了意大利应于一个月内参战。5月4日，意大利宣布废除同奥匈帝国的同盟条约，5月23日向奥匈帝国宣战。这样一来，欧洲就形成了第四条战线，即意大利对奥匈的战线。意大利动员了39个步兵师对奥匈作战，从6月29日到12月10日，在依崇佐河畔发起四次进攻，损失了近三十万人，但只取得局部胜利，把战线最多推进了20公里，因此，没有达到协约国要意大利吸引德奥军队的预期要求。年底，意奥战线也转入阵地战。

战争初期，保加利亚宣布“严守中立”，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到1915年下半年，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同盟国必胜无疑，遂于9月3日和德、奥、土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6日又和德、奥签订了军事协定。保加利亚撕去了中立的假面具参战，对塞尔维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塞尔维亚只有20万军队，而在奥塞边界和波斯尼亚却集中了35万德奥军队，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边界有30万保加利亚军队。虽然在战役开始后，有12.8万英法援军在萨洛尼卡登陆，但他们只以此地为桥头堡，准备将来的战斗，不能直接援助塞尔维亚，力量如此悬殊，胜败可以预料。10月5日，德奥大军开始进攻，9日占领贝尔格莱德，同时奥军从波斯尼亚进攻。保加利亚于10月14日正式

宣战，于 11 月 5 日占领尼什，截断塞军退往萨洛尼卡的道路。塞尔维亚军队虽英勇血战，但很快就被完全击溃，其残余的 12 万人退守希腊的科孚岛。塞尔维亚被打败以后，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同盟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1915 年两大联盟的海军行动并未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双方在海上都没有展开决战。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英、德两国巡洋舰队在北海的一次战斗，英国获胜；另一次是协约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斗，协约国失败。英国海军继续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德国企图借助潜艇打破封锁，虽未成功，但对协约国的海上交通线构成了很大威胁。

1916 年的战争进程 1916 年是大战关键性的一年，交战双方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本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这一年，德国又把战争重点放到了西线，所以在西线发生几次大战。俄国为配合西线，也在东线发动了攻势。

这一年西线第一次重大战役是凡尔登大战。凡尔登是法国的军事要塞，筑有复杂坚固的防御工事。它威胁着德属洛林，俯瞰着马斯河的上游，像一只突出的拳头，深入德国阵线。德军选择凡尔登为 1916 年进攻的主要目标，企图使它成为“碾碎法军的磨盘”，即吸引法军精锐部队到这里来而加以歼灭，进而打开通往巴黎的道路。德军调集了约 27 万人的部队、1000 门大炮，由皇太子亲自率领。当时防守凡尔登的法军只有 10 万人、200 门大炮，处于劣势。

2 月 21 日，德军以猛烈炮火轰击法军阵地，并派飞机轰炸法军的交通线，开始了凡尔登战役。在头四天中，德军就打出了四百多万发炮弹，法军们战壕浓烟烈火，树木烧焦，山头削平，阵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了过来，有人形容为“地表的地震”。法军作殊死的抵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了德军的前进。法国政府及时任命贝当为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官，并进行紧急增援。贝当于 25

日夜来到凡尔登，他给前线部队划定一条督战线，要求士兵死守。并立即组织抢修道路，组建了一支 9000 人的运输队，调集了 3900 辆汽车，从 27 日开始，在一周内赶运来 19 万援军和 25,000 吨军火物资，每昼夜有 6000 辆汽车到达凡尔登。由于法军有效的抵抗，德军未获进展。到月底，德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失败了。

6 月 7 日，德军再次发起猛攻。6 月 21 日，德军首次使用了毒气窒息弹，想消灭法军炮队。德军虽然杀伤大量法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凡尔登附近的炮台，但终未达到消灭法军的目的。7 月 11 日，德军进攻的最后一次高潮停止了，此后它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主动权逐渐转移到法军手里。10 月 14 日和 12 月 15 日，法军发动两次反攻，都取得胜利，夺回了大多数失地。到 12 月 18 日凡尔登战役结束。

凡尔登战役中法军有 60 个师先后参加了战斗，德军投入了 46 个师，双方伤亡人数总计 70 多万。虽然德军夺去了附近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凡尔登要塞始终掌握在法军手中。这次战役不仅是战争中期阶段的决定性战役，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德国开始走下坡路。

为了减轻凡尔登的压力，牵制德军，英法军队按照预定计划于 7 月 1 日在索姆河畔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这次进攻以英军为主，它活动在索姆河北，进攻的目标是巴波姆；法军配合于索姆河以南，以培隆为目的地。7 月 1 日英法士兵开始向德军阵地发起进攻，但进展缓慢，到 14 日，前进最远的地

方也不超过十公里，而自己的损失惨重。9月初，英法步兵又开始猛攻，并在15日英军发起的一次攻势中，首次使用坦克。这一新式武器的出现，使德军大为惊恐，英军乘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由于初期坦克制造得很不完善，装备较差，时速仅有6公里，战术运用也不尽正确，所以只能保证局部胜利，而不能保证整个战役的成功。到11月战役结束，英法军队没能达到突破德军阵线的预定目标。

这次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样，都是巨大的消耗战。其激烈程度比凡尔登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英军损失40万人，法军损失20万人，德国大约损失55万人。协约国军队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只不过前进了30公里，夺回德军占领的领土180平方公里。英法军队虽未达到预定的夺回失地的目标，但牵制了德军对凡尔登的进攻，这就使整个战局向着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化。

在意奥战线上，奥匈军队的进攻获得进展。5月15日，奥匈军队从特兰提诺以强大的炮火开始进攻，一举摧毁了意大利的防御措施，迫使意军在长达60公里的战线上退却，意军大败。

意大利的溃退产生了俄国的“布鲁西诺夫的进攻”。为援救意大利，俄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由布鲁西诺夫将军指挥，集中60万人和1930门大炮在长达400公里的战线上向奥军发动进攻。6月4日拂晓，开始了剧烈的炮战。6月5日，俄军突破奥军阵地，6月7日占领卢茨克，以后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占领了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和布科维纳，重新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上的隘口前。

东线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阻止了奥匈军队的进攻，使意大利军队免于进一步溃败；其次，改善了西线战场上的态势，使德军停止了对凡尔登的进攻，给英法军在索姆河发动攻势创造了机会；最后，它促使罗马尼亚决定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

罗马尼亚政府虽然在大战开始时宣布中立，但是它仍然敞开门户，欢迎交战双方跟它商讨价钱。到1916年，东线俄军既告胜利，西线德军屡遭失败，罗马尼亚认为时机成熟，遂于8月17日同英、法、俄、意签订条约，28日向奥匈帝国正式宣战。罗马尼亚的武器装备和军需供应都很差，对作战并没有充分准备，因而屡战屡败，同盟国军队反而分两路入侵：一路越过喀尔巴阡山隘口进入罗马尼亚北部；一路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尼亚南部。两路入侵的军队于12月6日在布加勒斯特会师，罗马尼亚的主要粮食产地以及石油和其他原料产地，都落到同盟国的手里。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之下，罗马尼亚战线才于12月底在多瑙河下游—布来拉—福克沙内—奥克纳—多尔纳瓦特拉一线稳定下来。俄军的战线为此延长了500公里。

战争开始的头两年，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的舰队始终龟缩在自己的港口内。德国指挥部为了突破封锁，改善自己的处境，决定进行海上进攻。1916年5月31日~6月1日展开了大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海战——日德兰海战。英方出动了151艘舰船，其中有37艘主力舰；德方出动101艘，其中主力舰27艘。5月31日，德国海军从基尔港出发，沿丹麦日德兰海滨驶向西北。下午3点48分与英国舰队相遇，双方同时开火。几百艘战舰横冲直撞，恶浪翻腾，硝烟滚滚，炮声隆隆。会战结果，英军损失舰船14艘，阵亡官兵6097人，德国损失舰船11艘，阵亡官兵2545人。英国损失虽大于德国，但仍掌握制海权，德军想要突破英军海上封锁的希望破产。此后，德国舰队一

直被封锁在港内，再没有较大的海战发生。

在 1916 年的几次大战役中，同盟国各国都遭到严重挫败，总的军事形势变得对它们越来越不利，东西两条战线都基本固定下来，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德国最害怕的。协约国虽然没能击败同盟国，但它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开始占优势地位，战略主动权已经转移到协约国手中。

1917 年的战争进程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在陆上，德军已处于被动局面；在海上，德军的处境也十分困难，英国实行着严密的封锁，掌握着制海权。因此，对于英军的海上封锁，德国只能用潜艇进行报复。

早在 1915 年 5 月，德国潜艇曾在爱尔兰南部海面击沉英国大型商船“卢西塔尼亚”号，船内旅客中有 120 名美国人，因此美国向德国抗议，德国答应限制潜艇活动，允诺军事行动只限于交战国。此后，交战国之间的攻击并未停止。在 1916 年，德国潜艇共击沉了 277 只英国船只，总吨数达 125 万吨，给英国海上运输带来一定困难。日德兰海战之后，德国更感到有必要扩大潜艇战争。在 1917 年初德国的军事会议上，海军将领坚决主张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他们认为，这可以迫使英国人在六个月内因饥饿而投降。鲁登道夫也赞成这一观点，认为最多一年便可达到这个目的。德皇威廉二世决定，德国从 1917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凡是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一切舰船，均受到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的船只也未能幸免。1917 年 4 月，潜艇战达到高潮，自英国开出的船只，每四艘中便有一艘被击沉。德国的这种战术，在头几个月里，确实使协约国受到惨重损失。1 月份被击沉的商船为 181 艘，2 月份达到 195 艘，3 月份增加到 325 艘，4 月份更达 423 艘。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击沉协约国商船 6000 余艘。而德国只损失潜艇 216 艘。

德国的潜艇战虽然取得了重大战果，但也促使协约国在战争中迅速创造出一些防御及反击潜艇的办法，如用“流体测音器”侦察潜艇的行踪；在多佛尔海峡布满电网阻止潜艇通过；发明能炸毁潜艇的深水炸弹；商船航行时，配备强大的护航队等等。因此，协约国虽受到很大损失，但英吉利海峡的交通运输并未中断，德国迫使英国求和的企图没有实现。

虽然自 19 世纪末以来，美德在拉丁美洲的矛盾日益增长，但大战爆发后，美国没有马上参战，而是静观事态的变化，以坐收渔翁之利。美国政府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果将是“没有胜利的和平”，即双方实力都会受到很大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决定性的胜利，“那时整个世界前途就会落在我们手中”。美国地处北美，与战区远隔大洋，战争为美国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不过，战时美国与协约国和同盟国的贸易是不等的。由于英国封锁，美国与同盟国的贸易猛跌，几至于无，与协约国的贸易却增加三倍。美国同协约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后，再不能隔岸观火，而是伺机参战。

1917 年 1 月 31 日，德国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宣布从次日起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这意味着战争”。2 月 3 日，威尔逊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以下两个事件进一步给美国提供了参战的口实：自 2 月 3 日至 4 月 6 日，德国潜艇击沉了 10 艘美国船只；另一事件是德国外交大臣发给德驻墨西哥大使一份密电，令其鼓动墨西哥进攻美国，并许诺把美国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三州还给墨西哥，这份密电被英国间谍截获，并转交给美国政府。美国于 2 月 28 日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文件，致使美国舆论大哗，参战呼声愈高。政府中主战派人物更是极力要把美国拉到战争中去。1917 年 3 月，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奇在拍给威尔逊的电报中说：

“很可能唯一可以保持我们目前的优越的贸易地位并防止恐慌的办法，就是对德宣战。”

美国参战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美国担心俄国可能单独退出战争，削弱协约国，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贷给它们的 20 亿美元贷款将付之东流。如果美国帮助协约国打败同盟国，它不仅分得一份肥美的赃物，还可以恃其经济力量在战后控制其他国家，夺取世界霸权。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借口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于 1917 年 4 月 6 日，向德国正式宣战。

美国的参战对战局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首先是它影响了许多其他“中立”国家，在美国宣布参战后，中国、巴西、暹罗、利比里亚、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古巴、巴拿马、汉志、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国也纷纷宣战，先后加入到协约国集团一方，这样就扩大了协约国阵营，使其达到 27 个国家，形成了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军事上对协约国集团直接援助。在 1917 年 6 月，美国派出几十艘军舰协助英国海军，进一步控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至大战结束前，共派出 85 艘驱逐舰参加反潜作战，并选出了 400 艘猎潜艇，美国海军参战是使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参战时美国只有 30 万陆军，但在 1917 年 5 月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迅速把军队人数增加到 300 万，并源源不断地把军队派往欧洲前线，共达 200 万人。最后，在财政和军需供应方面，更是给协约国带来了好处，大量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欧洲战场。美国不仅完全中止了对德、奥的军火供应，而且大幅度提高对协约国的贷款。美国全部战时支出，包括给协约国集团的贷款，共达三百五十多亿美元。从物资上为协约国的最终胜利准备了条件。

1917 年，德国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无限制潜艇战上，因而在各条战线基本取守势。协约国在西线发动几次进攻，没有多大收获。在东线，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虽然仍推行战争政策，但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德国乘机反攻，占领里加，进而威逼彼得格勒。在意奥战场，意大利再遭惨败，幸有英法派来援兵，才阻止了德奥军队前进。从陆战情况看，1917 年两大军事集团仍处于僵持状态，无重大转机。

战争的结束 战争给各交战国带来普遍的灾难和破坏。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即 1917 年，各交战国已精疲力竭，经济极端困难，社会普遍动荡。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在腐朽落后、各种矛盾最为集中的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提议谈判，遭到协约国的拒绝之后，俄国单独同德国进行了谈判。于 1918 年 3 月 3 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首先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苏俄退出战争以后，德国以为有机可乘，就从东线调出兵力集中于西线，企图在美国军队调到欧洲之前打败英法，尽早结束战争。当时，同盟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耗尽，兵源枯竭，后方不稳，它们最后发动的几次进攻只不过是孤注一掷的最后挣扎。从 3 月到 7 月，德军倾其全力在西线发动了五次攻势，均遭失败，德军损失 70 万人元气丧尽，再也无力发起进攻。

协约国方面自美国参战以后力量大大加强，逐渐掌握全部优势。1917 年 11 月 7 日，协约国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次年 3 月，法国元帅福煦为最高统帅。从此，协约国军队在福煦统一指挥下向德军发动一连串的反攻。7 月 18

日至8月4日的第一次反攻就攻到马恩河一带。

从8月初开始，战争的结局就已一目了然。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最后结束战争，将在1919年，就连福煦元帅也认为在1918年秋结束战争时机还不成熟。唯英国认为，德国士气业已颓丧，实行大规模的进攻，可以获得胜利，请求联军统帅进攻。8月8日，以英军为主力的联军发起了对亚眠突出地带的进攻。尽管鲁登道夫事先加强了这段防线，但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驻守该地的德军六七个师全军覆没。鲁登道夫在回忆这一天的战斗时称之为“是这次大战史上德军最黑暗的日子”。9月3日，德军撤到兴登堡防线，亚眠突出地带失守。美军则轻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这样，从7月18日起至9月中旬，德军的三个突出部：马恩河突出地带、亚眠突出地带和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全部为协约国联军所夺取。此后，联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

9月26日，协约国联军开始总攻。美法联军在南翼马斯河—阿登森林一线发起攻击，27日，英军在西边康布雷—圣康坦一带开火；28日，比利时国王阿伯特统帅比利时军和部分英法军在佛兰德发起攻势，德军已被夹在巨大的“钳子”之中。同日，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比利时军队开始收复国土。德军已无力反抗。随着德军在西线的崩溃，协约国在巴尔干战线也开始了反攻。1918年9月15日，协约国军队突破了保加利亚的防线，包围了10万名保军。保加利亚29日宣布投降。它的溃败，使同盟国的整个阵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土耳其也岌岌可危。英军在巴勒斯坦击溃了土军，占领了大马士革，严重地威胁着土耳其。另一支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从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土耳其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士兵自动放弃阵地，拒绝作战。土耳其素丹投降，于1918年10月3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奥匈帝国在协约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国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非德意志民族纷纷宣布独立。奥地利于1918年11月3日签订停战协定，无条件投降。

由于土、保、奥匈的投降，德国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在西线战场上，德军节节败退，蒙受很大损失。9月底，兴登堡在枢密院会议上声明，“德军已不能继续抵抗”，要求结束战争。由于协约国不愿让威廉二世和兴登堡作为谈判对手，而威廉二世又不想退位，遂改组政府，同协约国谈判。德军最高统帅部仍企图利用谈判机会进行军事冒险。10月30日命令海军出海与协约国海军决战，水兵拒绝。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影响到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工人和水兵代表苏维埃。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1918年11月11日晨5时，在巴黎东的贡比涅森林联军司令福煦的列车上，德国两名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当日上午11时，西线停火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血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欧洲局势

欧洲地位的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最为巨大。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严重挑战，已出现动摇。英法在大战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英国的主导地位，并且英帝国的面积还有所扩大，英国的国际影响，在德俄被排斥出世界舞台之后也有所提高。欧洲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但是，欧洲的经济、政治也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其地位作用不断下降。

战前，欧洲似乎可以号令一切。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表明，欧洲仅靠自己的力量甚至不能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欧洲需要美国、日本、英国的海外领地和其他国家的参与，需要它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支援，才最后定出战争胜负。

大战使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欧洲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被削弱。大战以前，欧洲的海外投资额每年高达 3.5 亿英镑，1913 年世界制成品出口的 60% 来自欧洲三个主要国家，即英国、法国和德国。伦敦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国内投资中心，而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表现在，除了英国本身有巨大的贸易额外，还影响了整个英帝国乃至全世界的贸易活动；另一个作用则更加明显直观，“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有世界范围的联系，并且通过新的股票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和通过票据市场提供短期资本。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作用，伦敦各种金融服务工作的廉价和安全，鼓励了正常的和扩展中的国际交易。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是以它雄厚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正因为它的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所以被称为“世界工厂”。英国的经济活动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世界经济结构的作用，正像凯恩斯形容英国战前的经济作用时所说的它是“乐队指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种情况开始逆转，及至战争结束，英国已走下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在 1913~1920 年的七年间，欧洲的制造业产量下降了 23%；英国的国外投资，在 1914~1918 年之间下降了 50%，直到 1929 年，其海外投资才超过 1914 年的水平；1918 年，英国向海外出口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例，仅为 1913 年时所占比例的一半；直到 20 年代后期，英国每人每班的煤产量才达到战前的水平；1924~1928 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生产低于 1913 年；英国、法国和德国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在 20 年代中期还低于 1913 年。大战前的 30 年间，欧洲制造业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3.33%，如果战争期间维持了这种增长率，1928 年的产量水平本来应该是在 1921 年达到的。如果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估计，由于战争，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八年。

由于欧洲工业的衰退，促进了一些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阿根廷和巴西向英国买不到机车零件和采矿机械，于是在本国自己制造；印度的塔塔家族发展了为数众多的制造业企业，其中的一个企业成为英帝国中最大的钢铁厂。这样，欧洲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被削弱了。战争还使英国耗掉了 80 亿英镑的军费，从战前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黄金储备量从 1913 年的 2 亿美元到 1921 年只增加了 6 亿，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从伦敦向纽约转移。

取代欧洲经济统治地位的是美国。美国的工厂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

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在 1913 年至 1920 年间，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增长了 22%，1920 年的钢产量占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石油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二，到 1929 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42%，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

美国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到 1919 年，欧洲欠美国的债务已达 100 亿美元，其中法国 30 亿，英国 40 亿，欧洲有 17 个国家欠了美国的债。美国的国外投资从 1913 年的大约 20 亿美元增加到 1930 年的 150 亿美元，其中 30% 投放在欧洲。黄金储备从 1913 年的 7 亿美元增加到 1930 年的 45 亿。欧洲已不再像 19 世纪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和世界的工厂。

战后，美国救济协会向欧洲提供了价值 29,100 万英镑的粮食。美国还贷款给德国，使德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英法等国又用它来偿还欠美国的借款。欧洲的战后经济就是靠美国的资金循环的。欧洲经济霸权已经开始走向没落。

俄罗斯帝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政治地图发生重大变化。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先后崩溃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

沙皇俄国在大战后期，经济陷入全面崩溃。政府征集一千多万人当兵，使农村劳动力极度缺乏，很多农户没有男人耕地，农业生产急剧衰退。1916~1917 年的粮食产量比战前减少 20%。战争使俄国财政陷于危机。从战争开始到 1917 年 3 月 5 日，政府的战争开支共达 296 亿卢布，等于这一时期国库收入的三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断加征新税，举借国债。国债总数从 1914 年初的 88 亿卢布猛增到 1917 年的 336 亿卢布。债务总额将近战前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一。

战争的失利，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饥荒的逼近，给俄国劳动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1916 年，全俄发生 1416 次工人罢工和 294 起农民骚动。沙皇统治的重要支柱军队也出现动荡。1916 年 10 月，主力舰“甘古特”号爆发水兵骚动。许多士兵同德奥士兵联欢，最大的一次有四个团的士兵参加。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对沙皇的战争政策。1916 年 7 月，哈萨克斯坦广大牧民武装起义，焚烧征调名册，捣毁政府机关。

战争使俄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得到扩展。1915 年 7 月，各地的自治机构联合组成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联合会。同年 8 月，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等资产阶级反对派组成进步联盟。他们在第四届杜马中拥有四分之三的席位，对沙皇政府愈来愈感到不满和失望。

1917 年初，群众斗争风暴遍地兴起。3 月 8 日，彼得格勒工人举行罢工游行。许多排队等待购买面包的妇女也参加到抗议行列中来。在一些队伍中出现了红旗和“打倒专制制度”、“和平”的标语牌。政府慌忙派出军警前去镇压。但是，他们驱散了这里的示威群众，别处又出现了游行队伍。3 月 8 日（俄历 2 月 23 日）这一天成为二月革命的起点。

3 月 10 日，首都爆发了全城政治总罢工，参加的人数超过三十万。布尔什维克党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参加斗争，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立宪民主党要求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远在军队大本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则命令军队平

息动乱。3月11日，示威群众在涅瓦大街遭军警枪击，近两百人被打死打伤。工人奋起抵抗。3月12日，起义工人得到六万名士兵的支持，他们攻占兵工厂，缴获四万多支步枪。还捣毁警察所，攻进监狱释放政治犯。3月13日（俄历2月28日），又有六万多名士兵转到工人一边。他们并肩战斗，占领了彼得堡罗要塞和冬宫。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国徽被摘了下来。革命红旗代替沙俄的白蓝红三色旗在首都上空飘扬。二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后，迅速扩及全国。正在前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15日宣布退位。统治俄国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了。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给人民以和平、土地、面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大众于1917年11月7日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第二位。国家的政治权力控制在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手里。德国无产阶级有2000万，占人口半数以上。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裂为三派。右派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右派有24万成员，领袖是艾伯特和谢德曼。中派以哈阿兹和考茨基为首，于1917年4月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打出和平民主的旗号，但反对用革命手段结束大战，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派有10万成员。革命的左派组织是斯巴达克团，它创建于1916年1月，领导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左派的力量比较弱小，成员不足200人，也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组织上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1918年秋，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10月，政府开始向协约国求和。可是，海军司令部却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八万名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11月3日下午，五千多名水兵在基尔港集会游行，遭到军警开枪镇压，死伤三十余人。示威者开枪回击。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政府派去镇压群众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港都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11月9日，柏林落入起义者手中。德皇威廉二世被迫于当日宣布退位，逃往荷兰。

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后，艾伯特建立了由三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三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新政府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没有触动容克贵族和军阀势力的特权。

1918年12月16~21日，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485名代表中，斯巴达克派只有10名。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操纵下，决定于1919年1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在国民议会作出决定之前，全部立法和行政权由艾伯特政府掌管。

斯巴达克派领袖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成立独立政党的必要性。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革命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有威望的埃喜荷恩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这一挑衅性决定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1月5日，柏

林工人举行抗议游行。当晚，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号召推翻艾伯特政府。6日，柏林50万工人走上街头，占领了火车站、警察局、电报局等据点。

但是，推翻艾伯特政府的形势并不成熟。士兵处于动摇状态。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刚开始的“民主时代”心满意足。农村基本没有卷入战斗。德国共产党才成立不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出任柏林总司令，于11日向起义工人发起进攻，占领了德共总部和《红旗报》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月15日被逮捕杀害。

一月战斗失败后，德国无产阶级继续为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不来梅、鲁尔地区、爱尔福特、哥达、柏林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起义。4月13日，慕尼黑工人还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均遭到镇压而失败。

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使欧洲的一个反动君主帝国崩溃，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奥匈帝国的瓦解 奥匈帝国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它的领土包括着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等。境内的少数民族占帝国人口的78%。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匈帝国内部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帝国政府由于战场上的失败而威信扫地。各民族纷纷起义，帝国迅速瓦解。

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首先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爆发。这是奥匈帝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工业产值占全帝国的四分之三。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势力。查理大学哲学教授马萨利克早在1900年就组建了人民党（1905年改名为进步党），要求民族独立。1918年10月14日，捷克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帝国政府关于把捷克的存煤和存粮运往奥地利的决定。罢工过程中，各地群众纷纷集会，要求脱离帝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查理皇帝见形势不妙，慌忙于10月16日宣布改组奥匈帝国为民族国家联盟，给予捷克等少数民族以自治权利。但是，这项许诺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了。10月28日，布拉格的民族委员会宣布成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最高政权由民族委员会接管。两天后，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宣布加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1918年11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马萨利克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在南斯拉夫，许多士兵从前线逃回家乡。他们自称绿军，手持武器同帝国官兵对抗。10月底，驻扎在里耶卡和普拉两地的军队举行起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情况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萨格勒布召开国民议会，宣布南斯拉夫地区脱离帝国。1918年12月4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告成立。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8年11月，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12月1日，宣布该地区并入罗马尼亚。

波兰在18世纪被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匈三国瓜分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奥占领了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并于1916年11月宣布波兰王国成立。但是，波兰王国的领土不包括德奥瓜分走的部分，同时王国的事务需听命于德奥占领当局。1918年10月，德奥扶植的华沙摄政委员会从占领者手里接管了政权。23日宣布成立华沙政府。在德奥帝国境内的波兰土地上，

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在克拉科夫成立临时政府。12月，克拉科夫政府同华沙政府达成协议。1919年1月，成立联合政府，毕苏斯基担任国家总统。

奥地利本土也兴起革命运动。1918年10月21日，奥地利议会宣布自己为临时国民会议，但是没有提出推翻哈布斯堡王朝问题。人民大众对这种软弱不满。10月30日，维也纳发生工人总罢工，成千上万群众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成立共和国。统治集团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决定成立由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伦纳任首相，维克多·阿德勒任外交大臣。11月3日，伦纳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12日，查理皇帝宣布逊位。国民议会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于1918年10月29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罢工游行，要求停止战争，宣布独立。斗争迅速发展成武装起义，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新成立的卡罗利政府于11月3日同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16日，匈牙利正式宣布为共和国。1919年2月20日，协约国驻匈军事代表、法国的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要求匈牙利东界驻军在十天内后撤100公里，空出的地方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卡罗利政府既不敢接受又不能拒绝这一通牒，决定辞职下台。3月20日卡罗利将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但后者感到一党难以支持局面渡过危机，乃于21日到狱中同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谈判。库恩提出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3月21日下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决定两党合并。协议宣布，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立即接管全部政权，工农兵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月21日晚，正式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协约国十分敌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4月4日发出照会，要求匈牙利履行威克斯通牒。遭到拒绝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15万军队从东北南三个方面发起进攻。新建的匈牙利红军仅有5万人，力量弱小，被迫后撤。5月初，侵略军进抵离布达佩斯100公里的地区，共和国危在旦夕。匈牙利政府发布动员令，几天内就组建了10万红军队伍。库恩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副手。5月中旬，红军发起反攻，并乘胜打出国境。6月16日，建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

红军的胜利引起协约国的惊恐。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于6月照会匈牙利，要求红军立即停止进攻，并撤退到1918年11月3日停战协定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内。作为交换条件，协约国保证撤退罗马尼亚军队，并邀请匈牙利代表参加和会。照会还威胁说，这一要求如遭拒绝，协约国将展开新的进攻。

协约国的照会引起匈牙利党内意见分歧。库恩采取妥协立场，接受协约国照会。6月下旬，红军后撤。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立即被颠覆。但是，罗马尼亚军队没有撤离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现受骗后，不顾形势的险恶于7月20日发起进攻，遭到挫折。1919年8月1日，当罗马尼亚军队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宣布辞职。大批革命者遭迫害。库恩等人被迫流亡国外。1920年3月，原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就任摄政王，在匈牙利建立了独裁政权。

三大帝国的崩溃是一项进步。但是，欧洲仍然存在众多问题。战败的德国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能容忍被踩在英法脚下。苏维埃俄国要打破封锁包围，推进世界革命。中欧东欧地区新生的国家还很脆弱，彼此间又有着众多矛盾和纠纷。在此还有欧洲地位的下降，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

系的衰落。所有这些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乃至世界将面临一个动荡时期、调整时期。

第二节 巴黎和会

协约国对战后世界的考虑 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规模的战争经过四年多的角逐，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浩劫不仅耗去了 1800 多亿美元的直接战费和 1500 多亿美元的间接战费，而且使大约 1000 万人死于非命和 2000 万人受伤。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欧洲各交战国经济凋敝，国力日下，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严惩战败国、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是各战胜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对战败国的惩罚，即对它们的掠夺是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为此，战胜国要求战败国对它们进行经济赔偿，限制战败国的军事力量，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以达到它们的战争目的。

人民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以及苏俄“和平法令”的颁布，促使战胜国在考虑战后的世界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出废除秘密外交，承认民族自决权，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和新建一批民族国家的设想。这既惩罚了战败国，分割了它们的领土，又实现了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而且还起到了抵消苏俄提出的“和平法令”影响的作用。

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考虑的内容之一是建立一个超乎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当时各国人民都要求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建立和平的可靠保证。各个战胜国政府为了表示重视广大群众的反战情绪，提出了建立以保障全面和平为目的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法国、英国及美国都草拟了国际联盟的方案，这些方案实际上都是以保护战胜国的既得利益、维护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为宗旨的。

虽然各战胜国在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考虑上有共同之处，但它们也各有一套自己的如意算盘，都想为自己捞取尽量多的利益，在重建世界新秩序中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俄国在革命以后，自动退出了争霸的行列；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已没有资格参加角逐；所剩下的就是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它们之间的经济、军事实力又相差甚远，这就要按战后的实力对比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

美国在战争中崛起，成为暴发户。由于美国参战较晚，到 1917 年 4 月 6 日才对德宣战，因此它在战争中损失最少，只有 11.5 万人阵亡，20.6 万人受伤。但美国是在大战中获利最多的国家。战争期间，欧洲各国都靠美国供应武器、装备、粮食和商品，这就加速了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工业生产总值从 239 亿美元猛增至 620 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倍，资本输出从 20 亿美元增至 1919 年的 70 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也从 23 亿美元增至 62 亿美元。战前美国的债务近 60 亿美元，战后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达 100 亿美元，全世界有 20 个国家欠美国的钱。原来最富有的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也欠美国 44 亿美元。美国从战前的资本输入国一跃而成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美国掌握了世界黄金的 40% 以上，逐步取代英国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取得了迅猛发展，战前美国军队只有 30 万人，到战争结束时已增加到 450 万。

美国企图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战争中增强了的军事力量冲出美洲、夺取欧洲的领导力，进而称霸全世界。1918 年 1 月 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十四点”演说，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消除经济壁垒，建立

平等的贸易条件；公平处理殖民地；维护民族独立；保证对俄国进行“最自由的合作”；建立国际联盟。很显然，威尔逊对战后世界的考虑主要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的。他之所以提出航海自由，是因为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要想取得海上霸权，就必须取代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而只有“自由航行”才能削弱英国对公海的控制权。消除经济壁垒则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其目的在于打破老牌帝国主义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关税壁垒，便于自己的经济渗透和扩张。所谓“公平处理”殖民地，则暴露了美国要插手老牌殖民国家的地盘，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打算。威尔逊迎合广大人民群众厌恶战争、要求和平的心理以求世界舆论的支持，他在演说中提出了“自由和平”、“国无大小一律平等”、“民族自决”等

口号，尽管包含了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企图，但它毕竟是第一次提出关于全球性的和平计划，提出在民族自决权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欧洲民族国家的主张，在当时受到极大的关注，成为巴黎和平谈判的基础。

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具体设想是：先建立起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联盟，通过国际联盟加强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以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在美洲巩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在西欧，保持德国在政治、军事上较强大的地位，在经济上不过分地削弱德国，使它足以同英法在大陆上抗衡并成为反苏阵地；在东南欧，企图建立一个由它独自控制的巴尔干国家联盟，从而实现进入欧洲和建立起对整个欧洲的控制权；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利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作工具，力图拆散英日同盟，削弱日本，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以确立其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

但是，美国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它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在战争中增强了军事力量，但它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相比是不相称的，海军力量比不上英国，陆军实力又在法国之下。并且威尔逊也未能得到国会中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在同老谋深算的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这些具有丰富外交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谈判时，受到了顽强的抵制，使美国的计划几乎全部落空。

英国经过战争，遭到削弱，实力大减。在战争期间，死亡官兵达 94.7 万多人，受伤者达到 212 万多人。全部军费超过 80 亿英镑，国内外债务相当于战前的 10 倍，70% 的商船被击沉。这动摇了英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除经济损失之外，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离心倾向迅速增长。这一切使保持了两个世纪之久的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但是除美国外，战后的英国还是最有实力的国家，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殖民帝国，继续掠夺和支配殖民地的大量财富。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财政金融联系，并保有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地位。除俄国外，欧洲盟国共欠了英国 43 亿美元的债务。在军事上，随着德国这个主要海上竞争对手的战败，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战争还使英国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夺得了大部分德国殖民地，而且还占领了土耳其的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地区。因此作为主要战胜国，英国不仅有左右欧洲事务的资格，而且有争霸世界的实力。

英国的具体打算是：维护殖民帝国的最大利益，尽量扩大其殖民帝国，巩固其在战争中抢到手的德国殖民地的统治权。恢复其海上霸权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消灭具有威胁性的德国海军，要求战败国支付战争赔款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达此目的，在欧洲，英国继续玩弄“大陆均衡”政策。

法国在战后已经成为英国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英国不愿意法国过分强大，为使德国成为制止法国势力过于膨胀的国家，它不想过分地削弱德国，以便自己在法德抗衡中渔利。英国还想利用美法矛盾达到英国主宰欧洲事务的目的，既联合法国一起对付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又拉拢美国一起对付法国独霸欧洲大陆的企图。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英国希望维持英日同盟来限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并换取日本在欧洲事务上对英国的支持；同时谋求与美国合作，共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以保护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战胜国。它作为大战的主要战场为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人口比例来算，它在人力上的损失超过了任何国家，阵亡者达 130 多万，受伤者超过 300 万。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战争期间全国物资损失高达 2000 亿法郎，1919 年的工业产量只及战前的 57%，农产品的产量只及战前的 60%，商船沉没了一半以上，约 7% 的国土和大部分工业及富庶地区遭到德军占领和蹂躏。一向以“高利贷帝国主义”著称的法国因战争欠美国 160 亿法郎，欠英国 130 亿法郎的债务。但战争也使法国的军事力量大增，随着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退出角逐，法国不仅在欧洲大陆上占有军事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成为世界头号陆军强国。

法国的主要目标是企图建立在欧洲的霸权，它要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这既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又可以消除可能与之竞争的宿敌和对手，以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绝对优势。因此，法国主要的打算是彻底地摧毁德国，收回在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夺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占领萨尔；肢解德国，把法德边界推到莱茵河，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独立的巴伐利亚国家，在德国东部割出一部分土地分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从经济上摧毁德国，要求德国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索取高达 2000 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彻底裁减德国军备，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尽量夺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在中近东的一些属地。此外，法国力图把德国以东的国家组成一个以它为盟主的同盟体系，以代替它从前的盟国俄国。这样，法国就可以通过控制东欧和中欧，插足巴尔干，巩固非洲和西亚的阵地，以建立它的欧洲霸权。法国要彻底严厉惩罚德国、称霸欧洲的计划，与英美的全球战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遭到英美的反对，而法国本身经济上的困境也削弱了它的外交斗争中的地位。因此，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得到全部实现。

意大利是带着投机心理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的。作为战胜国，它在战争中屡战屡败，没打过几次胜仗，阵亡 46 万人，受伤 94 万人。意大利虽说也跻身强国之列，但它的实力无法与英法相比。意大利的经济及军事实力相当薄弱，但争霸扩张的野心却很大。它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企图在南欧和地中海地区进行扩张。要求英法履行 1915 年伦敦协定和 1917 年莫里埃纳协定中许下的诺言，索取原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以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一些地方，还要获得有争议的阜姆港，从而获得对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的支配权，甚至要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意大利争霸地中海的野心不可避免地同英法美产生矛盾和冲突，由于意大利实力虚弱，其要求不可能被满足。

日本同美国一样在大战中发了横财，成为又一个暴发户。四年战争中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由入超变为出超，黄金储备增加了四倍半，并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

顾之机，向亚洲和太平洋大肆扩张，出兵抢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并抢占了中国的青岛和胶州湾。1915年1月18日，又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妄图独吞整个中国。日本在战后的主要打算是力图使它在战时侵吞的利益合法化，取得远东的霸权。因此它对欧洲的问题不太关心，但为了对付主要的劲敌美国，日本在欧洲问题上支持英国，希望以此来换取英国支持它在亚太地区的要求。然而不仅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与日本有尖锐的矛盾，英国也因在亚太地区有重大利益，与日本产生激烈冲突。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更不能容忍日本的侵略行径。

各主要战胜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和近期目标是如此地不同，导致巴黎和会上的激烈争斗。

巴黎和会的召开 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和会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正式召开，讨论对战败国的和约问题。参加和会的有27个国家的代表，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英国的自治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和印度也参加了会议。威尔逊曾发出邀请俄国参加会议的倡议。但协约国认为，俄国提出的条件不能接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最后没有能够参加和会。战败国被禁止与会。

参加和会的国家被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国家，即会议的操纵者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它们可以参加一切会议，这一类的国家可各派代表五名。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国家，它们曾参加协约国作战，如中国、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希腊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这些国家可以出席与它们有关的会议，其中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可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其余各国只有两个名额。第三类是曾与德奥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如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只能出席一些讨论涉及其国家问题的会议。第四类是中立国和即将成立的国家，它们可以在五大国中的某一国邀请下，就直接有关的问题发言。第三、四类国家只能派一名代表。

整个大会操纵在五大国手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选为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首席代表、前首相西园寺公望被选为副主席。

巴黎和会期间有三种会议，一是具有决定权和否决权的“最高会议”，由五大国政府首脑和外交大臣组成，他们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詹姆斯·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外交部长毕勋、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外交部长桑里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和枢密顾问官前外相牧野伸显。最高会议也称为“十人会议”。这十人决定会议的一切重大问题，并有权否定和改变全体会议讨论的结果。到1919年3月，为了更便于秘密磋商，由“四人会议”取代“十人会议”，即由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由于日本首席代表不是现任政府首脑而被排除在外。奥兰多虽然也列入“四人会议”之内，但因为意大利实力最弱，备受冷落，只能充当配角。真正主宰和会的则是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三巨头”。五国外长另组成“五人会议”以解决次要问题，协助决策，但其决定仍须经“四人会议”审批。

二是由有关国家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审议某些专门问题，如国际联盟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赔款委员会等。

三是由与会全体代表组成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没有任何权利，其作用就是举手表决通过在最高会议上已经作出的决议。在长达半年的和会期

间仅召开过七次。它只是和会的一种形式和点缀。正如和会主席克里孟梭说的那样，“只有五大强国先行决定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才举行会议”。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争夺与妥协 巴黎和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正像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预言的那样，“和会将变成一个相当动荡不安的场所”。帝国主义列强都想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这使巴黎和会一开始就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

在讨论会议程序时，威尔逊坚持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他认为国际联盟同和约应是一个统一体，处置战败国以及重新分配它们的殖民地应该由国际联盟最后作出决定。很显然，如果先建立国际联盟而美国又能控制它的话，美国就可以通过它获取一些殖民地，还能通过它去支配国际事务。美国还可以通过国联取消其他国家的联盟，主要是英日同盟。威尔逊说过“国际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同盟，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联盟”。所以威尔逊一再坚持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问题，称之为“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

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坚决反对首先讨论国际联盟问题。法国积极主张首先讨论边界、殖民地和赔款问题；英国则主张讨论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以及土耳其领地的归属问题。英法都主张把国际联盟与对德和约分开。这个问题在“十人会议”上争论了四天，最后达成协议，将国际联盟交由一个由威尔逊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归属问题。

对德和约问题是和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主要包括德国的边界问题、赔款问题、军备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各大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边界问题在西部集中表现在萨尔产煤区的问题上。这是法国在和会上取得了阿尔萨斯—洛林以后提出的又一个要求。如果法国得到了萨尔的煤，再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铁，它就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冶金工业基地，这将为法国称霸欧洲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法国的这一计划，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它们不愿过分削弱德国和让法国过于强大。克里孟梭在此问题上态度强硬，他宣称，如果法国得不到萨尔区就不在任何和约上签字。威尔逊恼羞成怒，以退出会议进行威胁。劳合·乔治发出了《枫丹白露文件》，在批评法国的要求的同时，陈述了英国的纲领，提出法国对萨尔煤矿有十年开采权的建议，各方最后在英国的建议的基础上作了妥协。德国东部边界主要是波兰问题。法国出于削弱德国的考虑支持波兰扩大自己的版图。法国外交部长毕勋认为波兰应该“大而且强，非常强大”，主张把上西里西亚和但泽全部划归波兰，建立一个“大波兰”以挟制德国。由于英美坚决反对，法国的意图最终未能实现。

关于赔款问题的争论包括赔款范围、总额及分配问题。在赔款范围上英法的看法一致，它们极力主张要取得战争的全部花费，包括对民间赔偿的抚恤金。美国则认为这个要求违背了停战前的协定。但在英法的一再要求下，威尔逊作了妥协，满足了英法的愿望。赔款总额的确定不是一个难题。法国一度提出 2000 亿美元，英国提出 1200 亿美元。法国提出的数字已远远超出了官方统计的战前法国和比利时两国的全部财富，劳合·乔治在《枫丹白露文件》中称法国的要求是“疯狂的幻想”，他认为赔款总额不应超出战败国的赔偿能力。美国也认为法国的要求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美国专家戴维斯提出了 250 亿美元的赔款数字。英美都不想使德国在经济上完全垮台。和会

无法确定具体的赔款数额，只得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关于赔款的分配，法国曾要求取得总额的 58%，英国得 25%，由于争执不下，在和会上也没有得到解决。根据美国的建议，也将它交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讨论确定。

关于重新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是会议争论的又一个热点。英法曾经订立密约瓜分某些殖民地，日本也被许诺获得某些地区，因此它们主张对德国殖民地直接兼并。美国则主张殖民地应由国联委托一些“先进民族”代管，即实行所谓的“委任统治制度”。英法要求马上分配委任统治权，美国不肯让步，最后英法妥协。和会决定不把德、土殖民地直接并入某一国家，而是以国联名义进行管理，再由国联委任给某一国家进行治理。

在如何处置德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又引起了美英法三国的争论。美国出于牵制英法和对付苏俄的考虑，主张几乎全部保留德国的军事力量。英法对此坚决反对，英国所考虑的是要彻底摧毁德国的海上力量，而不过分削弱德国的陆军，使它能同法国互相制约，以保持“大陆均衡”。法国则要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力量，还要求限制德国的军火生产，使这个宿敌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后各方都作出让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阜姆港是亚得里亚海的枢纽，战前是匈牙利货物的重要出海口，南斯拉夫认为它属于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1915 年的伦敦密约把它划归克罗地亚。奥兰多在和会上提出兑现伦敦密约的要求后，又提出要取得阜姆港。英法美为了扩大在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对意大利要求阜姆港的野心不予支持。不仅如此，三巨头还提出了一条所谓“威尔逊线”，将伦敦密约许诺给意大利的土地加以缩减。奥兰多一气之下离开巴黎回国，想以此要挟，可是他的做法几乎无人理睬，结果，他又悄悄返回巴黎，这充分说明了意大利的衰弱。

山东问题引起中日在和会上的激烈冲突，同时也反映出美日在亚洲的矛盾。日本参加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它在战时所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的所属岛屿得到承认，以便建立和巩固它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据的一切领土和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德国的租借地是用武力取得的，二十一条是在胁迫之下签订的。而且在中国参战时，曾经宣布和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均已废除，因此，德国已经没有权利转让给日本。他还着重指出，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据此，他要求把战争爆发时德国在山东拥有的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美国害怕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会影响它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强烈反对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主张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归协约国共同占有。英法对日本的袒护使牧野伸显愈益嚣张，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不参加国联进行威胁。英法两国为了阻止美国加强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劝说美国作出让步。在此情况下，威尔逊担心创立国联的计划遭到失败决定让步。三巨头作出了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的决定，并明文写进凡尔赛和约中。中国外交上的失败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俄罗斯问题没有列入和会的议程，但“从一开始，俄国革命的巨大阴影就隐隐地笼罩着和会”，因此早在和会正式开始之前，列强就专门对俄罗斯问题进行了几次讨论。法国寄希望于武力，主张直接组织 200 万远征军，“征服”苏俄，并建议首先出动美国军队。劳合·乔治主张同俄国进行外交谈判，通过威胁和利诱，迫使苏俄就范。这一意见得到威尔逊的赞同。由于“王子岛会议”的流产，造成同苏俄谈判中断。以后经过多次讨论和策划，决定对

苏俄进行经济封锁，由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组成遏制俄国革命影响的“防疫地带”。和会还批准了武装干涉苏俄的计划。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 巴黎和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吵之后，列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拟订了对德和约草案，然后把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道夫·兰佐召到凡尔赛领取文本，限15天内进行书面答复，而不准进行口头争辩。德国最为不满的是关于战争责任的第二百三十一条，他们认为战胜国对发动战争也应负一定的责任。由于条款过于苛刻，德国代表团不敢签字。在5月29日德方提出的复照中，几乎推翻了全部条款。协约国在作了微小的改动之后强迫德国全部接受。德外长兰佐因不敢签字而辞职。协约国以军事行动相威胁，德国政府被迫全盘接受了和约。6月28日，德国新任外长米勒和司法部长贝尔代表德国政府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签署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内容庞杂，共分15部分，432条。第一部分26条为国联盟约，其余406条是对德和约。

关于战争责任，条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认为战败国应负全部战争责任，“协约国和与之联合的各国政府肯定地认为，同时德国也承认：德国及其盟国对由于其侵略行径而强加给协约国和与之联合的各国政府及其人民的战争后果，使后者受到的一切损失和破坏，是负有责任的。”

关于德国领土，和约规定德国西部边界恢复到1870~1871年的状况。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萨尔煤矿区由法国开采，行政由国联代管，15年后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欧本和马尔梅迪地区划归比利时。莱茵河东岸为非军事区，不得设防；西岸划分成三个占领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5年、10年、15年。在东部，德国承认波兰独立。波兰得到了波兹南的全部、西普鲁士的大部分和上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的一部分；狭长的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完全隔开；重要港口但泽成为国联保护下的自由市，其港口由波兰海关管理，波兰有权处理该市对外关系和保护其侨居公民，并保证波兰人自由进入该市。它和波兰走廊一起作为波兰的出海口。德国放弃东普鲁士最北部的梅梅尔地区，由协约国暂时占领，1923年合并于立陶宛。在南部，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德奥永远不得合并。德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在协约国规定的疆界内完全独立，并将西里西亚南部的古尔琴地区划给该国。北部，在德国与丹麦之间的什列斯威格—荷尔斯泰因地区重归丹麦。德国总计失去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

关于德国殖民地，根据和约第一百一十九条，德国放弃了“其对海外领地的一切权利和称号”，由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非洲：多哥和喀麦隆各被分为两部分，由英法两国所得，法国分得这两块殖民地的较大部分土地。英国得到了德属东非的统治权，后来把西北一小部分即卢旺达和布隆迪移交给比利时。德属西南非洲交给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管理。太平洋岛屿：赤道南部的德属岛屿除德属萨摩亚和瑙鲁外都委托给澳大利亚管理，萨摩亚给了新西兰，磷矿储量很大的瑙鲁则由英国自己占有。赤道北部诸岛，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划归日本。这些被瓜分的德属殖民地共计面积300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余万。

关于经济和赔偿问题，和约规定，德国关税不得高于别国；战胜国对德输出输入的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尼门河、维尔塔伐河、多瑙河等重要河流为国际河流；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基尔运河。此外，还

规定德国应交出 1600 吨级商船的全部、1400 吨级商船的二分之一以及四分之一的渔船和五分之一的内河船只；五年内为协约国建造 20 万吨船舶；十年内分别向法、比、意提供大量的煤、机器、化工产品等。关于赔款总额，和约规定由协约国特别委员会加以确定，并在 1921 年 5 月 1 日以前向德国政府提出，偿付的期限和计划也由该委员会确定，在此之前，德国应先赔偿 200 亿金马克。德国负担占领军的全部费用。

关于德国军备问题，和约规定，取消德国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参谋本部以及军事院校，陆军总数不得超过 10 万人，其中军官不得多于 4000 人。德国不准拥有重炮、坦克和空军，只能保存 280 门野战炮。海军限定为战斗舰和轻巡洋舰各 6 艘，驱逐舰和鱼雷艇各 12 艘，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艇；海军兵员不得超过 1.5 万人，其中军官不得超过 1500 人；在德国港口以外的德国军舰一律交协约国销毁。德国应拆除莱茵河以东 50 公里内的工事，但东部和南部边界要塞工程应照现状予以保存，德军从所占领的各国撤回。协约国设立专门委员会监督上述军事条款的实行。

从条约的内容上不难看出，英、法、日等国追求的主要目标都已达到。巩固了英法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维护了英国在海上特别是在地中海的强国地位；保证了日本在远东的巨大优势。但是不符合梦想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1921 年 8 月 25 日，美国与德国单独签订了和约。

凡尔赛体系的建立 战胜国在处理完德国之后，立即开始与德国的战时盟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1919 年 9 月 10 日，协约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圣日尔曼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分立为两个独立国家，奥地利的独立地位非经国联行政院同意不准变更，即规定德奥不得合并。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独立。将南蒂罗尔、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海外的若干岛屿等地割让给意大利；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沿岸等地割让给南斯拉夫；将布科维那割让给罗马尼亚；将波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将加里西亚割让给波兰。阜姆被宣布为自由港。这样，奥地利所保留的土地和人口只及原来的四分之一，变成了一个只拥有 84,000 平方公里土地和 650 万人口的小国。此外还规定，奥地利废除征兵制，陆军不得超过三万人；只准保留三艘小艇作为巡查多瑙河使用；其余所有舰只、装备一律交出，由协约国处理；禁止拥有潜水艇及空军，赔款数额延至 1922 年确定，必须在 30 年内付清；由英法意对奥实行财政监督。

1919 年 11 月 27 日，协约国同保加利亚在巴黎城郊纳依签订了纳依条约。条约规定，保加利亚承认南斯拉夫独立，并交出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得到的大部分领土；将位于保加利亚西面的马其顿和蒂莫克河下游地区划给南斯拉夫；将南多布鲁甲地区划给罗马尼亚；西色雷斯由战胜国代管，后划归希腊。因此，保加利亚失去了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和通往爱琴海的所有出海口。条约还规定，保加利亚必须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限于两万人，不得拥有海、空军。偿付 4.45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自 1921 年起，分 37 年还清。

1920 年 6 月 4 日，协约国武装干涉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同匈牙利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这个条约在形式上很像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除了有关战争罪责的条款外，还规定了武装、赔款和

边界条约。条约规定，匈牙利可保留 3.5 万人的陆军和在多瑙河上的巡逻艇 3 艘。赔款 22 亿金法郎。条约规定，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巴特纳西部划归南斯拉夫；巴特纳东部和特兰西瓦尼亚划归罗马尼亚。这样，匈牙利只剩下了原来国土的 28.6%，领土面积缩减到 92,000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800 万。

1920 年 8 月 10 日，在巴黎近郊色佛尔，战胜国与土耳其素丹政府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欧洲领土部分除伊斯坦布尔及附近地区外，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割让给希腊；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由国际共管，无论平时或战时均对一切国家的军舰、商船及军用、民用飞机开放。这样，土耳其失去了五分之四的领土，仅剩下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土耳其武装力量被限制在五万人以内，只能保留六艘驱逐舰和七艘炮舰，不得拥有空军和炮兵。此外，条约还规定恢复帝国主义列强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战胜国有权监督其财政经费和关税。色佛尔条约是所有条约中条件最苛刻的条约，它使土耳其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但这个条约从未付诸实施，因为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废除了在条约上签字的素丹政府，也不承认这个奴役性的条约。

这些条约同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盟约一起构成了一个互为联系的条约体系，通过这一条约体系，建立了帝国主义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国际“新秩序”，使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又重新纳入它所控制的轨道。这一体系被称为“凡尔赛体系”。

凡尔赛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际和平体系”，但只维持了短暂的主要是欧洲的和平，就被由自身的缺欠而产生的矛盾所冲垮。

该体系对战败国过于苛刻的条款是它崩溃的原因之一。虽然德国被迫在和约上签了字，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传统大国是不可能长期被踩在脚下的，随着它自身力量的恢复和增长，必然会提出修改条约，甚至撕毁条约。有的战胜国本身都不打算执行这一条约，认为这种过于严厉的惩罚不仅不能完全实现，反而会增加战败国的复仇心理。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期间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枫丹白露文件》中指出：“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把它的军队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力量，把它的海军减到五等国家的地位，这一切终究毫无意义，如果德国认为 1919 年的和约不公平，那末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事实上，在严惩战败国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苛刻的和约只起到这样两个作用：一方面，德国根本不愿意或是根本不可能执行这一条约，而战胜国也不打算强迫德国执行，这就是说，条约并不足以摧毁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另一方面，它损伤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而激起强烈的复仇欲望。和约刚一结束，德国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煽动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民族情绪，为希特勒的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分配重新确立了它们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各自地位，而这种分配是按战后初期各国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大小进行的，因而各国所得的权益相差很大。这种差异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本来就不完善的凡尔赛体系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英国夺得了大量的殖民地，削弱了德国的海军，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控制者，维持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法国在很大程度上达

到了削弱德国的主要目的，预期获得的赔款份额最多，攫取的殖民地仅次于英国，并成为国际联盟的另一个主要控制者，在“追求一种有损于英国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上，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日本分得亚太地区的权益，实力地位明显增强，巩固了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优势。意大利虽然获得了一些利益，但对英法没有完全履行 1915 年密约的诺言而极为不满。美国在德国问题、航海自由问题、中国山东问题、国际联盟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足，未捞到实惠，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致使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和约。分赃不均，必须引起新的争夺，列强争霸斗争是削弱凡尔赛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的殖民统治形式“委任统治”制度，并不能阻止殖民主义体系危机的发展。列宁指出：“凡尔赛体系使世界十分之七的人口陷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些奴隶遍及全世界，受英国、法国和日本等一小撮国家的宰割。正因为如此，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冲击着凡尔赛体系。

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些新的“民族”独立国家。战胜国宣称是按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实际是按列强的意志划定的。这一地区本来就存在的民族问题和边界纠纷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每个新成立的国家都发现在其国土上居住着一些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属于本民族的人仍然居住在邻国接受外族的统治。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在立陶宛的波兰人等等。少数民族问题一直弄得东欧各国不得安宁，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问题，直接引起第二世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慕尼黑危机。

在这个矛盾重重和极不稳固的体系中，也能看到某些方面的进步。在对德和约中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战争是一种罪行，因此就要有人对战争负责，这是人类对战争认识的一个进步。至于罪责由谁来承担则是另一回事。国际联盟建立的本身，表明了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甚至可以说它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形式。但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到 1934 年才被吸收进去，而美国从来就没有参加，使国际联盟成了英法把持的、维持它们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工具。

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是巴黎和会的又一产物。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初步设想，此外在大战结束以前，法国和英国也都拟定了建立国际组织的方案。

法国的国际联盟方案是由以劳动部长里昂·布乔亚为首的政府特别委员会草拟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反德倾向。方案规定德国不得加入国际组织，建议在国际联盟下成立国际军队，设置国际参谋部。英国的方案是由菲利莫尔勋爵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制定的，它所设计的实际上并不是国际安全组织，而只是参加联盟的几个大国间的仲裁机构，目的是防止“联盟”的某一成员国突然袭击另一成员国。美国的方案是以豪斯上校为首的委员会制定的，就形式说，这一方案比英国的方案更近似国际组织的章程。它同英国的方案不同，联盟的成员不只限于大国。方案规定设立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提出保证全体成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民族自决”原则。

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39 卷，第 352 页。

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最高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并决定它应该作为总的和平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成立了以威尔逊为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国际联盟的盟约。威尔逊以豪斯方案为蓝本，拟定了一个新的所谓巴黎方案，即国际联盟盟约草案。国际联盟盟约是英美两国方案折衷的产物，经过激烈的争吵后，1919年4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并把它列为对德、奥、匈、保各国和约的第一部分内容。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正式成立。

在创建国际联盟的过程中，美国总统威尔逊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有人用“国联是威尔逊的产儿”来形容他为国联的建立所做的工作。但由于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没有取得多少实际利益，它所制定的战后长远战略计划和近期目标都未能实现，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美国参议院认为盟约中所规定的会员国保证“尊重并维护所有国联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有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的条款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它意味着美国要为他国承担许多义务，而威尔逊则认为这是盟约的核心，拒绝在这一条款上妥协。故尔在威尔逊的政敌共和党操纵下的参议院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凡尔赛条约，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国联在成立时有44个会员国，以后发展到63个，德国和苏联分别在1926年和1934年被接纳成为会员国。

国联的主要机构是全体会员国组成的代表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日内瓦被选定为国联总部所在地。国联大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召开特别会议，每个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代表至多不得超过三人，但只有一票表决权。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其职权为“处理属于联盟行动范围以内，或关于世界和平之任何事件”。然而，主要的决定是由国联行政院作出的。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实际上只有四个；德国加入后成为常任理事国）和经大会选出的四个（后来增加到九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会议四次。它逐渐变成了大会的一种执行委员会，负责为己为大会原则上接受的政策拟定具体细节并监督其执行情况。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以上两个机构的决议一般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常设秘书处被认为是国联体制中最富有创新的部分。它由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任秘书长。它负责安排会议、接受报告和控诉、登记条约、准备大会和行政院文件、管理出版物和新闻发布工作。

除了这三个主要机构外，国联还设立了国际常设法院、国际劳工组织，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等六个常设机构和专门委员会以及许多辅助机构，负责许多具体的繁杂的工作，如发放贷款、禁止鸦片贸易和照顾各国难民等，都在它的工作范围之内。

国联盟约宣称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提出了会员国的主要义务与职责。

盟约中提出了各会员国有保持各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的义务和防御外来侵略、保持各国之间和平的责任。为达此目的还作了裁减军备和对发动战争进行制裁等方面的规定。盟约还规定与国联盟约不符的各国之间的条约均应废除，进行“公开邦交”等。

然而，在这些所谓和平条款中有些观点并不统一而是互相矛盾的。例如盟约规定了处理争端的方法，即法庭解决、提请仲裁，或由行政院调查。如果发生争端的某一方敢于诉诸战争进行侵略时，那就对该国进行经济制裁和

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有关经济措施规定得非常详细，而军事措施则含糊不清。如果冲突的双方都不按上述三种调解方法，或者行政院解决争端的报告不能被全体一致通过，那末会员国就可以诉诸战争而不会受到制裁，这就是说，盟约并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也没有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盟约所规定的会员国“必须将本国军备减到最少限度，以足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及共同实行国际义务为限”的裁军条款，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它没有规定各国军队的具体数额或裁军比例，所以，对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各国往往以“保卫国家安全”和“实行国际义务”为理由拒绝裁军。

盟约规定了委任统治制度。它是南非总理史末资将军提出，得到威尔逊的赞同，在盟约第二十二条中建立起来的。委任统治地被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包括前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被承认为独立国之程度”，但“仍须有受任统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帮助，至其能自立之时为止”。乙类是在中非的前德国殖民地，“依其发展之程度，受任统治国必须负地方行政之责”，但应保证其他国家“在交换上、商业上之机会均等”，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类地区何时才能独立，未作明确规定。丙类是德国过去在西南非的殖民地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应“受制于受任统治国之法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根据受任国的法律进行管理。以上三类委任统治地区面积达 125 万平方公里，人口 1900 万，每年贸易额达 1.6 亿美元。委任统治制度是战后列强慑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声势，对殖民体系的一种改造。它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没有改变殖民统治的实质。

国际联盟盟约列入巴黎和会制定的各项和约之中，表明了它已成为凡尔赛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政治性国际组织，反映了 20 世纪的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根据 1946 年 4 月 18 日大会的决定，国际联盟正式宣告解散。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

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夺的新格局 凡尔赛体系只调整了帝国主义各国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矛盾冲突，而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帝国主义列强还未来得及根据其实力对比建立一种战后的新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角逐的是英、法、俄、德、日、美诸国。大战结束后，沙俄灭亡，苏维埃政府退出了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德国战败，已被排除在强国之外，战胜国不允许它在除本国领土之外的任何地区再有利益；法国在战争中遭到重创，此时，正忙于医治战争的创伤和巩固它在欧洲的既得利益，无暇插足亚太地区的争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是美、英、日三国间的争夺。既有英美的矛盾，也有英日的矛盾，最突出的矛盾则表现为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争夺的中心在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德国和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日本在 1904～1905 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扩张势头猛增，开始显露出美日之间的利害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英法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之机，进一步扩张它在远东及太平洋的势力。它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出兵占领了中国山东，并在 1915 年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暴露了它要独吞中国的野心。日本的一系列动作虽然威胁了英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但在战争状态下，它们为了取得对德战争中日本的援助，不惜牺牲中国而向日本暂时妥协。在 1917 年 11 月，美日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和日本领土接近的地方”。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重申它将“永远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使日本的势力迅速地发展。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几乎占了一半，而英国只占 17.1%，美国占 16.7%。日本还把大量的货物运到拉美各国，开始了向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甚至在美国的大门口墨西哥同美国进行竞争。

美国为了对抗日本，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 1918 年 6 月，美国提出了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的国际银行团的方案。它规定，所有给予中国的各种贷款均由银行团垄断，并由银行团控制贷款的使用。日本非常清楚美国将在银行团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它表面上同意参加银行团，但想方设法阻止银行团开展业务活动，使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拖延了两年而没有结果。美国计划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北洋军阀政府不敢接受银行团提供贷款的奴役性条件。

战后，远东市场对美国来说，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1920 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大大地缩短了美国重要港口同远东之间的航程，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争夺远东的欲望。争夺远东，特别是争夺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提到了首要地位。然而，战后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国内反战情绪的滋长，使美国不能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美国想夺取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目标在近期内难以实现。美国当时所能做的首先是破坏日本同英国的同盟，以消除对抗美国的潜在危险。

英日同盟在战前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这个条约签署于 1902 年，1905 年和 1911 年两次续订，它将在 1921 年 7 月到期。对于日本来说，该同盟在

过去的 20 年里一直是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对英国来说，英日同盟能对付法俄同盟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后在同德国对抗中，又能使英国舰队从远东腾出手来，并能保障印度及其他亚洲殖民地的安全。

然而，在战后，该同盟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弊大于利。日本利用了这一同盟，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在对华投资方面，英日双方已不相上下；对华出口方面，日本已高居各国之首。此外，日本在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入侵以及加紧对香港、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甚至印度等地进行渗透扩张，使英国感到它昔日的盟友已经打算把它赶出远东。英日矛盾在一战后日趋激化。英国认为，即将到期的英日同盟不管续订与否，都必须寻找在远东新的盟友。

英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主要是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和原料产地。战后，美国凭借经济实力，加紧向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渗透。在中国，英国作为最早侵华的国家，把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战前英国凭借了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消极对待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战后，由于英国财政上的困难和在远东的影响日渐缩小，它既无力阻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进攻和对英国势力范围的侵犯，更无法抵挡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宁可支持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借助美国的势力遏制日本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美英在进行争夺时又联起手来，成为反对日本扩张的伙伴。因为美国也深知，在亚太地区要限制住日本，建立自己的霸权，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

英美关系在政治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海军军备和英日同盟问题。1919 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早在大战期间就已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美国舰队到 1924 年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是对英国海上优势的直接挑战，而英国则无力应付。在英日同盟问题上，为了不至于弄僵和美国的关系，英国也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同意不再续约。

海军军备竞赛 海军历来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工具，海军实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争霸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军军备竞赛随着德国海军的败亡和美国的崛起，已从英德两国在北海和大西洋地区的争夺转移到以英、美、日为主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

英国在战后仍然保有最强的海军实力，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同美日进行较量。美国和日本都相互把对方看作是自己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主要障碍。日本军部早在 1907 年上奏天皇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便把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号假想敌国，在 1923 年修改方针时，则将头号假想敌国改为美国。而美国也很早就考虑制定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1913 年美国军方正式提出了以日本为敌人的“橙色作战计划”。在战略地位上，日本处于比美国更优越的地位。日本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设有据点。在辽阔的太平洋海域日本可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对美国来讲就非常困难。虽然美国于 1920 年已把它的舰队主力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但直到 1921 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拨款筹建菲律宾和关岛的基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在西太平洋没有作战基地的情况下，要取得对日的海上优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美国要疯狂地扩建海军。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开始向英国的传统地位挑战。威尔逊曾提出要建立一支最终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所维持的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势均力敌”

的海军，而英国决心要保持它的海军优势地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美国豪斯上校说：“英国宁愿耗尽它最后一个金币，也要保持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海军优势。”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更加坚决地表示，“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见解，无论什么论据和劝说，不管它们如何动听，都不应该使我们放弃我国赖以生存的海上霸权。”1918年12月，威尔逊向国会提出拨款六亿美元以扩充海军的计划。英日两国对此极为不安。1919年4月，在巴黎和会之外展开了一场英美两国的谈判，被称为“巴黎的海战”。英国坚持要求美国放弃新的海军计划，并承认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是属于“特殊需要”，并以巴黎和谈的某些条款相要挟。威尔逊被迫答应了英国的要求。然而，仅过了几个月，到1919年7月，美国国会便批准了扩充海军的计划。要求在三年内建造军舰137艘，其中包括10艘主力舰，6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美国为了建造新舰到1921年底已经用去了一亿八千七百万美元，要完全实现其扩建计划，估计还要再耗掉三亿多美元。按照这个计划，美国到1924年将拥有38艘主力舰，大大超过当时英国32艘的数字，将成为超过英国的世界第一海军强国。

英国长期以来实行“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实力必须等于其他两个海军最强国实力的总和）。它不甘示弱，于1921年通过决议，除已建造的十艘主力舰外，再增加四艘四万吨级的巨型战舰，此外还建造十艘巡洋舰和三十多艘潜水艇。扩充海军军备的计划使英国的财政极为紧张，1919~1920年其海军开支比1913~1914年增加了三倍。

日本更是野心勃勃，在1917年通过了建造“八四舰队”的计划，到1920年7月，建造“八八舰队”的计划（即每八年更新一次，各拥有八艘主力舰的两支舰队）又获通过。依照此计划，到1928年，日本可增加八艘主力舰、八艘新式巡洋舰。为完成该计划，日本的海军拨款1921年度高达近五亿日元，比战前几乎增加五倍，约占其全部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到1921年，英、美、日的海军力量对比以美国为基数10的话，其比例为13.5 10 4.9；其中主力舰（包括巡洋舰）的比例为13.9 10 6.8；如果把已经开工建造的那一部分计算在内，主力舰的比例则变为10.6 10 8.7。英国已经不占多少优势，特别是英国舰艇的老化程度高于美国。

列强之间愈演愈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在战后初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已是捉襟见肘。尤其是英国，战后的财政拮据更使它力不从心。美国利用英国的财政困难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偿还8.5亿英镑的战债。1921年，英镑的牌价降低到它的黄金平价的79%。劳合·乔治意识到“海军竞赛将会使英国崩溃”，不得不向美国妥协。1920年3月，英国海军大臣朗格发表演说，提议通过协商确定英美两国拥有相等的海军。1921年4月，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说：“准备放弃拥有舰队应等于世界上其他两个最强海军国家的舰队之和的传统政策”。日本虽然野心不小，但1919年以后对外贸易年年入超，特别是在1920年至1921年世界不景气之风袭击下，更感到难以担当造舰竞赛的重负。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拥有比英国更多的资金，但由于它战前海军实力落后于英国，起点很低，在太平洋地区又没有多少海军基地，成为海上霸主的计划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因此，它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讨论海军军备问题，以限制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东方兴起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特别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它在巴

黎和会期间反对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如何协调它们的在华利益以及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在此情势之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已没有能力诉诸武力，而只能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和平解决。这样，华盛顿会议就应运而生了。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1921年5、6月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参议员威廉·博拉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限制海军军备的国际会议的议案。1921年7月5日，英帝国会议也提议召开一次讨论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个建议正式提出以前，美国政府就已获悉，为了保持主动地位，7月8日，美国总统哈定指示国务卿休斯向英、法、日、意、中五国非正式地建议召开六国华盛顿会议。

英、法、日、意、中对美国的提议很快作了肯定的答复，只有日本对接受邀请持保留意见。日本政府不是不愿意参加讨论限制军备的问题，而是对美国提出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包括进去的动机表示怀疑，特别是怀疑英美事先已经达成谅解，破坏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但既然美国打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招牌，日本也难以拒绝，否则在外交上将陷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它在接受邀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把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作为“会议之主题”；对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只能限于一般原则，“不过求一主义及政策上之共同了解而已”；而对于像“二十一条”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问题，要“审慎免除其加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而不能“纠缠于重复过去的旧帐”，即反对把中国问题列入会议议程。

德国是战败国，它已经失去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所以未被美国邀请。苏俄及远东共和国也未被邀请参加会议。对此，苏俄政府照会美国，“俄国政府对于排斥它参加直接与它有关的会议，对于任何大国背着俄国作出的有关太平洋的决定的任何企图，表示抗议”，并断然宣布：这次会议的决议将不发生法律效力。

1921年8月21日，美国总统哈定向英、法、日、意、中五国发出参加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正式邀请，讨论“海军军备限制”和“太平洋与远东”问题。葡萄牙、荷兰、比利时认为会议内容与己有关，也要求参加。此外，英国各自治领和印度也派出独立的代表团，因此，这次会议共有14国代表出席。1921年11月12日，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历时两个半月，至1922年2月6日结束。美国国务卿休斯被选为会议主席。

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有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这次会议为了表示同巴黎和会的区别，宣布会议公开，代表的发言都在报刊上发表，据此，西方报刊宣称：“秘密外交从此结束了。”而实际上，整个会议的决定权仍然操纵在美、英、日三国手中，即由美国国务卿休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控制。实质性问题是由他们掌握的两个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在秘密状态下解决的。公开举行的全体会议只听取正式报告，批准委员会的决议，而不进行辩论，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很少受到重视。

会议本身批准并通过了七项条约和12项决议案，另有两项条约是在会议期间由与会国在会外商定的。其中主要有：《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

《九国公约》和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

《四国条约》的签订 英日同盟问题虽未被列入会议议程，但事情非常明显，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很难达成协议，因此它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美国代表团把废除英日同盟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美、日三国为此展开了秘密讨论。

早在会议开幕之前，美国就一再向英国施加压力。一方面向英国催还战债，使英国的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而必须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则以爱尔兰问题相要挟，声称如果英国继续结盟，美国将支持爱尔兰独立，迫使英国就范。英国本国和一些英联邦成员也认为该同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们感到日本依靠这个联盟得到的好处太多了，战后应把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作为帝国的政策基础。日本当然希望英日同盟能够维持下去，在条约即将到期的前一个月，日本曾派出皇储裕仁赴英活动，争取续约。但是同盟是否能延续已不完全取决于日本和英国，更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

英国在财政上有求于美国，但又不愿意得罪日本，因此英国试图以英、日、美三国同盟取代英日同盟。1921年12月1日在三国代表的秘密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正式抛出这一方案。这个方案不但涉及太平洋诸岛，而且涉及中国；不但规定要使用外交力量，而且规定要使用军事力量。他们计划的三国同盟实际上是英日同盟的扩大，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认为，这是变相保留英日同盟，它既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又有悖于本次大会的方针。它主张，缔约国不应有使用军队的义务；该条约的范围应限于太平洋区域，对华问题另订《九国公约》。此外，美国坚持邀请法国参加这一协定。因为美国觉得英法两国在争夺近东及德国问题上矛盾重重，特别是法国对美国负债累累，把法国拉进这个协定，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四国同盟”。在英国原方案和美国主张的基础上，由日本代表币原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经休斯、贝尔福、加藤三巨头会议通过后，由休斯通知法国，请其加入。

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为十年。条约规定，“缔约各国同意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如上述权利因任何国家的侵略而遭到威胁时，“缔约各国彼此之间应全面地和坦率地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协议，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有效的措施”。条约还规定，在取得缔约各国政府批准生效后，“英日两国于1911年7月13日在伦敦缔结之协定应即废止”。这样，四国同盟就取代了英日同盟，美国达到了拆散英日同盟的目的。日本代表无可奈何地对英国代表说：“不管怎样，你们毕竟给（英日）同盟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在签订《四国条约》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个附带声明。声明指出，《四国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委任统治权的承认，“且不妨碍美利坚合众国与各委任统治国关于委任统治各岛的协定”。1922年2月6日，又签订一个补充协定，说明了《四国条约》中一些具体条文的含义，即条约中“所用‘领地和属地’一语，对于日本仅适用于包括桦太岛（库页岛的南部）、台湾、澎湖列岛及日本委任统治下各岛”。

《四国条约》及其附件的签署，既反映列强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尖锐矛盾，也说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协议。这首先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完成了它多年的宿愿，拆散了英日同盟，消除了在远东争霸的一个障碍。同

盟的外交协商性质又使美国不必为维护英法在远东的利益而动用武力。英帝国在太平洋上的巨大权益也得到巩固。英王乔治五世对此甚觉满意，认为该条约既使英日的友谊依然如故，又促进了英美的关系。英王为表彰贝尔福的功绩给他晋爵授勋。条约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失去了往昔的盟友英国，甚至有时英国还同美国站在一起反对它的扩张。日本的武力扩张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权益已经通过条约得到了美、英、法的承认，特别是它已在国际上处于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成为四强国之一。所以，日本外相冈田康哉说，“四国协约为华盛顿会议之第一成功，日本之国际地位有加无已。”从这一点说，日本在这次会议上也取得了某种成功。

《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 限制海军军备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在 1921 年 11 月 12 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国便提出了一个限制海军军备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今后十年内不得建造主力舰，包括目前正在建造的新舰；拆毁一定数量的旧舰；参照现有海军力量，确立各主要国家主力舰的吨位比例为 5 5 3，即英美各为 50 万吨，日本为 30 万吨；新造主力舰的排水量不得超过 35,000 吨（巴拿马运河最大的通航能力）。

英国在会前就已放弃了传统的“两强标准”，因而英国对英美对等原则表示同意；对日本所占的比例也没有异议，它认为这个差额足以对付日本。日本代表则坚持要求英美日之间的比例应为 10 10 7。日本认为，进攻舰队对迎击舰队必须保持 50% 以上的优势兵力，而防守舰队则必须对敌国的舰队保持相当于该舰队 70% 以上的兵力。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的要求，并对它施加压力，宣称要是日本继续坚持下去，那末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造四艘。日本只好就范，表示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比例，但又提出了两个交换条件：一是承认日本原来在中国的利益，二是美国不得在太平洋上建筑海军基地。美国基本上满足了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另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法意两国主力舰的吨位各定为 17.5 万吨。

在辅助舰方面，除了关于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制问题各国取得一致外，其他均未达成协议。水下辅助舰即潜水艇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国提出美英潜水艇的吨位各为 9 万吨，日本 5.4 万吨。法国坚持自己的潜水艇吨位也应为 9 万吨，以补偿它在主力舰方面的劣势。英国认为，法国 9 万吨潜水艇的要求卡住了英国的喉咙，对英国是十分危险的因素。在水上辅助舰方面，美国把美英总吨位分别定为 40 万吨，日本 27 万吨。法国则提出了 35 万吨的要求。英国对 40 万吨的限额也不满意，拒绝对自己的水上辅助舰实行限制。由于分歧太大，各国又互不相让，使关于辅助舰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争论，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日、法、意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替换总吨位的限额是：美英各 52.5 万吨，日本 31.5 万吨，法意各 17.5 万吨，即一般所说的 5 5 3 1.75 1.75 的比例，主力舰排水量不得超过 3.5 万吨；舰炮口径不得超过 16 英寸。另外规定五国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是：美英各为 13.5 万吨，日本为 8.1 万吨，法意各为 6 万吨。

条约还规定美国不得在阿留申群岛、萨摩亚、关岛及菲律宾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和要塞；英国则保证不在香港以及东经 110 度以东的岛屿属地设防，但加拿大海岸附近、澳在利亚和新西兰除外；日本则承诺不在台湾、澎湖列

岛、琉球群岛、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以及日本在太平洋中现有和将来取得的一切岛屿或属地上新建军事基地。在英国的一再要求下，日本答应英美可以在新加坡建设新的要塞，英美在远东的海军基地也仅此一处了。这样一来，除了新加坡之外，英美所有的海军基地都在远离日本本土 5000 公里至 6000 公里以外，这种状况对日本十分有利。

《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又一胜利。它使美国取得了同英国平起平坐的资格，标志英国海上优势从此结束。日本虽然在军舰吨位方面居于美英之下，但它在海军基地建设方面基本没有受到束缚，使它在新加坡以北的太平洋水域占有优势，限制了美英向西太平洋扩张，保证一旦发生战争，日本海军能够在太平洋上取得主动。

这个条约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裁军协定，但它没有从根本上限制军备竞赛，它既没有禁止辅助舰和 3.5 万吨以下的主力舰的制造，又没有对裁减空军和陆军作出任何规定。因此它并没有真正消除军备竞争，相反，它成为日后国际争端的重要根源。

中国问题和《九国公约》 华盛顿会议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因为列强要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必然要争夺中国。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重申了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要求。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了一个包括十大原则的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废除各国在华的特权或特殊权益；取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的限制；各国对华条约，如无期限的应规定期限等。但在第二条中又声明，“中国既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主义，即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自愿承认该项主义，并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无有例外”。这十项原则，既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不再听任列强的宰割，又说明了北洋政府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还不能提出完全独立自主的主张。当初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时只限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现在北洋军阀政府则把它施行于全国各地；起初所说“机会均等”也只限于商业方面，新的提案却把这一原则扩展到了工业。这导致了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破坏。

中国的提案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代表卢特把十项原则归纳为四条，作为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即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个有力而巩固的政府；三、各国在中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四、不得利用中国的现状，谋取特别权利，以致削减其他国家的权利，也不得赞助有损它国安全的行为。日本代表加藤对“行政的完整”的含意进行询问，卢特说这不影响合法的特别权益，日本代表对此表示满意。可见，所谓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维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完整”，以利于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政策。但四条原则当然是对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的一个打击，但既然保持了日本原有掠夺的利益，日本也表示可以接受。经过会议讨论通过，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原则。

根据“卢特四原则”，中国代表提出了收回山东的要求；在国内人民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又向远东总委员会提出，“二十一条”严重影响中国的生存、独立和完整，应当予以废除。日本代表认为这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不能在大会上讨论，而只能在中日两国进行双边谈判时解决。中国政府最反对的就是直接与日本单独谈判。这使英美两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为应付

国内外舆论，它们必须公开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可是又不想得罪日本，从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其他谈判。最后在美国的斡旋下，采取折衷的办法，中日在会外进行谈判，英美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

谈判从 1921 年 12 月 1 日正式开始。在谈判中，双方争执最激烈的是胶济铁路问题。日本要求接替以前德国的一切权益，不但包括铁路，而且包括铁路区域内的矿藏，以及整个山东省的经济权益。而中国代表则坚持收回利权，赎回胶济铁路。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同时美国施加了压力，最终使日本作出让步，提出铁路由中日公司合办，后来虽同意将铁路售于中国，但又拒绝中国用现款支付，想借此继续控制铁路。中国代表坚决不肯同意，最后在美国总统哈定直接干预下，中国政府才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方案。

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进行得很不充分。在会谈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曾一度休会，直到整个大会即将结束前几天的 2 月 2 日才恢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谈判中，日本代表币原声称，“二十一条”是经过两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完全合乎国际惯例，并威胁说，如果废除这一条约，将使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出现不稳定局面，而带来不良后果。在中国代表的坚决要求和各方压力下，日本才被迫放弃了部分次要条款，如：将获得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借款的优先权，以及这两个地区的各种税款作抵押的借款的优先权让与四国银行团；放弃向“南满”派遣顾问和教官的优先权等。中国代表不满意日本的让步，还想继续讨论，但英美却认为日本的让步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中国应该满足了，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会议匆匆收场。

1922 年 2 月 4 日，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应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但中国应照铁路产业的现值（5340 万金马克再加上日本管理期间的增修费）偿还日本，期限为 15 年；偿清上述款项之前，车务长与会计长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也派一名会计长），对运输和财务进行管理；以前德国享有开采权的煤、铁矿山由中、日合资经营。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中国对“外国人民在德国旧租借区域内之既得权，无论在德国租借时或日本军事占领时经合法、公道取得者，应尊重之”。这个条约使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政治地位仍然很牢固，同时也为美国插足山东提供了机会。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总算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权利。

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中正式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全文共九条。卢特的四条原则被列为第一条，是该条约的核心部分。它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为保证第一条的实施，第二条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侵犯或妨碍第一条所述的各项原则。第三条则进一步贯彻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规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

此外，中国还向会议提出归还中国自行规定及处理关税的权利，并要求

把名义上 5% 的关税提高到 12.5%；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提出了撤销外国邮局的议案，以防止漏税和违禁品通过这种渠道大量流入中国；提出取消外国在华无线电台及撤退外国驻华军警的要求；提出“废除和提早终止”外国租借地的要求；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议案，等等。

在《九国公约》以及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十多项决议中，虽然都标榜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对中国上述的要求，除了同意撤销部分外国电台及英法同意交还威海卫和广州湾之外，其他都只是原则上承认，或者拒绝讨论，或者故意拖延，以达到维持原状的目的。

《九国公约》的签订，使美国得到了它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美国国务卿休斯说：“由于这个条约，中国的‘门户开放’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个条约为美国进一步对华扩张和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提供了条件，结束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1922 年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华盛顿体系及其实质 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解决了巴黎和会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会议通过的《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和有关中日问题的一些协定，补充了和部分地改变了巴黎诸条约的部分条款，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建立了在这一地区的“新秩序”，被称为“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体系同凡尔赛体系一样，是根据列强的实力对比确定的。凡尔赛体系是在承认英法占优势的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西方的关系；华盛顿体系则是在有利于美国的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但是，华盛顿体系只是暂时缓解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紧张关系。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策划者和最大收益者，废除了英日同盟，暂时阻止了日本独霸中国的进程，取得了与英国在海上并驾齐驱的地位。日本在英美的压力下，既失去了外交上的国际支柱英日同盟，又在中国问题上被迫让步，但它决不会甘心就此罢休，一旦有机可乘，便要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重施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这必然造成英日之间新的冲突。英国的衰落已成为必然，它自动放弃海上的绝对优势，如果能凭借往日的余威维持其在华、在远东的利益，就心满意足了。而日本的侵华政策，必然视英国为障碍，不挤掉英国，独占中国便是一句空话，因此，英日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英日、英日之间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在新的基础上的竞争，从而使华盛顿体系最终瓦解。

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帝国主义战胜国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它是极不稳固的，是注定要彻底崩溃的。

第五章 战后初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战后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概况

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化 20 世纪初，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物理学革命。这场物理学革命的先锋是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 年）。1905 年，年仅 25 岁的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其核心是论证了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性，从而确立了崭新的、相对概念的时空观。牛顿力学只能解释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既能解释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也能解释在光速或接近光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1915 年，爱因斯坦又提出广义相对论，揭示了四维时空同物质的统一关系，指出空间、时间不可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空间结构和性质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相对论认为，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进行运动时，运动物体上的时钟会变慢，尺子会变短；同时，物体的质量和能量也随运动速度而增加。广义相对论实际上是一种引力理论，它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为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大大推动了科学前进，特别是对研究接近光速的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另一项重大科学发现是量子力学。在本世纪初，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1858~1947 年）提出量子概念。他认为物体在发射辐射和吸收辐射时，能量并不是无限可分的，其最小的、不可分的能量单位即“能原子”或称“量子”。20 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1901~1976 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1887~1961 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到 1925 年左右创建了量子力学这门学科。这是研究微观世界粒子运动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发现解决了原子结构以及原子中的电子运动问题。它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等奠定了理论基础。量子力学在这一时期的应用是，它和相对论结合形成原子核物理学。1932 年，美国科学家劳伦斯（1901~1958 年）发明了回旋加速器。1934 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昂利克·费米（1901~1954 年）发明用中子轰击重元素铀，可造成铀的核裂变。1938 年，奥地利和德国的科学家继续费米的试验，进一步论证了核裂变的链式反应。科学家在对原子核进行一连串的电力冲击，造成核分裂后发现，铀原子核分裂时，放出的能量很大。1 克铀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烧 3 吨煤或 200 公升汽油，其爆炸能力相当于 20 吨黄色炸药。原子能的理论准备虽然是在欧洲完成的，但在技术上获得和利用原子能却是在美国首先实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加紧研究核裂变的问题，并首先把它用于制造新式武器。终于在 1945 年爆炸了原子弹。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力生产和电子工业有很大发展。电是既简单方便又经济便宜的动力来源。同时，它又是实现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各国对电力生产十分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火力发电站占主导地位。它的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 80%。在发电设备上，先进的汽轮机逐渐代替了活塞式蒸汽机。水力发电也日益增多。1936 年美国在科罗拉多河上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山峡水电站，坝高 222 米。电力技术的革新使欧美各国的发电量迅速增加。在二十多年里，德国的发电量增加了十一倍

多，美国增加了将近六倍，英国增加了四倍多，法国增加了将近二倍。

发电量（单位：万度）				
	美	英	法	德
第一次大战前的 1913 年	248	45	82	51
第二次大战前的 1939 年	1613	242	220	614

随着电力的增长，各生产部门逐渐改用电力，民用电器如洗衣机、吸尘器、电冰箱也逐渐普及起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无线电和电影事业的发展。无线电通信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发明。战后，科学家又在短波和超短波的研究上取得成就，使无线电通信的有效距离不断扩大，为广播事业奠定了基础。1920 年，美国首先设立广播电台，进行正规的定时广播。接着，法国和英国于 1922 年，德国于 1923 年，意大利于 1924 年也相继开始广播。由于欧美电台实现了联网，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广播体系。无线电收音机成为畅销的热门货。1922 年到 1929 年的七年期间，美国收音机的销售额增加了 13 倍，由 6000 万美元增加到 84,000 万美元。这一时期，电影技术提高很快。最初是无声电影，或是用留声机的唱片伴音，但效果不好。1930 年，出现了第一部有声电影。1935 年又产生了第一部彩色电影。电视在 20 年代开始出现。1933 年，发明了先进的摄像管。1941 年，试验彩色电视成功。

电力的发展使许多固定式的工作机器采用了电力驱动。但是，它不能适应移动式的机器的工作条件。因此，内燃机仍然是最主要的动力装置。1920 年，内燃机的总功率大约占原动机总功率的四分之三。内燃机广泛应用于运输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汽车成倍增长。1916 年世界汽车年产量比 1900 年增长 166 倍，达 150 万辆。

欧美各国的汽车年产量（单位：万辆）				
	美	英	法	德
1913 年	48.6	3.4	4.5	1.6
1939 年	357.7	50.4	22.9	33.8

随着汽车的增多，美国、德国先后修建起高速公路。汽车在城市间交通运输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并逐渐把城市和农村密切联系起来。公路网络日益密集。内燃机也广泛应用于海上和内河运输业。从 1918 年至 1928 年期间，装备内燃发动机的船舶吨位增加了九倍。1927 年，世界各造船厂所制造的内燃机船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当时所有的蒸汽机船。内燃机技术的改进使民用航空事业兴起。1918 年，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航线通航。第二年，德国柏林和魏玛之间建立定期航班。随后，几乎每年都开辟联结欧洲各国首都的新航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航线也建立起来了。

汽车、飞机的发展，需要大量橡胶做轮胎。1910 年，出现了合成橡胶，

表中的统计数字有的并不是正好这一年的，而是相近的年份的。如战前美国发电量 248 万度是 1912 年，法国发电量 82 万度是 1921 年，而英国 242 万度发电量是指 1937 年。

但质量远不如天然橡胶，价格也昂贵。30年代，美国研制出质量较好、成本较低的合成橡胶。1935年，美国研制尼龙丝成功，开始用来生产牙刷，后来大量生产尼龙丝袜。1940年，英国人发明涤纶。三四十年代，各种塑料投入工业化生产，它们在工业上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化工外，冶金、机械制造等方面也有很大进展。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1921年到1929年间，各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相当快。法国是9.4%，德国7.1%，美国4.3%，日本为3%，英国1.7%。1924~1929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工人平均每小时的产量大约提高了15~20%。美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早在一次大战期间就已大大超过战前水平，法、德、英分别在1924年、1927年和1929年超过战前水平。从1924年到1928年，约有20个国家恢复了金本位。以流水生产线和零部件标准化为重要内容的生产合理化运动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各国垄断资本获得较大的发展。许多原有的垄断组织的规模、实力和相互间的联系扩大了，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新的垄断组织，此外，国际垄断也迅速发展。但是，在新兴工业部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诸如煤炭、制鞋等传统工业部门却发展得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停滞不前，农业则长期发展缓慢处于隐伏的危机之中。在新兴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虽然有所增长，但仍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为以后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果不其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工业增长速度骤然下降。1930年到1937年期间，英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7%，美国是0.67%，法国和德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降低到3.9%和0.7%，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极不稳定的。同时，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作为战败国受到压制，经济凋敝，工业产量落在美、英、法之后。到1929年，又再次超过英法，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

欧美各国的政治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三个反动落后的帝国垮台了。在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了苏维埃俄国以及德、奥、波、捷、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九个共和国。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欧洲仍保留很多君主国。如西欧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北欧的瑞典、挪威，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当然，这些君主国的情况彼此很不一样。有些是落后的封建王国，君主有很大的权力；有些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君主只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

这一时期，欧美各国的选举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断趋向完善。广大人民在经历战争以后，视野扩大，关心时事，要求参与政事。欧美国家陆续实现了普选制。丹麦在1918年，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在1919年宣布男女公民均有选举权。美国在1920年第一次给妇女以选举权。英国在1918年规定，21岁以上的男子和30岁以上的女子有选举权。1928年改为妇女和男子一样，21岁起有选举权。作为女权运动的成果，很多国家的妇女进入了以前被男子独占的“王国”，出现了女律师、女医生，甚至女议员和内阁大臣。1919年，意大利也实行了普选制，但墨索里尼上台后，于1928年改为交纳工会会费或100里拉税的男子有选举权。日本战后也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法国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实行普选制的。

在政治舞台上，欧美各国都是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

新的情况是，由于技术工人的大量出现，各国社会党的力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并开始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上台组阁。社会党是上个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工人贵族手中，逐渐蜕化成为资产阶级左翼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们公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战争期间开始吸收社会党的领导人进入政府，以欺骗工人群众，诱使人民为战争出力。1918年，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资产阶级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慌忙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和谢德曼。1919年，魏玛宪法通过，正式成立社会民主党政府。奥地利的情况也相类似。在奥匈帝国崩溃之际，社会民主党人伦纳出任总理。德奥社会民主党人在革命高潮时上台执政，起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作用。几年之后，革命进入低潮。但是，人民斗争的深远影响仍在，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力单薄。在发生内阁危机，或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掌握议会绝对多数时，统治阶级往往让社会党上台执政。如英国资产阶级让未获议会多数的工党上台执政，同年，丹麦社会党人，几年后挪威工党也相继组阁。法国社会党人在1924年虽然没有组建政府，但它同激进社会党政府有密切的合作。1936年，法国社会党人勃鲁姆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社会党人上台后，大多宣布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在资产阶级所能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在革命形势未成熟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民意。

反动帝国的垮台，普选制的建立，普选权的扩大，以及社会党的上台执政，这些资产阶级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斗争的成果。同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出现了极端反动的法西斯政党和独裁集权制度，它们后来逐渐形成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英国和法国

战后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况 英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它打败了最大敌手德国，并且从德国、土耳其等战败国得到份额最大的殖民地。在中东，英国得到了伊拉克、巴勒斯坦、外约旦；在非洲，得到坦噶尼喀、多哥的一部分和喀麦隆的一部分；在太平洋上，得到瑙鲁岛。英国的自治领得到西南非、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群岛的一部分的委任统治权。曾经与英国争霸的德国海军，现已势衰力微，曾经和英、美争夺市场的德工商业，现在也一蹶不振。看起来，英国的霸权地位巩固下来了，甚至进一步提高了。但是，实际上，由于苏维埃俄国的出现，资本主义体系被打开了缺口；同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损耗，死伤人员300多万，花费400亿美元，2000多艘商船被打沉。大战和革命的结果打破了英国的传统市场。大战期间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战后，英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缺少大量更新固定资本的资金，国内投资能力不足；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美、意、日等国也大肆侵夺英国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市场。因此，英国在战后初期没有出现经济高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这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英国于1920年初一度出现短期的商业兴旺，但很快便进入了战后的第一次危机，直到1922年，各部门才先后摆脱了危机状态。由于暂时摆脱了德国的竞争，加上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它的新兴工业部门，如汽车业、电子业、有色金属业和化学工业等发展较快，到1929年，英国汽车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新兴工业部门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17年的6.5%上升到13.6%。但是，与此同时，构成英国工业基础的传统工业部门却日趋衰落。如煤产量从1913年的2.91亿吨下降到1929年的2.61亿吨，生铁产量从0.1亿吨下降到0.077亿吨。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13年的14.5%降到1929年的9%，1930年再次被德国超过。英国的出口总值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从1921~1927年，英国的出口额减少了五分之一。而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8%。英帝国长期严重依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它的工业、商业都依靠出口贸易，它的出口占全部产品的五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一旦出口贸易下降，就影响整个经济生活。如果说战后英国经济萧条的主要标志是出口贸易下降的话，那末，其明显的社会后果就是大量持续的失业人口。战后英国失业人口长期保持在一百多万到两百多万，特别是造船、机械、钢铁等基础部门，失业情况尤其严重。英国的工业技术也相对地落后于美国、日本。英国的煤炭开采只有19%实现了机械化，而美国70%实现了机械化。这又使英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由于政府实行粮食低税进口政策，导致农业产量也日益下降。

在政治上，英国一向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战后的第一届政府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联盟的政府。首相是劳合·乔治。为了减轻经济衰退，政府通过工业保护法，决定增加关税，规定对所谓主要工业（化学药品、光学玻璃、精密仪器，等等）的全部产品征收 $33\frac{1}{3}\%$ 的保护关税，并把一些失业人口迁到殖民地和自治领。1919年，英国通过了《英国教会议会（权限）法案》，使教会有更大的自治权。1920年，又使保险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国雇佣

人员的三分之二。1921年英国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劳合·乔治的内外政策引起了保守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不应该答应爱尔兰南部自治。1922年10月，保守党退出内阁，劳合·乔治被迫辞职。同月，议会重新选举，保守党人获胜。保守党人邦那·劳担任首相。不久，因年老力衰由斯坦利·鲍尔温（1867~1947年）担任首相。1923年议会大选中，保守党的议席由347席降为259席，而工党的议席由142席升为191席。自由党获得158席。当时，保守党和自由党互相倾轧，彼此不愿支持对方组织政府。因此，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第一次在英国执政，工党首领雷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年）组织了第一届工党政府。从此，工党开始取代自由党的地位，与保守党交替在英国执政。工党成立于1900年，由工联、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等组织联合组成。工党在1918年通过的《劳动与社会新秩序》的纲领中，主张在民众管理的基础上使生产者获得全部果实，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对工业实行民主监督，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实行财政革命，对高收入者收重税，并使财政收入尽可能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作为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工党执政后在资产阶级所能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加强福利措施。如通过“惠特利住宅计划”，由国家增拨补助金扩大住宅建筑。增加养老金和残废退休金，改善失业保险制度，规定从1924年8月起，男子失业补助金从每周15先令增加到18先令，妇女失业补助金从12先令增加到15先令，父母失业的子女补助金，从每周1先令增加到2先令。规定农业工人的最低限度工资，降低烟草、糖和其他食品的消费税。在对外政策上，缓和与自治领、殖民地的关系，同时承认苏联并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工党政府的政策与保守党或自由党差别不大。它不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本家一边。对外，继续执行殖民政策，派飞机轰炸伊拉克起义部落，在印度实行警察恐怖，镇压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使英国工人群众由失望到不满，而保守、自由两党则对它的某些激进措施感到不安。麦克唐纳任职不到一年，即于1924年10月辞职。迫使他辞职的导火索是“坎贝尔案件”。坎贝尔是英国共产党报纸《工人周刊》的记者，他在《工人周刊》上发表文章抨击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结果受到工党政府起诉并被传讯，后来，工党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释放了他。群众对工党政府不满，而保守党则指责工党政府纵容损害英国利益的宣传。保守党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在报纸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信件”，称共产国际指示英国共产党策划武装暴动推翻英国政府。季诺维也夫是当时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这一事件严重地损害了工党政府的威信。1925年，保守党重新执政，斯坦莱·鲍尔温组织了新政府。人们称它为第二届鲍尔温政府。丘吉尔在这届政府中任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1863~1937，他和执行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任外交大臣。这一届政府任期近五年，直至1929年中。鲍尔温上台后，为稳

麦克唐纳，苏格兰人，出身贫寒，1906年当选为下院议员，1922~1931年为工党议会党团主席。

费边社是1884年由悉·维伯、萧伯纳等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它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因费边在战争中擅长运用回避决战、缓进待机的策略而借用其意。萧伯纳主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主张采取温和缓进的改良主义办法，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和政权机构，逐步把土地和产业资本转为地方公有，即公社所有。

定英国经济采取了一些措施。1925年恢复了英镑的金本位制，企图重新确立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削减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镇压英国工人罢工。对外主张镇压印度、爱尔兰、中东阿拉伯地区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927年还参与干涉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视苏联，还制造了1927年英苏断交事件，表现了极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本性。

1926年5月，英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于矿主要强行降低煤矿工人的工资10%造成的。煤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要求废除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并拒绝签订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合同。该要求被工人拒绝后，矿主宣布自5月1日起实行同盟歇业。5月4日，英国工人举行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参加罢工的除了煤矿工人外，还有运输、铁路和机械工人，很快达到了600万人，致使当时工厂关门，交通停顿，城市瘫痪。工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掌管发放车船通行证和调配粮食，行使了政权机关的某些职能。英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力量太弱，没有掌握斗争的领导权。国际无产阶级给予英国工人的斗争强大的支持和援助。掌握罢工领导权的工会总理事会力图把斗争限制在经济领域，同政府秘密谈判，达成了协议。5月12日，铁路工人被迫复工。煤矿工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总罢工失败后，资产阶级加紧向工人反攻倒算。1927年7月，鲍尔温政府公布了《关于工业争议和职工会》的法律，宣布总罢工是非法的，规定任何组织“非法罢工或参加罢工者须受罚款或判处两年以下的徒刑”；禁止政府人员参加工联；严格限制工会会员为政治目的而进行募捐。随后，矿工的法定工作日从七小时延长为八小时。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安抚工人的措施，通过了对65岁的退休工人发老年金的法案、发孤寡补助金的法案，制定新的失业保险条例。工会总理事会代表与企业主集团代表签订协定，建议由劳资双方的代表组成全国工业委员会，以“调解制度”取代罢工活动，并要求实现生产“合理化”，“改进”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英国阶级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却进一步加强。1926年的英国工人大罢工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表明英国资产阶级在对付工人阶级方面更有经验、更有组织了。

爱尔兰的自治和英国自治领地位的提高 一次大战后，英国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本土和自治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殖民体系渐趋崩溃。战后初期，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重新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爱尔兰支持英国参加大战。但英国政府处处歧视爱尔兰人，在军队中禁止爱尔兰人成立独立团，在爱尔兰人与英国人混编的军队中，爱尔兰人不受信任和重用。1916年，爱尔兰共和派在都柏林举行起义，结果因遭到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15名领袖被判死刑，起义领袖之一德·瓦勒拉逃亡国外。在1918年12月英国议会选举中，105个爱尔兰议席中有73个是共和派。当时共和派议员中有36人尚身陷囹圄。共和派议员拒绝出席议会。1919年1月21日，共和派人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当时还在英国监狱里的德·瓦勒拉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接着各郡、市都建立地方行政机关、法院。都柏林政府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占领军”（爱尔兰人这样称呼它）和受英国控制的警察部队展开了游击战。爱尔兰共和国并派代表出席凡尔赛会议。在美国的爱尔兰侨民声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希望巴黎和会考虑爱尔兰民族的自决权的问

题。对于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要求，英国政府起先采取恐怖手段，派特种部队打击共和派力量，一些共和军战士不经审讯就被枪决。1921年双方开始谈判，并在1921年12月签订英爱条约。条约规定爱尔兰南部26郡为“爱尔兰自由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而北部六个郡与英国合并。从此英国的名称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爱条约在爱尔兰议会讨论时意见分歧，最后以勉强多数获得通过。总统德·瓦勒拉反对该条约，因此辞去职务，新政府由格里菲斯任总统，柯林斯任总理。爱尔兰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继续斗争，1922年6月爆发内战，到1923年恢复和平。同年，爱尔兰被国际联盟接纳为成员国。作为一个自治领，它多次参加英联邦的帝国会议。1925年，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终于确定下来。

英国的自治领是英帝国范围内的一种政治形式。大战结束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纽芬兰、南非。自治领被看成是英国本土的延伸，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帝国本土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英国从1887年起，定期召开各自治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首脑会议，讨论防御、贸易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自治领经济迅速发展和要求独立的呼声很高，促使英国采取新的措施协调与自治领的关系。1926年10月举行的伦敦帝国会议上通过的“巴尔福宣言”，规定英联邦的成员是自由地结合在一起的，英国和各自治领相互关系是平等的，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独立的，没有隶属的关系；它们都共同臣属英王，效忠英王。因为各自治领在防务上需要英国军队，特别是英国海军的保护，以及英国和自治领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各自治领仍然承认自己是英帝国的成员，并且宣布效忠于英王。1931年12月，宣言以《威斯敏斯特法案》的形式通过，被称为英联邦的大宪章。在宪章上签署的除各自治领的首脑外，还有印度。英国认为印度经过1919年的宪政改革已经确立英联邦成员国的地位了。《威斯敏斯特法》规定，如果没有得到自治领的同意，英国王位继承的法律不能作任何修改。在伦敦的国会只有根据自治领的要求，才能通过应用于自治领的法律。自治领的议会通过的法律不能因为它与英国的法律相抵触，而被宣布无效。英国国王也不能按照其英国大臣的劝告而驳回自治领议会的法案；对于自治领的事务，他必须根据自治领大臣的意见行事。各自治领议会可以废除在伦敦通过的、与它们有关的法律。这就改变了1865年所通过的法案，即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不得与伦敦通过的法律发生矛盾的规定，扩大了自治领的自主权。

20年代的法国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严重。因为战争主要是在法国本土进行的。遭受破坏的地区主要是北部的十个行政区。八十万幢房屋遭到了破坏，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运河和公路不能通行，两百多万公顷耕地荒芜，经济亟待恢复和重建。法国是大战的战胜国，战后它收回了盛产铁矿和煤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使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铁矿。同时法国也是欧洲最大的铝土矿产国，在电力水力方面居于欧洲前列。法国还获得了德国的巨额赔款，截至1931年止，德国支付给战胜国的206亿金马克中，法国得到了80亿金马克，是获得赔款最多的国家。此外，法国还从德国手中获取了新的殖民地，扩大它殖民掠夺的范围。早在大战期间，法国因丧失东北地区，就在南部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战后的重建又大力采用新的技术装备，并在北部重新建设新的现代化的工业中心。以上这些因素促使它经济恢复的速度较快，到1926年被破坏地区基本上得到了重建。其工业指数以1913年为100，1919年是57，1930年达140。1920年，法国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

是5%，到1930年上升为8%。法国在20年代初期的世界棉纺工业国家中就名列第三，丝绸是更为珍贵的出口商品。法国创办了许多新工业，雷诺和西特隆成了世界汽车制造业中的名牌。在航空、橡胶等部门，进步也非常显著。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经济繁荣的国家。

然而，法国仍然是小型工业企业占优势的国家，约三分之二的工业没有雇用领取工资的工人，只有0.5%的企业雇用一百至一百以上的工人，这些为数很少的大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占领取工资的工人总数的约45%。轻工业发展比较缓慢。农业在法国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战后，尽管出现了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的现象，务农的人数减少了，但更多地使用机械和化肥使法国的农业生产保持着高水平。农业电气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法国仍然是一个小农业主的国家。在小农业主拥有的土地中，约有25%是不到2.5英亩的土地，47%是2.5~25英亩的土地。土地面积超过125英亩的农场只有2%。1926年，法国工业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战后初期，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其战后的税收大大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到1927年，法国才取消了关于不准出口食品的一切禁令。

在政治上，法国是多党制政体。议会选举中由观点相近的政党组成联盟参加竞选。由于党派林立，党派缺乏纪律性，总理控制不了议院和议员，所以法国内阁更换频繁。从战争结束到1933年1月为止，法国共有27届内阁。战后初期，对德国的恐惧情绪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1919年11月大选中，右翼政党组成的国民联盟获胜，在602议席中获得425席。战时联盟政府总理克里孟梭辞职。米勒兰（1859~1943年）担任总理。1920年9月，米勒兰当选为总统，由白里安（1862~1932年）担任总理。国民联盟主要代表人物都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压制德国，坚决维护凡尔赛和约，逼迫德国按和约规定偿还赔款。1921年德国发生金融危机，要求延期偿还战争赔款，英国建议法国考虑德国的要求，白里安在与英国商谈前，米勒兰交给他一份备忘录，要他在赔款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不要在曼纳（英法官员会晤地点）召见负责赔款问题的德国代表，说赔款问题是属于“赔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只有这个协约国机构才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英法会谈没有取得成果，白里安辞职。1922年1月14日组成普恩加莱（1860~1934年）政府。1922年7月德国又一次提出无力偿还1921年的债款，要求延期六个月，遭到普恩加莱政府的拒绝，并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鲁尔。占领鲁尔引起德国消极抵抗，造成法国财政状况恶化，法国在国际上很孤立，英美趁机把解决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占领鲁尔激起法国内外普遍不满，备受战争折磨的法国人民担心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有可能把法国拖入新的欧洲战争。1924年普恩加莱辞职。1924年5月大选中，左翼联盟提出了民主的和平主义的竞选纲领，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取得了议会584席中的315席，其首领激进社会党人赫里欧（1872~1957年）担任总理。左翼联盟自1924年6月至1926年7月执政，先后由赫里欧、保罗·班乐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任总理。这是继英国工党政府以后在欧洲大国中出现的又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政府。赫里欧任期，在赔偿问题上接受英美的仲裁；通过道威斯计划；1924年10月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在国内宣布政治犯大赦，对因参加1920年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恢复其工作，给公务员组织工会的权利，妇女参加市政和县政选举的权利，限制阿尔萨斯和洛林天主教的特权。赫里欧的一些激进措施受到右翼政党的攻击，加上政府出

现了财政困难，1925年赫里欧辞职。班乐卫政府上台后，政治路线急剧右转，拒不接受开征财产税的方案，但全部保留了国民联盟政府向劳动人民征收的各种捐税。在殖民政策上，继续对摩洛哥里夫共和国进行殖民战争，对叙利亚德鲁兹人民起义进行镇压。殖民战争的开支使法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广大人民群众和左翼联盟内部的部分党派对政府不满，一向对左翼联盟财政政策不满的大资产阶级更加对左翼联盟施加压力，左翼联盟被迫辞职。1926年7月，普恩加莱再次担任总理，组成以各右翼政党为骨干、有左翼联盟部分成员参加的“国民统一”政府。“国民统一”政府进行了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使不断贬值的法币稳定了价格，外流的资金重新回流，实现了预算平衡。法国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国民统一”政府更加坚决地维护的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扩充军备，增加军事预算，加速建造军舰，实行普遍义务军事训练。在1927年英苏断交后，法国政府也掀起了反苏宣传，庇护白俄流亡分子，对苏联进行经济抵制。

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也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但由于是德国的邻国，它总感到自身安全缺少保障。它担心战败国德国东山再起，是凡尔赛体系最坚决的维护者。战后缔结的和约由于美国不参加，接着在赔款问题上又与英国产生分歧，它又敌视和惧怕社会主义苏俄，因此感到处境孤立。法国看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在战后初期分别建立联盟，共同注视东部和南部的战败国（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防止凡尔赛体系被破坏。这一联盟被称为小协约国。法国在这一联盟的启示下，也积极在欧洲寻求支持。1921年法国与波兰缔结友好条约；1924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缔结友好条约；1926年与罗马尼亚缔结友好条约；1927年与南斯拉夫缔结友好条约。法国还积极参加了洛加诺公约，该公约对德法之间和德比之间的边境线作了明确的划分。此外，法国在国防上采取防御措施，从1929年到1934年花了五年的时间在法国边境上建立长两百多公里的“马奇诺防线”（以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名字命名）。修筑这一防线花了巨额资金，法国政府把它作为安全的保障，后来表明它毫无用处。德国入侵时绕过马奇诺防线，使它完整地落入了侵略者手中。

法国人民在战后初期的相对稳定时期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1925年10月，共产党和总工会共同组织了历时24小时的总罢工，有一百多万工人参加，要求立即把军队撤出摩洛哥和叙利亚。1929年8月1日，法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战日”的斗争。1928年11月，激进社会党部长退出内阁，“国民统一”政府至此结束。

第三节 战后初期的美国

经济的繁荣 美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参战的，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而且在战争初期与交战双方大做军火生意，发了不少战争财。美国资本家在战时获得了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储存了充足的资金。又由于战后工业管理改进和技术革命的刺激，美国在经历 1920 年年中至 1921 年末的短期经济萧条后，经济很快复苏，并逐渐趋于繁荣。工业生产发展迅速。从 1923 年到 1929 年六年间，钢产量从 4490 万吨增长到 5640 万吨，提高了 26%；发电量从 713 亿度增长到 1167 亿度，提高了 65%。新兴工业有汽车业，电力、电机与电器业，无线电气工业，航空工业，电影业。汽车生产从 1900 年的 4000 辆增加到 1929 年的 4,794,898 辆，汽车的使用推动了公路桥梁的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并促进了石油、轮胎制造、公路修建及钢铁业的巨大增长，加油站遍布全国。柯立芝执政时期，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工人就业率高，收音机、洗衣机、小汽车成为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小城镇迅速成为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战时住宅建筑规模大为缩小，为战后住宅建筑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几十层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使欧洲人吃惊，人们称这一时期为“柯立芝繁荣”。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 81% 是美国货。收音机也已普及于寻常百姓家。汽车工业、电工业和建筑业成为 20 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支柱。国民总收入从 1919 年的 650.9 亿美元增至 1929 年 828.1 亿美元；人均收入从 1919 年的 620 美元增至 1929 年的 681 美元。美国向海外的资本输出额从 1919 年的 70 亿美元增至 1929 年的 172 亿美元（二者都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债），美国的商品输出从 1922 年的 39.71 亿美元增至 1929 年的 51.57 亿美元。从 1919 年到 1929 年，整个工业生产率提高 40%，农业提高 26%。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纽约开始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首先，是农业长期不景气。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陷入沉重的债务，有的失去农田，背井离乡。许多农场主也破产了。农民的收入偏低，购买力大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欧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已相继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农产品输出大为减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生产增长不快，结果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其次，一部分工业部门如纺织、煤矿、造船、制革等部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再者，由于企业集中程度高，兼并之风盛行，中小企业受排挤，财富分配极为悬殊。据联邦商务委员会 1926 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中说：“国内占人口 1% 的最大资本家占有财富达 59%；占人口 12% 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达 33%；而占人口 87% 的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广大人口只有 8% 的财富”。到 1929 年，15 家大公司集团控制了全美电力的 80%，20 个集团控制了 98.5% 的跨州输送电路等。1929 年约 60% 的美国家庭总收入在美国总收入的比重不足 24%。更为严重的是有 21% 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不足 4%。第四，这一时期盛行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1927 年，60% 的汽车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的，其他如电冰箱、洗衣机到私人住宅也大量采取赊购的方式。第五，这一时期投机活动猖獗，股票、债券等有价值证券大量发行，大企业主、金融寡头大搞投机倒把，普通的美国人也卷入大买股票寻求发财的热潮中去。还有，国际经济中的潜在因素也加深了国内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到 1920 年，欧洲等地区国家共欠美国 133 亿美元

借款。欧洲的贫困和美国的高额关税，使美国的海外市场日益缩小。这些都说明美国经济发展虽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但经济危机的不祥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政治上的保守 战后美国的经济上出现了繁荣景象的同时，政治上却出现了保守主义倾向。

战后初期，由于资本家取消了工人在战时争得的某些成果，削减工人工资，大量裁减工人，加上飞涨的物价加剧了生活的恶化，美国国内罢工浪潮汹涌。1919、1920年相继发生铁路工人、钢铁工人大罢工。仅1919年全年发生了三千六百多次罢工，参加人数达四百多万。最后在政府镇压和劳联右派领袖的出卖下失败了。但在1919年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美国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成立后受到了威尔逊政府的疯狂迫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同时，在战后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下，美国还出现了“红色恐怖”的浪潮。在一些城市发生无政府主义搞的爆炸活动以后，司法当局出动军警大规模逮捕“激进分子”。1920年1月的一次逮捕达6000人，使大批无辜的公民受到迫害。

美国是依靠移民组成的国家。但随着西进运动的终结，劳工和劳工组织把新移民看成是缩小国内劳工市场和妨碍劳工组织发展的因素，要求限制移民入境。20世纪初的15年，平均每年有100万移民入境。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1917年1月，国会通过对移民强制文化测验的提案。但1920~1921年，仍有123万移民涌入。在“外国人和外来哲学”引起颠覆的群众性的恐慌高潮中，美国实行了限制移民的政策。要求限制移民的除劳工外，还有一批极端本土主义者，他们或抗拒激进思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或对犹太教、天主教持有偏见，或对东南欧人种或亚洲人种持排斥态度。在这些社会集团的要求下，1921年，国会众议院通过来自华盛顿州的议员艾伯特·约翰逊提出的暂停移民一年的法案。此法案经参议院修正，将移民数限制为1910年在美国的各个外国出生集团人数的3%，1921年5月19日由哈定总统批准。该法案的实施虽然使移民人数有所减少，然而仍不能令人满意。1924年又制定了新的移民法，禁止东方移民入境，并将欧洲移民总数限制在1890年人口普查时外国在美国出生人口的2%。新移民法还规定，1927年7月1日以后，移民应该为每年15万人，根据1920年美国人民的民族出身进行分配。该法案的实施更有利于从数量上限制从东欧、南欧来的新移民。20年代，美国不仅严格限制移民入境，对于已侨居美国的外籍工人也进行政治迫害，几百名外侨工人被驱逐出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萨柯和万泽第案件。萨柯和万泽第都是意大利移民，1908年来美国，住在马萨诸塞州。萨柯是鞋匠，万泽第是散工兼鱼贩，两人是马萨诸塞工人运动的激进分子。在反共的高潮中，1920年5月5日，他们被诬告抢劫1.5万美元，并被判处死刑。虽然许多证据证明他们清白无辜，这一不公正的判决激起全美国及世界舆论的抗议，但美国政府还是在把他们关押七年后用电椅处死了他们。1927年7月万泽第在就刑前声明说：“我一生中没偷、没抢，就是想根除人类的罪行。我所以受到这样的审讯，就因为我是激进派，就因为我是外国人。”

20年代，已多年不存在的三K党复活了，并且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20年6月，三K党大约只有四五千名成员，主要分布在南部的七个州（印第安纳、俄亥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阿肯色和奥勒冈）。之后发展得非常迅速。1922~1925年是其最兴盛的时期。1925年，三K党的会员即达四五百万。三K党散布种族仇恨和种族仇杀：白人仇恨黑人；基督徒

仇恨犹太人；新教徒仇恨天主教徒。三 K 党在美国各级政府的放纵下，经常举行神秘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到处为非作歹，私刑、暗杀很普遍，尤其是针对黑人和工会领导人。许多三 K 党人还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在南部，他们操纵政治，选出市长、州议员和州长，成为“无形帝国”，政府中的政府。从 1914 年至 1924 年 10 年间，南方有六十多万黑人向北方迁移，很多黑人在候车时即遭非法逮捕。由于美国国内种族矛盾尖锐，南部地区新三 K 党活动猖獗，黑人屡遭残害，美国黑人不相信自己在美国能够获得生活保障和平等权利，黑人领袖玛卡斯·加维（1887~1940 年）倡导的“回到非洲去”的运动发展到几十万人。这是美国黑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张黑人迁回非洲的运动。

在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于 1920 年卸任以后，20 年代是三任共和党总统，即哈定（1921 年 3 月~1923 年 8 月）、柯立芝（1923 年 8 月~1929 年 3 月）和胡佛（1929 年 3 月以后）连续执政。哈定才能平庸，被人称为“碌碌无为的活动家”，上台后就提出实行“恢复常态”的政策，即从战时国家垄断恢复到战前私人垄断的“常态”。他恢复战前垄断资本家的自由经营，实行共和党传统的保护主义政策，提高关税税率，官方不过问企业合并、组合和发行股票等事项，放弃控制物价和调节生产的做法，一切放任资本家去干。他周围又结聚一批“俄亥俄帮”政客，结果政府中不断出现贪污渎职案件：退伍军人局局长福柏士用高价购买物资修建军人医院，从中贪污二亿多美元。福柏士贪污罪被揭露后，又发现内政部长福尔利用把海军第三号油井转让给私人企业经营的机会从中捞取大笔的贿赂，司法部长多尔蒂利用职权侵吞公款，等等。哈定为摆脱俄亥俄帮的羁绊，于 1923 年 8 月外出巡游，途中暴卒。柯立芝继任总统。他是一个比哈定更加亲密地同大企业合作的人。柯立芝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政策。他的名言是：“美国是个商业的国家，需要一个商业政府”，主张放手让资本家赚钱，政府应节省公共开支和税收，让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强调政府应保持大资本家的利益。柯立芝坚信：“既然只有富人是有价值的，因而政府应当谨防多数人的意见。由于贫穷是罪恶的报应，政府就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由于富人最了解他们利益之所在，政府便不应该干预他们经营的企业，而应该促进企业”。面对经济的一片繁荣景象，许多人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连总统也不例外。胡佛在 1928 年 10 月的竞选演说中宣称：“今天我们在任何地方比以往都接近消除人民生活贫困和恐惧的理想”。“只要让我们继续执行过去八年的政策，我们借上帝之助，很快将看到贫穷从这个国家消失的日子”。可见，此时美国，人们冷静分析事物的能力丧失殆尽。胡佛就任总统后提出的著名主张是：美国社会制度成长和繁荣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这种所谓的个人主义是和自由企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上反对政府的干预。这些主张使 20 年代的美国在政治上处于相对保守时期，国内的改革基本上停滞。非但如此，到 1920 年夏，“红色恐怖”的浪潮虽已过去，但公民权利仍受到侵犯，许多州制订了比战争年代还要严厉的惩治间谍法。在对外政策上，基本上放弃了孤立主义，不过，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没有参加国际联盟。在战债问题上，1924~1930 年美国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向德国贷款 25 亿美元。德国执行赔款计划偿付 20 亿美元，而前协约国偿付美国战债 26 亿美元。到 1931 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胡佛宣布延期一年偿付战债，后来危机继续扩大，决定取消战债。

20 年代美国整个社会价值观都在逐渐发生变化。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是清教徒式的，即勤奋、努力、个人奋斗、节俭、崇尚理性、反对浪费，等等。20 年代这种传统的社会价值观首先在城市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酗酒、赌博、卖淫、违禁售酒形成风气，追求享受、发财致富，投机倒把成为时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盛行，作案中使用机枪、爆炸物、大马力的汽车等，令人感到震惊。由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了选举权，就业机会也扩大了，战后妇女开始流行涂脂抹粉，以至于化妆品的销售量大增。妇女还开始吸烟喝酒，穿着露出胳膊和腿部的衣服来表现其独立性，公开谈论性问题，经常与男友约会，参加与男性的社交，有些人甚至生活放纵。一些人为了活得轻松，不愿受婚姻的束缚，晚婚，不要或少要孩子，从而造成美国生育率下降，而离婚率上升，家庭生活不稳定。而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使许多人特别是农村和小城市出身的人感到不安，对青年一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大为震惊，号召回到过去简单朴素的生活。与此同时，美国 20 年代精神文化显得浮浅和鄙俗。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粗制滥造了一些庸俗的作品，如电影以色情为内容的列居第一位，以犯罪为内容的列居第二位。文艺作品也日趋商业化和市侩化，大多以凶杀、色情、冒险起家为题材。20 年代，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美国独树一帜，影响甚广。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宣称：宇宙最根本的东西是“纯粹经验”，一切事物都是这种“纯粹经验”构成的；他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凡是对资产阶级“方便的”、“有用的”东西，都是真理。美国一些史学家把 20 年代美国的生活特点概括为精神上的“饥饿”的时代或“疯狂的 20 年代”。

在战后初期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总的来说有所上升，实际生活水平也有提高，这是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工人阶级本身斗争的结果。但是，在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美国全国失业人数每年都不少于 200 万人以上。社会上没有固定职业的贫民达 800 万之多。同时，还应当看到，工人工资的增长幅度远远赶不上少数社会上层人物收入的增长幅度。据统计，1923~1929 年，美国公司利润增长 62%，而工人的实际收入仅增长 11%。其次，工人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再次，工人内部的经济收入差距扩大了。呈繁荣状态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工人、熟练工人，工资增长幅度较大；而处于衰落状态的传统工业部门、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不多，甚至有所下降。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大搞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拉拢工人，收买工人贵族，缓和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狂妄宣称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其内在矛盾，进入“永久繁荣”阶段，灌输劳资合作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论调。同革命高潮时期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走向低潮，1919 年，美国有 416 万工人共参加了 3630 次罢工斗争，到 1928 年只发生了 604 次罢工，参加人数仅 31.4 万。工会在 20 年代不断地失去阵地。1920 年工会的会员达 500 万，1923 年下降至 360 万，1929 年更进一步下降为 345 万。但在纺织业、煤矿业等不景气的工业部门中，由于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失业严重等原因，工人们多次发动了英勇的罢工斗争。1927 年 10 万煤矿工人为期一年的大罢工成为战后相对稳定时期美国规模最大的罢工事件。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斗争进行了镇压。

第四节 战后初期的德国和意大利

魏玛共和国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1918年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庞大的帝国在战争和革命的风暴中崩溃。1919年1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优势。2月6日在德国南部的文化名城魏玛召开国民议会。国民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任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由于社会民主党没有取得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不能单独组织政府，便同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组阁，由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担任总理。1919年6月谢德曼因不愿意在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辞去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人鲍威尔接任总理，派遣外交部长米勒到巴黎签署和约。7月9日，国民会议批准了凡尔赛和约。

1919年7月31日国民会议通过新宪法，共13章181条。8月11日由艾伯特总统签署14日后生效。魏玛宪法规定德国为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各邦设置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有权管理本地的行政、教育、警察等事务，外交、国防、财政、关税、邮电等事务归中央政府掌管。德国立法机关由参议院和国会组成。参议院由各邦选派的代表组成，它主要起咨询作用，但各项立法须得到它的同意。德国国会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选举产生，它负责立法和决定预算，有权宣战和媾和。政府总理和各部部长都对国会负责，如果得不到国会的信任就须辞职。总统则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有权任免总理，解散国会。宪法规定，公民有人身、通信、居住、言论、集会等自由，“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总统特别权力，以便恢复德国的公共安宁和秩序。魏玛宪法是一部相当完备的宪法，在很多方面比原来的帝国宪法前进了一步，资产阶级在德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魏玛宪法没有能够彻底排除地主贵族的势力和影响。由于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后没有进行认真的社会改革，没有实施土地改革，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仍保留它的大地产，旧帝国的官吏和军官仍保留着他们的职务和特权，所以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软弱的共和国，自诞生时起一再受到右派势力的冲击。

1920年3月13~17日发生了复辟帝制的卡普暴动。德意志民族党人卡普（1858~1922年）借口要维护庞大的国防军，不肯裁军，不肯把武器交给协约国，他与国防军军官冯·吕特维茨相勾结占领了柏林政府大厦。卡普自封为总理。当暴动者向柏林进军时，政府要求国防军出兵镇压，但被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遭到了拒绝。艾伯特政府仓皇逃到斯图加特。柏林工人举行总罢工，切断柏林和外界的通信和交通联系，使柏林的经济生活陷于瘫痪。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国。叛乱分子得不到支持，纷纷出逃。卡普逃出柏林，吕特维茨躲入容克田庄。德国无产阶级拯救了共和国。艾伯特政府起初无能为力，后来又未惩处暴乱分子。1920年6月国民议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丧失50个议席，由中央党组阁。

战后赔款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德国经济问题，一直是德国各届政府面临的难题。1921年4月27日协约国赔款委员会把德国赔款的总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应自1921年5月1日起每年交付20亿金马克，66年内付清；1921年5月31日以前首先交付10亿金马克。1921年5月，德国政府被迫接受这个方案。1922~1923年，由于赔偿巨额债款，德国发生灾难性的马克贬值和财政崩溃。人们的储蓄、保险金顿时化为乌有，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暴涨，

高利贷者、投机商、企业家乘机发财，而普通人民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连中产阶级也陷入了绝境。1922年11月古诺任总理期间，向协约国要求延期偿付赔款，结果被拒绝。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多数票确认德国蓄意不履行赔款的义务。法国、比利时于1923年1月11日派十万军队占领鲁尔地区，逼迫德国履行赔款义务。古诺政府宣布消极抵抗，停止支付赔款，令占领军侵占地区的企业一律停工，其损失由国家补偿，指示各级官员拒绝执行占领军的命令，禁止铁路员工装运运往法国和比利时的货物，企图迫使法、比作出让步。但结果造成国际局势紧张，而且加重德国的经济危机。德国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大批工人失业，通货恶性膨胀，马克严重贬值。1923年仅补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大工业家的损失费就达700万金马克。美元与马克的兑换比值1923年10月为1:400亿马克，年底猛增到1:42,000亿马克。8月，爆发了几乎遍及全国的总罢工，参加人数达300万，迫使古诺政府下台。担任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主张放弃消极抵抗，通过与法国协商解决鲁尔被占领的问题。总统艾伯特任命他为内阁总理。9月24日，施特雷泽曼政府作出了结束消极抵抗的决议，并着手解决财政危机。11月15日公布稳定币值的法令，以总值32亿金马克的全国土地和工业作担保，发行新马克，财政部实行节约开支的政策，谋求预算平衡。1923年底，马克价值逐步稳定。施特雷泽曼政府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同时，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威胁。1923年秋，德国再次出现了革命形势。1923年10月10日在萨克森，10月16日在图林根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盟政府”。10月23日，汉堡爆发了由台尔曼领导的武装起义。国会于10月13日通过“非常授权法案”，接着施特雷泽曼政府宣布戒严，禁止罢工，命令国防军进入战争状态。政府武力镇压了汉堡工人起义后，于11月取缔了萨克森和图林根左派联盟政府，禁止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施特雷泽曼镇压革命的活动引起国内进步人士的反对。11月23日，施特雷泽曼政府被迫辞职。

在鲁尔危机期间，各种右派势力也活跃起来，以希特勒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是其中的主要的一支。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很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德军作战并获得“铁十字勋章”。1919年秋，奉德国陆军政治部之命调查慕尼黑的小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后控制了该党。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下，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趁巴伐利亚邦长官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集会的时机，率领武装的纳粹党分子闯进会场，扣留在那里集会的当地政府首脑，宣布撤换巴伐利亚邦政府和推翻全国政府。第二天，政变分子举行了游行。希特勒企图以慕尼黑为基地，向柏林进军，在全国建立纳粹党统治。由于该党当时力量还很薄弱，垄断资产阶级也没有看中他们，所以这次“啤酒馆暴动”很快就失败了。希特勒被抓了起来并被判处了五年徒刑。

1924年，通过签订道威斯计划，德国赔款问题得到了调整，经济上逐步走向稳定。为了使德国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施特雷泽曼在1924~1929年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1925年1月，提出保障莱茵地区边界，同英、法、意、比等国家签订互相保障该地区安全的条约。1926年，同苏联签订友好中立条约。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担任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1927年，国联理事会决定召回在德国的军事委员会。1928年，协约国巴黎会议提出1930年6月30日为法军撤出莱茵区的最终期限。德国通过合法

的途径一步步地摆脱凡尔赛条约的经济、军事条款，重新取得欧洲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德国外交被称为施特雷泽曼外交时期。

在战后初期的相对稳定时期，由于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源源流入，起了输血打气的作用，德国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仅次于英国，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总值 1927 年就超过了战前水平。在战败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远远超过战前。据统计，德国煤矿企业的 93%，染料工业的 96.3%，电气制造业的 86.9%，玻璃业的 90%，机器制造业的 80% 以上都控制在康采恩的手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了新的发展。德国在这段时间内广泛开展产业合理化运动，普遍更新工业固定设备，淘汰落后企业，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但同战胜国相比，德国的原料来源和市场都成问题，国内市场难以扩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更为加重，这就隐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5 年 2 月 28 日，艾伯特总统去世。3~4 月，举行了新的总统选举。老元帅冯·兴登堡（1847~1934 年）以 1465 万张得票当选。兴登堡不仅在军人中，在右翼政党中有影响，而且一般群众也把他看作振兴德国民族的一个象征。兴登堡是一个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东线德军总司令，最高统帅部建立后实际负责指挥全军。兴登堡当选为总统，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复活的表现。

德国无产阶级利用魏玛宪法保障的民主权利发展自己的力量。德国共产党是在十一月革命高潮中诞生的，1920 年德国共产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1923 年，德国共产党参与了汉堡工人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5 年 3~4 月，台尔曼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参加了总统竞选，得选票 193 万张。1925 年的 10 月 25 日，恩斯特·台尔曼当选为德国共产党的主席。1926 年德共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制定了一个无偿没收诸侯财产的法案，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 1928 年 5 月的国会选举中，德共得票数为 330 万张，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意大利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德奥同盟的意大利宣布中立。1915 年 4 月 26 日意大利同英、法、俄签订伦敦秘密条约，决定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战争。意大利指望通过战争攫取土耳其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片领土，重温历史上“大意大利”的美梦。战后，协约国撕毁诺言，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只分到特伦蒂诺等 8900 平方公里、160 万人口的领土。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它一寸也没有得到。大战中意大利曾占领阜姆和达尔马提亚。为此战后与南斯拉夫发生纠纷。1919 年 2 月协约国在伦敦开会作出决定，达尔马提亚归意大利，阜姆归南斯拉夫。意大利对这种领土处置极为不满，认为意大利在大战中死伤一百多万人，却没有享受应有的“荣誉”，得到的只是灾难和耻辱。意大利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激昂起来。

与欧洲其他大国相比，意大利是比较贫弱的。战争加剧了意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同时也使意与其他欧洲列强的矛盾更为尖锐。战后初期，意大利经济异常困难。它的国民总收入仅 200 亿里拉，但在大战期间的军费支出高达 1459.36 亿里拉，其中外债 200 亿，内债 350 亿。巨额的债务不仅使意大利战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还造成严重的金融混乱和财政崩溃。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急剧增长。1919 年议会选举中，执政的自由党票数急剧下降，社会党票数增加。战后的经济困境、政治动荡以及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再加上作为战胜国没有捞得好处而引发的强烈的国家民族主

义情绪，使垄断资产阶级选择了与法西斯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导致意大利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

1919年9月11日，加布里埃·邓南遮（1863~1938年，国家主义派首领）不顾伦敦会议协定，率领混杂的散兵冒险占领阜姆，并自称这种冒险行为是爱国行为。1920年11月，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两国代表在拉巴洛商谈阜姆问题，双方同意阜姆及其毗邻地区成立自由邦。但邓南遮拒不撤兵。1920年12月政府军炮轰阜姆，驱散邓南遮的义勇军。邓南遮逃到的里雅斯特，并打出法西斯主义的旗号。

意大利工人战后在社会党的领导下展开罢工斗争。1919年，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者达55.4万人；1920年工人运动的声势更浩大，全国举行罢工2070次，参加者猛增到231.4万人。工人们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且要求由生产者管理工厂。他们勇敢地占领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有的城市里，工人在议会大楼上竖起红旗，把国王的照片取下来，把印有铁锤和镰刀的招贴画贴上去。工人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在意大利农村，从自发的抗租、抗税斗争到以退伍军人为主的占地运动蓬勃兴起。仅1920年4月，全国上百万农民和退伍军人占领了191户贵族和大地主的217万公顷的土地。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担心局势难以控制，于1920年9月与社会党首领谈判。社会党以屠拉梯为代表的右翼把罢工作为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不敢夺取政权，并轻易地与政府达成协议，使工人的革命热情受到挫折。1921年1月，以葛兰西为首的左翼退出社会党，建立共产党。但共产党力量还弱小，未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要影响。而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势力却迅速崛起。

墨索里尼1883年出生于一个铁匠家庭，早年倾向于社会主义，参加意大利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墨索里尼公开支持政府参战被社会党开除。1914年10月墨索里尼参加了意大利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第二年，该组织更名为“革命干涉运动法西斯”，并在米兰建立全国性组织，墨索里尼成为其核心人物。意大利参战后，墨索里尼应征入伍。战后，墨索里尼决定重建法西斯组织。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组织法西斯战斗团，提出欺骗性的社会改革纲领蛊惑人心，如建立共和国，废除义务兵役制和爵位，没收非生产资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定最低工资，增加工人抚恤金和养老金，增课大资本捐税，没收教会地产，土地归农民，实行普选等。开始时，参加法西斯组织的人还不多，法西斯的影响还不足以同社会党、人民党相抗衡，垄断资本、封建残余势力和权势集团对它也存有戒心。墨索里尼资助逃到的里雅斯特的邓南遮，并借助邓南遮的力量扩大法西斯的影响。1920年后，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力量发展迅猛，墨索里尼利用政府、企业界、王室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加强投靠、迎合统治阶级，宣称法西斯战斗团要“把意大利从共产主义的恐怖下拯救出来”。法西斯战斗团队员身穿黑衫，破坏工人集会，捣毁社会党活动的中心，警察对此熟视无睹，企业界暗中给以资助，法西斯战斗团乘机扩大实力，1921年5月，战斗法西斯成员已近19万人。1921年11月，法西斯党正式成立，到1922

葛兰西（1891~1937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领导意共国会党团工作。1926年被法西斯逮捕，1928年被判20年徒刑，饱受折磨，于1937年病逝。主要著作有《狱中札记》《狱中书信》。

年发展到三十多万人。1922年7月，法克特政府发生危机，邀请法西斯党参加政府。8月，社会党发动全国总罢工，抵制政府这一行动。由于总罢工组织得不好，此起彼落，行动不统一。法西斯党乘机打击工人运动，掌握了对米兰市的控制权。原先，墨索里尼声称，法西斯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其目标是要建立秩序、纪律、国家权威，使意大利重新强盛起来。现在墨索里尼不再认为法西斯只是一种精神力量了，而且也不满足于和自由党联合组阁了。10月22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法西斯党的大会上，墨索里尼宣布，不管是政府给我们权力，还是我们去夺取，我们要向罗马进军。于是，由三万名法西斯行动队员分成四路大军进逼罗马。

10月27日晚，惊惶失措的法克特政府决定在罗马实行军事戒严。但年轻的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不肯在戒严令上签字。他听说军队对法西斯党抱公开同情的态度，怀疑政府军的力量，担心戒严令会危及王室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法克特政府被迫辞职。10月29日晚，墨索里尼到达罗马，国王任命他为首相。31日墨索里尼组成第一届法西斯政府，法西斯党终于上台执政。

墨索里尼执政初期，法西斯党在议会中只有35个席位，社会党和人民党在议会中占据着43.2%的席位。在14名内阁成员中，法西斯分子仅占4人。这表明虽然墨索里尼攫取了政权，但尚立足未稳。为了实行专制统治，墨索里尼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同垄断资本的关系，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加强对党政大权和法西斯武装的控制，解散所有的党派武装和由四万人组成的皇家卫队，法西斯战斗团成为国家正规的武装力量。为了使法西斯党成为议会多数，墨索里尼强迫议会通过新选举法，规定任何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只要票数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席位，剩下的三分之一席位按得票比例分配给其他政党。1924年4月举行议会选举，法西斯党获得65%的选票，控制了议会。墨索里尼为巩固其统治，除扩大法西斯党的组织外，还在青少年中建立法西斯组织。法西斯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群众和其他政党的强烈不满。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众议员马泰奥蒂出版《法西斯真相》一书，把墨索里尼上台前后的几百件罪行揭露无遗。6月10日马泰奥蒂被害。这一罪恶行径在意大利全国引起强烈反响。6月15日意大利民主派的150名议员退出议会表示抗议，并组成阿芬丁联盟（传说古罗马平民同贵族斗争时退据阿芬丁山岗），要求国王解散法西斯议会和政府，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以葛兰西为首的共产党主张阿芬丁联盟召开反法西斯全体会议，宣布成立人民议会，同法西斯议会相对抗，并举行反法西斯总罢工，但这些倡议为阿芬丁联盟拒绝。墨索里尼政府一方面坚决否认自己同刺杀案件有任何牵连，并把所有涉嫌官员免职，同时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禁止反对派集会。法西斯政权在渡过这次危机并得到王室和教廷的支持后，就加紧向革命力量反攻倒算。1925年1月，墨索里尼在议会公开宣布以武力镇压反法西斯活动，并连续几次改组内阁，把政府中的非法西斯大臣全部排除在外，建立法西斯的一党专政；1925年5月16日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宣布取消集会和结社自由；6月20日颁布《法西斯新闻检查法》，取消言论自由；12月24日颁布《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授予墨索里尼独裁权。1926年1月颁布政府具有制定法律权力的法令，11月借口发生谋刺墨索里尼事件颁布非常法令，宣布取消国家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1927年颁布劳动宪章，宣布

罢工是刑事犯罪行为。接着成立总体国家，由 13 个大的职业公团组织组成，其中六个代表商业、金融、农业、工业、海空运输、陆地运输的工人，六个代表这些领域的雇主，第十三个是专业人员和知识界。到 1934 年职业公团增加到 22 个。1928 年 12 月颁布《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规定政府首脑和法西斯委员会首领由墨索里尼一人担任。到 1929 年 4 月，作为政府首脑的墨索里尼一身兼任内阁 13 个部中的内政、外交、陆军、海军、空军、职团、殖民和公共工程八个部的大臣。墨索里尼还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树其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在法西斯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使法西斯党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墨索里尼还宣称总体国家是“超阶级的，不是维护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质上是在“阶级合作”、“民族利益”的旗号下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建立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反动，是战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形势下的一股逆流。

第五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

经济的飞速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对外扩张的机会，而且为它在经济上开辟了空前繁荣的道路。在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积极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日本商品大量涌入亚洲市场，在中国、印度、南洋等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欧洲货。日本在其他地区的出口也有大幅度的增长。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日本生丝以及各种商品的销路旺盛起来，协约国俄、英、法等国也开始向日本订购武器、军需品和食品。日本出口贸易取得了迅速发展。从 1915 年到 1918 年，日本对欧洲的出口额增加 60%，对亚洲增加 125%，对南美增加 629%，对非洲增加 1002%。这样，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一直是入超的贸易收支，从 1915 年起开创了大幅度出超的记录，出口额的增长直线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期间，日本对外贸易额共增加三倍，出超额总计达 14 亿日元。由于战时交战各国的船只大量被击毁和受到海上封锁，日本又成为国际海运的主要角色。日本船只活跃在地中海、大西洋甚至南北美洲地区的海洋上，从中获得大笔贸易以外的收入。贸易以及其他种种收入，使大量黄金源源流入日本。日本的黄金储备 1914 年为 3.5 亿日元，到 1919 年底已超过 20 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输出资本，仅给英、法、俄的债款总额为 5 亿日元。战争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使日本从战前的入超国变为出超国，由债务国（至 1914 年日本的外债为 11 亿日元）变为债权国。

在军事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对德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日本出兵占领了德属太平洋岛屿（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霸占了中国的山东。1915 年，日本政府又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极力争取远东地区的霸权。

对外军事的和经济的扩张，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工业投资，加速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日本工业从 1915 年特别是 1916 年起，完全摆脱了战前的萧条现象，出现了以出口工业和造船业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热潮。1914~1919 年，企业投资从 25 亿日元增加到 400 多亿日元；公司总数从 16,858 家，增加到 26,280 家；雇用五个工人以上的工厂从 32,000 个，增加到 44,000 个；工人由 94.8 万增加到 161 万。同期，工业总产值由 13.4 亿日元增至 65.4 亿日元，差不多增长了 4 倍。

战时，日本的所有工业部门都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其中制造工业部门的发展比采掘工业部门迅速，重工业的发展比轻工业迅速。大战前，日本的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工业，是以国营炼铁厂和兵工厂为中心，民间重工业也主要依仗陆海军和铁道部门的订货来维持，这使得各种重工业都处于财阀企业的垄断之下。大战期间，民办重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产品也转向民用方面。同时，各财阀也争先恐后地创办新企业打入主要部门，从而加剧了竞争，促使重工业迅速发展起来。重工业中以造船业发展得最快。1914 年日本建造 79 艘轮船，共 82,800 吨，1918 年激增到 443 艘，共计 540,500 吨，增加近 6 倍，使日本造船工业从战前的世界第六位上升为世界第三位。造船业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发展。战争期间，原有钢铁企业进行了扩建，并在 1915~1918 年间新建了年产量 5000 吨以上的 32 家钢铁公司。1917 年日本政府公布了钢铁奖励法，对于民办炼铁厂的新建、扩建，给予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和征用土地等特权。钢铁产量大幅度增加。1914~1919

年，日本生铁产量由 30 万吨增为 61.3 万吨，钢产量由 40 万吨增为 81.3 万吨，自给率分别达到 48% 到 73%。电力业也急剧发展起来，从 1913 年到 1919 年间，动力用电增加 4.3 倍，1917 年电动机的马力数超过了蒸汽机的马力数。化学工业也是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战时，一向从德国进口的染料、药品断绝了，加上亚洲、非洲对化工产品的需求增大，资本家竞相向化工企业投资，生产染料、炸药、甘油等的一系列新企业被建立起来。

在轻纺工业方面，因出口的需要得到迅猛的发展。棉纱增长了 4 倍，棉纺织品增长了 7 倍。丝织业由于向美国的生丝出口激增而繁荣起来。丝产量增至 1.7 倍，金额增到 5.2 倍。

由于工业的迅猛发展，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变化。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农业产值为 14 亿日元，工业产值为 13.7 亿日元，农业产值高于工业。到 1919 年，农业产值增为 41.6 亿日元，工业产值增为 65.4 亿日元，开始显著地超过农业，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过，在工业中，重工业尽管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其基础还是薄弱的，轻工业仍然占主要地位。1919 年，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产值中占 70% 以上，其中纺织工业就占 47.9%，而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各占 10% 左右，钢、纺织机器还有赖进口。战后不久，在战争期间畸形繁荣的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危机。整个 20 年代日本经济基本上呈现萧条。工业方面，1919 年生产指数为 484（以 1914 年为 100），此后逐年下降，1922 年降至 399.5。1923 年开始回升，但速度很慢，至 1928 年才回升到 500。战后由于政府一直推行把农业基地移往殖民地的政策，农业生产没有出现好转。1920~1929 年，农业总产值一直低于 1919 年的水平。主要农作物稻米的产量，除 1927 年略高于 1919 年的水平外，其余年份都低于 1919 年的水平。国内经常存在着 100 万人的失业和半失业大军。对外贸易增长缓慢，20 年代每年贸易入超徘徊在 1.87 亿~7.3 亿日元之间，致使黄金储备濒于枯竭，外汇比价不断跌落，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以高利率借外债。1923 年 9 月 1 日，发生了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大地震，震级 7.9 级，受害人口达 340 万，死伤人数近 20 万，受震两地绝大部分工矿企业受到摧毁或损害。财政损失达 100 亿日元。政府为了挽回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对受损害的资本家采取了经济措施，半年内发放了 17.3 亿日元的赈灾支票贴现和贷款。政府的大量贷款援助，使日本经济逐渐摆脱停滞状态。1925 年，日本工业产值和出口额超过了 1919 年的水平。

为了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扭转外贸恶化的局面，在政府的推动和资助下，日本工业中广泛推行产业合理化措施，大批吞并中小企业，合并同行大企业。20 年代，日本财阀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日益加强，较重要的卡特尔组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7 个猛增到 1929 年的 31 个，钢铁、制铜、煤炭、纺织、制糖、面粉等工业基本上被财阀所垄断。

抢米风潮和政党内阁的建立随着大战时期工业的急剧发展，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大大加速了。在各个部门中不断出现靠投机博得巨富的暴发户。在主要产业部门中，大产业资本和大金融资本愈益结合，形成实力雄厚、对外具有竞争力的大垄断资本。资产阶级的垄断利润高达 200%~300%，最高的达 600%。依靠战争养肥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日本的国民经济，在工业、贸易、交通和银行各方面都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战争繁荣之中，日本垄断资本就以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个财阀为首，正式成立。

战争使得日本资产阶级地主发财致富，却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贫困和灾难。日本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大大增加了。由于物价暴涨和资本家克扣工资，工人生活每况愈下。据统计，1917年工人工资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率，实际工资下降了30%。农民处于封建剥削之下，很多人失地破产，被迫流入城市做工，或沦为佃农。日本的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加上战时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使粮食供应日趋紧张。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却利用战争和饥荒，大做投机生意，囤积居奇，使米价扶摇直上。1918年春，稻米每升二角，到夏天上涨到五角五分。米价上涨，严重地威胁着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于是，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就急剧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1918年夏天，一场饥民自发的抢米暴动在日本发生了。7月23日，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从事搬运工作的渔家的主妇们，首先起来阻止本县所产大米运往外地。8月3日，富山县西水桥町渔家妇女两百余人包围米店，并与赶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由此开始了震动全国的群众性的抢米暴动。次日，东水桥町群众也奋起捣毁米店，把奸商囤积的大米抢夺一空。从西、东两水桥町开始的抢米暴动，如一股烈火迅速扩及远近各村。但8月3日到9日，尚限于富山县境内。从8月10日起，暴动越出了富山县境，从农村扩展到城市，进而又扩及全国小的町、村，像名古屋、大阪、神户、东京、横滨等大城市也被卷进激烈的暴动中来，形成了米骚动的高潮。从8月下旬开始，运动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下逐渐低落。这场前后持续三个月之久的群众革命暴动，波及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参加者达一千万人以上，包括工人、农民、渔民、城市贫民、学生、职员等各个阶层，连一部分海军士兵也参加了暴动。斗争也不断深入，从包围米店、焚烧奸商富豪的房屋，到捣毁警署，同军警展开搏斗和工人罢工，而且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这说明，米骚动由经济斗争开始，最后已具有了反对天皇和资产阶级反对统治的政治斗争的性质。

米骚动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群众大暴动，但毕竟是工农劳动大众反饥饿、反压迫的自发运动。由于缺乏组织领导，暴动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然而，有力地打击了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

米骚动被镇压后，日本工农运动仍继续发展。1920年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工人罢工斗争日益带有群众性。同时，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迅速增长起来。1920年日本发生了三千多次租佃争议。领导农民运动的很多人是受过十月革命影响的复员军人。在农民运动中，成立了以佃农为核心的农会组织“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农民开始走上了有组织的斗争道路。

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感觉到必须建立本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米骚动后，社会主义团体在日本不断建立起来。1922年7月15日，经过片山潜、渡边政之辅、德田球一等人的努力，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反动当局通过“治安维持法”等反动法令，对日共及其他工农团体进行镇压，但日共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推动日本革命的发展。

随着垄断资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1918年9月组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内阁。原敬是政友会总裁，号称“平民宰相”，其内阁成员除陆军、海军和外交三大臣外，

其余均是政友会成员。1924年1月,代表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宪政会、政友会同由国民党进步派组成的“革新俱乐部”举行会谈,组成“护宪三派”。随后,“护宪三派”在“坚决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和“整顿行政财政”的口号下发动了护宪运动。在1924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护宪三派获得大胜,组成三派联合政府。

三派联合政府执政初期,在对人民的斗争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某些试图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1925年3月通过了“男子普遍选举权法案”,规定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都享有选举权,使选民人数从300万猛增到1200万,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在经济上实行旨在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的紧缩财政的方针,将1925年财政年度预算缩减2.5亿日元,并裁减政府机关官吏。在军事上,将陆军25个师团裁减了四个,并剔除了许多武士出身的旧军官,提拔了一批城乡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官。陆海军军费也作了大幅度的削减。在外交上,因为有求于美英两国的资助,不得不相应地作些妥协。1924年6月~1927年4月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推行所谓的“币原外交”。主要内容是:协调与美英的关系;1925年1月正式承认苏联,恢复两国邦交和通商关系,并把军队撤出库页岛北部。在1925~1926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中国关税问题和治外法权问题的会议上,虚伪地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表示接受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实际上却强迫中国另订对日本有利的特别税率。“币原外交”在国内遭到了大资本家和政友会的激烈攻击。1927年3月,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内阁辞职。4月,政友会总裁、长州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并兼任外相。田中内阁企图以强硬的内外政策加强统治。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对政治犯实行死刑。1928年3月15日,田中政府在1道3府27县同时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大逮捕,被捕入狱的达一千六百余人。在外交方面,田中内阁积极鼓吹武力扩张,并阴谋策划对华军事侵略。1926年6~7月,田中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主旨是研究国际局势和制定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的内容向天皇写了一份报告,史称“田中奏折”。奏折明确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奏折指出苏联和美国都是日本推动对华政策的障碍,日本必须作好与之交战的准备。“田中奏折”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冒险的指导纲领。但田中政府的内外政策遭到了国内外激烈的抨击,1929年7月,田中被迫下台。

第六章 20 年代欧洲秩序的调整

20 年代，欧洲与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代。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各大国的实力对比没发生根本变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仍构成 20 年代欧洲国际关系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基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产物，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诸多矛盾，孕含着不稳定因素。不仅德国等战败国对强加于它们的凡尔赛体系十分不满，一有机会就想修改这一体系，冲破其束缚，就是在战胜国之间也矛盾重重。英国虽保住了海上霸权，但对法国暂时取得的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耿耿于怀，希望通过抑法抬德来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英、法之间在欧洲、中东和北非等地也均有利益冲突。美国不甘心在巴黎和会上一无所得被排除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局面，时时想着利用英、法、德之间的矛盾，伺机插手欧洲事务，并希望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与英、日对抗的能力。这些矛盾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内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大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兴起，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稳定因素增长。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资本主义各大国与苏联之间，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围绕是维护还是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巩固还是改变本国在该体系中的国际地位，以及战后和平问题，通过国际会议、多边或双边谈判、签订条约等形式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解决凡尔赛体系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内进行局部调整，维持战后的欧洲国际秩序与战后国际和平的局面。这一系列活动构成 20 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德、法、英矛盾的调整

德国赔款问题与鲁尔危机 战后欧洲的主要矛盾仍是战败国德国与以法、英为首的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德国战败，但并不甘心于屈辱的战败国地位，而法、英、美等战胜国对德国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它们之间争夺新的欧洲霸权的既微妙又激烈的斗争。

战后欧洲矛盾主要围绕着德国赔款问题展开。由于巴黎和会虽达成了德国赔款的协议，规定德国 1921 年 5 月 1 日前交付 200 亿金马克的赔款，并决定成立赔款委员会解决赔款问题，但对赔款的总额、赔款的方式、赔款期限及赔款如何在战胜国之间分配等重要问题未作具体规定，致使战后德国赔款问题成为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战后欧洲国际社会围绕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斗争。

作为德国主要宿敌的法国，希望从德国榨取最大限度的赔款，一方面削弱德国，使之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补偿自己在战争中的巨大损失，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大国地位。一向搞大陆均衡政策的英国，虽然也希望得到赔款，但它不愿过分削弱德国，希望德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既可以为英国商品提供较为广阔的市场，又可以以德抗法，保持欧洲大陆实力的均衡。而美国则反对向德国索取高额赔款，因为它担心，一旦德国经济因此而解体，无力支付赔款，那末，英国和法国就会以此为理由不向美国偿还战时债务，美国商品在欧洲的销路也将因此受到影响。英、法、美三国都希望按自己的意愿解决德国赔款问题，因而都力图把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根据凡尔赛条约成立的赔款委员会设在巴黎。由英、法、意、比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法国代表担任主席。实际上等于是法国掌握了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因为按照规定，委员会主席可以在表决均数的情况下作出最后裁决。该委员会在 1920 年作出关于德国赔款分配比例的规定，法国得 52%，英国得 22%，意大利得 10%，比利时 8%，其余 8% 在其他协约国希腊、罗马、南斯拉夫、日本、葡萄牙等国中分配。

1921 年 4 月，赔款委员会又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 1320 亿金马克，合 330 亿美元，其中包括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到 1921 年 5 月 1 日前应偿付而尚未偿付的 200 亿金马克。1921 年 5 月 5 日，赔款委员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 5 月 12 日前作出承诺，30 年内偿清全部债务，每年支付 20 亿金马克和出口商品价值的 26%，可用现金和实物支付。如果德国不同意，协约国可出兵占领鲁尔。

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难以承担沉重的赔款负担。德国政府虽然被迫接受了赔款要求，并于 1921 年 8 月交付了 10 亿金马克，但是“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1922 年，德国遭受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同年 7 月，德国政府以此为理由，要求延期支付全部赔款。英国支持德国的要求，英首相提出允许德国延期四年交付赔款，并将赔款总额减为 500 亿金马克的建议。该建议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这样一来，不仅英、法之间的分歧加深，德、法之间的矛盾也激化，法国准备诉诸武力。

1923 年 1 月 11 日，法国不顾英国和美国的反对，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理由，联合比利时，出动 10 万法比军队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造成 20 年代最为严重的、最为人瞩目的欧洲冲突事件。

法国此举的目的不仅在于以武力强迫德国履行赔款义务，而且是为了把鲁尔生产的煤、焦炭、生铁和法国洛林的铁矿石结合起来，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钢产国，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领导权建立物质基础。法比占领当局对鲁尔地区实行强制的军事管制，接管行政权，占领了矿山、企业和铁路，派法国人进行管理。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广设关卡，征收关税。对不服从占领当局者严加镇压，经常与被占领区的居民发生流血冲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关进监狱，并有约十四万五千人被逐出占领区。

面对法、比的军事行动，德国古诺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实行“消极抵抗”政策，抗议法、比违反凡尔赛和约。宣布立即召回驻两国大使，停止交付一切赔偿。同时命令鲁尔地区官员拒绝执行占领当局的一切命令，占领区的企业全部停工，企业主的损失由国家赔偿，失业工人由国家救济。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鲁尔地区的地方行政官员拒绝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煤矿工人进行怠工或罢工，铁路工人不给占领者运送煤炭，所有经过德国通往法、比的铁路全部陷入瘫痪。占领当局与被占领区的对立行动，使鲁尔危机更加深化。

鲁尔危机使冲突双方都陷入经济、政治的空前危机。在德国方面，由于消极抵抗政策的执行，使占德国煤、生铁和钢产量 80% 以上的鲁尔地区变成了“工厂的坟墓”，直接导致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一半，大量资本外流，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1923 年 2 月初，1 磅牛肉 3400 马克，到同年 11 月，竟涨到 280 亿马克，马克形同废纸。中小企业纷纷破产，普通人多年的积蓄荡然无存。失业工人达 500 万，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罢工浪潮此伏彼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严重的社会动荡使德国再次出现革命危机。危机迫使坚持“消极抵抗”政策的古诺政府下台。1923 年 8 月 13 日，组成施特雷泽曼政府。组阁伊始，面对普遍存在的革命危机，施特雷泽曼惊呼，“如果不放弃消极抵抗，它就会使我们布尔什维克化。”新政府宣布停止“消极抵抗”，工人斗争仍在继续。10 月，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成立工人政府，汉堡工人的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德国的革命危机给德、法两国的政局都造成严重威胁。

法国也没从占领鲁尔中捞到一点好处。由于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从鲁尔进口的煤和焦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法国的生铁产量因此下降了 35%，经济受到严重损害。此外，占领鲁尔期间法国支付高达 10 亿法郎的占领费，加重了财政负担，法郎贬值 25%，执行冒险政策的普恩加莱政府，也在朝野上下一片强烈谴责声中倒台。

英美两国担心鲁尔危机会导致德国经济陷于崩溃，出现革命危机。因而，它们分别向德国和法国双方施加压力，要求尽早结束鲁尔危机。英国向法国发出照会，声称如不撤兵，英国在赔款问题上不再支持法国，美国也采取与英国相似的立场。为了迫使法国就范，在法国财政的危急关头，英美乘机向金融市场大量抛售法郎，造成法郎贬值，加深法国的财政困境。与此同时，英国要求德国停止执行“消极抵抗”政策。

鲁尔冒险是法国谋求一战后欧洲霸权的一次尝试。鲁尔危机使法德双方面临政治经济危机，加上英美两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施加了强大的国际压力，使得法、德两国政府对各自的立场和策略以及对方的立场和策略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它们都不得不放弃原来所坚持的立场和策略，改行一条更为现实的解决问题的道路。1923 年 9 月，德国结束了“消极抵抗”，两个月

后，法国也同意由两个国际专家委员会来重新研究德国赔款问题，这就为美国插手赔款问题提供了方便。

道威斯计划 美英两国早就不满足于法、比控制的赔款委员会，希望有机会插手德国赔款问题。1922年底，美国国务卿休斯就曾建议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赔款问题，当时英、德表示赞同，法国反对。鲁尔危机之后，法国为形势所迫转变态度，以从美国得到贷款渡过财政难关为条件，接受美国建议。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决定成立由美、英、法、比、意五国代表参加的两个专家委员会，一个负责研究稳定德国金融、平衡德国预算问题，另一个负责确定德国外流资金数目和返回途径，两个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重审德国赔款问题。关于赔款问题的决定权就这样转到美国手中。

1924年1月10日，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1865~1951年）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在伦敦开始工作。4月提出关于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同年8月，接受赔款的各协约国代表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正式批准专家委员会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即“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主要精神是，首先稳定德国的金融，复兴德国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赔款。而赔款数目的确定应考虑德国经济的承受能力。计划规定，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贷款，帮助德国稳定金融恢复经济。对于德国赔款的总额，道威斯计划没作明确规定，只规定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即1924~1925年度赔款额为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五年后增至每年25亿金马克。支付赔款的来源是德国工业企业和铁路的利润，以及关税和日用品的间接税。道威斯计划还规定，德国的财政经济由以美英为首的协约国赔偿事务总管监督。计划还要求德国应该恢复经济统一，任何外国组织不得妨碍德国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法、比从鲁尔撤军。德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德、法双方也达成了法、比在一年内撤军的协议。1924年9月1日，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1925年7月，法、比从鲁尔撤军。

鲁尔危机的结束及道威斯计划的通过与实施，对当事国德国和法国两国，以及战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均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后的15年中，德国从美国和英国得到200多亿金马克的贷款，同时期，德国支付的赔款数仅为110亿金马克。大量的贷款流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起死回生。1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即已回复到战前水平，1929年再次超过英、法，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为其政治上的复兴及最后撕毁凡尔赛和约打下了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法国在1919~1923年间因凡尔赛和约而获得的欧洲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打击。鲁尔危机说明，法国无力独担维持和平、管辖欧洲的重任。而道威斯计划又使法国丧失了赔款委员会中的主动权，把对德国赔款问题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美国和英国，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再次跌落。美国和英国却从鲁尔危机和道威斯计划中获得好处。大量美元流入德国，加强了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及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影响。英国的联合美国、打击法国、扶植德国的欧洲均衡政策也因此得以实施。道威斯计划执行以后，欧洲的紧张局势出现缓和，这是协约国通过道威斯计划减轻对德国的压力，帮助德国经济复兴，调整凡尔赛体系而出现的必然结果。

杨格计划道威斯计划缓解了因赔款问题而造成的法德尖锐矛盾及欧洲国际关系紧张的局面，但是它并没有彻底解决赔款问题。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纠纷和国际调解仍在继续。道威斯计划只规定每年赔款数额，但对总赔

款数额没有明确规定，在赔款操作程序上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德国在支付赔款的同时，还要支付大量贷款利息，这也是一项不小的负担。

1928年，德国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1929年2月，以美国金融家欧文·杨格（1874~1962年）为首的新的专家委员会组成，讨论德国赔款问题。同年6月，杨格委员会制定出新的赔款方案，即“杨格计划”。该计划于1930年1月海牙会议批准生效。

杨格计划规定，德国赔款总额为1139亿金马克，比原定总额减少20%，59年还清。每年赔款约20亿金马克。每年赔款数额的三分之一为无条件必须赔偿款项，其余部分在困难的条件下，可延期两年支付，付清赔款的最后年限为1988年。杨格计划还取消了协约国对德国的财政经济监督，取消赔款委员会。赔款的一切结算事宜由美国操纵的国际结算银行办理，赔款必须用外国货币支付。

杨格计划实行仅仅一年，就被经济危机所打断。1931年6月，面对德国经济的严重困境，德国总统兴登堡致函美国总统胡佛，声称德国财政困难，无力还债，请予延期支付赔款及其他债务。美国总统担心德国的经济崩溃会影响欧洲政治经济秩序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利益，因此，胡佛总统照会协约国政府，宣布从当年7月1日起，赔款及一切政府之间的债务延期一年偿付，但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此为“胡佛延债宣言”。同年7月23日，主要协约国及德、意、日等国在伦敦会议上通过延期一年偿付债务的决定。

但是，德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一个由银行家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通过了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莱顿的报告，认定德国的国际支出必然会损害德国的财政稳定。1932年6月，有关各国在洛桑开会，再议德国赔款事宜。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数削减到30亿金马克，但批准这个协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妥善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勾销或削减所欠美国的任何债务，洛桑协定最后未获批准。然而，德国从此不再支付赔款，各国也不再谈论偿还债务，贯穿整个20年代的赔款和战债问题就此不了了之。

德国赔款问题是20年代最重要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列强之间，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多次展开冲突与协商，从而也带来了一次次对凡尔赛条约的调整补充。总的调整方向是减轻对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处罚，打击战后初期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抑法抬德。德国因此得以逐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经济束缚，实现经济复兴，为其最终用武力挣脱凡尔赛条约提供了条件。

第二节 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调整

热那亚会议 一战末期,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在俄国诞生的时候,西方列强均视之为洪水猛兽。1918~1922年,英、法、美、日等列强打着“保护俄国”的旗号,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年轻的苏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新生的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敌视对峙并没有因武装干涉的失败而消失。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战利品而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但在反对社会主义苏俄的问题上却异常一致,它们不仅把苏俄排斥于和会之外,还在和会上作出了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保留德国在东线的军队,建立由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组成的反共产主义的“防疫地带”的决定,以防止俄国革命影响扩展。巴黎和会甚至批准了反苏武装干涉的计划,扮演着武装干涉苏俄的大本营及司令部的角色。

巴黎和会以后,西方各国仍对苏俄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意,唯恐苏俄革命的影响扩散,导致世界革命。与此同时,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围剿和敌视挑衅,苏俄领导人也有苏俄被“资本主义包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心态。苏俄与西方世界之间这种彼此的敌意和不信任深刻又持久,严重地影响着一战以后的国际关系。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俄开始转入和平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了巩固苏维埃国家的中心任务。为达此目的,苏俄需要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交往,也需要西方的信贷来源,因此,苏俄政府努力同周边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恢复和发展经济贸易联系。1921年3月,苏俄首先同英国签定了贸易协定,互设商务代表处,恢复两国的贸易和政治关系。随后,苏俄又同德、奥、意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至1922年底,苏俄已同11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敌对情绪,也由于苏维埃政府拒绝承担以前俄罗斯帝国的债务,并拒绝归还在革命时期收为国有的外国资产,直至1921年底,西方国家还没有给予苏俄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推进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1921年10月28日,苏维埃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愿意在各大国承认苏俄,与苏俄缔结全面和约并向苏俄提供贷款的情况下,承认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并建议就此问题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谈判。

西方各大国对苏俄的建议反应强烈。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曼纳会议决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邀请苏俄和德国代表参加。曼纳会议通过了针对苏俄的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将本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别国,保障外国资本和利润不受侵犯;只有在承担本国历届政府的债务,归还并赔偿被接管的外国资产,保证财政货币流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外国政府的贷款,并得到协约国的正式承认。

曼纳会议及其决议表明,西方国家面对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苏俄这一现实,不得不作出准备承认并与之合作的选择。苏俄接受邀请,并组成以列宁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

列宁最终未能参加会议,但他为代表团制定了参加会议的具体纲领和策略。他指出,代表团去热那亚的目的是为扩大、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创造条件。

代表团应充分利用会议参加国之间的各种矛盾，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大小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好战派与和平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打破反苏统一战线，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在会上得不到，“那就在会外达到这一点”。

1922年4月，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34个国家的2000人出席会议。除英、法、意、比、日五个发起国外，所有欧洲国家和英国的自治领都派代表参加。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契切林，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阐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表示愿“在互利、平等和充分的、无条件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的政府和贸易界建立务实的外交和商贸关系。契切林还阐明了苏维埃政府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准备把一部分森林、矿藏和耕地租给外国资本经营的经济政策。

协约国要求苏俄政府承认并偿还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及地方当局所欠的184.96亿金卢布的债务；归还革命中收归国有的一切外国企业和资产，并对苏维埃政府及过去历届政府或地方当局因行动疏忽而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责任；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协约国宣称，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会同苏俄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契切林驳斥了协约国的诸项要求，并在债务问题上提出反要求，说如果协约国赔偿武装干涉苏俄而造成的总计为390.4497亿金卢布的经济损失，则苏俄同意偿付一切债务。双方针锋相对，热那亚会议陷入了僵局。

拉巴洛条约 仍受凡尔赛条约的严格束缚，在热那亚会议上备受压制和冷遇的德国，迫切希望苏维埃俄国不加入向它追索赔款的国家的行列。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根据列宁的指示，主动建议乘热那亚会议休会之机，在热那亚近郊拉巴洛重开苏德谈判，以使已经陷入僵局的热那亚会议出现会外突破。

4月16日，契切林与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互相放弃对于战争费用及战时给双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的赔偿要求；德国同意苏俄在革命时期把德国在俄国的国家和私人财产收为国有；立即恢复两国的外交及领事关系；在最惠国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拉巴洛条约的签定，是苏德外交的一次胜利。它突破了协约国孤立苏俄压制德国的局面。条约的意义不仅在于苏德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条约所采取的互相取消一切赔偿要求，恢复正常关系，密切经济联系的原则，为以后处理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开了先例。协约国指责拉巴洛条约破坏了凡尔赛和约，并照会德国声称“俄德条约中，凡与现存条约相抵触之条款，均可视为无效”。历时40天的热那亚会议没有签订一项协议而结束。1922年6月15日至7月2日在海牙继续召开的联合专家会议，也没有打开僵局取得任何结果。但是，由于苏俄在热那亚和海牙国际会议上宣传了自己的对外政策的原则，更由于苏维埃国家日益巩固和发展，西方国家不得不日益尊重苏俄的权利。1924年1月，意大利和英国步德国后尘，没有坚持首先偿还债务的立场，与苏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后，一连串的国家跟着效仿。西方大国中，只有美国迟至1933年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20年代，苏联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基本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布尔什维克党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1919年3月创建了共产国际。它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号召鼓动其他国家共产党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本国政府。随着战后初期革命高潮过去，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当前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到群众中去”，争取群众，建立统一战线。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也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西方国家致力于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苏联也在为一个又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而奋斗，积极努力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苏联共产党策略的转变及苏维埃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是2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基本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节 欧洲集体安全问题

战后欧洲安全问题 凡尔赛体系的缔造者们,在按照各国实力安排战后世界的同时,设计出一个国际机构——国联,希望由它来维持战后世界秩序及战后世界和平。

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存的政治独立,不受外来侵略”。从理论上讲,这一条规定为战后世界提供了安全保证。然而,被寄予维持和平与安全厚望的国联,不具备执行决议的“权威力量”,它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国联的意志是否能够贯彻执行,完全取决于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及各国政府对执行决议的自愿态度。按照国联盟约规定,国联确定对侵略者实施所谓“制裁”的程序既复杂又繁琐,而每一项决议措施都要由各国政府来实施,国联机构本身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强制力量,因而,国联机构在维护和平保证安全这一点上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各国政府对此都非常清楚。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是凡尔赛和约未能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欧洲各国政府,欧洲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又一焦点。

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连续两次遭到德国侵略的法国对安全的要求最为强烈。在巴黎和会上,法国提出在靠近法国的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即莱茵地区建立一个由法国控制的缓冲国。这一提议遭到深恐法国势力过分膨胀的英国和美国的否决。作为对法国安全要求的回复,凡尔赛和约除限制德国军备、解除德国武装力量之外,还规定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地区 15 年。如果德国履行巴黎和约条款,则每隔五年从莱茵地区的不同地区撤出一批军队,同时规定,莱茵河西岸 50 公里内为非武装区,德国不得设防。

法国的安全要求并未因此而得到满足。它希望英、美两国以条约的形式保障法、德边界的现状,当法国遭到德国侵略时,英、美给予援助。但这一计划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落空。法国在战后继续为维护凡尔赛体系所造成的现状和保障自身安全而努力。

20 年代,法国转向努力在欧洲寻求支持。1920 年和 1921 年,法国分别与比利时和波兰建立联盟。1924 年、1926 年和 1929 年,又与被称为小协约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缔结友好条约。法国打算依靠这一条约体系巩固其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但是,这些小国所能提供的援助和安全感毕竟有限。鲁尔冒险的失败和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使法国的欧洲霸权梦想渐趋破灭。随着 1925 年第一批从莱茵地区撤军的日期的临近,法国对自身的安全问题更加担心。

1924 年 10 月,国联第五次大会通过了旨在维护凡尔赛条约所划定的疆界,保证欧洲的现状,其中包括维护法国东欧盟国现状的《日内瓦议定书》,法国首先在议定书上签字。但英国因不愿在欧洲承担更多的义务而拒签,法国谋求自身安全的努力再次受挫。1925 年 4 月,白里安出任法国外长,他主张改弦易辙,通过和平协商,缓和法德矛盾、改善法德关系来保障法国安全。

战败后的德国努力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为了摆脱战后初期被孤立的困境,德国利用西方国家敌视苏俄、害怕苏德接近的心理,在与法国对抗的同时,争取外交上的主动,1922 年在热那亚会议上,与苏俄签定拉巴洛条约。从此,在与战胜国打交道的时候,德国手中多了一张苏俄牌。1922 年 12 月,鲁尔危机前夜,德国总理古诺曾建议法、德缔结条约,保证 30 年内互不侵犯,

该建议未得到法国的响应。次年鲁尔危机时，德国又提建议，建议法、比撤兵鲁尔，莱茵地区有关国家缔结互相保证安全的条约，再次遭到法国拒绝。鲁尔冒险的失败和道威斯计划的执行，使欧洲国际关系发生有利于德国的变化。1923年夏秋之交上台组阁，随后又连任德国外长六年之久的施特雷泽曼充分利用这一有利于德国的变化，开始了德国历史上有名的“施特雷泽曼外交时代”。

施特雷泽曼是一家啤酒厂厂主的儿子，为人严谨。一战时是自由民主党主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德国的侵略政策。一战失败后，国家所承受的灾难使他清醒，逐渐改变过去的信念，形成一套新的外交策略。其外交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将德国履行凡尔赛条约义务和逐渐施加外交压力以修改凡尔赛条约两方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战胜国之间及战胜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通过和谈外交，恢复德国的战前边界，重建德国世界强国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施特雷泽曼积极主张与协约国和解，适当满足法国关于安全保障的要求，以调整法德关系，争取法德安全互保。施特雷泽曼围绕德国的核心目标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1924年12月，德国向协约国提出加入国联，争取恢复政治上的平等，其要求得到英国的支持。1925年初，提出保障莱茵地区边界，同英、法、意、比等国家签订互相保证该地区安全的条约。1926年，与苏联签定友好中立条约。在施特雷泽曼外交的引导下，德国一步一步通过合法手段向摆脱凡尔赛条约的军事、经济条款的束缚，重获欧洲大国地位的目标前进。

战后的英国面对国内一系列政治经济难题，不愿在欧洲大陆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它希望欧洲局势稳定。从鲁尔危机前后可以清楚看到，英国不希望由法国单独制裁德国，更不愿意法国过于强大称霸欧洲。英国最担心被压迫激怒的德国与苏联结成联盟，或者是出现德国革命，从根本上破坏欧洲的均势。当然，英国也不希望德国东山再起，破坏莱茵地区的现状，破坏欧洲和平。英国最希望法德两国力量均衡，平起平坐，通过协议保证边界安全，由英国高居于法德两国之上作为保证国，再搞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

在英国的鼓励之下，施特雷泽曼再次拣起1922年古诺的建议，在原来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于1925年2月9日正式向法国和各协约国政府提交一份关于莱茵公约的备忘录。建议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一项公约，互相保证莱茵地区现状，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一切争端，互不进行战争。这时在法国，适逢以外长白里安为代表的法德和解势力抬头，法国外长白里安认为，德国的建议中至少有些部分适合法国的安全要求。于是，他在1925年6月26日给德国回复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又加上了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联和德国不仅要保证西部边界，对东部德波、德捷边界也要作出保证的内容。德国对后一项坚决拒绝。英国和美国积极支持德国，在英、美的压力之下，法国被迫放弃了要德国对东部边界作出保证的要求。

洛加诺公约 1925年10月5~16日，英、法、比、德、意、波、捷七国外长及意大利代表在瑞士疗养小城洛加诺举行国际会议，美国未派代表参加，但表示支持英国。会议草签了最后议定书和七个条约，总称为洛加诺公约。其中主要的是德、比、法、英、意五国互相保证条约，即莱茵保证公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德比和德法之间的边界维持现状，双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诉诸武力，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凡尔赛条约关于莱茵非军事区的规定应该得到遵守；1924年伦敦会议通过的道威斯计划仍然有效；

英国和意大利作为莱茵公约的保证国，一旦其规定遭到破坏，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在德国和英国两国的坚持下，条约对德国与其东部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没有作出保证。只是由德国分别与法、比、波、捷签订仲裁条约，规定缔约双方通过谈判和诉诸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一切争端。但在德波、德捷条约中没对其边界提出任何保证。洛加诺会议上，法国也分别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防备德国进攻的互相保证条约。

由于经过长期准备，各方立场较为接近，洛加诺会议气氛较为融洽。但在德国加入国联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讨价还价。英国和法国为用国联束缚德国，并防止德苏接近，要求德国无条件加入国联。而德国为了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要挟西方国家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坚持德国不能执行国联第十六条盟约的规定，即承担对侵略国进行制裁的义务。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第十六条显然是针对苏联的。施特雷泽曼在启程来洛加诺的前两天，对特意赶到柏林与他长谈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保证说，德国参加国联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保持对苏友好，不参加国联的反苏活动。就是在洛加诺会议期间，德国为了安抚苏联，也为了加强对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于1925年10月12日，与苏联缔结一项经济条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将向苏联提供3亿马克的贷款。

在洛加诺会议上，施特雷泽曼强调德国不能参加国联盟约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对侵略国进行制裁的原因是，德国已经解除武装，不可能参加直接的军事行动。如果参加间接军事行动让外国军队过境，就会发生严重的内政外交纠纷，将给德国的和平发展带来损失。而如果德国参加对俄国的经济制裁，俄国军队就会席卷全德，布尔什维克主义将扩大到易北河。而德国由于东部防御工事已拆除无以自卫。为了把德国拉入国联，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许诺，如果德国因和国联合作而面临战争，它的朋友将给予援助。“解除德国武装的人，将是重新武装它的人”。争执到最后，双方都有所让步。1925年12月1日公约正式签字时，其他与会国照会德国，对国联盟约第十六条给以新的解释，宣称“国联会员在符合本国军事情况、照顾本国地理形势的情况下”，抵御侵略行为。实际上，允许德国有保留地加入国联，德国参加国联问题就此得到解决。1926年9月10日，国联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接纳德国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同年9月14日，洛加诺公约生效。12月，协约国取消了对德国的军事管制，代之以国联主持的调查组。

洛加诺公约是在维护凡尔赛体系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它导致了欧洲大国地位的又一次变化，是对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较大调整。德国是洛加诺公约的最大受益国。通过该条约，德国在未承担任何新义务的情况下，取得了与法国及欧洲各国政治上平等的大国地位。此外，由于德国成功地拒绝无条件加入国联，使得它能够在洛加诺会议期间就与苏联缔结经济条约，洛加诺会议之后不久，又同苏联订立友好中立条约。德国因此可以周旋于英、法、苏三方之间，左右逢源，取得外交上更多的成功。此外，由于德国在条约中没有对德波和德捷边界给予保证，又为后来德国要求修改东部边界，重获但泽，占领波兰，进而东侵苏联埋下了伏笔。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曾经说：“在洛加诺看到可以保住莱茵地区，并有可能在东方收复德国的领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洛加诺条约是德国充分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搞东西方平衡外交的结果。它为德国下一个外交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洛加诺公约使英国得以最小的义务获得欧洲安全的保证，并成为法德之

间的仲裁人，进一步达到其扶德抑法，在欧洲搞均势外交的目的。法国本身的边界虽然得到公约的保证，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却因此大大削弱，降至与德国平等的地位。法国作为战胜国对于德国违约的行为，不仅再不能像鲁尔出兵一样进行制裁，其本身的安全也需要英国和意大利来保证。而公约对与德国接壤的法国的东部盟国的边界没有给予保证，削弱了法国的欧洲同盟体系。所有这些潜在的影响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

从洛加诺开会归来，法国外长白里安高兴地说，“和平终于到来了，我国的安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了保证了。”他还发表了“洛加诺精神”的动人演说。英国外长张伯伦则称洛加诺公约为“战争与和平的真正分界线”，是欧洲战后历史的“转折点”。张伯伦、白里安、施特雷泽曼还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洛加诺条约使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战败国的屈辱地位，争得了同英法的平等。洛加诺条约重申凡尔赛条约确定的德法、德比边界不可侵犯，莱茵地区非军事化，这就是说德国不能再索取阿尔萨斯和洛林，也不能进军莱茵区，法国亦不能像鲁尔出兵一样占领德国领土，德法、德比边界有了条约保证，这对于改善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德法关系，稳定欧洲局势，维持欧洲和平，应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洛加诺公约是西方各大国暂时妥协的产物，不可能像其缔约者所设想和宣传的那样，给欧洲带来永久和平。条约内蕴含着新的矛盾与斗争。随着各国实力的发展变化，矛盾更加尖锐突出。短暂的和平局面最终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所激化的各种矛盾所打断，战争取代了和平。

第四节 裁军问题与巴黎公约

裁军问题 1919年4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声称要“增进国际间的合作并保持和平”。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规定各成员国“必须将本国军备减至最低之限度,以足以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实行国际义务为限”。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年代相对稳定时期,随着各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方各主要大国竞相发展各自的军事力量,军备竞赛有增无减。1929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法国的军费开支增加30%,英国增加42%,意大利增加44%,日本增加142%。各国人民对各国政府间的军备竞赛忧心忡忡,强烈要求裁减军备。英、法、美等大国为了限制别国军备,欺骗舆论,平息本国人民的不满,也打起了“裁军”大旗。2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围绕裁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早在1920年,国联就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临时裁军委员会。由于该委员会把保证“国家安全”作为裁军的必要前提,裁军没有任何进展。洛加诺会议之后,国际社会要求裁军的呼声日高,1925年12月,国联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包括英、法、美、苏等26国代表参加的裁军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筹备在1926年正式召开国际裁军会议。

然而,西方各大国祭起“裁军”这面旗帜的目的,是想裁减别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和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英国和美国希望裁减法国的陆军,削减其作为欧洲第一大陆军国的军事力量;法国则希望通过限制建造大型舰只来削减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和海上霸权;德国则以军备平等为借口,要求重整德国的军备。在筹委会存在的七年当中,举行过多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拟定一个公约草案,但没有获得任何一个与会国的同意。苏联于1927年11月参加裁军会议筹委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上坚持全面裁军的立场,提出解散全部陆海军,销毁一切武器,取消国防部的全面裁军方案。李维诺夫认为只有通过普遍的彻底放弃军备的直接办法,才能制止战争危险,防止战争。但西方国家以国联盟约只规定缩减军备而不是彻底裁军为由,否决了苏联的建议。此后,苏联又提出大量裁减轰炸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大国实行累进裁军的局部裁军方案,也被列强拒绝。

在筹委会中,不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各国根本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就是在筹委会下设各技术小组处理的各种具体问题上,各国也是各持己见。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技术性的,但实际争执却源于迥然不同的民族利益和立场。甚至“军备”一词包括什么内容,是否要把军事潜力也包括在内这样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争执不休。裁军谈判旷日持久,筹委会一拖再拖,正式的裁军会议陷入难产。

直至1930年底,筹委会才草拟一份裁军公约法案,并附筹委会成员国的46项保留条件,交国际裁军会议讨论。1932年2月2日,在远东的战争乌云已经聚积之时,国际裁军会议才正式召开。62个国家的4000名代表云集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各大国代表抛出各式各样的裁军方案。法国总理塔迪厄首先在会上提出将重型武器和进攻型武器交国联指挥,建立国际警察部队,对破坏国联盟约和裁军公约者进行制裁的“塔迪厄方案”。英国代表从欧洲均势政策出发,支持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建议有限裁军。美国代表提出销毁重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质量裁军”的建议。这些方案反映了西方各大国的利益及它们之间尖锐对立的矛盾。苏联在全面彻底裁军方案被否决之后,要

求按比例递进裁军。德国强烈要求“军备平等”，已经在远东开始其侵略行径的日本，则反对任何方式的裁军。

经过五个月的激烈交锋，会议没有任何进展，许多小国代表因失望而愤然离去。迟至7月，会议才通过一个没有具体数字和确切比例，也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和实际约束力的裁军决议。裁军会议的第一阶段就这样草草收场，西方各大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矛盾没有解决，反倒深化。1932年9月，德国以未获军备平等权为由，第一次退出裁军会议。在德国的要挟面前，列强一片恐慌。1932年12月11日，英、法、美、意、德五国达成协议，同意德国“在保障集体安全体系内享有平等权利”，德国的“军备平等”要求和法国的“安全”要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德国重返裁军会议。

1933年2月，裁军会议复会以后，法国为限制德国，又抛出把欧洲所有军队一律改为短期服役的民兵，进攻性武器只留作维持国际秩序用的“赫里欧计划”。英国则提出把欧洲主要国家军队的人数限定在70万，德国五年后享有真正军备平等权，另设一个裁军委员会进行监督的“麦克唐纳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各国首脑支持英国的方案。希特勒为了掩人耳目，欺骗舆论，以便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也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原则上接受“麦克唐纳计划”。对德国军备最为敏感的法国，眼见德国已经磨刀霍霍，坚决要求在裁军前建立军备监督制度。法国还要求把恢复德国的平等权期限由五年延至八年，前四年为试用期，四年以后，再考虑法国裁军和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德国坚决反对，并因此于1933年10月再次退出裁军会议。

1933年底，羽翼渐丰的希特勒咄咄逼人，再次提出允许德国征兵30万，并可以拥有凡尔赛条约禁止拥有的武器等更高要求，作为恢复裁军谈判的条件，被法国拒绝。德国退出裁军会议以后，各国军备竞赛愈演愈烈。1934年的裁军会议没有任何希望和成果。同年6月，裁军会议不欢而散，裁军问题不了了之。

海军的裁军同样举步维艰。1922年各海军大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虽然达成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重要协定，规定了各国主力舰的总吨位及各国之间的比例，但是条约对潜艇、轻巡洋舰和辅助舰未作规定。华盛顿会议以后，海军军备之争再起。1927年，英、美、日三个海军强国在日内瓦召开海军会议，没能就限制非主力舰问题达成任何协议。1930年1月，五个海军强国再次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经过激烈的交锋和复杂的谈判，英、美、日三国签定《伦敦海军公约》，重新调整英、美、日三国在驱逐舰方面的比例。根据条约，日本有权建造相等于英、美巡洋舰和驱逐舰总吨位70%的同类军舰和同样吨位的潜艇。这次海军协定的成果非常有限，事后，英、美、日扩充海军军备的行动没有受到实质性限制。到1933年，美国造舰37艘，英国造舰139艘，日本造舰154艘，英、日的海军军备增扩速度大大超过美国。

与此同时，法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实力竞争也有增无减。而德国在洛加诺会议后，重整军备速度加快。1928年，德国政府拨款8000万马克，建造万吨级装甲巡洋舰。1930年，德国已建造出设计巧妙的第一艘“袖珍舰”。它虽然符合和约所限制的一万吨的规定，但是其威力强大的武力装备，却使和约作出限定的目的破产。德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军备开支，预示着日后德国海军将再次崛起。

巴黎公约 鲁尔冒险失败，接受道威斯计划和洛加诺公约以后，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大大下降。一连串外交上的失利，引起了国内各党派的不满。为

了平息国内逐渐增长的不满情绪，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也为了把美国拉到自己一边，使法国的安全有进一步的保障，法国政府决定利用各国人民对集体安全和长久和平的渴望及美国国内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发起一次和平运动，显示自己的和平意向。为此，法国外长白里安接过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和历史部主任肖特威发出的“摒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呼吁，于1927年4月6日在巴黎举行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建议法美两国缔结一项条约，保证相互永不交战。随后，6月30日，白里安又正式照会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建议缔结一项双边友好条约，谴责并摒弃战争，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一切争端。

美国与法国之间本无尖锐的矛盾冲突，但美国不愿意因单独与法国缔结条约而卷入欧洲冲突。在各国人民和平呼声日高的形势下，又不便直接拒绝法国的建议，有损于美国的和平形象。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经过半年的精心考虑与策划，决定接过法国递过来的和平旗帜，把双边的内容变成多边的条约。1927年12月28日，凯洛格回复法国政府，建议由美、法共同倡议，先由美、英、法、德、意、日六大国签署白里安提出的非战公约，然后，普遍邀请一切国家参加。美国这样做，既可以保证欧洲安全，有利于其在欧洲的投资，从欧洲的和平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又希望通过这个举世参加的非战公约，拉起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组织，与英、法控制的国联抗衡，从而达到其在巴黎和会上想要达到而未达到的做世界政治霸主的目的。

美国的回复与法国最初的意愿大相径庭。法国既不愿意在欧洲对德国和意大利承担非战义务，也不愿意放弃其和英国处于凡尔赛体系中心的位置，更不愿意把和平盟主的角色让给美国。但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白里安又不能在世人的面前拒绝以“和平”为主要内容的，又是自己最先提出来的“和平”方案。于是，法国于1928年3月26日向美国提出四个签约条件：第一，条约必须在世界各国签署之后才能生效；第二，公约不排除各国合法的自卫权利；第三，签字国对违反公约的国家不承担非战义务；第四，公约不得妨碍以前根据国联盟约和洛加诺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法国提出这些保留条件是为了使公约不了了之。一心想达到自己目的美国认为关键在于六国首先签约。于是，它抛开法国，直接与其他四大国磋商，争取它们的支持。德国由于条约由“双边”变成“多边”，把不利于德国变成不利于法国，首先表示赞同。英、意、日虽然态度冷淡，但不好表示反对，只得原则同意。英国提出保护“特殊利益”的保留条件。所谓“特殊利益”是指公约牵扯到它拥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和地区即涉及其殖民地时，英国政府拥有专门解释的权利。美国当然也有“特殊利益”需要保护，对于英、法的保留条件并不在意。最终，六大国取得一致，1928年8月27日，美、法、英、德、日、意等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亦称《非战公约》。

条约共三条内容。第一条规定，各缔约国“在相互关系方面，放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第二条规定，“在处理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冲突时，不论其性质如何，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来解决”。第三条规定，各国按各自的法律程序批准该条约。最初，苏联没有受到邀请，苏联方面指出，排除苏联参加谈判，表明发起国要把条约变成反对苏联的工具。公约签

字时，美、英、法才被迫邀请苏联，1928年8月31日，苏联宣布同意参加这一公约，但不同意任何保留条件。公约1929年7月25日生效，到1931年，共有64个国家在巴黎公约上签字。

《非战公约》宣布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战争。但是，一些大国在签约时提出了保留条件，法国提出每个国家应保留合法的防御权；英国则提出在对自己有特殊重大利益关系的地区进行自卫时，不受条约约束；美国也声明，各国有权决定是否需要诉诸武力而自卫；日本则声称，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满洲”可以进行战争。如此诸多的保留条件，等于否定了条约本身的非战内容。而条约没有任何条文规定保证和平手段的实行。条约对于不能和平解决的争端，没有提出任何处置的办法，对于非和平的手段也没有提出制裁。可见，条约本身比比皆是的缺陷和漏洞，就使得条约变成一纸空文，没有任何约束力。连条约的发起人之一凯洛格本人在私下也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

然而，《非战公约》毕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字的一项国际和平条约，它为各国摒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间的争端，奠定了法律基础，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庭对德、日两国主要法西斯战犯进行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应该说，条约是相对稳定时期和平主义努力的一项重要成果。

第七章 俄国十月革命与二三十年代的苏联

第一节 十月革命的胜利

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政治陷入混乱崩溃的困境。1917年3月，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

当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大会于3月12日晚在塔夫利达宫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最初约有五十人，后来增加到两百人左右。大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1864~1926年），副主席是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执委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了多数，布尔什维克最初只有两名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后，俄国大多数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1917年3月，全国共有555个苏维埃。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起着全国领导中心的作用。

苏维埃从一产生就以革命权力机关的身份发布命令，管理国家事务。它建立了军事委员会，负责维护革命成果；建立了粮食委员会，负责首都的粮食供应。3月14日，苏维埃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所有部队都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政治活动，监督管辖本单位的武器。苏维埃的活动表明，它已是新生政权萌芽。

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他们以苏维埃代表名义同资产阶级分子谈判，让他们出面组织政权。3月15日，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公爵（1861~1925年）出任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改名为人民自由党）领袖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二月革命后改名为民族民主共和党）人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样，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是主要政权，掌握着各级权力机构。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得到武装工农的支持，拥有实权，但它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甘居次要地位，成为辅助性政权。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

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复杂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急需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全党都期待列宁的到来。1917年4月16日夜，列宁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到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汇集在首都的芬兰车站，热烈欢迎自己的领袖归来。列宁登上装甲车，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最后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第二天，列宁在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4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报告提纲，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列宁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政权已由沙皇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手里，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基本完成。“俄国当前形势的

克伦斯基（1881~1970年），律师，1912~1917年任杜马代表，劳动团分子。二月革命后加入社会革命党，历任临时政府的部长、总理。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是“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新建的国家应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要做到这点，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认为，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推翻。因为这样做会同支持临时政府的苏维埃发生对立，会脱离群众。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只要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就可以和平地剥夺临时政府的权力。然后再在苏维埃内部开展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革命所以能够和平发展，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

列宁指出，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阻碍在当时是革命护国主义。很多人认为，为了保卫俄国革命必须护国，必须继续战争。而资产阶级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转移群众斗争视线，同时以进行战争为名组织反动武装力量，伺机镇压人民。列宁要求全党耐心地向群众解释，说明当前的战争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只有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以民主的和约结束战争。

列宁的讲话遭到孟什维克的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他们认为当前的任务应是巩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4月21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以13票对2票否决了列宁的提纲。经过列宁的宣传解释，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5月7~12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33人，代表着8万名党员。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列宁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在《四月提纲》精神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反复向工农大众说明：临时政府为了保护资本家、地主的利益，不会给人民带来和平、土地、面包；应该抛弃这个政府，把政权全部转归苏维埃。

5月1日，俄国人民第一次公开庆祝国际劳动节。但就在这一天，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发出照会，声称俄国政府“决意完全遵守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5月3日，该照会公布于众。士兵和工人看到后大为愤怒，原来政府继续战争不是它所宣传的“为了保护革命”，而是要履行沙皇政府承担下来的“义务”，实现它的侵略目标。当天下午和第二天，10万群众自发走上彼得格勒街头，高呼“打倒米留可夫！”“打倒古契柯夫！”“公布密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首都的示威游行得到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城市的响应。各地的抗议示威表明，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发生动摇，临时政府的统治陷于危机。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俄历4月，历史上称它为“四月危机”。

临时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先后解除了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职务。同时要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参加内阁。5月18日，第一届联合政府成立。李沃夫继续担任总理。克伦斯基改任陆海军部长。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担任邮电部和劳动部长，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担任农业部长。

6月1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800多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105名。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孟什维克策烈铁里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愿意夺取

政权，为国家的今后命运负责。列宁即席反驳道：“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一样，它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但是，大会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控制，通过了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大会选举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 256 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 35 名。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彼得格勒 50 万群众于 7 月 1 日（俄历 6 月 18 日）走上街头。在示威群众队伍的上空，飘扬着数千面红旗和横幅标语：“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临时政府的统治再次陷于危机。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结束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 临时政府企图用前线的战斗来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7 月 1 日，下令俄军在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发起进攻。但是，这次冒险失败了，十几天的进攻就损失了六万多人。消息传到首都后，工人、士兵群情激昂，要求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引导群众进行和平示威。7 月 17 日，50 万士兵、工人高举“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游行示威。政府从前线调回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打死 56 人，打伤 600 多人。接着，资产阶级展开了全面进攻，强行解散工人武装，捣毁党的刊物《真理报》，诬蔑列宁、季诺维也夫（1883～1936 年）等人是“德国间谍”并下令通缉，还逮捕了加米涅夫（1883～1936 年）、托洛茨基（1879～1940 年）等革命领导人。

七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公开使用暴力对付人民，表明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也不复存在，政权完全落到了临时政府手中。

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党有秩序地转入地下。为了防备临时政府的搜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秘密转移到彼得格勒郊外的拉兹里夫。8 月下旬，列宁迁到芬兰居住。在外地隐匿期间，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阐明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列宁一直同彼得格勒保持着密切联系，指导着党的工作。

8 月 8～16 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71 人，代表着 162 个地方组织和 24 万党员。会上，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 年）作了组织工作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了政治工作总结报告。大会讨论了七月事件后的形势，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由于苏维埃已被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败坏，无法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因此大会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代替。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列宁、布哈林（1888～1938 年）、捷尔任斯基（1873～1926 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1881～1938 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等 21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七月事件后，李沃夫宣布辞职。8 月 6 日，第二届联合政府成立。克伦斯基任总理兼陆海军部长。新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积极活动，公开叫嚣建立反革命军事专政。米留可夫在人民自由党中央会议上呼吁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以便永远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危险。克伦斯基政府则宣称要“实现国家政权同国内各派组织力量的团结一致”。8 月 25～28 日，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国务会议。军队的将军、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前国家杜马议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出席了会议。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认为莫斯科国务会议是为反革命阴谋制造舆论的大会，并在会议开幕的当天组织莫斯科 40 万工

人举行抗议罢工。

在国务会议上，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1870～1918年）公然要求给军官以全权来恢复军队的纪律，企图通过整肃部队建立军事专政。会后，科尔尼洛夫回到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加紧反革命叛乱的准备。9月3日，俄国军队放弃里加，德军威逼彼得格勒。9月7日，科尔尼洛夫以“拯救祖国”为名，命令克雷莫夫率领第三骑兵军团和高加索山民师向彼得格勒推进，企图武力镇压首都的革命力量，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首都的几万名工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奋起抗击叛乱。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在彼得格勒城周围构筑工事，决心武装保卫首都。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派出大批宣传员向受骗的哥萨克和士兵说明，科尔尼洛夫在利用他们反对革命。哥萨克和士兵了解事情真相后，拒绝向彼得格勒进军，并掉转枪口逮捕了军官。克雷莫夫看到败局已定，于9月12日开枪自杀。不久，科尔尼洛夫也成了阶下囚。

革命形势的形成和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临时政府的支柱——军队陷于瓦解。广大士兵不再相信政府和军官的谎言，相继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9月，列宁提出接受平分土地的纲领，并号召农民立即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先后通过决议，谴责妥协政策，支持革命方针。10月8日，刚出狱的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时，党又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即通过武装起义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苏维埃掌握。

1917年秋，俄国经济濒于全面崩溃。工业产量比上一年下降了三分之二。财政混乱，债台高筑。债务总数达到490亿卢布，国家每年应付的债务利息几乎等同于战前的国家预算。最为严重的问题是饥荒。首都居民的面包分配量从每天一磅半减为四分之一磅，有时连这点面包也没有。列宁指出，全国已处于“大难临头”的困境。

劳动人民对临时政府的统治强烈不满。莫斯科、乌拉尔、顿巴斯等地工人掀起强大的罢工浪潮。90%以上的欧俄县份都爆发了农民反地主的斗争。靠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后方的卫戍部队共约六百万人，于10月份先后表示站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一边。俄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也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照原样统治下去了。临时政府于10月8日再次改组。克伦斯基仍然担任政府总理。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名领袖都退出了第三届联合政府。为了欺骗群众，阻止革命的发展，临时政府匆忙制定条例，召开预备国会。布尔什维克党揭破这一骗局，宣布抵制这个会议。

列宁分析这些情况后，于9月向党中央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与《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明确提出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党必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为了便于领导革命，列宁于10月20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23日，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列宁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经过讨论。以十票对两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列宁起草的决议，指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在孟什维克左翼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武装起义。列宁对这种泄露党的机密的行为非常气愤，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党中央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警告，禁止他们再公开发表反对中央路线的声明。

为了顺利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一机构名义上是为了监督彼得格勒军区的活动和首都城防工作，实际是准备武装起义的公开指挥部。它的主席最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兹米尔，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波德沃伊斯基。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在其中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11月2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卫戍部队派出政治委员。4日，卫戍部队代表会议决定，各项命令必须有政治委员的签字，否则一律无效。这就使驻扎在首都的15万士兵完全处在苏维埃指挥之下。4日，彼得格勒两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员建立中央司令部，直接受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中央司令部主席是布尔什维克尤列涅夫。11月5日，拥有八万多名水兵的波罗的海舰队发表声明说：“准备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声召唤下，就手执武器支持革命”。所有的革命力量都有条不紊地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临时政府企图阻止起义的爆发。11月6日清晨，派遣士官生和警察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派革命士兵夺回了印刷厂。中午《工人之路报》出版，号召人民起来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11月6日上午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等11名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决定各中央委员不得离开起义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并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司令部。会议还委派斯维尔德洛夫等人负责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

敌对阵营也在准备搏斗。6日上午，克伦斯基到玛丽亚宫向预备国会发表演说，要求预备国会支持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克伦斯基不等预备国会对他的要求作出决定便匆忙回到冬宫。他打电话给前线司令部，要求紧急抽调可靠部队集结首都。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科夫尼科夫要求各团驱逐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去的政治委员，并命令士官生和哥萨克队伍开赴冬宫，保卫临时政府。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掌权，也害怕国内战争。11月6日，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在预备国会慌忙提出议案，要临时政府向交战国发出立即开始和谈的建议，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它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并确定具体日期。但临时政府拒绝接受这三项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陷于束手无策的软弱地位。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则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参加起义。

起义开始后，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认为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夺权更为有利，主张把最终推翻临时政府放在大会开幕之后。托洛茨基提出，政权问题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列宁对起义的拖延十分忧虑。6日晚，他从匿居地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立即发起进攻。半夜，列宁来到斯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文献》，《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2卷，第385页。

莫尔尼宫直接领导武装起义。这以后起义的步伐明显加快。7日凌晨2点，起义者占领了车站和中央发电站，7日清晨，夺取了国家银行和电话总局。克伦斯基见形势不妙，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逃出彼得格勒。

7日上午，整个首都几乎全部落在起义者手中。10点，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7日下午1点，玛丽亚宫被起义者占领，预备国会被驱散。临时政府成员龟缩在冬宫之中，妄图负隅顽抗。为了消灭敌人的这个最后巢穴，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战地指挥部，由波德沃伊斯基、布勃诺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等人负责。下午6时，大约2万名革命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包围了只有3000人守卫的冬宫。为了避免流血，战地指挥部向临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命令它在20分钟内投降，但遭到拒绝。

11月7日晚9点40分，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火，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声。接着，革命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从四面八方方向冬宫发起冲锋。在波德沃伊斯基等人率领下，起义者很快就突破冬宫的外围防线，冲进了大门。他们涌上楼梯，扫荡着士官生，搜索着冬宫的1050个大小房间。深夜1点50分，部长们隐匿的房间大门被打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拿着手枪站在部长面前说：“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并下令逮捕了他们。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由于11月7日这一天是俄历10月25日，所以人们称这次革命为十月革命。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当起义者攻打冬宫之际，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1月7日晚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625名，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79名。

代表大会开幕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意攻击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遭到驳斥后，他们发表声明退出大会。他们原以为，这样做会带走大部分代表，可以宣布这次大会没有代表性、不合法。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退出大会的只有51名代表。

8日清晨，攻下冬宫的消息传来后，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8日晚，列宁向大会作了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根据列宁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和平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罪行，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开始和谈，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约。法令呼吁英法德三国工人，以多方面的行动帮助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的事业进行到底。

和平法令通过后，列宁又就土地问题作了报告。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土地法令。法令规定，立刻无偿地没收地主土地，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都是全民的财产。法令满足了农民的平分土地要求，宣布土地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分给劳动者使用。

大会批准了苏维埃政府的组成。在酝酿时，布尔什维克曾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参加政府，但遭到拒绝。新政府遂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内务人民委员是李可夫，外交人民委员是托洛茨基，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斯大林。

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1 名成员中，布尔什维克 62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29 名。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加米涅夫。

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开端。彼得格勒起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莫斯科苏维埃于 7 日傍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工人士兵发动起义。莫斯科军区司令指挥军队对起义者进行反扑，重新占领了克里姆林宫，起义一度受挫。这时，莫斯科近郊的贫苦农民以及彼得格勒的赤卫队和水兵都赶来支援起义。11 月 11 日，布尔什维克率领起义大军发起全面进攻。经过几天激战，于 11 月 16 日清晨攻进克里姆林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革命烈火遍地燃起。广大人民特别是士兵和农民热烈拥护决心立即结束战争和实行平分土地的苏维埃。在他们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到 1918 年春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把这个阶段的胜利称作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进军”。

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它不仅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且鼓舞着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并向各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崭新的寻求解放的道路。

第二节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 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遭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强烈反对。它们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11月11日通过决议，要求成立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参加的政府，以取代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坚决反对这一阴谋，但同意在苏维埃领导机构中增加他们的代表。双方进行了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于15日决定退出谈判。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意这一决定，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辞去行政职务。11月21日，党中央推荐斯维尔德洛夫代替加米涅夫担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布尔什维克党在维护新政权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加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1917年12月9日，全俄农民苏维埃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790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9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社会革命党人305名。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共同努力下，大会战胜了社会革命党的反对，决定同工兵苏维埃合并。22日，布尔什维克党又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联合组阁的协议。七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担任农业、邮电、司法等部门的人民委员。两党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它削弱了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促进了无产阶级政权同广大劳动农民的联系和团结。

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为捍卫苏维埃政权，再次同社会革命党展开生死搏斗。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715名，其中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社会革命党370名，孟什维克15名，人民自由党17名。社会革命党控制了立宪会议。他们拒不讨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企图假手立宪会议否定苏维埃政府。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无视苏维埃的行为，于19日通过法令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23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苏俄第一个宪法性文献——《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进一步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布尔什维克党在回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攻的同时，开展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新的政权机关的工作。苏维埃首先废除了临时政府的各个部门，进而取缔了地方上的自治局、市杜马等机关。它创建了人民法院和工人人民警，以代替旧法院和旧警察。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总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第一任主席是捷尔任斯基。它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揭露和摧毁了大量反革命阴谋案件，但也不时发生滥用职权之事。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政府宣布废除常备军，建立全民武装。但很快发现赤卫队无力承担保卫国家的任务，乃于1918年初宣布组建红军。为了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废除等级制度，取消爵位；实行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宣布男女平等，国内各族人民的权利一律平等。

在经济方面，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11月21日颁布《工人监督条例》，对一切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不久，将银行、铁路、大工业收归国有，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并宣布废除沙皇和临时政府所借的160亿金卢布外债。为了统

“契卡”是“非常委员会”开头两个俄文字母的译音。

一管理和调节 国民经济,1917年12月15日在人民委员会下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奥新斯基。1918年3月,李可夫接替他担任主席。

在农村,农民根据土地法令,没收了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全部土地。在分配土地过程中,贫苦农民同富农和富裕中农展开了激烈斗争。富裕农民凭借其经济实力,要求多分土地。他们还囤积粮食,哄抬粮价。苏维埃于1918年5月9日宣布实行粮食专卖,规定全体农民必须把剩余的粮食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违者将被逮捕判刑。6月11日,决定在各村乡建立贫农委员会,开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同时,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经过这场斗争,农民得到数千万公顷的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和大量农具牲畜。贫农委员会的活动严重打击了富农的力量,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农的利益,特别是损害有余粮的农民的利益,引起农村局势的动荡。因此,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9日决定改造农村苏维埃,将贫农委员会并入地方苏维埃。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 三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俄国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他们痛恨战争,迫切要求和平。苏维埃政权充分理解和支持人民的这一心愿。在彼得格勒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就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协约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德奥集团希望减轻东西两线作战的压力,同意进行和谈。

1917年12月15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署停战协定。22日,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正式举行。苏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而德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屈尔曼却提出了掠夺性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大片俄国西部领土。

列宁考虑到旧军队已经瓦解,新军队刚开始建立,无力抗击德军的进攻,因此主张忍辱签订和约。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签订和约会加强敌人,不利于德国工人发动起义。他们主张以革命战争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提出第三种意见。他认为苏俄没有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在屈辱的和约上签字也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认为这样作可以保持道义方面的纯洁性,同时也不会威胁苏俄的安全,因为德国慑于本国工人革命是不敢进攻苏俄的。

1918年2月9日,德方宣称他们的条件是绝对必须接受的。第二天,苏俄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宣布结束对德奥的战争,并准备复员俄国的军队。德国遂中止谈判,并于2月18日向苏俄发动进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了大片土地,逼近首都彼得格勒。2月21日,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工农大众加入红军保卫苏维埃。

2月23日,党中央开会。列宁提出立即签订和约,否则他将退出政府和党中央。“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意见。托洛茨基认为全党团结一致是可以组织防卫的,但如果列宁辞职,党将发生分裂,也就无法领导这场战争。因此,他表示将在表决中弃权。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以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四票弃权通过列宁的建议。1918年3月3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3月6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辩论,大会批准了列宁的路线。会后,政府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3月14日,在新首都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坚

决反对签订和约，宣布退出苏维埃政府。

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失去大片土地。它把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划归德国；规定红军应撤离芬兰、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另外，把卡尔斯、巴统和阿尔达甘地区划给土耳其。但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国内战争的开始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协约国打起防止德国入侵和保护侨民利益的旗号，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1918年3月，英军在俄国北方港口摩尔曼斯克登陆，揭开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序幕。4月，日军在海参崴登陆；8月，英、美军队也相继侵入海参崴。武装干涉者还从南方侵入苏俄。8月，英军进入巴库。德国军队则利用布列斯特和约践踏着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这时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外国干涉军的人数不多，作用有限。

1918年春，爆发了捷克军团叛乱。这个军团是在革命前组建的，包括了近五万名在俄国的捷克战俘。苏俄退出世界大战后，允许他们经过西伯利亚到法国去，但必须交出武器。协约国极力挑动捷克士兵武装叛乱，说只有用武力打到出海口才能离开俄国。5月底，当装载着捷克军团的60列军车停在奔萨、车里雅宾斯克、海参崴一线时，捷克人发起叛乱。战火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弥漫。

捷克军团叛乱是在苏维埃处于困难时刻爆发的。年初，苏维埃解散了立宪会议和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困惑甚至反对。粮食专卖的实施和贫农委员会的建立使许多农民对苏维埃的信任发生动摇。左派社会革命党由盟友转到敌人一边，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趁机带头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各地建立起形形色色的政府。在托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在萨马拉建立了“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在第比利斯成立了“格鲁吉亚民族委员会”。在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在中亚的阿什哈巴德也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政府。1918年9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邀集各地反苏维埃集团的代表在乌法开会，成立以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也夫为主席的五人执政内阁。他们宣称执政内阁是全俄临时政府，企图协调和统一全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活动。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打出“立宪会议”和“买卖自由”的旗号，煽动中小农民和工商业者同他们一起叛乱。无产阶级政权陷于危急之中。它所控制的地区只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主要是莫斯科周围的地方。它失去了粮食和煤炭的主要产地。由于原料缺乏，铁路瘫痪，40%的工厂停了工。劳动大众生活困苦，长期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两面包，有时连这一点食品也得不到。

暗藏的敌人不断制造颠覆破坏事件。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进入德国驻俄使馆，刺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当天，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发动叛乱，组织1800名武装分子攻占中央电报局，并宣称恢复对德作战。苏维埃政府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接着又粉碎了雅罗斯拉夫等地方的暴乱。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米歇尔逊工厂讲演。当他准备离开工厂的时候，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开枪行刺，身中两颗子弹，伤势十分严重。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獗，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红色恐怖”，无情

镇压一切反叛活动。1918年9月2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统一的军营，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下，要求把各项工作都转入战时轨道。全体公民，不分职业和年龄，都必须无条件履行苏维埃政府所赋予的保卫祖国的任务。

为了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战争，苏维埃政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政府颁布了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政府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在城市，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监督。国家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总管理局对工业的管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排斥自由贸易，实行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对全国成年人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后来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是在战争和经济被破坏的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它对捍卫苏维埃政权，保证国内战争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而且在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非常措施不仅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这说明制定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失误，即“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工农武装的建设。1918年初才组建的红军到10月就达到八十多万人。9月，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领导各条战线的战斗。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总司令是参加红军的旧军官瓦采齐斯（1873~1938年）。11月30日，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防务工作。

1918年夏，捷克军团和萨马拉政府的军队占领了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以后，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党中央分析这一形势后，确认东方战线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并动员五分之一的党员奔赴前线。在短短的两个半月里，东线成立了五个军。10月初，东线司令加米涅夫率领红军解放了喀山和萨马拉，把敌人赶到乌拉尔地区。乌法的五人执政内阁见形势不妙，逃往西伯利亚。在南方，斯大林领导红军于8月和10月两次打退克拉斯诺夫对察里津（1925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后称伏尔加格勒）的进攻。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苏俄政府于11月11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命令红军收复德军占领的土地。苏维埃力量不断增大。

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邀请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在莫斯科开会，成立共产国际，以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

粉碎白卫军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 德国投降后，协约国利用世界大战结束之机向苏俄增派了大量干涉军，很快就在俄国南部集结了13万军队，并同俄国的白卫军一起向北推进。但是，干涉军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影响下发生分化，很多士兵拒绝作战。1919年4月，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舰队水兵举行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协约国看到自己军队内部不稳，被迫撤走大部分干涉军。

从原文和内容看都应译为“粮食征集制”。但“余粮收集制”的译法沿用已久，故不作改动。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2卷，第182页。

谢·谢·加米涅夫（1881~1936年）是参加红军的旧军官，不是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列·波·加米涅夫。

1918年11月，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发动军事政变，解散执政内阁，逮捕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阿夫克森齐也夫。此后，广大农民日益离开社会革命党，转而在苏维埃领导下，同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展开生死搏斗。

高尔察克自称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他得到协约国的大力支持，用外国枪炮装备了自己的25万军队。1919年3月4日，他指挥白卫军从乌拉尔山一带向西进攻。红军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下，被迫后撤一百多公里，退到伏尔加河流域。这时，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也发起进攻。在这紧急时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大批党团员和工人加入红军，后方工人决心以加倍的劳动支援前线。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下班后，莫斯科—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车库的党支部发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家放弃休息，不要报酬，自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列宁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它为“伟大的创举”。

1919年春，红军兵力增加到150万。4日，东线南路军在伏龙芝（1885～1925年）指挥下发起反攻，解放了乌法。7月，加米涅夫改任红军总司令后，伏龙芝负责指挥东线。红军乘胜追击，越过乌拉尔山区，解放了西伯利亚大部地区。1919年底，高尔察克全军溃败。高尔察克被活捉，1920年2月7日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

高尔察克溃败后，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在1919年8月夸口说，要组织14国进攻苏俄。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协约国仍把颠覆苏维埃的希望寄托在白卫军上。英、美、法给邓尼金运去几百门大炮和几十万支步枪，派去几百名军事顾问。

1919年夏，邓尼金的15万军队发起总进攻。他依仗优良的武器和剽悍的骑兵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10月13日，又攻占了奥廖尔，逼近图拉，直接威胁莫斯科的安全。俄国资本家宣布，将给第一个冲进莫斯科的团队以百万卢布巨奖。苏维埃政权处境万分危急。列宁发出“大家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几万名党团员奔赴前线。南方战线司令员叶戈罗夫（1883～1939年）和军事委员斯大林指挥红军于10月中旬转入反攻，解放了奥廖尔、哈尔科夫、基辅。1920年初，进而攻占察里津、罗斯托夫。邓尼金主力被击溃。邓尼金逃亡国外，其残部由弗兰格尔率领逃到克里木半岛。

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候，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于1919年5月发动进攻，占领杨堡，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党中央从其他战线调来军队，加强防务。8月底，把尤登尼奇赶到爱沙尼亚边境。但是，当邓尼金进攻莫斯科时，尤登尼奇重新发起进攻，在英国坦克的掩护下，10月中旬攻抵彼得格勒城下。10月21日，红军开始反攻。11月，被击溃的尤登尼奇部队退到爱沙尼亚境内，当即被爱沙尼亚当局解除了武装。1920年2～3月间，红军解放了北方重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

1920年4月，波兰军队进攻苏俄。5月初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6月，西南战线红军在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指挥下发起反击。7月，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年）指挥西方战线的红军反攻，解放了白俄罗斯领土，进而越过国界，月底逼近华沙。由于红军进展过速，先头部队远离后方，两条战线配合得也不够好，以致当波兰军队在8月反攻时，红军不得不后撤。10月，苏波签署停战协定。1921年3月18日，两国签订里加和约。在南方战线，伏龙芝指挥红军突破弗兰格尔防线，于1920年11月打下

刻赤，解放整个克里木半岛。

1920 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是，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1920 年 4 月，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不是工农苏维埃国家，而是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它接受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把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1922 年 2 月，布留赫尔率军攻克伯力，肃清滨海省的白军。10 月 25 日，人民革命军开进海参崴，把最后一支外国干涉军赶出国境。1922 年 11 月，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胜利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内战结束后的形势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夺得巨大胜利，在国际舞台上站住了脚跟。但是在转向和平建设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危机。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使两千多万人丧失生命，四百多万人伤残，国家满目疮痍。农业生产直线下降。1920年的粮食产量只及1913年的一半。更为严重的是，1920年末战争逐渐平息，但农业生产形势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农民不堪忍受愈来愈严厉的无偿征购，有意缩减生产，抗拒粮食征集。1921年的播种面积只有9030万公顷，比1920年减少690万公顷，只及1913年的86%。粮食和原材料的短缺使多数工厂无法开工。1920年的工业产值为14亿卢布，只及战前的13.8%。同年的煤和铁的产量分别是870万吨和12万吨，为1917年的28%和4%。棉织品的产量降到战前的5%。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连面包、肥皂等最起码的物品都十分缺乏。

由于经济破坏、工厂停工和饥荒流行，许多工人改行从事手工业，做小买卖，或流向农村。产业工人数量明显减少。1913年，大工业中有250万工人，到1921年只剩下140万。莫斯科在1917年1月有204万居民，到1920年7月只剩下112万。彼得格勒居民则从250万减为72.8万。工人中出现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1920年秋到1921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爆发了工人罢工和抗议游行。

农民是苏维埃俄国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的80%。在经历革命风暴之后，农村发生很大变化。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富农的力量大为削弱，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二。革命前，贫农是大多数，现在占优势的是中农。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余粮收集制。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干涉军入侵威胁的消失，农民不肯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们强烈反对征粮队的活动，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但遭到否定和拒绝。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反苏维埃暴动频繁发生。1921年，坦波夫省、沃罗涅什省、萨拉托夫省以及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地区都爆发骚乱，有不少中农参加。农民的不满影响到军队。1921年3月初，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可靠基地的喀琅施塔得爆发水兵兵变。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政策，提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水兵叛乱以及各地的农民暴动被迅速平息下去。可是，苏维埃政权的处境仍十分危急。列宁说：“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布尔什维克党注意到危机的出现，提出了各种克服危机的办法。多数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主张严格纪律，加强国家干预。1920年冬，粮食人民委员部建议由国家直接组织农业生产。春天按生产计划的规定向农民发放种子，让他们播种耕耘。秋天，按政府的指标征收农产品。对违背者予以严厉制裁，同时取消商业，打击农村集市贸易。少数人不赞成这一意见，主张放松控制，用物质利益刺激生产。这一主张被谴责为社会革命党思想。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列宁亲自过问这一问题。他多次接见农民代表团，发现“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换句话说，农民并非受人蛊惑，“自觉地”进行反布尔什维克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2卷，第184页。

列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277页。

党活动，而是感到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本能地”起来反对苏维埃。列宁逐渐认识到，在坚决镇压叛乱的同时，必须改变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农民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才能维护工农联盟和稳定政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决议，决定废止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从此，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俄共（布）十大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3月21日颁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法令。4月，政府宣布，1921~1922经济年度的粮食税额为2.4亿普特。这个数字比原定的1921~1922年余粮收集额4.23亿普特低了很多。每一农户的粮食税额取决于它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收成和财产状况。对贫苦农户给予优待。所有农户在缴纳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处理剩余的粮食。粮食税政策受到农民的欢迎。他们看到，扩大耕种面积，多打粮食就能多得粮食，生产积极性于是大大提高。

实行粮食税后，农村中有不少农户因缺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不能耕种自己的全部土地。为了尽快恢复农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5月22日颁布《土地劳动使用法》，允许出租土地，期限一般定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为六年。法令允许使用雇佣劳动力，但主人必须同雇工一起劳动，另外在承租土地上不得使用雇佣劳动力。法令还允许农民自由选择使用土地的形式，自行决定采取村社的、个体经济的或集体经济的形式。1925年11月，苏维埃政权发布新的法令，放宽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条件，把租佃土地的期限延长到12年，并允许在承租土地上使用雇佣劳动力。

1926年，土地和生产资料租佃关系，以及雇佣劳动关系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年，出租土地的数量达到1090万俄亩。出租土地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7.4%，其中多数是生产资料不足的农户，贫农户占出租土地户的82%，中农户占16%。而承租土地的农户67%是中农户，13.1%是富农户，19.9%是贫农户，其中多是富裕农户。出租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耕畜和农具。1927年，有45.1%富农和富裕中农户进行这方面活动。在雇佣劳动方面，1927年有定期雇工330万，零工250万。出卖劳动力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5.4%。使用雇佣劳动户占农户总数的19.8%，其中富农户占全部使用雇佣劳动户的3.2%，占雇佣劳动总量的20.9%，中农户占70.7%和73.4%。

20年代的农村租佃关系是在国家直接监督下进行的。具有富农剥削性质的租佃关系受到严格控制，只占很小的部分。参与租佃活动的绝大多数是中农及一部分贫农。这种关系的发展适应了当时农村发展的需要。它使有多余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的殷实农户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产量。另一方面，也使贫苦农民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改善处境，发展自己。《土地劳动使用法》的贯彻，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

实行粮食税后，国家又陆续调整了其他经济政策。在流通方面，内战后期多数产品或是凭证供应或是免费分配。商品买卖是在黑市秘密进行的。1921

1931年以前，苏联的经济年度从每年10月开始，到次年9月底结束。

1 普特等于16.38公斤。

1 俄亩等于1.09公顷。

年3月27日，粮食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关于在地方范围内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商品交换条例》，规定在地方范围内，农民完成农业税后的剩余产品可以在公民之间自由交换。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产品交换，全俄成立中央消费总社，下设众多网点。国家把工业品交给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进行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列宁当时认为，采用这种办法可以避开市场，避开私商中介人，把资本主义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之内，从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实践证明，产品交换制不符合苏俄实际情况。国家手里没有足够的工业品能够拿出来交换农产品，再加上交通瘫痪，仅有的一些工业品也常常不能及时运到地方。中央消费总社计划于1921年8月15日前拨出8105亿金卢布的工业品给地方合作社，而实际却只拨出1133亿金卢布，即不到规定的14%。另外，地方合作社机构不健全，办事效率极低，经常有各种混乱和不合理现象发生，根本无力完成产品交换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农民习惯于市场贸易，不理解也不愿接受商品交换。结果，商品交换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重挫折。政府原计划在1921年8月15日以前用工业品交换3200万普特粮食，但到10月1日只得到218万普特粮食，完成原计划的6.8%。政府设计的商品交换很快被突破，变成使用货币的商品买卖，并且超出了地方经济周转范围。10月底，列宁宣布商品交换失败。政府允许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恢复国内的自由贸易。与此同时，国家重建银行系统。在各地成立国营百货公司等机构，以活跃商业往来。政府还从信贷税收等方面鼓励和促进私营商业的发展。到1922年，私商在全国零售周转额中占到了四分之三。另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成立中央商业局和商业调节管理局，以加强对私营商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商业的发展，活跃了经济，改善了供应，使一度十分紧张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重新稳定。

在工业方面，内战后期宣布把中小工业都收归国有。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那些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本国和国外的资本家经营。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公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开办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一起组织合营股份公司。列宁强调要通过租让制发展苏俄经济改善工人生活，同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1921年7月，政府公布《租借条例》，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公民、合作社和其他联合组织。租让和租借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企业由私人经营，但所有权仍属于苏维埃国家。租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政府的法令，按时交纳租金，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1921年7月，政府通过了《关于手工业和小企业》的条例，允许私营小企业雇工20名。1925年5月，放宽限制，经特别批准可雇工100名。租让制在苏联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到1926年，全国只有65个租让企业，主要是开采北方森林的木材厂和采掘东部矿藏的稀有金属公司。著名的有德国的莫洛加木材公司、英国的勒那金矿有限公司、瑞典的哥德堡滚珠轴承股份公司、美国的哈里曼锰矿公司等，租期一般为20年。租借企业比较多，仅1924年就由国家租出6488个。但是，他们多是磨粉厂、碾米厂、榨油厂、制革厂，甚至是一些小作坊，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承租人多是原业主，合作社大约占到四分之一。租借企业的发展使食品加工业迅速恢复，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管理制度也有很大改变。原来，

国家设总管理局，统一管理各个企业。国家负责制定生产计划，提供资金，调拨原料，并把一切产品收到自己手里，统一进行分配。工厂无权决定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负责盈亏。内战结束后，政府解散了大多数的总管理局，要求各企业按部门组成托拉斯，如南方钢铁托拉斯、顿河煤炭托拉斯等。托拉斯负责管理企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政府还废除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实行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付酬的办法。合作社的管理体制变动更大。在内战时期，它归粮食人民委员部领导，一切活动由国家规定，几乎成为国家的一个供应机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合作社成为独立机构。它可以按照自定的价格采购各种农产品，也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在城乡居民中出售日用品，还可以承租中小企业和作坊。

新经济政策的采取是苏维埃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它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放弃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他们从苏俄国情出发，认识到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联合绝大多数居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点，就需发展唯一能使农民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环节——商业。从这一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规定出一条新的建设道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监督下，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

新经济政策具有重大意义。它使 1921 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新经济政策为苏俄人民指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沙皇俄国是有名的民族监狱，内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于 1917 年 11 月 15 日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各族人民拥有平等和自主权；享有完全自决乃至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部族可以自由发展。1918 年 1 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明确肯定了联邦制原则，指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于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联盟基础上，而成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

在民族自决思想的鼓舞下，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和自治共和国。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先后宣布独立，并得到苏俄的承认。乌克兰政权最初被民族主义的拉达掌握。苏俄于 1917 年 12 月 16 日发表声明，承认乌克兰独立。与此同时，乌克兰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俄罗斯工人士兵支援下，逐渐在乌克兰各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7 年 12 月 24~25 日，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哈尔科夫召开，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拉达于 1918 年 3 月成立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宣布脱离苏俄。德国战败投降后，红军开进白俄罗斯，拉达逃跑。1919 年 1 月，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高加索，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孟什维克于 1918 年 4 月宣布成立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脱离苏俄。5 月，分裂成三个共和国。直到 1920~1921 年春，才先后建立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在中亚，1918 年 4 月

建立了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为第一个加入苏俄的自治共和国。在土耳其斯坦南部，1920年4月和10月先后成立了花刺子模和布哈拉两个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巴什基尔、鞑靼等少数民族成立了自治共和国。

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后，俄共（布）中央提出要加强各苏维埃共和国间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以抗击共同的敌人。1919年6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指令，规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成立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合并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机构、财政和劳动人民委员部。1920年秋到1921年春，俄罗斯联邦又先后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条约，进一步将对外贸易、邮电等人民委员部合并。

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顺利恢复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各苏维埃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经济整体，以便充分利用各国的经济财政资源。为了具体研究这一问题，俄共（布）中央在1922年8月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不久，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方案得到某些共和国党中央的支持，但遭到格鲁吉亚党中央的反对。列宁因为生病没有直接参加这项工作。当他了解到双方争执的内容后，写信给党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反对自治化计划，认为它缩小了各共和国的权利。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在1922年10月通过决议，规定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联盟。

党中央十月决议还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盟参加即将成立的苏联。以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这一规定。他们要求格鲁吉亚作为平等的独立共和国直接加入苏联。斯大林以及俄共外高加索边疆委员会书记奥尔忠尼启则不能容忍这一要求，斥责他们是“沙文主义败类”，并改组格鲁吉亚的党政领导机构。奥尔忠尼启则还发脾气打了姆季瓦尼的支持者卡巴希泽一耳光。列宁得知这些情况后，于1922年12月30~31日，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件，批评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列宁指出，民族问题极为重要，“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在反对民族主义问题上，列宁强调“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要着重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鉴于政府机关并未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机关，列宁认为，有关“退出联盟的自由”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并不足以保护少数民族不受大俄罗斯主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52~353、352、350、355页。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52~353、352、350、355页。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52~353、352、350、355页。

义的侵害。他认为，必要时可从现有的联盟形式后退，只保留军事外交的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列宁口述这封信后不久，病情恶化，无法工作。列宁的上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组建苏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四个共和国。中亚的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由于国家制度不同，没有加入苏联，但它们同俄罗斯共和国订有联盟条约。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加里宁、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雅科夫和纳利马诺夫分别代表四个共和国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24年1月，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宪法，从法律上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固定下来。

1924年，在中亚细亚进行了民族区域划界工作。原来的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共和国不复存在。新建两个加盟共和国——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于1925年加入苏联。另外，组建了塔吉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三个自治共和国。1929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苏联发展成为由七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

国民经济的恢复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苏俄就遭遇了罕见的大旱灾，34个省的3000万居民陷于饥荒。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比较顺利地渡过了灾害，到第二年就消除了它的后果。

1922年起，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1923年，大工业的产量达到战前的35%，工人数量也有所增加。但1923年秋天，又发生了销售危机。国营工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仓库里，致使企业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工人中产生不满情绪，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罢工事件。造成销售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过大。工业品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而农产品价格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广大农民群众无力也不愿购买昂贵的工业品。另外，国家过急地采取行政措施限制、排挤私营工商业，而国营和合作社机构又软弱无力，致使商品流通不畅，市场萎缩，销售危机更加严重。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决定降低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整顿工人工资的发放，改善商业工作。1924年，进行了币制改革，使卢布的价值逐渐稳定下来，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条件。1925年4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对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决定停止对私人资本的排挤，放宽对私人工商业者的信贷条件，降低高额税率。在农村，减轻对新发展起来的农户的政治经济压力，取消对农民经商的限制，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维埃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成分活跃起来，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在农村，富农力量有所增长。1925年，富农占到全体农民的3.3%，中农占61.1%，贫雇农占35.6%。工业中，私营企业包括小工业和手工业在1925年占整个工业生产的23.9%，其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不超过15%。在批发商业中，私人资本居于次要地位，只占全部交易额的1/4。但在零售商业方面，则是私人店铺占统治地位。苏维埃政府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52~353、352、350、355页。

对这些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着各种监督和控制。

列宁十分注意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1922年底~1923年初，列宁在病中口述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和信件，阐述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

列宁特别重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认为坚持工农联盟，保证农民跟无产阶级走，不跟资产阶级走，是关系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大事。为了做到这点，列宁提出合作化计划。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合作社可以把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此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另一方面，合作化又是农民能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办法。因此，合作化计划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方法。为了发展合作社，党不仅要大力支持这个事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列宁认为，这是摆在党面前的划时代任务。现在党的工作重心应由“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说，这种改变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列宁提出的另一项划时代任务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他提议改组工农检察院，把它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模范机构，并依靠它改造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只有国家机关真正是新型的、精简的、有效率的，它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节约资金，建立大机器工业，实现电器化。

列宁还提到防止党的分裂问题。他认为影响党的稳定可能是工农“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也可能在于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关系。“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列宁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性格却太粗暴。因此，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至于托洛茨基，列宁说他“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担心，这两人的不同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党的分裂。为防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列宁主张补选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以提高党中央的威望；改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以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1923年1月，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些思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可惜，受条件限制，列宁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市场，运用民主法制加强监督反对官僚主义，文化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一国建设与

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65页。

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67页。

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67页。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38~339页。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第340页。

世界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能进行充分的阐述。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脑溢血引起呼吸器官麻痹而与世长辞。

列宁逝世后，苏联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艰苦奋斗，加快经济建设工作。1925年，谷物的总产量接近战前水平，达到7247万吨。畜牧业还低于革命前的水平。工业总产量为战前的73%，铁路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为战前的80%。国内商品流转总额大约是战前的70%。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25~1926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达到战前的93.7%。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展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只有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生产中占据优势。工业的产量比先进的欧美国家落后很多。按人口平均计算，俄国的煤钢产量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都不及美国或德国的十分之一。俄国的人均工业产量同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因此，苏联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之后，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另外，列宁逝世后谁将是党的最高领袖，成为全党最关心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受这两个问题的影响，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改造建设工作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复杂的历程。

列宁病重期间，党内民主问题成为全党共同议论的话题。1923年，党中央九月全会专门研究了党内状况。12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提到“党的机关出现官僚化”的问题，要求发扬民主制。托洛茨基认为问题比决议写的要严重得多，他写信给党中央并在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党中央执行了错误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机关上”，用党的机关“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他要求执行新方针，主张党内制度民主化。托洛茨基还说，从历史上看，老近卫军大都发生蜕化，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这番议论遭到大多数干部的反对。1924年1月，俄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谴责托派“背离列宁主义”，“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列宁逝世后，党政领导人纷纷写文章，缅怀列宁的功绩。托洛茨基发表《十月的教训》，直接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严重错误，说他们“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大为恼火。斯大林同他们联合一起，翻出旧帐，历数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到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列宁之间的分歧，指责托洛茨基企图用自己的主义代替列宁主义。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严厉谴责托洛茨基，并决定解除他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列宁所担心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未能防止，而且很快就以行政手段决出胜负。

1925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斯大林提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过，他没有说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更没有讲清实现的途径。但是，这一提法鼓舞了人民建设的信心，得到人民的拥护。代表会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在莫斯科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阐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提出要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报告。在列宁格勒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的支持下，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作了副报告。他泛泛地历数了党面临的困难：一是世界革命进程迟缓，二是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三是列宁逝世后党内未建立起集体领导。他认为苏联在“走向一个特殊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胜利不可能在苏联一国范围内，而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加米涅夫提出对斯大林的信任问题，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未就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

展开充分讨论，而对“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意图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大会肯定了党中央的路线。会后，加米涅夫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省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

党的十四大之后，斯大林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强调苏联的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不同，并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

斯大林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为了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必须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不仅能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国家。但是，斯大林未提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同世界经济发生众多联系的问题。

斯大林认为，俄国经济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因此，必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他认为，苏联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可以依靠政权力量加快经济发展。他把许多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视为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予以否定。主张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的办法快速发展经济。具体讲，一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是用行政办法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

斯大林说，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漫长的发展途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苏联不应走这条旧路。苏联可以从发展重工业开始自己的工业化。因为苏联的重要企业都是国家所有的，政府可以通过指令性计划，调动大部分人力物力资源去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斯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只要发展了重工业就是实现了工业化。至于轻工业、农业等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为发展重工业效力的部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关系无需过多顾及。

为了加快工业发展，斯大林认为必须采用行政手段保证高积累多投资。他说，苏联的建设资金不能靠掠夺殖民地和向外国借债来筹集，只能从内部，依靠自己力量积累。政府应把国有企业、矿山、铁路、银行以及贸易部门的利润尽量多地收缴上来，作为工业化资金。其次是征收农业税。第三是号召人民艰苦朴素，用发行公债等办法把消费资金转为建设资金。可是，用这些方法积累到的资金不足以应付大规模建设的需要。斯大林决定放弃原来的意见，不再要求缩小直至消灭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转而主张提高工业品的出售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用多收少付的办法向农民再征收一笔额外税，以加快资金积累。至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扩大积累的根本手段，则被冷落忽视。

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政策提出后，许多人发表不同看法。布哈林认为在当时条件下，经济建设“只能以乌龟速度爬行”。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主张大力发展农业。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认为，苏联发展工业必须“同世界市场联系”。在最近年代里，应“走农产品输出的道路”，以换取外汇，进口机器设备，推动工业发展。托洛茨基提出另一种意见。他宣扬“不断革命”论，要求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不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926年，托派分子和新反对派分子联合一起，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他们公开宣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臭名远扬的理论”。他们指责中央对富农等资本主义势力斗争不力，要求成倍地增加私营工商业者的捐税，并向富裕农民“借用”1.5亿普特的粮食。他们要求加快工业化速度，说把工业的年增长率定为4%~9%，是“彻头彻尾悲观主义

的计划”。托季联盟宣称，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已经影响到党和国家，使“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发展”，提出要“批判斯大林派制度”。1927年7月，托洛茨基进一步指责斯大林和党中央多数派走上“热月化”的蜕化背叛道路，说现今的领导集团无力组织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在必要时更换领导人。8月，党中央开会，谴责托季联盟的活动。同时，决定在12月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9月，托季联盟提出反对派政纲，其中虽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大部分是“左”倾的东西。反对派将政纲送交党中央，要求予以印发。遭拒绝后，反对派自己秘密印刷，并向党内外散发，要求全党进行辩论。10月，党中央公布了自己的提纲，并指令《真理报》出版辩论专页，刊登各种政见，其中包括托季联盟的政纲。经过全党辩论，最后投票赞成中央路线的有72.4万党员，而追随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多人。反对派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在1927年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组织几百名反对派分子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机会主义”，“公布列宁遗嘱”等口号。联共（布）中央认为托季联盟的行为已超出党章许可的范围，于11月14日开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将其他托季联盟骨干分子也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在政治上被打倒，在组织上被清除，但其错误的理论思想并未得到认真分析批判。

在党内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国家着手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27年10月，党中央全会讨论了五年计划的问题，规定发展速度为年增4%。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制定五年计划的指示，将年增长率提高为9%。根据党代表大会的指示精神，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872~1959年）集中一批专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讨论研究，最后提出两个方案，最佳方案比初步方案的指标高出2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1888~1935年）提出工业发展的指标。此时，正值推行非常措施，反对右倾，上述三个方案均被否定，甚至被视为“对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和优越性的轻视”。斯大林要求大大加快发展速度。古比雪夫迅速提出第四个方案，规定工业产量每年增加19%~20%，这个增长速度超过了托洛茨基在1927年提出的15%~18%的要求。

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5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五年计划。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苏联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开展 20年代中，新经济政策全面实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但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个是社会分化。农村中，富裕农户日益增多，到1927年大约有十万户，其中一半的富裕户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联共党领导人意见不一。托洛茨基等人把富裕农户基本都视为富农，认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猖獗，已经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布哈林等人则认为中农仍是农村的中心人物，应扶植小农经济，鼓励劳动农民发财致富。多数人害怕分化，反对分化，认为应控制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另一个问题是价格调整不好。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市场贸易开放。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希望国家少干预市场，价格能按价值法则和供需关系调整。但苏维埃担心市场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增长。同时，政府还要利用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来加速建设资金的积累。这就产生了矛盾。人们对如何调节这个矛盾，想法不一。政府受各方面影响，也拿不

出始终如一的政策。时而向农民让步，放松对价格的控制；时而打击私人买卖活动，压低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左右摇摆造成城乡供销关系和工农关系多次出现紧张情况。1925年底，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确定工业化方针，认为计划经济的力量可逐步包揽城乡一切经济活动。1926年起，政府加强对价格的控制，用它来排挤私人工商业和限制市场贸易活动。与此同时，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比上一年降低6%，而粮食的收购价降低20%~25%。这引起工农产品价格不协调，城乡关系紧张。托洛茨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无产阶级力量。他要求提高工业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更多资金。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意见，未经慎重考虑就于1927年2月决定降低工业品价格，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指导下，轻工业品本已不足，降低价格后更是供不应求，最后导致商品荒。农民有钱买不到所需商品，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情况表明，国家对工农业产品几次提价降价都未能完全调整好同农民的关系。市场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控制，影响着工业化的迅速开展。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调整工农关系转向改造小农方面。

1927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农村问题。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并指出这种过渡的基础是进一步开展对富农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说，这个过渡应是“逐步的”，因为个体私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整个农业的基础”。这种互相矛盾的决议内容，反映当时对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人认为，采取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激进办法是走出困境的途径。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后，危机立即暴露出来。1928年初，国家收购上来的粮食只有513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89万吨。斯大林认为，粮食收不上来是富农反抗造成的。1月，党和政府决定采取同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非常措施，强迫富裕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否则执行刑法第一百零七条，没收他们的粮食和农业机器，并判处徒刑。

采取非常措施后，国家收购到的粮食数量迅速上升，仅1928年第一季度就征集到450万吨，这个数量除去原来少收购的189万吨，还超过了几个月前托季联盟提出向富农借用的粮食数字——1.5亿普特（约为245万吨）。1928年党中央四月全会指出，这些粮食大都是采用同新经济政策不相容的手段得到的，如“没收余粮（完全不按照司法手续来运用第一百零七条）；禁止农村内部粮食买卖或一概封闭‘自由’粮食市场；为‘弄清’余粮而进行搜查；建立巡查队；在清付粮款和出售奇缺的商品给农民时，强行摊派农民公债；付款由邮局转汇，其中一部分以公债券或其他证券支付；对中农施加行政压力；实行产品直接交换，如此等等”。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许多富农和富裕中农激烈反抗政府，全国发生一百五十多起骚动事件。更多的人缩减耕地，破坏农具，屠杀牲畜，甚至弃地出逃，经济上自我消灭。农村形势十分紧张。

布哈林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产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定得太低，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非常措施后，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布哈林于1928年5~6月，两次上书中央，申诉自己的观点，表示不同意中央的做法。9月，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布哈林主张减慢工业化速度，把更多的资金投

到农业上去，以利工农业的均衡发展。

布哈林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李可夫（1881～1938年）和托姆斯基（1880～1936年）的支持。1929年2月9日，他们三人在党中央会议上联合发表声明，批评现行政策。4月，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斯大林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批判布哈林的观点，特别是批判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指责他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四月全会通过决议，谴责布哈林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工会领导职务。年底，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年12月，李可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1890～1986年）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时，苏联农村仍十分落后。1928年，全国只有2.7万辆拖拉机。春播作物的土地翻耕工作，99%靠畜力和人力完成，机耕地面积只占1%，大约一半的成年居民不识字。这一年的农业集体组织只有3.3万个，有40万农户参加，占全国2400万农户的1.7%。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多数是低级形式的共耕社，只进行劳动互助。

布哈林遭到批判后，斯大林决心用行政手段加快农业集体化过程。1929年6月到9月，全国有九十多万户新加入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数字几乎等于革命后12年中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总户数。但从全局看，集体化比例仍很低。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7.6%，其耕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3.6%。这很难说清1500万户中农是否对农庄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宣称农村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农民已经“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农庄了。斯大林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改变对中农和富农的政策。几天后，党中央召开全会，要求加快集体化速度，并派遣25,000名工人下乡，推进这一运动。到年底，又有240万户农户加入农庄。

1930年1月5日，党中央根据斯大林的要求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要求在几年内实现全盘集体化。这同几个月前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大不相同。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公有经济（包括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17.5%，而新的决议要求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等主要产粮区在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任务，非主要产粮区在1932年春天完成。决议还指出，占多数的共耕社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集体化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实行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

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苏联政府机关对划分富农的标准曾提出过多种标准，但从未提出明确而科学的统一规定。因此，很难说出富农的准确数字。多数苏联学者认为，1927年有富农89.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后，20多万户富农“自我消灭”，逃往城镇。到1929年秋，富农只剩下60～7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3%。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富农极力阻挠农庄的建立，散布谣言中伤农庄，纵火焚毁农庄的财产，暗杀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些富农分子制造假农庄，春天吸收贫农入农庄，剥削他们的劳动，秋后又把他们开除出去。

1930年2月1日，苏联政府通过决议，废除以前颁布的关于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的法律，并决定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它转交给集体农庄。对富农本身分为三类处置：对进行反苏活动的富农，采取逮捕镇压政策；对大富农，把他们迁徙到国家北部和东部的荒凉地区，从事伐木、采矿、开荒等劳动；对其他富农则迁出农庄地界，安置在本区的边缘地带，拨给他们一定土地耕种。官方宣布，从1930年初到1932年秋，一共有24万户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地区。苏联学者认为，绝大部分富农户都扫地出门，被驱逐到国家边远地带。总共有100万~110万农户被暴力剥夺和消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错划的中农户。

在党的号召下，农村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30年1月，加入农庄的有300万农户。2月又增加700万户新成员。集体化比例从1929年12月的20%，猛增加到1930年3月的58%。在这一惊人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都发生过火行为和严重错误。各基层苏维埃和集体化工作人员在上级严令催促和警告下，纷纷采用行政命令和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宣布，“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的地方则规定，凡拒绝加入农庄者，没收其土地，剥夺其选举权，致使一些地方被清算、被剥夺选举权者多达15%~20%。有些地区越过劳动组合，直接组织农业公社，把住宅、小牲畜、家禽等都收为公有，以致许多农民在加入农庄前屠杀牲口。仅1930年2~3月间，全国就有1400万头大牲畜被杀。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农村形势动荡不安，一些地方出现了反苏维埃的暴乱。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严厉批评“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3月14日，党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批评了集体农庄建设过程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强制跳到组织农业公社，用行政手段封闭教堂，取消市场和集市等错误做法。决议要求立即消灭这些歪曲行为。文章和决议发表后，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得到了纠正。从1930年3月开始，集体农庄数目大量减少，大约有1000万农户退出农庄。但从秋天起，集体化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60%以上的农户走上集体化道路，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这一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80%。联共中央在1933年1月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在集体化过程中，政府从多方面支持集体农庄的建设。它减免农庄的赋税，提供贷款和种子，加强农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国家加强对农庄的控制。它把农业机器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1932年，共组建2502个机器拖拉机站，拥有14.8万台拖拉机（按每台15马力计算）。机器拖拉机站为农庄提供机械服务。它通过服务，监督农庄执行国家生产计划的情况，同时要求农庄用农产品交付劳动报酬。1933年，宣布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规定集体农庄的首要义务是每年向国家交售相当数量的农产品，其中粮食的交售额占到产量的32%~43%。而国家付给的价格却低于生产成本。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和义务交售制这两个渠道，每年都能有保障地得到它所要求的粮食和农产品。

集体农庄的管理和分配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才确定下来的。开始时，很多农庄每天早上吹哨集合，然后分配任务，实行每个庄员轮流干大田、菜地、饲养、巡夜等各种劳动。分配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的农庄按人口供给一切，有的按劳动力分配，也有的按干活多少分配。为了寻求适当的体制，政府两次召集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总结农庄建设的经验。1935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章程规定，农庄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农庄和农民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和出租。农庄组织生产队，负责某一地段的全年生产，或负责饲养一定数量牲畜等其他专业生产。庄员按劳动日的多少进行分配。此外，允许庄员拥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公顷的宅旁园地，饲养猪牛等家畜家禽。示范章程的通过，促进了集体农庄的巩固。

全盘集体化运动使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富农阶级被消灭，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农业成为直接听从党政机关指挥的部门。这一变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它使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得到一定保障。实现集体化后，国家从农民手中征到的粮食不断增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为18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为2750万吨。没有再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另外，集体农庄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农业集体化是工业化运动的必然继续。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盘集体化运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错误。它违背了列宁提出的改造农民的自愿和逐步原则，使千百万农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牧民在这场变动中遭受许多本可以避免的苦难与死亡。苏联学者估计，集体化时期遭到迫害的有500万~1000万人。仅哈萨克地区，在1930~1933年期间就有近200万人死亡。而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的大饥荒使300万~400万人饿死。集体化运动中，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行政命令体制，把农民束缚在农庄里，使农民失去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甚至连迁徙自由也受到限制。政府忽视农民的物质利益，限制城乡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用超经济手段从农民身上拿走很多。所有这些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重重，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农牧业生产长期停滞落后，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五年计划的实施 苏联从1928年10月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2年底，政府宣布提前完成这一计划。1933~1937年又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被迫中断。

五年计划首先是一个向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国家有五种社会经济结构。第一种是宗法经济，即差不多完全不从事贸易往来的自然经济。第二种是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当时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活跃起来。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获得重大发展。第五种是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经济被排挤出工业和商业领域，小商品经济得到改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93%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99%。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一切经济部门都确立起来了。

五年计划规定要高速发展工业，为了保证这一要求的实现，政府实行

高积累,把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一五计划规定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为 646 亿卢布,二五增为 1334 亿卢布,其中一大部分用于重工业投资。在这期间,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人们掌握先进技术,学会生产管理。在这一口号的推动下,1935 年 8 月 30 日夜,顿巴斯的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掘了 102 吨煤,超过定额的 13 倍。此后,在全国兴起学习斯达汉诺夫,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各行各业中都涌现出一批斯达汉诺夫式的先进工作者。

一五期间,苏联利用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之机,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还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工。三个主要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札波罗日钢铁厂,以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大型项目都引进了美国、德国的设备和技术,并得到外国工程师的帮助。由于苏联本国技术力量不足,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达到外国设备的设计能力。二五期间,政府注意挖掘已建企业的潜力,同时大力发展本国机器制造业。先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新契尔克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地新建起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扩建了高尔基和莫斯科两个汽车制造厂。此后,苏联基本停止了外国设备的进口。1937 年机器进口的比重仅占苏联需求量的 0.9%。这显示苏联经济的高度独立自主性。但做得太过分,丢失了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的机会。

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六千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等。1940 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13 年增加六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战争前夕的 1940 年,苏联年产 1800 万吨钢,1.6 亿吨煤,3100 万吨石油,483 亿度电。同时,苏联工业每年给农村提供几万台拖拉机,使机耕地在全国耕地中的比例由 1932 年的 20%增加到 1940 年的 70%,初步实现了耕种的机械化。然而,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苏联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1940 年,苏联的人均产值为 510~542 美元,美国是 1886 美元,英国是 1234 美元(1937 年),日本是 554 美元。

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未能按期实现。一五计划规定国民收入增加 102%,实际只增加 60%;农业产值应增加 50%,实际下降 14%。煤炭、钢铁、石油、电力、拖拉机、汽车也没有完成计划。二五计划执行得比一五计划好,但也有许多问题。国民收入规定增加 120%,实际不到 112%,消费品增长率仅达到指标的一半。

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国民收入由 1913 年的 210 亿卢布增加到 1937 年的 963 亿卢布。1935 年,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的配售制。后来,又陆续取消了其他食品 and 所有工业品的配售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沙皇时代,四个人中就有三个文盲。经过多年努力,到 1939 年,全国识字的居民达到 87%。城市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实行了四年制义务教育。高等学校成倍增长,1938 年全苏有近 700 所,在校

学生达 55 万人。科学技术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瓦维洛夫提出了作物种类演化理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火箭理论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库尔恰托夫领导设计和研制出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列别杰夫研制出用乙醇合成人造橡胶的办法。在社会科学领域，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文学领域，发表了众多反映苏联数十年巨大变化的作品。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柯夫的《水泥》（旧译《士敏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世界知名之作。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首先是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产量，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前的 1925~1927 年期间平均每年为 7527 万吨，一五期间降为年均 7360 万吨，二五期间再降为 7290 万吨。畜牧业的状况更差。一五期间，马的头数从 3210 万头降为 1730 万头；牛从 6010 万头降为 3350 万头；羊从 10,700 万头降为 3730 万头；猪从 2200 万头降为 990 万头。二五期间，大牲畜的存栏头数有所回升，但未达到 1928 年的水平。农牧业中，只有棉花、制糖用的甜菜等技术作物的产量有了明显提高。轻工业产值虽然 1940 年比 1913 年增加了 3.6 倍，但同期重工业却增长了 12.4 倍。这种不同的增长比例造成农轻重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经济建设的第二个问题是，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单调，质量低劣。许多产品无人问津，大量积压，另一方面，优质对路产品奇缺，供应紧张。第三，经济粗放发展，效益低下，国家资源大量消耗和浪费。

第五节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1936年宪法的制定和高度集中体制的确立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使苏联在经济方面和社会阶级结构方面都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了从法律上肯定这一变化，1935年初召开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1924年宪法。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由斯大林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研讨，于1936年5月完成新宪法的起草工作。

1936年11月25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在苏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国内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新宪法。

新宪法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宪法取消了各级苏维埃选举中的一切限制，以直接选举代替了多级选举，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新宪法保障劳动人民享有劳动、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保证他们在年老、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享有物质保障权。同时，宪法还规定了苏联公民应尽的义务：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军队中服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新宪法还反映了苏联民族国家体制的变化，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改为加盟共和国。高加索联邦分为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便由原来的7个增加为11个。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1937年12月12日全国举行了新的苏维埃代表的选举。1938年1月，召开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出由24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加里宁任主席团主席。莫洛托夫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年5月，斯大林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苏联新宪法的制定，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这一体制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不能真正发挥人民政权的作用，变成徒具虚名的权力机构。联盟制也是有名无实，少数民族的权益并无可靠保障，他们实际生活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里。民主法制被忽视。干部由上级委派，唯上是从。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不受群众监督。权力愈来愈集中于个人手里，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

经济方面的特点是，建成了一个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它实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分统统消灭掉。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生活改善的办法实行高积累多投资，发展粗放型经济。它片面发展重工业，建立准军事型的经济，并以此提

高国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建设模式是在苏联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内部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形成的，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斯大林通过它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一模式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运行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违背列宁关于把文化经济建设当作工作重心的指示，仍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它忽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也不适应世界经济集约化和全球化的要求。从长远看，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和大清洗运动 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布哈林反对派后，他的最高领袖地位牢固确立起来，威望也空前提高。1929年12月21日举国上下庆祝斯大林50寿辰。《真理报》用八个版面刊载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祝寿文章，称颂斯大林是列宁的唯一主要助手，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有些文章不惜歪曲事实说斯大林在党的第一批小组建立时就是“党的最优秀的组织者和建设者”，说他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唯一的从一个战场派往另一个战场的中央委员”。各地的党政组织和个人也纷纷向斯大林发出致敬信。许多城市、工厂、农庄和街道，甚至山峰都用斯大林来命名。这以后，过分颂扬之风愈刮愈烈，进而成为一种政治思潮。斯大林被奉为神明，当作偶像顶礼膜拜。不仅一切成绩胜利归功于斯大林，而且斯大林就是党和国家的化身、真理的代表。1934年召开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决议，确定今后党的工作方针路线；而只简单地“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斯大林的讲话逐渐成为人们工作、发言的唯一依据，成为判断事物对错的唯一标准。

30年代，斯大林主持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运动。哲学界的德波林学派，文学界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史学界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经济学界的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学派，甚至生物学界的瓦维洛夫学派都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扣上“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反党”等各种政治帽子。一些研究机关被解散，许多学者遭逮捕处死。这些批判把斯大林的绝对领导和唯一正确地位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学术领域。

1938年，经斯大林亲自审定，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个人崇拜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完全确定下来。

共产党内一些领导人对日益形成的个人崇拜以及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问题感到不安。在1934年初召开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期间，酝酿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是当选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缺票270张，而基洛夫只缺3张。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暗杀。凶手被当场抓获，他叫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托洛茨基早在1929年已被驱逐出苏联。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写信给党中央承认错误，第二年重新被接纳入党，担任一般工作。基洛夫被刺后，他们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1月，对他们进行审判。虽然没有可靠证据，仍判处他们十年和五年有期徒刑。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秘密信件，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革命警惕性，深

挖暗藏的敌人。1936年，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重新审讯，用严刑拷打和引诱欺骗的办法，强迫他们承认更大的罪行。1936年8月1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公开审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物证，仅凭被告的“交待”和“承认”就宣布他们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组织刺杀基洛夫，并多次企图暗杀斯大林。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死刑，不容上诉就予以处决。

公开审讯后不久，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于9月25日从休养地索契打电话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要求立即任命叶若夫取代雅哥达为内务人民委员，以加紧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26日，叶若夫上台，把大清洗推向全国各地。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以及被认为是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均遭逮捕。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持异议的人，对领导干部不满者也被拘禁。1937年，因“反革命案件”被捕的人数比上一年多九倍多。

1937年1月23日，最高法院对前托季联盟分子进行第二次公开审讯。这次的指控比前次升了一级，说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秘密组织“托洛茨基平行总部”，不仅组织暗杀活动，而且“接受托洛茨基指示，将乌克兰出卖给德国”，以换取德国支持托洛茨基上台掌权。法庭判处皮达可夫等13人死刑。

2月18日，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自杀身亡。他反对内务部随意逮捕枪杀他的部下，更对内务部搜查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行为无法容忍。他向斯大林告状，没有结果。他感到已失去信任，绝望中开枪自尽。奥尔忠尼启则的抗议行动并没有唤起领导人对问题严重性的注意，更未能阻止清洗运动的继续扩展。

几天后，联共（布）中央于2月23日~3月5日举行全体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宣称有“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的这一分析同他三个月前的讲法大不一样。当时他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说国内只剩下“互相友爱”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时则说处处都有“人民的敌人”，并且窃取了重要职位。斯大林认为这一可怕情景是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并且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根据，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全会无条件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一错误理论和对形势的主观估计，决定加紧清洗，以“连根拔除和粉碎”外国代理人和间谍。同时，党中央正式授权内务部可以对“凶恶的敌人”采用“肉体压迫的方法”。会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12页。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0页。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29页。

后，大清洗浪潮推向党政部门、军队领导机关、科学文化单位、厂矿农庄等基层组织。

1937年6月，红军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等高级将领被逮捕处死，罪名是组织反苏军事中心，充当德国间谍。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法庭举行第三次公开审讯，指控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组织“右派和托派同盟”，不仅充当外国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而且要赤裸裸地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李可夫等19人被判处死刑。

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法制不健全且遭随意破坏，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西方材料估计有500万人受牵连，30万~40万人被处决。1936~1939年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打败托季联盟和布哈林之后的1934年召开的，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占56%；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正式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决，占70%。会后选出的17名政治局成员中有5名被害，1名自杀。军队的损失十分惊人。第一批被授予红军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名（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总共有4万多名营级以上的高中级军官遭迫害。乌克兰、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党政领导人几乎均被处决。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受害。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喀秋莎炮的发明设计者朗格马克，喷气技术研究所所长克雷伊苗诺夫，坦克设计家札斯拉夫斯基等人遭杀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火箭之父科罗廖夫等人被捕入狱。一大批留驻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干部被当作外国间谍受审查监禁。前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列申斯基-伦斯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查皮克以及德国、保加利亚、伊朗等国共产党领导人被处死。

1938年末，大规模的逮捕处死浪潮逐渐平息。这场历时多年的大清洗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斯大林在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清洗时……犯过严重的错误”。

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外交政策的变化 20年代上半叶，苏维埃政府先后同周边邻国以及德、英、意、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西方对苏联的敌视和挑衅仍不断发生。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苏联积极支持德国冲破凡尔赛和约束的努力，并大力发展同德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合作关系。1926年4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使洛加诺条约孤立苏联的阴谋破产。

1927年5月，英国中断同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未能带动其他国家同它一起联合反苏。相反，苏联受到邀请，于11月底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联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并提出全面裁军的建议。这显示，苏联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正在重返国际舞台。

30年代，希特勒上台执政，公开宣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迅速恶化。面对法西斯扩张威胁的增长，苏联决定在外交战略上作重大调整。1933年11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美国总统罗斯福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57页。

互换照会，决定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同时，苏联与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建交，形成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

1933年底，苏联外交部提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它改变过去对凡尔赛体系的敌视态度，表示愿意参加国联，同英法等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这一倡议受到欢迎。1934年9月，苏联被接纳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从此，苏联完全走出被孤立被忽视的处境，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

为了对抗德国的威胁，苏联特别重视同它的传统盟友——法国的关系。经过谈判，1935年5月，苏法签订互助条约。同月，又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互助条约。在此之前，同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些条约的签订为进一步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它没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英法统治集团推行绥靖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愿真正同苏联合作。1936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苏联积极支持西班牙政府军，而英法推行不干涉政策，双方矛盾不断加深。1938年，希特勒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英法背着苏联，单独同德国会谈，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慕尼黑协定。这件事大大损伤了苏联对西方的信任。此后，苏联采取更为慎重的政策，避免卷入国际冲突。与此同时，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加快国防工业生产，扩大军事实力。1938年，苏军有150万人，1939年增到200多万，并配备大量大炮、坦克和飞机。

在亚洲，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威胁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多次向日本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均遭拒绝。1932年，日本炮制的“满洲国”成立。苏联担心卷入冲突，于第二年正式通知日本，准备出售中东铁路。1935年，苏联与日“满”达成协议，将本应归还中国的中东铁路出卖给“满洲国”，并同意“满洲国”在莫斯科设立领事馆。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苏联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借助中国抗日战争牵制日本反苏活动。同时，对日本的军事挑衅予以坚决回击。

1939年春，德国侵吞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威胁迫在眉睫。苏、英、法再次坐在一起，商谈联合抗德之事。但在苏军能否进入波兰领土抗击德国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苏联乃于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避开即将爆发的战争。但在秘密协定中，获得德国的承认，竟将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波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宣布中立，并继续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希望以此维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利用德国忙于同英法交战无暇东顾之机，将划为自己利益范围的地方并入苏维埃国土。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边界向西推出200~300公里，扩大领土47.6万平方公里，新建卡累利阿—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数目由11个增为16个。

法国战败后，德苏矛盾激化。1941年6月22日爆发战争。苏联同美英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法西斯。

第八章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西亚政治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西亚人民反帝斗争的兴起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西亚的形势 奥斯曼帝国是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土耳其素丹兼哈里发 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护教者和神法的执行者，又是世界伊斯兰教的大教主。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拥有前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从 18 世纪下半叶后，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其欧洲的属国纷纷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帝国在欧洲仅剩下巴尔干半岛尖端一小块领地了。但在亚洲，广大阿拉伯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仍处于帝国的范围之内。

从 19 世纪初叶起，英法等殖民国家的势力已侵入西亚地区。同时，北方的沙皇俄国一直觊觎奥斯曼土耳其东北部与沙俄毗邻的土地，并与英法争夺黑海海峡地区，企图为其南下寻找一个出海口。后起的德国则利用奥斯曼素丹政权对英、法、俄的夙怨，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帮助修建铁路，派遣军事顾问，打入奥斯曼土耳其。一战前，德国势力上升，取代了英法。1914 年 8 月，德国与土耳其签订同盟条约，奥斯曼土耳其被绑到了德国的战车之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素丹政府追随德奥同盟参战。为了打败土耳其和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及属地，大战期间，协约国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1915 年 4 月，英法俄与意大利在伦敦签订秘密协定，承认意大利在土耳其沿地中海地区拥有特殊的“权利和利益”。同年秋，英法秘密制定瓜分奥斯曼亚洲部分的计划。1916 年初，英法与沙俄交换了意见，9 月达成了分割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各省的秘密协定，即《赛克斯—皮柯协定》。英法为换取沙俄对战争的支持，还允诺战后沙俄可兼并黑海海峡地区，并可占领土耳其都城伊斯坦布尔，沙俄则需将波斯（伊朗）的“中立地带”让给英国，并在这个地区支持和保障英法的特殊利益。1917 年 4 月至 9 月，英法意在伦敦谈判并进一步缔结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协定，并拟征求沙俄同意。

战争使奥斯曼统治下的西亚阿拉伯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1915~1916 年冬，叙利亚、黎巴嫩约有 40% 的人死于饥饿和流行性疾病。从 1916 年开始，阿拉伯人掀起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起义，斗争遍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地区。英国打着支持阿拉伯人独立的旗号，与阿拉伯人领袖达成共同对土耳其作战的协议，允诺战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1916 年，在英国支持下，亲英的沙里夫·侯赛因为埃米尔的阿拉伯汉志王国成立。阿拉伯人民的反抗运动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战败投降，奥斯曼帝国彻底瓦解。协约国

哈里发意为“继承者”、“代理人”。穆罕默德逝世后，其继承者阿布·伯克称安拉的使者“哈里发”，行使宗教和军政大权。1517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阿巴斯王朝末代哈里发曾把哈里发职位让给奥斯曼素丹塞利姆，此后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一身二任。

根据 1907 年英俄协定，波斯被分为三十区域。俄国占有北部地带的经济权益；英国占有南部地带的经济权益；西南部为“中立地带”，对英俄两国“平等开放”。

集团英、法、意等战胜国将奥斯曼土耳其的西亚属地几乎全部瓜分。早在 1916 年 11 月，英国强迫卡塔尔接受奴役性的条约，把卡塔尔变为其“保护国”。1920 年国际联盟的圣勒摩会议规定，英国获得对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获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1925 年英国还宣布塞浦路斯为它的直辖殖民地。此时海湾地区的科威特和阿拉伯诸酋长国已先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西亚，特别是海湾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一战前，英国几乎垄断了这里的石油。20 世纪初，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相继成立。一战后，英伊石油公司成为一个巨大的石油垄断公司。它的资本由 1913 年的 200 万英镑上升到 1939 年的 3000 多万英镑，石油产量由年产 25 万吨增加到 1000 多万吨，年利润率由 5% 增加到 20%。在石油租借地内，英伊石油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警察和法庭，所在国政府无权干涉，成为“国中之国”。一战后美国也向西亚渗透，要求重新分配石油产地。从 1927 年以后，美国石油财团先后获得伊拉克（摩苏尔）石油公司股份的 23.75%，以及科威特、巴林群岛、沙特阿拉伯等地的石油开采权。到 1937 年，西亚和北非（埃及）的石油总产量为 15,655,000 吨，其中英国占 76.9%，美国占 13.1%，法国占 6.2%，荷兰占 3.8%。

20 世纪初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亚各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奴役之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它们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农业和原料附庸、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它们的石油资源被外国垄断公司控制。西亚诸国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85%~90% 的居民居住在农村和牧场，70%~80% 的耕地、牧场属于封建地主、王公、寺院，大片土地变成外国石油公司的租让地。贫苦农民在对分制（地租占收成的 50%）或更残酷的剥削条件下承租土地。进入现代史时期的许多西亚国家，不仅保持着浓厚的封建宗法制，还存在着奴隶制甚至氏族部落制的残余。阿拉伯贝都因人依然生活在沙漠地带过着游牧生活。

一战期间和战后，西亚各国民族资本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民族工业还十分微弱，主要是中小手工业企业。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已经诞生，但力量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西亚大部分地区卷了进去，有的地区成为战场。由于战争需要，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加倍掠夺西亚国家的资源，而且利用西亚国家的人力为战争服务。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加剧了西亚各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1917 年毗邻西亚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促进了西亚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一战后，西亚一些国家产生了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有的国家建立了共产党，西亚各国反帝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

一战后，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接着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亚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阿富汗、伊朗和西亚阿拉伯国家也兴起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

阿富汗的独立和改革运动 19 世纪末，阿富汗成为英国的半殖民地。为反抗英国的侵略，阿富汗曾先后进行两次抗英独立战争。20 世纪初，由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马哈茂德·贝格·塔尔齐为代表的青年阿富汗派形成。

外约旦原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委任统治制后，1921 年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

塔尔齐抨击英、俄帝国主义，指出“独立，只有完全独立，才能使阿富汗繁荣富强”。青年阿富汗派在部分王室、官员和知识分子中有巨大影响，国王哈比布拉·汗的第三个儿子阿曼努拉受其影响，并成为这一派别的政治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富汗保持中立，但大战期间，英军占领了邻邦伊朗的大部分领土，使阿富汗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阿富汗民族的新觉醒。1919年2月20日，哈比布拉·汗在贾拉勒阿巴德的一次狩猎中遇刺身亡。2月28日，阿曼努拉击败宫廷保守势力后继承王位。他在青年阿富汗派支持下组成以青年阿富汗派人为主体的内阁。在加冕时，他明确宣布：“阿富汗应当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应当拥有主权国家所具有的一切权利”，并宣布阿富汗“不承认任何外国的统治权”。他亦立即采取措施，力求使阿富汗摆脱英国的控制。

1919年3月3日，阿曼努拉致函英印总督要求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要求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议英阿关系，4月又致函苏俄政府，建议两国建立友好的关系。5月，苏俄政府宣布承认阿富汗独立，表示将取消沙俄同阿富汗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愿与阿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但英国拒绝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并在印度与阿富汗边境集结兵力，企图再次使用武力迫使阿富汗屈服。

1919年5月3日，英国制造挑衅事件，在位于喀布尔西部的开伯尔山口发动总进攻。这样就开始了阿富汗第三次抗英独立战争。在阿曼努拉领导下，阿富汗实行全国总动员奋起抗战。阿富汗军队从开伯尔山口、加兹尼和坎大哈三条战线迎击英军，并在边界地区部族武装的支持下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浴血战斗。5月25日，一支阿军在东部战线突入英属印度西北边省，包围并迫使塞塔尔要塞的英军投降。但到了6月初，整个战局处僵持状态。英军凭借优势兵力与先进装备，出动空军轰炸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等城市，但在战斗中遭到阿军的阻击，无法深入阿富汗国土的纵深地区。

由于阿富汗军民的英勇抵抗，加上印度人民反英运动的高涨和英国在对苏俄武装的干涉中被牵制了众多的兵力，以及英军的厌战情绪的增长，英国不得不同意阿富汗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建议。1919年6月3日，英阿双方缔结停战协定。8月8日签订初步和约。和约规定维持阿富汗与英属印度的原先的边界线（杜兰线），并确定六个月后再谈判双方关系正常化问题。初步和约签订后，阿富汗在外交上获得新的成就。1919年10月，苏俄政府正式承认阿富汗独立。1921年，阿富汗与苏俄、土耳其、伊朗签订友好条约。阿富汗赢得了对外关系的自主权。1921年11月22日，英国被迫与阿富汗正式签订和约。条约规定英国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双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这个条约将阿富汗独立战争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阿富汗成为一战结束后第一个赢得政治独立的亚洲国家。

阿富汗独立后，阿曼努拉先后访问了印度、埃及、土耳其和西欧诸国，并到苏俄考察，回国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建立了内阁，加强了中央政权，设立了立法会议，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代议制机构。1923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在经济上，取消了税卡，对进口商品实行高关税，颁布了《奖励工业法》，宣布土地私有制合法化，废除封建徭役，把土地税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在文化教育上，举办世俗学校，创办女子中学，发展国内教育事业，并鼓励出国留学。同时，创办剧院，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广使用民族语言——普什图语。在社会生活中，颁布新法典取代伊斯兰教法规，禁止贩

卖、拷打奴婢，禁止买卖妇女，废除多妻制，取消妇女出外戴面纱的旧习俗，并限制伊斯兰教僧侣和部族领袖的特权。

在青年阿富汗派支持与推动下的阿曼努拉改革旨在以欧洲国家为模式，打击和削弱封建神权的传统势力，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国家的实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利于阿富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伊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巴列维王朝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但伊朗领土被参战国英、俄占领，西部一度成为战场。大战期间，伊朗北部人民开展了反对沙俄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宣布“废除瓜分波斯的条约”，并发表“保证波斯人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等声明，这在伊朗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大战结束后，俄军从伊朗北部撤走，但英国军队却推进到伊朗北部。到1918年年中，英军几乎占领了伊朗全境。1919年8月，英国迫使伊朗王国政府签订英伊条约，将伊朗的军队、财政、关税以及铁路、公路建设的权力交给英国控制，伊朗实际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和武装干涉苏俄的基地。这激起了伊朗人民的反抗。

1920年4月，伊朗北部阿塞拜疆省首先爆发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省会大不里士城，赶走了官吏，建立了民族政府，宣布阿塞拜疆为“阿扎吉斯坦”（自由之邦）。起义是以穆罕默德·希阿巴尼为首的阿塞拜疆民主党人领导的。希阿巴尼出身于商人家庭，担任过清真寺长老，参加过1905年革命。1917年在大不里士建立民主党。该党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的利益，主张成立爱国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反对英帝国主义和专制王室，要求取消英伊条约。起义得到人民的支持。民族政府主张伊朗独立，阿塞拜疆自治，同苏俄建交和实行民主改革；但没有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也没有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系，只限于消极固守。同年8月，英国支持的伊朗王国政府军发动进攻；9月，起义被血腥镇压。希阿巴尼遭杀害。

1920年，伊朗各地斗争高涨，吉兰省的斗争最为突出。1920年5月，苏俄红军击败在巴库的英国干涉军和白卫军，到达伊朗里海港口恩齐列（后改名巴列维港）。由米尔扎·库切克汗领导的森林军游击队乘机发动攻势，占领了吉兰省的腊什特和恩齐列，而后又占领了整个吉兰及曼季勒和马赞德兰省的部分地区。6月5日，宣布成立吉兰共和国。在吉兰组成了有商业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地主集团和伊朗共产党参加的反帝爱国联合阵线，建立了以库切克汗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伊朗共产党前身为正义党，1920年成立。6月22~24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反动王室政府的纲领，与库切克汗合作，参加吉兰革命政府。库切克汗为首的吉兰政府的政纲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是反对帝国主义，把英国赶出去，二是推翻王室政权，建立共和国政府。吉兰革命政权获得进入当地的苏俄红军的支持。1920年7月，吉兰起义军向首都德黑兰进军，形成了巨大的革命声势。

然而，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吉兰革命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分裂。库切克汗是虔诚的穆斯林，反对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主张维护伊斯兰教秩

大战期间，1917年库切克汗领导的一支由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商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出没于吉兰省茂密的森林，反对伊朗封建统治者和沙俄，故称“森林军”。

序，不同意进行土地改革。而伊共部分领导人却错误地推行“左”倾社会主义政策：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剥夺商人和手工业者，反对伊斯兰教，强令妇女脱去面纱等，引起革命政府内部意见的严重分歧。1920年7月，库切克汗率森林军部队退出政府，统一战线瓦解，革命出现危机。1921年初伊共批判了党内“左”倾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提出了新的纲领，主张联合一切阶级反对国王、大封建主和帝国主义。1921年5月吉兰革命统一战线恢复，组成了以库切克汗为首的新政府，并宣告吉兰为苏维埃共和国。

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伊朗政局发生变化。在英国支持下，代表新兴地主—商人集团利益的军人礼萨·汗于1921年2月2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室贵族支持的旧政权，建立了新政府。礼萨·汗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后又出任国防大臣，掌握了实权。他在政变成功后，表现了较强烈的独立性，在一些问题自行其是，与英国顶撞，同时采取措施，整顿和扩充军事力量，以夺取全国政权。

伊朗政变后成立的新政府于1921年2月26日与苏俄签订苏伊友好条约。苏俄废除了沙俄政府与伊朗签订的有损伊朗独立和主权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并把沙俄在伊朗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伊朗；但规定伊朗领土不得被利用来对苏俄进行敌对活动，否则苏俄有权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伊朗领土，为了自卫，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苏伊友好条约签订后，伊朗政府于同年3月宣布废除1919年英伊条约，要求英军从伊朗撤退。迫于形势，英军于5月撤出伊朗。同年6月，苏军也从吉兰地区撤退国内。随着英、苏军队的撤走，伊朗长达12年之久的外国军队占领时期结束了。

1921年9月，吉兰革命政府内部再次发生分裂和混乱，库切克汗公开与伊共破裂，并杀害了伊共领导人。库切克汗与吉兰其他领导人也相互攻击，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礼萨·汗乘机展开全面进攻。1921年末，伊朗政府军占领了吉兰全省，库切克汗逃入山林中，不久去世。吉兰革命运动被镇压。

与此同时，礼萨·汗又镇压了霍拉桑的革命运动。到1922年初，伊朗各地的革命均遭镇压。此后，礼萨·汗利用人民反英情绪，把军队中的英国军官赶出去，建立统一的国民军；同时，采取强硬手段，平定国内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打击王室贵族集团。1923年10月，他出任首相。1924年发动“共和运动”，提出了废除卡扎尔王朝的口号，全面抨击王室和国王。1925年10月31日，礼萨·汗通过国会宣布废除卡扎尔王朝。随之，他又在伊斯兰教宗教领袖支持下，终止了建立共和国的运动，致力于组成自己的新王朝。同年12月12日，伊朗立宪会议宣布礼萨·汗为伊朗国王，称礼萨·沙·巴列维。从此，伊朗进入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

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反帝斗争和沙特阿拉伯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地区分别被英、法军队占领，建立委任统治制度。这引起了广大阿拉伯人民的不满。1920年3月，由叙利亚各地区代表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独立，成立以费萨尔为国王的君主立宪国家。法国出兵攻占大马士革，废黜了费萨尔国王，并于9月，将叙、黎划分为四个区：大黎巴嫩、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以便分而治之。从1920年下半年起，叙、黎各地反法起义斗争不断发生，与此同时，伊拉克地区人民反对英国占领者的起义十分高涨。1920年6月，起义几乎波及全国各地。领导起义的是伊拉克独立捍卫者协会。在起义军包围下，英国军队被困守在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等城市，面临

灭顶之灾。英国政府匆忙调集军队解救。由于封建主的背叛和英国挑起部落冲突，起义终被镇压下去。1921年8月英国扶植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翌年，英国与费萨尔王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英伊条约》。条约确立了英国对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以及英国在伊拉克的特权。这激起了伊拉克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

1922~1928年，伊拉克人民的罢工斗争和武装反抗从未间断。为了缓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情绪，英国被迫于1932年宣布结束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但同时宣布1930年签订的为期25年的英伊军事同盟条约开始生效，以继续保持英国对伊拉克的控制。

为了反对法国的委任统治，1925~1927年，叙利亚—黎巴嫩人民举行了民族大起义。起义从叙利亚南部山区杰贝尔·德鲁兹省开始，迅速向北蔓延。1925年8月，起义队伍组成叙利亚国民军，由阿特拉什素丹任统帅，并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0月，北部城市哈马的市民也举行起义。武装斗争烈火逼近大马士革附近。10月18日，起义军占领大马士革；11月，叙利亚全境几乎都被起义者控制。起义军还一度扩展到黎巴嫩境内。法国政府从国内和法属摩洛哥调派数万援军前来叙利亚。法军总兵力达10万人，发动了对起义军基地德鲁兹山区的大规模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直到1927年7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根据地库塔森林区失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持续两年的反法大起义给了法国在叙、黎的委任统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法国不能再沿用老一套的殖民统治了，起义以后法国不得不同意召开立宪会议，并给予当地上层人士管理地方的一定权力，来缓和与阿拉伯人的关系。

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是20世纪初和一战后西亚阿拉伯地区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20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遭到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与掠夺。半岛内部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内战不休，不仅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难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势力。历史发展的趋势要求半岛统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早在1902年，沙特家族的首领伊本·沙特占领了利雅得，开始了沙特家族领导的反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到1913年，伊本·沙特基本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内地的广大区域。1915年英国强迫伊本·沙特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承认他对内志、哈萨等地的统治权，而伊本·沙特则需同意不与其他国家签定协议和进行谈判，也不向其他国家提供租让权，不侵犯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保护地”。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瓦解，土耳其在西亚的大部分土地被英国控制，伊本·沙特的地域处于英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在英国支持下，汉志的侯赛因多次发动对内志的攻击。

盘踞在沙马尔地区的拉希德家族的酋长国和英国支持的侯赛因埃米尔统治的西部汉志王国，是沙特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主要阻碍。1920~1922年，伊本·沙特打败了拉希德家族军队及其支持者汉志侯赛因的援军；1924年9月起，他率军进攻汉志侯赛因的属地，先后占领了塔伊夫、麦加、麦地那、吉达。到1925年12月，整个汉志地区被沙特家族占领，基本完成了半岛的统一。

伊本·沙特统一阿拉伯半岛共费了30年时间，1926年汉志人拥戴他为

全名，阿卜杜·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赫曼·沙特，1880年12月2日（回历1297年12月29日）生于利雅得，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缔造者。1953年去世。

国王，并成为内志及其属地的素丹。1927年5月，伊本·沙特与英国在吉达签订条约，英国承认他为汉志和内志及其属地之王，享有独立地位。1932年阿西尔正式并入。为进一步清除封建割据势力，统一行政管理，巩固中央集权，伊本·沙特于同年9月将汉志—内志联合王国变为统一的王国，正式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

在统一过程中，伊本·沙特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发动了使游牧民转为过定居农牧生活的“伊赫万运动”，建立了一支亦农亦兵的强大队伍，依靠这支力量完成了统一事业。伊本·沙特还大力宣传瓦哈比教义，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布道士为前导，大军继后，击败敌人，开拓疆土。在半岛统一后，伊本·沙特参照西方式样，组织政府，促进国家机构的现代化；同时，引进西方技术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并实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年轻国家的独立与生存。

伊本·沙特的统一事业，矛头指向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支持的割据势力，带有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打破了半岛封建割据的状态，有利于社会进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统一和崛起，是西亚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对激发阿拉伯各国继续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节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

奥斯曼土耳其参加一次大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大战中，帝国有 60 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 万人负伤。战时军费开支高达 58, 100 万里拉。包括各种破坏在内，整个战争带来的损失达 10 亿里拉。战争结束时，土耳其经济崩溃，外债累累。耕地从 6400 万土亩减少为 3000 万土亩，粮食收成降低 1/2，物价上涨 15~20 倍。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苛捐杂税、强迫供应和强制劳动等等全部负担都压在人民头上。战争引起的饥荒和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造成全国人口锐减。战后土耳其到处是饥饿、破产和贫困的景象。

土耳其战败后，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18 年 10 月 30 日，素丹政府被迫与协约国签订《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协定内容非常苛刻，规定土耳其立即解散其军队，交出军舰，开放黑海海峡由协约国控制；土耳其的铁路、交通和电信部门由协约国军管；石油产地交协约国管理。还规定，在必要时协约国可以占领土耳其任何战略要地。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国军舰驶入海峡，英国最高专员到达奥斯曼都城伊斯坦布尔。随后英、法、意派出总数达 10.7 万人的军队，占领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包括海峡地区、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西南部以及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土耳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1919 年 5 月 15 日，在英法支持下，希腊军队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及其邻近地区。希土矛盾由来已久，两国互有移民。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带带有 250 万希腊人。希腊统治阶级对这一地区怀有野心。在巴黎和会上，希腊首相要求把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划归希腊，并企图在黑海沿岸建立一个“邦杜斯希腊国家”为利用希土矛盾，从中渔利，英国支持希腊出兵占领这一地区。与此同时，协约国帝国主义还策划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北部建立“独立的亚美尼亚国”，东南部建立“库尔德斯坦”，妄图肢解土耳其的国土。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我们用不着为土耳其将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惋惜。”

在战后国家经济破产、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土耳其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俄国革命的胜利和沙皇的垮台，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奥斯曼帝国的特权，并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战时瓜分奥斯曼领土的密约，鼓舞和推动了土耳其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

《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后，1918 年 12 月，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德米特约尔的人民首先起来武装反抗法国占领军。希腊军队入侵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农民纷纷建立游击队，抗击占领军。农民成了反侵略斗争的主力，从前线回来的退伍军人起着骨干作用。土耳其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斗争。但当时土耳其工人人数不多，且集中在占领军控制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西部沿海城市，同时还没有组成自己的革命政党，因而没有能够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

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在一次大战期间更获得较大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活动还从西部

“邦杜斯”是古代希腊在黑海沿岸建立的一个国家的名称，近代以来，希腊统治者企图恢复它。

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东移至安纳托利亚地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战期间依靠同德、奥进行粮食、烟草和棉花等贸易，有的由于经营军需品生产获得发展。这就打破了过去民族资产阶级仅仅依赖与英美垄断资本取得联系获得发展的局面。此外，希腊族、亚美尼亚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削弱乃至消失，也提高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从 19 世纪下半叶逐步兴起的土耳其民族意识，到一次大战结束后的民族存亡的新形势下迅猛勃兴。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国土被瓜分的威胁下，土耳其各地资产阶级、爱国军官和官吏以及伊斯兰教的上层分子纷纷建立民族主义组织。1918 年底，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伊兹密尔、色雷斯、基利基亚等地均建立了“护权协会”。土耳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手中。

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9 年）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爱国领袖，他领导了土耳其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凯末尔出生于萨洛尼卡（今属希腊）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学生时代即参加反对封建统治政权弊政的秘密活动。1908 年积极参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大战期间，他战功卓著，因在海峡保卫战中的胜利，赢得“伊斯坦布尔救星”和“海峡及首都保卫者”的声誉。1916 年 4 月晋升为准将，获“帕夏”称号。但他反对土耳其素丹政府追随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反对德国军事顾问团干预土耳其内政及以恩维尔为首的亲德派的政策。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签订后，他认为“砸断套在祖国脖子上不自由和耻辱的枷锁”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展民族抵抗运动”。1918 年 11 月，凯末尔从前线回到首都，向议会和素丹建议组织一个对抗协约国的强硬民族内阁，他向素丹表示，只要交付他军事大臣的重任，他有能力“拯救土耳其”。但他的愿望很快成为泡影。他决意离开受协约国帝国主义控制，弥漫着消沉、妥协气氛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前往游击战争风起云涌的安纳托利亚。凯末尔于 1919 年 5 月 16 日，即希腊侵占伊兹密尔的次日，接受了素丹政府要他担任第九军督察使的任命，启程前往安纳托利亚。19 日，他到达黑海港口城市萨姆松，踏上了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他从遍及安纳托利亚的反抗占领军的群众斗争中，目睹了人民的高昂救国热忱，增强了拯救祖国的信念。6 月中旬他在写给素丹的报告中强调说：“整个民族已经觉醒”，“充满了捍卫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奋斗精神，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决心与全民族一起为国家的完全独立而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离开安纳托利亚。他利用各种场合，向人民群众反复宣传“不独立，毋宁死”的思想主张。

当时，民族抵抗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将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组织联合起来，以便组成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核心。在此期间，凯末尔利用他拥有的权力，发出通告，指令各地军、政机构派遣代表，召开会议，统一各地护权协会，制定维护祖国独立及领土完整的纲领。1919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6 日，凯末尔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了东部各省护权大会，通过了护权协会章程和告全国人民书。大会宣布反对各种形式的外国占领和干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托管和委任统治。凯末尔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正式取得了在民族抵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同年 9 月 4 日至 12 日，在锡瓦斯举行了安纳托利亚和罗姆里护权协会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决了支持委任统治的主张，确认了埃尔祖鲁姆大会通过的民族斗争的纲领性要求，明确宣布：“不论任何情况，我们土耳其人之独立自由，决不能听凭他人限制，所以凡我土耳其人民所居各省，不论何地，我等均不承认其脱离帝国而独立”。会上成立了全

国性的统一的护权协会，凯末尔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成为未来民族政权的雏形。大会闭幕当天，代表委员会即宣布断绝与伊斯坦布尔的一切联系，并要求驸马费里特任首相的政府引咎辞职。

会后，凯末尔加紧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他将分散于各地的农民游击队改编为接受统一指挥的“国民军”。其有强大的战斗力的正规军的建立，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安纳托利亚民族抵抗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素丹被迫改组政府，继位的阿利·里萨政府为抵消护权协会的影响和利用民族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在承认护权协会的合法性的同时同意召开帝国议会。但民族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三分之二的议席。1920年1月28日，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占多数议席的凯末尔派议员使议会通过了反映民族要求的《国民公约》，这是挽救土耳其民族危亡的独立宣言，它宣布：土耳其的本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土耳其应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废除一切阻碍土耳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治外法权和各种限制；开放海峡地区不应使土耳其领海受到侵犯；偿还列强的债务不能叛卖民族独立自主的原则等等。公约明确指出，当前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是土耳其取得“生存和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

议会通过《国民公约》的行动，使素丹政府和协约国大为震惊。3月16日，协约国军队在伊斯坦布尔登陆，占领电台等部门。素丹政府宣布解散议会，逮捕和流放民族主义派议员，并宣布凯末尔运动为“叛乱”，军事法庭缺席宣判凯末尔死刑。同时，出动“讨伐军”，企图用武力扑灭民族抵抗运动的烈火。

面对协约国和素丹政府的进攻，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于4月23日在安卡拉召开了新的国民议会——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国民政府。凯末尔担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从伊斯坦布尔投奔革命阵营的伊斯梅特（伊诺努）担任军队参谋长。大国民议会以凯末尔的名义给列宁写信，要求苏俄政府支援土耳其的民族斗争。5月，安卡拉政府向苏俄派出代表团，6月，苏俄宣布承认土耳其国民政府。同年，土耳其从苏俄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

1920年6月，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发动攻势，侵占了巴勒克西尔、布尔萨等地。同年8月10日，素丹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这个条约将列强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根据条约，黑海海峡地区实行“国际化”，成立由列强控制的国际海峡委员会。土耳其的领土被瓜分后只剩下原有国土的五分之一，即安纳托利亚境内安卡拉与黑海之间的一块土地。条约还规定，恢复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国债管理局；设立由英、法、意三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财政委员会，控制土耳其的海关、税务及其他财经大权。这一条约是协约国集团强迫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中最带奴役性的条约，它激起了广大土耳其人民的愤慨。

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军依靠人民的大力支持和苏俄的援助，并利用英、法、意等国之间的矛盾，很快击溃了素丹政府支持的“哈里发军”，随后于1921年集中兵力与希腊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1921年7月，希腊军发动攻势，进逼至距安卡拉仅50公里的地方。8月，凯末尔命令国民军在萨卡里亚河东岸构筑防线，并下达总动员令，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在萨卡里亚战役中，15,000名土耳其士兵英勇牺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挡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

经过 22 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击溃了希腊军。这一战役的胜利改善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同年 10 月 20 日，法土签订安卡拉协定，法国承认大国民议会政府，同意在两个月内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撤军。当年秋，意大利军队也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撤出。英国被迫改变公开支持希腊的立场，转而采取“中立”。

1922 年，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土耳其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8 月 26 日，土耳其国民军发动了向希腊军的总攻势，一举击溃了希腊占领军，俘虏了希腊军总司令特里库皮斯等高级将领。9 月 9 日，光复伊兹密尔。18 日将希腊军全部逐出安纳托利亚。10 月初，英法意代表在穆达尼亚同土军西线司令伊斯梅特开始停战谈判。并于同年 10 月 11 日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收复了东色雷斯，大国民议会和国民政府掌握了伊斯坦布尔及海峡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逃上英国军舰，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黜苏丹。

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废除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奴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1922 年 11 月 20 日在瑞士洛桑重新召开解决对土和约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一方是土耳其，另一方是英、法、意、希等国，美国派观察员出席。苏联等黑海沿岸国家代表应邀参加讨论海峡问题。洛桑会议经过两个阶段，历时八个月，经过激烈的争论与谈判，终于在 1923 年 7 月 24 日签订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简称洛桑和约。新的和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确定了土耳其从黑海到爱琴海的边界，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归还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少数民族地区仍归属土耳其；废除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财政监督权，取消赔款，实行海关自主。同日，英、法、意、日、希、罗、南、保、土九国签订了《海峡公约》，规定黑海海峡无论在平时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海上和空中都通航自由的原则；海峡地区非军事化，由签字国组成的海峡委员会实行监督。

洛桑和约的签订是土耳其人民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又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它将凡尔赛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计划。1923 年 8 月 23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了洛桑和约，10 月 2 日，协约国军队撤离了伊斯坦布尔。6 日土耳其国民军进驻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巨大胜利。

第三节 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和凯末尔的改革

在民族独立战争胜利后，凯末尔革命进入民主改革和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时期。在凯末尔执政期间（1923~1938年），土耳其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开展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政治方面，首先面临着国家体制的改革，以建立共和制国家。土耳其是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国家。皇权（素丹）和教权（哈里发）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阻碍社会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围绕未来政权形式，土耳其议会内外争论异常尖锐。凯末尔在进行政治改革时，采取灵活的逐步前进的策略。1922年11月，通过大国民议会作出决议，首先废除了素丹制。素丹穆罕默德六世因惧怕法庭的审判逃亡国外。土耳其素丹制随着末代素丹的出逃而不复存在。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建立共和国的决定，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为首届总统，伊斯梅特任第一届政府总理。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安卡拉。至此，历时600年之久的奥斯曼王朝寿终正寝。

接着，凯末尔将改革的目标对准封建神权的主要标志——哈里发制。素丹被废除后，国内反对势力聚集在新任哈里发伊本杜勒·麦吉德的周围，国内外伊斯兰教界，尤其是邻国的伊斯兰教徒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保留哈里发的地位。托钵僧的头目谢伊赫·赛义德甚至煽动库尔德人叛乱。凯末尔党内一些人分裂出去，组成“进步共和党”，反对废除哈里发制。然而，凯末尔以大无畏的精神，排除种种干扰，终于推动大国民议会于1924年3月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决议，并将最后一代哈里发驱逐出境。4月，土耳其颁布了宪法。1928年从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完成了政教分离的改革，土耳其成为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

在法制方面，土耳其政府取消了伊斯兰宗教审判制度，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权。1926年颁布了民法、刑法、商法、海上法。在民法中废除了限制妇女权利的一夫多妻制。

在经济方面，凯末尔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改革和建设。1923年在伊兹密尔召开“经济大会”，制定了《经济公约》，发表了《九项原则宣言》，提出了复兴国家经济，重建金融机构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思想。大会通过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是：促进小生产向大型轻、重工业企业的过渡；迅速发展国内有原料供应的部门，特别是纺织和食品等部门；实行关税自主；创办国家银行，以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等等。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干预，实施进口替代，并采用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凯末尔借鉴苏联工业化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制订发展民族经济的计划。1934年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放在轻工业部门。

土耳其政府采取了限制外国资本的政策，它用赎买的方式将一些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企业，如铁路和公用事业部门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一批国营企业。从1929年后，实施了关税保护政策。1930年成立中央银行，剥夺了奥斯曼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力。

在农村，为恢复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1925年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宣布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并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1927年和1929年，颁布了向无地农民和移民分配土地的法令，开始对国有土地进行分配。同时，

逐步建立农业银行和农业信贷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贷款，以发展生产。

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土耳其共和国工农业的发展。1927~1939年，土耳其的注册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近五倍（1927年为5800万里拉，1939年为33,100万里拉）。其中，大工业企业增长1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苏、日外，土耳其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1924~1939年土耳其修筑铁路近4000公里。由于农业的改革，可耕地面积由1927年的436万余公顷增加到1940年的约1266万公顷。粮食产量1930年已自给自足，且有少量供出口。1930~1938年，每年粮食平均出口6.5万吨，农业平均增长率达5.1%。

在文化教育方面，凯末尔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发展民族文化和现代教育的方针。1924年颁布了教育世俗化、现代化法令，将教育统一在国家控制之下，以摆脱神权的束缚。土耳其政府停办了旧宗教院校，取消了大学神学系，整顿了外国人和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普及五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工、农、矿、师范及成人夜校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改建和扩建了高等学校。凯末尔提倡文字改革，于1928年废除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旧文字，改为拉丁字母。凯末尔亲自教人民读写新文字，获得“首席教师”的称号。为推动土耳其语言的民族化，清除外来语，1932年成立了土耳其语言协会。为了发展民族的历史科学，在凯末尔提议下，1931年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

教育改革促进了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字改革有利于文盲的减少。世俗化的文化改革使文学、音乐、艺术获得迅速发展，人民的文娱生活活跃起来。

在社会生活方面，凯末尔也进行了破除封建、宗教旧习俗，实行现代新风尚的改革。土耳其政府封闭了修道院，取缔了托钵僧，禁止用荒诞的咒语治病；废除了旧的历法，采用公历；将每周假日由星期五改为星期日；在服装方面推行西服和便服，并废除了妇女戴面纱、头巾的旧习俗。1934年6月，议会通过采用姓氏的决定，取消了象征封建等级的旧称号与旧头衔。凯末尔带头放弃了“帕夏”头衔，接受了议会授予他的姓氏——“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之父。

在对外关系方面土耳其共和国实行和平中立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凯末尔继续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5年与苏联签订《土苏友好中立条约》；改善与加强同邻国（阿富汗、伊朗等国）的关系。1930年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1933年签订边界保证条约。凯末尔政府促进了两个区域性和平条约的缔结。第一个是与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等国签订的《巴尔干条约》；第二个是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四国组成的《萨达巴特条约》集团。

土耳其还改善了与西方国家法、意、英等国的关系。1936年7月20日，在瑞士的蒙特洛，土耳其与英、法、苏、希等有关国家通过了新的海峡制度公约，即《蒙特洛公约》，将海峡管理权从“国际委员会”手中收回。公约规定，土耳其共和国可以在海峡两岸设防，并进行管理。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夕，凯末尔创立了土耳其人民党（1923年9月），不久改组为人民共和党。它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执政党。1931年，这个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把凯末尔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归纳为六项原则，即：

- （1）共和主义；
- （2）民族主义；

- (3) 平民主义；
- (4) 国家主义；
- (5) 世俗主义；
- (6) 改革主义。

这六项原则即构成“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代表大会把六个箭头的标志，定为人民共和党的党徽。凯末尔主义是在革命与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是土耳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总结，也是土耳其建国的指导思想。六项原则于 1937 年列入土耳其宪法。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捍卫独立，取得了政权；在共和国建立后，又实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打击了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与文化朝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取得了远远超过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战果，在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世纪 20~30 年代，亚非国家一些民族民主运动都受到它的影响。凯末尔的革命和改革是进步的，但作为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阶级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例如对工农运动的限制与对土耳其共产党的镇压。

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土耳其的崛起，鼓舞了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人民，孙中山先生多次赞扬土耳其革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著文高度评价土耳其革命，赞誉它“不独挽回了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回教民族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和印象”，并热切希望“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成为“东亚巨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

第九章 一战后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第一节 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与朝鲜人民的反抗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 19世纪末，日本的势力入侵朝鲜半岛，与沙俄发生激烈的争夺。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沙俄从朝鲜排挤出去，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伊藤博文出任朝鲜统监后，将朝鲜的立法、行政以及人事等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还解散了朝鲜李氏王朝的军队。1910年8月，驻扎在汉城的日军包围了朝鲜宫廷，用刺刀威胁韩国君臣签订了《日韩合邦条约》。从此，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吞并朝鲜后，进行“武断政治”。总督由陆海军大将担任，直属天皇，独揽朝鲜的立法、司法和军政大权。陆军大将寺内正毅被任为首任总督。他公开叫嚷：“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密布各地，两个日军师团和两支海军分遣队常驻朝鲜，可以随时出动，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当局还颁布一系列法令，取缔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为了防止朝鲜人民造反，日本殖民者不仅没收了朝鲜民间的武器，还强迫朝鲜人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甚至要用铁链子拴在案板上。而在朝鲜的日本文官和教员都实行佩刀制。20世纪初叶，日本殖民者在朝鲜继续保留中世纪残酷鞭挞的笞刑制度。这一切正如列宁指出的，日本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结合在一起，空前残暴地对朝鲜进行掠夺”。

在经济上，日本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掠夺。殖民当局颁布“土地调查令”、“森林令”、“矿业令”等法令，强行霸占朝鲜的土地、森林和矿产资源，压制朝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占有了朝鲜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和矿山，把朝鲜变为日本粮食、原料的供应地和日本商品的市场。日本殖民者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愚民奴化政策。他们禁止朝鲜人民学习和使用朝鲜语，用日语取代。在学校中不准开设朝鲜历史和地理课程，并宣扬朝鲜人民是“劣等民族”，鼓吹日本对朝鲜的“恩德”，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妄图摧残朝鲜的民族文化，消灭朝鲜民族。

在日本殖民奴役下，朝鲜人民陷入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流浪到国外，不少人被迫逃进深山老林，变成刀耕火种的“火田民”。1914年“火田民”达到二十四万多人。广大贫苦的佃农，不仅要负担越来越重的田租，还要交纳多达五十余种苛捐杂税。朝鲜的工人阶级大多在日本殖民者的工厂、矿山、铁路和港口劳动，他们遭到沉重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在武装的工头监视下，每天要从事长达12~14小时的繁重劳动，而工资却不够养家糊口。在殖民统治下，朝鲜民族工商业受压抑，城市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者也面临破产的威胁。

从日本侵入朝鲜后，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延绵不断，从未停息。1910年

1910年8月22日由日本驻朝鲜统监寺内正毅与朝鲜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在汉城签订。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皇帝陛下把整个朝鲜的一切主权权利全部和永远割让给日本皇帝陛下”。日本则给予朝鲜皇帝以相当的称号和每年给予费用。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0卷，第64页。

前后，朝鲜的反日义兵起义持续将近十年，义兵队伍曾发展到十四万多人，形成全国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给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20世纪初，朝鲜掀起的爱国文化启蒙运动，通过创办报纸，组织学会，兴办学校，积极传播了抗日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促进了朝鲜人民觉醒。

朝鲜三一人民起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朝鲜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鼓舞了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和决心。1919年3月1日终于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

三一人民起义的导火线，是韩国太上皇高宗李熙被害的事件。李熙因不满日本的控制，在位时曾幻想依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摆脱日本的“监护”，1896年曾逃入俄国使馆避难。1907年又乘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在海牙举行之际，秘密遣使向会议发出呼吁，要求承认朝鲜的独立，废除日本的保护制度。事后，日本殖民者立即废黜了李熙，立其子李垆为王。1919年1月21日夜，长期被幽禁在德寿宫内的李熙被日本总督长谷川指使朝奸毒死。为了掩人耳目，日本官方公报诡称是患脑溢血死去的，并声称要为他举行“国葬”。但是却规定葬仪须用日本“古礼”。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激起了各阶层群众的愤慨。

朝鲜民族主义者决定利用高宗遇害事件，开展反日宣传，并在国葬日展开反日示威运动。以天道教教主孙秉熙为首的宗教界领袖，推选了33人，作为“民族代表”，起草《独立宣言》，并提出“大众化、一元化、非暴力”的方针，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与学生团体联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日爱国阵线。1919年2月8日，朝鲜留日学生首先发动。数千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发表要求独立的宣言，揭开了斗争的序幕。

1919年3月1日下午，汉城学生队伍浩浩荡荡拥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工人、市民和农村赶来参加国葬的农民群众也蜂拥而至。在学生领袖金元璧、康基德等人的主持下，学生代表郑在镕登上公园的六角亭，庄严地宣读了《独立宣言》。接着开始了示威游行。30万群众分成几路，奔上街头。示威群众高举朝鲜国旗，振臂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等口号。游行队伍的洪流汹涌澎湃，顷刻间淹没了整个汉城，交通为之断绝，日本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状态。

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迅即调集军队、宪兵和警察进行镇压。在日本宪警的屠刀下，赤手空拳的群众的鲜血染红了汉城的大街小巷，但没有人退缩。李大钊主持的《每周评论》以《朝鲜独立活动的情状》为题，报道了朝鲜三一运动的情况，并具体介绍了一位朝鲜青年学生的英勇斗争情景：“有一位幼年学生，右手拿一个（朝鲜）国旗，口喊独立，日本拿刀把他右手砍了。这位学生又用左手持起国旗，仍呼独立万岁。日本宪兵又把他左手砍了，这个学生两手虽然皆被他们砍了，口中仍然喊独立万岁不止。”在殖民者屠刀的威逼下，朝鲜爱国青年毫无惧色，充分表现了不屈不挠的争取独立的民族精神。

当群众掀起大规模反日运动的时候，孙秉熙等“民族代表”没有去参加群众集会，而是在泰和饭店聚会，悄悄地宣读一下他们起草的《独立宣言》，喊几句口号，就草草了事。他们还公布由孙秉熙等18人签署的约法三章，要求人们“一切行动务必遵守秩序”，“切勿以排外感情用事”，力图把群众斗争纳入和平请愿的轨道。随后，他们就打电话向日本警务总监部投案自首了。

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和“民族代表”们的妥协投降并没有能阻止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3月1日当天，除汉城以外，平壤、南浦、安州、宣州、义州、元山、仁川和大同等地也都发生了群众性的示威和暴动。3月5日，汉城人民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又一次举行示威游行，并转变为武装暴动，与日本军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汉城群众示威和起义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迅速传播半岛，反日民族主义的烈火在全国大小城镇和农村燃烧起来。从1919年3月至年底，在全国218个府、郡中，有217个府、郡爆发示威和起义。参加斗争的群众达200万人以上。青年学生是先锋，工农群众是主力，其他各阶层群众也积极投入斗争、旅居国外的朝鲜爱国者也热烈声援国内人民的斗争。

3月底4月初，斗争达到高潮。一些地区的群众自动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工人罢工转向政治斗争；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在咸镜南道的利原，农民袭击了郡守衙门，处决了日本郡守，一度掌握了郡的行政权。在工农斗争和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中小工商业者、下级官吏和职员采取停业、罢市、抵制日货和辞职、怠工等方式投入了这场民族斗争。侨居在中国东北、苏俄沿海州、日本和夏威夷群岛的朝鲜人也举行集会、游行，与国内人民斗争遥相呼应。

朝鲜人民起义爆发后，日本总督府立即发布戒严令，调动军队，配合宪兵、警察，并动员日本移民，采取野蛮的屠杀手段，把朝鲜人民的起义淹没在血海之中。在汉城，他们把示威群众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用大刀砍死。在水原，他们把群众关在礼拜堂内，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日本殖民军警，仅仅在3月至5月间，就屠杀了7500多人，打伤1.59万人，逮捕4.69万余人，破坏和焚毁了49所学校、教堂，烧毁715户民房，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三一人民起义到1919年八九月份终于被镇压下去。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也因为运动缺乏坚强正确的领导，停留在无组织的自发反抗状态，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虽在运动的发动阶段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当民众起来时却动摇妥协，惧怕革命斗争，终于造成起义的失败。

三一反日人民起义是朝鲜的一场全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朝鲜民族独立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起义显示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它震撼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机器。据不完全统计，起义人民共惩处了作恶多端的殖民官吏和宪警166人，摧毁警察派出所159个、面（邑）事务所77个、邮电局15所、其他官方机构27处。起义后，日本被迫改变统治方式，将“武断政治”改为“文治主义”。三一人民起义是朝鲜现代史的开端，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朝鲜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阶段。

朝鲜三一人民起义是一战后亚洲各国中最先掀起的反帝解放斗争之一，它鼓舞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三一起义进入高潮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亦受到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精神的鼓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人士和进步团体发表声明，声援朝鲜独立，并敦促北京政府电告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力争承认朝鲜独立。

朝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 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打击下，日本被迫变换统

治策略，以“文治主义”代替“武断政治”，取消以现役陆、海军大将担任朝鲜总督的规定，扩大录用朝鲜人充当官吏，虚伪地宣称允许朝鲜人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起义被镇压后，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分化瓦解。一部分上层分子成为亲日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另一部分人逃亡国外。当时中国上海租界里，组织了一个以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们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获得独立。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组织“独立军”，在朝中边境进行抗日斗争。

20年代，朝鲜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以后，工人逐渐组织起来，各地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研究团体。1925年4月17日，朝鲜共产党建立，第一任书记金在凤。1927年朝鲜国王纯宗李坫去世，确定6月10日为国葬日。共产党发动了反日的“六·十岁”斗争。在汉城、仁川等城市举行集会、游行，与日本军警发生激烈冲突。1926~1928年，朝鲜工农运动继续发展，罢工斗争294次，24,200多人参加；农民抗税斗争2000多次，11,500多人参加。1929年1月元山市3000工人的总罢工，震撼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标志朝鲜工农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涨。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殖民者压低朝鲜农产品价格，倾销日本商品，增加捐税，以转嫁危机的负担。1930年汉城的企业倒闭了二分之一，工人被解雇三分之一。在日本充当劳力的70,000名工人因失业纷纷回国。危机期间，日本和朝鲜地主提高地租，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负债和破产的农民急剧增加。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化。工农运动和学生反日斗争蓬勃发展。从1929年11月光州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开始，到1930年4月，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广泛兴起，汉城、平壤、釜山等大城市的194所学校和60,000多名学生卷入了斗争。1930年釜山纺织厂、平壤橡胶厂工人举行罢工；新兴煤矿工人发生暴动。农民抗租斗争不断发生，多次形成武装反抗。面对这种形势，日本殖民者撕掉了“文治主义”的面纱，加强了法西斯恐怖统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把朝鲜变为侵华反苏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基地，在朝鲜加紧兴建军火工业，修建军事工程，掠夺战略资源和粮食。30年代朝鲜工业比重增加，1925年朝鲜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7%；1936年上升为31%。这些工业几乎都是由日本财阀占有，并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据1932年统计，日本资本在工业中占91%，在商业中占99.2%。朝鲜民族资本微不足道。在机械制造业中，一个朝鲜人办的工厂也没有。

日本还加强了对农产品的掠夺以供应军队。1932~1936年，从朝鲜运出的大米比1927~1931年增加30%，使朝鲜人民的大米消费量急剧减少。为榨取朝鲜的人力资源，1937年日本总督府设立“劳动调查委员会”，凡17岁以上的劳动者须登记。随后把成百万的朝鲜人民强制派到中国战场充当劳力和炮灰，或送往日本做苦工。

同时，日本当局颁布《朝鲜临时保安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加强

朝鲜共产党成立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也没有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由于宗派主义者的破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到1928年已不再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组织的力量而宣告解散。但共产党人和一些地方组织仍坚持战斗。

政治迫害，1934年逮捕了“思想犯”66,000多名。日本殖民者还推行“皇民化运动”；鼓吹“内鲜一体”，企图把朝鲜同日本内地合为一体；强制朝鲜人改用日本姓名和日人通婚，进一步实行奴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激起了朝鲜人民强烈的反抗。30年代，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兴起的同时，朝鲜人民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一带，朝鲜人民革命军、韩国独立党军与中国抗日部队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是这个斗争的中坚力量。

金日成（1912~1994年），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诞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即今平壤万景台）的一个反日爱国家庭。1925年随父移居中国东北。1926~1927年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期间参加抗日活动，先后组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盟和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1年加入共产党。翌年4月组织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日益壮大，后来扩建为人民革命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与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密切合作，并肩作战。他们和中国抗日部队统一编制，在中国境内作战时，以中国抗日部队番号活动；返回祖国朝鲜作战时，则以朝鲜人民革命军名义活动。

与此同时，还有许许多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直接参加中国东北抗日部队。崔庸健、金策、徐哲、崔贤等都曾在中国东北与中国同志一起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4~1935年，朝鲜人民革命军历尽千辛万苦，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进行了成千次的战斗，影响日益扩大。中朝边境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鼓舞了朝鲜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朝鲜工人罢工斗争日益发展。据日本驻朝鲜总督府警务总监署的统计，1934年发生了199次罢工，有13,098人参加；1935年有170次罢工，有12,187人参加。

为了广泛团结朝鲜一切抗日力量，1936年5月5日，朝鲜祖国光复会成立，金日成被推举为会长。祖国光复会制定了纲领、章程，发表了成立宣言。它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是：实现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解除日本军队、宪兵、警察的武装，组织为朝鲜独立而斗争的革命军队；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亲日分子的一切财产；同平等对待朝鲜民族的民族和国家实行亲密联合。还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十大纲领全面规定了朝鲜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任务，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族民主纲领。祖国光复会的章程规定了会员资格、入会方式和会员的活动原则，并制定了该会的组织原则、组织形式等条款。

祖国光复会是以朝鲜共产主义者为领导核心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它成立后发表了宣言，号召朝鲜人民，不分阶级、性别、地位、党派、年龄、宗教的差别，在十大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参加和在各地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开展光复祖国的斗争。成立仅几个月，祖国光复会就发展到二十多万人。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中小工商业者和宗教人士纷纷成立祖国光复会。1936年12月1日，会刊《三月刊》发行，更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1937年1月，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之一“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成立，它建立了四十多个基层组织。祖国光复会的活动遍布中国东北和朝鲜国内许多地方，团结了朝鲜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推动了抗日武装斗争，并为朝鲜共产

主义政党的重建准备了条件。

1937年后，日本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镇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朝鲜人民抗日武装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从1937年至1939年与日军进行了三万九千多次战斗。1937年6月4日，金日成指挥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越过鸭绿江，奇袭日军“国境警备”重点据点普天堡，取得全胜，鼓舞和推动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朝鲜抗日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坚持战斗。在中国内地和抗日根据地的朝鲜爱国者的组织：“朝鲜独立同盟”等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与甘地主义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英国强行将印度拖入战争的深渊。在大战中，印度有 150 万人被征调到西欧和中近东战场上作战，其中有 10 万多人伤亡。大战还极大地加重了印度人民的经济负担。印度人民在大战期间被迫承担了高达 1 亿英镑的军费，名列英帝国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英国还向印度征调了大批的物质和粮食，英国从印度运走 369 万吨各种物质和装备，以及 500 万吨粮食。巨额的军费和向宗主国无偿提供的“贡赋”，使印度的国债在战后几年里高达 78 亿多卢比。大量粮食的外运使本来就缺粮的印度粮价大幅度上涨，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仅在 1918 年，就有 1200 万印度人被贫困、饥荒及流感夺去了生命，占当时印度人口的 5%。

一战给印度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一战前，印度人民虽然憎恨英国殖民统治，但不少人对西方文明只有模糊的认识。一战中，欧洲列强为了争夺世界不惜相互残杀，导致一千余万人的死亡，使印度人民有机会看到帝国主义惟利是图，崇尚暴力的特性，从而对西方文明有较清醒和全面的认识，坚定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其次，在大战期间，由于英国放松了对印度的控制，印度的民族资本有了长足的进步，印度资产阶级对战后英国资本卷土重来心怀恐惧，增加了对独立的渴望。第三，大战时，英国为了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支持，曾许诺在战后给印度人民以自治地位，加上大战已极大地削弱了英国，英国要像战前那样统治印度已经非常困难。

英国统治者对一战后印度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仍采用软硬两手来对付日益高涨的印度民族主义浪潮。一方面，英国人继续推行“宪政改革”。1918 年 7 月，英国发表了有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驻印总督蔡姆斯福联合署名的“改革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立法机构方面，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构，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选民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另一部分由总督指定，总督对立法会议通过的任何决议拥有否决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实行双头制，即将各省政务分为两类，一类为“保留部门”，包括治安、司法、财政等重要事项仍保留在英国省督手中；另一类为“移交部门”，如卫生、教育部门移交印度人担任的厅长管理。这个方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实际上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变的条件下，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和地方政权的席位，以便笼络他们。同时，“宪政改革”有利英国人挑拨离间印度各宗教教派及种姓间的矛盾，英国人好坐收渔人之利。英国人这种通过有限的让步，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控制在自己设计的程序中的做法同印度民族主义者原先所企盼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自然引起大多数印度人民的不满。

另一方面，让印度人民更为愤怒的是，英国人不仅没有实现大战时让印度自治的诺言，反而对印度实施更为强硬的措施。1919 年 3 月，殖民当局颁布由英国法官罗拉特提出的法案，规定战时制定的《国防条例》依然有效，授予总督特别权力，殖民当局有权不经起诉就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甚至可不经审讯即判刑或判服劳役，警察还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罗拉特法》的颁布，激起印度人民的抗议怒潮，各地举行集会、示威和罢工。

印度的民族主义力量在 1905 ~ 1908 年运动后经历了短暂的低潮后，在大

战期间已开始重新积聚力量，迎接新的高潮的到来。主要表现在：到 1916 年时，国大党实现了重新统一；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甘地开始承担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

在一战前，国大党内存在着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歧，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被开除出国大党。1908 年，提拉克被捕入狱；1914 年 6 月，提拉克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提拉克宣布自己效忠英王，并呼吁印度人民在战争中支持英国；同时，表示要通过合作和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达到自治的目的。因而此时激进派的政治主张同温和派已基本一致，经过党内一些人士的斡旋，在 1916 年当国大党年会在勒克瑙开幕时，两派统一终于实现，激进派重新进入国大党，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区分也随之消失。

就在 1916 年国大党两派重新统一时，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方的年会上，同时通过了共同制定的行动纲领——勒克瑙协定。协定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确认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双方达成的妥协原则，即国大党同意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在席位分配上，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省，其席位可以略低于人口比例；占人口少数的省，应得到略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

在争取激进派重回国大党和争取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合作的过程中，甘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1869～1948 年），出生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中等种姓家庭，父亲曾在本地一个小土邦任过官职。甘地在 1888 年西渡英国学习法律，1891 年结业获律师资格回国。1893 年到南非，在那儿生活了 22 年，1915 年才回到印度。在南非，甘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从原来只追求个人出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转变为争取印度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者；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转变为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在南非，除继续其律师工作外，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印度侨民反对白人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的运动。他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策略，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过各种媒介传到印度，在印度人民中声望鹊起。1912 年，国大党元老、温和派领导人郭克雷在南非考察中发现了甘地，并向国大党推荐了甘地。1915 年，甘地放弃他在南非的较为优裕的生活，回到印度承担起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责任。

甘地回到印度后，除了将印度的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到印度民族主义大旗之下，以及将他在南非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印度，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之外，甘地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他重视做争取工农的工作，将工农吸引到民族解放运动中，从而扩大了运动的基础，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甘地回国后，先是漫游全国，与各阶层交往，并深入民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1917 年，当他得知比哈尔邦的三巴朗地区的农民反对殖民当局强迫他们种植靛青植物的消息后，他赶到三巴朗，组织农民向政府请愿，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最后，比哈尔省政府不得不废除强迫农民种植靛青植物的法令。不久，当阿赫梅达巴德的纺织厂的工人同资方发生冲突时，甘地又赶到那里，组织工人罢工，甘地并以绝食相威胁，迫使资方对工人作出让步。由于甘地的倡导和亲自做表率，国大党开始面向工农，国大党同农民的关系因而也密切起来，国大党的组织也随之在基层建立起来。

当英国当局颁布《罗拉特法》后，国大党根据甘地的提议，决定 1919 年 4 月 6 日举行总罢业。甘地号召在这一天全印人民实行斋戒和祷告，进行

和平抵制。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在斗争中，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其中，旁遮普地区的运动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这里是印度的粮源和兵源所在地，一战时，英国从这里运走了大量粮食，在战场上牺牲的印度士兵也多来自该地区；这里还靠近俄国的中亚地区，十月革命的消息在这里广为流传；此外，这里革命基础好，在一战前以及一战中，民族主义者在这里已经做了大量宣传和动员工作。阿姆利则城是旁遮普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是锡克教的圣地，同时又是印度西北的重要铁路枢纽。《罗拉特法》颁布后，阿姆利则城的人民不断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英国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1919年4月10日，英国当局在阿姆利则城逮捕了两位民族运动的活动家。这引起了群众的抗议。城市居民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并一度控制了该城。英国殖民当局派遣戴尔将军率军开进阿姆利则，实行戒严。4月13日，约两万群众在当地的一个广场举行抗议集会，戴尔指挥军队堵住广场的出口，未发出任何警告便下令开枪，仅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就有379人被打死，1200人受伤，而当时的阿姆利则全城只有25万人口。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英国当局一面封锁消息，一面继续实行镇压。在阿姆利则城的大街和广场上搭起台子，把印度爱国者绑在上面进行体罚；在所谓英国女牧师受辱处设立“报应处”，强迫每一个印度人经过该处时，都得爬过去；不许印度人聚会，违者格杀勿论；将大批爱国者逮捕入狱。

“阿姆利则惨案”的真相被披露后，印度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连那些原来对英国人抱幻想的人也失望了。在孟买、阿麦达巴德、加尔各答、联合省、比哈尔等地发生焚毁政府机关、邮局、警察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颠覆列车，袭击警察和监狱的事件，愤怒的群众甚至同军队搏斗。

群众的革命行动冲破了非暴力抵抗的范围，甘地自责自己犯了“一个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错误”。4月中旬，甘地匆忙要求中止运动。但当时民众的反英情绪仍在高涨，甘地和国大党人不得不顺应这种形势。1920年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大党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大党和穆斯林基拉法运动领导人阿里兄弟一道制定了“非暴力不合作计划”。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格普尔年会正式通过该计划。在此计划中，甘地规定运动采取渐进的方式，分为三步：一、放弃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二、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三、逐步走上抗税阶段。

同时，国大党进行改组，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泛建立地方支部，吸收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入党。国大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00万党员和15万志愿者，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架构完善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国大党还通过甘地主持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规定国大党的斗争目标为“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实现司瓦拉吉”。甘地对司瓦拉吉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即：如有可能，在英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有必要，就脱离英帝国而独立。新党章第一次提到了独立的目标。

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多达三分之二的选民抵制选举，许多职员和律师放弃自己的职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有的地方公开焚烧英国货。群众一旦动员起来，他们就不满足国大党所设立的运动范围，他们要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要将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一场社

会革命。在 1921~1922 年间，印度各地先后发生了劳动群众与有产者间的阶级冲突，比较著名的有：孟买的工人罢工、旁遮普的阿卡里运动、马德拉斯的莫普拉起义，以及联合省的农民运动。孟买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阿卡里运动中，下层锡克教徒要求将锡克教财产归全体教徒所有，教团由选举产生，矛头对准锡克教上层人士。莫普拉起义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低级种姓反对印度教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联合省农民斗争矛头对准当地地主。这些冲突偏离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将矛头对准英国人的大方向，而且这些冲突中往往采用暴力方式，违背了甘地设立的“非暴力”界限。

为了平息印度人民的反英运动，1921 年 11 月，英王王储威尔士亲王到达印度“巡视”。遭到孟买和各地人民的抵制，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下旗志哀，举行总罢业。有的城市由抗议转变为与军警的流血冲突，仅在孟买，就有 59 人丧生。恼羞成怒的英国人大批地逮捕印度的爱国者，从 1921 年末到 1922 年初，有多达两万的印度人被关进监狱，其中包括了除甘地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印度著名民族主义领导人。

1922 年 2 月 1 日，甘地向当时的里丁总督提出最后通牒，如果英国当局不释放政治犯，不取消对报刊的审查制度，他将宣布开始不合作运动的最后阶段——抗税。

英国政府不愿让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扬言英国不可能也不准备给印度自治。为了保住印度，英国对爱尔兰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作出让步，腾出手来，将军队调往印度进行镇压。

在这决战关头，甘地不顾当时党内许多人的反对与不理解，决定暂时退却。他以曹里曹拉事件为由，宣布中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曹里曹拉是联合省的一个村镇，1922 年 2 月 4 日，为了抗议警察镇压他们的游行示威，两千多农民包围了当地的警察所，愤怒的农民放火焚烧警察所，21 名警察在火中丧生。甘地认为这一事件表明运动已完全超出国大党控制的范围，如让运动继续下去，将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1922 年 2 月 12 日，根据甘地的提议，国大党在巴多利召开会议，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1922 年 3 月 10 日，甘地被捕，被判处六年徒刑。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转入低潮。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的中止标志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时期。群众对国大党的热情骤然下降，国大党党员数在高潮时期曾达近千万人，1923 年时下降到不足五十万人。甘地身系狱中，国大党领导层在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所应采取的斗争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派人坚持甘地的主张，即暂停政治斗争，全力以赴实施建设性纲领，包括推广手纺，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消除不可接触制，禁酒，促进民族教育等，为以后发动新的不合作运动准备条件，这一派被称为不变派。另一派人则主张既然不合作运动停止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必须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他们特别强调没有必要再抵制立法会议，而应重新参加选举，争取国大党有更多人进入立法会议，否则，国大党就会自行脱离政治舞台，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一派人被称为主变派。无论是不变派还是主变派在群众中都缺乏号召力。

到 20 年代末，由于印度政治舞台上出现新的因素，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再次高涨。首先，在 20 年代末，印度出现了工农运动。在 20 世纪上半叶，印度工业在亚洲国家中名列前茅，因而有一支较大较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据

1921年工业普查，受雇于十人以上的企业中的工人总数约为260万人，他们集中在一些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印度的政治中心。又由于现代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斗争性，印度工人阶级因而成为印度现代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一战以前，孟买工人为抗议英国政府审判提拉克而举行的总罢工第一次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度的工人阶级进一步觉醒，他们成为国大党领导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的重要群众基础。其后，印度工人的组织性更加提高，到1926年，已有将近两百个工会，拥有三十余万会员，其中纺织工会发展较快。在此基础上，成立于1920年的全印工会的地位也逐渐加强，1926年全印工会大会拥有57个工会，125,000会员。印度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工会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反映在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战斗性的增强上。1927年以前，工会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温和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强调经济方面的要求，经常执行妥协的路线。1927年后，由于一大批印度共产党人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人士加强在工人中的工作，使印度工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1931年后，印度有三个分属不同中央的工会组织：国大党控制的全印工会大会；右翼改良主义分子所主持的全国职工联合会；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职工大会。

同时，农民运动在农村兴起。印度的工业发展并没有根本改变印度的落后农业国地位，农民在总人口的比例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1891年，印度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5%，40年后，1931年，上升到75%。同时，英国统治印度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人口的急剧膨胀，1800年时印度只有7000万人，1900年增加到2.8亿，1940年再上升到4亿多人。这意味着印度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大大缩小了。大批农民为生活所逼，要么借下高利贷，要么出卖自己的土地，最后的结局是成为一无所有的雇工和佃户，在1921~1931年的十年中，农业无产者的人数从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有多达五分之四的农民是欠债的。饥寒交迫的农民不得不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1927年发生在印度西部巴多利农民拒绝交纳田赋的群众运动最具代表性。国大党积极参与并组织了这场斗争，政府不得不取消将田赋平均提高20%至25%的决定，释放被捕的农民，归还他们被没收的土地。这一运动提高了国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1936年，在国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全印度的农民组织——全印农民协会。

其次，在20年代末，印度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信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力量。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俄国十月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开始传播。到1923年，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拉合尔等地，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但在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上，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英国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镇压年轻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初，殖民当局制造了所谓的坎普尔的共产主义者诉讼案，四名印度共产主义者被捕并被判四年监禁。在1929年3月20日，又有33名工人领袖和共产主义者被控“阴谋反对国王陛下”和“打算取消英王在印度的主权”，他们被关进密拉特市监狱。印度共产党在发展道路上步履艰难也同印度共产主义者们没能同印度社会带给他们的种姓、宗教、地方社团观念决裂，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有关。尽管如此，印度共产党人的活动在组织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自身权益，以及加强印度左派力量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印度革命运动史上，工农党的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在 1926 ~ 1928 年间，在孟买省、孟加拉、旁遮普和联合省共建立了四个工农党。工农党的成员多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他们对当时革命低潮时期国大党内浓厚的妥协思想和无所作为不满，开始寻找其他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方式。他们认识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因此，建立了体现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工农党。

但是，对 30 年代及其后印度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大党党内左派力量的崛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昌德拉·鲍斯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尼赫鲁（1889 ~ 1964 年）出生在一个西化家庭，他的父亲 M. 尼赫鲁是印度的名律师，又是国大党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尼赫鲁自幼受西式教育，后又在英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以参加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其政治生涯，很快得到甘地及其他国大党领导人的赏识。尼赫鲁在英国学习期间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1927 年访问欧洲，代表国大党出席布鲁塞尔殖民地人民大会。同年，他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了他良好的印象。回国后，他在印度大力鼓吹社会主义。鲍斯（1897 ~ 1945 年）出生在孟加拉的一个地主家庭，先后在加尔各答和英国剑桥受教育，并通过了文官资格考试。1921 年 6 月回国，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文官前途，投身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1927 年 11 月，当选为国大党孟加拉省委员会主席。同年底，和尼赫鲁一起被任命为国大党秘书长。尼赫鲁和鲍斯在政治观点上最大的一致体现在他们不满老一辈国大党人的做法，不满足于有限的自治目标，他们要求取得完全的独立。1928 年 11 月，在他们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印独立同盟。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工农党的成立，国大党左派力量的形成，这些 20 年代末出现的新因素为 30 年代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再次高涨提供了条件，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促使了革命运动时机成熟。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袭击了印度的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种植单一性经济作物的地区。危机期间，印度农业产值从 103.4 亿卢比下降到 47.3 亿卢比。黄麻、棉花、大米的价格下降二分之一以上。农民的收入减少一半以上，而赋税却有增无减。大批农民负债、破产，成为农村无产者。在工业部门，由于危机的打击，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1931 年印度失业人数达一千七百万。在业工人的工资大为降低。经济危机加剧了印度社会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英国资本家极力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凭借帝国优惠制，殖民当局帮助英国滞销商品强占印度市场，并人为地保持高价，导致进出口商品也就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急剧扩大。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进一步打击了印度工商业者、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加深了广大印度人民的苦难，促使印度各阶层人民投身民族主义运动。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 1930 年甘地发动的“食盐进军”为标志正式开始。实际上在此之前，英印关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 年，英王任命了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调查团来印度调查孟太古—蔡姆斯福方案实施情况。在调查团七名成员中，竟没有一个是印度人，这激起了全体印度人的愤怒。国大党一致决定对西蒙调查团实行抵制。西蒙调查团 1928 年 2 月 3 日抵达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共产党人、全印工会大会等都宣布抵制。广大群众以及商会、工厂主协会都积极参加，全印各地掀起了抗议浪潮。这种形势

推动了甘地和国大党领导层在 1928 年国大党年会作出决定如英国当局一年内不给予印度自治，就开展新的更强有力的不合作运动争取实现独立的目标。

英国政府在接到国大党的最后通牒后，拖了一年时间，在 1929 年 10 月 31 日，由印度总督发出文告说将在伦敦召开有各土邦代表及各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以便在会上为印度制定宪法。国大党接到文告不到 24 小时便在德里召开会议，讨论总督的建议。会后，党内各派领导人发表了《德里宣言》，要求圆桌会议必须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并提出国大党只有在实现如下条件下才能参加圆桌会议：必须采取和解的政策，以营造一种平静的气氛；必须大赦政治犯；国大党的代表要在会中占多数等。

《德里宣言》主要是根据党内右翼派别的意见提出的一项温和的要求，同左派的主张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要求也被英国政府拒绝了。同时，殖民当局通过了公共安全法，准备大肆镇压印度爱国者。

1929 年 12 月当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举行时，它别无选择，只有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甘地推荐尼赫鲁为大会主席，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大会还决定授权工作委员会发动以争取独立为目标的新的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并决定国大党退出中央和省立法会议。工作委员会授权甘地全权领导不合作运动，由他规定运动的方式和开始时间。新选出的全印委员会还把 1930 年 1 月 26 日定为“独立日”。

1930 年 1 月 26 日，孟买和全国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独立日”活动。1 月 31 日，甘地向总督欧文提出 11 点要求，主要内容有：降低地税 50%，废除食盐专卖和取消盐税，削减军费至少一半，减少英国官员薪金 50%，实行保护关税，释放政治犯等。尽管这些要求连争取自治领的地位都没有提及，仍遭到当局无理拒绝。3 月 12 日，甘地亲率他的 78 名弟子，开始向印度西海岸的一个名叫丹地的村子进发去制盐。这段路全长 240 公里，甘地一行了 24 天。主要目的在一路上宣传动员群众，以抗盐税作为全面抗税斗争的开始。

“食盐进军”点燃了全国抗英运动的烈火，示威游行、罢工和农民抗税斗争风起云涌。运动很快在一些地方冲破了甘地所限定的非暴力框框，开始转化为武装斗争。其中，发生在孟加拉省的吉大港、西北边省的白沙瓦，以及孟买省的绍拉普尔的武装起义最为激烈，影响最大。吉大港是濒临孟加拉湾的一个港口城市，英军在此设有一个大军火库。1930 年 4 月，这里的秘密革命组织“吉大港印度共和军”发动武装起义来配合全国的群众性反英运动。4 月 18 日夜里，吉大港共和军攻占了军火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同时，另一部分人在城里切断电信联络，破坏铁路交通，以阻止外来援军进入，并且占领了警察营房，实际上控制了该城。英国派出大部队前往镇压。终因寡不敌众，吉大港起义最后失败。吉大港武装起义发生后不久，在 4 月和 5 月，位于印度西北边陲靠近阿富汗的白沙瓦和印度纺织工业城绍拉普尔也发生了武装起义。最初这两地的人民只是响应国大党的号召，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活动，由于英国当局派出军队镇压，逮捕当地领导人，激起民愤，人民被迫自发地拿起武器同殖民军战斗。他们占领殖民政府机关，构筑街垒，曾一度控制城市好几天。在白沙瓦，一些英印军队还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拒绝向群众开枪。起义极大地打击了英国统治者，为了对付白沙瓦起义，英国不得不将全印三分之二的兵力集结到那里。

但是，起义没能得到国大党的有力支持，甘地甚至批评拒绝向群众开枪的军人。起义因而没能得到全国的响应和支援，在强大的敌人镇压下，这种孤立无援的起义只能失败。

在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英国统治者采用两面手法来对付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方面，殖民当局在全国颁布特别法令，实行戒严，禁止集会、游行，宣布国大党等组织为非法，逮捕了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将十几万参加不合作运动的群众关进监狱。另一方面，对印度人民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离间国大党同印度其他政治集团的关系，孤立国大党，并最后将国大党逼到英国人设置的谈判桌旁，在英国人拟订的协定上签字画押。1930年11月，英国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圆桌会议，参加者有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锡克教和贱民领导人，社会各界名流，以及土邦王公代表。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抵制了这次会议。但是，甘地和国大党未能将对圆桌会议的抵制态度坚持到底。1931年时，由于英国当局的严厉镇压，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国大党又没能组织起有力的抵抗，一度轰轰烈烈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转入低潮。1月25日，总督下令释放甘地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所有成员。2月17日甘地与总督欧文在德里谈判。3月5日，签定《甘地—欧文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英国承认国大党合法，国大党则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圆桌会议。同年9月，甘地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会议上，国大党提出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要求，被英国政府拒绝。不仅如此，由于英国人的挑拨和利用，国大党同印度其他政治集团在有关议会席位分配上产生尖锐的矛盾，对日后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国大党在第二次伦敦圆桌会议上所遭受的屈辱与挫折使党内激进派十分不满。而殖民当局则利用第二次圆桌会议召开的机会，作好了进一步镇压的准备。在圆桌会议结束后不久，1932年1月，殖民当局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进行大搜捕；国大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甘地等主要领袖又一次被捕。国大党再次恢复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但已不可能具有1930年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了。1934年5月，国大党正式宣布无条件停止不合作运动。

1935~1945年间印度的政治发展 国大党一停止不合作运动，英国当局就着手其“宪政改革”，试图诱导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按英国人预先设计的方案与英国统治者合作。1935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这一宪法是根据“西门调查团”的建议制定的，除了对印度人民作一些无关大局的让步外，基本是《孟太古—蔡姆斯福方案》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内容。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印度人民的反对，称它为强加在印度人民身上的“奴隶宪法”。

尽管如此，国大党决定利用新宪法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进行斗争。新的政府组织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关于联邦政府体制，另一部分关于省一级政府体制。英国人在后一部分对印度人民作了较大让步。虽然英国仍然坚持由殖民当局委任省督，省督可以否决省立法会议决议、解散省立法会议，可以干预省政府活动并有权解散省政府；但也规定，省立法机构由选举产生，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由省立法会议选举中得到大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省政府，省政府对省立法会议负责，可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作为妥协，英国当局决定暂时搁置印度人民反对较强烈的联邦政府部分，从1937年4月1日起，首先实施省自治部分，并定于同年初先按照新法案，实行省立法会议选举。

选举结果表明，大多数的选民投了国大党的票。在 11 个省总共 1585 个席位中，国大党得到了 714 席，在 7 个省组织了国大党人政府。虽然省政府的权力有限，但这毕竟是由印度人自己在地方上行使权力，是印度人民在国大党领导下开展民族主义运动迫使英国人作出的让步。国大党的威望迅速增长，党员从 1936 年的不到 50 万人，增至 500 万人。

国大党参与省立法会议选举并组织省政府也给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使党内的右翼温和势力抬头。党内左翼力量反对组织省政府，认为那将不可避免地转到与殖民当局合作的立场，导致放弃争取实现独立目标的后果。但左翼力量未能扭转方向。最后，以鲍斯为首的一部分人于 1939 年 5 月在国大党内成立前进集团。6 月 22 日，前进集团进而与国大社会党、共产党的民族阵线等组成左派团结委员会。国大党内的矛盾加深了。

其次，国大党在省立法会议选举中的胜利及随后省自治的实施过程给穆斯林联盟以极大的刺激。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0～1949 年）。真纳生于卡拉奇的一个富商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学法律，获律师资格。回国后成为穆斯林的著名律师。1896 年加入国大党，1913 年参加穆斯林联盟。从 1934 年起为该组织的永久主席。他原来主张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合作，争取印度自治。因而，他并不是一个教派主义者，同国大党党人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存在着合作的基础。选举的结果使真纳和他的穆斯林联盟大失所望。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是情理中的事；但出乎真纳的意料之外的是，穆斯林占当时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穆斯林联盟只得到 1585 席中的 108 席。甚至在穆斯林居民占主体的省份，它也没能获得多数。大选后，真纳希望国大党能在穆斯林得席位较多的省政府中给穆斯林联盟一些部长职位，遗憾的是这一真诚的合作愿望遭到国大党的拒绝。国大党一些领导人采取唯我独大的作风，排斥其他党派。尼赫鲁就曾说过：“归根结底，今日印度只有两方力量，即政府和国大党。其他力量必须分别排到这两方力量中”。这些因素促使真纳及其他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为了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同国大党抗衡，必须争取全印穆斯林的一致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多地求助于教派主义，只有教派主义的旗帜才能使全印穆斯林认同于穆斯林联盟。

但是，尽管存在党内矛盾以及与穆斯林联盟的不和，1939 年时的国大党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没有其他印度政治力量能与之抗衡。英国当局认识到，消灭国大党已不可能，避开国大党作出的任何决定在印度无法产生效力；同时，他们尽管不愿意离开印度，但也不得不承认让印度获得自治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让印度的稳健保守的势力接管政权，使权力的过渡不致损害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的利益。这一点，在二战爆发前已显示出端倪。

二战对印度政治发展的影响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大党与英国当局的政治合作随之结束。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同一天，英国未经印度人民的同意，宣布印度对德作战。同时，英国当局颁布《印度国防法》，授权警察部门可以驱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封闭报刊，并对一切它认为“有碍国防”的人，不经起诉即可随意逮捕。英国议会还匆忙通过了 1935 年印度政府法补充法。根据该法，殖民当局有权解散自治省政府。英国人这些做法明显地表现出对印度人民力量的鄙视，想趁战争之机，压制印

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英国人的行径激起了印度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国大党不愿重犯一战时的错误，不再相信英国会以德报德，会以印度人民在战争中对英国的支持而在战后答应印度人民的要求。他们认为，战争使英国的力量大为削弱，正是要求英国让步的最佳时机。所以，国大党一方面反对法西斯侵略，同情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另一方面，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英国未给予印度独立的地位之前，印度人民不愿在战争中支持英国。英国当局则坚持只有在战后才会考虑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

作为对英国顽固态度的反应，1939年11月，八个省的国大党省政府实行总辞职。国大党在甘地的领导下，开始第三次不合作运动。英国当局则大规模地逮捕国大党领导人和左派人士。在整个二战期间，国大党一直对殖民当局抱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国大党同殖民当局矛盾的加剧给穆斯林联盟的发展一个机会。穆斯林联盟将国大党省政府总辞职当作摆脱印度教徒统治的“解放日”来庆祝。1940年3月，在拉合尔举行的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决议。这一国家将包括印度东北和西北住有穆斯林最多的地区。自此，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再也不可能调和了。

印度左派力量在二战中遭到削弱。二战中，英国将大批军队派驻印度，在战争初期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在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下，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其他左派人士，都没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印度共产党将国际上法西斯势力与民主势力的斗争摆在首位，转而采取与英国人合作的态度，放弃了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而影响了共产党在战时及战后的发展。而以鲍斯为首的一部分印度爱国志士则错误地同德国和日本建立联系，想获取他们的支持，通过武装斗争赶走英国人。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印度的各种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各种政治派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采取不同的策略，使各自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战后印度的前途。国大党坚持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从合作转到不合作立场，从而在印度人民中确立了自己的威望；共产党和其他左派力量因各种原因，没能在战时得到发展；而穆斯林联盟在二战中得到发展。战后印度的前途自然地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来安排，战后印度的独立最终以印巴分治的形式来实现。

甘地主义及其评价 甘地在印度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甘地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他面对强大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毫不畏惧；斗争虽屡遭挫折，却毫不气馁。他一生中曾入狱17次，最长一次被判6年监禁；绝食也达17次，最长一次达21天。尽管如此，他从没放弃过实现印度自治和独立的目标。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难能可贵的精神，他因而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意即“伟大的灵魂”）。

在甘地的推动下，国大党改组为一个有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并有城乡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党，斗争由上层分子的狭小圈子扩大到广大群众之中，从而揭开了国大党历史新的一页，进入“甘地时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亲自先后领导了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运动中，甘地采取抵制洋布，反对食盐专卖，要求减低地税等措施，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反对英国殖民者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甘地为印度的独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印度独立后，

他被尊为印度共和国的国父。

甘地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甘地的思想，或称甘地主义，内容庞杂，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爱、真理、非暴力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宗教观；以争取印度自治独立为主的政治思想；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消灭贱民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富人庇护穷人的社会思想；限制大工业发展、发展乡村工业、提倡手工纺织的经济思想。尽管在国大党内外对甘地这些思想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为印度争取自治独立的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印度独立后制定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

最后，还应该指出，甘地的非暴力实际上限制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革命转变为一场劳动群众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革命。这一点表明甘地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为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第三节 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战后东南亚的发展形势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东南亚地区，除暹罗（泰国）以外，均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整个东南亚地区已被瓜分完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占有缅甸、马来亚、文莱、沙捞越、沙巴和新加坡，面积共 101 万平方公里；法国占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面积共 74 万多平方公里；荷兰占有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立荷属东印度，面积共 190 余万平方公里；葡萄牙占有东帝汶，面积为 1.8 万平方公里；美国取代西班牙，占有菲律宾群岛，面积为 29.9 万平方公里。

暹罗（泰国）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但英、法通过协议，以湄公河河谷为界，划分了双方的势力范围，暹罗实际上是英法争夺和双重控制下的半殖民地。

在这一时期，西方殖民国家将东南亚各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战略基地。经济上，东南亚完全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转变。在政治上，各国政治体制虽有不同，但基本特征是建立了由西方殖民国家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殖民政权统治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外交和军事等等重要权力集中于总督和高级驻扎官手中。同时，西方国家把某些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带入殖民地，并不同程度地保留和利用当地原有的统治机构，扶植当地封建势力、部落酋长充当统治工具。建立联邦，以当地人治当地人，实行分而治之，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国家常用的统治手段。英国在自己的殖民地实行所谓宪政改革；美国实行“菲律宾化”，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荷兰继续奉行所谓给殖民地以权力和福利的“道义改革”；法国殖民政策则由“合一主义”转向“联系主义”。这些殖民政策上的调整都是企图以一定的“让步”来保持它们在殖民地的特殊权益与地位。现代时期，一些东南亚殖民地出现了咨询性议会和法院，实行政官制，政党也纷纷成立。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在一战后，东南亚国家交通运输发达起来，城市兴起，人口增多。东南亚各国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长发展起来。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民族主义政党如越南国民党（1926 年）、印尼民族党（1927 年）、缅甸德钦党（即我缅人党 1930 年）等相继成立。从 20 年代起，尤其是 30 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东南亚国家（印尼、越南、马来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共产党先后成立。泰国共产党成立稍晚（1942 年）。一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工农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此伏彼起，不断发展。其中，越南和印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最为蓬勃。

由于各国国情与社会的差异，阶级力量状况不同，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如同亚非其他地区一样，存在不同类型，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如印尼、缅甸、菲律宾、马来亚和新加坡等；有的国家掌握在爱国王公手中，如柬埔寨；唯有越南，是在 1930 年共产党成立后，革命领导权转由工人阶级的政党掌握。

东南亚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各具特色，但综观各国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国家的重

大斗争事件有：1926～1927年印尼的反荷民族起义；1930～1931年越南的反法民族解放斗争高潮和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30年缅甸沙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德钦党人领导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和反英的学生运动；1935年菲律宾农民起义和在武拉干省成立“共和国”的斗争。

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国家政权一直握于以王室为中心的泰国人手中。然而，泰国也并非一成不变。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拉玛四世、拉玛五世的改革之后，1932年在资产阶级政党——民党的领导下，泰国又发生了革命性政变，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

东南亚地区盛产大米和热带经济作物，锡、橡胶和石油等战略资源丰富，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海岛又处于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垂涎已久，从30年代初开始，日本加紧了东南亚的渗透与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南进”步伐。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用武力强占东南亚地区，将东南亚诸国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体系之中。这激起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高潮。二战期间，越、缅、马、新、菲等国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印尼和泰国也开展了抗日运动。东南亚各国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经验积累，为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战争，但法国利用越南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征调了十余万人充当士兵或劳工。大战期间，捐税、殖民贡税和强制性公债增加。越、柬、老三国供给法国将近19.15亿法郎的公债和2亿法郎的经费。

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战后获得新的殖民领地与委任统治地，但战争使法国经济遭到严重损失。为恢复国内经济巩固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法国在战后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经济开发。1921年4月，法国殖民地部部长阿尔贝·萨罗提出了开发各殖民地，包括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他的计划经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当局同意后，开始实施。这就是法国对越南的第二次殖民经济开发。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法国财政金融资本失去了俄国，因而涌向了东方国家，向印度支那的资本输出空前增长。1924～1929年，法国私人资本对越南的投资约达30亿～40亿法郎，而1888～1918年，法国国家与私人资本向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的投资总额仅约十亿法郎。上次殖民经济开发期间，法国主要投资于采矿与交通运输两个部门，这次开发则首先投资于农业，主要是发展橡胶种植园，其次是采矿业，同时也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这是第二次经济开发的特点。

这一时期，以橡胶为主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橡胶种植面积由1924年初的3.12万公顷增加到1930年的99,678公顷；乳胶产量由1913年的将近200吨增加到1929年的10,308吨。20年代，越南掀起了一股探矿、开矿的浪潮，当局发放了大批的探矿许可证，建立一系列矿业公司，矿产总值迅速增加。1924年矿产总值为印支币1140万盾，1929年增至1860万盾，按当年1盾等于11.46法郎计算，共计价值2.137亿法郎。法国采矿公司利润猛增，鸿基煤矿公司刚成立时（1888年）仅有资本900万法郎，1930

年连本带利增加到 3840 万法郎。

资金较战前雄厚的东方汇理银行，在这一时期仍然代表法国金融巨头的利益，握有法属印支的财经大权，它在各大公司、企业均有股本。法国殖民政权并继续提高关税税率，限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的商品输入，将越南的外贸束缚在法国贸易圈内。法国资本家通过控制越南市场，操纵越南的主要出口商品——煤、大米、橡胶等，每年攫取高达 10 亿多法郎的巨额利润。1924 ~ 1929 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印度支那有人称这一时期为法国资本家的“黄金时代”。

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越南民族工商业有较快的发展。20 年代，越南资本家创办了纺织厂、发电厂、内河轮船公司，拥有小矿山，开设了出口贸易商行。1926 年西贡成立了越南人投资和经营的越南银行，拥有资金 26 万盾，由黎文贡任经理，南圻的一些越南地主、资本家投资，这是民族金融资本的萌芽。战后，越南资产阶级真正形成。但是，在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越南民族资本力量薄弱。据统计，1926 ~ 1927 年，河内较大的工商企业有 700 多家，越南人经营的仅 300 家；西贡有 539 家企业，越南人经营的只有 70 家。越南民族资本大多是中小商业资产阶级。上述第一家越南人的银行，资本微薄，开业不久后被法国大银行并吞。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增加。1928 年，河内有 13 万人，海防 9.8 万人，顺化 3.5 万人，西贡 12.5 万人，堤岸 19.2 万人。20 世纪初，城市居民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到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已增加到 8% ~ 10%。与此相适应，城市小资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在殖民制度下，越南经济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工业不发达，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不那么清晰。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遭到殖民主义的压抑，得不到自由发展，他们与殖民制度有深刻的矛盾，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教育，具有独立与自由的新意识，是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霍尔在《东南亚史》中说：在法属越南，“反对法国人最激烈的正是那些最擅长法语的人”。

第二次殖民经济开发，促进了越南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也推动了越南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战前，越南工人人数仅约 10 万人，到 1929 年底，据法属印度支那劳工总局的调查统计为 221,052 人。其中，工商企业工人 86,624 人占 39.2%；农业种植园工人 81,168 人，占 36.8%；矿工 53,240 人，占 24%。此外，还有数万在越南资本及其他外侨资本（华侨、印侨资本）企业中劳动的工人。这里还没有包括在铁路、水利工程的劳工、季节工以及手工业工人等。越南工人阶级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有的具有半工半农的性质；其数量和占人口的比重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相比，但它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就分布部门说，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集中于种植园，四分之一的工人集中在采矿业。就地域分布而言，北部集中于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和工矿区；中部集中在义安—荣市—边水一带；南部则以西贡—堤岸地区居多。越南工人阶级身受多重压迫，劳动时间通常每日长达 12 ~ 14 小时，工资微薄，劳动条件恶劣。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享有社会保险，稍有反抗就被视为非法而遭到迫害。尤其是在种植园和矿山的契约劳工，他们被法国劳工招募所骗来后，丧失了人身自由，许多人在期满前就死于虐待与疾病。越南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而富有革命性，这个阶级还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密切的联系，这为他们之间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第二次开发期间，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地主阶级对越南农民土地的掠夺更加紧了。根据法国学者伊·亨利的统计，1930年间越南的土地分配情况大致是：人口的94.8%占有耕地28.5%；而人口的5.2%却占有耕地59.6%。在越南南部土地集中程度最高。拥有5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占南部人口的2.5%），共霸占了100多万公顷的土地，为南部耕地总面积的45%。殖民者为发展农业种植园，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土地。据1931年的统计，法国地主占有耕地及未开发的土地90万公顷，其中南部60多万公顷，占越南耕地面积的20%。高额的地租、捐税和高利贷负担，使越南农民终年劳累，所获连维持三四个人的生活也极度艰难。因而，越南农民阶级也处于与殖民主义和封建地主对抗的地位。

由此可见，战后法国的殖民经济开发，客观上促进了越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并给越南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同时由于法国殖民者与越南封建势力勾结起来，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阻碍了越南社会的进步，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越南民族的觉醒。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法国和中国两个途径传播到越南。从20年代起，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23年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如越南义团、复越会、兴南会、越南青年党和越南独立党相继诞生。1924年6月，越南爱国志士范鸿泰在广州沙面法租界用炸弹行刺法国驻印支总督麦蓝未成，在军警追击下，他自沉珠江牺牲。范鸿泰的勇敢行动与壮烈殉节的事迹传入越南国内，激起了广大群众更强烈的反法情绪。

20年代中期，越南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逐步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建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成为越南革命发展的迫切要求。

越南工人阶级政党的缔造者胡志明（1890～1969年），原名阮必成，曾改名阮爱国，在中国活动期间改名胡志明，义安省（今义静省）南坛县人，15岁参加反法秘密活动。1911年只身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1917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在法国建立越南爱国者联谊会。1919年，代表越南爱国者向巴黎和会递交了提出承认越南民族自决权，恢复越南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等八项要求的请愿书。1920年加入法国社会党，接着到达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1924年底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胡志明从苏联到达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胡志明于1925年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组织共产团作为这个革命组织的核心，同时举办政治训练班和选派革命骨干入黄埔军校学习，以培养革命干部。这些青年回国后，深入工矿农村，发动并组织工农运动。

从1925年开始，越南国内人民斗争日益高涨。7月，越南民族主义的著名领袖潘佩珠在上海被法国密探诱捕，押解回国，被殖民当局的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激起了越南人民的抗议怒潮。在人民斗争压力下，法国殖民者不得不释放潘佩珠，把他软禁在顺化。1926年3月24日，越南爱国民主主义者潘周桢逝世。全国掀起了追悼这位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参加送葬活动的人达14万。

1928～1929年，越南革命运动和工农斗争进一步发展，秘密工会成立。1929年年中以后越南出现三个共产主义的组织。6月，北圻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内部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河内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圻的共产主义倾

向组织新越革命党改组为印度支那共产联盟。10月，南圻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也改组，称为安南共产党。但这三个组织各自独立活动，甚至互相排斥。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在香港九龙秘密召开党的统一会议，合并了三个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在党中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任总书记陈富起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论纲》（即《政治论纲》），制定了“打倒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与路线，并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党的建立，标志着越南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

1930年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越南。危机持续到1935年，首先影响越南的农业。越南的大米及其他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西贡米市的1号大米1929年每石价格为印支币11.58盾；1931年降到6.72盾，1934年落到3.26盾，下降了68%。农民收入锐减，捐税反而增加。1929~1933年，各地连年发生灾害和饥荒。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一些富裕农民和小地主也濒于破产。地价下跌，许多地方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法国种植园主及越南地主乘机兼并土地。为转嫁危机，法国向越南倾销剩余商品，许多企业因此减产或倒闭，外贸萎缩，市场萧条。半数以上工人失业，各阶层人民生活恶化。但法国公司和种植园从殖民当局获得贷款和津贴，不仅保住自己的经济阵地，而且继续向国内汇回巨额利润。殖民官吏和封建官僚的薪俸也普遍得到提高。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危机，促使了越南人民反法斗争的高涨。

1930年2月9日，爆发了由越南国民党领导的安沛起义。起义首先在安沛发动，随后在临洮、永保和扶翼等地相继起事。越南国民党在起义中提出“把法国强盗赶回法国去，把南国（即越南）交还南人”的口号。起义以越籍士兵为主力，并有部分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但由于准备不周，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农民，因而几天内就被镇压下去。国民党的领导人阮太学、阮刻濡等牺牲，许多起义者被捕，幸存的国民党人被迫逃亡。从此，越南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结束。

安沛起义失败后，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共产党一面着手统一和建立各级党组织，同时提出“反对白色恐怖”、“释放被捕起义者”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动员群众掀起抗法斗争。

1930年2~4月，南部富莲种植园、北部南定纱厂、中部义安边水火柴厂和锯木厂的工人先后举行大罢工。北部河南省和太平省农民要求分配地主稻米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这些斗争揭开了1930~1931年越南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序幕。同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许多省市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农民发动抗税斗争。南部西贡附近农村每晚可听到召集农民集合的鼓声，形成了一个“红色地带”，共产党影响扩大，一些乡被称为“共产乡”。五一节的斗争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6~8月，越南全国爆发了121次斗争，其中工人斗争22起，农民斗争95起，其他劳动人

陈富（1904~1931年），河静省（今义静省）德寿县人。1926年加入反法民族主义组织，新越革命党，同年7月至广州见到胡志明，后赴苏联入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任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1931年4月在西贡被捕，9月在狱中病逝。

越南国民党于1927年12月25日建立，主要领导人阮太学、阮刻濡等人，其纲领主张首先进行民族革命，然后进行世界革命，其行动纲领主张建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培养干部，伺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殖民政权。

民阶层斗争 4 起。群众斗争最激烈的是中部，共发生 82 次。

在 30 年代初的斗争高潮中，中部义安、河静两省的运动发展最为迅猛，形成斗争的最高峰。在印支共产党的中圻党委和义安省委的领导下，从 5 月初开始，义安、河静两省地区的工农以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形式掀起群众斗争高潮。8 月底 9 月初，一些县的农民冲入县城，捣毁衙门，砸开监狱，包围兵营，并惩办密探和豪绅恶霸。在斗争中，农村党支部、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和自卫队纷纷建立。9 月下旬，义安、河静一些县和农村地区的殖民政权瓦解。县官逃遁，乡、里长被迫交出官印，农会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党支部领导下的农会执委会负责农村的管理，出现了苏维埃式的工农革命地方政权。

在苏维埃当权的“红色乡村”，实施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废除苛捐杂税，减免地租，取消公债和贷款利息；收回被地主豪强霸占的村社的公田、公地，重新分配；建立法庭，惩办反革命；组织自卫队，整顿社会秩序。同时组织农民学习越语和文化。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高涨。义安、河静两省革命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法斗争，同时它又得到各地的声援。法国殖民者极为恐慌。在西贡出版的《公论报》惊呼：“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事变，而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运动。”

为了镇压义静苏维埃运动，法属印支联邦总督巴斯埃亲自研究和部署镇压计划，调集兵力，颁布戒严令，遍设军事据点，并利用阮氏朝廷，实行政治欺骗。他们在义静地区推行一些改良措施以麻痹和瓦解人民的斗志。在反动势力反扑的时候，这一地区又发生灾荒，群众生活困苦。在反镇压、抗税和夺粮斗争中，当地党委领导犯了“左”倾错误，一度提出“拔掉知识分子、富农、地主、土豪老根”的口号，并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扩大了打击面。1931 年驻西贡的党中央常委机关被破坏，陈富和中央常委全部被捕。4~5 月，中圻和义静地区党的领导干部分也相继被捕，运动失去领导核心，自 1931 年年中以后，逐步低落。革命力量转入地下，义静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

义静苏维埃运动虽然失败，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正如胡志明所指出的，“义静苏维埃显示了越南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和英勇精神，运动虽然失败，却为后来八月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力量。”

1931 年下半年后，越南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但共产党人和反法爱国志士仍坚持斗争。从 1933 年起，运动逐渐兴起。1934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了党的海外机构，并着手恢复和统一国内党的基层组织。1935 年 3 月，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1936 年越南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友爱会、读书会、互济会等合法、半合法的组织建立，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民族解放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斗争 印度尼西亚从 17 世纪初逐步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有三百多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印尼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或称“尼德兰东印度”。荷属时期，印尼自 18 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后，直接由荷兰国王委派的总督管辖。以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下辖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东部诸岛等六个省区，以及位于中爪哇日惹与梭罗地区的四个公国（土邦）。

殖民当局建立一支皇家陆海空军武装力量，以荷兰军官为骨干，征募印尼人，组织了相当庞大的军事镇压机器。同时，在 1918 年正式建立了东印度国民议会作为咨询机构，除荷兰人议员外，也吸收部分当地上层人士为议员。从 20 世纪初以来荷兰女王和王国政府宣称荷兰要在东印度执行“道义政策”，将权力逐步移交给当地人，改善殖民地的状况。但实际上，以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掌握了一切大权，东印度国民议会形同虚设，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

进入 20 世纪，荷兰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为了保持自己在印尼的地位，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允许列强资本自由输入东印度殖民地。因而，英、美、日、法、比等外国垄断资本如潮水般涌入印尼。一战前后，在印尼形成了以荷兰为主的国际垄断资本共同剥削的局面。英国资本首先进入，它同荷兰资本建立合营企业，在印尼的种植园和采矿业大量投资，其实力仅次于荷兰，居第二位。美、日对印尼的资本输出也日益增长。到 20 年代，印尼的外国资本达 60 亿荷盾，外国洋行和大银行控制了印尼的各生产部门，操纵了它的经济命脉，攫取了巨额利润。1929 年，外国垄断公司在印尼的企业其利润率高达 30%~40%，有的高达 170%，一年就可从印尼掠夺 15 亿荷盾以上的利润。

印尼拥有一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六千多个有人居住的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其面积为荷兰本土的 57 倍，并拥有六千多万人口和一百多个民族，各个岛屿与地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宗教、语言和民族问题复杂多样。荷兰殖民者采取保存封建主义和一切前资本主义残余的政策，在维护总督集权统治的前提下，保留各土邦王公的特权，并扶植印尼封建贵族、地主、奴隶主以及民族酋长们作为统治支柱。

伴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种植园、采矿企业、铁路和轮船等近代运输设施建立起来，这一方面破坏了印尼原有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印尼群岛，尤其是爪哇岛上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一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印尼民族资本企业有所发展。据统计，1925 年爪哇岛上有 5175 家雇工六人以上的企业，由印尼人经营的有 865 家。印尼的民族企业主要是花裙业、编织、制鞋和卷烟（丁香烟）等行业，但规模小，发展缓慢。此外，印尼还出现一些从事零售贸易的商人，其中不少是华侨、华人商人。

印尼的工人阶级主要是在外资企业、矿山和运输部门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除印尼土著工人外，华工和土生白人工人也是重要成分。在 30 年代，除了成百万的农业种植园工人外，印尼已有产业工人 50 万人。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尼也出现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地方官吏和没落贵族家庭，同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但他们又受到殖民者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强烈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教育，提高印尼人的社会地位。此外，早期移居的欧洲人后裔“土生白人”及其知识分子也受到歧视与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对殖民政权不满。

从 20 世纪初开始，印尼民族日益觉醒，民族主义组织逐步出现。1908 年 5 月 20 日，印尼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至善社在中爪哇的日惹成立，其宗旨是“采取法律所准许的一切手段”，发展教育，实现“农业、畜牧业和商业的进步”，“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以及“土著艺术和科学的复兴”。它的创建人是医生瓦希丁·苏提罗胡梭多。到 1909 年，至善社已建有 40 个分社，有会员 10,000 人。它的建立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1911 年，

印尼花裙业商人在中爪哇梭罗组织“伊斯兰商业联盟”。这个组织的最初宗旨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保护印尼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抵制华侨商人商人的竞争。1912年，改组为“伊斯兰联盟”，成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著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佐克罗阿米诺托任主席，总部设在大商业城市泗水。它的斗争目标是建立印度尼西亚人的自治政府。到1918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8.94万人的群众性政党。其内部有不同派别。

与此同时，土生白人知识分子于1912年在万隆成立了“东印度党”，提出“东印度是东印度人的”的口号，要求生长在印尼的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这个党不久就被迫解散，但其中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14年5月9日，原荷兰社会民主党党员史尼弗立特和印尼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泗水创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争取印尼独立”的纲领，主张“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团结人民、工人和农民以及一切民族和宗教”，并“以社会主义知识教育人民”。这个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并开展工人运动，并在伊斯兰联盟中开展革命活动。它为印尼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印尼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建立。1918年印尼各地有7000工人参加罢工，1919年增加到6.6万人。1919年在日惹建立了工人运动联合会，加入联合会的工会有22个，会员人数超过7.2万人。工人运动的高涨迫切要求建立工人的革命政党。1920年5月23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联盟改组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选举司马温为主席，并于年底加入共产国际。1924年，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改称印尼共产党。

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促进印尼工农运动的发展。1920~1923年印尼罢工斗争高涨。1922年东印度总工会成立，次年领导了爪哇铁路工人大罢工，有1.3万名工人参加，其中包括欧洲籍工人。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并将司马温驱逐出境。农民运动也日益兴起。由于伊斯兰联盟规定其成员不得参加其他政党，联盟内的共产党人宣布退出，另组红色伊斯兰联盟，吸收农民参加。1924年红色伊斯兰联盟改组为人民同盟，其成员达三万多人，大多数是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同盟开展农民运动。

20年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尤其是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鼓舞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在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和共产党成立的形势下，荷兰殖民当局加强了镇压。他们解雇罢工工人，逮捕反抗的农民，封闭进步学校，取缔出版、集会等民主自由权利，监禁和流放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同时在农村组织恐怖集团“绿色同盟”来对抗人民同盟。荷兰殖民者的恐怖镇压加剧了他们与印尼人民的民族矛盾，革命烈火一触即发。但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印尼共产党领导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力量。1924年底，党的特别代表大会认为已存在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并提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实现银行和工业国有化等口号。1925年12月15日，印尼共产党在日惹附近的布兰班南举行紧急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决议，并成立起义委员会，以准备和领导起义。

起义原定1926年6月20日发动，但由于党内领导人丹马拉卡等反对起

即后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的马林。

义，并另立印尼共和党，使共产党陷入分裂，起义不得不推迟举行。到 1926 年 11 月 12 日，起义终于在爪哇的雅加达和万丹首先发动。当日晚，雅加达起义委员会领导郊区起义农民向市区进军，他们进攻监狱，占领电话局，袭击警察署。万丹的起义农民打死了残暴的梅尼斯区区长，破坏了一座铁路桥，占领了拉甫安火车站，以切断荷军运输线。起义的火焰迅速扩大到勃良安、万隆、梭罗、北加浪岸和谏义里等地，斗争持续到 12 月上旬。苏门答腊的起义原定与爪哇同时发动，但爪哇起义爆发后，印尼共产党中央多数领导人即被捕，苏门答腊起义委员会未接到起义指示，迟至 12 月中旬才决定举行起义。1927 年 1 月 1 日，苏门答腊的沙哇仑多煤矿区首先爆发起义，起义者与殖民军激战 12 天后终于失败。其他地区起义坚持了一个月也被镇压。

1926~1927 年印尼民族大起义的风暴震撼了荷兰的殖民统治。荷兰殖民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印尼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进步工会和人民同盟被解散，约有两万多人被捕，一些领导人被处以绞刑，四千多人被杀害或被判五年至十年徒刑，一千三百多人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荒无人烟、疟疾横行的利辜集中营。

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的条件尚不具备；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很不成熟。党的领导在起义前脱离实际执行了一条“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消灭富农、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口号；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亚的苏维埃政权。使党不能团结广大群众，组成广泛的反荷统一战线。此外，在起义前夕，丹马拉卡反对起义和分裂党组织，也是造成起义失败的重要因素。因而，起义过程中，缺乏统一领导，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地斗争不能按计划密切配合，起义斗争仅仅两个月就被荷兰殖民者分别绞杀了。

然而，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起义，给荷兰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鼓舞和推动了亚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印尼人民的反荷起义获得了中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同情。1926 年 11 月 25 日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声援印尼人民的斗争，指出：“我们从这里，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人民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印尼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被迫转入地下。印尼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但荷兰的镇压无法阻止民族独立运动的继续发展。1927 年 7 月 4 日，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在万隆创立“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翌年改名“印尼民族党”。这是一个代表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加入该党的不仅有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小职员，还有手工业者和工人、农民。它提出了“取消政治上的依赖，结束荷兰政权”等要求民族独立的纲领，反对同荷兰殖民政权合作。同时，苏加诺于 1927 年 12 月建立了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印尼民族党、伊斯兰联盟、至善社、巴巽丹协会、苏门答腊同盟、巴达维亚人联合会、印尼研究会等政党、团体联合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苏加诺当选为主席。

苏加诺（1901~1970 年），出生于东爪哇泗水（苏腊巴亚）。父亲是一个封建贵族出身的小学教师，母亲出身于巴厘岛的婆罗门家庭。1916 年苏加诺在泗水荷兰中学求学时，寄居在父亲的好友、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佐克罗阿米诺托家中。在这里他阅读了许多世界伟人的传记和他们的著作；并认识了

领导当时印尼民族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著名政治领袖，经常向他们询问有关政治和民族运动的问题。从这时开始，他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影响，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对苏加诺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泗水读书时，苏加诺积极参加了青年运动，加入了伊斯兰联盟。1921年中学毕业后，他进万隆工学院学习。这一时期，他专心研究了各种政治理论，积极投身民族运动，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激烈抨击荷兰殖民统治的演说。他领导的印尼民族党和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明确提出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要求，吸引了许多群众。不少转入地下的印尼共产党人也参加进去。1928年10月，印尼各族青年在雅加达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青年誓词》，宣称他们是“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祖国；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大会决定以象征勇敢和纯洁的红白旗作为印度尼西亚国旗。代表大会还第一次奏起了青年作曲家苏勃拉曼谱写的《大印度尼西亚歌》。

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公开要求取消不民主的法令，取消利辜流放地，取消契约工人刑罚条例，释放政治犯，取消禁止公务员参加政党的禁令。荷兰殖民当局把苏加诺和他领导的民族党的活动视为“洪水猛兽”，下令予以严厉镇压。1929年12月29日，苏加诺等民族党领导人被捕，囚于万隆监狱，民族党活动被禁止。1930年8月18日至9月29日，苏加诺被殖民法庭审讯。在法庭上，苏加诺发表了题为《印度尼西亚控诉》的辩护词，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和谴责荷兰殖民统治的罪恶，表达了印尼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信念。殖民法庭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悍然判处苏加诺四年徒刑。对苏加诺的审判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新闻，大大提高了苏加诺在群众中的声望。1931年12月31日，苏加诺被提前释放出狱时，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这时，苏加诺成为印尼民族运动著名的领袖，他的政治思想成为印尼民族主义者从事民族运动的思想武器。

20~30年代是苏加诺政治思想体系初步形成时期。苏加诺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理论——“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者、宗教信仰者、共产主义者联合，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26年，苏加诺在万隆工学院毕业时，他在《青年印度尼西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论述了印尼三大政治势力之间相互的关系，强调为实现民族独立这个共同目标，这三支力量应互相合作，加强团结。1933年，他撰写了《争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一文，提出通过民族独立的“金桥”走向正义和繁荣的社会，首次阐述了他的经过民族革命向社会革命发展的思想。苏加诺还提出了“马尔哈恩”思想，即贫民主义。他用一个自耕农的名字马尔哈恩来代表印尼的贫民大众，主张依靠贫民来实现印尼的革命。在二次大战期间，苏加诺阐述了他的建立统一的印尼民族独立国家的思想。1945年6月他在独立调查会上，发表了“建国五基”的讲话，提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和信仰神，是建立独立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这标志着苏加诺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

苏加诺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即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团结，其政治思想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处理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他一贯主张平衡和协调。苏加诺的思想是现代亚非民族主义思潮中一种具有鲜明的反帝特色的进步思想，对于印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

作用。

30年代初，印尼民族党虽因领导人被捕和殖民当局的镇压遭受挫折。但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仍在发展。印尼民族党被宣布为非法后，党组织一分为二。沙多诺组织了“印度尼西亚党”；哈达和沙里尔建立了“印尼国民教育党”。1931年12月苏加诺获释后，尽力使两党统一，但未成功。他加入印度尼西亚党，并担任该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党发展迅速，到1933年夏已有71个支部，2万党员。

1933年印尼人民反荷斗争的重大事件是“七省号”军舰水兵起义。起义原因是荷兰当局连年降低水兵工资，引起水兵的反抗。1933年1月，泗水港的海员罢工，被调往苏门答腊的“七省号”军舰水兵在海上宣布起义，印尼水兵联络部分荷兰军官夺取舰只，返航泗水。殖民当局派飞机轰炸，调遣舰队围攻阻截，水兵起义被残酷镇压。在这次起义中，荷兰、印尼海员团结合作，给予了殖民统治沉重打击。

在镇压水兵起义之后，荷兰殖民者加强了对印尼民族主义政党的镇压。1933年8月，苏加诺再次被捕，未经审讯即被流放到小巽他群岛的佛罗列斯岛，后又转移到苏门答腊的明古连。翌年2月，印尼国民教育党亦遭禁止，哈达、沙里尔等被捕，11月流放到利辜，后转移到班达岛。

30年代后期，法西斯侵略威胁日益严重。1935年4月，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慕梭秘密回国。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1937年4月组成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该党于1939年7月倡议建立“印尼政治联盟”。其目标是团结各阶层、各党派，争取印尼民族自决，实现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统一，民主选举责任议会，印尼与荷兰协调一致，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

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印尼共产党的策略转变。1939年12月，印尼政治联盟召开了印尼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印尼语为国语，红白旗为国旗，《大印度尼西亚歌》为国歌。要求成立国民议会。但是，荷兰政府拒绝了印尼人民的这个要求。

第四节 日本侵略与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和掠夺 在日本帝国主义形成和崛起过程中，帝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就宣传“皇国”日本不仅要吞并中国、朝鲜，而且要统治东南亚。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者竭力宣扬夺取南洋的富饶资源，以确保将来向中国大陆的扩张。从30年代初开始，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政治渗透。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在日本“国策基准”中将向南方海洋方面扩张发展作为基本国策的一个方面。1940年7月，近卫内阁提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扩张政策，并明确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包括已被侵占的朝鲜和正在侵略的中国，而且囊括整个东南亚，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的诸岛屿。在这个侵略计划中，占领东南亚，独霸西南太平洋是关键的一环。

从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日本向南侵略的步伐日益加速。9月22日，日军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迫使法国殖民当局承认日军驻扎权，并拥有控制海防机场和滇越铁路的权利。1941年初，日本插手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边界冲突，以“调停”的姿态出现，实际偏袒泰国，促使泰国銮披汶政府倒向日本，为日军假道泰国向缅甸和马来半岛进攻准备了条件。1941年7月，日军又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并迫使法国殖民当局签订《日法共同防卫印支议定书》，控制了西贡、金兰湾等海空军基地，将印度支那作为实现南进计划的战略基地。

在这一切完成后，日本加紧了战争准备。1941年10月，日本主战派军阀头目东条英机上台组阁，扩大侵略战争的机器全面启动。12月7日（夏威夷时间）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日本打着“解放东南亚”的旗号，利用偷袭带来的暂时的海空优势，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美、英、荷等西方殖民国家在战前实行对日本侵略者的“绥靖政策”，思想上麻痹轻敌，防务上缺乏认真准备，军事上没有统一指挥和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因而节节败退。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日本便迅速侵占了东南亚诸国。日军向西越过泰国，占领了英属缅甸，直取印度大门；向南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及荷属东印度，并在菲律宾打败了美军，控制了东南亚海岛地区，逼近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在征服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后，控制了这个地域1.5亿人和3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以前侵占的朝鲜、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总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亿，形成了一个北起阿留申群岛，南临澳大利亚，西迄印度洋的庞大殖民帝国，基本上实现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东条英机声称，日本在东南亚占领区内要建立以日本帝国为中心的“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的秩序。”这种所谓“共存共荣的秩序”，是依靠军刀建立起来的殖民体制。

在政治上，日本实行的是军事法西斯的集权统治。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是在以寺内寿一大将为首的南方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在完成军事占领任务后，1942年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在南方军总司令部下设军政总监，各地设军政府，负责占领地的行政、治安等工作。日军每占领一地，迅即成立军政府，同时颁布戒严令，取缔一切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并进行

大搜捕，对抗日人士、共产党人和华侨实行残酷镇压。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实行“大验证”，集合当地华侨逐个检查，进行大规模逮捕和集体屠杀。据新加坡华侨估计，死于这次“大验证”的华侨约为2.5万~5万人。日本在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屠杀的华侨人数总共约15万人。

为了保持对东南亚的控制，日本对东南亚各占领地区与国家，依据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占领政策与统治方式。一是直接统治区，这是必须严加控制的战略要地，如新加坡、槟榔屿等，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市并划为特别市，派日本官员任市长；二是起初由日本直接统治，但准备给予有限自治或“独立”的地区和国家，如缅甸、菲律宾等。日本占领缅、菲后，在建立军政监的同时，扶植当地人组织亲日傀儡政权。1943年后又先后承认缅、菲“独立”；三是“联盟国”，如印度支那和泰国。泰国銮披汶政府与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后于1942年1月向英美宣战；法属印支联邦也与日本签订共同防守条约，双方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为加强对占领地区的控制，1942年11月1日，日本天皇敕令成立“大东亚省”，由青木一男任大东亚相，其下属南方局即为管辖东南亚的机构。1943年11月5日，东条政府又专门召开大东亚会议，邀请占领区的亲日政权首脑与头面人物参加，会议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要求“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

在经济上，日本对东南亚占领区实行殖民掠夺政策。1942年7月，日本成立“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提出《大东亚建设基本纲领》，规定东南亚为日本的矿业、农业基地，主要供应所需的石油、矿物和农业资源。各地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对被占领地区的铁路、船舶、港口、航空和邮电部门实行军管，对外贸易及汇兑也进行管制。日本占领当局没收英美荷在东南亚的工厂、矿山和油田交日本财阀经营。日本军政府强迫新、马地区的华侨缴纳5000万元叻币的奉纳金，并大量发行军用票或“南方开发金库券”。这些毫无价值的票、券在日本战败后，成了一堆废纸，使东南亚各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日本对东南亚的人力、物力资源实行掠夺性的榨取。在占领各产油区后，它只顾战时急需，不考虑长远的开发和利用，盲目开采，不注意机器与设备的维修。日本还强征粮食，强迫改种军需作物，造成生产萎缩，引起歉收和饥荒。在越南，日本每年掠夺大量的大米。1940年有46.8万吨，1941年58.5万吨，1942年97.4万吨，1943年102.3万吨。1944年后由于日本强迫农民改种其他军需作物和天灾，大米产量下降，但日本仍掠走49.9万吨。1944~1945年冬春，越南北方发生空前严重的饥荒，饿死200万人，相当于当时越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日本占领者还以“勤劳奉仕”为名，组织劳工营，征用当地劳工，强迫战俘为其修建军事工程和铁路。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日本强迫十多万亚洲劳工和6.4万英、澳军战俘修筑泰缅铁路，非人的待遇和过度的劳累，造成大批劳工和一万多战俘死亡。这条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

在思想文化上，日本打着“亚洲人治亚洲”的旗号，宣扬东方文化（实为日本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灌输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存共荣”思想，对其他源流的文化采取压制的方针。日本占领当局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取缔西方国家、华侨和当地民族主义者主办的报纸；规定日语与当地主要语言为官方语言，大力普及日语，派遣日本教师讲授日本的地理、历史、伦理学及日本歌曲与日式运动；广泛推行日本社会风尚和习俗。日本的法定节假日，如国家节日“纪元节”、天皇诞辰日“天皇节”等成为被占领国

家的正式节日；公元纪年改为昭和或日本皇纪，各国标准时间改为东京时间，举行集会、仪式时，与会者要向东京皇宫遥拜。

为了从心理上征服占领区人民，日本借助东南亚的传统宗教势力。在缅甸、泰国，日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貌出现。在马来亚、印尼，他们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声称反英美不反天主教。

日本占领者还利用东南亚的民族矛盾，挑拨原住民与华侨、华人的关系。他们在马来亚宣扬“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执行“亲马恶华”政策，保留各土邦素丹的特权与宗教领袖地位，起用马来人参政，担任地方官员，并组织马来“乡土防卫队”以镇压华人为主体的抗日活动。

日本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和超经济的掠夺政策，以及殖民奴化教育，暴露了它的侵略野心，剥下了它在入侵初期打扮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外衣，加剧了它与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激起了各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对东南亚的侵占，取代了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地位，打破了旧的殖民统治的格局，建立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东南亚的新的殖民秩序。这使东南亚的形势和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西斯侵略势力与反法西斯民主势力之间的矛盾取代了东南亚被压迫民族与原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成为首要的任务。

从日军侵入之日起，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到处燃烧着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共产党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投入了反侵略斗争的洪流，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也投身抗日斗争。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0年9月，日军乘法国败降，侵入印度支那北部；1941年7月，又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法国殖民当局对日妥协投降，印度支那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基地。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印支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反法斗争。1941年5月，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越南独立同盟，团结了各阶层群众，发动了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越南独立同盟以北部山区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1943~1944年革命力量迅速扩大。1945年3月，日本发动军事政变，踢开法国殖民者，独占了印度支那三国，并在越南扶植亲日傀儡政权。越南独立同盟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国高潮，积极准备发动全国武装起义，终于在同年8月，发动全国总起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入泰国；21日，迫使泰国签订双边军事同盟条约，把泰国拴在日本侵略的战车上。泰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组织抗日义勇队，并创办地下抗日报刊。1942年，泰共发表十大纲领，发动工农，开展抗日运动。与此同时，对卖国的披汶·颂堪政府不满的爱国人士在1942年初创立和开展“自由泰”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在国内外的一些军官、政府官员、公务人民及知识分子，约五万人。他们在国内进行地下斗争；同时与美英联系，准备起义。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立即派军登陆马来半岛。1942年5月，驻扎在这里的英军投降。早在日本入侵前，马来亚共产党就动员华侨支援中国抗战。日军侵入马来亚后，马来亚、新加坡人民组织抗日队伍。1941年12月30日，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新加坡华人抗日义勇队成立，成员发展到一万人左右。

1942年1月，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诞生。这支抗日武装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拥有一万多人，组成八个独立支队。人民抗日军的旗帜是绣有三颗金星的红旗，它象征着马来亚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战斗团结。同时，抗日自卫团、后备队、同盟会、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也纷纷建立。人民抗日军出没在马来半岛的椰林中、橡胶园里和矿场上，频频出击，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多内，共作战三百四十多次，歼敌五千五百多名。

日军于1942年5月占领菲律宾。美军溃败和投降，一部分菲律宾上层人物逃亡国外，另一部分人投靠日本，成为日本控制下的“行政委员会”的成员。1943年10月，日本又导演了一场给予菲律宾“独立”的丑剧，劳雷尔当了傀儡总统。在这种形势下，菲律宾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1942年3月，菲共领导的一支农民游击队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歼敌百余人。同年3月，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简称“胡克”）在邦板牙省地区的山林中正式成立。到年底，这支队伍发展为42个支队，拥有5000人。他们以中吕宋为主要活动基地，建立民主根据地，创办军政干部学校，出版抗日报刊，建立民主政权——防卫会，进行减租减息，没收菲奸地主土地等民主改革，动员了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由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领导的“自由菲律宾”、“蓝鹰”、“猎人”等抗日组织也与人民抗日军合作。广大华侨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在人民抗日军中，有一支骁勇善战的华侨游击队，他们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字命名，称为“四八支队”，为菲律宾人民抗日斗争立下了不少战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进行了1200多次战斗，歼灭了日伪军25,000名，解放了吕宋岛中部平原的广大地区。

1942年1月初，日军在印尼群岛登陆；3月，荷兰总督投降。日本在印尼各岛驻扎重兵，建立军政府。同时，将荷兰拘禁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哈达等释放出来，并以允诺给予“独立”为诱饵，拉拢印尼上层人士，建立“民众力量中心”、“爪哇奉公会”等亲日组织，为日本统治效劳。由于日本的严密控制和欺骗政策，印尼人民抗日斗争处境极为艰难。但是，印尼共产党人仍然建立各种地下反法西斯组织，发动工人怠工，农民抗粮夺地，城市居民反对劳役，学生抵制“精神教育”。广大印尼华侨与印尼人民并肩抗日。苏加诺等利用合法地位，在宣传与日本合作的同时，鼓吹印尼独立，并掩护抗日地下组织的活动。他还出面营救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沙里弗丁。日据时期，印尼各地爆发了多起抗日暴动。1943~1944年，西加里曼丹的华侨与当地人民共同发动抗日武装暴动，有一千二百多人惨遭屠杀。印尼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坚持下来，为1945年八月革命和印尼的独立准备了条件。1942年5月，日本侵占了缅甸，同时将资产阶级右翼领袖巴莫捧出来组织伪行政机构。缅甸民族主义领袖对日本也存在幻想，因此，缅甸抗日斗争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缅甸民族主义政党——德钦党的领袖昂山等人曾经指望日本帮助实现独立。他们在日本控制下的泰国建立了一支有4000人的“独立军”。这支队伍随日军打回国后发展为50,000人。但不久日本当局就将它裁减为3000人，并改编为缅甸“国防军”。1943年9月又改名为“国民军”，受日本军事顾问控制。1943年8月，日本为争取缅甸支持日本作战，宣布给予缅甸“独立”。巴莫任政府总理，昂山任国防部长。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日军在缅甸的各种暴行，造成缅甸人民深重的民族灾难。昂山认识到，

这种“所谓独立，不过是一纸空文”。错误与挫折教育了缅甸爱国者。昂山与缅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秘密进行了联系。1942年9月，缅共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开展了游击战争。1944年，抗日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在阿拉干山区，曼德勒一带建立了根据地。同年8月，缅甸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成立，它包括缅共和各抗日民主党派和团体。昂山被推选为主席，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任总书记，有组织的成员达二十万人以上。武装力量，包括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有五万人。这个组织提出了“驱逐日寇，建立人民政府，消灭法西斯，联合民主的盟军”等口号。当盟军从印度攻入缅甸之后，缅甸抗日武装配合了大反攻。1945年3月，昂山指挥的缅甸国民军发动起义，倒转枪口，向日军开火，终于在同年5月配合盟军光复了首都仰光。

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起，担负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担，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欧洲，特别是太平洋上的战斗，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通过抗日斗争的锻炼，各国人民革命力量增强，这为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十章 1900 ~ 1945 年的非洲

欧洲列强自 19 世纪末瓜分了非洲后，到 20 世纪初，已在非洲全面确立起殖民统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在非洲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一时期，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和经济开发的方式加强了对非洲的经济渗透和掠夺。帝国主义统治非洲的结果，促进了非洲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两次世界大战激化了非洲人民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矛盾，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动，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非洲统治和掠夺的加强及非洲的社会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场争斗，主战场在欧洲，但是非洲还是直接和间接地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因为冲突开始时非洲的大部分都在欧洲交战双方国家的统治之下，尽管德国考虑到在非洲的战争将于自己不利，因而曾向英、法提议双方军队在殖民地不进行战斗，他们在非洲的成败由欧洲战争胜负来决定，然而在非洲占有绝对战略优势的英国和法国对此不加理睬。

非洲的战事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在第一阶段，协约国的战略意图是消灭德国在非洲的有生力量，攻占德国在非洲占有的港口和战略要地。在战争爆发后的很短的几周内，协约国军就攻占了多哥的洛美、喀麦隆的杜阿拉、西南非洲的斯瓦科普门蒙德和吕德里茨湾；在东非，破坏了达累斯萨拉姆和坦葛港；在埃及，英国加强了苏伊士运河的防务，在随后 30 年里埃及成为英国控制非洲和中东的战略支撑点。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征服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协约国军先后攻占了西南非洲和喀麦隆。

虽然在非洲土地上进行的几次战役并不足以影响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可是对非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百万以上的非洲士兵参加了在非洲或欧洲进行的战争。人数更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强制性地征当搬运工，每个作战的士兵就需要大约三个搬运工的支援。直接与间接卷入战争的非洲人据估计达 250 万人，远远超过当时非洲大陆人口的 1%。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和搬运工超过 15 万人，受伤和致残的人则大大超过此数。

战争给非洲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破坏。战争期间，各宗主国对其非洲殖民地经济加强了国家干预。主要的形式有：控制价格，征收粮食作物，强迫种植某种作物，为主要工程项目征集劳动力等。由于实行价格控制，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在大战期间上涨了，而非洲产品出口的价格则被控制在较低水平上，这使得靠工资为生和以生产出口农产品为生的非洲人深受其害。例如，埃及棉农发现他们从自己产品提价中所得到的利益抵消不了燃料、衣服和谷物等项费用的急剧上涨。维持非洲人日常生活的农产品，包括甘薯、木薯和豆类被大量以低于自由市场价格收购或征集，供应给欧洲的协约国和非洲及中东前线的军队，这种做法既损害了非洲农民的利益，又加剧了城乡人民的困难。

强征大批非洲人入伍和做搬运工，造成战争期间非洲大陆许多地方劳动力严重短缺。此外，战争期间，宗主国要求各殖民地多作贡献以资助战争，各殖民地承担了当地战事的绝大部分军费负担。各殖民地的非军事性的公共工程几乎全都停顿，经济发展计划不得不中止。

世界大战也给非洲的社会政治带来重大的影响。一次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搬运工以及劳工从他们村庄的狭隘世界中被驱赶出来，送往几千里之外，无疑是一次全洲性的人口大流动。这是自非洲大陆被帝国主义瓜分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它打破了帝国主义宗主国在殖民地之间长期实行的隔离和封锁政策的束缚，大大开阔了非洲人的眼界。来自各地区的非洲人有机会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非洲人通过耳闻目睹，不仅进一步认识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凶残本质，而且也看清了他们虚弱的本质，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对于克服民族自卑感，提高自尊心起着良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欧洲作战的非洲士兵，他们中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甚至亲身参加欧洲国家

爆发的革命运动，有的还同宗主国的无产者建立了广泛的接触并加入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在战争中，非洲士兵普遍学会了使用武器的技术。这些士兵回国后，往往对殖民统治者更加不满，成为推动非洲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

列强对非洲统治的加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制度第一次作了较大的调整。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围绕解决“敌属地”的归属问题，对德属非洲殖民地进行再分割。这次分割因发生在一战以后，国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因而不可能再用19世纪末瓜分非洲领土的方式来处理。英法操纵下的国际联盟炮制的委任统治制度应运而生。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再瓜分，对帝国主义国家好处在于可以得到德国殖民地，同时又不必承担德国提出的要将殖民地的价值折合为补偿的责任。

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之间在殖民地再分割问题上争吵激烈，最后经过协商，于1919年5月7日由最高委员会批准了将德属多哥和喀麦隆分配给英法两国实行委任统治，将德属东非的坦噶尼喀分配给英国统治。不到一年，比利时也获得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统治权。上述地区均为乙类委任统治地。西南非洲则列为丙类委任统治地，变为南非联邦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殖民地的殖民地。

对德国的殖民地实行“委任统治”的结果，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面积达到380万平方英里，人口达6000万，成了在非洲的最大殖民帝国。它实现了在近代瓜分非洲时期梦想完成的“开罗开普”计划，形成由北往南纵贯非洲大陆的殖民地带。法国在非洲占有4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统治大约4000万的人口。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加在一起占非洲80%的领土。所以，一战及一战后委任统治制度的建立并没有改变非洲的殖民地命运。

一战以后，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得到加强。欧洲虽早已于1885年完成对非洲的瓜分，但瓜分之后，欧洲政府对这一大陆的兴趣就大大减弱了。欧洲国家之所以分割非洲，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致被排斥在有潜在价值的地区之外，对他们说来，重要的是占有而不是发展。当时欧洲政府的国内税收收入有限，资产阶级纳税人不愿政府花他们的钱去维持非洲殖民地的法律和秩序。欧洲政府为殖民地新政府配备人数极少的官员；军队和警察从当地招募，由几名欧洲军官指挥。政府许多职能工作甚至委托给基督教会和一些商业公司。只有当地方收入因征收关税和人头税而逐渐增多以后，殖民政府才能负担雇用正规的文职人员和警察，以有效地在他们统治下占有和管理整个领土。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勉强达到这个地步。

一战前，各宗主国在统治非洲的方式上具有较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英国是采取间接统治最为典型的代表。英国本土小国寡民，在海外却拥有大片的殖民地，不可能依靠由本土派出军队和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另外，英国从其统治印度的历史中得出经验：彻底摧毁原有的统治基础，改变旧的传统习俗，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危及自己的殖民统治。在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国放弃原来兼并土邦扩大英属印度领地的做法，转而让一些土邦继续存在，并宣布要尊重印度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努力培植王公贵族作为自己统治印度的工具。从一开始，英国就有意地将统治印度的经验运用到统治非洲殖民地上，英国人在受其统治的殖民地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组织，让当地酋长成为英国统治机构中的官吏，领取薪金。

由酋长治理本部落日常事务，赋税由酋长征收，在将大部分的税收上缴殖民政府后，允许酋长为自己的“地方金库”保留一定比例的税收，用于地方之需。英国人则在每一个部落区域派驻顾问，监督地方行政。

与英国统治非洲的方式不同，法国在其非洲殖民地实行的是一种直接统治方式。即法国在征服了殖民地后，有意地摧毁原有的非洲当地人的地方权力结构，剥夺部落酋长的权力，由法国委派总督和各级行政官员进行直接统治。一战后，法国殖民统治者认识到直接统治的一些弊端，开始注意到利用和扶植当地非洲人上层为自己服务的重要性。他们在不影响法国对殖民地统治的前提下，吸收一部分原有的非洲人统治者担任部分地方行政管理职务。同时，开办“酋长学校”，培训一批忠于法国殖民当局的非洲人，任命他们为酋长，由国家发薪水；一旦发现他们不再忠于法国人，殖民当局就撤换他们。此外，法国人在非洲还实行“同化政策”，他们将非洲殖民地当作自己的海外领土，当作法国本土在海外的延伸，因而鼓励非洲人上层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将他们逐渐吸纳同化到法国人社会中。他们还给非洲人上层投票权，将法国议会中一定比例的议席保留给这些人。

一战后，欧洲列强在非洲的统治方式有趋同的趋势。一方面，各宗主国更加注意利用非洲当地的部落酋长和头人，将他们变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殖民当局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来强化自己在非洲的统治。无论是在直接统治还是在间接统治下被欧洲人所用的非洲人酋长，不再是单纯的地方首领，而更多的是殖民当局的地方官员。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方式的区分不再具有重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经济掠夺 帝国主义瓜分和统治非洲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非洲的财富，非洲的土地、劳力、矿产资源、农产品都是掠夺的对象。由于宗主国相互之间的国情不同，各自占有的殖民地的情况也不同；还有，在不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需求也不同。因而，各宗主国对其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便具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地理资源与气候条件是影响掠夺方式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非洲是一块巨大的大陆，各部分的地理气候千差万别。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东非的肯尼亚和南非地区，那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较少萃萃蝇，欧洲人在这些地区大量移民，强占非洲人的土地，建立大种植园。在西非地区，那里土地肥沃，雨水充沛，适合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但由于萃萃蝇肆虐，欧洲人无法大批长期移民居住，殖民当局则采取各种手段让当地人改种欧洲人所需要的作物，他们以低价收购这些产品，出口到欧洲谋取高额利润。在刚果地区，那里炎热异常，不适宜农作物种植，但那里地上有各种热带森林资源，地下有矿藏资源，殖民当局将土地出租给欧洲人大公司，欧洲人使用非洲人为其采橡胶和开矿。

其次，各宗主国的国情不同，在对殖民地的掠夺方式上也因而存在差异。例如，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非洲时都采用过强迫劳役制。这种野蛮的制度在一战后受到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凡尔赛条约上，国联还特别规定在委任统治地取消强迫劳动。英法作为国联的常任理事国，不得不顾及国际舆论，在掠夺非洲中，更多的是采用现代资本主义剥削手段。而葡萄牙和比利时仍然在其殖民地实行强迫劳役制。

第三，一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非洲时存在一种无序状态。一战

后，各宗主国更多地通过资本输出和由殖民政府主持下对殖民地进行开发的方式将殖民地经济纳入宗主国经济的范围，成为宗主国经济的附属。这一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法国的萨罗计划上。

阿尔贝·萨罗曾两度出任法国海外殖民部部长（1920～1924年，1932～1933年）。他就职时，正值一战后法国经济困难之际，法郎严重贬值，法国无充足外汇购买原材料，希望开发殖民地的资源来弥补。因此，萨罗着手实施殖民地开发新政策，制定了“殖民地经济发展十五年计划”，又称萨罗计划。萨罗公开宣称其计划的目的在于：“为了未来法国的强大，法国必须要求它的殖民地和保护国除了提供食物外，还应该为军队出人，为国家的支出出钱，为工业和贸易出原料和其他产品。”萨罗把殖民地分为几类，规定每一类殖民地要提供某些特定产品。

英国在一战后也采取类似法国的殖民政策，它体现在卢加德1922年出版的《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托管》一书中。该书影响了整整一代殖民地行政官员，并被英国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当作指南。该书作者卢加德曾长期在非洲担任殖民地行政官员，后又成为英国出席委任统治委员会的首席代表。卢加德首创了一种理论，即殖民强国有着双重的责任：一是对其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的责任；二是对外部世界的责任。对于殖民地的人民，要推动其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最后使其达到自治；对于外部世界，要开发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并寻求使其进入世界市场的出路。

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英法等国在一战后加快加大向殖民地输出资本。据统计，到二战爆发时，在非洲的投资中，英国占第一位，约占总投资额的一半；法国居第二位；然后是比利时、美国和葡萄牙等国。

外国资本主要投在采矿业上。到1936年，投在南部非洲五大产矿地区的资本占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投资的近三分之二。由于投资倾斜于采矿业，非洲的采矿业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很快。据1938年统计，非洲开采的金刚石、钴、黄金等七八种矿产品的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已占首位。其中，金刚石的产量占世界的98%，黄金占46%。仅著名的南非德兰士瓦金矿和金刚石矿的开采到1926年时累计价值高达50亿美元。外国资本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南非开采金刚石的公司到1934年时支付的股东红利相当于原资本的四倍。

经济作物是外国资本在非洲掠夺的第二大项目。殖民当局除鼓励欧洲移民建立经营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和农场外，还采取各种措施来诱导或强迫非洲农民改种经济作物。例如，有的殖民地向非洲人征收高额的税收，规定必须用货币交纳，迫使非洲人为取得货币，不得不改种经济作物。有的规定只有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才可以减免劳役。英、法在西非殖民地还利用非洲人中间商同本地非洲农民签定合同，每年按量收购经济作物。殖民当局有时还利用价格因素和提供其他优惠条件来诱导非洲农民多种经济作物。非洲许多国家大部分耕地因而被迫种植一种或少数几种经济作物。

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促使非洲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商业的繁荣与一批商业城市的兴起。外国资本因而也投在修建公路、港口基础设施，兴建水利灌溉工程，以及为城市服务的医院、学校和市政工程等。

总之，在殖民当局的主持下，外国资本输入非洲，一方面为外国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促使非洲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珍贵的矿产资源被疯狂开采，利润流进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农民们依赖单

一经济作物，受世界市场价格和殖民当局政策的摆布。公路、港口和市政建设是为了采矿业和进出口贸易以及商业发展的需要修建的。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民族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由于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非洲的粮食播种面积大大减少，当地人民需要的粮食远不能自给，许多国家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当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非洲农民首先成为受害者。

非洲的社会变迁 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统治和掠夺的结果使非洲社会在现代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之前，非洲大陆除局部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尚未进入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绝大多数非洲人仍以部落和村社为中心，受部落酋长的统治。帝国主义侵入非洲，尤其是在进入 20 世纪后，帝国主义为了战争及掠夺的需要，不断地强征非洲人入伍当兵、到矿山采矿及为欧洲人当佣人等，许多非洲农民被迫离开了偏僻的乡村，流落到城镇变成雇佣工人或城市居民，从而摆脱了部落酋长的管辖。这就使得传统的部落村社组织逐渐瓦解，促进了非洲社会内部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分化。非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

非洲无产阶级的发展主要在一战后开始，到二战结束时，无产阶级人数比战前增加了 50%，达到一千多万人。非洲无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下特点：

首先，工人人数在非洲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人人数最多的是埃及和南非，1937 年时埃及有工人 27.5 万，1945 年增加到 36.2 万；南非在 40 年代已有工人近 600 万，占当时全国劳动力的 87.2%。而同一时期，在西非的工人人数则很少，只有 57 万人，仅占劳动力总数的 2%。中非地区则更少。

其次，非洲工人流动性很大，大部分是流动工人和不熟练工人，尤其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非地区。造成工人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洲工人主要从事采矿业，欧洲资本家往往只与工人订立六个月到两年的雇佣合同，很少有比这更长的；资本家为了攫取超额利润，给予工人极低的工资，不给工人解决住房问题，工人不得不将老婆孩子留在乡下，自己流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害怕一旦工人成了熟练固定工人，不仅会影响白人的就业机会，而且不利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因此，非洲工人的流动性是由欧洲资本家剥削方式及殖民统治的特点造成的。

非洲无产阶级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对外国垄断资本和殖民当局充满仇恨，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但是，非洲工人的流动性不利于工人的团结，很难在他们中组织起稳定和统一的工会，也不利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加上殖民当局有意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制造工人阶级队伍中不同肤色工人之间的对立，非洲无产阶级始终未能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

非洲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要比无产阶级迟缓得多。两次世界大战也曾给非洲民族资本带来发展的机会。在战争期间，宗主国为了维护自己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防止其他国家的商品乘虚占领自己的殖民地市场，在殖民地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非洲本地工商业的发展。此外，在战争时期，居住在非洲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大量地参军上前线，这也为非洲人经营农场、商业，以及食品和原料初加工业创造了条件。

民族资本在非洲大陆的发展极不平衡。北非的民族资本比较发达，有一支比较强的资产阶级队伍，最突出的是埃及，其次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南非的资本主义最发达，但控制在白人殖民者手中。西非海岸的一

些英属殖民地有一个从事商业贸易的非洲本地人商业阶层。在非洲其他广大地区，民族资本基本是个空白，不仅没有像样的工业，甚至连小商业也为印度和西亚商人所把持。

非洲大陆民族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同非洲大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前，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尚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统治非洲后对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采取了各种歧视和限制性的政策所致。

帝国主义控制了采矿业。在许多地方，宗主国禁止非洲人勘察和开采矿藏。欧洲人公司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往往抢先取得了矿山的开采权，非洲人开采被视为非法，要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厉制裁。在西非和东非的一些殖民地，非洲人虽被允许在欧洲人公司“租让地”之外开采矿藏，但由于缺乏资金，很难得到发展。殖民当局还想方设法限制非洲人经营制造业，以便维持非洲人提供原料、劳动力，欧洲人提供制成品这种世界经济格局。一战后，坦桑尼亚的民族资本想利用本地的西沙尔麻资源，自己生产麻线时，英国当局强迫坦桑尼亚同英国的有关联合会进行商谈，规定由英国联合会决定西沙尔麻产品价格。在英国人的干预下，坦桑尼亚的西沙尔麻工厂不久便倒闭了。从整体上看，一直到1949年止，非洲本民族的工业还仅限于轧棉、磨面，以及剥皮去核等食品加工工业；即使是这些工业部门，许多资本也是外国人的。

在商业领域，非洲资本的发展也困难重重。在不少地方，殖民当局竟颁布法令禁止非洲人经商。有的殖民地则采取种种刁难的措施，限制非洲人经商。如在肯尼亚，英国殖民当局特别颁布了“禁养驴子条例”，不准非洲人养驴，以防止非洲人利用驴作运输工具经商。有些地区，像在英法统治下的西非地区，殖民当局则向非洲小商贩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让他们难以维持。

由于以上因素，一直到二战结束，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中非洲资产阶级的力量极为弱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无法起主导作用。

在20世纪非洲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么一部分人，他们是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青年军官。帝国主义为了统治需要，积极培植代理人，纷纷在殖民地开办学校，甚至允许少数人到欧美国家留学。他们中一些人日后成为帝国主义的走卒，甘愿为殖民政府效力。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在欧美文化的熏陶下，民族主义意识最先觉醒，深感受异族压迫之苦，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现代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非洲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大部分来自这一阶层。

第二节 一战后北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20 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列强加强对非洲统治和掠夺的时期，也是非洲人民开始觉醒，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植根于乡村社会，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帝斗争更加波澜壮阔；同时，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在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组织领导下，以城市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的反帝运动蓬勃兴起；而且还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族起义和革命战争。

影响 20 世纪上半叶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外部因素对非洲大陆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最初产生于国外后又植根于非洲大陆的泛非主义。由于各地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程度、阶级结构、种族构成不一样，这些外部因素对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兴起与发展极不平衡，表现在运动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具体内容，及结果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大致可区分为北非、南非以及北非和南非之间广大的黑非洲等三类地区。

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 在非洲大陆，一战后，大规模和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先兴起于北非地区。其中，以 1919~1922 年的埃及人民反英斗争，1921~1926 年摩洛哥里夫地区反对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以及 1935~1941 年埃塞俄比亚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最为著名。

一战后，埃及是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在本国资产阶级领导下掀起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国家，并在 1922 年获得了独立，它具有时间早、规模大、群众广泛参加的特点。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和独立的实现要比埃及晚 30 年到 50 年。

埃及位于西亚和北非的交接处，在地理上属于非洲大陆，但在历史文化上属于西亚中东文化圈，埃及人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迟至近代时期，它还是奥斯曼帝国属下的一个行省。长期以来，它享有世界穆斯林文化中心的美誉，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爱资哈尔大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学者到这里讲学听课。埃及人民深为自己悠久的历史文明自豪，它与伊斯兰教一道成为团结人民、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有力武器。

英国于 1882 年英埃战争后开始占领埃及，但仍让埃及维持自己的政府，并在名义上仍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埃及的控制，英国于 1914 年 12 月 2 日宣布对埃及实行军管。几周后，又借口土耳其加入德奥同盟，宣布埃及脱离宗主国土耳其，变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废黜了不太听话的阿拔斯二世，让亲英的侯赛因·卡米尔当自己的傀儡，埃及从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在埃及实行间接统治，赫迪夫和内阁依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和统治机构，英国驻埃及最高官员同其他外国使节一样，只享有“总领事”的头衔。但英国通过以下方式对埃及实行控制：任命一批英国官吏在埃及政府中任职，充当政府各部的顾问，掌握了各部的实权；由英国人担任埃及军队的总司令，并将一批英国军官安插在埃及军队和警察中任要职；规定素丹和内阁首相必须听从英驻埃代表的意见，英国人实际上成了埃及的太上皇；英国控制埃及的财政和经济。

同非洲其他国家相比，埃及有一个人数较多，力量较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埃及是非洲资本主义最先开始发展的地区，早在 19 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埃及

在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导下已开始改革，实行过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尽管阿里的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英国人日后又限制埃及工业的发展，力图将埃及变为生产和供应棉花单一经济作物的基地，埃及的工业因而控制在外资手中；但是，埃及的资产阶级还是成长起来。埃及的资产阶级大致包括三种人：工商业资产阶级，人数少，力量有限，但在一战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由于埃及作为英帝国东方战场的中枢，英不得不让埃及发展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工业，以支持战争；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在英国统治下，埃及的农业加速商品化，许多埃及大地主已经资产阶级化，他们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人数多，势力大；埃及的自由职业者、行政官员和军官则构成资产阶级中的第三种人。

这三种人在一战后都不满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工商业者不满于一战后英国资本卷土重来而使埃及民族工业不景气。农业资产阶级的不满在于一战后外国资本加速吞并埃及土地，控制水利灌溉设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对英国殖民统治最为不满的是第三种人中的一些人，英国统治埃及后，将大批英国人安置在高级职位上。据估计，20世纪初，在埃及任职的文官不过150人左右，1914年时已达1600人。他们往往占据了政府中位高薪厚的职位，曾有过调查，在高级职务中，埃及人占不到四分之一，英籍职员的工资甚至是埃及官员的十倍。特别是当英国人为了制造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矛盾，有意安排较多的叙利亚人在埃及政府中任职，这使得埃及资产阶级怒火中烧，提出埃及政府埃及人化的要求。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要求得到了工农的支持和响应。1917年时，埃及工人数已达70万，在非洲仅次于南非。在工人中出现了工会组织，据官方统计，1918~1921年间新成立的工会，开罗有37个，亚历山大有23个，运河区有18个。工人们同时受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20年埃及成立了社会党，1922年该党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埃及共产党。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末已经成立民族党和祖国党，他们在战前已在工人中组织工会做工作，宣传民族主义思想。

一战后的埃及仍是个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他们在大战中经历了磨难，也受到了教育。在大战期间，大批青壮年农民被抓去当差，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占三分之一的青年男子参加了“劳动队”。英国人还强行压价收购埃及棉花，并强征大批农产品和牲畜。英国的掠夺导致埃及的饥荒，数十万埃及人在战争时期死于饥饿。许多青年农民也由于参加战争，经受了锻炼，对帝国主义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群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埃及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英斗争。以扎格卢勒为首的埃及资产阶级政党华夫脱党领导这场斗争。扎格卢勒（1857~1927年）出生在埃及卡尔比省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在乡村私塾读书，后进入爱资哈尔大学深造，曾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880年在《埃及事件报》报社任编辑，1882年参加奥拉比起义。英国占领埃及后，曾被关押数月。后与一首相的女儿结婚，自此仕途大进，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参事，1906年和1911年先后担任过教育部长和司法大臣。

1918年11月13日，扎格卢勒等一群埃及政治活动家求见了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温盖特，以埃及人民的名义要求英国撤销“战时法令”，并要求派遣代表团去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埃及的独立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扎格卢勒决定组织代表团，到欧洲各国去开展活动，并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

代表团在阿拉伯语中为华夫脱，因此，以扎格卢勒为首的组织便被称为华夫脱党。华夫脱党当时的要求体现在其《民族要求宪章》上，有以下几点内容：取消不列颠对埃及的保护制度，承认埃及独立；英国撤离埃及；承认代表团作为代表埃及利益的全权谈判对手，允许代表团前往伦敦，然后转赴巴黎参加大会。

英国当局以坚决镇压来回答埃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1919年3月8日，英国驻埃及军队司令奉伦敦的命令，逮捕了扎格卢勒等四人，将他们流放到马耳他岛。这一镇压行动便成了1919年3月起义的导火线。先是学生行动起来。在3月9日这一天，首都开罗的大学生们举行和平的游行示威，连中学生也参加了。3月11日，工人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一天，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埃及职员加入到罢工者行列。英国当局一律施以武力镇压，这就燃起了全体埃及人民愤怒的火焰，各地除举行示威游行外，一些地方还爆发了自发性的武装起义。在几乎整整一个月时间里，殖民主义者无法恢复对埃及的控制，国家机关也陷于瘫痪状态。

英国人被迫释放扎格卢勒等华夫脱党人，准许他们到巴黎去。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埃及民族主义者们的要求没受到重视，列强们仍然承认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巴黎和会上传来的消息使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更加高昂，奋起进行反抗。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发生反英暴动，当地群众筑起街垒，进行战斗。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派出军队镇压起义者；另一方面，作出让步姿态，表示愿给予埃及“自治”的权利，派出以米尔纳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到埃及，加紧拉拢赫迪夫政府及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准备与他们达成协议，以对付华夫脱党人和工农群众。埃及人民以全面抵制和反英示威来对付米尔纳代表团。米尔纳一无所获回到伦敦，当时扎格卢勒正在伦敦，米尔纳向扎格卢勒提出一项条约草案，其中规定在名义上取消保护制度，但应让英军继续留驻埃及。这个条约的条款一公布，埃及立即掀起抗议浪潮。扎格卢勒代表团拒绝了这一方案。赫迪夫政府也害怕国内人民的不满，不敢贸然签定这一卖国条约。

英国人最后采取强硬的一手，当1921年12月示威风潮再起时，英国当局再次逮捕扎格卢勒及其他几位华夫脱党领导人，先关押在印度洋塞舌尔群岛的监狱里，后又转移到英国直布罗陀要塞。

华夫脱党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沸腾。在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街道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这次反抗的声势不如1919年，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普遍比较平静，一部分资产阶级不再参与斗争，而殖民者则准备充分，他们从英国本土派来大批精锐部队出动军舰和飞机，很快就将反抗镇压下去。

在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埃及民族主义者们只好作出退让；英国虽镇压了反抗，但由于此时印度的形势变得对英国来说十分严峻，它必须尽快解决在埃及的冲突，好腾出手来应付印度危机。因而双方同意按英方原先提出的方案行事。

1922年2月28日，英国发表宣言，宣布承认埃及独立，放弃对埃及的“保护”；同时，又向埃及提出所谓的“四项保留条件”。它们是：英军继续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带以及全国军事要地；英国的顾问仍然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埃及应保护外国人在埃及的权益，英国监督埃及执行各种领事裁判权和其他不平等条约；英国直接管理埃及以南的苏丹国家，控制尼罗河水源，

扼制埃及的经济命脉等。

1923年4月11日公布了埃及宪法，宣布埃及是自由独立的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赫迪夫改称为国王，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1923年9月扎格卢勒回到埃及。在1924年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华夫脱党取得了胜利。扎格卢勒担任了独立后的第一任首相。

1919~1922年埃及人民的斗争获得了部分的胜利，由于英国人仍保留许多特权，埃及人民在争取完全独立解放的道路上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摩洛哥里夫起义 摩洛哥位于非洲大陆的西北角，西临大西洋，北隔只几公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大西洋—地中海通道，是西欧到东方地区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素有“西方的锁钥”之称。所以历来为殖民侵略者争夺的对象。

摩洛哥作为一个国家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素丹是摩洛哥国家的领导，他的权力受马赫曾（国务会议）的节制。国内有些地区由哈里发（素丹的代理人）、帕夏（省长）、卡伊德（专区长官）、谢赫（部落酋长）管辖。素丹或马赫曾很少能使全国各地都服从自己。摩洛哥几乎总是分成两种地区：服从中央政府的省和不承认中央政府权力的“叛乱省”。

殖民主义列强曾不止一次地企图在摩洛哥的领土上扎下根来，在19世纪，列强之间的角逐竞争使摩洛哥得以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实际上，摩洛哥变成几个强国的半殖民地。到20世纪初，法国已经在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摩洛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首先，1904年4月英法签定了协约，其中主要的一条是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法国则相应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通过这种交易，终于结束了百年来这两个殖民大国在非洲大陆上的竞争。紧接着，在同年10月3日，法国和西班牙签定协议，私自划定两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从而安抚了西班牙。这些背着摩洛哥的欧洲列强间的交易激怒了摩洛哥的统治者，也惹得德国十分不快，一战前因而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终于在1911年签定了《法德协定》，德承认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德则获得法属刚果一部分作为补偿。在20世纪初到一战前的短短十余年里，严重的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法国最后都能一一克服，法国在摩洛哥似乎已无后顾之忧。1912年3月30日，法国强迫摩洛哥素丹哈费德签定了接受“保护”的条约，又称非斯条约，条约共九条，主要内容有：素丹王位和宫廷继续保留，进行法国政府视为有益的行政、司法、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法国对摩洛哥领土进行军事占领；摩洛哥在未获得法国政府同意之前不得签定任何国际性条约；法国在摩洛哥派驻总督，监督本条约的执行，并专门负责处理摩洛哥境内一切有关外国人问题。通过此条约，摩洛哥实际上已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摩洛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摩洛哥尚不是法国独占的殖民地，西班牙在摩洛哥也存在着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同年11月27日，法国同西班牙签订条约，确定了摩洛哥北部沿地中海平原地区，南面里夫山区归西班牙管辖，但在法律上仍属于“保护国”的领土。摩洛哥北部的重要港口丹吉尔及其周围的一些地方为西方列强“共管区”。于是，摩洛哥统一的领土被肢解为三部分。

“保护”条约并不能给摩洛哥带来安定，一方面，摩洛哥人具有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他们对素丹签定卖国条约深感愤怒，举行各种方式的反抗。连法国人自己也承认：“我们的部队从登陆那天起就不曾有过喘息的机会，原因是遇到的抵抗实在太顽强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统治只及摩洛哥的

平原地区，草原区与山区仍无法控制。另一方面，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历届法国政府的政策是要确保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非洲沿岸的绝对优势，它不愿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被另一个列强独占的国家。而西班牙政府则倾向确保它的管辖区的自治，将其从苏丹的主权下分离出来，制造两个摩洛哥，一个是法属摩洛哥，另一个是西属摩洛哥。

一战后，法国和西班牙各自在自己的辖区内大力进行“经济开发”。其中，里夫地区的丰富矿产资源早已使西班牙矿产公司垂涎，因而西班牙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征服里夫这块尚未归顺的地区。

以对人民“严酷”著称的贝兰格尔将军被西班牙政府任命为驻摩洛哥高级专员，他于 1918 年制定了一个首先征服西部的杰巴拉部落，然后再东进征服里夫部落的军事计划。

1919 年 7 月，西班牙征服西部的杰巴拉族后，开始准备进军里夫山区。里夫族人是北非西北部柏柏尔人中最强大的支系之一，有 13 个部落，共 50 万人，占摩洛哥人口的 10% 左右。其中，贝尼·乌里阿格勒部落在里夫族 13 个部落中最为强大。酋长阿卜杜勒·克里姆·哈塔比所在的家族被称为伊斯兰教的圣裔家族，在里夫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西班牙人在进攻前派奸细毒死了老酋长，在紧急关头，部落长老议事会推举其长子阿卜杜勒·克里姆担任军事首领。

阿卜杜勒·克里姆生于 1882 年，受过大学教育，1915 年任梅利利亚城首席法官时，曾因反对西班牙，主张摩洛哥独立而被西班牙当局逮捕，1918 年获释后继续任该城法官。其父在得知西班牙妄图进攻里夫的消息后将其紧急召回，共御外侮。其父遇害后，他决心继承父业，消灭西班牙侵略者。

克里姆面对强敌，认真做好两方面的工作。首先，他利用欧洲列强间的矛盾，缩小打击面，争取尽可能多方面的支持。法国、德国、英国出于各自的私利，担心具有战略意义的直布罗陀南岸出现强大的西班牙殖民地，因而不愿看到西班牙顺利地结束属地内的征服战争。克里姆派专人同法国联系，取得武器装备，英国和德国暗地支持里夫人的斗争，英、德的军火商秘密地向里夫军队提供武器。其次，克里姆清醒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到在没有作好充分战斗准备以前，不能轻易地同敌人交锋。他主动要求同西班牙举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将兵力步步后撤，把西班牙殖民军引进里夫山区内线作战，以发挥自己地形熟的优势。

1921 年初，西军仗着兵力与武器上的优势，向里夫山区长驱直进。一路烧杀抢掠。激起了里夫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向克里姆请战，决心誓死保卫家乡。在人民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克里姆在 6 月 1 日夜里率领 300 名战士偷袭立足未稳的西军。经过几小时血战，歼敌 400 人，收复了达尔阿巴拉。同时还缴获了大批武器、粮食和药品等。参加西班牙殖民军的摩洛哥人雇佣军纷纷投奔了里夫军队。原先动摇不定的某些里夫人部落也都集合到克里姆的旗帜下。在短短时间内，里夫军队发展到 3000 人。达尔阿巴拉的胜利，揭开了里夫人民起义的序幕。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里夫的民心士气。7 月 21 日，里夫军民再接再厉迎头痛击孤军深入阿奴阿尔城由西尔维斯特将军率领的西军。战斗前后历时六天，里夫军民大获全胜。歼灭西军一万四千七百余人，缴获大炮一百三十九门，机枪四百多挺，步枪三万九千多支，此外还有许多粮食和其他日用品。失败了的西尔维斯特将军自杀身亡。阿奴阿尔之战是西班牙殖民战争史上空

前绝后的一次大败战，震动了欧洲，当时报刊舆论称之为“阿奴阿尔惨剧”。

克里姆在抗击西班牙入侵，尤其在指挥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赢得全里夫人民的高度信任和热烈拥戴。克里姆学习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经验，在战场取得胜利的同时，及时地进行民族政权的建设。1921年9月，克里姆召开了由12个部落贵族参加的代表大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民族誓约》，作为里夫民族主义者必须遵守的行动纲领。《民族誓约》共有六条内容：一、不承认侵犯摩洛哥主权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二、西班牙人应该撤出1912年法、西条约签定前尚未管辖的全部里夫地区，西班牙在摩洛哥只能保留休达、梅利利亚及其周围地带；三、承认里夫国家的完全独立；四、宣布成立里夫民主共和政府；五、西班牙应该赔偿里夫人民所受的损失；六、在平等条件下，同所有大国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签定条约。

同年9月19日，国民会议开幕。宣布成立独立的里夫共和国，建立由克里姆领导的民族政府。里夫国家建立后，克里姆兼任国防和内政的领导人，为巩固国家的独立地位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和改革措施：统一军事编制，建立统一的常备军和部落民军；实行立宪政治，制定宪法；废除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传统法和传统法庭；实行新的税收制度；实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民族誓约》和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促使了里夫地区各部落间团结与统一，增强反帝反殖的力量，假以时日，也将对改变里夫地区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

西班牙侵略军的失败和里夫国家的建立，使统治着摩洛哥南部的法国占领者惊恐不安。摩洛哥因其地理位置在法国的殖民帝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打算逐渐统一法属北非和西非等殖民地，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经撒哈拉沙漠，到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流域，南面囊括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殖民地，然后同法国本土联合，组成一个大帝国。在里夫人民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中，法国从不加干涉到暗中接济里夫军队，其目的正是为了利用西班牙殖民势力失败而被逐出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殖民地。另外，随着克里姆领导里夫人民反抗西班牙侵略斗争的节节胜利，克里姆在整个摩洛哥的影响日益扩大，人民更加不满于法国殖民统治和卖国求荣的素丹傀儡政府。法国殖民者认识到如果让克里姆民族政权继续存在发展下去，摩洛哥势必成为第二个土耳其，克里姆将成为西北非的凯末尔，这是法国殖民统治当局绝对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一旦里夫人将西班牙侵略军赶到地中海边，干涉里夫共和国便立即摆上法国殖民统治者的议事日程。

面对法国的军事威胁，克里姆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冷静与成熟，他懂得决不能同时对法国和西班牙两面作战。里夫小国寡民，法国远比西班牙强大，法国所能动员的军队就远远超过里夫全体居民的总数。摩洛哥基本上还是一个部落社会，要将各个部落整合和团结到自己的大旗下，需要时间和其他条件。因而克里姆力主同法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法国要消灭里夫国家的主意已定，里夫人只能在抵抗或投降中选择其一。

里夫人没有被强敌吓倒，他们被迫对法国的战争挑衅进行还击。1925年4月间，里夫军队迅速南下，突破法军防线，屡克法军据点，收复一度被法军占领的里夫的粮仓——韦尔加河谷，并向法军重兵把守的非斯、塔扎方向展开猛烈的进攻。

随着战事吃紧，法国和西班牙捐弃前嫌，加紧勾结。双方经过紧张的外

交磋商，于 7 月 25 日正式签定了法西临时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共同对付摩洛哥人民，不准单独与里夫国媾和。7 月底，法西两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法国任命贝当元帅为驻摩洛哥部队总司令。不久，法军增加到 30 万人，又募集了 40 万非洲人雇佣兵，组成了一支 70 万人的侵略大军来对付人口仅 50 万的里夫国。西班牙军队也增加到 10 万多人，并由里维拉首相亲自统率。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法国专门拨出 1.83 亿法郎的巨款作为特别军费，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了陆、海、空三军。两国政府还采用收买部落首领，并用摩洛哥素丹的名义发布了悬赏令，以 50 万法郎作为捕杀克里姆兄弟的酬金。

由于法西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远远超过里夫国，法西军队很快控制了战局。9 月末，西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攻陷了里夫共和国首都阿杰迪尔。次年 6 月下旬，法军包围了里夫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塔尔吉斯特。克里姆为了保护里夫军民的生命财产，决定自愿成为俘虏，要求法国宽容里夫军民。6 月 27 日，里夫军正式投降，克里姆及其族人共 23 人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新生的里夫共和国被法国、西班牙帝国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

里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和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充分展现了摩洛哥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与巨大力量，里夫起义成为摩洛哥人民争取自身民族解放的一次尝试，在里夫起义所提供的历史经验的启发和鼓舞下，摩洛哥人民终于在 1956 年赢得了独立，成为二战后非洲大陆上取得政治独立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埃塞俄比亚位于红海西岸，控其南部出海口，雄踞东西方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埃塞俄比亚境内遍布险峻的群山、相互孤立的高原和陡峭的峡谷，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使埃塞俄比亚显得雄伟壮丽，被人称为非洲的瑞士。但是，相互孤立和多山的高原断层，对于企图统一国家的国王和企图征服这个国家的入侵者说来，同样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埃塞俄比亚领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历史上长期群雄封建割据，经济落后，抵御外侮的力量比较薄弱。早在近代时期，它就成为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对象。其中，意大利最为积极。在 1895~1896 年发动侵埃战争，遭到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殊死抵抗，埃塞俄比亚人民在阿杜瓦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挫败了意大利的侵略，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成为 20 世纪初非洲大陆上少有的几个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之一。

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威胁，埃塞俄比亚的封建统治者开始认识到结束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孟纳利克当政时（1889~1911 年），他便积极进行改革，加强中央权力和军事力量，平息各邦封建主叛乱，结束国家多年的分裂混战状态。但孟纳利克晚年患病，大权旁落，国内政治重新陷入混乱之中。直到 1930 年，女皇扎娣图病逝，摄政王塔法里·马康南即位，称海尔·塞拉西一世，情况才得到好转。塞拉西一世上台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以至社会生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这一改革进程被意大利的侵略打断了。

意大利在 19 世纪末那次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失败后，一直想卷土重来，没有停止过对埃塞俄比亚的颠覆与干涉。一战时，意大利带着投机心理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想在战后获得邻国领土和瓜分德国海外殖民地。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意大利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意大利没能得到原德国海外

殖民地和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一战后，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分子利用意大利人民的不满得以上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之后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墨索里尼认识到一战后要想在欧洲邻国和巴尔干半岛上扩张已不可能，墨索里尼将目光盯在了埃塞俄比亚上。占领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就能拥有其丰富的资源；可以将原已占领的几块东非殖民地连接成一个殖民大帝国，据此与英法抗衡；占领埃塞俄比亚还可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意大利随时有爆发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危险；最后，占领埃塞俄比亚可以洗刷掉1895年战争的耻辱，提高法西斯政权的威信，“既不能给人民以面包，就应给人民以光荣”。

墨索里尼要赶在埃塞俄比亚统一强盛起来之前占领它。从1934年下半年起，意军就不断向埃塞俄比亚进行挑衅。12月5日，意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非洲人士兵的瓦尔瓦尔事件。12月30日，墨索里尼提出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动计划。

1935年10月3日清晨，意大利不宣而战，30万大军突然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分北、东、南三路大举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正式爆发。这是一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相差悬殊的战争。尤其在军事上，意大利拥有数十万配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武器的正规军。而埃方的正规军只有一万多名，全国只有500挺机枪，能使用的只占十分之一，空军只有七架旧式客机。

面对强敌入侵，海尔·塞拉西皇帝首先作为国际联盟会员国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意大利侵略。虽然，英法控制的国联对意大利采取纵容态度，未能给予意大利及时和有利的制裁。但它毕竟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爆发了声援埃塞俄比亚人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有的还专门成立援助组织或派出志愿军，奔赴埃塞俄比亚参战。欧美国家的工人和进步人士积极开展支持埃塞俄比亚人民斗争的活动。中国和印度等国人民也尽力给予支持。这些给埃塞俄比亚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同时，海尔·塞拉西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战斗。在战争爆发五个小时之后，塞拉西向全国发布了总动员令，要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他要求他的士兵不要因为万一名英勇的领袖牺牲而气馁。在一次大会上，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讲话的皇帝，将同你们在一起。为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我将毫不犹豫地洒净我的鲜血。”埃塞俄比亚军民在塞拉西皇帝领导下，不畏强暴，奋勇杀敌。他们用大刀、长矛、标枪等原始武器迎击敌人。他们还采用埋藏粮食，朝水井放盐块不让敌人饮用，实行坚壁清野来打击敌人。意军在付出很大代价，攻占阿杜瓦、马卡累和戈腊黑等地后，无法继续前进。意大利的闪电战计划遭到了失败。墨索里尼为此暴跳如雷，撤了意军总司令德博诺的职务，任命巴多利奥元帅为意军总司令。

意军调换统帅后，又从本土调来大批军队，至1936年初侵埃意军总数增加到50万人。意大利侵略军出动飞机对城镇进行狂轰滥炸，甚至使用了化学毒气。埃塞俄比亚军队仍一味坚持打阵地战和攻坚战，致使死伤惨重。从1936年2月中旬起，一批重要城镇相继陷落，埃军的主力在梅丘战役中被消耗殆尽。5月5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失守，塞拉西皇帝及其家庭成员从吉布提乘英舰“冒险”号离开非洲，流亡英国。5月9日，墨索里尼得意忘形地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不久，意大利把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

合并为意属东非殖民地。

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标志着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意侵略第一阶段的结束。埃塞俄比亚人民英勇不屈，他们接受教训，迅速走上了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正确道路。1937年夏，各支游击队首领聚集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安博开会，成立了“团结合作委员会”。会议选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统筹军饷和武器。游击队人数迅速增加，很快形成了一支10万人的部队，使抵抗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形势。到1938年时，游击队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意军只能固守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带。1939年，游击队已经发展到40万人。

1941年，英国军队在东北非战场向意军发动反攻。在埃塞俄比亚游击队的配合下，英军进入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也率领数千名游击队战士从苏丹进入埃塞俄比亚。同年5月5日，塞拉西率军到达亚的斯亚贝巴，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1941年底，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意战争获得完全的胜利。埃塞俄比亚人民不仅光复了祖国，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功绩被载入了世界史册。

第三节 两次大战之间黑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萌动

黑非洲指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生活这一地区的人民肤色较黑，经济较落后，迟至本世纪初，社会制度上许多地方尚处于部族阶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实行母系氏族制。

自欧洲殖民者入侵黑非洲大陆起，就不断遇到非洲人的抵抗。早期的反抗大多是由当地部落首领、酋长或国王领导。欧洲人凭借其武力，往往不费多大力气就将其镇压下去。当原有的地方统治者意识到抵抗无用时，便放弃抵抗，转而采取与欧洲人合作，争取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自己原有的权利，分享权力总比一无所有好。而西方殖民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或多或少给当地酋长旧贵族们一些让步。这种相互妥协就成了欧洲人在黑非洲实行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基础。

非洲人民从不曾停止过反抗，一战前黑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带有浓厚的地方宗教色彩，最为著名的是1905年发生在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1904年末，在坦噶尼喀的马图姆比族和恩金多族居住的地区秘密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是在恩加兰贝有一种圣水，饮用了这种圣水，就可以刀枪不入，逢凶化吉。于是，人们纷纷涌向恩加兰贝，以求得到圣水。喝了圣水，自然就成了组织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把群众组织了起来，并在1905~1906年发动了规模较大的起义。水在斯瓦希利语中称为马及，故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马及马及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但它在非洲人民反抗西方统治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因为在这场斗争中，非洲人民利用水作为组织人民的手段，打破了往日的部族界限，非洲人民开始按地域联合一致反抗侵略，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就此意义而言，西方对非洲的侵略客观上不自觉地起了促使非洲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

除了利用传统地方宗教之外，非洲人民还利用基督教作为斗争的工具。欧洲人统治非洲促进了基督教在非洲大陆上的传播。欧洲人在非洲传播基督教本意在麻痹人民的斗志，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由于基督教宣传教徒都是兄弟姐妹，从而客观上有利于非洲人打破原有的部落束缚，实现新的团结。最初，教会都控制在欧洲人手中。非洲人逐渐认识到欧洲传教士所宣扬的同欧洲殖民统治者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没什么根本的不同，因而他们开始将基督教非洲化，建立非洲人自己的教会和教堂，由自己的主教传教。基督教非洲化最先产生在南非，后陆续传入东非、中非和西非，并形成埃塞俄比亚运动。据说在《圣经》中曾谈到，埃塞俄比亚将得到特别的祝福，承担特别的使命。这里的埃塞俄比亚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泛指整个黑非洲。很快这形成一个新的教派，并在整个非洲大陆传布开来。

基督教非洲化运动在一战后继续发展，1921年，比属刚果爆发了基班古运动。西蒙·基班古是斯坦利湖畔的一名木匠，他信奉基督教，创立了自己的教会，提出新的宗教学说，宣布“上帝将降火把白人全部烧死”，并带头喊出了“刚果是刚果人的刚果”的口号。起义的真正原因在于比利时殖民当局所实行的残酷的强迫劳役制和强征人头税。基班古派人到各地组织群众拒交人头税、拒种出口作物和拒服劳役。起义遭到殖民当局镇压，基班古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押30年，死于狱中。

在黑非洲，与人民大众利用宗教方式进行反抗殖民统治同时的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活动。如果说前一种反抗斗争发生在乡村，参加者多为农民的话；

那末，后一种的民族主义活动则最先出现在城市。参加者包括：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在非洲本土上过学，有的甚至留过洋；一部分非洲当地的工商业者；以及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城市居民。从地域上划分，他们又可分为大陆本土与海外两部分人。

大陆本土的以英属西非今天的尼日利亚、加纳的为较强，海外的主要是生活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一些黑人精英。他们相对于人民大众说来是少数人，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们看不起人民大众，对非洲本土文化持批判态度，而对殖民统治当局则抱有幻想。他们相信宗主国最终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因而试图调和他们与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合作的态度来换取殖民统治者的让步。他们这种态度同他们的出身与个人经历有关。这种人在英属西非海岸较多，尤其在塞拉利昂较为典型。他们大多是释奴的后代，自19世纪初起，英国率先废除奴隶贸易后，英国的军舰在大西洋上巡逻，将截获的奴隶送到西非海岸，即今天的塞拉利昂居住下来，在那里这些释奴及其后代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他们不同于其他当地非洲人，他们不受传统的部落制度的束缚，由于是英国人搭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对英国人和基督教报有感激之情。他们的后代进入教会开办的学校，学习英文，学习西方文明。有些人毕业后当了官员、记者、律师、教师，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很自然的，这些人对待西方文明和殖民统治的态度与一般非洲人不一样。“他们不仅吞食了西方文明的诱饵，而且连线 and 钓竿也想一道吞下”。

他们与西方殖民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要求分享更多的权益。他们通过创办自己的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在1900年时，塞拉利昂有不下34种报纸，黄金海岸有19种，尼日利亚有7种，其中许多是由非洲人主办的。但他们没能也不想吸引广大的非洲群众跟着他们一道走。他们显得势单力薄，连殖民统治者也看不起他们，他们因而深深陷入困惑和痛苦之中。

一战以后，非洲商品经济继续发展，传统的村社经济和部落制度进一步瓦解。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城市。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形成网络加强各地的联系；另一方面，促使新的社会阶层力量的壮大。在城市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成长。同时，城市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更多的非洲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中许多人出身贫寒，受过有限几年教育，不足以在社会上谋个好职位。尤其是，一战后白人统治者对非洲人的歧视更为严重。英属西非的黄金海岸被认为是对非洲知识分子政策较为宽厚的地区，但就是像这样比较开明的地区，在1926年的政府中，英国人占有481个位置，非洲人仅占28个位置。在随后20年里，欧洲高级职员的人数翻了一番，而非洲人没什么增加。这使得年轻一代的知识阶层对殖民统治日益不满，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他们学习欧洲人的政治活动方式，建立起现代政党组织。

1920年，来自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冈比亚的民族主义者们齐集一堂，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来自黄金海岸的著名黑人政论家和律师海福德被选为主席。从该组织骨干分子的职业看，15人是律师，8人是商人，所以这是西非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政治组织。它所提出的纲领比较温和，“在英国国旗下，帮助英属西非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也就是要争取得到类似英帝国南非自治领的地位。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他们同他们的前辈人相比，没有根本的改变，仍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另外，该组织没有常设的机构，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结社，还称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海福德去

世后，该组织也就瓦解了。

30年代是非洲民族主义组织发展的重要时期，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是促使黑非洲民族主义进一步成熟的两大因素。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中产阶级的利益遭到较大的打击。西方公司压价收购出口经济作物，非洲农业资产阶级的收入减少；机关裁员，减少工资，非洲人工薪阶层首当其冲受害，这促使一部分现代民族主义者靠近人民群众，在工农大众中寻找知音。拜齐尔形象地说：“大萧条是打通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通道的革命鼯鼠。”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进一步刺激了黑非洲的民族主义。埃塞俄比亚是个有悠久历史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的一直维护了自己独立的国家。而英法对意大利的侵略竟然袖手旁观。这促使民族主义者们对自己过去的想法进行认真的反思，信奉基督教，接受西方文明是否就能摆脱西方的侵略。

在三四十年代，大多数黑非洲国家都出现了民族主义组织，著名的有：塞拉利昂的西非青年联盟、尼日利亚的青年运动、黄金海岸的曼比党等。在这些组织中，激进的已经提出争取独立的口号，如尼日利亚青年运动在1938年发表的纲领中第一次号召由本国人民接管政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认识到争取群众支持以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日后成为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的桑戈尔提出应该放弃单纯的西方化，应注意保持非洲人自己的特性，将二者结合，应对非洲黑人传统抱有自豪感。

但是，直到二战时期，黑非洲现代民族主义者在如何争取民众支持的问题上仍没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们往往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这种态度很典型地反映在麦考利所说的：“穿上英国服装做生意，消遣娱乐时则穿本地服装。”在唤醒民众，团结争取群众加入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黑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仍是说的多，做的少。

20世纪上半叶海外黑人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泛非主义运动上，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成为殖民地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系渠道。1900年7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泛非会议，会议由来自特立尼达的律师威廉斯发起，到会代表32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和西印度群岛，来自非洲本土的只有四人，他们大多是在英国留学的学生，实际上是一次留英黑人学生的聚会。到会代表就全世界黑人境遇问题广泛地交流情况和看法，主张黑人应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同白人享有同等权利。会议第一次使用泛非（Pan-Africa）一词，将原来的“非洲协会”更名为“泛非协会”，创办《泛非》月刊，宣传全世界黑人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因此也可称为泛黑会议。在威廉斯主办的大会之后，分别于1919年、1921年和1923年由杜波依斯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首都又召开了三次泛非主义者大会。但这些大会对非洲大陆的影响有限，20年代后基本不再召开。直到1945年，在二战胜利的影响下，才再度召开。

总之，在两次大战之间，以非洲酋长、宗教首领组织领导的反帝斗争已经退潮，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正在产生；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尚处于酝酿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先知先觉者们还是少数人集团，同群众缺乏联系；一些人对帝国主义统治和西方文明存在幻想；民族主义者自身内部因地区、部族而存在隔阂；海内外民族主义者之间不够团结。以上因素导致两次大战之间黑

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相对沉寂状态，这些不利因素在二战后才得到克服，黑非洲终于在二战后迎来独立解放。

第四节 英布战争之后南非的政治发展与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南端。自古以来，黑人便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迟至 15 世纪末，西方人才知道它。17 世纪中叶，一小批荷兰人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来到这里并定居下来。从此，欧洲人便源源而来，他们反客为主，强占非洲人的大片土地，建立牧场，开采矿石，将占人口多数的非洲黑人原住民赶到限定的小块贫瘠的地方。白人殖民者一方面要役使黑人，另一方面又要隔离他们，以免种族的区分与界限被打破。在此基础上，在 20 世纪，白人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统治的政权。从此，南非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不断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进行斗争，终于在 90 年代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 19 世纪 50 年代，南非出现了四个政治实体：两个英国的殖民地，即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两个布尔人组成的共和国，即德兰士瓦的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河地区的奥兰治自由邦。19 世纪末，随着金刚石和黄金矿在南非的发现与开采，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矛盾加剧，英国人企图吞并两个独立的布尔人共和国，并引发 1899~1902 年的英布战争。

英国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02 年 5 月 31 日双方达成了弗里尼欣和约，和约规定：布尔军队投降，承认英国国王的宗主权。作为回报，英国则答应尽快给布尔人以内部自治，并给予布尔人 300 万英镑的财政援助，以补偿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同时，英国人还答应布尔人提出的不给南非黑人以选举权的要求。

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20 世纪初，在四个殖民地大约有六十万人。他们说一种源于荷兰语但同现代荷兰语已相当不同的阿非里卡语，他们称自己为阿非里卡人，以强调自己的民族属性。他们同英国殖民者虽有矛盾，但在南非同属压迫黑人的白人集团，因而，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多于他们的差异。英布战争之后，双方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矛盾有所缓和。布尔人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派主张同英国和解的力量，此派以博塔和史末资为首的南非党为核心。他们认为，布尔人在南非与英国人命运与共，所有生活在南非的欧洲人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南非民族。1906 年 1~2 月，史末资赴伦敦，一方面表示效忠大英帝国，一方面又晓以厉害关系，终于使英国取消了布尔人强烈反对的利尔顿宪法。该宪法制定于 1905 年，旨在加强英国总督在南非的权力，削弱原有的各殖民地议会的权力，从而强化英国人对南非的统治。布尔人担心实行该宪法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为了安抚布尔人，建立一个统一的、自治的、亲英的南非，英国政府制定了新宪法，对布尔人作了让步。

按照新宪法，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分别在 1906 年 12 月和 1907 年 7 月举行议会选举。博塔组织的人民党在德兰士瓦获得了 69 个议席中的 37 席；菲舍尔的统一党在奥兰治的 37 个议席中获得了 32 个席位，他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布尔人自治政府的总理。黑人和有色人种在这两地选举中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1908 年，在英国经营多年的开普殖民地，亲布尔人的政党也在选举中获胜，在那里，绝大多数黑人和有色人种因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在英布战争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在战争中失败的布尔人却在英国统治下的南非四个殖民地中的三个掌了权。

这一政治发展态势使布尔人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所希望建立的四个殖民地的政治联邦发生了兴趣。1908年，在德班召开了有四个殖民地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占南非人口五分之四的黑人和有色人种被完全排除在会议之外。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关于非洲人的选举权问题。经过热烈的辩论，会议最后通过的《南非法案》明确规定，联邦的所有议员均须是欧洲人的后裔。这实际上将英布战争前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推广到开普和纳塔尔地区，以法律形式肯定、扩大和巩固了布尔人的种族歧视政策。

经英国议会批准，南非联邦在1910年5月31日正式成立，它取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英国国王仍为国家元首，原来的英国四个殖民地就成为它的四个省。南非联邦成立后的第一次选举在1910年9月15日举行。选举前，四个省的布尔人政党在博塔和史末资的共同领导下，联合组成“南非党”。竞选基本上是在南非党和亲英的、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联邦党”之间进行。选举结果是博塔的南非党获得67个议席，联邦党获得39个议席。博塔将军出任南非联邦的第一任总理。

南非联邦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危机，危机源于布尔人内部两派人在如何对待南非非白人（南非白人对其他种族的统称）以及如何对待南非说英语白人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博塔和史末资代表一派，主张密切同英国的关系，阿非里卡人与南非说英语的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白人集团。而以原奥兰治自由邦的将军赫尔佐格为首的一派则主张阿非里卡人不能与英国人合流，而应各走各的道；与此同时，还应该逐步削弱与英国的关系。另外，虽然两派人都主张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但在具体处理黑人问题上，赫尔佐格一派被认为比前一派人更顽固和保守。

1914年，赫尔佐格退出执政的南非党，而与他的支持者组成国民党。国民党很快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1915年10月，在南非联邦的第二次大选中博塔和史末资的南非党在130个总席位中只获得54席，而成立才一年的国民党却一举夺得27席。南非党只能与获得39个席位的，由说英语的人组成的联邦党联合执政。1920年3月，在南非联邦成立后的第三次大选中，国民党获得44席，一举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执政的南非党仅得41席，英裔的联邦党得25席。这次，南非党即使与联邦党联合，仍不足整个议会的半数。出于不得已，1921年2月再次举行大选，大选前，南非党与联邦党合并，才赢得79席，史末资得以继续执政。

南非国民党在选举中频频得手，说明其主张在白人选民中有大量的追随者。英布战争改变了相当一部分阿非里卡人的生活。他们因农场毁于战火而大举流入城市、厂矿。这些人一时难以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只能充当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就业竞争中有时还竞争不过比他们更早适应这种环境、比他们更能吃苦的黑人。当时南非工业企业大部分属于英资所有，资本家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倾向于使用廉价的黑人来取代白人工人，于是南非就出现了“穷白人”问题。1913年和1914年，这些生活贫困的白人工人为改善处境，曾进行过大罢工。一战后，白人工人的处境变得更为严峻。1922年3月6日，他们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实行全国总罢工，并选举一个“行动委员会”领导罢工。罢工工人模仿过去的战斗方式，组成“民团”。罢工工人计划占领各矿，促使政府辞职。3月10日，行动委员会和民团还占领了兰德地区除博克斯堡和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之外的所有警察局。史末资政府调集重兵，在3月14日镇压了武装罢工。约有200人被杀，1200人受伤，2000

多工人被捕。好几个工人领导人被处死刑。20年代南非白人工人的斗争既具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面，他们的罢工矛头是针对白人资本家的；同时，也带有排斥黑人的种族主义性质。当时相当一部分白人工人将自己的不幸归之于黑人的竞争，想通过对社会上收入丰厚工作的垄断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史末资政府镇压工人罢工，使工人们对其不满。他们因而拥护带有更强的种族主义色彩的国民党。

在1924年4月进行的大选中，史末资的南非党败于赫尔佐格的国民党。但国民党的席位也并未超过议会的半数。国民党与代表白人工人利益的劳工党结盟，联合执政。由赫尔佐格出任总理。这届政府被称为“联盟政府”。它是南非阿非里卡民族主义与白人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赫尔佐格从1924年起担任南非联邦总理直到1939年。赫尔佐格上台后，加紧实施其通过种族歧视提高白人地位的政策。1924年的“工业调停法”、1925年的“工资法”和1926年的“矿山与工厂法”，均旨在在于在南非工业中实行种族歧视，让白人享受特权。赫尔佐格政府的政策成功地分裂了南非工人阶级的队伍，使南非的白人工人分享其种族主义政策的成果，成为维护种族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

南非联邦成立后不久，1913年11月27日，南非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著土地法》。规定：禁止非洲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任何土地；禁止采用分成制地租和货币地租；非洲人使用欧洲人农场土地只准采用工役地租，每年必须为地主服工役90天以上；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该法令实质上是不允许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独立经营个体经济的权利。而当时一些黑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积蓄了点钱，已多多少少在欧洲人划定的保留地外买了点地，这些小地产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土著土地法》一经公布，白人农场主立即掀起大规模驱赶黑人垦户的浪潮，非洲人突然面临空前严峻的局面：他们经过几代人辛勤劳动积累的财产（房屋、土地和畜群）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从此，大片南非土地便只能由白人垄断性所有，黑人只有出卖劳动力当奴仆的权利。《土著土地法》从法权上将南非分为两个世界，占人口14%左右的白人占有87%的土地，而占人口75%的黑人只拥有13%的土地。这为后来全面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奠定了基础。

《土著土地法》的颁布和实施激化了南非社会的民族、种族和阶级矛盾，也从反面教育了黑人，推动了黑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促使黑人产生了打破部族、地区界限，联合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强烈愿望。1912年元月，来自南非全国各地的和与南非接壤的三个英国属地的黑人组织的代表、酋长和一些黑人知名人士，云集布隆方丹。会上决定组成“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作为南非全国黑人政治组织的联合体。牧师家庭出身的黑人知识分子杜比当选为这一组织的主席。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初期基本是个黑人上层的组织，它的领导人都是在黑人中有一定地位的人，如律师、牧师、教师等自由职业者，部落酋长和有一定财产的人。他们对待白人种族主义者强加于他们的歧视与压迫所作出的反应，是向当局申诉和请愿，希望能争取到同情，从而改善自身的处境。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围绕着土地问题，土著人国民大会对白人当局，乃至英国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游说和申诉。但是，无论是南非当局还是英国政府对这些申诉均置之不理。

1923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直到二战爆发时，它在黑人群众中的影响仍然有限。促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得以发展的是新成长起来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代领导人，他们出身并不那样高贵，因而也更能体察一般群众的疾苦和要求，更能联系人民大众。这些年轻人大多受过中等，甚至高等教育。许多人都曾担任过地方学生组织的领导职务，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在严肃认真地考虑和探讨黑人的解放之路。他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软弱和无所作为深为不满，他们一反老一代的领导人讳言非洲民族主义的做法，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是非洲民族主义者，他们拒绝一切形式的白人统治，从而冲破了老一辈领导人的局限性。

1943年10月，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开始酝酿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下成立青年组织的问题。1944年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他们组成“青年联盟”。1944年4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正式成立。纳尔逊·曼德拉当时是重要成员之一。青年联盟很快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核心，担当起战后领导南非黑人争取解放的重任。

第十一章 1900 ~ 1945 年的拉丁美洲

20 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经历了一系列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变化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民族经济被纳入以欧洲和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经济变革带来社会变革，城市迅速发展，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而社会变革则为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拉美各国政治先后经历了改良和革命动荡，有时则陷于停滞状态。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战前后拉丁美洲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19 世纪后期，尤其在 1880 年以后，拉美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拉美各国自 19 世纪二三十年先后获得独立后，随着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控制，拉美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减少了。拉美的大地产主们将自己的庄园变成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而不是为国内外市场生产产品。但到 19 世纪后期，由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促使拉美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欧洲的工业化使居住在欧洲城市里的人口大大增加，欧洲本国农业无法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大的对食品的需求，更加仰仗海外食品的进口。同时，欧洲的工业由于门类的扩大与产量的增加，对海外原料尤其是矿产品的需求也增大了。这就促使欧洲向海外投资进口更多的食品和原料。

在海外对拉美产品需求扩大的刺激下，拉丁美洲各国以惊人的速度改造他们原有的经济来满足这种需要。拥有大片肥沃草原的阿根廷成为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尤其是羊毛、小麦和牛肉；智利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产铜国；中美洲出口咖啡和香蕉；古巴除生产咖啡以外还生产蔗糖和烟草；秘鲁则出口蔗糖和白银；在巴西，除出口咖啡外，在亚马逊河流域发展起天然橡胶种植业，1912 年巴西生产了占世界产量十分之九的天然橡胶。到本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出口经济。

出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制成品的进口，拉美主要从欧洲进口相对大量的纺织品、机器、奢侈品和其他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业的繁荣促进了拉美的铁路建设，在本世纪初阿根廷已铺设了 10,000 多英里的铁路，到 1913 年铁路里程进一步扩大到 20,000 多英里。在墨西哥，1875 年尚只有 357 英里的铁路，到 1910 年时墨西哥铁路增加到 15,000 英里。

随着发展的加快，来自工业国家、尤其是英国的资本开始进入拉美。在 1870~1913 年，英国在拉美的投资从 8500 万英镑上升到 7.57 亿英镑，即在 40 年中增长了大约八倍。至 1913 年，英国投资占拉美的外国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英国投资最多的一个部门是铁路建设——主要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和巴西。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还投在了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的矿业部门。

经济增长的这种“出口—进口”形式就这样刺激了拉美经济中原料和矿产品部门的发展。由于形成这一刺激及其所需资本主要来自海外，拉美就走上了—条通向“依附性”经济增长的道路，即其经济的繁荣与衰弱依赖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运作状况。

一战爆发后，拉美出口型经济出现进一步增长的势头。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国家远离欧洲战场，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相反，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战争需要，增加了对拉美各国的粮食和战略原料的需求。同时，由于战争，拉美国家不再可能像战前那样从欧美进口大量工业品，一些较大的拉美国家开始自己搞起工业化来。在巴西，纺织、制糖、采煤等工业有相当迅速的增长。1920 年，巴西拥有 13,000 多家工业企业，约有一半即 6000 家是 1915~1919 年战争期间新创立的，到 1928 年工业企业数又增至 31,000 多家。工业生产总值，1928 年比 1914 年增加了三倍。战前全国只有 87 家纺织厂，纺织品大部分靠进口，1920 年猛增到 300 多家，基本上满足了本国的需要。阿根廷是小麦和肉类的传统出口国，大战期间，肉类和羊毛的出口量，

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占世界第一位；小麦的输出量，1920年增至5010万公担，占世界第三位，达到阿根廷最高水平。工业方面，以屠宰冷藏业的发展最为显著，其他如纺织、建筑、造船、金属加工、石油、采煤和化学工业等部门也都有相当的发展。整个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总值，从1913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50多亿美元。在农村，一些大地主和大牧场主采用农业机械和先进技术，雇用农业工人，改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拉丁美洲各国甚至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很多国家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是发展较快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封建性的大地产在很多国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命脉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广大拉美人民未能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加紧了对拉美人民的掠夺。战前，英国资本在拉美占着绝对的优势，尤其在南美大陆各国。大战期间，美国利用它在拉美的劲敌英国和德国互相厮杀的机会，以泛美联盟为工具，加紧对拉美的侵略和控制。美国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投资总额，从1913年的12.4亿美元，上升到1919年的24亿美元，几乎增长了一倍，到1929年时，又增加到37亿美元。贸易总额在1913~1920年间，增加了400%。美国在拉美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空前提高，单独地垄断了拉美对外贸易的半数以上。美国不仅加强了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各国的霸权地位，而且进一步向南美各国扩张。一向在南美占着绝对优势的英国，力量开始削弱。美国垄断公司还直接占有大片土地，成为拉丁美洲的最大庄园主。他们在种植园中广泛采用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把千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新的债务雇农。美国资本向拉丁美洲扩张的加强，不仅使美国垄断组织得到了巨额利润，而且使拉美各国在经济上日益从属于美帝国主义。

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开始就给拉美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经济的突然衰退缩小了拉美的出口市场。拉美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和数量都下降了，其结果是1930~1934年的总出口额比1925~1929年的水平低48%。一些国家的传统出口产品大量积存，卖不出去，仅巴西的咖啡，在危机期间就有四千多万袋在轮船、火车的锅炉里焚毁。20个拉美国家的生产总值，1932年下降到1925年的水平。由于生产的缩减，工农业中的失业人数达到500万到700万之多。

但值得指出的是，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为拉丁美洲的工业进步增加了新的动力。出口业的衰落使拉丁美洲削减了用于进口制成品的资金，日益成熟的拉美企业家们抓住这个机会，填补空缺，发展自己本国的工业。

一些拉丁美洲政府首次扮演了促进工业发展的角色，它们开始实施各种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措施。它们先后采用的方法有：构筑关税壁垒，把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使本国企业能成功地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地步；在本国创造某种需求来刺激本国企业的生产；最为重要的是创建国营公司和直接在工业企业中进行投资。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更大的经济独立性，通过建设自己的工业拉美将减少对欧洲和美国制成品的依赖。从实际效果上看，通过这种对本国企业实行保护以及由国家直接投资的做法，拉美国家为本地区的工业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刺激。至少在一些主要的拉美国家中，自30年代

后期至 60 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相对成功。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建起了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带来了经济增长。这种形式的发展虽有局限性和缺点，但它具有增强民族经济的直接效果。

总之，尽管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在 20 世纪上半叶期间受到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可历史留下的却是一部取得了显著进步的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次世界性事变促使拉丁美洲经济部门发生了重大的结构变化，成功地建立一批自己的轻工业，一些较发达的国家还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

20 世纪上半叶拉美社会变迁 伴随经济发展，20 世纪上半叶拉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在南美及墨西哥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仍在不断地涌入拉美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都市化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最后，由于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拉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在增长。

在一战以前，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是拉美地区教育比较发展的国家。早在 19 世纪末期这三个南美国家已广泛推行了公民普及教育。例如，在阿根廷，国立和私立学校中注册的小学生人数 1890 年已有 30 万人，1912 年时增到 78 万；在国立学校就学的中学生人数从 1880 年的 3300 上升到 1915 年的 11,000。在智利，1891 年有 95,000 名儿童在公立小学念书，到 1909 年已增至 24 万名。在乌拉圭，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已开始着手建立全国公共教育网，到 20 世纪初，乌拉圭在教育方面已成为拉美地区仅次于阿根廷的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教育开始较快地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巴西与墨西哥。巴西在瓦加斯总统统治时期使全国的小学增加了一倍，中学增加了四倍，1937 年创立了巴西大学，瓦加斯还促进了各种职业院校的建立。墨西哥在两次大战之间将普及教育当作最重要的纲领之一加以推行。1925 年至 1940 年间，墨西哥的小学生人数增加了 100 万人。墨西哥政府除推行普通教育外，还实施一系列计划，抓成人及农村教育。从 1922 年至 1947 年，墨西哥以每年平均 1000 所的速度建立起了 25,000 所乡村学校，使得墨西哥识字率在这一时期从 29.8% 上升到 57.5%。这些国家公共教育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拉美社会的现代化。

拉美地区与亚洲地区一个很大不同点在于自近代以来它吸收了大量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

国际移民进入拉美地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达到高潮，1850~1914 年间，成百上千万移民涌入拉丁美洲。在这一时期内，仅阿根廷一国的净移民数大约就有三百万。还有数量可观的人移民到巴西、乌拉圭和智利。

到本世纪 20 年代时，大规模持续的移民浪潮消退了，但其后在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却又使大量的欧洲人在几个较短的时期内涌入拉丁美洲。两次世界大战、30 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二战前后中欧出现的对犹太人迫害浪潮，都促使大量欧洲移民进入拉美地区。同时，在这一时期，亚洲移民也开始涌入拉美地区，1924 年到 1933 年间，有十多万日本人移居巴西。

大量外来移民涌入拉美给拉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移民给本地人口增添了新的种族成分，拉美社会因而由土著印第安人、来自非洲的黑人、欧洲移民，及他们相互通婚而形成的混血种人所组成。此外，外来移民为拉美地区带来了活力，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技能，而且还带来了相当大的现代化变化。

国外来的移民大都居住在城市地区，从而加速了拉美地区的都市化进程。这一进程还受到另一重要因素的推动，在整个拉丁美洲，当新建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为城市地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时，农民们不断迁移到城市去，城市的流动人口因此增多。早在 1895 年，阿根廷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本世纪初，乌拉圭也有相同数量的人口成为城市人口。

进入 20 世纪后，拉美地区的都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尽管城乡人口都在增加，但是移民和国内人口迁徙导致了较高的城市增长率。城市人口（居民超过两万人的城市的人口）增长迅速，1945~1950 年间，阿根廷、智利、古巴、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五国的城市人口都已达到 50% 以上。

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移民的不断涌入、现代教育的普及，以及都市化的发展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中等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发展。就职业而言，这一阶层包括专业人员、商人、店员以及中小企业家。新的社会环境不仅需要更多的各级政府官员，还需要更多的教师。商业出口机构需要会计、经理和经纪人。日益扩大的新兴采矿业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工程和技术人员。中等阶层主要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积极参与政治以求提高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另一重大变化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新建的货栈、工厂、采矿业和加工厂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队伍。一次大战时期，由于工业的发展，拉美工人阶级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力量显著壮大了。例如，巴西的产业工人，1909 年为 3.5 万人，1920 年增加到 27.5 万多人。阿根廷的产业工人，也由 1907 年的 12 万人增加到 1920 年的 35 万人。工人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等等轻工业和加工制造业部门。20 世纪上半叶拉美工人阶级队伍重大特点之一是，在拉美几个主要的工业较发展的国家中，除墨西哥之外，外国移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自己的工会组织，通过罢工等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第二节 一战前后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

进入 20 世纪，拉美地区出现了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影响较大的有：1910~1917 年墨西哥革命、阿根廷的一月风暴、巴西普列斯特斯长征和尼加拉瓜桑地诺反美爱国游击战争。

1910~1917 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墨西哥处于迪亚士统治下。迪亚士（1830~1915 年）出身于印白混血种家庭，早年当过绿林好汉，后成为胡亚雷斯（1806~1872 年）手下一名将领。胡亚雷斯去世后不久，1876 年，他夺取了墨西哥的统治权。随后，他统治墨西哥达 35 年之久（1876~1911 年）。

胡亚雷斯是墨西哥历史上的伟大改革者，曾被后人称赞为“墨西哥各族人民中最先进的人物”。胡亚雷斯的改革有两大目标：建立民主政体和发展经济。迪亚士则只要后者而不要前者。他认为：欧美式的民主不适合墨西哥的国情，墨西哥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的无政府状态证明民主只能给墨西哥带来混乱；只有让他成为墨西哥的独裁者，墨西哥的和平安定才有希望；只有和平安定的局面才能开发墨西哥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只有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教育事业，实行社会改良措施，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使用“面包或是棍棒”的政策。对那些可能危及其个人独裁统治的人物，他先给予笼络，他的名言是“一只口里衔着骨头的狗不会伤人，也不会去偷窃”。如谁不识抬举，就坚决消灭之。通过这种手段，他将地主、教士、将军、地方首领、土匪头子、外国资本家、中产阶级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统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把他们集合起来对付工农大众。

在迪亚士统治时期，墨西哥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19 世纪末，墨西哥已建成 9000 英里以上的铁路。矿业产值从 1880 年 3000 万比索增加到 1900 年的 9000 万比索。纺织厂、钢铁厂纷纷建立。外贸 1870 年仅为 5000 万比索，1900 年时达到 2 亿比索。1894 年政府收入为 4100 万比索，1910 年时增加到 1.1 亿比索，16 年增加了一倍半。1894 年第一次实现预算平衡，在其统治最后 16 年里，墨西哥有了 1.36 亿比索的积累。有了钱，政府可以如期支付军队的薪饷和政府雇员的工资，从而结束了过去因发不出薪饷而爆发内战，又因内战更发不出薪饷的恶性循环。

但在这些成就后面，墨西哥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迪亚士统治时期，土地集中程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占全国总面积五分之一的九千多万英亩的土地被迪亚士私下分给了 17 个自己的亲信，最多的一人分到 1700 万英亩。迪亚士还将大量的国有土地出卖给外国资本，外国资本不仅获得大片墨西哥土地，而且根据 1884 年法，得到土地下面的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美国除在墨西哥拥有大量的种植园外，美国的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还占有了墨西哥四分之三的矿山和一半以上的油田。

大地产制给墨西哥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1894 年以前，墨西哥的粮食人均产量是 282 公斤，1894 年下降到 154 公斤，1907 年时只剩下 144 公斤。广大的印第安人被剥夺了世代耕种的土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在大庄园里，农奴们工资低微，时常遭受殴打。

进入 20 世纪后，迪亚士政权开始面临危机。首先，从 1908 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已不再繁荣。1909 年又遇粮食歉收，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不满情绪加剧。当时，迪亚士政府已经老化，迪亚

士本人已是年迈的老人，他的两个行政长官已年逾八十，六个在七八十岁。人民希望政治上出现新的变化。

1910年是个选举年，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马德罗出来与迪亚士竞选。马德罗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土生白人家庭，家有大农场、棉花种植园、酿酒厂和冶炼厂。他本人曾在法国和美国留过学，具有人道主义思想。1909年起，他周游全国，组织团体、创办报纸、发表演说。当1910年4月，选举开始时，迪亚士并不把这位身材矮小的对手放在眼中。但到5月时，迪亚士发现马德罗竟能集合起三万多追随者在总统府外示威时，迪亚士立即将马德罗抓进监狱。

大选完毕后，迪亚士才将马德罗放出来。出狱后，马德罗于1910年10月5日发表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有：要求迪亚士辞职，进行选举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并号召墨西哥人民武装起来，跟迪亚士进行斗争。

马德罗的号召立即得到了人民的响应。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军队都相继行动起来。特别是农民，因长期受残酷压迫剥削，对迪亚士恨之入骨，反抗特别强烈。在农民斗争中，出现两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南方的萨帕塔(1877~1919年)和北方的比利亚(1877~1923年)。萨帕塔是莫雷洛斯州的一个混血种人佃农。他以“争取土地和自由”为口号将甘蔗种植园里的印第安农奴组织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他们焚烧大庄园，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且袭击地方的官僚机构。比利亚原先是一个债务奴隶，后来逃跑成为闻名北方的绿林好汉。他与萨帕塔一样，领导农民为争取土地与地主进行斗争，曾把墨西哥北部特拉索斯家族1700万英亩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

马德罗与南北两支农民军取得联系。1911年初，两支农民军都取得重大战果，并开始向首都推进。在农民军的南北夹击下，迪亚士被迫于1911年5月24日辞职，逃往欧洲。消息传开，举国相庆，首都彻夜狂欢。

1911年6月，马德罗进入首都，11月就任总统。马德罗上台后，并不能控制国内局势。他上台靠的是农民革命军的力量，但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不愿按农民的愿望办事，而是要求解散农民游击队。同时，他对旧政权的人物大谈怜悯与仁爱，让他们官复原职。

人民群众对马德罗政权很快感到失望。1911年11月，萨帕塔在莫雷洛斯州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指责马德罗欺骗人民，并公布了“阿亚拉计划”，其中提出了农民革命的土地纲领，要求没收大地产，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所有者可获得地价的三分之一作为补偿，但地主如果直接或间接抗拒这一措施，则没收其全部财产。阿亚拉计划获得了农民的热烈拥护，在南方农民军所控制的六个州内，掀起了农民自己起来武装夺取土地的浪潮。

美国对马德罗政权采取一种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担心马德罗将采取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美国政府利用人民群众对马德罗政权不满的情绪，支持墨西哥反动势力反对马德罗。1913年2月，美国策动马德罗军队的参谋长韦尔塔发动政变，将马德罗逮捕入狱，随后将其暗杀。

马德罗之死再次激起墨西哥革命高潮，出现三支反韦尔塔的力量：以卡兰萨和奥夫雷贡为代表的护宪军，萨帕塔和比利亚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以及刚成立的工人红色大队。

韦尔塔政权上台后不久便内外交困，摇摇欲坠。由于韦尔塔政府上台后

转而采取亲英政策，不太听美国的使唤，1913年3月，美国新总统威尔逊就职后，不再支持韦尔塔政权。1914年7月15日，韦尔塔不得不辞职。墨西哥成为一座空城向各路军队敞开。这是一场竞走比赛，谁最先到达墨西哥城，谁就获得政权。1914年8月，卡兰萨部将奥夫雷贡进占墨西哥城，卡兰萨获得了政权。

新成立的卡兰萨政权没能得到农民军的支持，当年12月，比利亚和萨帕塔联合起来，进占墨西哥城，卡兰萨军不得不撤出墨西哥城。但是，农民军进入墨西哥城后，很快显露出他们的局限性。萨帕塔个人品格高尚，革命性强，治军严明，但他不知如何去治理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掌握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在同比利亚军会师于墨西哥城后不久，萨帕塔军便自动地退回自己的根据地莫洛雷斯山区去。比利亚本人绿林出身，沾有不少不良习气，对自己的部下管束不严，部队在首都很快地开始变质。

卡兰萨则在外省集结各种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争取工农的支持。1915年1月6日，发布土地改革令，规定凡非法从印第安村社夺取的土地必须归还印第安人，如不够需要，还应从大地庄园中拨出一部分土地来分配。他还与工人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建立联系，承诺将帮助工人成立工会，改善工人的状况。结果，有六个团的红色工人兵团加入卡兰萨的军队，卡兰萨的力量因而大增。

1915年1月，奥夫雷贡率军打败比利亚军，回到墨西哥城。随后，卡兰萨军对南北两支农民军进行围剿。萨帕塔因在南部建有根据地，同当地的群众关系好，坚持斗争一些年，直到1919年误中敌人埋伏而牺牲。1923年比利亚因战败被杀。

轰轰烈烈的墨西哥革命最终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卡兰萨军队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革命中，墨西哥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当时约1500万人口的墨西哥，有100万人死于战火，铁路被破坏殆尽，矿业生产在1910~1920年间下降40%，工业下降9%。

尽管如此，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工农群众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因而，取得政权的卡兰萨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对工农的要求作出些让步，这主要体现在1917年2月颁布的宪法中。

1917年宪法是1857年宪法的继续与发展。其中，有关土地问题的第二十七条和有关工人问题的第一百二十三条尤其值得重视。1917年宪法宣布：国家是土地、河流、矿藏的所有者，严格限制外国人利用墨西哥资源的权利，只有墨西哥人才能拥有这些资源；教会和股份公司不得领有土地；收回迪亚士政权出卖给外国的租借地，废除大地产制，发展小块土地所有制。宪法还规定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会权利，实现女工和童工的保护制度，废除封建借贷关系等。总之，这部宪法为墨西哥政府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改革和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提供了法律根据，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20世纪初拉丁美洲最激进的一部宪法。

阿根廷一月革命风暴 在阿根廷，从1918年到1921年的短短三年间，发生了850次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710万人次。其中，1919年的一月风暴，成为这一时期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潮。事件最初起因于一家英资公司中的劳资冲突。1918年11月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英国华森公司属下的一家冶金工厂的2500名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

资 20%和改善劳动条件。1919 年 1 月 7 日，该厂的工厂主雇用一批武装暴徒向正在集会的工人开枪射击，造成当场有 6 名工人死亡，30 名受伤。这一暴行激起全城劳动者的愤怒。第二天早晨，各工厂自发组织了罢工。到 1 月 9 日发展为总罢工，为死难工人举行葬礼，市内交通中断、商店停业、工厂关门，有二十多万工人为死难者送殡。送殡队伍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政府军警开枪射击送殡队伍，游行群众奋起反抗，罢工立即转变为武装起义。工人们砸开军火库，抢光了两所军械库的武器，纵火烧毁了华森公司的机械厂。在大街上，工人将电车的车厢翻转过来筑起街垒，同军警展开搏斗。好几天内，整个城市几乎被工人所控制。首都工人的斗争得到了刚成立不久的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和各省工人联合会的支持。起义延续到 1 月 15 日，最后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在这次事件中，有两千多人死亡，四千多人受伤，在阿根廷历史上被称为“流血的星期”。

一月风暴虽然失败，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伟大力量，迫使阿根廷政府不得不作些让步。在 1919~1923 年间，阿根廷政府颁布了若干改善劳动者处境和限制企业主的法令，为产业工人和运输工人确定八小时工作日，并不顾议会中大多数人的反对，实行石油国有化措施。

普列斯特斯纵队长征 1924 年，巴西政府军队中爆发多次起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年 7 月，巴西圣保罗卫戍部队 6000 士兵在伊西多·洛佩斯将军的领导下，爆发了反独裁起义，起义者占领圣保罗城达三周之久。同年 10 月，驻在巴西南部里约格朗德北部的一个小镇上的工兵大队，在大尉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领导下发动起义，号召推翻贝尔纳德斯独裁政权。这支被称为“普列斯特斯纵队”的起义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起义队伍很快扩展到 1500 人。为了增援圣保罗的起义者，同洛佩斯将军的起义部队会合，普列斯特斯率部北上。贝尔纳德斯政府集结大军，配以大炮、坦克和轰炸机，追击围剿起义部队。普列斯特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来对付政府军，突破重围，于 1925 年 4 月与洛佩斯的部队会合。

起义部队会合后，仍然面临被剿灭的危险。为了把斗争继续下去，部队进行了整编，并接受普列斯特斯提出的计划，深入内地开展游击战。经过整编，纵队分为四个支队，拥有 3000 名战士，由洛佩斯任司令员，普列斯特斯任参谋长。洛佩斯为取得同巴西沿海地区起义者的联系，前往阿根廷。纵队则在普列斯特斯的领导下向内地挺进。所以，人们称这支队伍为“普列斯特斯纵队”，把普列斯特斯称为“希望的骑士”。纵队翻山越岭，横渡大河，穿越沙漠、沼泽和原始森林。战士们忍饥挨饿，饱受疟疾和黄热病的折磨，但他们始终保持顽强的革命斗志。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税租帐册，释放政治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支革命的纵队同超过他们 20 倍的政府军进行 53 次大战斗和千百次小接触，两次穿越巴西全境，转战巴西 13 个州，行程两万五千多公里。成为拉丁美洲现代史上的一大革命壮举。但是，由于起义队伍没有建立根据地，没能将群众广泛动员起来，最后在政府的追击下，于 1927 年初退入玻利维亚境内，起义遭到失败。普列斯特斯本人流亡国外，1934 年在墨西哥加入共产党，后来长期担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

尼加拉瓜桑地诺反美爱国游击战争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是个小国。由于它在地理位置上同时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境内有尼加拉瓜湖和圣胡安湖，具有开凿沟通两洋的运河航道的优越条件，因此很早就成为英美两

国资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国先通过强迫尼加拉瓜签订一系列借款协定和条约控制了尼加拉瓜的海关、铁路和银行的大权，操纵了尼加拉瓜的经济命脉。接着，1914年8月5日，美国同尼加拉瓜迪亚斯保守党政府签订了《布里安查莫罗条约》，以300万美元的代价获得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的特权，以及取得具有军事意义的封塞卡湾和科恩群岛为期99年的租借权。从此，尼加拉瓜实际上沦为美国的保护国。美国可以任意干涉尼加拉瓜内政，使尼加拉瓜的政局动荡不安。

1921~1926年，尼加拉瓜自由党与保守党为争权夺利不断爆发内战，美国站在保守党一边。1925年，保守党人查莫罗发动政变，推翻了自由党政府。自由党人为反对查莫罗，恢复被推翻的政权，建立了一支“护宪军”。1926年，当美国看到保守党人政府摇摇欲坠时，公然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登陆，蛮横进行军事干涉。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美国先后派出了十几艘军舰和5000名海军陆战队，以“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进驻首都马那瓜，并封锁海岸，到处建立“中立区”，以阻挠自由党军队的进攻。同时，给迪亚斯保守党政府大量的武器军火，甚至出动飞机支援。作为回报，迪亚斯政府保证美国在1914年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美国的军事干涉和迪亚斯的卖国行径，遭到尼加拉瓜人民的坚决反抗，许多地区爆发了起义，成立了游击队。美国加紧对自由党人施加压力，1927年5月，美国总统柯立芝派遣特别代表亨利·史汀生到尼加拉瓜进行调停。自由党人慑于群众的武装斗争和美国的压力，与美军签订了“黑山楂”协定，同意停火，立即向美军缴械，由美国监督下届选举。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之间的战争遂告结束。

但在自由党人将领中有一人拒绝放下武器，他就是奥古斯托·桑地诺将军。桑地诺，1895年出生在尼加拉瓜一个小庄园主家庭。曾在墨西哥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当过机械师。1926年5月，当他得知国内发生反独裁武装起义时，立即回国参加斗争。他先到北部山区的一家美国资本所有的金矿做工，在那里组织群众，准备武器弹药。1926年10月26日，他率领29名矿工炸毁矿山，正式宣布起义。开始，他们只有少量枪支，他和战士们就用沙丁鱼罐头盒制土手榴弹，用锄头、斧头为武器，不畏强暴与美国侵略军作战。桑地诺为了与自由党人一道反对迪亚斯，遂率军东进，与自由党人的部队会合，随后他被授予将军衔。当自由党人接受美国调停，实行妥协时，桑地诺则决心继续高举反美战旗。他说：“一个民族的主权，不是靠言词，而要用武器来保卫它。”

桑地诺毅然与自由党人分道扬镳，率领200人的队伍北撤，然后开进层峦叠嶂的塞戈维亚山区。这时，他身边只剩下三十多人。但他顽强不屈，在他发表的《5月12日通告》中表示：“宁愿战斗而死，也不屈辱而生。”桑地诺重新组织和扩大队伍，建立根据地。当美军向桑地诺发出最后通牒，要他48小时内投降时，桑地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严阵以待，誓死保卫祖国。”并于1927年7月7日凌晨向美军据守的军事重镇奥科塔尔发动进攻。由于有当地农民和市民的参加与支持，游击队炸毁了敌军司令部，很快攻占了大半个城市。美国出动空军配合地面部队发动反攻，游击队伤亡很大，被迫撤退到山上。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游击队接连受挫。这些失败教育了桑地诺，使他改变了攻城夺地的战略，转而采取“分散队伍，夜间出击，利用障碍，伏击敌人”的游击战方针。同时，他着手整顿起义队伍，正式成立尼加拉瓜民族主权保卫军。无论官兵，人人配带由红黑两色组成的统一标志，象征“不

自由，毋宁死”。此后游击队开始改变了被动局面。

11月，美国侵略军对桑地诺起义军司令部所在地奇泼特高地发动了残酷的围剿。桑地诺的部队由于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够快速转移，采取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

桑地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他倡导成立“工农合作社”，开发尼加拉瓜的天然资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主张没收外国人占有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收回运河区主权，维护本国经济权益等。他还规定了起义军不发工资，不得侵犯和平居民等条令。因而起义军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人数扩大到了三千八百多人，除工人外，还有大量的印第安农民和黑人参加。起义军坚持抗战七年，先后进行五百多次战斗，曾一度控制全国16个省中的八个省。尽管美国一再增派军队，但这支人数不多、装备甚差的队伍，却英勇地抗击着拥有海、陆、空各兵种的一万两千多人的美国军队。

在桑地诺军打击下，美国政府变换了手法，在尼加拉瓜训练了一支“国民警卫军”，由原陆军部长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为队长，随后于1932年宣布美军撤出尼加拉瓜。接着，美国又扶持萨卡沙“当选”总统，以代替蒙卡达，而军权则掌握在美国代理人索摩查之手。

1933年1月1日，自由党人胡安·萨卡沙就任尼加拉瓜总统。他以美军已经撤出尼加拉瓜为政治资本，邀请桑地诺来首都谈判停战。随后，双方草签了协议。1934年1月，萨卡沙再度邀请桑地诺赴马那瓜作最后的谈判。2月26日，桑地诺抵达首都，18日，他致函萨卡沙，要求限制国民警卫队的活动，保障游击队员的安全。20日，萨卡沙对桑地诺及游击队的安全再次作出保证。21日下午，桑地诺应邀到总统府赴宴。宴毕，在返回的路上，被预先埋伏的索摩查国民警卫队绑架，当夜十点三刻被杀害。随后，国民警卫队袭击了桑地诺游击队根据地，杀害了约三百名革命者，桑地诺游击队遭到彻底的破坏。1937年，索摩查在美国扶持下出任总统，他自定为终身总统，并规定可以世袭，从此，开始其长达41年之久的亲美独裁统治。

桑地诺领导的尼加拉瓜人民反美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但是在桑地诺领导下尼加拉瓜人民敢于反抗外国侵略的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反美斗争，在拉丁美洲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除以上事件外，在其他拉美国家，也多次发生了罢工斗争和武装起义。1919年5月秘鲁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坚持两个月才被镇压下去。在古巴，1920~1921年，不断发生工农群众的罢工和暴动，迫使美国于1922年2月撤出其在古巴的驻军。1920年，危地马拉人民起义，经过八天战斗，推翻了以美国垄断资本联合果品公司为靠山的卡夫雷拉的暴虐统治。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发展

国家建设与政治现代化 拉美虽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已先后获得独立，但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政治上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独立战争后拉美社会产生了大批的散兵游勇，他们被大小军阀利用来互相争权夺利，破坏了社会安定。独立战争后出现一批新的国家，产生未定国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断。最重要的是，独立摧毁了原先宗主国国王的合法象征，又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取代它将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权威。当时拉美各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种族隔阂、阶级对立，人民效忠于家族和地方利益，缺乏民族国家观念。加上地理上的差异，交通通信的落后，其结果是拉丁美洲的政治分裂，出现了政治上的考迪罗主义。一批地方庇护主或军阀除保有自己的军队外，还通过控制地方司法和行政官员来行使统治权力，软弱的国家政府则默认他们的权力。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严重妨碍拉美社会经济的进步。这样，拉美各国不得不首先致力于现代国家的建设，即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让全体国民认同和服从国家的利益，并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职权管理范围，从而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拉美政治在 19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在一些国家发生变化，边界问题和地区性叛乱事件逐渐减少，国家在对教会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在逐渐提高。

一战后，出于参与政治的愿望，在拉美各国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著名的资产阶级政党有阿根廷和智利的激进党、乌拉圭的红党、哥伦比亚的自由党、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古巴的真理党和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这些政党同 19 世纪拉美的政治组织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这些政党吸收自己的成员时，不是看他是否效忠于某一个特定的政治领袖，而是根据他是否认同该党的意识形态、施政纲领及该政治集团的利益。新式政党有更加严密的组织，他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人，在全国各地开展活动。

一战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得到了传播，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也在拉美各国先后建立起来。早在十月革命前，拉美一些国家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就已在一些工业中心，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小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予拉美工人阶级巨大的鼓舞，也进一步增强他们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意志。拉美各国的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摆脱无政府工团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束缚，在各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1918 年 1 月，阿根廷左翼社会党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创立阿根廷国际社会主义党，1920 年改名为共产党，并宣布加入共产国际，这是拉丁美洲大陆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接着，墨西哥（1919 年）、乌拉圭（1920 年）、智利（1922 年）、巴西（1922 年）、尼加拉瓜（1925 年）、古巴（1925 年）、秘鲁（1928 年）、萨尔瓦多（1930 年）、哥伦比亚（1930 年）等国的工人阶级政党也相继成立。1929 年 6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进入 30 年代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又有八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拉丁美洲共建立了 19 个共产党组织。拉美共产党在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对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4~1945年间，拉丁美洲政体所发生的最重要的现代化变化就是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拉美的精英，尤其是地主开始对本国的政治感兴趣。他们不再满足于生活在封地式的庄园中，而是开始追逐政治权力。此外，到本时期结束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已完全取消，在约半数的国家中还取消了识字限制。还有七个国家在此阶段赋予妇女参加投票的权利。选举权的扩大使广大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阶层成了能对名门望族的政治垄断进行挑战的新兴力量。

总之，一战后，拉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加强；政党的成立有利于政治向制度化方向发展；选举权的扩大使政治参与更加广泛。在这些条件下，拉美各国原有的考迪罗政治逐渐向现代政治转变。这点在墨西哥、巴西和智利等国尤为突出。

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运动 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迪亚士的独裁统治，并且颁布了一部激进的宪法，但是，革命后墨西哥的政局仍然十分动荡。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国内的封建地主和反动天主教教会势力不断制造混乱，伺机反扑。工农大众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忠实履行1917年宪法。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却忙于争权夺利、纷争不已。先是奥夫雷贡和卡列斯联合一道反对卡兰萨政府，1920年卡兰萨被推翻，奥夫雷贡执政。1928年7月奥夫雷贡又被一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没几年时间，几大首领剩下卡列斯一人，卡列斯才较稳定地控制了局势。

卡列斯也是一位军人，1924年第一次当选总统，从那时起直到1934年，其间虽然更换过好几个总统，但实权一直操纵在卡列斯手中。他于1929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党，自任为该党的“最高领袖”，通过国民革命党他在幕后操纵政府。在执政初期，他也曾以“左翼”自由主义者自居，实现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倾向的政策，强调反对教会势力和进行土地改革。1925年，在他的主持下，国会还制定了有进步意义的土地法和石油法。土地法对外国公司在墨西哥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了限制；石油法将外国石油公司对土地的所有权改变为50年的租借权，由此还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1927年以后，卡列斯开始改变立场，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妥协。这一年年底修改了石油法，将外国公司的50年租借权改为无限期。1930年，停止了曾实行过的土地改革，并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墨西哥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工农运动再次兴起，中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在执政的国民革命党内部形成一个左翼激进反对派，他们主张保护民族主权摆脱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严重依附，实现1917年宪法所规定的许多进步改革。卡德纳斯是这一派别的领导人。在激进派的努力下，1933年12月在克雷塔多召开的国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名为“六年计划”的行动纲领。拟订的计划中主要精神是加速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外国资本流动，发展民族工业，增进农业进步和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卡列斯集团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稳定局势，在1934年总统选举中，推出卡德纳斯作为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年)出生在一个印欧混血种人家庭，他父亲是个小杂货店主，家境贫寒。卡德纳斯在14岁时就辍学进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1913年，他参加了革命军队。他在战斗中不断晋升，25岁时被提拔为准将。1928年和1933年两度在自己的家乡米却肯州担任州长。在担任

州长期间，由于他励精图治，大兴改革之风，颇有政绩。1934年他当选墨西哥总统。

卡列斯当时推出卡德纳斯一方面是由于想利用卡德纳斯在墨西哥人民中的声望，另一方面是认为卡德纳斯的个人权力基础比较薄弱，易于控制。但实际上，卡德纳斯上台后立即采取巩固民主政体的措施，坚决打击以卡列斯为代表的军事寡头势力。卡德纳斯迅速改组了内阁，新内阁吸纳具有进步思想的政治家。当卡列斯企图控制卡德纳斯，阻止其改革时，1935年6月，卡德纳斯发表《告全体人民书》，公开与他决裂。卡德纳斯积极争取群众对政府的支持。1936年2月，在卡德纳斯的支持下，召开了全国工人运动统一代表大会，建立起“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拥有会员近百万人，成为支持新政权的一支强大力量。当卡列斯进而图谋发动政变时，卡德纳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断然措施，于1936年4月10日用飞机将卡列斯放逐到美国去，并进一步将卡列斯党羽从中央、各州政府以及军队中清洗出去。同时，对军队进行改造，规定军官晋升必须经过技术考核，现役军官不得介入政府工作，把军队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卡德纳斯还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1938年，卡德纳斯重新组建了执政党，并将其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党。新党改变过去以地方集团为基础的组织系统，在党内设立农业（农民）、劳工、军人、和民众四个部门。这一改组首先有利于吸纳工人农民入党。1938年，卡德纳斯将墨西哥最大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纳入党内。当时工会会员有25万，农会会员有255万，两者相加占党员总数的94%，从而大大壮大了改革的力量，成为钳制军方的重要力量。一旦军人政变，政府可以武装工农讨平叛乱的军人。其次，党内设立军人部，有利于军人的意见在党内得到表达，而不是诉诸手中的枪杆子。在党内，军人只占有四票中的一票，因而不能再主宰墨西哥的政治。1941年，卡德纳斯进一步推行改革，下令在党内废除军人部，解散国会中的军人集团，政治职位几乎全部由文人担任，墨西哥政治终于摆脱了军人的干预。

卡德纳斯大力推行土地改革，打击封建大庄园主的势力。在他任职期间（1934~1940年），他将4000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墨西哥农民。这一数量几乎等于在他之前所有总统分配的土地的两倍。卡德纳斯还认识到，光提供给农民土地而不提供配套的必要服务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墨西哥的农业问题的。有了土地的农民往往满足于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余粮来满足日益扩大的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卡德纳斯的解决方案是大力倡导建立村社组织。村社是古代阿兹特克人留下来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但原来的村社土地已逐渐被大庄园主兼并。卡德纳斯重新将土地分配给村社，村社成了土地所有者。一个村社包括数百甚至上千户人口。政府还成立“全国村社信贷银行”，向村社提供资金，帮助村社兴修水利工程、铺桥修路、建立学校和医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卡德纳斯的村社发展计划实行得并不理想。政府所许诺的社会服务和资金没有到位，村社管理混乱，生产率低下，提供给市场的农产品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虽然存在上述问题，卡德纳斯由于给农民分配了大量的土地，加快了土改步伐，这不仅使卡德纳斯政府在农民中赢得巨大的声望，也有利于稳定农村从而有利于墨西哥农业的发展。

在工业领域，卡德纳斯政府实行将石油等工业企业国有化，打击外国垄断资本势力的激进政策。在迪亚士统治时期，外国资本控制了墨西哥很多重要工业部门。1917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一切矿藏拥有直接的管辖权，但革命后的各届政府在同外国资本斗争中动摇不定，没有改变外国垄断资本控制墨西哥经济命脉的局面。在20世纪初，墨西哥石油资源在已探明的世界石油资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到30年代，外国石油公司，主要是美国资本，几乎垄断了墨西哥的石油开采。在1928年的石油工业中，仅美、英资产就占全部总投资的96%，本国资本只占1.1%。卡德纳斯上台后，设法限制外国垄断组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1938年3月18日，政府宣布将所有17家美、英石油公司的产业全部收归国有。外国公司的财产由墨西哥石油股份公司接管，分十年偿还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的财产。美国公司先是要求自己的政府出面干预，对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让卡德纳斯改变政策。这一招失败后，接着，美国公司提出了巨额索赔，包括它们曾拥有的所有地下石油的未来价值。墨西哥政府据理力争，同时争取墨西哥人民的支持。墨西哥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来支持政府。很多人主动地把他们的钱财，甚至结婚的戒指也奉献给国家，来支持政府赎买外国的石油公司。在赔偿外国公司之后，墨西哥人创建了自己的国有石油企业——墨西哥石油公司。最后，黔驴技穷的美国公司实行对墨西哥石油进行了世界性的拒购，并强使所有主要的外国石油设备提供者将墨西哥石油公司列入黑名单，阻止墨西哥发展自己的石油冶炼业。但是，墨西哥政府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石油开采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石油国有化运动取得了成功。为了纪念这一斗争，墨西哥人民把“3月18日”这一天定为“征收日”。它标志墨西哥经济独立的开端。

综上所述，卡德纳斯的改革将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提出的目标加以制度化，他的政治改革促进了墨西哥的政治民主化；土地改革有利于长期困扰墨西哥的农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将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则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利益。总之，卡德纳斯改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大地所有制，促进了墨西哥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劳动人民的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从而将墨西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进入20世纪的巴西和瓦加斯的改革运动 进入20世纪以来，巴西是拉丁美洲各国中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但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和落后的农业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巴西经济的主要特点。

战后初期，巴西的重要企业都控制在英国股份公司手中，英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巴西的航运业、银行业和纺织工业，以及铁路和很大一部分咖啡种植园。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霸权地位后，加紧了在巴西的扩张，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根据1929年的统计，美国在巴西的投资总额为4.8亿美元，比1913年增加了7.5倍。不过同一时期英国在巴西的投资总数仍高达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巴西的投资总数的一半以上。美国资本在巴西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而其投资额仍远远落后于英国。

同时，一战后巴西经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依然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封建残余的落后农业国。据1920年的普查材料，当时巴西人口共3060万人，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4/5。其中，咖啡在战后初期出口总值中占70%。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大庄园占地产份数的4.6%，却占有注册土地总面积的63.4%；而100公顷以

下的小地产占地总份数的 71.5%，只占有注册土地总面积的 9%。千百万缺少土地的农民被迫为庄园主做工，成为依附性的债务农。庄园主和种植园主豢养警察，私设公堂，任意迫害农民和雇工。

在政治上，一小撮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对外贸易的寡头势力统治着巴西社会。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往往流于形式。把持政权的是来自生产咖啡的圣保罗州和畜牧业发达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土地商业寡头。从 1889 年共和国成立到 1930 年，总共有过八位文官总统，其中四位是圣保罗人，三位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巴西人因而称之为“咖啡和牛奶的政治”。

土地—商业寡头的统治成了巴西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日益成长壮大的巴西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打破旧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桎梏，改变旧的经济关系，在社会变革中寻求出路。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巴西经济。作为巴西出口经济支柱的咖啡国际价格猛跌，社会上失业人口大增，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1930 年总统大选时，形成两个对立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联盟：一个是以圣保罗州寡头势力为首的“巴西民主联盟”，推举圣保罗州的咖啡巨头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为候选人；另一个是南里约格朗德州、巴拉伊巴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地主资产阶级组成的“自由主义者同盟”，推出热图利奥·瓦加斯为候选人。自由主义者同盟提出了一份以改革社会政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竞选纲领，赢得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如同以往一样，“选举”结果，受寡头势力支持的“官方”候选人儒利奥·普列斯特斯获胜。这时，社会中一批早就不满于寡头统治的青年军官于 10 月 23 日发动军事政变，把权力交给了瓦加斯。11 月 3 日，瓦加斯组织新政府，当上了临时政府总统。

瓦加斯于 1883 年 4 月 19 日出生在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一个大牧场主家庭，早年受过军事和法学方面的教育，在路易斯政府中曾担任过财政部长，1928 年被选为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瓦加斯精明机智，善于审时度势，富有组织才能。1930 年上台后，先后统治巴西达 18 年之久（1930~1945 年，1951~1954 年）。

瓦加斯上台伊始，先是注意协调各派政治力量，逐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1930 年 10 月政变是各种反圣保罗寡头势力的政治力量的结合，包括新老政客、青年军官和一部分人民群众。因此瓦加斯新政府在人事安排上注意照顾各方的利益，以维持政治平衡。

他将主要目标放在削弱地方寡头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上。长期以来，巴西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由各州组成的松散的共同体。他上台后不久即以“临时政府根本法”取代 1891 年宪法，解散联邦议会及各州、市立法机关，集中央行政和立法大权于一身，由中央联邦政府任命的督办来取代原先各州的州长，并将地方的一些权力收归中央。通过设置新的行政区域来减少一些强州对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同时，将各州军事武装并入国家正规军。瓦加斯的措施引发了圣保罗州的叛乱。圣保罗州的寡头集团长期以来支配巴西政治，不愿屈从中央政府。他们抵制由中央派来的督办，要求瓦加斯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新宪法，并在 1932 年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瓦加斯政府出动大军进行镇压，叛乱武装在圣保罗城与联邦军队对抗四个月后，不得不投降。同时，瓦加斯还使用警察摧毁军队中主张更激进社会变革的组织。

1934年7月，巴西颁布了新宪法，议会正式选举瓦加斯为总统，开始了“宪政时期”。1934年宪法肯定了巴西为联邦共和国，总统四年一选不得连任。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但由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该宪法扩大了群众参与，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额。此外，联邦政府依据宪法精神还制定了限制外国势力，发展民族经济的法令和具体措施。

1934年，巴西进入其政治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巴西国内出现营垒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早在1932年时，受欧洲法西斯思潮的影响，巴西的右翼分子就成立了一个类似欧洲法西斯政党的组织——整体党，领导人是普利尼奥·萨尔加多。到1935年，该组织的成员已迅速扩展到整个巴西。在政治舞台另一端的是人民阵线运动，即全国解放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35年，是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联盟。左右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瓦加斯政府先是采取联合右翼镇压左翼的策略。1935年7月政府开始打击全国解放联盟。政府颁布“戒严法”，政府授权军队摧毁了该组织的办事处，没收宣传品，查缴档案，并将其领导人投入监狱。共产党人面对镇压，曾在纳塔尔、累西菲和里约等地进行过反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在政府镇压了左翼运动后，右翼欢欣鼓舞，静心等待时机夺权，根据宪法规定，瓦加斯总统任期到1938年结束，届时应举行大选。右翼势力信心十足地准备在大选中一举击败瓦加斯。瓦加斯以防止“毁灭性内战”和“从共产主义威胁下拯救巴西”为由，于1937年11月赶在大选前宣布解散议会，废除1934年宪法，同时颁布了带有浓厚专制主义色彩的新宪法，宣布要建立“新国家”。

1937年宪法打破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的所谓“组合制”，即立法权由议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总统共同行使，议会作用被大大削弱，总统有权解散国会，颁布法律和提名下届总统。由企业主和劳工同等数量代表组成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不仅负责调解劳资关系，而且有权颁布经济法令。此外，新宪法还规定：实行新闻检查，取缔一切政党活动和宣布罢工和歇业是反社会行为等。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瓦加斯政府所颁布的这部具有浓厚专制主义色彩的新宪法打破了巴西法西斯右翼势力想通过议会选举合法手段上台的目的。新宪法颁布后不久，政府便取缔了巴西的法西斯政治组织。瓦加斯政府曾试图在内阁中给法西斯头目萨尔加多一个职务加以安抚，但被萨尔加多拒绝，右翼集团要的是全国政权。一些法西斯分子也曾进行反抗，政府则毫不手软地实行镇压，法西斯组织很快随萨尔加多流亡他处而土崩瓦解。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瓦加斯政府先后瓦解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他从而可以在一个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政治舞台上活动。瓦加斯实际上取消了1938年的大选，他将自己的任期延长到1943年下一次大选。当1943年来临时，瓦加斯宣布紧急状态，从而取消了大选，他的总统任期一直延续到1945年10月被一次军人政变赶下台。

在瓦加斯执政期间，巴西实行一系列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主要有：保护关税，以“进口替代”方针来扶植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将一些外资企业国有化；由国家大力兴办主导工业和基础工业。由于实施这些措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西已建立起基本能满足本国需要的纺织、食品等消费轻工业；有了包括铁路、公路、航运、电站和各种通信设施在内的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建立起钢铁、水泥等基础工业并开始兴建金属、化学等新

兴工业。

总之，在瓦加斯统治巴西的 15 年里，巴西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它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土地—商业寡头独占巴西政权的局面，提升了工业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通过 1937 年宪法，瓦加斯确立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威，建立全国性的政党来瓦解以州为基础的地方政治权力，将巴西由一个松散的各州联合体变成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政府在组织和领导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巴西工业现代化进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为战后巴西经济的高速发展、将一个农业国转变为新兴工业国奠定了基础。

智利人民阵线的成立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是南美洲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被称为南美洲“A、B、C 三大强国”。智利的国土形状成长条带状，北部干旱荒芜，但有着举世闻名的天然硝石和铜矿资源。中部为一大谷地，美丽而肥沃，出产小麦、玉米、大米、大麦等农作物，素有“智利粮仓”的美称。南部是多雨地带，遍布原始森林。在殖民地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部谷地的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的消费，而且出口到国外。大部分的耕地被少数家族占有，采用南美洲大陆常见的大庄园经营管理方式，农民们或作为依附农或作为雇工为庄园主劳动。长期以来，中部地区是智利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土地寡头控制了智利的政治权力。

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采矿业逐渐取代农业和商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870 年时，智利已控制世界铜市场的四分之一。同时，可用做肥料和炸药的硝石成为主要出口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硝石出口获得了增长，20 年代初期有所下降，尔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30 年代起，由于人工硝石的应用得到推广，硝石的出口才急遽下降。与硝石的情况相反，铜的产量在一战后却在上升，铜在智利的出口、税收中占很大的比重，铜成了智利经济的支柱产业。

19 世纪以来智利矿业的发展使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社会权贵人物内部出现了新的成分，这些人是北部的矿主和在不断发展起来的城镇做生意的商人。但土地寡头控制智利政治的局面并没根本的改变。地主与矿主、商人往往通过家族关系连在一起，这种关系常把城乡之间的冲突降低到最低水平。

采矿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城市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同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的中间阶层和工人人数不仅在人口中的比重高，而且他们绝大部分是智利本国工人。因而，智利的中间阶层和工人从一开始就能直接进入政治舞台，导致智利政治中较早形成左中右三大势力。

在政治制度方面，智利是拉丁美洲议会民主制度确立较早的国家。早在 1871 年，智利就修改了宪法，禁止总统连任。1874 年再次修改宪法，使政府部长对国会负有更大的责任，从而强化了立法权，缩小教会和总统权力。在 80 年代，国会规定 25 岁以上有文化的男人均有选举权。智利允许多种政党存在，至 1900 年，政党已有五个，他们可以进行公开的竞争。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一方面为智利创造了政权和平转移的条件；同时，也使智利的政府经常更迭，在 1895~1925 年期间，内阁的更迭每四年进行一次。

一战后，智利的硝石出口大幅度下降，而铜矿的开采又大部分操在外资之手，智利的经济面临困难。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智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改善生活和争取民主权利，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运动。1919年，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在1月至2月，工会领导人为抗议战时的高通货膨胀召集了大规模的集会。8月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十万名参加者在总统府门前走过。在1920年大选中自由主义者领袖，代表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当选为智利总统。为了应付当时智利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亚历山德里政府一方面发挥政府调节职能，提出了一些笼络人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口号，如实行政教分离，男女平等以及制订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等。政府还曾根据法律对一些罢工进行有利于工人的调停，并让工会合法化，想把工人限制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亚历山德里政府对那些不服从政府调解的工人罢工实行镇压。亚历山德里的做法同时遭到右翼和左翼势力的攻击。右翼保守势力要维持现状，不愿让工会合法化，并担心自由派势力获得城市工人支持后会危及原有的寡头统治。劳动群众则对政府的一些镇压措施不满。亚历山德里政府因而处于风雨飘摇中，1925年亚历山德里不得不辞职。1927年5月，铁腕人物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当选为总统。

伊瓦涅斯政府上台后通过监禁政治上反对派，尤其是劳工领袖，和中止公民的一些民主权利来强化其独裁统治；同时，扩大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加快铁路、公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使智利的政局动荡不安。矿产品出口急剧下跌，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浪潮。导致伊瓦涅斯政府于1931年7月辞职下台。1932年，马马杜克·格罗韦组成“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但它只存在13天。不久，在1932年10月的又一次选举中，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再次当上了总统。

令广大民众失望的是，第二次当政的亚历山德里对社会秩序的兴趣超过了对变革的兴趣。他继承伊瓦涅斯政府的做法，对反对派（尤其是左派）进行镇压。当1936年爆发一系列罢工时，亚历山德里采取了强硬措施，他宣布戒严，关闭议会，并流放劳工领袖，派军队接管劳工运动中心的铁路部门。在国际上，亚历山德里公开表示同情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欢迎德、意、日等法西斯势力渗入智利，并大大扩大了与德、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法西斯势力在智利日益猖獗起来。

面对法西斯威胁，1936年，智利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劳工联盟等组成人民阵线，并推举激进党人塞尔达为人民阵线的候选人。智利劳工联盟成立于1936年，下属一千两百多个工会组织，会员总数达四十万左右。这个统一的工会组织，成了人民阵线强大的支柱。人民阵线以“面包、房屋、衣服”为竞选口号，并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要求写进了竞选纲领中。1938年，塞尔达当选为智利总统，组成了西半球第一个人民阵线政府。

塞尔达是一位富有的激进党人，主张改良主义，他在人民阵线和中下层人民的支持下，仅以4000张选票的微弱多数战胜对手政治联盟候选人古斯塔奥·罗斯。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曾宣布要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以及对农民进行财政上和农业技术上的援助等。在实际行动方面，这个政府在经济上，曾开办了一个“开发公司”，来发展国营的电力、石油、钢铁、甜菜糖等方面的企业。在对外关系上曾于1944年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5年4月，对轴心国宣战。这期间，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某些改善，某些公民权利得到恢复。但在社会政策上，作为人民阵线内主导力量的激进党人的思想是不激进的，他们不愿用革命的办法在智利实现彻底

的社会变革。

1941年，塞尔达因健康原因被迫辞职，人民阵线开始解体。战后不久，在美国的威胁利诱下，1946年上台的激进党人魏地拉总统逐步向右翼势力靠拢。1948年，国会通过法令，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标志中间派与右派势力相勾结向左派力量开刀，中间派与左派联姻时期宣告结束。

尽管如此，人民阵线在其存在的短短几年里还是有效地防止了法西斯在智利上台，它促进了左派力量在智利的发展，宣告寡头政治在智利的终结。已组织起来的智利无产者团体一旦参与政治，就再也不能将其排除出去，它成为影响战后智利政治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并在70年代阿连德政府时期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总之，本时期拉美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国家的稳定程度不断提高，许多拉美国家政府权力得到巩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的发展。其他拉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比起墨西哥、巴西和智利虽稍为逊色，但在两次大战之间也取得一些长足的进步。委内瑞拉在本世纪前几十年里由政治强人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统治（1908～1935年），他推行的虽是一种独裁统治，但也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政治稳定，为日后的国家建设铺平了道路。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南德斯·马丁内斯（1931～1944年）和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的独裁统治（1931～1944年）也同样起到巩固中央政府权力的作用。这些政治强人都反对考迪罗主义，主张建立文官政府统治。

第四节 拉美对外关系的发展

自哥伦布到达美洲后的几百年来，拉美地区一直受到外部势力的控制。最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这块大陆，西葡的殖民统治随着 19 世纪 20 年代拉美独立战争后拉美国家的独立而告终。拉美独立后英美很快地填补了空白。同西、葡不同的是，在一般情况下，英美并不采取将拉美变为自己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而更多的是施加政治影响和寻求经济利益，实行一种“非常规的帝国主义”，也称为“新殖民主义”。在其后的一百余年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拉美的霸权，另一方面则是拉美人民为摆脱政治经济上对欧美的依附状态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拉丁美洲，特别是南美洲经济上的主要控制者，他通过贷款、直接投资、操纵对外贸易和获取特权等方式控制了拉美经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已拥有 118 条铁路，45 家港口服务公司，112 家公用事业公司，25 家硝石公司和 23 家石油公司，并控制几乎全部的电话、电力和水力等事业。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差不多已完全成为英国垄断资本的附庸。其中以阿根廷的情况最为突出，一战前阿根廷的输出与输入，几乎全部为英国掌握，阿根廷因而被称为“大不列颠帝国的第五自治领”。一战前，英资在拉美经济中的独大地位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1914 年拉美的长期外国资本（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	外国私人投资（和外国公共债务）	百分比
英国	5066	51.9
法国	1013	10.4
德国	367	3.8
美国	1487	15.2
其他	1821	18.6
总计	9754	100.0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美的外部融资》（纽约，联合国，1965 年）第 16~17 页。

英国在拉美的经济渗透和扩张遇到了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早在 1823 年，美国单独发表了“门罗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门罗宣言表面上是为了反对神圣同盟武装干涉拉美的计划，但实际上其矛头所向是对准英国，是为了排挤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而方便自己对拉美的掠夺。美国的野心在美墨战争（1846~1848 年）中充分暴露出来，美国使用暴力和阴谋，将墨西哥的“半壁江山”攫为己有。此举在墨西哥以及与美国临近的中美洲和南美北部国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 19 世纪行将结束时，美国又通过美西战争（1898 年），一举夺取了波多黎各，并将古巴置于其“保护”之下。进入 20 世纪以后，美国更是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加勒比地区为所欲为，类似颠覆、干涉，乃至军事占领的事件时有发生。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为获得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所采取的手段。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早就想在巴拿马地峡地区挖通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巴拿马地峡位于中美洲的南端，直到 1903 年，这里属于南美洲哥伦比亚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为了单独开凿与独占巴拿马运河，于 1903 年 1

月 22 日强迫哥伦比亚政府与之签订了“海—艾尔朗条约”，美国方面只需一次付出 1000 万美元现金，嗣后每年再付 25 万美元，就可以开凿运河并对运河区进行控制和设防。哥伦比亚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在人民的压力下，哥伦比亚参议院不得不在 1903 年 8 月 2 日一致拒绝批准这个条约。美国很快作出反应，美国一面派出军舰开抵巴拿马城，同时策划巴拿马地区一些上层人物制造所谓的与哥伦比亚分离的“独立革命”。1903 年 11 月 4 日，巴拿马宣布独立，11 月 13 日即得到美国的承认。紧接着，11 月 18 日，巴拿马的阿马多尔政府按照美国的意图，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奴役性的《美巴条约》。从此，美国不但有“永久占领”、“永久使用”运河区及单独开凿、管理运河和有关河流、湖泊等特权，而且还获得了一系列干涉巴拿马内政的权利。

1904 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他宣称，在西半球，“美国为了恪守门罗主义，即使不愿意，也将被迫……实施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将拉美地区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19 世纪门罗主义中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到 20 世纪美国要将其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一战前在拉美地区争斗的外部势力不仅有英国和美国，德国也在加强其在拉美的影响。德国并不隐瞒自己在拉美的野心，1900 年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通知帝国国会预算委员会，德国终将在巴西海岸建立海军基地。无独有偶，同年，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在一份奏章中提出，如果过去德国在拉丁美洲获得一块殖民地的话，那末其价值会比夺得整个非洲更大。德皇在这份奏章所加的批语是：“正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该地区取得最高权力的原因所在。”德国除了通过经济渗透外，还大力支持往拉美移民。1900 年时，在巴西南部的德国移民已达 35 万人，居住在智利的德国人约有 12 万，在阿根廷和中美洲也有德国移民的居民点。德国政府积极鼓励这些移民保持和发扬德国民族传统，并资助德语学校和德国教会。德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渗透也十分引人注目。1896 年德国教官开始为智利训练陆军，1900 年德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帮助智利建立了军事学院。到 1914 年，德国已向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派遣了军事代表团。本世纪初，德国在拉美施加自己的影响，不仅是其同英国争霸全球的战略的一部分，其矛头也对准了美国。德皇始终拒绝承认门罗主义并主张欧洲国家有权干涉西半球事务。

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的睦邻政策和泛美主义的发展 美国是拉美最重要的邻国，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自拉美独立以来，美国对拉美的政策的主要宗旨是一致的，这就是：尽量排除其他外部势力在拉美的影响，保证自己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和对加勒比地区的统治；同时，阻止拉美人民进行任何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革命与变革。只不过它所采取的手段和政策由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战后，由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在战争中两败俱伤，美国势力乘机大举入侵拉美，开始逐渐取代英国，在拉美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地位。首先，一战后，美国在拉美的投资逐渐赶上并超过英国。1929 年时，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已基本同英国拉平。二战结束时，则已大大超过英国，1950 年时，英在拉美的投资是 23 亿美元，而美国的投资则高达 63 亿美元。在拉美的外贸方面，美国也日益占据优势。在一战期间，美国对拉美的贸易额增长了 400%，垄断拉美贸易的一半以上。这种势头继续发展，到 1941 年美国在拉美的进出口

比重上分别占到 62.4%和 54%。一战后，美国私人公司在拉美占有大片的土地，在其上建立甘蔗园、香蕉园、咖啡园。其中最大的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近半个世纪中，该公司在中美七个国家里掠取了 280 万公顷的土地，占这些国家土地面积的 28%。

随着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势力的增长，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开始认识到，为了确保美国在拉美的长远利益，光靠武装干涉和政治控制是不够的。大棒政策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可能损害自己在拉美的形象，导致拉美人民的反美情绪的高涨，最终不利美国在拉美的利益。因此，美国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形象。在一战前，塔夫脱总统鼓吹的“金元外交”政策显示了这种转变的最初征兆，他宣称“当前的外交政策必须符合商业关系的近代概念。这种政策的特点是以金元代替枪弹”。实际上是主张金元与枪弹并用以建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一战后，柯立芝总统在其执政期间表示美国要对拉美政策作些改变，放弃赤裸裸的暴力行为，采取友好的态度。其后，胡佛总统也作过相同的鼓吹。但最后制定新政策并加以实施的是 30 年代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就是“睦邻政策”。

1933 年，罗斯福上台后，在其 3 月 4 日的就职演说中声称：“在世界政治领域里，我将使本国遵循睦邻政策。”随后，美国对拉美政策作了某些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主张任何美洲国家不应干涉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政；在经济上，则要奉行美洲国家之间互惠贸易协定。1933 年 12 月，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七次泛美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代表罗斯福政府首次签字同意美洲各国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表示要放弃对美洲各国的“干涉权”。为此，美国于 1934 年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也就是放弃干涉古巴内政的特权。在墨西哥放弃驻军的权利。在海地和尼加拉瓜撤出了美国占领军。在巴拿马放弃其干涉内政的权利。在经济上，美国与拉美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增加对拉美各国的“经济援助”。1934 年 8 月美国同古巴签定美国同拉美国家间的第一个贸易互惠协定。到 1939 年底，美国已同 11 个拉美国家签订了贸易互惠协定。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福政府的“睦邻政策”并没有真正停止对拉美国家内政的干涉。实际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政府也还时常采用包括武装干涉在内的各种手段干预拉美国家事务。著名的例子有：1933 年古巴独裁者马查多被推翻与圣马丁政府上台以后，罗斯福就曾派遣 30 艘兵舰，进行干涉；1934 年美国训练的尼加拉瓜国防军，谋杀了尼加拉瓜的民族英雄桑地诺将军；以及支持与扶植拉美地区反动独裁政府。

罗斯福政府的“睦邻政策”为美国资本进入拉美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垄断财团在拉美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据有关数字，1930~1938 年九年中，美国垄断组织在拉美以利润、利息和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达到 13.1 亿美元。到二战前夕，美国在拉美进出口份额上已大大超过英国；美国在拉美的投资额已接近英国；美国垄断组织控制了拉丁美洲很大份额的铁矿、铜矿、白银、锌及石油的开采。

罗斯福政府的“睦邻政策”还有利美国对拉美政治的控制。拉美各国，尤其是一些南美国家，对与自己同处美洲大陆，并与自己一样通过独立战争获得独立的美国原本抱有一种亲近感，门罗宣言也曾在拉美国家中引起积极的反响。但美国的形象逐渐被自己在拉丁美洲的侵略扩张行为破坏了。1880~1914 年，美国鼓吹整个西半球具有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利益，试图在整个西

半球范围内组建一个国家联盟。在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的倡议下，第一届泛美会议于 1889 年在华盛顿举行，1901 年在墨西哥召开第二次泛美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四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上，建立了泛美联盟，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由美国国务卿担任常任主席。但由于美国在这一时期在拉美采取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拉美各国对美国的动机抱有怀疑与担心，所以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对美国的建立国家联盟的想法不太热心。又由于历史文化上拉丁美洲与欧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拉美国家甚至出现了想通过国联实行联欧抗美的趋势。自 1933 年罗斯福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七次泛美会议上宣布其“睦邻政策”后，泛美主义在美洲大陆重新抬头。美国在二战前夕和二战时期多次召集泛美会议，按美国的旨意统一美洲各国对二战的态度。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镇压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以反对来自西半球以外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于 1948 年 3 月至 5 月在波哥达召开了第九次泛美会议。这次会议把组织较为散漫的“泛美体系”，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把原有的“泛美联盟”改为这一新组织的秘书处。泛美会议和美洲国家组织成了美国利用来控制拉美各国的政治工具。

总之，“睦邻政策”同以往美国对拉美政策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一政策也曾对拉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从实质上讲，美国实行“睦邻政策”的根本目的仍在建立和维护自己在拉美的独霸地位。正如美国共产党人福斯特所指出的：“事实上，睦邻政策只是把旧的帝国主义改头换面一下，以便更有效地击败增强了的帝国主义竞争。这是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更有效的方法。它构成了一种制度，拉丁美洲各国在表面上获得了民主独立，但在实质上，总的控制权还是控制在美国手里。”二战后，随着美国在整个拉美霸权的建立，拉美地区实际已成美国的后院，美国与拉美国家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激烈，并构成了战后拉美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第十二章 1929 ~ 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节 1929 ~ 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经济制度从西欧发源以后，不可阻挡地向全世界各个角落扩展并深化。新的现代文明有其生命力也有其内在矛盾，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从 19 世纪中叶起就影响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性循环，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对生产造成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反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各国国内矛盾及各国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但是当时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一点。战后，经过一段艰难困苦的调整恢复，医治战争创伤，各国的政治经济又回到正常的轨道。

20 年代是资本主义繁荣、稳定与和解时期，也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时期。1926 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达到战前水平。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繁荣，这给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劫难中挣扎出来的欧洲人民带来巨大希望，以为可以像 19 世纪那样再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以美国的财政金融制度为主要支柱的美国和欧洲的繁荣与稳定，随着 1929 年 10 月 24 日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消失。

大崩溃似乎来得太突然了。1929 年夏，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工业生产指数 1923 ~ 1925 年平均为 100，1928 年 7 月上升到 110，1929 年 6 月升到 126。同时美国的股市行情也在看好。1929 年夏季的三个月中，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由 268 上升到 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 165 上升到 258。美国财政部长 1929 年 9 月还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时隔一个月，大崩溃开始了！10 月 24 日这一天，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出现抛售股票的浪潮。平常每天股票交割量约二三百万股，24 日这一天抛出了 1280 万股，以后的情况更加严重，一个月内股票价格下跌 40%，再以后是持续三年的下降。1929 ~ 1932 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 55 家中股票的平均价格由 252 美元下降到 61 美元。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在这期间由 262 降至 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由 173 降至 8。危机期间，仅美国就有 5000 家银行倒闭。危机影响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1932 年，美国的钢铁工业仅以 12% 的生产能力运转；到 1933 年，工业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暴跌近一半，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现代经济是世界性的，这种世界性的危机给资本主义各国带来强烈影响。大危机迅速猛烈地从财政扩展到工农业，从美国扩展到世界。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缩减了 36%，世界贸易额缩减近三分之二，失业工人达三千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上万家银行倒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遭到沉重打击。

危机迅速波及严重依赖美国投资的德国和奥地利，由于美国金融公司收回了它们在海外的短期贷款，1931 年 5 月，掌握奥地利三分之二以上债务和资产的维也纳银行宣布无偿付能力破产，这在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恐慌。随

后 7 月 13 日，德国四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纳特国家银行宣告破产，柏林证券交易所关闭。德国的财政情况迅速恶化，1931 年 5 月到 7 月，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 42%。危机迅速波及严重依赖外贸的英国，波及依靠农产品的出口与外贸的南美和大洋洲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大国中，法国是最晚卷入危机的国家。这是一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以财政信贷为起点，扩展为工农业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开始，波及世界各地。

与以往出现的历次危机相比，这次危机生产下降幅度之大，危机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失业率之高，都是空前的。以往历次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额最大的下降数是 7%，而这次危机中这两项的下降数分别为 36% 和 2/3。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是，与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工业危机相伴随的是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大量“过剩”，农产品的价格暴跌，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大量农产品被销毁。成吨的牛奶被倒进密西西比河，使之成为“银河”，大量的小麦、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而广大失业的农业工人和城市失业者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此外，危机过后没有出现以往常见的经济复苏，危机过后直至 1933 年才进入“特种萧条”，1936 年各国的生产刚有所回升，1937 年下半年又爆发了新的危机。

危机爆发的原因 凡是经历过那次大危机的人们在回顾危机时，无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是什么诱发了这样一场遍及全球的惨重的经济危机？除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基本的矛盾以外，危机的到来与一次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也不无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旧的经济秩序，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美国迅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各国的债权国之时发展起来的。战后欧洲许多国家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务，大量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占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雄踞世界金融霸主宝座的美国在海外大量投资贷款，世界经济严重依赖美国这根支柱，支柱一倒，整个经济受到冲击。大量的海外贷款，不仅使债务国的经济受制于美国，而且作为债权国的美国也受到影响。为了支付到期的借款，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这就使美国的一些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受到影响，海外市场的缩小直接导致农产品的“过剩”。

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垄断程度的提高，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状态加深。这种矛盾在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表现最为突出。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20 年代虽然美国生产迅猛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但隐藏着种种险象。1920~1929 年，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 2%，而工厂中生产率却增长 55%；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和生活费用的不断增长，农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到非农业工人的 40%，即使在繁荣时期，农村中的贫困也普遍存在。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1929 年，贫困户占美国家庭的 60%，这与拥有大量资本的垄断资本家形成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有限的大众购买力，另一方面是高比率的投资能力，这种状况直接促成生产过剩危机的来临。

由于经济繁荣，20 年代在美国股票买卖非常兴盛。不光投机商人大搞股票买卖，普通人也想买股票发财，政府推行的方便贷款政策更助长了股票贸易。1924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登记额为 270 亿美元，1929 年 8 月长到近 900 亿美元。股票发行面额大大超过社会上的资金，而股票稍稍跌价人们就赶紧抛出手头的股票，于是财政信贷成为美国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此外，当

时许多美国银行是单独经营，缺少战胜金融风暴的足够财力。一旦风暴袭来一家银行倒闭，储户纷纷到其他银行取款，从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1929年初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一些大的银行家和企业家打算大量收购股票来控制股票价格下跌的趋势。但是到1929年10月24日，抛售股票的浪潮已经不可阻挡，危机终于从美国经济的最薄弱环节爆发。

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 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大灾难、一次大震荡，遭受经济危机席卷的国家均发生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危机与动荡。危机期间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估计为一千四百多万，约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英国的失业人数近三百万，占劳动力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德国的劳动者约五分之二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临时性或半日的工作，失业人数600万。也就是说约有半数人口处于绝望和贫乏之中。法国由于是农业国，失业人数为85万，但农村中有许多半就业和隐蔽的失业者。各国遍布排队领取救济面包的人群，及大量来回游荡寻找工作的人们，人民的生活已达到了极度贫乏和悲惨的境地。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人口的存在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危机期间在美国在欧洲各国到处可见饥民和失业者的示威游行。社会不安达到如此程度，即使在政治上一向稳定的美国也出现了政治上的骚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遭到冲击。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处于焦虑之中，感到临近悬崖的绝望。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各种措施，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生活，加强对政治局面的控制。

1931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对890种商品提高税额，美国损人利己首先筑起关税壁垒，立刻造成连锁反应。33个国家很快起来抗议，7个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法国对英国进口小汽车增税60%，那些发生农业危机的国家也高筑关税壁垒，以维持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到1931年底，25个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1932年增至76个国家。1932年英国在渥太华举行英联邦会议，决定在英帝国内部建立关税优惠制。法国则采取限额输入的办法，保护本国的商品市场。从而形成了激烈的关税战、市场战。

1931年9月最先使用金本位的英国首先放弃了被认为是对国际贸易有利的相对稳定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使英镑贬值三分之一，随后二十多个国家先后放弃金本位。英国为了不使英镑的世界金币地位完全丧失，1931年11月起，同英联邦国家陆续联合起来，组成英镑集团。同英国财政经济有密切联系的瑞典、丹麦、葡萄牙、埃及、伊拉克、暹罗、阿根廷、巴西也参加英镑集团。英镑集团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用英镑结算，固定本国货币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并把大部分外汇储存在伦敦。而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波兰六国组成维持金本位的贸易集团，保持货币不贬值。美国一度与法国达成协议，坚持金本位，但1933年3月美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宣布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出口，1934年美元贬值40%。美国与其属地、菲律宾、加拿大及大多数拉美国家组成美元集团，其内容与英镑集团相似。到1935年世界很大部分地区分裂成五个货币集团，英镑区、美元区、金本位区、日元区及德国统治下的外汇控制区，货币战愈演愈烈。

在资源问题上，经济实力较强的英美等国千方百计控制资源，建立经济区，对重要的原料如橡胶、锡等缔结限额生产的国际协定；而资源相对不足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则企图用刀与剑来夺取资源，争夺生存空间，世界上空战争乌云密布。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克服有待于统一的世界性市场的恢复和国际间货币关系的稳定。在危机期间激烈的市场战、货币战和资源战中，资本主义各国也曾企图通过协商建立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图走出危机。1933年6月12日至7月21日，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国际经济会议，力图达成关于降低关税，稳定货币的协定。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想牺牲别人，保存自己，彼此矛盾重重。各国你争我夺，乱作一团，没有一个大国挺身而出，促使各国通力合作，美国也不例外。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恶化，恶化的国际关系不仅延长了经济危机，而且延长了危机后的萧条，危机过后出现了30年代的“特种萧条”。

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体制是一次大的冲击。在危机冲击的旋涡中，资本主义各国都采取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措施，以求摆脱危机带来的种种困境。由于各国经济条件和政治传统均不一样，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也不尽相同。但国家政策调整的总趋势大致相似，即利用国家权威，提高关税，增加出口，尽量保证国内经济的平衡；通过贷款或保护性法规等途径，援助主要经济部门增加生产；同时由政府出面，开发公共工程，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救济失业。这些反危机的措施带有很大的应急性，这些应急措施的实施，势必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以来的一次大的普遍性的调整，通过这次调整，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渡。

第二节 美国罗斯福新政

寻求摆脱危机的途径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战后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固定资本的更新及生产合理化运动，美国出现了 20 年代的繁荣。这次繁荣使许多人陶醉，以为进入了千年盛世。1929 年初，新总统胡佛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对国家的未来毫不忧虑，它光辉灿烂，充满希望”。然而繁荣仅维持了不到十年。1929 年 10 月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1929~1933 年美国始终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心。1932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几乎下降一半，整体经济水平又倒退至 1913 年。1932 年已有 86,000 家工商企业停产，1933 年初全国失业工人 1700 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下降 35%~40%，农业总收入比 1929 年下降 60%，100 多万农户破产。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也濒于瘫痪，至 1933 年，全国 5500 多家银行倒闭，千百万美国普通人的多年积蓄付诸东流；仍在维持的银行库存现金不过 60 亿美元左右，而要兑付的是 410 亿美元的存款。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都正式关门，金融活动陷入严重混乱和窒息状态。

对这场不期而至的危机，美国企业界和政界的领袖人物均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没预料到危机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也不懂得危机的根由何在。总统胡佛仍然深信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健全的，政府不应对企业进行干预。尽管如此，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胡佛政府还是采取了反危机的措施。193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规定近千种商品价格，用以保护国内工业品的市场。

然而这一尝试性的努力微不足道，它不足以制止大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经济情况仍在恶化，失业美国人的生活异常困苦。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存款，失掉了保险金，最后因无力偿还抵押债务而失去自己的住宅和土地，流落街头。不到两年时间，用空包装盒和破木板、破铁皮等搭起的棚户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各个城市，无家可归的人蜷伏其中，沦为乞丐。这些棚户区被称作“胡佛村”。

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社会形势胡佛坚持认为危机根源不在美国国内，而在欧洲，美国所能采取的最适当的办法，只是使美国经济免受牵连。从 1931 年秋天起，胡佛所作的努力就是保持美国的金本位。根据胡佛的建议，美国会 1931 年 8 月通过议案，拨款 1.25 亿美元，扩大联邦土地银行的信贷能力。次年 7 月，又建立了国内信贷银行系统，供房屋抵押契据贴现之用。这些措施旨在使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建筑信贷公司得到抵押借款人应偿还的现金，以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避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住宅。1932 年 2 月，国会又根据总统要求通过法案，拨出价值十亿美元的黄金，以应付欧洲人用美钞兑换黄金之用，以使美国维持金本位。然而黄金继续外流，金本位制不再能自动调节国内与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循环，而是使经济螺旋式下降，萧条越发加深。1932 年 1 月，胡佛政府又成立复兴金融合作署，资金五亿美元，由联邦政府向企业、银行、保险公司贷款，防止它们倒闭。但是复兴金融合作署仍不能满足银行对新资金的基本要求，且贷出的款项大部分落入各银行和信托公司手中。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胡佛政府仍恪守自由放任的政策，反对联邦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更反对由联邦政府实施救济政策，胡佛认为救济是地方慈善

机关和地方政府的事，为此，他在 1930 年 10 月，先后驳回由联邦紧急救济委员会和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提出的联邦公共工程方案。直至 1932 年 7 月 21 日胡佛才不得不签署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款 15 亿美元用于地方的公共工程，以扩大就业提高消费。在农业方面胡佛政府曾经责令稳定价格收购农产品，但难以刹住物价的跌势。他拒绝联邦农业局提出的由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调整农业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制订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计划，对农业进行控制的主张。农业危机旷日持久，并大有逐渐深化之势。

直至胡佛任职的第四个年头，危机仍在继续蔓延，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出现失业工人示威，农民骚动，退伍军人要求发给补助金的游行。胡佛任职期间虽然一直在寻找摆脱危机的途径，也曾经作了些努力；但是他始终坚持他在 1928 年竞选演说中一再着重强调的信念，即自由放任主义是美国制度的核心，是美国繁荣的根源，因而反对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他所作的努力虽然在美国历史上也属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于如此深刻的危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局势在恶化，美国人民对胡佛政府失去了信任，甚至有人对现有制度也丧失了信心，人们在期待着，希望 1932 年的选举，能选出一个给他们以信心和希望的人物。在这种形势下，1932 年选举中，民主党人罗斯福以普选票超过 57%，并以 472 张对 59 张选举人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

罗斯福新政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 年）祖籍荷兰。出身显贵家庭，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娴于辞令，很有政治胆略，个人感情奔放，曾任海军助理部长和纽约州长。1932 年罗斯福在芝加哥接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时，就向欢呼的代表说，“我向你们，也为自己在这里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从此，“新政”就成了罗斯福政府反危机的总称。

1933 年 3 月 4 日，千百万美国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新总统的就职演说。51 岁的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不得不恐惧的唯一事物，是恐惧本身。”“只要国家仍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我就要求国会授予我应付危机的那种唯一的最后手段——广泛的行政权，使我可以向紧急状态宣战，就像真正有外敌入侵时一样。”

上台伊始，罗斯福心中并没有一幅新政的完整的蓝图，许多新政措施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应急采用的，但是罗斯福及团结在他周围的热心于新政事业的专家智囊团的顾问们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即经济发展形势、生产及市场结构的变化已使古典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过时，现代经济的管理的出路应该由政府来进行有组织的规划。因此，必须放弃胡佛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至于如何干预，在怎样的程度和范围内干预，还有待于在新政的实践中摸索。从后来实践的新政主要内容来看，可以用“三 R”来概括，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和改革（Reform）。

最初一批重要的新政立法是在 1933 年 3 月 9 日至 6 月 16 日通过的，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有“百日新政”之称。

新政是从整顿改革危机最深的金融业开始的。就职演说之后，罗斯福即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一天。接着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罗斯福的顾问们及胡佛政府财政部将卸任的一些工作人员通力拟订出的紧急银行法案。3 月 8 日参众两院以上喊声通过这项法案，送还总统签署。法案通过之迅速，意见

之一致前所未有的，民心为之一振。该法案授权总统对个别银行进行审理，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才允许开业。3月12日罗斯福第一次发表炉边讲话，向人民保证银行储蓄是安全的。6月通过格拉斯—斯特高尔法，该法规定，联邦储蓄银行管理银行投资，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限制银行的投机活动。同时成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5000元以下的小额存款实行保险，以保护储户。1934年又通过证券交易法，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证券交易，制止证券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要求银行在发行新证券时，必须将有关资料公布于众。这些法案初步稳定了国内金融秩序。

在国际上，为了加强美国经济地位，1933年3月，即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宣布放弃金本位。1934年1月通过黄金储备法，由财政部掌握全国黄金，禁止黄金流通，使黄金用于国际贸易及充当发行钞票和存款的储备金。规定黄金与美元的比价是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美元贬值约40%，以增强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调整农业。1933年6月通过了农业调整法。该法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减耕，缩小现有的耕地面积，以控制生产过剩来增加农民收入，并以增收面粉厂、纺织厂和屠宰厂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加工税，来补贴减耕农民的经济损失；二是所谓保持平价，由政府补贴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以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和购买力恢复到1909~1914年的水平。农业调整成果显著，农产品不可控制的局面得到改善。农产品价格提高，从1932年到1936年农业纯收入增加了50%，农民抵押贷款大幅度下降。但是减耕的实际损失转嫁给了消费者，在减耕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大农场主，许多分成农被迫离开土地。当千百万人食不果腹的时候，却大量毁掉农产品，连下令这样做的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也说，“毁掉正在生长的庄稼，这完全违背人类最健全的本性。”这种人为破坏生产力的做法受到各界的批评，1936年高等法院宣布此法令无效。

处于深刻危机中的美国工业也急需整顿调整。193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罗斯福称之为“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最具有深远意义的立法”。该法的宗旨是，通过订立公平竞争法规，协调各部门的企业活动，促进工业组织起来，在各贸易集团之间进行合作。为达此目的，成立“全国复兴署”，由它协调国家、企业主和劳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拟订公平竞争法规，订出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的规章。凡是接受法规的企业，一律发给上面印有，“我们尽我们的职责”的蓝鹰标志，约两百万雇主接受了公平竞争法规。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暂时取消反托拉斯法对垄断的限制。另根据工业复兴法，内政部还成立了一个公共工程署，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减少失业大军。

为缓和危机中紧张的劳资关系，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对劳工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工人有权组织起来，可选派代表与雇主进行谈判，签订‘集体合同’；雇主不得以工人参加何种组织作为雇佣条件；雇主必须遵守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限额，不得雇用童工。”这一规定大大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使许多雇主怨恨不已。

公平竞争规约保护工厂免受竞争之苦，它们可以停止降低价格和工资；它保护了那些勉强支撑的企业，却不利于那些可以按照低于一般市价的产品价格进行生产营利的企业。在危机严重关头，这种规约不无作用。一旦经济情况好转，雇主们便对规约群起而攻之。到了1935年除同业工会和工会组织

外，多数人反对它。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工业复兴法违宪而完全停止执行。

新政的另一主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由后来成为罗斯福得力的私人顾问的霍普金斯主持救济署的工作。霍普金斯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把救济款拨往各州。次年开始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受到广泛赞誉。

与以工代赈政策有直接联系的是百日期间通过的公共工程和保护自然资源法案。1933年3月即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18岁到25岁的男青年种树，建水坝，扑灭森林火灾，种植防护林。每批25万人，每期半年，由陆军协助组织，进行军事编制。在遍及全国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大战爆发前，约有200万青年参加这一活动。1935年，国会拨款45亿美元，加强公共工程。仅霍普金斯主持的工程振兴局，1936年就吸收了300万人员兴建遍布全国的立体交叉公路、体育馆、美术馆、医院等。新政期间最惊人的开发自然资源的工程是田纳西河的开发。1933年5月国会通过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发展法令，据此法令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署，其开发计划包括控制洪水泛滥、改良土壤、航运、建立水电站等宏伟目标，该工程成为新政功绩中最杰出的一项。工程开始后，田纳西地区农村中的用电家庭由10%增至90%。一种崭新的生活在这原来经济落后地区展开，该地区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

除上述以外，危机期间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迫使美国向福利国家迈出重要步骤，1935年8月14日，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对失业者、老人、残废者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该法规定，对残废无谋生能力者提供救济，年满65岁的退休劳动者，根据其原工资水平，每月获10~85美元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的一半保险费由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资的1%，另一半保险费由联邦政府拨付。这项法令，加上1935年通过对大公司征收超额累进税的法令，使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相应缩小，有利于社会稳定。

由于新政的工业复兴法被信奉自由放任政策、敌视新政立法的最高法院于1935年5月27日宣布为违宪，该法中有关劳工权利的第七条第一款也随之被废止，激起了工会组织的激烈抗议。罗斯福认为得不到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支持，社会稳定无从谈起，新政难以保持，政府统治也难以巩固。于是，在罗斯福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通过了《华格纳法》即《全国劳工关系法》，用以代替被废除的工业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该法规定，不公平地对待劳工的行为为非法，这些行为包括解雇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控制劳工组织，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依据该法而成立的劳工关系委员会，负责处理劳工与雇主的申诉。这一立法是罗斯福劳工政策的体现，是新政后期的一项重要改革立法，对于稳定社会、复兴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6月，国会又通过了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立法。该法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七年后每小时工资不得少于40美分。这种立法无疑有利于劳工民众。

新政贯穿始终的中心内容是致力于复兴经济和实现社会改革。不过以1935年为界，前后期的中心政策有所不同。前期，1933年的严重局势和绝望情绪，要求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措施，以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医治严重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到1935年，经济已部分复苏，国民情绪也发生变化，政治上的分歧日益增加，控制经济的愿望减少；因此，1935年以后，新政侧

重于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这时，推行新政的人抛弃了新政初期奉行的统制市场的理论，更为明确地接受凯恩斯的学说，倾向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制定新的运作规则，促进经济复苏。到 1939 年，欧洲战争乌云密布，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对外政策，新政至此告一段落。

对新政的评价 1933~1939 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各项新政措施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出于使美国走出危机、最大限度地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是从资本主义长远目标出发的长远规划。尽管罗斯福本人及其经济顾问们没有对新政进行总体论证，也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依据，但新政所体现出的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生活的倾向是明显的。运用政权的力量，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局部调整原美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现代经济运转的环节，限制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某些负面效应，使美国经济更顺畅发展，是新政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

新政是为了对付经济危机而应急出台的，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上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1415 亿美元增至 1939 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200 万降至 1939 年的 800 万。新政的实施为千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配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在保证垄断资本安全有效地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保证贫困失业者的最低生活水准，有利于危机年代美国社会的稳定，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

大危机对于在繁荣幸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民来说，是一次猛烈冲击。面对突如其来大规模失业，排队领取救济品，靠政府救济度日的情景，美国人民惶然不知所措。危机冲击着他们对自己的前程和价值观念的信心，也动摇着他们对美国国家制度和美国国家未来的信心，这种普遍存在的民众情绪，是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土壤。在新政前夕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也出现了“银衣社”、“黑衣社”等法西斯组织。新政的实施不仅缓解了危机，稳定了社会，也恢复了美国人民对美国国家制度的信心，有效地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政继承了美国进步主义传统，并代表了改革的趋向，在灾难性的经济危机面前，新政一改以前历届美国政府所信奉的自由放任主义，开国家政权大规模干预国家经济活动之先河。新政实施者的本意是为维护经济危机冲击下的美国传统、美国制度，其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把美国推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给二战以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以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危机年代的英国和法国

英国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随 1929 年秋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而出现的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 1930 年初就波及英国。1932 年夏秋之际，英国的危机
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在英国，20 年代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那样的繁荣局面，
20 年代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因危机的影响变得更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几
乎没有任何找到工作的希望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1929 年 11 月，英国的失
业人数为 132.6 万人，1930 年 12 月，这一数字跃为 250 万。1931 年至 1932
年，失业工人达 300 多万，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危机对英国农业的打
击较为严重，1930~1932 年期间，农产品价格下降 34%，致使农业生产严重
缩减。危机对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英国外贸打击也很沉重，出口贸易锐减，
国际收支在历史上首次出现逆差，到 1931 年，国际收支逆差已达一亿英镑，
英镑的金融稳定地位受到猛烈震荡。

1925 年 5 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失败，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上台。新政府面
临着美国金融公司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和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
济金的问题。麦克唐纳政府中的许多人士对引起危机的真正原因不理解，只
在传统的政策中寻找出路，拒绝采取任何可能造成预算赤字的措施。在危机
面前，政府决定紧缩开支，削减社会保险，增加间接税来解决财政问题。这
些措施遭到人民的反对，1931 年 8 月，工党政府辞职。在英王乔治五世的要
求下，麦克唐纳同保守党结盟，组成有自由党和保守党参加的所谓“国民政
府”。新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力图保住金本位，但在接连不断的挤兑黄金的
浪潮冲击下，不得不于 9 月 20 日宣布放弃英镑金本位，并以此作为克服危机
的主要措施之一。1 英镑从价值 4.86 美元跌到 3.4 美元，随之而来的是纸英
镑的大贬值，以便增加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增加出口。为了保持贬值
后英镑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英国同英帝国各成员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
家组成英镑集团。参加该集团的国家的货币与英镑挂钩，彼此间的贸易也以
英镑为计算单位。1932 年在渥太华举行的帝国会议上，英国与自治领及一些
英镑集团国家建立英镑集团之间国家关税互利协定，以利于英镑集团内的双
边贸易的发展，加强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强国的竞争能力。这样一来，
尽管英镑金本位崩溃了，但是英镑在世界商品流通中仍占有 40%~50% 的份
额。

为了应付严重的农业危机，英国政府大力协调农业，设法增加农民收入，
减少英国对海外食物的依赖。1931 年，通过农产品法，打算重新组织农业生
产和市场。但由于个体的农民难以控制，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英国的粮价必
然受世界市场上极低的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和控制。要刺激国内农业生产，必
然要限制农产品进口。英国为保护国内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市场放弃从 19 世纪
三四十年代开始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932 年 2 月，通
过“进口税法”，规定除少量商品外，对一切进口商品征 10% 的关税。对那
些对英国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实行进口关税法以
后，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状况有所改善。

在工业方面，英国各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纺织、煤、钢、造船等部门
是 19 世纪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工业生产进行调
整使之合理化。英国政府采取两方面的调整政策，一是扩展国家对公用事业
的控制，如对公路、铁路、电力的管理；二是国家在企业的赞同下进行调整，

诸如在煤、钢、棉、造船等部门协商产品价格、产品数量、工资等问题。1934年4月，通过了石油国有化的议案。

到1934年底，英国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有较大改善，但失业问题一直严重存在。1931年8月上台的国民政府上台伊始，把失业工人的补助金削减10%，以便为政府节约开支。同年11月，实行“贫困调查法”，再把每年的失业补助金额削减3000万英镑，工人不断起来斗争。1930年，全国罢工工人人数为30万，1931年增至50万，1934年9月，伦敦15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政策，各地工人还多次举行到首都的“饥饿进军”。英国政府害怕1926年总罢工重演，不得不于1935年对失业补助金作出新规定。英国的失业问题直到实行征兵和重整军备才有较大改变。

失业者的悲惨状况和绝望情绪很容易为法西斯分子利用，连英国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很深的国家也不能完全摆脱法西斯主义的魔影。1932年10月，原工党大臣小组的一个成员，奥斯瓦尔德·摩斯莱爵士，组织了一个包括形形色色法西斯团体在内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各地建立起地方组织。它得到《每日邮报》的支持，并从意大利得到一部分津贴，企图效仿意大利和德国建立“总体国家”和专制政体。但是该组织的影响和作用相对较小，未能对英国政治形成威胁。1934年6月，该组织曾在伦敦举行集会，激烈反犹太人，抵制保守党政策，同警察和左翼群众混战一场。此后，该组织一蹶不振，法西斯势力衰落。

1935年6月，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保守党改组政府，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职务。1937年5月，保守党人尼维尔·张伯伦上台组阁。虽然名义上一直是联合政府，但实际上从鲍尔温到张伯伦直至丘吉尔一直是保守党人出任首相，英国这些年是在保守党人的统治下度过的。

1937年5月，张伯伦上台之时，欧洲国际局势已经恶化，英国重整军备又受到国内经济状况掣肘。张伯伦便企图以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军备力量之不足。他一改前任首相不过问外交事务的做法，一手统揽外交大权。在他的主持下，英国议会政府排斥以丘吉尔为代表的对德强硬派的主张，形成一整套所谓“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绥靖“总计划”。绥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避战求和，保持欧洲现状，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其具体战略设想是，通过谈判或协商，牺牲中欧及东欧一些小国的利益，出让自己的某些利益，以部分满足德、意法西斯的扩张要求的做法，以“祸水东引”的手段，维护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

张伯伦政府以绥靖外交作为避免战争的主要手段，但绥靖外交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执行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在与德意法西斯的较量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一系列让步妥协之后，还是被拖入战争，导致英国在战争初期遭受失败。绥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张伯伦自己，也于1940年5月，在德国从西线发动进攻的时候，在众叛亲离，朝野一片谴责声中“引咎辞职”。同年11月，抑郁病死。

危机年代的法国政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从德国索取了大量赔款。20年代法国经济发展较为稳定平衡，其经济发展不像英国那样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不存在贯穿整个20年代的严重失业问题。因此，1929年至1930年，当欧洲其他国家已经饱尝危机之苦的时候，法国还在享受20年代的繁荣。然而，当还处于繁荣余辉之中的法国为自己幸免于难而庆幸的时候，危机已经悄悄降临。1930年11月，法国乌斯特里克银行宣告破产，法国的经

济危机开始了。

法国的经济危机来得比较晚，但是特别持久。1933年，当欧洲许多国家从危机中复苏的时候，法国经济在经历了1932年夏天短暂好转后，又继续恶化。危机一直延续到1936年，危机使法国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许多企业、银行倒闭，工农业生产和贸易额大幅度下降。全国工业总产值以1929年为100%，1932年为69%，1935年下降至67.4%。危机对轻工业打击最大，1929年至1935年，约有130家纺织厂破产。危机还使自1928年后一直较为稳定的法国财政出现混乱，财政收入失去平衡，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国际收支逆差也在增大，但由于危机前夕和初期大量黄金从国外流入，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信贷银行系统受到的震荡比其他国家小。危机使在法国经济中占重要位置的许多中小企业和小商人破产。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和财产，农民收入减少三分之一。1935年，全国失业人数约为100万。这一数字不包括在农村中大量存在的隐蔽的未充分就业者。

法国自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局一直不是很稳定，第三共和国的65年中就有95届政府。经济危机使法国社会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尖锐起来，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政局的动荡。危机初期，法国政府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对付危机的办法，只是承袭以前的传统做法，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坚持金本位等紧缩通货的政策。这种做法对法国的经济复苏产生不良影响，使法国深深地陷在经济停滞的泥淖中难以解脱。由于延袭传统做法向人民转嫁危机，加重了危机期间人民的痛苦，资产阶级也由于经济迟迟不能恢复而对政府不满，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制，以维护自身利益。法西斯主义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滋生蔓延。

危机期间，法国出现“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同盟”、“青年爱国团”、“法兰西团结”等法西斯组织。其中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火十字团发展最快。该组织最初由曾获得过战争十字勋章的军人组成，后来各类激进分子也被裹挟进来。1934年春，该组织有3.5万名成员，第二年发展到20万，1936年已达45万之众。这些法西斯组织大多主张推翻议会制，建立独裁政权。

1933年底，当政府正打算通过一项预算改革时，发生“斯达维斯基事件”。法籍白俄斯达维斯基发行股票进行金融投机，几千户小存款者因之破产，他却赚取了15亿法郎。事发后，他收买政界、司法界要人两千多名，企图逃脱罪责。该事件暴露了政府的腐败，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法西斯分子以此为契机向议会制度发动进攻。1934年2月6日，火十字团等两万多名法西斯武装人员冲向国会大厦，企图解散国会，推翻共和国。在这紧要关头，巴黎工人举行示威，工人和警察与暴徒发生武装冲突，最终使法西斯分子的夺权阴谋破产。“二六”事件后，达拉第政府辞职，由杜迈尔组织“民族统一”政府。该政府于1934年11月提出加强政府权力的改革纲领，遭到各政党的反对而倒台。此后，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直到1936年议会选举时，各届政府均没有能力解决法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民阵线政府的改革 险恶的社会局势，促进了法国左翼力量的联合。为了抵抗法西斯势力，“二六”事件之后不久，1934年2月12日，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发动反法西斯总罢工，全国近500万工人参加。同年7月，社会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反法西斯统一行动公约。1935年5月，由共产党发起在巴黎举行各左翼党派和团体参加的反法西斯会议。会上通过了反法

西斯和新的世界大战的人民阵线决议。同年7月14日，左翼三大政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共产党及统一总工会、人权同盟等几十个党派组成人民阵线，全国约有200万人参加拥护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人民阵线的纲领是，要求通过保障劳工权利的立法，打破200家金融家族的控制，实行法兰西银行和军事工业国有化，固定农产品价格，政府收购农产品，取缔各种法西斯组织及其武装。这个纲领反映了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团结全国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战争的纲领，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936年4月法国议会选举，人民阵线在610个议席中获381个议席。6月4日，成立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首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

人民阵线的胜利，在工人中产生尽早改变自身处境的热切希望。5月26日开始，工人自发地以静坐的形式举行罢工，全国出现罢工高潮。勃鲁姆上台伊始，立刻在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实行一系列改革。他首先敦促雇主协会和总工会谈判，达成《马提翁协议》。协议同意增加工人工资7%~15%，承认工会的权利，履行工会代表全体工人与资方签定的协议，在不削减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这是工会斗争一个不小的胜利。勃鲁姆还促使议会通过集体合同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提高工会的地位，加强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此外，勃鲁姆政府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强政府对法兰西银行的控制，部分军事工业实行国有化。政府规定较为稳定的农产品价格。禁止拍卖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来抵债，对严重缺少资金的中小企业实行优惠贷款，解散法西斯组织。

勃鲁姆把他的政府纲领称为“法国的新政”，法国工人把人民阵线的社会改革称为“新时代的曙光”。但是，勃鲁姆的改革引起了保守派的恐惧，他们担心勃鲁姆之后会出现法国的列宁，甚至哀叹天主教的法国竟落到一个左派社会主义者手里。他们为了阻挠改革，让“资本外逃”，把大量黄金运出国外，破坏法郎币值，加重政府的财政困难。面对右派的猖狂进攻和因右派作祟而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勃鲁姆要求议会授予政府颁布“一切必要措施”的暂时权力，但是其要求被保守势力强大的参议院否决。人民阵线的纲领难以继续执行。

1937年3月，勃鲁姆宣布“暂停”实施人民阵线纲领；6月，勃鲁姆被迫辞职。继勃鲁姆之后上台的是旭丹和达拉第政府，法国政治开始向右转。达拉第政府破坏勃鲁姆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取消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工人因此举行总罢工，罢工遭到政府的镇压。人民阵线纲领最终虽然未能完全贯彻实施，但它在法国危机的历史关头执行一年，有效地抵制了法西斯主义，避免法国走上法西斯道路。

第四节 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经济危机与纳粹党的兴起 20年代下半期，德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威斯计划后大量流入德国的美英资本。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英金融界抽走大量资本，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德国作为现代金融体制、金融危机的首批牺牲者而很快卷入危机。由于德国是战败国，既丧失了全部殖民地，又不能以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因此，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由于外国债主逼债，很多银行和企业倒闭破产，仅1931年破产的银行企业达一万多家。危机期间，德国的工业生产几乎下降一半，钢产量减少73.1%，煤减产46%，机器制造减产73%，失业工人近七百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农业危机也很严重，农产品价格暴跌，大批小农户破产，农业生产下降30%，出口也锐减一半以上。

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德国政府想不出良策妙方，也只是在传统做法中寻求解脱之计。为了削减经费，平衡预算，德国政府削减工人工资、救济金和养老金，提高农民的纳税额，同时却向资产者提供一百多亿马克的补助金和贷款。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已经痛苦不堪的德国人民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

深刻的危机也震撼了政府统治，政府更迭频繁。1928~1933年先后更换四届政府，各届政府都无法克服财政困难和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在危机深重的非常时刻，在德国这个民主传统较为薄弱的国家，脆弱的民主体制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弹性和能力。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在危机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德国法西斯势力兴起。

德国的法西斯政党全称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该党的党旗是红地白圆圈，中间是黑色的卐字。希特勒解释说，红色象征着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白色代表着民族主义思想，黑色象征着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卐字则代表着有教养的雅利安人。

1920年，希特勒抛出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其党纲针对德国战败在国际上受屈辱的处境及国内民众普遍存在的不满和复仇心理，大肆鼓吹民族主义，提出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要求更多的土地与殖民地；彻底打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此外，还主张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处死奸商，禁止童工等等，以便争取群众。

1921年10月，希特勒组建了冲锋队，其成员多是社会渣滓、流氓打手。1925年又成立了党卫军。它先是希特勒的卫队后来成为纳粹党的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1923年11月8日，乘法国出兵鲁尔，德国国内政局动荡之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店掀起叛乱。失败之后，希特勒被关押了九个月。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这是一部夸张的自传体的回忆录，该书随意见论，冗长乏味，但其基本思想比较清楚，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鼓吹“生存空间”论，“受屈辱的德意志应该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更广阔的空间”。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先向西同其宿敌法国算帐，然后向东方突击，让俄国从欧洲的版图消失。

其二，宣传种族优越论。说德意志民族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地球上的高等民族。德意志民族应主宰世界，对其他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要进行无情的统治，要践踏“低等”民族。

其三，提出“领袖原则”，认为最好的国家制度是独裁政权。元首对一

切负责，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元首的绝对权力。

其四，鼓吹用武力挣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如今不能靠强烈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地区回到德意志帝国的怀抱。”武力夺取的目标，不仅在于要夺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土地，而且希特勒还认为“新德意志要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德意志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的食粮”。这本书后来成为法西斯德国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

应该说，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希特勒政治生命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此之前，希特勒一直奔走游说，但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趋向好转，政治局势也较为稳定，希特勒的鼓噪收效甚微。直到1928年，纳粹党成员还不足10万，在国会491个席位中仅占12个席位。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一半工人失业，大量农民破产，许多中小资产阶级也朝不保夕，昨日还算富有，今日一贫如洗。希特勒从这些在猛烈的经济风暴冲击下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城乡中小资产阶级那里，从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对政府极端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那里，寻找到新的支持者。希特勒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派出数千名纳粹宣传员前往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迎合不满现状的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进行蛊惑宣传。希特勒本人也租用一架飞机，进行“飞行演说”，扩大纳粹的宣传与影响。

1930年3月，纳粹党公布《农民纲领》，迎合农民群体的要求，提出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土地抵押和土地拍卖，给农民以减免税款提供借贷等经济帮助，以争取农民群众，同年5月，纳粹党又公布《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的纲领》，向广大失业工人作出扩大公共工程，提供广泛就业，国家资助中小企业的许诺。对于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商人，纳粹党提出处死奸商和高利贷者，废除不劳而得的“利息奴役制”，托拉斯国有化的主张。面对所有对战后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屈辱地位不满，心中压抑着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德国人，纳粹党则保证，要砸碎凡尔赛条约的枷锁，雪洗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恢复大德意志帝国往日的辉煌。

这样一来，以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不屑于理会的默默无闻的希特勒，在大危机的非常时刻，被越来越多的濒于绝望的德国人看作带领他们走出绝境的希望。于是，民众转向希特勒，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成员从15万上升到100万。

1930年9月大选，其结果震撼德国和欧洲。共产党议员的人数从54名增加到77名，纳粹党的议席，由12席增至107席。这表明，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在德国社会内部左翼力量增长的同时，右翼极端势力也在迅猛扩展。魏玛共和国面临着挑战，共和国处于危机之中！

共和国危机与纳粹党上台 成功地吸引了更多的选民，希特勒向夺取政权迈出了第一步。1930年选举之后，垄断资产阶级也对希特勒刮目相看。希特勒又乘机向对他夺取政权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垄断资产阶级靠拢。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坐着轿车跑遍整个德国，同企业界的重要人物会谈，争取他们的支持。1932年1月，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企业家俱乐部向克虏伯、胡根堡等三百多各大企业家和银行家讲解纳粹党的纲领。他谈到，在经济领域树立个人权威，在政治领域也应树立个人权威。他一再向企业界表示，决不触动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主权，保证根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鼓吹德意志种族优秀论，夺取新的生存空间。他的讲演结束后，到场的企业家全体起立向

他欢呼，二者一拍即合。处于危机震荡之中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把支持希特勒看作是既可以扼制来自共产党左派的威胁、稳住动荡不安的国内政局，又可以对外夺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扩大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从此开始了纳粹法西斯同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联盟。据估计，1930~1932年，纳粹从垄断资本家那里获得的资助达7000~9000万马克。

对于政权武装力量的支柱——国防军，希特勒也极尽争取拉拢之能事。1930年9月，三名国防军军官因涉嫌在军队中散布纳粹影响而受审，希特勒亲自出庭为其作证。在法庭上，他向听众保证：按照法律程序取得政权，不反对国防军。一旦纳粹党上台执政，还要扩大加强国防军，以图摆脱强加在德意志民族身上的凡尔赛枷锁。他的这一番讲话，拨动了德国军界中普遍存在的狭隘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复仇心理，国防军原来对纳粹的戒备心理和敌视态度因此而消融。此后，希特勒还以取消他一手组建的准军事组织——纳粹党冲锋队为条件，换取军界的支持。

就在希特勒一步一步向权力顶峰接近的时候，共和国却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1930年9月的选举使纳粹成为国内第二大政党，这意想不到的结果破坏了原来议会中的多数。这样一来，议会统治的基本原则，即各政党在议会多数的支持下组阁执政的条件消失。在此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天主教中央党的布吕宁政府没有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全靠总统兴登堡行使紧急法令来进行统治。这种紧急法令1930年行使了五次，1931年增至44次，1932年竟达66次之多。议会统治的基础和基本游戏规则被破坏，为专制统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1932年5月，因在东普鲁士土地法令问题上，总统与总理意见相左，在总统兴登堡的要求下，总理布吕宁辞职。

继任的总理巴本是中央党成员，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于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纳粹党再次获胜，选票增加到37.4%，议席也由1930年9月的107个增至230个。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获133个议席，共产党获得89个议席。

希特勒因此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当兴登堡邀请他参加联合政府时，遭到希特勒的拒绝，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力，其要求又为兴登堡所拒绝。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都不参加联合政府，政府又没有议会多数的支持，议会政体很难再坚持下去。为了扭转局面，巴本下令解散议会，于1932年11月又举行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丧失200万张选票，其议席也减少了34个，共产党增加75万张选票，议席从89个增加到100个。

纳粹党在大选中失利，希特勒非常沮丧，一度准备开枪自杀，垄断资产阶级也为此而恐慌。他们担心一旦纳粹党崩溃，原来为纳粹党所拥有的这几百万张选票转到左派手中，危及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利益。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发生，垄断资产阶级在这关键时刻给纳粹党以鼎力帮助。不仅资金源源流向纳粹，解救其财政困境，而且沙赫特、梯森、克虏伯和西门子等大资本家联名上书兴登堡，要求任命“民族运动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为总理，以便建立稳固的统治。垄断资本的支持，是纳粹党起死回生扭转危局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维持局面，巴本仍想与纳粹党合作，遭到希特勒拒绝，巴本被排挤下台。1932年12月2日，施莱谢尔将军出任总理。施莱谢尔曾企图用分裂纳粹党，拉拢纳粹议员，任命纳粹党内部左翼领袖施特拉塞为副总理的办法，

来组织自己的议会多数。但是在希特勒的全力阻挠下，其努力失败。施莱谢尔由于没有议会多数的支持，也不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1933年1月4日，在大银行家特·冯·施罗特的策划下，希特勒与巴本达成了组建天主教中央党和纳粹党联合内阁的协议。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纳粹党联合，保证组阁所需要的议会多数，而希特勒则应允天主教中央党的成员在内阁中担任重要职务。就是这样一笔政治交易，迫使施莱谢尔于1933年1月28日辞职。两天后，兴登堡不得不授命希特勒组阁。

纳粹独裁统治的建立 希特勒就这样，像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通过“合法”的手段上了台。但当时纳粹在内阁中仅有三名成员，希特勒不以此为满足，又进一步向一党专政的个人独裁统治迈进。

希特勒在就职演说中说，德国在魏玛共和国的14年里受到了那么多损失，今天的德国应该体现纳粹党人的意志。随后，立即宣布解散国会，并于3月5日举行新的大选，以使纳粹党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

为使新的议会选举能达到预期目的，希特勒首先向共产党及左派力量开刀。2月初，他下令禁止德国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查抄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为了控制舆论界，2月4日，希特勒签署了关于暂时禁止报纸出版和公开集会的命令。命令中说，“凡是对国家机关、当局和领袖进行谩骂和蔑视的报纸和集会都必须受到监督，因为这些报纸和集会损害了国家生存的利益。”根据该命令，不仅共产党的宣传出版机构被取消，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报纸出版权也被取消，选举进行之前，所有的新闻机构，包括电台广播都在纳粹党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纳粹一手把握了舆论界。

1933年2月27日深夜，纳粹党一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纵火事件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指使荷兰人卢贝所为，希特勒和戈林却以此为借口诬陷共产党，对共产党横加镇压，逮捕了包括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和侨居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内的四千多名共产党人。2月28日，希特勒即颁发了《保护国家和人民法令》，以紧急时期为借口，取消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把叛国罪和纵火罪由判处无期徒刑改为死刑，制造出一片恐怖。

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1933年3月5日举行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120个议席，共产党尽管因纵火案遭到了打击，仍获81个议席。纳粹党耍尽一切卑鄙手段之后，虽然获288个议席，在议会占多数，但仍只占44%，没有达到足够的票数。希特勒再次玩弄政治伎俩，无视宪法规定，宣布共产党的议席无效，并且又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后者给纳粹达到52.5%的足够票数，该党在内阁中捞到充任一些部长的好处。

1933年3月23日，纳粹党又强令议会通过《授权法》。在投票之前，全部共产党议员及部分社会党议员被禁止参加投票。该法授权总理越过国会对内政外交的一切问题发布法令。该法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享受四年的独裁权，在此期间，可以不受国会，甚至总统的任何监督而成为独裁者。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至此已名存实亡。

希特勒在掌握了全部政权之后，进而推行一体化政策。所谓一体化，就是使地方政府机构、工会组织和军队全部纳粹化。1933年3月31日，希特勒颁布了《各邦与帝国一体化法令》。法令规定除普鲁士以外的各邦议会可以不经选举而改组，以使其和国会选举结果保持一致。该法授权邦政府可不经邦议会同意而颁布各项规章，调整地方管理。4月7日，又颁布关于

各邦一体化的第二道法令，法令规定由帝国任命的委员作为帝国代理官在各邦执掌大权。根据柏林帝国的指令，帝国代理官有权任免邦政府的人选。这样，各邦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大权、行政权力也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实际是纳粹党的手中。

1933年4月7日这一天，纳粹政府还颁布了《重建公务员体制法令》，规定解除所有不具有本行职业技能的人或不是雅利安人出身的人的职务，以此为借口，把非纳粹党人从政府较高的岗位上排挤出去。

政府机构实行一体化之后，纳粹政府又实行党禁，禁止纳粹党以外的其他各政党的存在。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3月选举之后已转入地下，1933年6月至7月间，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第一大党的社会民主党和民族人民党、国家党、人民党、中央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也先后被迫解散。自由工会在5月初就已被解散。工人们全部被迫加入于5月10日建立的“德国劳工阵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多党制就这样在共和国名义上还存在的時候被取消，纳粹党成为全德国政治意志的唯一体现者。

军队方面的一体化也在同时进行。冲锋队原是纳粹党的武装工具，曾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希特勒上台以后，冲锋队的势力急剧膨胀，尾大不掉，其首领罗姆居功自傲，企图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二而一，由自己一人操纵。在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对抗中，希特勒为拉拢国防军，同时剪除纳粹组织内部可能与自己对抗的力量，支持国防军。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亲率党卫军飞往慕尼黑，以罗姆企图军事政变为借口，将其逮捕，不经任何审讯即刻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1500名冲锋队头目。剪除异己的活动由军界扩大到政界，希特勒的政敌、纳粹党内部左翼领袖施特拉塞及前总理施莱谢尔相继被杀害。

1934年8月1日，希特勒操纵的国会通过了《元首法》。把总统和总理原则上合而为一，确立了权力一体化的元首原则。次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集国家一切最高权力于一身的国家元首。为了给自己披上一层顺应国民意志的色彩，8月19日，又举行一次纳粹一手操纵下的所谓“公民投票”，希特勒从此成为国家和国民意志的全部体现。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极权体制确立，第三帝国形成。

希特勒的暂时得逞由各种因素促成。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无疑给希特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危机把德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抛进苦难的深渊，对自己的现状和对现政府的强烈不满，使他们把眼光投向他处，希望并寻觅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带领他们走出苦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压迫，使德国人民心中积郁起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当前所未有的危机携带着前所未有的苦难来临之时，这种民族情绪必然走向极端；因为这时的民族复仇心理已和摆脱苦难的强烈渴望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正常的社会法规难以驾驭的力量。这种民众情绪和社会力量很容易为极端主张和极端分子所利用。

此外，德国的民主政体本来就基础薄弱，魏玛共和国诞生于德国战败，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被镇压之时，共和国从其诞生那天起，就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左派认为它是镇压革命的产物，右派认为它是革命的派生物，并且同屈辱的凡尔赛条约联在一起。而普鲁士式的向现代经济过渡的道路，使得容克贵族的旧势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旧阶级没有得到革命性的改造，德国资产阶级也因此成长缓慢。社会中没有有一个中坚力量维系，共和国

没有一个稳定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支持。当危机袭来之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冲突，根基不牢的共和国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德国的左派力量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纳粹上台之前对纳粹得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虽然两党曾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但共产党忽视了同当时德国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指责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做法，社会民主党也对共产党取敌视态度，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2年总统选举中，兴登堡再次被提名为候选人，纳粹党的提名是希特勒，共产党的候选人是台尔曼。社会民主党不顾共产党“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的提醒，选举了兴登堡，为纳粹上台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希特勒正是抓住机会，利用上述一切有利条件，蛊惑民众，最终被垄断资产阶级捧上台，他的上台，给德国、欧洲及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法西斯独裁统治与扩军备战 纳粹上台之时，世界经济危机已有所缓和，但为了实现其既定的摆脱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控制，夺取新的生存空间的目标，纳粹党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并迅速走上扩军备战的道路。

为了巩固其统治，1933年9月希特勒政府颁布“庄园继承法”，规定所有拥有7.5公顷至125公顷土地的农户必须证明自己是雅利安人，其土地不能分割或出卖，只能由长子继承。该法令在农村制造出一批拥护纳粹统治的中小农，扩大了纳粹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城市，希特勒通过修筑城市街道，铺设高速公路，架设桥梁，修建飞机场和兵营，改良土壤，开垦荒地等措施，一方面解决德国存在的大量工人失业的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国家的基本建设，为日后备战作准备。

在经济体制方面，纳粹德国也进行了改革，大大发展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的、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33年7月，成立了控制全国经济的最高机关——德国经济总会，该组织由垄断巨头和纳粹党头目组成。1934年11月，该组织发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根据该条例，国家通过经济部门和地区系统两条途径，牢牢控制私人企业，各企业的原料分配和订货都被国家严格控制。这样一来，国家政权和垄断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国民经济向军事经济转轨。为了加强对企业工人的管制，纳粹政府还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企业主即是企业的全权领袖，工人是其下属，工人不得自行辞职。此外，纳粹德国还成立了“德国食品管理总会”，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进行生产，农产品的大部分必须以低价卖给国家，国家通过这种办法，严格控制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农业经济也纳入国家统制的轨道。

1936年8月，希特勒明确提出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扩大生存空间，德国的经济必须立足于战争的基础之上。同年10月，纳粹政府成立“四年计划办公室”，由戈林具体负责，以使“德国经济在四年内做到能应付战争”。从此以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增长，国民经济更迅速地向军事化方向推进。

1933~1939年，德国的消费品生产增长43%，军需工业却增长11.3倍。在全部工业投资中，消费工业品所占比例，由1928~1929年的31%，下降到1934~1935年的25%，到1937~1939年，已降到17%。军备开支逐年增长，1936年比1934年增长两倍，1939年达到300亿马克。到战争开始之前

的 1939 年，德国的军火生产已是英美两国总产量的两倍还多。德国在纳粹统治之下，几年之内就在军事上崛起，为其最后发动战争进行物质准备。

除经济军事化以外，纳粹德国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加强法西斯控制。从纳粹执政之日起，就开始了排犹运动。1933~1935 年颁布多项法令，禁止犹太人经商、担任国家公职，甚至不允许犹太人成为德国公民，不准与德国人成婚。1938 年开始，纳粹政府使用暴力逼迫犹太人移居国外。1938 年 11 月，掀起大规模反犹活动，焚烧犹太教堂，打碎犹太人商店的橱窗，制造著名的“水晶之夜”，即全国砸碎犹太人玻璃窗之夜。其暴行致使无数犹太人流离失所，并惨遭杀害。

在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一切人类进步的思想文化都遭到禁止，进步书籍被烧为灰烬。全部的文化生活都要符合纳粹思想。报纸、音乐、电影、广播、新闻等，都受制于以戈培尔为首的“德国文化总会”。所有报纸的新闻，甚至标题都由纳粹党的宣传部控制。在纳粹的控制下，广播报纸成了纳粹党宣传“种族优秀论”、“生存空间论”和其他战争理论的工具。种族理论被规定为学校的主要课程，学校也成了军事训练的基地。为控制德国青年，纳粹还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所有德国青年必须加入，接受战争教育和军事训练。

为了实现夺取生存空间和称霸欧洲的目的，纳粹从上台开始就着手扩军备战。1933 年 10 月 14 日，希特勒以未能满足德国的“军备平等”为由，宣布退出日内瓦国联裁军会议。接着又退出国联，这表明德国准备不受国际社会的任何束缚，公然走上扩军备战的道路。果然，1935 年 3 月，希特勒不顾凡尔赛条约的明文规定，公然宣布恢复义务兵役制。1935 年 6 月，又成功地与英国签定了英德海军协定，尽管该协定规定英德海军比例为 100 : 35，但在潜艇方面吨位保持平衡。这一协定对于希特勒重新武装海军具有重大意义，1936 年 3 月，希特勒出兵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公然撕毁保证西部安全的洛加诺公约。当法国因此而恢复两年兵役制时，希特勒也以此为借口，把其国防军的服役期改为两年。

为了实现扩张野心，纳粹法西斯制定了动员全部国民经济力量和国民力量，在各方面作好速战速决的准备的总体战略的基本国策。由于把主要预想敌设为法国及其东欧同盟国，进而确定了优先发展陆军和空军的发展规划。经过 1936~1939 年四年的准备，到 1939 年 8 月，德国军事力量共有 103 个陆军师，其中有 5 个装备完整的装甲师，3200 辆坦克，军用飞机共 4093 架，海军计有 57 艘潜艇，22 艘驱逐舰，9 艘巡洋舰和 6 艘装甲巡洋舰。虽然德国的海军力量还比不上英国，但其军事总体力量在战前已超过所有的邻国，再度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尽管德国蓄意发动战争，其备战工作比其对手英国和法国下手早，准备成熟，但不能说德国已经作好了打一次世界大战所必需的一切准备。德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是掠夺资源，弥补本国资源不足，而德国最难以克服的正是资源问题。除了煤炭以外，其余战争所必需的原料，如石油、橡胶及各种矿产资源德国都极度贫乏。虽然希特勒早已扩大战备原料的进口，并且大力发展战略原料代用品的试验和生产，比如合成油、合成橡胶、人造棉毛、加工稀有金属等，但是资源问题仍难以解决，大部分的战略原料仍需进口。法西斯德国难以克服其侵略野心与其有限实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最终促成法西斯的垮台。

第五节 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经济危机打击下的日本 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20 世纪前十年才完成产业革命，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迅速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跃居资本主义世界强国之列。但是一次大战之后，在战争中出现畸型繁荣的日本经济很快陷入危机，1923 年才有所回升。但回升速度很慢，20 年代当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繁荣的时候，日本基本上是萧条。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可阻挡地席卷日本，使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遭受新的打击。日本的进出口贸易，1930 年比 1929 年下降 30% 左右，1931 年又比 1929 年下降约 50%。国内八种主要商品价格 1930 年比 1929 年下降 37%。日本是个岛国，市场狭小，资源紧缺，对外贸易缩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1931 年经济危机发展到最严重地步，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29 年下降三分之一，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达 50%，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一年进入危急关头。

危机期间日本的失业工人达 300 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被降低三分之一以上。农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人均收入由过去的 700 日元降至 130 日元，三分之二的农民失去土地，许多地方出现饥荒，造成大批人死亡。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政府不是设法减轻人民的痛苦，而是向人民转嫁危机。日本滨口内阁（1929 年 7 月～1931 年 4 月）拯救危机的主要办法是紧缩通货，用降低工资增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推行“产业合理化”，以便降低成本，提高日本商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1929 年 12 月和 1931 年 4 月，滨口内阁分别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和“主要产业统制法”，增加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在主要生产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限制生产，淘汰中小企业，增强大财阀对主要产业的控制。日本政府在危机期间的主要财政政策，起初是保持金本位制。当 1931 年英美等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后，日本犬养毅内阁下令禁止黄金出口，恢复通货膨胀政策。

为了扭转国内生产萎缩局面，刺激国内生产，日本政府还实行“军需通货膨胀”政策。所谓军需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与政府扩大军事支出和军事订货相结合，在促进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推动国民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1931 年至 1936 年，日本政府发行 67 亿公债，货币流通量增加 9 亿日元。同时期，日本的军事预算由原来占总预算支出的近三分之一，增至 69%。

危机期间，无论是经营电力、化学、飞机等行业的新财阀，还是生产钢铁、煤炭和造船的老财团，都更加依靠国家政权，加强与军部的联系，靠着政府与军部的支持，大力发展与军事有关的新工业新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使日本工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民经济加速向军事生产转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产品的变化，使新老财团本身与军事有关的经济利益发生联系，其军事扩张倾向大大加强。这样一来，军阀与财阀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起来，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作“军财抱合”。“军财抱合”使得原本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日本社会更加军国主义化，对日本最终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在国际上，为对付国外激烈的竞争，扩大出口，日本政府执行推销政策。所谓推销政策，就是不顾国际市场上的压低价格和剪刀差，廉价出口本国商品，以争夺对日本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国际市场。30 年代前几年，在这种政策指导之下，低廉的日本商品冲向欧美各国，以致欧美各国先后动用立法

手段，抵制日货进口，保护本国市场。

日本政府执行的转嫁危机军需通货膨胀政策，加重了日本人民的痛苦，导致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尖锐化。在危机年代里，工人罢工此伏彼起，仅1931年就发生2415次罢工，农村中的“租佃纠纷”也屡见不鲜。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和台湾人民也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这一切震撼了日本的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化 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军国主义传统和封建残余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就出现了法西斯组织。最早出现的法西斯组织是北一辉领导的“犹存社”，以后又繁衍出“行地社”及“黑龙会”、“大日本国粹党”等法西斯组织。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急进爱国社”、“神武会”、“国家社会党”等五花八门的法西斯团体纷纷涌现。在日本，先后有几百个这样的组织存在。

这些民间法西斯组织是军国主义思想与民间右翼势力结合的产物。他们多主张建立极权政体，鼓吹进行战争，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细亚联盟”。这些团体在民间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法西斯势力。但是，由于它们组织松散，缺少共同的纲领，彼此之间没有更多的联系，更没有统一的行动，因而没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日本法西斯化运动中不起主要作用。

军部是不同于民间法西斯团体的一股影响力最为强大的法西斯势力。军部是日本政权中的军事部门，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司令部、陆军省、海军省等。根据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军队由天皇统率，辅佐天皇指挥军队的军部直属天皇，不受制于内阁。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军部势力急剧增长，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经常凌驾于政府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敬组织第一个政党内阁，军部势力有所削弱。但一些中间阶层出身的将校级军官和中下级军官组合在一起，制定行动纲领，形成“一夕会”、“樱会”等军内法西斯组织，其骨干分子有永田铁山、冈村宁茨和东条英机等。这些组织分成“幕僚革新派”和“基层将校革新派”两个派别。两个派别统称“军内革新派”。它们以皇道主义自我标榜，力主“军人干预政治是理所当然的”，声称“政党是日本国民的公敌”，要求推翻政党内阁、建立暴力统治，公开鼓吹战争。

30年代，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外矛盾激化，民众怨声载道。法西斯分子适应群众心理，提出“打倒财阀和政党”，“解决满蒙问题”，“保障工人与妇女权利”等口号。进行欺骗性宣传，使民间法西斯势力恶性发展，军部内部的法西斯势力也极度膨胀。他们利用人民对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情绪，要求取消议会制，实行军部独裁，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为达此目的，他们在军内掀起了“国家改造”运动。所谓“国家改造”运动出现以后，军事政变频繁，刺杀事件时有发生。

1930年11月，在军部的支持下，法西斯组织“爱国社”成员暗杀民政党首相滨口雄幸。滨口重伤，不久身亡。随后，1931年若内阁期间，军部法西斯组织“樱会”分子于当年3月和10月，两次策划发动政变，拥戴法西斯分子宇垣一成和荒木贞夫，两次政变均因时机不成熟而告流产。1931年12月，若内阁因解决不了财政危机而下台，政友会组阁，成立以犬养毅为首相，法西斯分子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的新内阁。军部力量大大加强。但是，以少壮派军人为代表的军部法西斯分子希望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他们仍

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不惜使用刺杀手段，来达到此目的。

1931年10月政变未遂事件以后，军部法西斯组织“一夕会”和“樱会”都被解散。军队内的法西斯分子分化出对立的 two 派，一派是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他们主张以恐怖手段改变现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部法西斯独裁，对外主张向北进攻苏联。由于这一派以中下级军官为骨干，又称少壮派，他们得到新财阀的支持。另一派称统制派，以宇垣一成和东条英机为首，由军部内的高级军官组成。他们以老财阀和旧的官僚贵族为靠山，主张在高级军官的统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控制政权，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实现政权法西斯化，加快对外侵略的步伐，侵略的目标是中国和南洋。

1932年5月15日，以少壮派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生为主体的法西斯分子发动暴乱，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总部，刺杀了首相犬养毅。“五一五”事件虽然最后失败，但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日本政党内阁结束。5月26日，成立了以海军大将、前驻朝鲜总督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超政党的，军阀—官僚内阁，日本政权开始向军部独裁过渡。

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由于对通过什么方式建立军部法西斯统治的主张不同，军部法西斯势力中的两派，即皇道派与统制派矛盾日益尖锐。1934年1月，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被迫辞去陆军大臣职务。次年7月，皇道派另一中心人物真崎甚三郎的教育总监的职务也被解除。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一手策划的。8月，少壮派军官相泽三郎刀劈永田铁山于军务局长室。为了打击皇道派，统制派下令把皇道派的中坚力量第一师团由东京调往“满蒙”。皇道派决定在该师团调离之前发动政变，建立自己一派大权独握的军事独裁政权。

1936年2月26日，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少壮派军人一千五百多人在新财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的住宅和警视厅等地，杀死了前首相斋藤实及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淀太郎等现任内阁大臣。首相岗田启介因叛军错把其秘书当成他而误杀幸免一死。暴动者占据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厅、陆军省、参谋部等地多日，企图成立以皇道派为主的军人法西斯内阁。由于军部一些法西斯头目担心政变会破坏天皇制度，海军又担心政变会导致陆军独裁，政变因得不到支持而于29日被镇压。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退出现役，直接参与政变的80名下级军官被判刑，17人被处死。此后皇道派势力衰微，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军队中居于领导地位。

统制派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老财阀的支持下，1936年3月成立以法西斯分子前外相广田宏毅为首的新内阁。广田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按照军部的意愿组阁并进行统治，广田内阁成立后，极大地加速了日本政权的法西斯化过程。1936年5月，应军部要求，广田内阁恢复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这使得军部控制操纵内阁合法化，内阁沦为军部的傀儡。此外，广田内阁还正式废除了议会多数政党组阁的内阁制，议会对内阁的监督权也被取消，军部可以无所顾忌地操纵内阁。广田内阁的建立，标志日本军人法西斯专政的初步确立。

日本政权的法西斯化过程与德国和意大利相比有其不同之处。它不是像德意那样，通过一个法西斯政党或法西斯组织篡夺政权来完成，而是军部法西斯势力在财阀的支持下，通过一系列政治的，或是军事的行动，不断扩展

自己的力量和影响，逐渐把握政权，从而实现日本政权向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转化。

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日本是一个岛国，其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经济上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驱动日本帝国主义军方代言人迫切希望征服邻近地区或国家，建立一个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日本帝国。

中国东北是日本觊觎已久的一块肥肉。那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铁和煤的矿藏都很丰富。此外，还有广袤肥沃的土地。过去日本已经在这里获得某些特权。1927年“东方会议”之后，日本连续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企图使东北的地方统治者脱离中国归附日本。但1928年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的“改旗易帜”，使日本的压服阴谋破产，为了保护并扩大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日本不惜挑起战争。

日本军部法西斯在推动战争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积极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除了赤裸裸的扩张目的以外，军部还企图以所谓“解决满蒙”问题来煽动战争狂热，争取国内中间群众的支持。提高军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通过发动战争来推动日本国内法西斯化的进程。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直接策划下，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24小时内攻占沈阳和长春，不到100天就侵占了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2.5倍的整个东北。为了使其军事占领合法化，日本占领军导演出一幕“自治”、“独立”的丑剧，1932年3月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不以此为满足，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件，只因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军的准备也不足，才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但在以后的几年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挑衅不断。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系列条约，日本实际上控制了中国冀、察两省。

“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在任外相时，就于1935年10月4日提出对华政策三原则，即要求中国取消一切抗日活动，承认“满洲国”，中日共同反共，实现所谓中日亲善，以控制中国的经济与外交。广田内阁成立以后，秉承军部旨意，不仅加快了法西斯化过程，而且加快了对外侵略的步伐。1936年8月，广田内阁公布了“庶政一新”的纲领，规定国家财政首先服从国防需要。这种准战时财政政策的实施，及政府对汽车、石油、粮食等与战争有关的重要部门的控制加强，表明国家已经临近发动战争。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了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为“谋求帝国的生存与发展”，就要“稳步地向海外扩张”，“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实现所谓日满华三国紧密提携，并“向南方海洋发展”。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会议还要求陆军军备对抗北边苏联在远东的兵力，海军军备对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以确保日本在该地区的制海权，保证向南洋发展的目标的实现。《基本国策纲要》既反映了陆军的北进意图，也涵盖了海军的南下主张，基本勾勒出日本日后进行侵略、南北并进的庞大胃口和狂妄意图。

为了实现《基本国策纲要》的目标，准备殖民扩张，日本政府大力推行陆军制定的五年扩充计划和庞大的海军造舰计划。1936~1937年度军费支出

占总支出的 46%，1937 年军工生产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 61.7%。1931 年陆军总数为 23 万人，1937 年增至 45 万人，同年，海军作战人员编制扩充了四分之一以上。日本政府在军队中极力鼓吹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思想，把军队训练成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

1936 年 11 月，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反苏的借口下，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展开瓜分世界的斗争。

1937 年 6 月，同天皇、军部和财阀均有密切联系的近卫文麿组阁。近卫文麿在组阁宣言中就重申他一贯主张的侵略扩张思想。他说，其内阁的任务之一是实行“国际正义”，而“国际正义”如无世界领土的公平分配就不彻底。“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办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由于他所描述的这种国际正义还没实现，那末日本的大陆侵略政策就是正当的。近卫文麿上台伊始曾多次强调，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建立“新国民体制”，准备发动战争。1937 年 7 月 7 日，近卫组阁不过一个月零三天，日本法西斯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进行圣战”，“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声中，日本侵略者首先攻占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中国军民顽强抗战，使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产。

为了确保战争的进行，稳定后方，1937 年 9 月，近卫文麿内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宣传“举国一致、征服世界”的思想，在支援“非常时期财政经济”的名义下，制定《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加强对经济各部门的控制，进一步把国民经济全面转上战争轨道。随后，近卫内阁从军人、垄断资本家和议会政党最有势力的代表中选出十名临时阁员，并组成大本营，进一步加强军人在内阁中的地位。日本战争机器被全面开动起来。

第十三章 30年代的国际关系

第一节 30年代初期德日意的侵略扩张与英法美苏的态度

日本侵华与列强的对日绥靖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为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铤而走险，首先在中国东北燃起战火。

“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一向被日本称作“生命线”。日本在这一地区具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据统计，1930年，日本从中国东北进口的物资占整个进口额的11%，其中76%的豆类、64%的煤和46%的钢铁都是由中国东北进口的。中国东北又是日本重要的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占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东北投资总额的73%，占其对外投资的54%；日本出口中国东北的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8%。而且，中国东北是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夺取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跳板”。因此，确保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战略目标。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制定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会议把中国东北列为日本的“特殊地区”，确立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方针。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同美、英在中国的争夺加剧。美英资本加紧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死后，继任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向亲美的蒋介石政府靠拢。在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限制日本在东北的某些特权，并计划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修筑西满铁路，实行东北四路的联运和运费减价，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竞争。奉系军阀的转向，使日本想通过扶植亲日政权使东北成为“特殊地区”的政策破产。这种情况促使日本决心要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把东北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同时，日本想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来缓和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接着使用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炸路和袭击日本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随即向东北全境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日本抬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同年1月，日军进攻中国上海。翌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省，将其并入“满洲国”。随后，日军入侵察哈尔省北部和河北省东部地区。1936年1月，日军进犯绥远省。中国军民先后在上海、长城各口、察哈尔北部和绥远等地奋起抵抗，并在东北三省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美英对日本侵华所持态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损害了它们的在华利益，因此力图对其加以某种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它们采取了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国务院于9月20日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对事变的发生表示“惊讶”。24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命令军队，避免再有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歧见”。直至1932年1月日军攻占锦州，威胁到美英有重大利益的华北后，美国的态度才稍转强硬。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宣布美国不承认九一八事变后被以武力改

变了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现状，重申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维护美国的在华权利。美国的这一政策性声明，史称“史汀生主义”或“不承认主义”。史汀生发出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声明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国民党政府训令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理事会采取行动，“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蒋介石政府把事件的解决寄托在国联主持“公理”和“调停”上。9月22日，英法控制的国联向中日两国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冲突，立即撤退军队。电报不分是非曲直，把被侵略者和侵略者置于同等地位，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袒护。9月3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以日本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有确切之保证”为条件，要求日本“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并对日本政府声明“无领土野心”予以肯定。日本政府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军，并继续增兵，扩大占领区。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又通过决议，要求日本于11月6日以前撤军，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再次通过决议，“重申9月30日一致通过之决议”，并决定委派一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对局势进行实地考察。1932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法、美、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代表李顿。其实，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东北，事实非常清楚，根本用不着调查，组织调查自有其帝国主义目的。

1932年4月，调查团到达中国东北。经过近半年的调查，10月，国联公布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自卫手段”。报告书驳斥了日本人关于“满洲国”是由于“独立运动所产生”的说法，确认是日军“以强力侵吞并占领了确属中国领土的广大地区，以致作为上述行动的结果，则是该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脱离而宣布独立”。报告书认为日本应对占领“满洲”和在那里建立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的制度负责。但是，报告书却胡说中国抵制日货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从苏联来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研究东北问题“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因素”，还说中国革命运动“使日本受害较其他国家为大”。报告书断言：“恢复现状，并非解决办法”；“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时组织，亦属同样不适当”。它主张：中国主权应当保留，但东北应获得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应予承认；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中日武装力量都从东北撤退，另组由外国教官协助的特别宪警来维持秩序。显然，报告书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既要绥靖日本，又想分沾利益，企图把日本独占的东北变为列强共管的殖民地。

李顿报告书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也置若罔闻，继续展开军事进攻，1933年1月初占领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这种情况使正在审议报告书的国联大会处于尴尬的地位。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基本上接受了李顿报告书的意见，并申明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出军队。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通告，宣称“帝国政府确认确立远东和平之根本方针，与国联之所信，完全相反”，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大举向南扩张，侵入华北，使英美在华北的利

益受到严重打击，从而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1934年4月23日，英国政府在给日本政府的照会中强调：“英国对于九国公约极为关注。任何国家，对于自愿签订之公约，若单独宣布废止，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皆为英国所反对。”29日，美国也照会日本政府，指出：“在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义务与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其他有关国家的同意，而得以达成它自己的企图。”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为核心，举国一致，英勇地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无疑损害了英美在华的利益，但它们仍然继续执行“静观和忍耐”的政策。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对日本的侵略不加谴责，而只是旁敲侧击，空谈“维持和平”，“切戒在推行政策中应用武力”等等。日本政府也对赫尔的声明“表示同意”。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罗斯福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并试探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应，于10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呼吁建立反对侵略者的“防疫地带”，把侵略者“隔离”起来。罗斯福的演说遭到孤立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于是罗斯福迅速降低调门，表示制裁是一个“可怕字眼”，应该“扔到窗外去”。英国首相张伯伦也一再表示，不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1937年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也只是“对中国表示道义支持”。

根据中国政府的申诉和国际联盟的建议，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苏联应邀参加，日本拒绝出席。中国代表要求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呼吁各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这些要求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最后，会议发表的宣言只是泛泛地重申必须尊重《九国公约》所确定的原则，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会议没有规定对付侵略者的任何具体措施。

美英不愿对日本实行制裁，除了政治原因外，还由于它们不愿使自身的经济利益蒙受损失。据统计，美国对日贸易占其远东贸易额的42%，其对日投资和贸易是对华投资和贸易的2~3倍。因此，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资本家反对制裁日本。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英继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为日本侵略战争输血。1937年，在日本进口的军事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铜占92%，汽车及零件占91%，石油及石油产品占60%，废钢铁占59%，机器及机床占48%，生铁占41%。七七事变后的一年，美国输往日本的军事战略物资竟达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英国对日本供应战略物资的总额仅次于美国而占第二位。1938年，英国及其自治领向日本输出的物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0.79%，其中军用物资占17%。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对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来说，当时如果美英实行经济制裁，它是很难维持这种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的。

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与英法等国对侵略的纵容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意大利法西斯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它力图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扩张势力，称霸地中海，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湖”。但是，它的欧洲扩张计划受阻于英、法、德而一时难以得逞，于是转而把主要的侵略矛头指

向非洲，决定首先侵占仍保持独立地位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部，控制着从地中海经红海到印度洋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意大利一旦吞并埃塞俄比亚，就可以把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连接起来，加强在东非的殖民阵地，使其成为进攻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基地，并威胁地中海通向印度洋的英国的“海上生命线”。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控制了埃塞俄比亚就控制了尼罗河下游苏丹和埃及的水利灌溉系统。

1934年12月5日，意军在瓦尔瓦尔地区制造边境冲突，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挑衅。埃塞俄比亚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联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但英法控制的国联采取“不干涉”政策，宣布瓦尔瓦尔事件双方都未被证明犯有侵略罪行。法国希望同意大利接近，结成英、法、意的联合阵线，共同对付德国的威胁。1935年1月7日，它同意大利签订罗马协定，两国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的调整达成协议。意大利放弃对法属突尼斯的要求，并同意照顾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特殊利益；法国同意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20%的股票让给意大利。法国外长赖伐尔向墨索里尼暗示，法国政府将不阻挠意大利实现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意图。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回答墨索里尼的探询时说：“你们采取行动时要讲究些策略，我们是不会干涉的。”

英法等国的“不干涉”政策助长了意大利侵略者的气焰。瓦尔瓦尔事件后，意大利加紧向东非增兵，至发动侵略战争前夕，在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集结了三十多万人的兵力。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侵略军不宣而战，分三路向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埃塞俄比亚军民在海尔·塞拉西一世领导下奋起抵抗。尽管意军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战争初期，他们处处受到埃塞俄比亚军民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11月16日，墨索里尼撤销了德博诺的侵略军总司令职务，改由意军总参谋长巴多利奥元帅担任此职。

战争爆发后，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意大利的野蛮侵略，要求给以制裁。迫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国联行政院于10月7日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随后国联大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对意大利实行财政和经济制裁，但意大利最迫切需要的石油等战略物资不在禁运之列。当时意大利在东非只有够两个月使用的石油储存，如果经济制裁包括石油的话，侵埃意军的飞机、坦克很快就会陷于瘫痪。同时英国也没有封锁苏伊士运河。海空军力量远远超过意大利的英国，如果在地中海切断意大利的补给线，封锁苏伊士运河，就可以置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意军于死地。显然，国联的制裁根本无碍于意大利继续进行侵略战争。

1935年12月9日，法国总理赖伐尔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尔炮制了一个《霍尔—赖伐尔协定》。协定“建议”埃塞俄比亚把整个欧加登省和提格雷省东部等共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转让给意大利，以换取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划出一条约3000平方英里的走廊及其通往阿萨布港的出海口，同时埃塞俄比亚还要在其南部地区给意大利提供一块“经济发展和居留的地区”。海尔·塞拉西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这一出卖埃塞俄比亚人民利益的协定。声明说：“在埃塞俄比亚人看来，那些建议是否定了和抛弃了国际联盟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它们将肢解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和消灭它的独立，来为一个对它进行袭击的国家谋利益”；“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的解决，势将是鼓励侵略和对国际

约言的违反”；“埃塞俄比亚的重大利益正在成为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优先于任何其他考虑的”。这一协定也遭到英法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霍尔和赖伐尔都被迫辞职。

国联和英法的姑息纵容政策使意大利有恃无恐。1936年3月初，意军发动进军亚的斯亚贝巴的新攻势，对埃塞俄比亚的城市乡村进行狂轰滥炸，并且公然践踏国际公约，灭绝人性地大量施放毒气。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埃军虽英勇抵抗，最终不敌。5月5日，意军攻占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5月9日，意大利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随后，意大利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联合为意属东非。7月4日，根据英国的提议，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从1936年7月15日起取消对意大利的制裁。

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和英法的“不干涉”政策 1936年1月，西班牙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和劳动者总同盟等民主力量组成人民阵线。2月，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人民阵线政府。新政府根据人民阵线纲领，开始实行民主改革：颁布大赦令，释放政治犯，实行土地改革，将七十多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恢复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实行社会立法，解散一些反动组织等。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决定发动颠覆共和国的武装叛乱。

1936年7月18日，驻摩洛哥和加纳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佛朗哥和莫拉等将领策动下发动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西班牙本土。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部队以及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参加了叛乱。佛朗哥和莫拉指挥的叛军占领了西班牙本土南部和北部省份，企图南北夹击马德里，一举消灭共和国。

叛乱发生后，西班牙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两天内有30万人报名参加民兵组织——人民警卫队。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中城市的叛乱很快被平息。叛军只控制南方的安达卢西亚和北方的加利西亚、纳瓦拉、旧卡蒂利亚和阿拉贡等省份。工业、政治中心、主要港口和交通干线均为共和军所控制。叛军速战速胜的计划被粉碎。

在叛乱面临失败之际，德意法西斯公然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从1936年7月底开始，他们派飞机到西属摩洛哥，协助佛朗哥把叛军运往西班牙本土，并把大批坦克、飞机、大炮等各种轻重武器运往西班牙支援叛军，随后又派出正规军直接进攻西班牙共和国。据统计，战争头两年，德意向佛朗哥提供的武器有飞机1650架、火炮2700门、坦克和装甲车1150辆、步枪数10万支、炮弹750万发，调往西班牙参战的兵力至1939年累计达20多万人。德意的武装干涉使西班牙内战同时具有西班牙人民反对外国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性质。

德意之所以对西班牙实行武装干涉，不仅是要扼杀西班牙共和国，掠夺西班牙的丰富资源，而且追求着更大的战略目标，即控制大西洋通往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罗陀海峡，切断英国通往中东和亚洲的海上要道，威胁英法在地中海的战略基地，为征服欧洲作准备。对德国来说，西班牙战场还是其军事战略、战术和新式武器的试验场。德国赖歇瑙将军在1938年说：“西班牙对德国来说是战争的高等学院”，这“比在和平条件下训练十年”更有益处。

虽然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战略目标指向英法，但由于英法统治集团仇视人民革命，害怕西班牙人民阵线运动蔓延至欧洲其他国家，并指望德意对

西班牙的干涉将成为“德国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进军的第一个战役”；因此，他们对法西斯侵略采取“不干涉”政策。1936年8月15日，英法两国政府互换照会，声明为避免干涉西班牙内战，“禁止将一切武器，弹药、战争物资以及一切装配或拆散的航空器和一切作战船只直接或间接输出，再输出和运至西班牙、西班牙属地或摩洛哥西属地区的某一目的地”。“不干涉”政策开始生效。到9月3日，共有27个国家签订了“不干涉协定”。为监督协定的执行，9月9日，根据法国的建议在伦敦成立了“不干涉西班牙委员会”，由英国财政大臣摩里逊担任主席。“不干涉协定”规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禁止运往西班牙的武器过境。以后又补充一个禁止派遣外国志愿人员到西班牙去的协定。正在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德意两国也参加了“不干涉协定”，但仍继续大规模地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派遣干涉军进攻西班牙共和国。英国外交家杰弗里·汤普逊曾这样形象地描述道：“德国的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和驱逐舰向佛朗哥和意大利人提供侦察资料，为其轰炸机指引目标。这些军舰都悬挂着‘不干涉’委员会的带有相应标记的专用旗帜。我们一直在想，发明这一标记的人一定具有相当无耻的幽默感。”显然，所谓“不干涉”，实际上只是单方面束缚西班牙共和国获得武器，而佛朗哥叛军却可以从德意等国源源不断地得到武器供应。“不干涉”政策，其实质是纵容法西斯侵略。

苏联也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其目的是力图阻止佛朗哥叛军得到外来援助，当看到情况完全与此相反时，遂于1936年10月23日正式宣布：“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愿再为对西班牙合法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显然不公正的既成局势承担责任，……它认为自己不应再比不干涉协定的任一其他参加者受到该协定更多的约束。”据统计，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8月，苏联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了496架飞机、332辆坦克，以及大批装甲车、火炮、机枪和步枪，并派了军事顾问前去协助西班牙共和军作战。各国人民募集粮食、药品、武器和捐款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来自54个国家的四万名左右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另有两万名左右外国人士在医疗队和辅助队服务。有一万多名国际纵队的战士，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佛朗哥叛军在德意支持下，于1936年秋占领了整个西部地区，开始和莫拉指挥的叛军会合，企图进而夺取首都马德里。在这危急的形势下，社会党人卡瓦列罗于1936年9月4日组阁，共产党人也参加了政府。新政府进一步采取了社会改造措施：没收叛乱地主的地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接管资本家遗弃的工厂，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管理；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劳保制度；改民兵为正规军，在军队中设立政治委员会；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广泛的自治权。

1936年10月，叛军推举佛朗哥为西班牙国“元首”，并分四路进逼马德里，于11月6日进抵马德里近郊。指挥官莫拉吹嘘说，他用四个纵队进攻马德里，“第五纵队”将在市内迎接他。从此，“第五纵队”就成了内奸和间谍的同义词。西班牙人民在国际纵队的配合下，展开了英勇的马德里保卫战。共产党人身先士卒，马德里90%的共产党员走上前线。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马德里军民浴血奋战，多次粉碎叛军的进攻。

1937年，人民阵线内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和托派分子要求把大中小企业一律收归国有，要求在农村实行集体化。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于

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掀起反共和国政府的叛乱。叛乱虽然不久被平息，但使局势更加恶化。5月17日，左派社会党人涅格林组织新政府。新政府整顿军工生产，惩办叛乱头目，解散托派组织，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

1938年春，叛军发动了总攻击。3月初，叛军突破北方的阿拉贡防线，向地中海沿岸推进，切断了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同共和国其他地区的联系。接着，叛军分兵出击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为扭转战局，共和军于7月在埃布罗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鏖战三个多月，歼敌八万余人，但由于人力物力得不到及时补充而被迫转入防御。12月，叛军和干涉军出动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向加泰罗尼亚发动进攻。1939年2月，加泰罗尼亚沦陷。25万共和军越过法国边境后被解除武装。2月27日，英法抛弃了“不干涉”的假面具，宣布承认佛朗哥政权，并与共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3月5日，共和国中央战线司令卡萨多和右派社会党人贝斯泰罗在马德里发动叛乱，推翻了涅格林政府，并要求同佛朗哥进行谈判。佛朗哥拒绝谈判，要求卡萨多投降。3月28日，马德里陷落，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遭受失败。西班牙建立了佛朗哥独裁统治。

美国的中立政策 30年代，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反对干预和卷入其他大陆的战争。他们利用美国人民不愿卷入新的战争的情绪，推动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

1934年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立了以孤立主义分子奈伊为主席的军火调查委员会，调查军火商人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影响广泛的听证会，发表了长达数百页的调查报告，揭露出军火商在战争中牟取暴利的事实与美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和英法相勾结的内幕。奈伊大声疾呼：“上次参战，我们的目标半点也没有达到”。奈伊委员会的活动进一步煽起了美国人反对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情绪，而且使美国人民相信，必须执行严格的中立政策来防止美国卷入欧洲战争。国务卿赫尔说：奈伊的活动“给孤立主义者一个跳板，引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中立法”。美国国会经过长时期的辩论之后，于1935年8月31日，即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前夕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案。法案规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外国之间发生战争，或战争在进行之中，总统应宣布此项事实，宣布之后，凡以军械、军火、或战备物资，自美国之任何地方，或其属地之任何地方，输出而运至该交战国之任何港口，或运至任何中立国港口以备转运至任一交战国，或运至任何交战国所利用之任何中立国港口者，均为违法。”法案还禁止美国船舶运载军用品至交战国和美国公民乘交战国船只旅行，但不禁止其他物资包括战略物资出口。法案有效期到1936年2月29日。罗斯福总统在签署法案时提出警告说，无区别的武器禁运可能会事与愿违，把美国拖入战争。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0月5日，罗斯福援引《中立法》，宣布对交战双方实行军火禁运。由于禁运不包括原料和战略物资，因此它有利于工业较发达的意大利，而不利于没有军火工业的埃塞俄比亚。因为前者可以利用从美国进口的原料和战略物资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而后者没有力量自行制造现代化武器。由于舆论的压力，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5年11月5日发表声明，宣布实行“道义禁运”，规定向交战国出售的物资数不得超过平时的贸易数，并宣布向交战国出售石油和铜等战略物资是违反中立法精神的。但是美国并没有严格执行“道义禁运”。11

月，美国对意大利的石油出口等于平时的三倍，对意属东非的石油出口等于平时的六倍。罗斯福承认：“我们的中立法案执行起来可能很不平均，很不公平——可能实际上援助侵略者，而对于被侵略者则拒绝援助。”

1936年2月底第一个中立法期满时，美国国会随即通过了第二个中立法案，将第一个中立法的有效期限延长至1937年5月1日，并增加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条款。此外还授权总统决定外国的战争状态是否存在和是否实施中立法。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随即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8月，美国政府宣布“不干涉”政策，禁止将军火运往西班牙。9月，美国政府拒绝了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关于输出武器给西班牙共和国的要求。1937年1月8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关于对西班牙武器禁运的联合决议。决议规定：“在西班牙现有内战状态存在期间，自本决议批准之日起，不得非法将武器，弹药或作战工具从合众国的任何地点或合众国的属地输至西班牙或输至其他任何外国以便转运至西班牙或供西班牙敌对双方任何一方之用。”决议于当日批准。4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第三个中立法——永久中立法。该法除前两个中立法规定的内容以外，又规定中立法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授权总统判定战争状态之是否存在，不仅有权禁止武器，而且可以禁止任何货物输往交战国或内战国。美国的中立政策有利于佛朗哥叛军，而不利西班牙共和政府。因为：

第一，美国不禁止佛朗哥叛军从自己手里购买石油和各种燃料。据统计，西班牙内战期间，叛军从美国得到的石油和燃料逐年增加，1936年34.4万吨，1937年42万吨，1938年47.8万吨，1939年62万吨。叛军所需石油总计有75%以上是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第二，美国不禁止叛军的支持者德意法西斯购买自己的武器。这样，美国的武器就通过德意法西斯源源不断地流入叛军手中。罗斯福承认：“佛朗哥的飞机在巴塞罗那平民的头上投下了美国制造的炸弹，这些炸弹是由美国厂商卖给德国政府或德国公司而运往德国，然后又转运去给西班牙佛朗哥的。”佛朗哥说：“美国的中立法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姿态。”

从30年代美国在两次局部战争中宣布使用中立法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纵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是美国式的绥靖政策。

苏联争取集体安全的外交政策 30年代初，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德国纳粹党执政，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战争威胁空前加剧。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国成了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它们同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势力之间的矛盾成了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联合起来，挫败法西斯国家的扩军备战行动，扑灭它们不断点燃的侵略战争火焰，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面对新的世界形势，苏联调整了外交战略方针和策略，即由反对和防止英、法、美策划反苏新武装干涉，转变为争取联合英、法、美等非侵略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从支持德国冲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转而支持国联反对法西斯，把维护本国的和平安全纳入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轨道。

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都主动调整了相互间的关系。1933~1935年，苏联先后同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哥伦比亚、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1933年11月，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扩大了自己的国际联系，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威望，推进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苏联认为，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必须在以往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缔结区域性多边互助条约，结成集体安全体系。1933年12月，苏联政府提出了缔结一个包括苏联、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参加的共同防止德国侵略的区域性协定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参加国联。这是苏联外交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日本和德国相继退出国联，凡尔赛体系濒于崩溃之际，法国希望苏联进入国联，为这一国际组织注入新的活力。在法国的倡议和推动下，1934年9月15日，国联30个会员国联名邀请苏联参加国联。9月18日，国联以38票对3票的绝对多数赞成接纳苏联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苏联在加入国联时发表声明，反对国联推行的殖民主义的委任统治制度，并对国联以往的有关决议和没有苏联签字的条约不承担责任。

1934年2月出任法国外交部长的巴尔都，主张联合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各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共同遏制法西斯德国的扩张。在此背景下，苏法两国外长进行了谈判，于6月底拟订“东方公约”的草案。草案提出签订两项相互联成一个体系的互助协定，即苏联、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互助公约和苏法互助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应自动向遭受进攻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还规定，苏联接受洛加诺公约，充当此公约的保证国，而法国则作为东方公约的保证国。法西斯德国立即察觉到公约会束缚自己的侵略手脚，于1934年9月10日声明拒绝缔约。接着，罗马尼亚、波兰拒绝参加。英国开始采取抵制立场，后来在持保留条件的前提下同意给予支持。10月9日，巴尔都在马赛欢迎来访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同后者一起被刺死。此后，缔结东方公约的谈判实际被搁置下来。1935年3月16日，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关于限制德国武装的军事条款，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给法国以极大震动，联苏抗德的舆论重新高涨。苏联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在东方公约不能缔结的情况下，于1935年3月29日正式向法国政府提出缔结互助条约的建议。4月15日，苏联向法国提交了条约草案。5月2日，苏法两国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当苏联或法国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无端侵略的对象时”，两国应“立即相互进行支援和协助”。关于“欧洲国家”一词，是应法国的要求而写上的，意在表明法国不承担援助苏联抗击日本侵略的义务。

5月16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签订了互助条约。此条约内容同法苏互助条约相同，但在附加议定书中有一项规定，只有当法国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时，条约参加国才相互进行援助。这一条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要求而写上的。贝奈斯总统说，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捷克斯洛伐克“不愿把自己的政策的方向从西方转到东方”，“不愿单方面与俄国联系”。实际上这一条也反映了苏联不愿单独卷入对德战争和让英法“祸水东引”阴谋得逞的意愿。

这两个互助条约本来可以在遏制德国扩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三国如果真能联合起来，就会对德国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而苏法两国实力的总和又超过德国。但是法国统治集团没有履行条约义务的诚意。法苏条约签订当月，法国外长赖伐尔在华沙参加波兰总统毕尔苏斯基的葬礼时，公开对戈林说，法苏同盟是一出“滑稽剧”，是一张不值得重视的废纸。他又对波兰

外长贝克说，签订法苏条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法苏互助反对侵略，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德苏接近。由于法国的这种态度，致使条约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形成 德、意、日三国都是法西斯国家，都要求改变现状，重新瓜分世界，这是促使它们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逐步勾结起来和结成联盟的政治基础。

30年代中期前，德意在重新瓜分世界问题上曾存在尖锐的利害冲突。意大利企图统治巴尔干，控制东非和红海，变地中海为“意大利内湖”，实现复兴“大罗马帝国”的迷梦。这与德国企图称霸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野心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对亚得里亚海、巴尔干、多瑙河流域，特别是在对奥地利的争夺问题上。奥地利是中欧的心脏，希特勒早就怀有把德奥合并起来的野心。意大利在奥地利也拥有经济权益，一直把奥地利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野心保持高度警惕。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后，意大利于1934年2月17日同英法政府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要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地位。同年3月17日，意、奥、匈三国签订《罗马议定书》，为发展三国间的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的规定。7月25日，希特勒策动奥地利纳粹分子发动叛乱，刺杀了总理陶尔菲斯，企图乘机吞并奥地利。意大利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并派出四个师加强意奥边界，警戒希特勒准备入侵奥地利的行动；9月27日，又和英法发表联合宣言，宣布“1934年2月17日关于有必要依照有关的条约维持奥地利的独立完整的宣言仍保持其全部效力并将继续为三国共同政策的根据”。1935年3月，德国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奥地利的独立岌岌可危。4月，意大利和英法在斯特莱沙开会，通过关于欧洲问题的决议，宣布“承认维持奥地利独立和完整的必要性应继续为三国共同政策的基础”。促成德意关系转变的契机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德意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英法采取不彻底的制裁行动，而德国则公开支持意大利。同时，意大利为了在夺取英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问题上获得德国的支持，也逐步改变了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态度。于是，德意关系大大改善。两国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使双方的立场进一步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感到有必要调整关系，以便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进一步加紧合作，共同对付民主国家。

1936年10月，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应邀访问柏林，同希特勒和德国外长牛赖特等进行了会谈。25日，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德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意大利答应在埃塞俄比亚给德国以特权；两国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两国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对“不干涉”政策采取共同立场；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的方针；两国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空军。11月1日，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表演说，称这个协定标志着“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罗马和柏林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欧洲国家应当围绕这个“轴心”进行合作。“柏林—罗马轴心”由此得名。德意“轴心”的建立，标志着法西斯国家在建立侵略集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德意接近，建立“轴心”的同时，德国和日本也加紧了勾结。1936年5~6月间，日本驻德武官同德方开始举行关于缔结政治盟约的谈判。“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国内进一步法西斯化，外务省同军部协调关系后，指示驻德大使加紧同德方谈判。1936年7月上旬，德方正式向日方提交《反共产国际

际协定》草案文本。11月25日，两国正式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诬蔑共产国际干涉各国内政，“威胁全世界的和平，”规定：“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施，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施”；“缔约国对于因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国内安宁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旨趣，采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请其加入本协定”。此协定还带有一个直接针对苏联的秘密附件。附件规定：“遇缔约国一方无故遭受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在协定有效期内，两缔约国约定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

《反共产国际协定》不仅是针对苏联，而且主要是针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德日之所以要打出反共产国际的旗号签订协定，是为了迷惑西方民主国家，避免与它们过早直接对峙。里宾特洛甫在协定签订后便表示：“形式上我们还要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然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应该把英国当作主要敌人。”希特勒对他的亲信说：“我必须……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幽灵来遏止凡尔赛诸国，要使他们相信，德国是反对赤祸的决定性堡垒。这是我们渡过危机，摆脱凡尔赛和约和重新武装的唯一方法。”

希特勒为了把意大利拉进《反共产国际协定》，邀请墨索里尼于1937年9月访问德国。希特勒恭维墨索里尼是“少数的时代孤客之一”，“历史考验不到他们，他们自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勾结起来，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

建立法西斯侵略集团是希特勒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略部署。他曾宣称：“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进行战争。”随着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形成，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愈来愈迫近了。

第二节 帝国主义的慕尼黑阴谋

德国吞并奥地利 由于英、法推行绥靖政策，希特勒采取的毁约扩军措施都如意得逞，加上法西斯侵略集团已经形成，于是决定加速实现“大德意志”的计划，向欧洲心脏地区进军，首先是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1937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再次爆发了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下降了16%，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法西斯国家由于已经转上战时经济的轨道，因此受的影响较轻，但出现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军火工业畸形发展的现象。经济危机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激化了它们之间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进一步促使法西斯国家加快了重新瓜分世界的侵略扩张步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走了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阶段。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开有主要军政头目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亲自作了准备发动欧洲战争的部署。希特勒说：“德国的前途完全决定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这个“生存空间”“不是在遥远的非洲或亚洲的殖民地，而是‘在德国近旁’的欧洲心脏地带”；“最迟在1943~1945年时期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如果法国发生严重内讧或“被牵连在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中”，则“在1943~1945年以前采取行动”；“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这次军事会议是纳粹德国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

吞并奥地利是希特勒实现其征服欧洲计划的第一步，因为这既可以打开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又获得通往东南欧和巴尔干的通道。当时奥地利有700万人口，主要是讲德语的民族。希特勒利用这点，极力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扶植奥地利法西斯组织。1934年7月25日，希特勒策动奥地利法西斯匪徒发动叛乱，杀害总理陶尔菲斯，企图乘机吞并奥地利。但由于遭到英、法、意的反对而未能得逞。这次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希特勒的一种试探。因为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条约都规定，德国应承认并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英、法、意则负有保证奥地利的独立不受侵犯的义务。通过这次试探，希特勒只得等待时机，并为侵奥创造新的条件。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希特勒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以及共同支持西班牙佛朗哥叛军而加深了同意大利的勾结，终于形成“柏林—罗马轴心”，并使意大利同意德奥合并。

在英国，1937年5月上台的张伯伦保守党政府，加紧推行对德绥靖政策。他们认为只有修改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在中欧满足德国的部分领土要求，划东欧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才能保障欧洲和平。为了便于放手推行绥靖政策，张伯伦上台不久就撤换驻德大使，将主张对希特勒的扩张行动保持高度警惕的菲普斯撤职，换上亲德分子汉德逊。张伯伦要他“与纳粹政府全力合作”。汉德逊为纳粹德国大唱赞歌，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德国和英国那样更诚挚地保障欧洲和平事业的了”，并公开表示“奥地利应并入德国”。汉德逊以“纳粹大使”闻名于世。1937年11月，张伯伦派他的亲信掌玺大臣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哈利法克斯在同希特勒会谈时，对希特勒的反共“功勋”大加赞颂。他说：“元首不仅在德国内部已有很多的建树，并且由于消灭本国共产主义的结果，元首就阻塞了共产主义向西欧发展的道路，因此德

国有权被认为是西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希特勒要求改变凡尔赛条约所确定的现状时，哈利法克斯表示：“凡尔赛强制条约的错误必须加以纠正。英国过去本着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也始终表现了自己的影响”；“所有其余一切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关于大概迟早定会发生欧洲秩序变更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指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言。英国所关心的只是这些变更必须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

通过这次同张伯伦私人代表的会谈，希特勒深信英国不会以武力反对德国在中欧的扩张，而法国没有得到英国支持的保证，也决不会对德作战。与此同时，法国总理旭丹在接见德国代表时也表示赞同德奥合并。德国亦把吞并奥地利的意向明确地告诉了访问柏林的美国驻法大使布立特，而美国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希特勒摸清了英、法、美的软弱态度，深信吞并奥地利的时机成熟了。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交给他一份炮制好的“协定草案”，要求奥地利政府立即取消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释放全部被监禁的纳粹分子，保证纳粹党的宣传鼓动自由，以及任命奥地利纳粹党头子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等。希特勒对许士尼格威胁说：“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三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就要下命令向奥地利进军。”许士尼格试图凭借英法支持而反抗。他说：“我十分清楚你能够入侵奥地利，不过总理先生，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样做意味着流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立的，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当即回答说：“片刻也不要认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阻挠我执行我的决定。意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极其密切的友好关系使我和意大利站在一起。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在希特勒的威胁下，许士尼格被迫屈服。2月16日，奥地利政府进行改组，赛斯-英夸特等纳粹分子在政府中身居要职。同时，对纳粹分子实行大赦，连1934年枪杀陶尔菲斯总理的凶手也被释放。

在面临亡国危险的形势下，奥地利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救亡浪潮，维也纳等地百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政府抵抗侵略。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许士尼格于3月9日宣布在3月13日就是否赞成奥地利独立问题举行全民投票。3月11日，德国向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取消全民公决，要求许士尼格辞职和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政府总理。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在纳粹分子的胁迫下全部接受了这些要求。3月12日拂晓，德军越过边界，入侵奥地利。翌日，赛斯-英夸特政府决定将奥地利并入德国。3月14日，希特勒签署了奥地利同德国“联合”的文件，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个省——东方省，赛斯-英夸特任省长。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英法两国政府曾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希特勒明白英法无意认真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干脆宣称德奥关系是“德意志人民的内部问题，与第三者无关”，拒绝了英法的抗议。4月初，英、法、美三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撤回了各自驻奥使馆，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

苏联坚决谴责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3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这次侵略行为“发生在欧洲中部”，“它不仅危及今后与侵略者毗邻的11个国家，而且危及全部欧洲国家，甚至欧洲以外的国家”，“出现了发展成为新的国际冲突的危险”。声明表示：“苏联政府同意与其他大国一道，立即在国联以内或国联以外讨论形势迫切要求采取的措施。”声明说：“事到明天，可能就已经晚了，但是只要一切国家，特别

是大国，对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毫不含糊的立场，那末今天还不算晚。”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这样，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不受惩罚地吞并了奥地利，顺利地迈出了他征服欧洲计划的第一步。

苏台德区问题与五月危机 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就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工业发达，资源丰富。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谁控制了波希米亚，谁就控制了欧洲。”对纳粹德国来说，捷克斯洛伐克既是向巴尔干扩张的桥头堡，又是进取东欧和攻击苏联的前哨基地，是称霸欧洲大陆的必争之地。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1500万人口中，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族共占950万，其余55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有320万德意志人，大多居住在苏台德区。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利用民族问题占领苏台德区。1933年，希特勒在苏台德区扶植纳粹分子康拉德·汉莱因建立了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希特勒指使汉莱因要不断地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保持紧张局势，以便为他制造入侵的借口。

1938年4月24日，汉莱因在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八点纲领，要求苏台德区完全“自治”，所有官员均由德意志人担任，释放被关押的纳粹政治犯，政府改变同法国、苏联结盟的政策，转而与德国外交“协调一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汉莱因举行谈判，同意释放纳粹政治犯，但拒绝了让苏台德区完全“自治”的要求。5月中旬，汉莱因中断了同政府的谈判，前往德国。希特勒立即进行武力威胁。5月19日，他调动四个摩托化师向德捷边境集结，企图用武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服。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人民反法西斯的抗议运动的推动下，立即发布局部动员令。双方军队在边境集结对峙，形势骤然紧张。这就是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五月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于奥地利，它具有较好的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条件：第一，工业发达，工业生产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七位；第二，拥有比较发达的军事工业和比较完善的国防体系，以及35个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陆军师，捷德边境筑有坚固的山地工事“捷克马奇诺防线”，加以地势险峻，被称为“中欧抵御纳粹的要塞”；第三，处于欧洲中心，战略地位重要，受到国际上不受侵犯的保护，被认为是欧洲有最完整、最牢靠的条约保障的国家。2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成了小协约国的同盟关系，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1935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同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法捷条约规定，当一方受到无端攻击时，另一方将立即进行援助。苏捷条约则规定，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只要法国给予援助，苏联将立即援助。为支持这两项条约，1935年又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这就是说，德国一旦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只要法国履行条约义务，加上法国同英国的传统关系，就有可能形成英、法、苏、捷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局面。

“五月危机”爆发时，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它将履行苏捷互助条约的义务，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英法急于设法平息可能发生的捷德武装对抗。它们一面警告纳粹德国不要动武，一面压捷克斯洛伐克让步。5月21日，法国外长庞纳接见英、苏大使后宣布，如果德军越过捷边界，法国将立即驰援其盟国。达拉第在接见德国大使时，指着办公桌上的动员令说：“阁下，我

是否签署这个文件，将取决于您。”英国则表示，如果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的条约义务，英国政府不能担保在事件的压力下它自己不会介入。与此同时，德军参谋部也提出警告说，德国的军事机器能够在不抵抗的条件下进军奥地利，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甚至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得不暂时退了回去，命令在德捷边界集结的德军撤离，并指示汉莱因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同政府进行谈判。希特勒制造的“五月危机”破产。

慕尼黑协定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五月危机”后，希特勒下令修改代号为“绿色方案”的侵捷计划，决心“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行动日期最迟在1938年10月1日。为了达到顺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目的，希特勒加紧对英法进行讹诈。“五月危机”时，英法虽有过某种强硬的表示，但并没有放弃绥靖政策。英国在表态可能介入的第二天，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密令驻法大使菲普斯约见法国外长，警告他不要夸大英国对德国警告的含义。菲普斯说，英国将永远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将（同法国政府）一道立即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去保护捷克斯洛伐克，防御德国的侵略”。8月3日，张伯伦派英德亲善协会主要成员伦西曼勋爵到布拉格，以“非官方身份”充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苏台德德意志党人之间的“调解人”。名义上是进行调解，实际上是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让步。法国则表示，它将“接受并支持英国”可能提出的有关解决苏台德问题的任何计划。迫于英法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同意苏台德区实际“自治”。但是，这种妥协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欲，苏台德区问题只不过是希特勒侵吞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借口。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上帝创造700万捷克人，并不是为了要他们来监督、欺负、侮辱350万德意志人的”，并咒骂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是“凡尔赛的政治家们设计的一个畸形儿”。希特勒公开宣称，在目前情况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范围内用自治来解决争端，显然是不够了。当晚，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党徒发动叛乱，但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镇压，汉莱因逃亡德国。德军大规模地向德捷边境集结，制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九月危机”。

9月15日，张伯伦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办法”，飞往德国与希特勒会晤。会谈中，希特勒威胁恫吓，咄咄逼人，正式要求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张伯伦表示自己同意德国的要求，但需要回去同英国政府和法国磋商。9月18日，英法两国政府在伦敦举行会谈，一致决定要捷克斯洛伐克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翌日，英法联合照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捷将德意志居民超过50%的地区割让给德国。照会威胁说：“如果不将上述地区立即移交德国，和平的维护和捷克斯洛伐克切身利益的安全，便不可能获得切实的保障。”

英法的照会引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巨大的愤怒。9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复照英法，断然拒绝了它们的无理要求。21日凌晨，英法驻捷公使把贝奈斯总统从床上叫起，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强令收回原来的答复，并威胁说，如果不立即接受英法的建议，那末，捷克斯洛伐克就要在全世界面前对因此而引起的战争负全部责任，届时，“英国将置身事外”，法国“将不履行它的条约义务”。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终于屈服。当天下午，照会英法政府，接受英法建议。当晚，贝奈斯总统在对国民的讲话中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情激愤。9月21日，布拉格 25

万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英法建议，发布总动员令，不让德军开进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爱国官兵也坚决要求抵抗。哈查政府被迫辞职。西罗夫将军的新政府在人民力量的推动下，宣布全国总动员。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奋起准备保卫祖国的时候，9月22日，张伯伦带着英法的计划再次飞往德国，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会晤。张伯伦满以为这下子可以达成他们的政治交易了。但是贪得无厌的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没有什么用处了。他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要由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其余地区也要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此外，捷克斯洛伐克还要把一些领土割让给波匈两国。9月23日，希特勒把一份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在9月28日前完全让出苏台德区的备忘录和一张德军要实行军事占领的地区的地图交给张伯伦。经张伯伦的请求，希特勒最后作了“生平很少有的让步”，答应把完全让出的日期改为10月1日。

9月24日，张伯伦回到伦敦，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转达了希特勒的各项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极为愤慨，掀起了强大的抗议浪潮，要求政府抵抗侵略。9月25日，捷政府答复英国政府，表示拒绝希特勒的要求，并在全国进行总动员。

在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纳粹德国侵略的形势下，苏联重申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心。为了履行对捷条约的义务，苏联决定向西部边境集结30个步兵师，并命令空军和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联还建议法、捷、苏三国参谋部立即会晤。在英法，强硬派反对向希特勒屈服。在这种形势下，两国政府也摆出某种强硬姿态。9月25日，法国政府宣布，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法国将履行对捷条约义务。翌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如果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将“与法国站在一起”。27日，英国的舰队实行动员。伦敦开始挖掘防空壕，并向居民分发防毒面具。法国也实行局部动员。伦敦、巴黎开始疏散居民。两国政府制造战争仿佛一触即发的气氛，其主要目的是借此恐吓本国群众，以便使他们相信，如果不再向希特勒妥协，战争即将到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他们顺利推行绥靖政策服务。情况确是如此，9月27日晚，张伯伦发表广播演说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他还说：“我将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去作第三次访问，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同一天，张伯伦两次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要求他接受德国人的“某种有限度的军事占领”，并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了遭到武力侵略和武力肢解外，将别无其他出路。”9月28日，张伯伦分别写信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建议立即召开有英、法、德、意、捷五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张伯伦对希特勒保证说：“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9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希特勒和贝奈斯写信，呼吁他们进行谈判。27日，罗斯福又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写信，建议立即举行由与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直接有关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9月28日下午，希特勒分别致电英、法、意三国政府首脑，邀请他们次日来慕尼黑举行会谈。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苏联未被邀请，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亦没有代表参加，而是处于被裁决的地位。在会上，墨索里尼提出了一个建

议，这个建议实际上是由德国起草的，只不过以意大利的名义提出。张伯伦和达拉第立即表示赞同这个建议。9月30日凌晨，四国通过了以意大利建议为基础的协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简称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原则上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连同上述地区的一切建筑和设施移交给德国；德军从10月1日起分阶段占领德意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在德意志居民是否占居民多数尚不能确定的地区，由四国代表组成的国际机构占领，再通过公民投票以确定其归属；由国际委员会最后确定边界。慕尼黑协定附件规定：英法将保障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不受侵犯；德国和意大利允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

协定签订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被叫进会议厅，由张伯伦向他们宣读协定的内容，并交给他们一张地图，责令立即执行。9月30日上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高压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慕尼黑协定。10月中旬，由英、法、德、意、捷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决定，德意志居民是否占多数尚不能确定的地区亦取消公民投票，将其直接移交给德国。德国不费一兵一卒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1.1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半左右的工业实力。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它的国防线被完全摧毁了。

9月30日，张伯伦同希特勒签署了一项《英德宣言》，声称“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作战”。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时，挥舞着这纸“宣言”，洋洋得意地宣称：“我们这一代的和平已经得到了保证”。12月6日，法德也签订了类似的宣言，宣称两国将保持“和平和善邻的关系”，“庄严地承认”两国之间目前的疆界乃是“确定的疆界”。实际上，这些宣言不过是一纸空文。

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国主宰小国，牺牲弱小国家利益进行妥协的一次交易，是绥靖政策登峰造极的表现。

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加速了它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协定签订后仅仅21天，希特勒就发布了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令。1938年10~11月，德军占领苏台德区。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丰富的矿藏和发达的工业全部落入德国手中，并使英法在未来对德作战中减少了三十多个盟军师的兵力，从而大大改善了德国的战略地位。

第三节 英法苏谈判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大战迫近与英法苏外交政策的初步调整 慕尼黑会议及协定鼓励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1938年10月，德国向波兰提出要求：收回但泽市，并在波兰走廊修筑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德国享有两路的治外权。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22日，占领了立陶宛的麦默尔。3月24日，希特勒密令三军作好占领但泽的准备。5月22日，德意缔结《钢铁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受到外来威胁时，另一方应在政治和外交上给以全力支持；如果缔约一方同另一国或数国发生战争，另一方应立即以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与空中予以援助。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慕尼黑会议以后希特勒的一系列侵略扩张行动，使中欧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重大变化，严重损害了英法的利益。慕尼黑政策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同时从1939年1月起，英法政府得到情报，希特勒将首先进攻西方，而不是苏联。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张伯伦政府意识到一味妥协退让不能使希特勒放弃侵略，要保持英国的霸权地位，必须适当调整外交政策，在对德妥协、姑息的同时，加以必要的遏制和对抗。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三天，即1939年3月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认为再也不能和希特勒进行谈判了。以前英国宣称“我们的边界在莱茵”，对中欧和东欧避免承担义务，而现在则采取主动介入的态度。张伯伦声称：英国不是不关心东南欧发生的事态，如果出现希特勒挑战，英国将与其他国家一起“予以抵抗和制止”。3月21~22日，英法两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谈，商讨在对德战争中两国相互支援的问题。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说：“只要纳粹分子还在执政，欧洲和平的希望就是渺茫的。”两国外长认为，在对德战争中，波兰有着突出的重要意义。法国要求，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应在一定时期内提供援助。英国答应了法国的要求。3月22日，英法双方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在战时相互支援的协议。两国虽然没有正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但实际上已形成了军事同盟关系。3月31日，在同法、波政府协商后，张伯伦宣布对波兰提供安全保证。4月6日，英国同波兰缔结了互助条约，把单方面保证变成了双边互助协定。法国也重申忠于法波同盟的义务。4月13日，英法对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安全保证。5月12日，英国同土耳其缔结了互助协定。随后法国也同土耳其缔结了同样的协定。英国还对荷兰、丹麦等国提供安全保证。英法都加强了战备，英国国会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在对苏政策方面，张伯伦政府在国内强硬派要求同苏联结盟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改变不与苏联进行任何合作的僵硬态度。由于英法仍然是绥靖派人物张伯伦和达拉第执政，因此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极为有限。

慕尼黑阴谋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是对欧洲集体安全运动的一种反动。慕尼黑会议后，侵略战火逐渐燃向苏联国境，西方国家又极力散布“俄国军队软弱无力”，希特勒“要东进夺取乌克兰”的流言，更使斯大林对英德勾结的危险提高了警惕。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努力受挫，英法极力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的情况下，苏联对外交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逐渐把防止德国法西斯首先进攻自己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

慕尼黑会议后英、法、苏外交政策的这种调整，使 1939 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欧洲舞台上，出现英法苏谈判、英德秘密谈判和苏德谈判三项交叉的外交活动。这三项谈判目的不同，内容相左，无论哪项谈判取得成功，将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事业产生极其不同的影响。

英法苏谈判及其失败 从 1939 年 4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英、法、苏三国进行了关于缔结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的谈判。这是一次为世人关注、极为重要的谈判，因为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问题。

在三国正式谈判之前，英苏之间从 3 月中到 4 月初进行了前奏性的谈判。1939 年 3 月 18 日，英国在得到德国将进攻罗马尼亚的报告后，要求苏联在罗马尼亚遭受侵略时给予援助。当天晚上，苏联建议召开苏、英、法、波、罗、土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商讨采取共同行动制止德国侵略的问题，但为英国所拒绝。3 月 21 日，英国建议英、法、苏、波四国发表共同宣言，宣布一旦欧洲某一国遭受侵略时，四国将立即讨论共同抵抗侵略而应采取的步骤。次日，苏联表示赞同。4 月 1 日，英国以波兰拒绝参加为借口，宣称“关于宣言的问题已经过去了”。

从 4 月中旬起，英、法、苏三国开始了关于缔结互助条约的正式谈判。4 月 15 日，英国要求苏联单方面发表声明，许诺一旦与苏联相邻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遭受德国侵略而请求援助时给予援助，但英国并没有作出在苏联遭受德国侵略时给予援助的许诺。同一天，法国则建议同苏联根据对等原则达成协议，即：如果法国因援助波、罗而同德国发生战争，苏联立即向法国提供援助和支持，反之，苏联如果因援助波、罗而同德国发生战争，法国亦将立即向苏联提供援助和支持。4 月 17 日，苏联向英、法建议缔结一个为期十年的三国互助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一方受到德国侵略时，其他缔约国应立即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三国共同保障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和苏联相邻各国的安全；三国应尽快确定在上述情况下进行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方式；三国同时签订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抗德战争开始后，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德国媾和。英法对苏联的建议迟迟不作答复。直到 5 月 8 日才收到英国的复文。复文提出，当英法履行对比、波、罗、希、土等国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苏联应立即给予援助，但却避而不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遭受侵略时英法是否给予援助的问题。5 月 14 日，苏联复照英国政府，指出英国的建议置苏联于不平等地位，坚持必须以苏联 4 月 17 日建议为基础缔结互助条约。英国朝野对张伯伦的态度强烈不满。丘吉尔责问张伯伦说：“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建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我看不出苏联的建议有什么不好……如果你准备在战争中和俄国结盟（这是最大的考验和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你准备在保卫我们曾给予保证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时与俄国结盟，那末，你为什么又害怕现在就同俄国结盟呢？在这个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英国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有 92% 的人赞成与苏联结盟反对纳粹德国。伦敦公众还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同苏联缔结条约。5 月 22 日，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即所谓《钢铁同盟条约》。波兰危机加深，战争危险加大。5 月 27 日，英法向苏联提出一个关于三国互助条约草案的建议。英国放弃了一直坚持要苏联单方面声明承担援助罗、波的义务，同意三国缔结一个反侵略的互助条约，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未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列入三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范围之内，亦没有规定在发生侵略

时，三国必须采取的援助方式和规模，而只规定立即“进行协商”。6月2日，苏联向英法提出新的互助条约草案，规定三国对比利时、波兰、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等八个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其他欧洲国家遭受侵略时，只要被侵略国提出要求，都将给予援助。

为了加快谈判的步伐，三国决定将“远距离交换照会”的方式改为派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直接的谈判。苏联邀请英国外交大臣访苏，以便谈判在高一级进行，但英国只派了一名司长前往。6月15日，英法苏莫斯科谈判正式开始。7月1日，英法代表提出一份关于三国互助条约草案的修正案。英法同意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遭到直接侵略时，同苏联一道向它们提供援助，但是拒绝在这些国家遭受“间接侵略”时向它们提供援助。苏联坚持要求在发生间接侵略时英法必须履行援助义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己见，互不相让，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7月9日，苏联建议不等政治谈判取得结果，立即开始军事谈判。7月25日，英法接受了苏联的建议。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首的，具有签约全权的高级代表团，而英方代表团团长是一名没有全权证书的退休海军上将，法方代表团团长是一名兵团司令，且迟迟于8月11日才到达莫斯科。谈判从8月12日开始。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共同抗击德国的具体计划，表示苏联准备派出136个陆军师和大量空军参战。计划规定，在侵略者进攻英法时，苏联以相当于英法用以抵抗侵略者的70%的兵力投入战场，同时波兰必须参战，并应在本国西部边界投入40个至45个师；如果侵略者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发动进攻，这两个国家应以其全部武装部队投入战斗，而苏联将以和英法参战兵力相等的兵力投入战场；如果侵略者通过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进攻苏联，英法应以相当于苏联在欧洲前线抵抗侵略者的70%的兵力投入战场，波兰也必须参战。英法代表团只空谈军事合作的目标和原则，不提具体方案，不愿承担具体的军事义务。在苏联代表的一再追问下，英国代表表示英国只能派出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另外，由于苏德并无共同边界，因此只有苏联军队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才能给英、法、波、罗以援助。为此，苏联要求波兰、罗马尼亚政府在战时给予苏军过境的便利，但遭波、罗拒绝。8月21日，法国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并以废除法、波盟约为威胁手段，要求波兰同意苏军过境。波兰政府仍拒不同意。苏联也不肯让步。这样，继政治谈判之后，军事谈判又走进了死胡同。

8月21日三国军事谈判开会时，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建议休会。当天深夜，柏林宣布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历时四个多月的英法苏谈判以破裂而告终。英法苏谈判的失败意味着建立西方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反法西斯侵略联合战线的最后努力完全落空。欧洲国际社会失去了一次制止战争避免战火的最后契机。

英德秘密谈判 在英法苏谈判期间，英国同德国进行了秘密谈判。1939年5~7月，英国政府官员同来英国访问的德国霍恩洛厄亲王就英德合作和重开谈判的问题频繁接触。6月，英国政府首席工业顾问威尔逊同德国《四年计划》专员沃塔特在伦敦举行密谈，双方讨论了英德经济合作的广泛前景。接着，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等同德国外交部官员佐尔茨进行了会谈。佐尔茨认为，英国“确实愿意在对东欧的保护问题上向德国作出让步，使德国可以在同东欧的经济关系中自由行动。”他还说：张伯伦“自从出任首相以

来，一直认为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通过柏林—伦敦这条线”。7月18日~21日，威尔逊和英国外贸大臣赫德森分别同沃塔特在伦敦举行会谈。7月29日，英国工党国会顾问巴克斯顿同德国驻英使馆参赞科尔特密商。8月3日，威尔逊会见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在谈判中，英国提出了同德国合作的纲领，主要内容是：德国尊重英帝国的权益；把东欧和东南欧划作德国的势力范围；两国就世界市场和原料、殖民地等问题进行谈判，划分势力范围；缔结英德互不侵犯条约和互不干涉协定。英国还提出，一旦实现英德合作，英国将中止同苏联的谈判，解除对波兰、土耳其等国提供保证的义务，并促使法国取消法苏互助条约。迪克森在8月3日给柏林的报告说：“这里有种占优势的印象，认为近几个月来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联系，不过是对于同德国实行真正妥协的一种手段，只要那个唯一重要和值得努力实现的目的——一旦达到，即同德国一旦成立协定，那时这一切联系便化为乌有。”

但是，长达四个月的英德秘密谈判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因为英德矛盾尖锐，难以调和。英国想和德国划分势力范围，但纳粹德国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绝不会同意和英国平分秋色。其次，希特勒先占波兰，后攻英法的战略方针已定，而这时之所以和英国谈判，其目的是破坏英法苏三国谈判，同时继续麻痹对方，为发动侵略战争创造有利条件。显然，这时的谈判没有任何诚意，他不会打乱战略计划，和英国达成协议。第三，德国侵占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英国国内反对绥靖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种政治气氛不允许张伯伦搞“第二次慕尼黑”。

英德秘密谈判是导致英法苏谈判破裂的原因之一，英德谈判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说明德国的侵略胃口已经远远超出英国绥靖主义者所能作出的妥协让步，英德矛盾难以调和，在未来战争中必将两军对垒。

苏德谈判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9年3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苏联面临着极其复杂和险恶的国际形势：第一，德国把侵略矛头指向波兰，战火即将蔓延到苏联的边境；第二，在东方，日本在1939年5月向苏联寻衅，挑起诺蒙坎事件，苏联军队正在同日军进行激烈的局部战争；第三，张伯伦政府没有完全放弃绥靖政策，但又被迫改变不与苏联进行任何联合的僵硬态度；第四，希特勒要称霸欧洲大陆，其战略方针可以先东后西，也可以先西后东。他看到英法两国军事准备不足和对德软弱的态度，决定先进攻英法。为了避免在同英法作战时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希特勒决定对苏联作出重大让步，使苏联保持中立。面对这种形势，苏联为击破英法祸水东引的阴谋，避免首先卷入同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改善两国关系的外交试探采取灵活的策略对待。苏联在与英法谈判的同时，又同德国进行了秘密谈判。

早在1938年12月~1939年2月，根据德国的倡议，苏德之间就缔结贸易信贷协定问题举行谈判。1939年4月17日，苏联驻德大使前往德国外交部会见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时，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几乎没有影响同意大利的关系，它也不应该成为苏德关系的绊脚石”。5月26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指示驻苏大使舒伦堡向苏联明确表示：不存在德国“向乌克兰扩张的任何企图”，不管波兰问题怎样解决，德国“对俄国的利益将给予尽可能多的考虑”；德国认为“德苏之间在外交事务方面并不存在实际的利害冲突”，“德苏两国外交关系缓和与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到来”。此后，苏德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曾一度中断。7月下旬，英、法、苏决定举行军事谈判，

德国担心它们会结成军事联盟；同时，德国实施“白色方案”的时间也日益迫近，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希特勒决定对苏联作出重大让步。7月29日，德国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给舒伦堡大使一封密信，要求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试探对德国完全改变其东方政策一事的反应，如莫洛托夫的态度有所松动，就进一步向他表示：“不论波兰问题如何发展，我们都准备……保全苏联的利益并且同莫斯科达成谅解。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上，如果谈判进行得顺利的话，也可以提出，我们将调整我们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以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8月3日，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舒伦堡说：“德国方面希望改善德俄关系，……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加以解决，使双方都感到满意。”当时苏联仍然寄希望于与英法结成反法西斯侵略联盟，因此对德国仍然采取了冷淡的态度。8月10日，德方人士告诉苏联驻德代办，只有在战争爆发前缔结德苏协定，苏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8月14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转告莫洛托夫，德俄关系已经“面临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他准备亲自到莫斯科作一次短期访问，“以元首的名义向斯大林先生提出元首的意见”，“为德俄关系的最后解决奠定基础”。这时，英、法、苏军事谈判进行还不到三天，于是莫洛托夫以准备不充分为理由加以婉拒。8月17日，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并对他说，德国准备同苏联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同苏联一起对波罗的海各国作出担保。在会见时，莫洛托夫把苏联复照交给舒伦堡，建议首先缔结商业和贷款协定，然后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共同保障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并要求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以改善日苏关系。8月19日，苏德签订贸易贷款协定。8月20日，希特勒亲自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最迟于8月23日让里宾特洛甫赴苏联签订条约。这时，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因“过境权”问题陷入僵局，于是苏联决定接受德国要求，同意里宾特洛甫来苏进行政治谈判。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写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随即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于当晚签订了为期十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彼此保持联系，以便对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进行协商”；“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议定书对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界限作了规定：“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为界”；“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对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解除了苏联长期以来对英法搞“祸水东引”的忧虑，使苏联得以暂时置身于战火之外。但是，苏联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建立集体安全的努力，同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订约，也带来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它模糊了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认识，混淆了侵略和被侵略的界限，削弱了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斗争。苏

联自己最终也深受德国毁约，突然袭击之害。至于条约所附秘密议定书涉及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它粗暴践踏了小国的基本民族主权，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行为。德国利用反法西斯国家间的矛盾，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其免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为它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开始，到 1945 年 9 月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结束，历时整整六年。它经过法西斯国家的战略进攻，交战双方攻守互易的战略转折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最终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这场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当时中国人一般称它为“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全球，把六十多个国家、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了战争的旋涡。这是一场真正的世界性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大战的爆发及其初期阶段

德国入侵波兰和英法对德宣战 1939年8月31日晚，一支穿着波兰陆军制服的德国党卫队“袭击”了靠近波兰的德国边境城镇格莱维茨，“占领”了该城的电台，并用波兰语广播了反德声明，宣布“清算敌人——德国的时刻到了”。希特勒借口德国受到了“侵略”，命令德军于9月1日向波兰发起进攻。波兰被迫迎战。当天，英法政府照会德国，要求德国停止对波兰的进攻，撤出军队，否则，两国将“毫不犹豫地履行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德国根本不加理睬。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加拿大也相继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1日凌晨，德军出动57个师约150万兵力、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分南北两路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波兰拥有100万左右的兵力、800多辆坦克、400多架飞机。力量对比，波兰处于劣势。同时，波兰全部42个师中，真正作好战斗准备的不过30个师，后备队没有集中，许多飞机驾驶员都不在机场。德军采用闪电战术，首先派出大批飞机偷袭机场，摧毁了波方的大部分飞机，并对波兰的战略中心、交通枢纽和指挥机构进行猛烈轰炸。德军各个集团军以坦克为先导，在航空兵支援下，发起攻击。波兰政府领导军民拼死抵抗，但敌不住德军的进攻，不到两天，波军第一线主力就被打得七零八落。

德军突破波军防线后，以每日50~60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突进，从南、北两路向华沙迂回包抄。9月6~7日，南路德军在波克率领下攻克克拉科夫，北路德军在隆斯特德率领下占领波兰走廊，渡过维斯瓦河。9月17日，南北两路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地区会师。波兰政府无力挽回败局，于9月16日撤离华沙，经罗马尼亚，先到达巴黎，后流亡伦敦。华沙军民拒绝投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抗击德军。德军直到9月27日才占领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号称陆军居欧洲第五位的波兰，顷刻之间覆亡了。

波兰迅速沦亡，和没有得到外部援助，孤军奋战有直接关系。作为波兰盟国的英法，当时在西线拥有近110个师，而德国在那里只有23个师。如果当时英法在西线发动进攻，德军将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其结局肯定会对德国不利。但是英法实际上却是宣而不战。从1939年9月大战爆发到1940年4月希特勒在西线展开攻势的七个多月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双方仅限于军队巡逻，偶尔有些小冲突和炮击。这种战争史上的怪现象，被称为“奇怪的战争”或“假战争”、“静坐战”。这是英法长时间以来推行绥靖政策的延续，被迫宣战，不敢真打，只能坐视波兰灭亡，最终自食恶果。

西线战争与法国的败降 希特勒利用英法在西线制造“奇怪战争”的七个多月时间，疯狂地扩军备战，将主力调往西线。德国陆军扩展到156个师，超过英法两国兵力的总和。德军部署在西线的兵力达136个师，准备大举入侵法国。但是，希特勒决定在进攻英法之前，首先闪击北欧，侵占丹麦和挪威。希特勒之所以作出这种决策，其意图是：第一，占领丹麦和挪威，可以打破英法对德国的海军封锁，使德国海军舰艇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北海和大西洋，免遭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海军封锁之苦；第二，占领丹麦和挪威，在挪威西海岸建立海空军基地，可以限制英国海军活动，从北面威胁英国；第三，保证瑞典铁矿砂安全运到德国。当时瑞典是德国铁矿砂的重要供应国。

德国在战争第一年消耗的 1500 吨铁矿砂中，有 1100 吨是从瑞典进口的。这些铁矿砂，在冬季主要是通过挪威北部的港口运出，沿挪威海面运往德国。1939 年 11 月，苏联和芬兰爆发战争后，英法对芬兰提供援助。芬兰跟瑞典接壤，希特勒深怕英法远征军借故进入瑞典、挪威，霸占瑞典的优质铁矿砂，从北面威胁德国，所以决定先发制人，侵占丹麦和挪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丹麦没有卷入欧洲大陆的纷争，并于 1939 年接受德国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于 1940 年 4 月 9 日清晨，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随即向丹麦发动了进攻。丹麦政府于当天宣布投降，同意“在德国的保护下维持中立”。

在进犯丹麦的同一天，德国舰队也向挪威各重要港口发动进攻，占领了挪威西海岸的纳尔维克、卑尔根和南海岸的克里斯丁等重要港口。德国舰队进攻挪威首都奥斯陆时，遭到挪威海军的猛烈还击，几艘德舰被击沉击伤，德国舰队被迫暂时撤退，但德国用空降部队占领了奥斯陆。挪威前国防部长、民族叛徒吉斯林被扶植为傀儡政府首脑。挪威国王拒绝投降，带领政府官员向北方转移，并命令全国继续抵抗。为支援挪威军队抗击德国法西斯，英法军队于 4 月中以后在挪威登陆。德国进攻西欧后，英法军队于 6 月 8 日撤出挪威。6 月 7 日，挪威国王和政府流亡伦敦。6 月 10 日，德军占领了挪威全境。

未等挪威战役完全结束，希特勒于 1940 年 5 月 10 日在西线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中立的小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希特勒进攻荷、比、卢，既是他称霸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进攻英法的序幕。就在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当天，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张伯伦被迫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保守党人丘吉尔出任首相，组成有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5 月 13 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表明要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争取胜利……”。丘吉尔改变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但他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却是极端严峻的。

1940 年 5 月初，德军在西线集中了 136 个师、2580 辆坦克、3284 架飞机，分三个集团军群。其部署是：北路 B 集团军群共 28 个师，任务是突破德荷边境的防线，占领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作出要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先例的样子，以吸引英法军主力；南路 C 集团军群共 17 个师，配置在马奇诺防线正面，任务是佯攻马奇诺防线，以牵制法军；中路 A 集团军群共 44 个师，任务是翻越卢森堡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山脉，向英吉利海峡突进。此乃主攻方向。此外有 47 个师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莱茵河地区。当时西欧各国总兵力约 147 个师，其中英国远征军 10 个师。英法统帅部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规，错误地估计德军的主攻方向必然是地势平坦的比利时中部地区，因而把大部主力集中在色当以西的法比边界上，在法比边境和法国北部各省部署了 51 个师，另一部分主力则部署在马奇诺防线的背后及其东南面对德国和瑞士的边界上，而在面对阿登山脉的色当和迪南之间的一段边界上布防极差。

5 月 10 日凌晨，德国开始全面进攻。首先出动大批飞机猛烈轰炸荷兰、

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 72 个机场，摧毁了几百架飞机。接着，德军空降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荷军和比军的后方机场、渡口、桥梁和防御支撑点。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德军 B 集团军群的地面部队对荷兰、比利时北部发起攻势。5 月 13 日，荷兰女王及政府大臣逃往伦敦。15 日，荷兰投降。德军 A 集团军群于 5 月 10 日突击阿登地区。德国出兵的当天，只有 30 万人口的卢森堡不战而降。德军坦克摩托化部队出其不意地在比、卢接壤的阿登山区分三路纵队快速挺进，三天就越过阿登山脉天险。14 日强渡马斯河。15 日突破最后一道防线，然后沿法国北部平原迅速向西挺进，20 日夺取亚眠，22 日攻下布伦，26 日占领加来，直逼英吉利海峡。把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比部队同法国后方拦腰切断。5 月 28 日，比利时投降。与此同时，近四十万英法联军被压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前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边是如虎似狼的追兵，只要纳粹装甲军再前进一步，就可封锁敦刻尔克港口，断绝其逃往英国的生路。就在这时，希特勒给 A 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下达了一道暂停前进的命令，从而使英法联军绝处逢生，获得了三天修筑防御工事，巩固敦刻尔克防御圈，掩护退却的时间。英国海军动员了 850 艘船只，从巡洋舰、驱逐舰到普通的小帆船来进行撤退工作。从 5 月 27 日到 6 月 4 日，英法水兵和船员冒着德机的轰炸和炮火的袭击，经过九个昼夜的苦战，把 33.8 万军队经过英吉利海峡撤退到了英国。只有担任后卫的 4 万名法军被俘。这次大撤退被誉为英国海军史上的一次宏伟战绩，即所谓“敦刻尔克奇迹”。这次大撤退的成功，使英国得以保存实力，重新武装，继续作战，从而种下了法西斯德国尔后失败的种子。这次“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则是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贻误了战机。纳粹著名坦克将领曼斯坦因在战后写的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痛切地说：“敦刻尔克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错误。”

1940 年 6 月 5 日，德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横贯法国北部的 400 英里战线上发动总攻。法军总司令魏刚集结一百多万军队在索姆河和安纳河一线构筑的“魏刚防线”不到三天就被击溃。德军向巴黎进逼。6 月 10 日，意大利趁火打劫，向英法宣战。6 月 13 日，巴黎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次日，德军占领了巴黎。6 月 16 日，贝当取代雷诺出任法国总理。第二天，贝当政府宣布停止抵抗。6 月 22 日，按德国规定，在 1918 年 11 月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森林同一节车厢里，法国政府代表在纳粹德国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战协定规定：占法国领土五分之三的北部和西部工业发达地区为德军占领区，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非占领区建立贝当傀儡政府，首府设在维希。

拥有 300 万大军，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为什么不堪一击，短短的六个星期就败降？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法国达拉第政府长期推行绥靖政策，缺乏同德国侵略者开战的思想 and 军事准备。1939 年 9 月，虽然对德宣战，但宣而不战，军火生产仍处于平时状态。1940 年 3 月，雷诺出任总理后，达拉第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绥靖政策的阴魂仍然不散。

第二，坚持消极防御战略，对德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二战前，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从瑞士到比利时之间建筑了一条以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名字命名的防线。他们视“马奇诺”为固若金汤的防线，甚至在守兵佩带的铜徽章上也刻有“他们休想通过”的题词，以为依赖这一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

同时英法统帅部又错误地估计德军的主攻方向为地势平坦的比利时中部地区。至于阿登山区，道路崎岖，他们认为是敌人无法攻克的天险，防备薄弱。但德军正是从这个防备薄弱的地区攻入法国北部，使马奇诺防线丧失作用。

第三，无视坦克机械化部队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因而坦克、飞机这类现代化武器的生产落后于德国。而德军由于在战场上大量密集地使用空军和坦克装甲部队，快速突击，使法军一开始就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海狮”计划和英伦空战 法国沦亡后，英国陷于孤军作战困境。希特勒企图通过施加军事压力，发动和平攻势，迫使英国屈服。1940年6、7月间，希特勒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英国提出“和平建议”，邀请罗马教皇和瑞典国王进行斡旋。他扬言，只要英国把殖民地归还给德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就可以跟英国媾和。希特勒的和平试探遭到丘吉尔政府的坚决拒绝。

在对英国的和平攻势失败后，希特勒于7月16日签署了关于制定对英国实施登陆战役，代号为“海狮作战计划”的16号指令；叫嚷要“清除英国本土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海狮计划规定德军在8月中旬完成作战准备。希特勒力图取得英吉利海峡和伦敦上空的制空权，摧毁英国空军、机场和港口，为实施“海狮”计划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德国共集结了2669架作战飞机。从1940年8月9日开始，德国每天出动数百架次甚至上千架次飞机，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队和英国的城市、港口、铁路、桥梁、机场及其他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轰炸。仅在头三个月就投下了一万多吨炸弹。

当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已遭受严重损失，重型武器大部分丢在法国，武器弹药奇缺，只剩下500门大炮、200辆坦克、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陆军正在整编，国民警卫军还在受训。这样薄弱的军事力量，要保卫数千英里的海岸线，确是一项严重考验。但是英国没有屈服，丘吉尔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抵抗希特勒的侵略。丘吉尔说：“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田野和街头战斗，在山岭上战斗。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国土。我们将战斗到底，决不投降。”英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地投入民族自卫战争。到1940年8月20日为止，有200万人手中有了步枪和刺刀，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编入了军事组织。庞大的国民警卫军手持步枪或其他武器，随时准备为英伦三岛而战。飞行员利用在本土上空作战，航程短，地形熟，飞机可以随时返回地面加油和补充弹药后再出击的有利条件，经常一天起飞出击三四次，从而大大弥补了英国空军在数量上的劣势。当时英国已发明并使用雷达，又有数万青年参加对空监视，因而使自己的机群和地面炮火能准确地打击敌机，经常使敌机遭受数倍于己的损失。

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实际上从法国投降后就已开始，但当时的规模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英国施加压力。因此一般认为，英伦空战是从1940年8月9日才正式开始，其进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9日至9月6日，德国空军轰炸的重点是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队和英国的机场、港口、海军基地及其他空中设施。主要目的是把英国海军赶出英吉利海峡，夺取制空权，为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本土创造条件。

第二阶段，从9月7日至11月13日，德机轰炸的重点是英国首都伦敦，

主要目的是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在 9 月 15 日的空战中，德机被击落 60 架，而英机只损失 26 架。英国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战役日”，每年都举行庆祝活动。

第三阶段，从 1940 年 11 月至 1941 年 5 月，德国空军主要轰炸伯明翰、考文垂、南安普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英国工业城市，破坏英国的工业生产。考文垂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和前两个阶段比较起来，这个阶段空袭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德国的空袭实际上已是虚张声势了。

英伦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在英伦空战中，德国空军始终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统计，德军损失飞机 1732 架，而英国只损失 915 架，双方飞机损失近 2 : 1。在 1940 年 8 月下旬和 9 月初，英国空军还出动轰炸机对柏林进行了三次夜袭，引起了德国当局的震惊。希特勒在其发动的“空中闪电战”破产后，被迫于 1940 年 9 月 17 日下令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并于 10 月 12 日以后，陆续调走用于“海狮”计划的部队和船只。“海狮”计划实际上被取消。英国赢得空中自卫战的胜利。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形成与德意扩大对巴尔干的侵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意、日三国于 1938 年初至 1939 年夏，在柏林、罗马和东京分别进行多次谈判，酝酿在《反共产国际协定》基础上建立三国军事同盟。1939 年 5 月，德意签订钢铁同盟条约，此乃法西斯轴心国军事同盟形成的开始。日本和德国当时在侵略目标和步骤上存在分歧，德国首先要进攻英法，因此在谈判中要求不仅把苏联，也要把英、法、美列为敌对国，而日本这时还没有正式决定跨出南进的步伐，因此不赞成把英、法、美列为敌对国，于是三国谈判停滞不前。1939 年 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日本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背叛，为此中断了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后，日本曾表示采取不介入欧洲战争的立场。到 1940 年夏，德国入侵北欧、西欧得逞后，日本为了加紧侵华战争并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建立三国军事同盟又趋积极。正在与英国进行空战并准备侵苏的法西斯德国也迫切需要和日本进一步勾结。1940 年 9 月 9 日，两国在东京恢复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谈判。9 月 18 日，里宾特洛甫到罗马劝说意大利加入军事同盟。9 月 27 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和日本外相来栖三郎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 leadership”；“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 leadership”；三缔约国中一国受到目前未参加欧洲战争或中日战争的国家的攻击时，相互给予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三国声明“上述各条款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俄间现存的政治地位”。条约中所说的目前未参加欧洲战争或中日战争的国家指的是美国，德国想以此来威胁美国，阻止它直接参加对德战争，而日本则想借此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组织反美同盟。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

德意日军事同盟形成后，希特勒为了建立进攻苏联的战略前进基地，加紧扩大对巴尔干的侵略。1940 年底至 1941 年春，希特勒采取种种胁迫手段，先后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拉入轴心国军事同盟，并将军队开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与此同时，意大利于 1940 年 10 月出兵侵入希腊。希腊军民奋起抵抗，在品都斯—伊庇鲁斯战役中大败意军，并转入反攻，与英国

一起把意大利赶出希腊。1941年1月，英希达成军事合作协定，英军进入希腊。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慑于德军压境，签署了加入轴心国同盟的议定书。南斯拉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3月27日，卖国政府被推翻，新政府拒绝加入轴心国同盟，并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4月6日，德国、意大利军队入侵南斯拉夫。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军队投降，国王和政府经希腊逃往伦敦。南斯拉夫被德、意、匈、保占领和瓜分。

德军在入侵南斯拉夫的同一天，也对希腊发动了进攻。英希联军溃败。4月16日，德军包围希军主力。21日，希军投降。在希腊作战的英国远征军从海上撤退。4月27日，德军进入雅典。6月1日，德军占领希腊全境。希腊国王和政府经埃及流亡伦敦。南斯拉夫、希腊军队的抵抗及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迫使希特勒把进攻苏联的时间从5月推迟到6月下旬。

苏联“东方战线”的建立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苏联先后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200~400公里，建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防御希特勒侵略的所谓“东方战线”。

1939年9月17日，在波兰遭到德国法西斯侵略、濒于灭亡的时候，苏军越过西部国界，进入波兰东部，占领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28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确定苏德两国的“最终国界”。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成立苏维埃政权，并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

1939年9~10月间，苏联以保障安全为名，迫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先后同它签订了互助条约，取得了在三国境内驻军和建筑海、空军基地权，但条约规定不得损害三国的主权，不改变三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1940年6月，在德国大举进攻西欧的形势下，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提出改组三国政府和让苏军在三国境内自由通行等要求，三国被迫同意。苏军立即对三国实行了军事占领。6月17~21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成立了新政府。7月，三国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批准三国为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

1939年10月，苏联以列宁格勒距苏芬边界只有32公里、地位极不安全为由，要求同芬兰交换部分领土和租借汉科半岛为海军基地等要求，遭芬兰政府拒绝。11月2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由于芬兰对苏联采取“极端敌视和挑衅”的态度，苏联认为“芬兰已经走上直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道路”，因此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宣布中断同芬兰的外交关系。11月30日，苏联陆、海、空军向芬兰发动全线进攻。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芬兰战败求和。1940年3月12日签订《莫斯科和约》，芬兰被迫将包括维堡在内的整个卡累利阿地峡、维堡湾西部沿海、拉多加湖西部和北部、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割让给苏联，并将汉科半岛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为期30年。

1940年6月26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并要求把布科维那北部移交给苏联，以此赔偿罗马尼亚占领比萨拉比亚期间

比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前身摩尔多瓦公国的领土，后被土耳其占领，归属奥斯曼帝国，1812年并入俄罗斯帝国，1918年被罗马尼亚收回。

带给苏联和比萨拉比亚居民的“巨大损失”。次日，罗马尼亚复照苏联政府，婉拒苏方要求。同一天，苏联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罗马尼亚在向英、德、意求援无望后，于6月28日被迫接受苏联的要求。6月30日，苏联出兵占领了这两个地方。苏联将比萨拉比亚同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合并，于8月2日成立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北布科维那则被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东方战线”的建立，给苏联西部增加了防御空间，但从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情况来看，它并未起到苏联预期的作用。苏联无视小国的独立与主权，侵犯别国领土完整，干涉别国内政，直至实行军事占领，并入自己的版图，无疑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当时苏联领导人头脑里的帝国意识，即恢复俄国旧有版图思想作祟的结果。它伤害了这些小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深远的不良后果，留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

卫国战争爆发前夕，苏联还采取了另外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就是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

1940年希特勒横扫西欧大陆后，加紧准备向东进攻，苏联西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德国，苏联迫切需要稳住日本，以便一旦与德国开战，不致陷入东西两线作战。此时已确定“南进方针”的日本，也把调整日苏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方针。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双方经讨价还价的谈判，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五年，苏日在签订中立条约时，两国政府还同时发表声明，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有利于保障苏联东部的安全，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但苏联政府关于“满洲国”的声明，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是牺牲他国利益及主权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的行径。

美国《租借法案》的通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认定美国的防线是在欧洲，多次向国会提出修改中立法。国会经过长期争论，于1939年11月2日通过修正的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允许交战国在美国购买军火，但实行“现购自运”的原则，即用现金购买武器，自行运输，船只悬挂本国国旗。11月4日，罗斯福签署了新中立法。由于英国海上运输发达，又有强大的海军，因此新中立法更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德国。在东方因中国无力自运，则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新中立法的通过是美国调整欧洲政策，从中立向英法倾斜的开始。

1940年春、夏，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胜利，给美国以极大的震动。多数美国人主张援助英国，因为英国的命运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安危。6月11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要求将美国的旧驱逐舰转让给英国。7月，英美在华盛顿举行秘密谈判。9月，两国达成协议，美国将50艘逾龄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英国则把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等八个海、空军基地借给美国，期限99年。从6月到10月，美国还给英国97万支步枪、25万支左轮枪和895门大炮。

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陈述英国所处的危险状况，特别谈到英国在财政上的困难。丘吉尔说，英国军用物资十分短缺而又拿不出钱来购买所需要的武器，总统能否在宪法许可范围内防止英国变得“一贫如洗”。罗斯福明白，英国确已面临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必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援助英国，这也是保卫美国的需要。罗斯福提出把武器租借给英国，以解决英国的迫切需要而又缺少资金的困难。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他的设想。他说，假设我的邻居起了火，而我家又有一条浇花用的软水管，我只能把这条软水管借给他把火灭掉，然后再还给我，而不能要求他先付钱买这条软水管。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炉边谈话”，提出“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口号。他还说：“如果英国倒下去，轴心国家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及各大洋……到那时候，在整个美洲，我们所有的人就将生活在枪口的威胁下”。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与美国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国家用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式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拨款70亿美元用于实施此法案。当天，罗斯福就签署了该法案。

《租借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已完全放弃“中立”政策，转到了反法西斯国家一边，成了它们有力的后盾。这对于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巨大的意义。丘吉尔说：“法案一经通过，就马上改变了整个局面。”他致电罗斯福，以整个英帝国的名义表示感谢。

第二节 战争的扩大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苏德战争的爆发与莫斯科保卫战 希特勒在灭亡法国后，就着手准备侵苏战争。1940年8月1日，德军总参谋部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开始制定进攻苏联的作战方案。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命名为“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计划，即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巴巴罗萨计划”规定德军分三路向苏联腹地实施快速纵深突击，在1941年入冬前占领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顿巴斯，推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一线。计划要求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前完成。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和它的仆从国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共出动190个师、550万兵力，配备近5000架飞机、4000多辆坦克，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1800多公里战线上分三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北路北方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出发，直扑列宁格勒；中路中央集团军群从华沙以东出发，指向莫斯科；南路南方集团军群于多瑙河到卢布林地区集结，向基辅进犯，而后向顿巴斯进军。突然袭击发生后一个半小时，德国才向苏联宣战。

战争初期，德军的进攻十分凶猛，苏军连连失利，西部国土大片沦丧。6月22日当天，德军就击毁了苏联的66个机场和1200架飞机，并全线突破苏军的防线，侵入苏联国境25~50公里。中路德军在波克率领下，于6月28日占领了明斯克，苏军43个师3个旅被围歼于明斯克、比亚威斯托克地域。7月16日，德军攻占离莫斯科只有37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由于苏军顽强抵抗，强有力地反突击，希特勒于7月30日命令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在北方，莱克指挥的德军在占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之后，于9月8日推进到拉多加湖南岸，开始从陆上封锁列宁格勒。在南方，隆斯特德指挥的德军于9月中包围了苏联的4个集团军，苏军被围歼60多万人。9月19日，基辅陷落。以后，德军向乌克兰东部和克里木半岛推进。10月，苏军撤出敖得萨。截至1941年11月，德军深入苏联腹地850~1200公里，占领土地15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区战前居住的人口约占全苏人口的40%，工农业产值几乎占全国的2/3。到1941年12月1日，苏军损失700多万人、坦克24万辆、飞机2.4万架。

苏联之所以在战争初期遭到如此严重失利，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德军的突然袭击估计失误，未按时完成战争准备。

斯大林对法西斯德国要侵犯苏联是有认识的，因此在战前，苏联加快了备战的步伐。1939~1941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每年增加13%，而其国防工业每年增加39%。在这期间新组建125个师，使苏军人数猛增两倍。但是在对德军的突然袭击问题上估计失误。斯大林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更多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因而竭力避免同德国过早地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竭力避免受任何挑衅而卷入战争。斯大林认为，德国在结束对英作战之前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春，苏联从各种渠道获得德军将入侵苏联的情报，但是斯大林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情报是伪情报，是带有挑拨性的，是西方有意唆使苏联和德国互相敌对。1941年6月13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巴巴罗萨”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的音译。他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希特勒想借此名给侵苏战争染上“圣战”的色彩。

铁木辛哥和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危急形势，要求斯大林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但斯大林仍害怕会刺激德国，因而犹豫不决。6月21日晚，两名德军成员投奔苏军，报告德军将于22日凌晨发动进攻。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同意命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苏军总参谋部于6月22日零时30分下达命令完毕，但这时距德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了，苏联许多集团军还没有接到命令，战争已经爆发了。这就是说，战争爆发时，苏军处在一种没有充分动员、匆忙上阵的临战状态。

第二，对德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和战术指挥上失误。

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认为，德国发动对苏战争，其战略主攻方向是乌克兰，以首先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因此，苏军在西南方向上部署了80个师，占西部边境苏军总兵力的47%。但实际上敌人的主攻方向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企图直取首都莫斯科，一举摧毁苏联的神经中枢，而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只部署了40个师，占西部边境苏军总兵力的23%。

在战术指挥上，苏军对希特勒的“闪电战”的新战术认识不足。这种“闪电战”，其特点是不宣而战，从战争一开始就以主力投入突袭，在突破防御之后用坦克、摩托化部队纵深直插，分割包围，扩大战果。但这时苏军仍没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认为德苏战争还可能像以往的战争那样，首先在边境接触，然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同时苏联一度轻视坦克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在1939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的情况下，苏联突然作出了解散坦克部队的决定。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德军在法国战场运用坦克部队成功后，苏军才匆匆着手组建新的机械化军，但已经太晚。

第三，30年代，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大批苏军高级将领和优秀军官被无辜清洗，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四，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对苏军不利。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国拥有中西欧强大的经济、军事资源，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军队现代化装备程度高于苏联，加上当时欧洲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反对它的第二战场，因此可以把绝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东线发动进攻，这就使得一段时间内的力量对比德国居于优势。

德军虽然在苏德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远没有完成“巴巴罗萨计划”预定的目标。1941年9月6日，希特勒发布第三十五号指令，命令以中央集团军群为主，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一部分部队配合，实施“台风”作战计划，向莫斯科发动主攻。为此，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集中了74个师和1个旅的兵力，其中包括14个装甲师和8个摩托化师、1700辆坦克、1500架飞机。

1941年9月30日，德军向莫斯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中旬先后占领奥廖尔、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逼近到离莫斯科不到一百公里处。10月16日，苏联政府和各国驻苏外交使团迁往古比雪夫，但联共（布）中央、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斯大林都留在莫斯科。国防委员会决定，从10月20日起，莫斯科实行特别戒严。十几万市民组成民兵师和巷战小组。45万市民到郊外构筑防御工事。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斯大林亲临红场，检阅红军，发表了演说。广大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11月15日，德军向莫斯科发起第二次进攻。11月27日，德军突击部队

推进到离莫斯科只有 24 公里的地方，指挥官从望远镜里已经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苏军英勇抗击，迫使德军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

12 月 5 日、6 日，苏联加里宁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先后发起反攻。到 1942 年 1 月初，德军被迫从莫斯科近郊向西溃退了 100 公里到 250 公里。希特勒暴跳如雷，撤换了前线指挥官，自任陆军总司令，并下令禁止后退。苏军最高统帅部为扩大战果，命令九个方面军向敌人发动全线反攻。从 1 月 8 日到 4 月中、下旬为止，苏军在各条战线上将德军击退 150 公里到 400 公里，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威胁，改善了列宁格勒的处境。

莫斯科战役的胜利，宣告希特勒“闪电战”的彻底破产，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德军面临持久的两线作战的局面。这次胜利增强了苏联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形成。

珍珠港事件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为了实现独霸东亚、争霸世界的野心，日本统治集团早在 1936 年就确定了南北并进的国策方针，即向南进犯英美等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附属国与向北侵略苏联并进。1940 年，德国侵占西欧，荷兰、法国相继投降，英国困守英伦三岛，美国又忙于支援西欧盟国的抗德战争而无力东顾。日本军国主义认为，这是南进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定以南进为对外侵略的主要战略方向。日本之所以急于南进，是为了夺取东南亚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和其他战略物资，并切断国际援华通道。1940 年 8 月，日本近卫内阁抛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妄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东亚地区，进而包括大洋洲在内的日本殖民大帝国。1940 年 9 月 23 日，日本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9 月 27 日，和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加深了它同美英的矛盾。1940 年 7 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对日本限制出口飞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10 月又宣布对日全面禁运废钢铁。同时，宣布给予中国 5000 万美元贷款和对华实施租借法。但是，美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德国威胁，它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因此力图与日本达成协议。当时，日本也需要争取时间作外交和军事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从 1941 年 3 月起开始举行秘密谈判。美国想以牺牲中国东北为条件，换取日本从中国东北以外地区撤军，恢复中国的门户开放，放弃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条约，保证不用武力向西南太平洋发展。日本则要求美国在不限制贸易的情况下，承认它对中国的侵略，并企图迫使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求得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双方的分歧未能调和，谈判陷入僵局。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一场先北进还是先南进的争论。外相松冈和部分陆军头目主张乘机北进，与德国瓜分苏联；以首相近卫和陆相东条英机为首的实力派主张立即南进，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等到苏联被严重削弱时，再北进苏联。7 月 2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继续坚持南进方针，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对美英一战，对苏德战争暂不介入。7 月 24 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很快占领整个印度支那。美国立即作出反应，7 月 26 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和禁止把石油等物资运往日本，并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日美对立空前严重，谈判一度中断。1941 年 10 月，东条英机接替近卫上台执政，一方面加紧完成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加派来栖三郎特使赴美协

助重开谈判，以掩盖战争部署。美国指望通过加强在菲律宾的防线和英国加强在马来亚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阻止日本占领整个中国和南进。它力争至少在 1942 年之前避免在太平洋燃起战火。由于双方各有需要，两国谈判恢复，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

1941 年 11 月 26 日，一支由载机 423 架的 6 艘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3 艘巡洋舰、9 艘驱逐舰和 3 艘潜水艇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下，从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出发，秘密驶向夏威夷。经过 12 天的航行，于 12 月 7 日（东京时间 12 月 8 日）凌晨抵达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最大海军基地珍珠港以北 230 海里处。当日 7 时 55 分，日本 183 架从航空母舰起飞的俯冲轰炸机、鱼雷飞机和战斗机突然袭击珍珠港，攻击持续了 45 分钟。紧接着，又出动 167 架飞机第二次攻击珍珠港，持续时间约一小时。美军对日本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7 日是星期天，日机突袭前的珍珠港一片太平的假日景象，除航空母舰外，所有的舰只和飞机都整齐地排列着，太平洋舰队的美国官兵，有的在度过周末舞会之后还没有起床，有的正在吃早饭，有的已上岸休假。当美国雷达站突然发现有庞大的机群正向珍珠港飞来，听到报告的值班军官以为是从美国西海岸向这里飞来的一队飞机，根本不当一回事。由于珍珠港美军缺乏警惕，反击无力，日军取得了突然袭击的重大胜利。它以损失 29 架飞机、5 艘小型和 1 艘大型舰艇，以及死伤约 200 人的极小代价，炸沉美国战列舰 4 艘，重创 1 艘，炸伤 3 艘，炸沉或炸伤其他大型舰只 10 艘以上，击毁飞机 260 余架，使美国死伤人数达 4500 多人。美国太平洋舰队除 3 艘未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航空母舰免遭攻击外，几乎全军覆没。

珍珠港战火终于使美国从传统的孤立主义羁绊中挣脱出来，使美国暂时停止了党派之争，而将不可遏止的怒火汇合成一个强音——参战！把炸弹扔到东京去！这样，珍珠港事件就帮助罗斯福解决了一个难题——让美国人心甘情愿地参加战争。丘吉尔也为此感到极大的喜悦。12 月 8 日，美、英对日宣战。接着，自由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2 月 9 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2 月 11 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美国、中国、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对德、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迅速扩大，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起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发动全面进攻。12 月 8 日入侵泰国，9 日侵占曼谷。12 月 10 日占领关岛。同一天，日机炸沉停泊在马来亚沿岸的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两艘战列舰，取得东南亚海域的海空控制权。12 月 22 日占领威克岛。12 月 25 日占领香港。1942 年 1 月至 2 月，日军攻占马来亚和新加坡，使英军丧失了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

1941 年 12 月 10 日，日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1942 年 1 月 2 日，占领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4 月 9 日，驻守八打雁的美国和菲律宾军队七万余人投降。5 月 7 日，美国司令下令余部投降。

1942 年 1 月下旬，日军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2 月至 3 月，先后在苏门答腊和爪哇空降、登陆，占领印度尼西亚。

1942 年 1 月，日军由泰国进攻缅甸。3 月占领仰光。应英国当局请求，中国派出远征军十万余人，配合英缅军队作战。5 月，英中军队退到印度和中国云南境内。

1942 年 5 月，日军占领了英属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达到日

本向东南推进的极限。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日军侵占了3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太平洋大片海域，占领区人口1.5亿。加上原已侵占的中国领土、朝鲜、印度支那，共控制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约4亿人口。但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的分散，以及各国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日本以蛇吞象力不从心，从1942年6月起，逐渐失去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和主动权。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促使被侵略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波兰沦亡和德国席卷西欧后，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相继在英国建立流亡政府。这些国家与英国事实上已经开始形成反法西斯同盟。法国败降后，戴高乐在伦敦宣布建立“自由法国”，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与英国建立了同盟关系。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与此同时，美英参谋部代表于1941年1月至3月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谈，制订了“ABC-1计划”，规定了两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在欧洲战场打败德国，然后再对日本作战，即“先欧后亚”战略。《租借法案》的通过和“ABC-1计划”的制定，标志着美英两国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6月12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邦同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流亡政府及自由法国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同盟国宣言。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宣布支持苏联。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当天晚上，丘吉尔发表演说，指出希特勒“侵犯俄国只不过是侵犯不列颠诸岛的前奏”，表示“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6月23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发表声明，谴责德国侵略苏联。6月24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凡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7月12日，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规定在对德战争中相互支援，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单独同德国谈判或媾和。苏联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签订了共同行动协定，并与其他国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及“自由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8月16日，苏英签订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英国给予苏联1000万英镑贷款。7月30日，罗斯福派遣亲信幕僚霍普金斯访苏，同苏联政府讨论美国对苏军事援助问题。8月中旬，美国派往苏联的装载军用物资的船队首次启航。

1941年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东北部的纽芬兰阿根夏湾的美国军舰上举行会晤。8月14日发表了联合宣言，史称《大西洋宪章》。宪章共八条，主要内容是：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反对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同意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摧毁纳粹暴政后重建和平，使各国人民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放弃使用武力，解除侵略国的武装，减轻爱好和平人民对于军备的沉重负担；在尊重现有义务的同时，“力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胜败，对于为它们的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世界贸易及原料的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一切人类可以横渡公海大洋，不受阻碍”。尽管宪章的某些条款暴露了美英之间的利害冲突，反映了美国同英国争霸的目的；但宪章所确定的对德战争目的和一系列进步、民主原则，反映了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战斗目标和共同要求。它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并成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9月24日，苏联发表

声明，同意宪章 的基本原则，但有一定的保留。

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对德作战和有关援苏问题。10月1日，三国签订议定书，规定从1941年10月1日到1942年6月30日，美、英两国每月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及其他武器和军用物资，并承担其运输任务；苏联向美、英提供原料。10月30日，罗斯福宣布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贷款。11月7日，美国正式宣布把租借法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苏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等国家正式参战，反法西斯阵线迅速扩大。罗斯福在与丘吉尔会谈中，提议由所有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各国签署一项共同宣言，经与苏、中等国磋商，美、英两国起草了联合国家宣言草案。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宣告：各签字国政府保证使用全部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反对同它们处于战争状态的德意日三国及其仆从国；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互相合作，不与敌人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宣言还声明，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斗争中给予物质援助和贡献的国家，均可加入本宣言。嗣后又有21个国家陆续在宣言上签字。这一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加强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是保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为后来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参加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制度不尽相同，因而在联盟内部也存在矛盾和斗争。在当时，是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标把它们联在一起，结成坚不可摧的力量，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节 战争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莫斯科战役后，苏联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1942年夏，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参加南线夏季攻势的德军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共97个师，拥有1200辆坦克、1640架飞机。

1942年6月28日，德军发动进攻，7月17日进抵顿河大弯曲部，揭开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序幕。斯大林格勒战役按苏军的行动性质分为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

苏军防御阶段从1942年7月17日到11月18日，历时四个月，包括远接近地防御（7月17日至8月17日）、近接近地防御（8月18日至9月12日）和市区防御战斗（9月13日至11月18日）三个时期。

远接近地防御：7月17日，德军在契尔河一线发起进攻。苏军顽强抗击，经过一个月的艰苦防御战，被迫退守斯大林格勒外围防线。

近接近地防御：8月19日，德军再度发起进攻，从西面和西南方向同时突击斯大林格勒。23日，德军第六集团军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的防线，抵达斯大林格勒以北30英里的伏尔加河河岸，企图从北面沿伏尔加河突击并夺取该市。与此同时，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突破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线，逼近斯大林格勒以南15英里的伏尔加河河曲，从而形成对斯大林格勒的半包围圈。9月12日，苏军防守部队撤向城郭，德军突击部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直接指向斯大林格勒市区，南部战线距市区只有2~10公里。

市区防御战斗：9月13日，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从此开始了城市争夺战。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和第六十四集团军担负起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市区的任务。在巷战中，双方逐街逐楼反复争夺。红军战士宣誓：“誓死保卫城市，绝不后退！”他们为保卫每一寸土地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巴甫洛夫中士和他的战友在一幢残破的大楼里，英勇机智地击退了德国步兵、坦克和飞机的轮番袭击，使德军两个月都不能从这里前进一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实施的反突击和局部进攻战役，有力地支援了市区的保卫战。10月15日，德军在一个狭小地段突进至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及其附近的伏尔加河地域。11月11日，德军在“街垒”工厂以南冲到伏尔加河河岸，但其攻势已成强弩之末。苏军的浴血奋战保住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并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11月18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防御阶段结束。

反攻阶段从1942年11月19日到1943年2月2日。

在红军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斯大林、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主持下，制定了反攻计划——“天王星”战役，决定围歼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主力。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线集结了三个方面军——瓦图京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和叶廖缅科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总计14个集团军、110.6万兵力、146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50架作战飞机、15,500门火炮和迫击炮，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负责调度。苏军当面之敌是魏克斯元帅指挥的德军B集团军群所属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和第四集团军，总计101.1万兵力。1942年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从斯大林格勒北面的谢

原名察里津，1925年改称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

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发起进攻，向东南方向挺进。第二天拂晓，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发起进攻。苏军迅速突破敌军防线，构成“铁钳攻势”。23日，南北两翼苏军在卡拉奇、苏维埃茨基，马里诺夫卡地域会师，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全部和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共22个师另160多个独立部队，总计33万人。24日至30日，苏军对被围德军展开攻击，将其压缩到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德军统帅部为了援救被围德军，组建了由曼斯坦因元帅指挥的顿河集团军群。12月12日，曼斯坦因部队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域突击，随即被苏军击溃。1943年1月10日，苏军顿河方面军开始对被围德军发起攻击，至2月2日全歼被围德军。德军元帅保卢斯成为阶下囚。随后，苏军在整个冬季攻势中，将德军远远推向西部，解放了北高加索、罗斯托夫、库尔斯克、沃罗涅等大片地区。

在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苏军消灭敌军近150万人，使德军损失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000架飞机和12,000门火炮。德军遭到发动战争以来最大的失败。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胜利，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也产生决定性影响。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为防止轴心国集团土崩瓦解，夺回战略主动权，决定在苏德战场发动新的大规模夏季攻势。德军由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调集33个师，包括9个装甲师、2个摩托化师，总计90余万兵力、2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2050架飞机，其中包括“虎”式坦克、“豹”式坦克、“斐迪南”式自动重型强击火炮、福克沃尔夫190A式战斗机和汉克尔129式攻击机等大量新式武器，于1943年7月5日从南、北两面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钳形攻势，企图围歼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尔后向西南方面军后方突击，向东北方向展开进攻，从而制造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由于苏军顽强抗击，德军进展迟缓。从7月12日开始，苏联的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及草原方面军等数路方面军发动强大攻势，8月5日解放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8月23日收复哈尔科夫。苏军取得了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此战，德军损失50余万人、飞机3500余架、坦克1500辆。库尔斯克会战标志着苏德战场完成了根本转折，苏军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而德军则从此完全丧失战略进攻能力，战略主动权完全转入苏军手中。

北非战场的胜利和意大利投降 墨索里尼上台后，一直妄图夺取北非、东非，建立一个从地中海经北非、东非到印度洋的“新罗马帝国”。1940年夏秋，意大利军队乘法国败降、英国溃退之机，分两路向北非和东非进攻：一路从利比亚出发，沿地中海海岸进攻埃及；另一路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出发，入侵肯尼亚、苏丹和英属索马里。但是，意大利的胜利非常短暂。1940年12月初，在埃及的英军开始反攻，至次年2月初进逼到意属利比亚的阿盖拉。在东非，英国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调集军队，并从非洲当地征集士兵组成混合部队。1941年1月开始反攻。4月，攻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月，意大利在东非的殖民地丧失殆尽。

在非洲的意军遭到英军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1941年2月，希特勒派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进入北非。3月，德意联军发起进攻，把英军打退到埃及国境线。11月，英军再次出击，推进到阿盖拉。1942年5月，隆美尔重新发起强大攻势。6月中旬，德意军队在北非东部大败英军。21日，托卜

鲁克 3.5 万英军向德军投降。6 月底，德意军队进抵距埃及亚历山大港约 96 公里的阿拉曼。英国朝野为之震动，并引发一场政府危机。8 月初，丘吉尔亲自前往开罗改组中东司令部，任命亚历山大上将为总司令，蒙哥马利中将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力主以进攻将德军赶出北非，并着手补充兵员和装备，加强部队训练。经过整顿，第八集团军实力大增，拥有 19.5 万兵力、1029 辆坦克、2311 门火炮、750 架飞机。德意联军只有 10.4 万人、489 辆坦克、675 架飞机、1219 门火炮，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处于显著劣势。

1942 年 10 月 23 日，英军在阿拉曼发起反攻。11 月 4 日，隆美尔命令德意军队全线撤退。英军乘胜追击，并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大量杀伤退却中的德意军队。6 日，英军因雨停止追击，从而未能全歼隆美尔兵团。

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军以伤亡 1.35 万人的代价，杀伤和俘虏敌军 5.5 万人，缴获和击毁坦克 350 辆。英军阿拉曼战役的胜利是北非战场的转折点，盟军从此开始掌握战略主动权，进入战略反攻的新阶段。

阿拉曼大捷后，英军继续挥戈西进。1942 年 11 月 13 日，收复托卜鲁克。1943 年 1 月 23 日，占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1943 年 2 月上旬，进抵利比亚突尼斯边界。德意军队退入突尼斯境内。

正当英军乘胜西进的时候，1942 年 11 月 8 日，美英盟军 10.7 万人在北非远征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的统帅下，分三路分别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地域登陆，随即占领了该三城。11 月 10 日，法国维希政府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在艾森豪威尔的压力下，向北非法军发布停止抵抗命令。美英盟军登陆后，迅速向东推进，到 11 月底，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直逼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下。从此，盟军对退入突尼斯境内的德意军队造成了东西两面夹击之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慌忙采取应急措施：一方面把军队开进法国南部地区，进一步控制维希政府；另一方面紧急向突尼斯增派援军，企图在北非负隅顽抗。11 月 27 日，德军企图夺取法国舰队，封锁并占领土伦。法国海军将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在内的六十多艘舰艇全部凿沉。

1943 年 2 月 14 日，集结在突尼斯南部的德军进行反扑，但被盟军击退，隆美尔逃回德国。3 月 20 日，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从突尼斯南部发动进攻，迫使敌军撤至突尼斯北部。4 月 19 日，美英军队从西、南两面发起总攻。26 日攻占朗斯托普峰；5 月 7 日，美军攻占比塞大港，英军攻占突尼斯城。由于盟军海空军极其严密地封锁了突尼斯与意大利之间的海空运输线，德意军队撤往意大利的企图未能得逞。5 月 13 日，25 万德意军队全部投降。美英盟军在北非战场取得了胜利。

盟军在肃清北非敌军后，根据美、英两国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于 1943 年 7 月 10 日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东南部登陆。8 月 17 日，占领全岛。墨索里尼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7 月 25 日，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在会见意大利国王后被逮捕，囚禁在亚平宁山的一个山顶上。总参谋长巴多里奥元帅上台组织新政府。他同盟军秘密谈判，并于 9 月 3 日签署了停战协定，退出战争。在签字的当天，英军从西西里岛出发，渡过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登陆。9 月 8 日，美军在萨勒诺地区登陆；10 月 1 日，进入那不勒斯。与此同时，希特勒利用英、美军队进军迟缓之机，迅速派军队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包括罗马在内的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并于 9 月 13 日用飞机劫走了在押的墨索里尼。9 月 15 日，根据希特勒的旨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

利北部组织了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权。9月29日，巴多里奥签署意大利投降书。10月13日，巴多里奥政府正式宣布意大利退出法西斯同盟，对德宣战。美、英、苏三国立即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盟军在阿拉曼战役和整个北非战役以及在地中海地区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个转折点。

中途岛海战和瓜岛争夺战的胜利 中途岛是一个陆地面积只有4.7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珍珠港西北一千多海里处，是夏威夷群岛的西北门户和屏障。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机轰炸东京后，日本为扩大日本本土的“防御圈”，决心实施中途岛—阿留申群岛战役，以中途岛为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日军进攻中途岛的主要意图是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时占领该岛，迫使美军退守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为实施这次战役，日本联合舰队出动舰艇20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8艘（舰载机400多架）、战列舰11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56艘、潜艇24艘，并配属陆军一部组成6个战术编队，由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统一指挥。5月26~29日，各编队先后由本土启航，预定于6月4日对中途岛发起进攻。此外，联合舰队在威克岛、夸贾林岛一线还有178架岸基飞机。

5月中旬，美军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码电报，掌握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调集航空母舰3艘和其他作战舰艇30多艘，舰载机230多架，组成两个特混舰队，悄悄地隐蔽在中途岛东北海域，待机歼敌；同时在中途岛附近海域部署潜艇以监视日舰行动，并派出远程飞机侦察。和日本兵力相比，美军明显处于劣势，但由于事先掌握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兵力编组及进攻日期等情况，因而占有防御和指挥上的优势，能够集中使用兵力，抓住有利战机出奇制胜。

主攻开始前一天，1942年6月3日，日本北方编队空袭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企图引诱美军舰队北上，从而陷入日本舰队的夹击。但美军没有中计。6月4日凌晨，日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率领的第一机动编队派出第一批飞机108架袭击中途岛。但美军早有准备，飞机已升空迎敌，因而使日军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南云急令已挂上鱼雷的第二批飞机改装炸弹，准备再次袭击中途岛。这时，日军侦察机发现美国舰队正向日舰队接近，于是日机又匆忙改装鱼雷。美军利用日军第一批飞机返航和第二批改装鱼雷的飞机尚未起飞的有利时机，派出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连续猛烈攻击日舰；日军只有部分战斗机凌空迎战，其鱼雷机在遭到攻击后则连机带雷爆炸。这次海战结果，日本损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330架，另有重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2艘被重创；美军只损失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艘和飞机147架。6月5日，山本下令停止中途岛作战，率军西撤。美军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

中途岛海战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它改变了太平洋地区日美航空母舰实力对比。从此，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中途岛海战之后，日美双方都在为控制西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地进行部署。日本企图占领新几内亚的重要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进逼美军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为此，日本海军部队从1942年6月底起开始在位于澳大利亚东北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机场，至8月5日基本完成。美军发现这一情况后，决定在其投入使用前攻占该岛，以遏制日军向西南太平洋的扩张。

1942年8月6日午夜，美军开始进攻。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万多人在瓜岛登陆。8日，美军击溃了日本警卫队和施工部队的抵抗，占领了该岛，同时占领了邻近的图拉吉岛和另外两个小岛。日本大兵营命令日军迅速击退美军，夺回瓜岛。日军逐次增兵反攻，均遭惨败。11月中旬，日军第三十八师主力分乘11艘运输船驶往瓜岛，被美军击沉10艘，击伤1艘。从此，瓜岛日军转入防御，但由于补给日益困难，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加上疟疾流行，已经丧失战斗力。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停止瓜岛作战。1943年1月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从瓜岛撤退的命令。2月1日至7日，10,630名日军撤出瓜岛。持续半年之久的瓜岛争夺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在瓜岛争夺战中，双方各自投入的兵力累计，美军约6万人，日军约3.6万人；各自的兵力损失为，美军5800人，日军2.5万人。为争夺瓜岛，双方海军还进行了大小海战30多次，日军损失舰艇30多艘，美军损失22艘。

美军瓜岛争夺战的胜利，标志着太平洋战场战略转折的完成。从此，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则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战略主动权已完全转入美军手中。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 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战略性转折的形势下，苏、美、英三国决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政府首脑会议，以商讨加速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与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了三国在缅甸配合作战和战后处置日本的问题。三国首脑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开罗会议之后，这份宣言被带到德黑兰，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阅后表示同意，于是在德黑兰会议结束的当天1943年12月1日发表。

开罗宣言庄严宣告：“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三国“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三国声明：“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开罗宣言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主要国际文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和蒋介石的单独会谈中，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同时又迫使蒋介石同意把中国东北某些权益让予苏联，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战后处置德国、波兰疆界走向、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及未来的国际组织等问题。

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早在1941年7月斯大林给丘吉尔的第一封信中，就要求英国“在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方（北极地带）开辟反对希特勒的战场”。丘吉尔认为，英国力量不足，大举登陆必遭惨败。1942年5、6月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和伦敦，分别与美英达成了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于6月12日公布于世。但是，丘吉尔并不想履行这一诺言，他说服罗斯福，首先在北非登陆作战，而将开辟西欧战场推迟到1943年实施。7月18日，他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斯大林。8

月，丘吉尔飞往莫斯科。他在向斯大林解释英美战略意图时，画了一个鳄鱼图形。他说，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打它柔软的下腹部（即地中海北岸欧洲南部地区）。丘吉尔表示，英美将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可是，到了1943年5月，英美再次食言，决定把开辟第二战场时间推迟到1944年5月。丘吉尔意欲开辟巴尔干战线，以阻止苏军进入东南欧，维护英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利益。1943年8月，英美魁北克首脑会议确定了进攻西欧的“霸王”作战计划。德黑兰会议再次讨论了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在会上没有公开反对在法国登陆，但提出要同时进攻巴尔干。丘吉尔的意见不仅遭到斯大林，也遭到罗斯福的反对。罗斯福从加快战胜希特勒和夺取欧洲霸权的全局利益考虑，认为只有在能够给希特勒以致命打击的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才不会失去“上场取得最后一分，以决定全局胜利”的机会，因此不赞成丘吉尔进攻巴尔干的计划。罗斯福主张“尽量多用美国军队去占领德国”，“要尽快地把美国军队开进柏林”。显然，取道法国这条通往德国的捷径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佳选择。由于斯大林，特别是罗斯福的反对，丘吉尔只好忍痛放弃其进攻巴尔干的计划。这样，苏、美、英三国首脑终于就“从东、西、南三方面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完全达成协议”。三国首脑决定于1944年5月在法国北部发动“霸王”战役，开辟第二战场，而苏联将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发动攻势，以便阻止德军从东战场调到西战场。

关于战后处置德国问题，三国首脑都同意分割德国，但在如何分割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最后决定设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

关于波兰疆界问题，斯大林提出，在西边以奥得河为界；在东边，坚持1939年9月底的边界线。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同意波兰的国界向西移。但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打败德国后苏联愿意参加对日作战，但苏联要求归还整个库页岛，获得千岛群岛，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

此外，罗斯福在会议上介绍了战后建立维持和平机构的设想。

会议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会后发表了《德黑兰宣言》和《关于伊朗的宣言》。《德黑兰宣言》宣布三国决心在战争方面，以及在战后的和平方面进行合作。宣言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地上消灭德国的军队，在海上消灭它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它们的兵工厂。”宣言最后说：“我们怀着信心期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凭着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他们自己的良心而生活。”“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德黑兰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会议，它对加强苏美英三大国的合作、协调盟国作战和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第四节 同盟国的战略反攻

苏军的战略反攻 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完全取得了战略主动权。1943年8月至11月,苏军在南线肃清高加索地区的敌人,解放顿巴斯;在乌克兰,解放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在中线解放斯摩棱斯克。1944年初,苏军与德军之间的战线,大体上从拉多加湖南岸,经斯摩棱斯克,南下沿第聂伯河为界。这时,在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兵员和重要武器装备均已超过敌军。苏军拥有635万人,敌军为500万。苏军的飞机比敌军多170%,火炮比敌军多70%。苏军不仅得到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援,还有敌占区近百万游击战士的紧密配合,并有美英的援助。1943年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制定了1944年战略反攻计划,决定集中兵力连续发动十次重大的战略性战役。

第一次打击:1944年1月14日,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发起反攻,至2月底逼近纳尔瓦、楚德湖东岸、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一线,歼敌近十万,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大部 and 加里宁州一部分,彻底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市的900天的封锁。

第二次打击:1944年1月下旬,苏军在第聂伯河以西的南布格河广大流域发起强大攻势。参加这次战役的有苏军四个方面军——乌克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方面军,总兵力为177个师,当面之敌为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共93个师。至3月底4月初,苏军歼敌66个师,向西推进400公里,解放了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进抵苏联国境线。

第三次打击:苏军乌克兰第三和第四方面军在黑海舰队的配合下,分别于1944年3月底至4月中和4月初至5月12日进行了两大战役,先后解放了敖德萨和克里木半岛全境。

第四次打击:1944年6月10日,苏军从1939年苏芬边界出击,至7月底推进到1940年的苏芬边界,迫使芬兰当局停战求和。

第五次打击:1944年6月23日,苏军发起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苏军有四个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参加了这次战役。至7月底8月初,苏军向西推进了550~600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大部 and 拉脱维亚一部分领土,逼近东普鲁士和华沙。在这次战役中,苏军歼敌54万,给予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以毁灭性打击。

第六次打击:1944年7月13、14日,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两大突击集团相继转入进攻,27日,攻占利沃夫。30日,强渡维斯瓦河。15日,占领散多梅希。与此同时,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于8月6日攻占西乌克兰石油工业中心德罗戈贝奇,接着进攻喀尔巴阡山口。8月中,转入防御。

第七次打击:1944年8月20日,苏军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开始实施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8月21日,攻占雅西。8月24日,攻占基什尼奥夫。8月23日,罗马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反法西斯武装起义。8月25日,罗马尼亚新政府对德宣战。8月31日,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9月,肃清罗马尼亚境内全部德军。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9月9日,保加利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9月底,苏军协助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全部国土。

第八次打击:1944年9~10月,苏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了爱沙尼亚全部领土 and 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

第九次打击：1944年9月，苏军进入匈牙利。10~12月，苏军以匈牙利为主战场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12月26日，苏军完成对布达佩斯地域德军的合围。与此同时，苏军进入南斯拉夫，协同南共武装力量于10月20日解放贝尔格莱德。

第十次打击：1944年10月，苏军在芬兰北部发动进攻，并于11月进入挪威国境作战。

1944年苏军的战略反攻取得了辉煌战果，歼敌138个师160万人，击毁或缴获坦克6700辆、火炮和迫击炮2.8万门、飞机1.2万架；收复了除拉脱维亚小块土地外的全部苏联国土。为追击侵略者，苏军开始越出国境作战，积极配合了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击败了纳粹德国的东欧仆从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北欧仆从国芬兰。苏军1944年战略反攻的胜利，为1945年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基础。

第二战场的开辟与西欧国家的解放 德黑兰会议后，美英任命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为盟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为副总司令，加快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为实施“霸王”计划，盟军在英国总共集结了包括美、英、加、法、波等11个国家的287.6万人的兵力、7000艘舰船、1.1万架作战机和2700架运输机。由于一些准备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盟国将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由原计划的1944年5月初改为6月初。

德军西线守军为隆斯特德元帅指挥的B、G两个集团军群共58个师。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41个师驻守在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沿海一带，主力配置在加来地区，在诺曼底地区只部署7个师，不足9万人；勃拉斯科维茨指挥的G集团军群17个师驻守在法国南部。

为对付盟军登陆，早在1942年9月，希特勒就下令从诺得角到西班牙海滨构筑一道永久性抗登陆防线——“大西洋壁垒”。由坚固支撑点和野战工事构成，并设有地雷场和水中障碍配系。虽然到1944年这道防线还没有完全建成，但已给盟军的登陆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德军最高统帅部对英美军队在西欧登陆地点的估计没有一致看法，希特勒认为在加来地区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德军设防重点在加来地区，诺曼底一带防御较薄弱。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后，希特勒还认为这是牵制性的行动，大规模的登陆在加来。

1944年6月6日凌晨，盟军三个空降师分别在诺曼底德军防线后方的科唐坦半岛南端和奥恩河口附近空降着陆，占领了通往海滨的要道。当天6时30分至7时45分，在猛烈的空袭和炮击的掩护下，盟军登陆部队分别在五个登陆地段突击上岸，至9时基本突破了德军的防线。6~7日，盟军有17.6万人登上欧洲大陆。至6月12日，盟军五个登陆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正面宽约80公里、纵深13~19公里的统一登陆场。6月18日，盟军切断科唐坦半岛。6月21日，盟军向瑟堡发起总攻；29日，瑟堡德国守军投降。至7月5日，盟军有100万人登上欧洲大陆，还有17万辆车辆、近60万吨补给品运过海峡。盟军展开了扩大登陆场的作战。7月18日攻占交通枢纽圣洛，20日攻占冈城。至7月24日，盟军登陆兵力达145万人，建立了一个正面宽150公里、纵深13~35公里的登陆场，发动地面总攻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诺曼底登陆战役胜利结束。在这次战役中，盟军伤亡12.2万人，德军伤亡和被俘11.4万人，另有2117辆坦克和345架飞机被击毁。

诺曼底登陆战役是迄今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这次战役之所以能胜利进行，是由于盟军登陆前准备充分，兵力和武器装备占有绝对

优势，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登陆地点选择正确，以及在东线有苏军反攻配合。此外，德军对盟军登陆地点判断失误，也是盟军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此次战役，对盟军在西欧展开大规模进攻，加速纳粹德国的崩溃具有重大意义。

1944年7月25日，登陆盟军从诺曼底地区发动攻势，迫使德军向东南方向退却。8月19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8月25日，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入巴黎。8月30日，以戴高乐为主席的法国临时政府成立。

1944年8月15日，美法联军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戛纳至土伦一带登陆。参加这次登陆战役的盟军兵力约50万人，由美军第七集团军和战斗法国第一、第二军组成。驻守法国南部的德军约25万人。至8月19日，盟军攻占正面宽90公里，纵深60公里的登陆场，登陆兵力达16万人。随后，美军分两路北进；法军则向西推进，27日攻占土伦，28日解放马赛。9月12日，南北两路盟军在巴黎和马赛之间的蒙巴尔会师。1944年底，法国全境解放。

1944年9月2日，盟军进入比利时。9月8日，比利时政府从伦敦迁回布鲁塞尔。9月9日，卢森堡解放。1944年9月17日，盟军在荷兰南部发动攻势，在荷兰内地军的配合下，至1945年3月解放了荷兰全境。

1944年12月16日，德军集结了20个师20余万人的兵力、900多辆坦克、800架飞机和2600门火炮，在比利时和卢森堡交界的阿登地区发起反扑。美军在阿登地区的兵力为5个师8.3万人、242辆坦克。德军突破美军防线，至24日向前推进了近100公里。1945年1月6日，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指出西线局势令人焦急，希望苏军尽快发动一次重大攻势。斯大林立即作了肯定答复。1月12日，苏军提前发起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德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调往东线。盟军同时展开反击。阿登地区德军丢弃重装备东撤。21日，德军退至进攻出发阵地；28日，撤至本国境内。阿登战役结束。

在意大利战场，盟军于1944年夏发起进攻。6月4日，占领了罗马。但是，盟军在1944年没能进一步向意大利北部推进。

盟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美军在取得中途岛海战和瓜岛战役胜利后，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并从1943年6月起转入反攻。美军采取“双叉冲击”战略，从西南太平洋和中部太平洋两路出击，以菲律宾为会合点，实行越岛进攻。

1943年9月，内外交困的日本决定缩短半圆形防线，规定了“国家绝对防卫圈”，即从缅甸起，沿马来半岛屏障地带，延伸到新几内亚西部，再伸展到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向北直到千岛群岛。日本妄图固守这一防线。

1943年6月，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在拿骚湾登陆，在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岛屿开始对日军发动进攻。9月，盟军在新几内亚东部莱城登陆。11月，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布干维尔岛登陆。至1944年春，攻占了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1944年8月，盟军完成了对新几内亚的占领，从而为进攻菲律宾开辟了道路。

在中部太平洋战区，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军于1943年11月攻占吉尔伯特群岛。1944年2月，取得了马绍尔群岛战役的胜利，从而突破了日军的外围防御圈。

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后，绕过加罗林群岛，直取马里亚纳群岛，建立攻

击日本本土的基地。参战美军兵力共 12.7 万余人、644 艘舰船和近 2000 架飞机，分编成两个突击编队；北部突击编队进攻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南部突击编队进攻关岛。1944 年 6 月 15 日，美军在塞班岛登陆，经过二十多天的激战，于 7 月 9 日占领全岛。日军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自杀。8 月 2 日，美军攻占提尼安岛。8 月 10 日攻占关岛。其间，美、日海军于 6 月 19~20 日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海域进行了激战。日军参战的 9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 3 艘、击伤 4 艘，360 架舰载机只剩下 25 架，另有战列舰、巡洋舰各 1 艘被击伤。美军参战的 15 艘航空母舰只有 2 艘受伤，956 架舰载机只损失 126 架，另有战列舰 2 艘和巡洋舰 1 艘被击沉。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使日本海军受到致命打击，其“绝对防卫圈”开始崩溃，并导致东条英机政府的垮台。

1944 年 10 月 20 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莱特岛登陆。10 月 24~26 日，美日双方展开了世界海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莱特湾海战。美军出动航空母舰 35 艘、战列舰 12 艘、巡洋舰 26 艘、驱逐舰 144 艘、潜艇 29 艘、舰载机 1280 多架；日军出动航空母舰 4 艘、战列舰 9 艘、巡洋舰 21 艘、驱逐舰 35 艘、潜艇 17 艘、飞机 716 架。在此次海战中，美军击沉日军航空母舰 4 艘，战列舰 3 艘、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9 艘和潜艇 7 艘，击毁飞机 500 架。日方海军几乎损失全部主力，而美方只损失航空母舰 3 艘、驱逐舰 2 艘、护海域的制海制空权，为攻占整个菲律宾奠定了基础。1944 年 12 月 25 日，美军攻占整个莱特岛。1945 年 1 月，美军在吕宋岛登陆，3 月 4 日收复马尼拉，3 月中旬控制了整个菲律宾。

1945 年 2~3 月，美军攻占琉黄岛。4 月 1 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以伤亡 4.9 万人的代价，于 6 月 30 日占领全岛。至此，盟军取得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海空军基地，打开了通向日本的门户。

在缅甸战场上，中、英、美联军从 1943 年秋起也展开了反攻。1943 年 10 月，中国驻印军从印度边境利多地区出发，向缅甸北部日军发起进攻。1944 年 3 月，占领孟关。6 月 25 日，在英军配合下攻克孟拱。8 月 5 日，中美联军攻克密支那。随后，中国驻印军将所属各师扩编为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于 10 月中分三路向因多、杰沙、瑞古、八莫一线发起攻击，12 月 15 日攻占八莫，1945 年 1 月 15 日攻克南坎。

为配合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中国远征军 16 万余人，于 1944 年 5 月 10~12 日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起反攻。至 1945 年 1 月，先后攻占腾冲、龙陵、芒市、畹町，并越过中缅边界追击日军，1945 年 1 月 27 日在芒友与中国驻印军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随即南下，于 3 月 8 日攻克腊戍，30 日在乔梅与英军会师，滇缅公路被打通。缅甸人民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自由同盟领导下，积极配合盟军作战。1945 年 3 月 20 日，盟军占领曼德勒。5 月 2 日，盟军进占仰光。6 月，收复缅甸全部国土。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仍将陆军主力放在中国。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初，日军发起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战役，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中国国民党政府军队抵抗不力，洛阳、长沙、南宁、柳州相继失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战场在 1944 年开始局部反攻，攻克城市七十多座。

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占了欧、亚广大地区，对被占领国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骇人听闻地屠杀各国人民。被占领国人民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主权，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德、意、日三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

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争。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给了法西斯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仍然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牵制着一百多万日本军队。

朝鲜人民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斗争。在朝鲜国内，有各种地下抗日团体开展活动。1942年3月，巨济岛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摧毁了日本空军基地的4个地下飞机库和2个汽油库，烧毁飞机60架。

1940年9月，日军入侵印度支那，越南人民举行北山起义。次年5月，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越南各阶层爱国人士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团结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马来亚共产党促使各地游击队联合起来，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经过三年艰苦斗争，抗日军发展到1万人，解放全国一半以上农村。

1941年12月，日军侵入菲律宾。1942年2月，在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各抗日团体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月，建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1944年秋，人民抗日军发展到10万多人。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后，人民抗日军积极配合美军作战。

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后，缅甸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8月，缅甸共产党与人民革命党等其他党派团体一起，建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自由同盟成员迅速发展到20多万人，游击队员达5万人，积极配合盟军在缅甸的反攻。1945年3月，昂山领导的国民军发动起义，配合盟军光复了首都仰光。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泰国。1942年1月，泰国上层人士创建了“自由泰国运动”，有5万人参加。它用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了近万人的武装力量。泰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义勇队”发展到近千人的队伍，给日本占领者以打击。

在欧洲，波兰人民在1939年成立了第一批游击队。1940年，流亡政府在国内设立代表处，领导国内抵抗运动。1942年2月，将抵抗力量改组为国家军。后来发展成为30万人的队伍。农民党在农村建立农民营，有15万人。1942年1月，波兰共产党人创建工人党。3月，正式建立人民近卫军，有6万人。波兰的抵抗运动在斗争中不断扩大。1944年，游击队作战1万多次，歼敌15万。华沙犹太区居民于1943年4月19日发动武装起义，英勇战斗一个月，最后遭到血腥镇压。1944年7月，苏军进入波兰。8月1日，华沙爆发起义。100万居民同仇敌忾，打击占领军。德国调集一个军，残酷镇压了起义，枪杀20万军民，并把华沙城夷为平地。

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反对德意法西斯占领者及其傀儡政权的人民解放战争。1941年6月，在南共领导下，建立了各级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以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为总司令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7月，南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开展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即在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武装起义。1941年底建立了第一支正规军——无产者旅，游击队员发展到8万人，解放五分之一国土。1943年11月，成立了以铁托为主席的全国解放委员会。到去年底，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国土。1944年10月20日，南斯拉夫人民武装力量在苏联红军帮助下解放贝尔格莱德。经过四年英

勇斗争，南斯拉夫人民建立了一支拥有 80 万人的人民军队，终于战胜了敌人，在 1945 年 5 月解放了全国。

1939 年意大利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了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1941 年 11 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1942 年 9 月，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1943 年 4 月，成立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9 月，意大利投降，德国军队取代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1944 年秋，民族解放军发展到 7 万人。11 月 17 日解放地拉那。11 月 29 日解放全部国土。

1941 年，德军占领希腊，希腊国王和政府流亡国外。在国内，希腊共产党组建了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人民解放军。到 1944 年秋，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达 160 多万人，民族人民解放军达 7 万多人，解放了大片国土。同年 10 月德军撤出希腊时，英军在希腊登陆，流亡政府返回雅典。

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后，法国人民和资产阶级政界中的有识之士举起了抗战的旗帜。6 月 17 日，也就是贝当政府宣布停止抵抗的当天，法国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飞往伦敦。第二天，他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呼吁法国人民在他领导下继续抗战。6 月 23 日，即贝当政府投降的第二天，戴高乐再次在伦敦发表声明，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在伦敦树立起“自由法国”的旗帜，组织在英国的法国武装部队和海外法国人民，为反对法西斯暴政和解放法国而斗争。1943 年 5 月，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等 16 个政党团体在国内共同组建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戴高乐派往国内的代表让·穆兰担任第一届主席。1944 年 3 月，国内各抵抗组织的武装力量联合为统一的内地军。同年 6 月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内地军积极配合盟军的反攻，其队伍也迅速发展，达到 50 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 25 万人。

1943 年 7 月德军占领意大利北部后，意大利共产党组织了“加里波的”游击队，社会党和其他党派也组织了各自的武装队伍，展开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1944 年 6 月，北部地区的游击队统一为“自由义勇军”，共 25 万人，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武装有 15 万人。1945 年 4 月底，北部意大利人民发动武装总起义，解放了包括米兰、热那亚、都灵、威尼斯等城市的广大地区。

在 1944 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等国的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配合盟军解放国土。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等国的人民也展开了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五节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

雅尔塔会议 1945年初，苏联和盟国军队从东西两线向德国本土推进，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日军尚在负隅顽抗。为了协调盟国关系，商讨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规划战后世界秩序，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4~11日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三国外交部长、参谋长和顾问们。会议讨论的范围广泛，争论激烈，最后签署了会议公报、会议议定书，作出了一些对战争和战后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德国问题。三国制定了最后击败德国迫使其无条件投降的计划。会议决定，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三国分区占领，成立一个由三国最高司令官组成的盟国中央管制委员会进行协调管理。三国同意从英、美占领区划出一个地区，交由法国占领，并邀请法国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指出：“我们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再扰乱世界的和平。”会议决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力量的武装并予解散；解散德国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的全部军事装备；消灭或管制德国全部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处一切战争罪犯；废除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与机关；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必须以实物偿付它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赔偿应首先支付给那些承受了战争的主要重担、蒙受了最大损失和组织了对敌斗争胜利的国家。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负责研究德国对盟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数额与方法问题，并同意将苏联提出的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其中50%应归苏联所有的建议作为赔偿委员会考虑的提案之一。

第二，关于波兰问题。这是苏联和英美在会议期间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波兰政府组成和边界两个问题上。

波兰沦亡后，原波兰政府成员先后逃往巴黎和伦敦，在国外组织了流亡政府。在国内，波兰工人党组织了人民近卫军，并在1943年底联合国内民主党派在华沙秘密成立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1944年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宣布组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1945年初，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波兰临时政府。英、美曾企图让波兰流亡政府回国执政，在遭到苏联坚决反对后，又提议把流亡政府整个并入临时政府，仍遭苏联拒绝。面对苏联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已事实上在国内行使职权的形势，英、美被迫妥协。雅尔塔会议最后达成原则协议：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由美、英驻苏大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与波兰临时政府代表及波兰国内外其他民主领袖进行磋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政府。

关于波兰疆界，会议决定：“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地区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即从德国获得领土的补偿，补偿的范围应“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第三，关于组建联合国问题。早在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苏、

美、英三国代表和中、美、英三国代表就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了会谈，就建立联合国问题进行过详尽讨论。四国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提出了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内容，遗留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苏、美、英三国原则上都同意设立否决权，实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但美、英主张在常任理事国成为争端当事国一方时，该理事国不应参加投票，而苏联反对任何限制否决权的规定。此外，关于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首脑就上述两个遗留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了协议。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采纳了美国的折衷方案，即规定对有关强制执行的任何决议案都需要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当事国不能投票的原则只适用于那些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常任理事国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都拥有否决权。会议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确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创始会员国。会议还决定，由苏、美、英、中四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以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作基础，制定联合国宪章，成立联合国。

第四，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根据美国联合参谋部当时估计，美军需要付出100万人员伤亡和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打败日本，因此，促使苏联早日参战，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要力争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个问题，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美苏就有接触。1944年2月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在背着丘吉尔的秘密会谈中达成了协议。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在他们已经商定好的《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文本上共同签字。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从沙俄手中夺取的“权益”须予恢复，即：1.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2. 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3.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协定还指出：“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予以实现。”美国之所以同意苏联这些条件，为的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伤亡，并防止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维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直到1945年6月14日才由美国通知中国国民党政府。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根据美国的要求，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上接受了上述条件。

会议通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声明三国将“协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欧洲的前轴心附庸国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南斯拉夫、伊朗、巴尔干以及遣送战俘等问题。

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会议，它对协调盟国最后战胜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巩固盟国的合作，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它的一些决定对制裁德国和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的条款，是背着中国人民作出的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雅尔塔协定是美苏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产物。

纳粹德国的倾覆 1945年春，苏联和美、英等盟国军队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德国本土作战。苏军进抵奥得河、尼斯河一线，距柏林只有60公里。盟军先头部队推进至易北河附近，距柏林100~120公里。东西两线军队都为最后粉碎德国法西斯积极进行准备。与此同时，美、英军队于1945年4月在意大利发起最后进攻，在波河一带歼敌3万人。意大利人民在北部举行武装起义。游击队和起义工人解放了米兰、热那亚、都灵等城市，并抓获和处死了墨索里尼。4月29日，在意大利的德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希特勒在欧洲的轴心伙伴已纷纷垮台，德国法西斯已完全孤立。

希特勒困兽犹斗，并指望反法西斯联盟内部发生分裂而使战争出现转机。他下令实行超级总动员。德国15~18岁的孩子和50~60岁的男子都必须应征入伍。老弱妇孺、战俘和外国劳工被驱使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为防守柏林，德军集结了100万人的兵力、1500余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04万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架作战飞机，并建立了纵深梯次防御系统，包括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地区和柏林防御圈。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地区由三道防线组成，纵深20~40公里，主力配置在第二防线。柏林防御圈由外层、内层、市区三道围廓组成。城内划分为九个防御区，构筑了四百多个钢筋混凝土的堡垒。

为攻占柏林并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苏军集结兵力250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6250余辆、火炮和迫击炮4.2万门、作战飞机7500架。苏军在兵力和兵器上占有绝对优势。

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时发动进攻，分别于19日和18日突破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地区。4月24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柏林东南会合；次日又在柏林以西会合，从而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同一天，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在距柏林120公里处，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与美军会师，使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连成一片，而德军则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4月20日，白俄斯第二方面军发动进攻，强渡西奥得河，保障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在柏林北面的攻击。

这时，法西斯党内部分崩离析。希特勒的昔日亲信戈林、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等纷纷逃离柏林。4月23日，戈林从德国南部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接管全部权力，代表元首“在国内外充分地自由采取行动”。希姆莱则背着希特勒与英美秘密联系，准备投降。希特勒得知后大怒，骂戈林是混蛋，希姆莱是“卖国贼”，下令将他们逮捕，但已无法行使权力。

1945年4月26日，合围柏林的苏军部队采取多路向中心突击和分割围歼的战术，开始强攻柏林。4月27日，苏军突入柏林市中心。4月29日，德军被分割成三个孤立部分，苏军开始强攻德国国会大厦。经过逐层逐级地争夺，苏军战士于4月30日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德国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就在这一天，罪大恶极的希特勒绝望自杀。5月2日，德军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率守军残部投降。对企图由市区西逃的德军零星部队的作战，延续到5月5日结束。在柏林战役中，苏军共歼灭德军93个师，俘虏48万人。

1945年5月7日，德国代表在盟军司令部所在地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代表盟国签字的是美国史密斯将军，苏联的一位将军与法国代表作为见证人参加签字仪式。斯大林认为，苏军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柏林是苏军攻克的，因此，兰斯的投降仪式从方式到地点都是不恰当的，它有损苏军

的威望。苏军最高统帅部批评了自己的前线指挥官，苏联政府则向英、美提出交涉。最后商定，兰斯签降只算预演，正式签降由苏联政府的代表主持，地点在德国柏林。5月8日柏林时间22点43分，莫斯科时间5月9日0点43分，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近郊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主持签字仪式的是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待朱可夫等同盟国的全权代表在德方签署的投降书上签了字，已是莫斯科时间5月9日0点50分。此后，在习惯上，西方国家以5月8日为停战日，而苏联则宣布5月9日为胜利日。

波茨坦会议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宣告欧洲战争结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法西斯节节败退，但仍负隅顽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排战后世界和分享战争胜利果实，以及如何迅速击败日本法西斯，成为苏、美、英三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第三次会晤。出席会议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7月28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随同出席会议的有三国政府的外长、参谋长及顾问们。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战已指日可待，共同的敌人正在逐渐消失，因而苏联和美、英之间在安排战后世界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经过十多天的争论、磋商，于8月2日签署了《苏美英三国的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和《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两个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这两个文件通称波茨坦协定。

协定进一步确定了占领管制德国的政治、经济基本原则。政治原则是：肃清纳粹主义和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协定规定：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的指令，分别在其各自占领区内实行，他们并以管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共同处理有关全德事宜；解除德国的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消灭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制止一切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废止一切纳粹法律；逮捕并审判战争罪犯；德国的行政管理地方化、分散化。对德管制的经济原则是：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禁止军事生产，铲除或控制可用作军事生产的一切工业；德国的经济应尽可能在最短时期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特别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协定所形成的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重点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满足国内需要；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

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达成了协议。苏联所提赔偿要求，将以没收德国境内苏占区内的资产及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苏联从其所得的赔偿额中，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美、英及有权获得赔偿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将从西部各占领区及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此外，苏联还将从西占区内应拆迁的工业设备中无偿抽取10%作为赔偿，另以食品、煤等商品作交换抽取15%。德国的军舰和商船由苏、美、英三国均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及邻近地区让与苏联。

关于波兰问题，美、英同意承认波兰统一临时政府，并撤销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对波兰西部边界，三国首脑同意，在其最后划定之前，原德国的东部领土，即自史温曼德以西的波罗的海沿岸奥得河至与西尼斯河会合处，再沿西尼斯河至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包括经本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的一部分东普鲁士和以前的但泽自由市，均由波兰政府管辖。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由和约解决。

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的外长会议，以进行关于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战后处置日本的方针。并通过一项决议，即《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因为当时苏联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所以没有签字。公告是以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的。中国政府没有参加讨论，但事前征得了它的同意。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在公告上签字。这样，公告就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消除日本军国主义，严惩战争罪犯；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之工业；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必须消除。公告宣称：“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个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军队当即撤退。”

波茨坦会议协调了三大国在打败日本法西斯和战后处置德国、日本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对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巩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苏联和美、英在这次会议上对战后世界安排问题达成的协议与存在的分歧，对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日本的投降 1945年3月，日本统治集团制订了“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打算在本土实行决战，以作最后挣扎。6月，日本政府又先后颁布“义勇兵役法”和“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规定15~60岁的男性公民和17~40岁的女性公民均须服役，非服役人员必须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从事各种为战争服务的活动。为了实施本土决战，日军还从中国、朝鲜等地向本土调兵。《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统治集团十分恐慌，但日本政府表示拒绝接受公告。反法西斯盟国当即进行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决战。

美军为摧毁日本的军事工业、海空军设施和战争意志，从1944年中起就派飞机对日本连续实施大规模的战略空袭。到1945年8月中战争结束前，美机共出动14,569架次，投弹17万多吨。美军的轰炸，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日本军民的士气，但也导致大量日本居民死伤。

1945年7月中，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为加速战争进程，争取在苏联参战前迫使日本投降，并在战争结束前对原子弹进行实战效应试验，美国决定对日本投掷原子弹。1945年8月6日，美机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炸死7.8万人，炸伤3.7万人，死伤人数占当时广岛实际人口24万人的48%。8月9日，美机又在日本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造成了2.37万人死亡，4.3万人受伤，死伤人数占当时长崎实际人口23万人的29%。此后，这两个城市又有大量人口因患原子病而死亡。据统计，广岛现场死亡和后来因患原子病死亡的总人数达17万人；长崎现场死亡加上随后五年因原子弹爆炸死亡的总人数达14万人。美国投掷原子弹对加速日本投降起了促进作用。

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为履行承诺，着手准备对日作战。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6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设立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并从西线秘密抽调75万人到远东地区。远东苏军总司令部辖三个方面军及太平洋舰队、阿穆尔河区舰队和北太平洋区舰队，计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兵集团军和部

分蒙军，总兵力达 174 万人。当时驻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的兵力约 70 万人，还有伪满军队等约 20 万人。苏军在兵力、兵器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晨，苏军分别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朝鲜北部四千多公里战线上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进攻。至 14 日，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8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下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洽降。8 月 19~24 日，苏军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主要城市空降部队，先后进占齐齐哈尔、沈阳、哈尔滨、长春和旅顺。至 8 月底，苏军在中国军民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配合下，肃清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顽抗的日军。同期，苏军还进占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9 月 1 日占领国后、色丹两岛。在对日战争中，苏军共击毙日军 8.3 万余人，俘虏 59.4 万人。苏军的胜利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

1945 年 8 月 9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的军队作战。八路军、新四军抽调 10 万余人进军东北，会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各解放区军民展开大反攻，从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收复县以上城市 150 余座。亚洲各国人民抗日武装也纷纷发起反攻，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坚决打击下，日本法西斯已陷于全面崩溃，山穷水尽。1945 年 8 月 9 日上午，日本军政要人在皇宫的防空洞内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以外相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在维护国体，即保存天皇制的前提下无条件接受，而陆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反对无条件投降，认为如果这样，还不如实行本土决战。两派争论激烈，相持不下。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例会上仍然意见分歧，议而不决。于是在 9 日深夜召开了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铃木首相要求“依据圣断作出会议决定”。天皇表示赞成外相的提案。日本政府遵照裕仁天皇的指示，向瑞典和瑞士发出电报，请求两国政府转告中、美、英、苏四国，如日本皇室及国家主权予以确定，日本即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2 日，盟国复称：“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终形式须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8 月 13 日，美国谴责日本故意拖延投降时间，进行猛烈空袭。8 月 14 日，裕仁再度召开御前会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心没有改变。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7 日又向国内外日军发布和平投降的命令。散布在国外各地的 330 万日军陆续向盟军投降。8 月 30 日，美军在东京及附近地区登陆，实现对日本的占领。9 月 2 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签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和受降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也签了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民主力量与妄图称霸、奴役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展开的一场殊死搏斗。苏、中、美、英等近 50 个国家结成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相互支持，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

这场大战是迄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争。它历时六年，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战争的漩涡，战火燃

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 2200 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 1.1 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 1 亿人，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 1.3 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收入的 60%~70%，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 4 万亿美元。

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苏联军民是打败“轴心国”元凶——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为了夺取苏联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军民伤亡达 6000 万人以上，死亡 2700 万人，其中苏联红军牺牲 866.84 万人，物质损失按照 1941 年的价格达 6790 亿卢布。据统计，二战参战国蒙受的全部损失中有 41% 是苏联的损失。

美、英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在二战期间约向 38 个国家提供了总计 500 多亿美元的租借援助，牺牲官兵 40.5 万人，英国也有 37.5 万官兵在战争中牺牲。

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个主战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牺牲 2100 多万人，财产损失和物资消耗 1000 亿美元以上。

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给侵略国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据统计，德国在战争中死亡和被俘的人数达 1360 万人，其中 1000 万人损失在苏德战场上。在德国本土上，有约 400 万平民死于战火，1400 万人无家可归。日本在中国战场死亡 150 万人，在太平洋战场死亡 124.7 万人。

上述数字表明，法西斯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世界人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才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有见识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在一些国家拥有极大杀伤力的核武器的情况下，战争，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不一定是争取大国霸权地位的好办法，还有可能使交战双方都遭到毁灭性打击。遭受二战劫难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决不允许这种悲剧重演，何况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人类遭受的浩劫将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日益成为广大人民和各国政府最关切最重视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反法西斯同盟国之所以获胜，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法西斯轴心国。战前，德、日等国走军事强国之路，其军力在 30 年代后期大增，对外扩张也连连得手，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单纯的军事强国难以维持长久。德、日最终还是被逐出强国之林。有远见的政治家由此看到，强国之本首先在于发展科技和经济。国家的安全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不单纯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而是要看综合国力的强弱。政治家们愈来愈重视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广大人民在经历困苦战争年代之后，强烈要求把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用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样，发展经济和保卫和平就成为战后世界的主要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出来的原子能、火箭、雷达、生化武器等技术，在战后陆续运用于民用生产，从而推动了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使战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引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化。

二战期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运用国家的力量把经济纳入战时轨道，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从而深刻地改造了战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荡涤了法西斯的污泥浊水，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得到新的发展。

由于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时期得以摆脱 20 世纪上半叶所陷入的全面经济政治危机，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二战的结果是，德、意战败，英、法削弱，整个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欧洲列强主宰世界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欧洲中心地位丧失的同时，美、苏崛起，发展成世界超级大国，形成美苏两极冷战对峙的世界新格局。随着西欧的复兴、联合，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日益强盛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又逐步向多元结构的新时代过渡。

战争引起了革命。中国、朝鲜、越南和东欧国家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它们和苏联一起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一支强大的新兴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创造了有利于民族独立运动成功的内外新因素、新条件。战后，在亚、非、拉兴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